



童小鹏 著

风雨四十年

(第二部)



为《风雨四十年》序

杨尚昆

童小鹏同志要我为他所写的、以回忆周恩来同志为主要内容的《风雨四十年》写个序，说几句话。

周恩来是举世闻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杰出领导人之一。他生前从不愿意别人称赞自己的功绩，而且在病中留下遗嘱，死后要把骨灰撒向祖国大地，不愿后人为他树碑。可是，他为中华民族解放，为人类进步事业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德，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早已为人民所崇敬，作为学习的楷模。因而，有关周恩来的传记、文章和文学作品，一问世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并广为流传；故此，用各种体裁、从各个角度介绍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我们留下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供正在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而努力的人们学习，是党史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任务。童小鹏正在做的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童小鹏是长期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的。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几天，他就随周恩来来到西安工作，以后又一直在南京、武汉、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和党的长江局、南方局工作，1946年又随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南京，直到1947年3月7日随董必武等最后一批人员撤回延安。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一方面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一方面又负责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在敌后开辟第二战场的工作，为此，党中央成立了中央城市工作部，周恩来兼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李维汉率领城工部机关随叶剑英和我领导的中央后委机关去山西临县三交镇附近工作。童小鹏任城工部秘书处长，负责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秘密电讯工作。1948年9月，中央城工部改为中央统战部后，童小鹏任副秘书长、秘书长。1958年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直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调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文革”浩劫，童小鹏也未幸免，被打成“走资派”，又以“特嫌”为由隔离审查，下放劳动，直到1973年才回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这时，周恩来虽患不治之症，仍关心并指导统战工作，直到弥留之际。

童小鹏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近四十年，许多老同志都希望他尽早把他所知道的周恩来写出来。他早在1984年就制定了《风雨四十年》的写作计划，陈云同志还为他题了书名；他征求过我的意见，我极表赞成，并同意作序。可是因为他几年来一直忙于负责过去战争时期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长江局”、“南方局”、“南京局”的党史资料的征集出版工作，同时出版了他的影集《历史的脚印》，无暇动笔。现在上述工作都已结束，他决心“叶落归根”定居到福建去完成这一任务，这是一个好主意。除了文字的叙述外，他还准备按内容插载当时当地他亲自拍摄的珍贵照片，堪称文图并茂。我想这本书的出版，一定能够深受读者的欢迎，并从中汲取精神食粮，以实际行动来完成革命先辈未竟事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祝愿《风雨四十年》的早日问世和取得成功！

1991年11月

风雨四十年
第二部

协商大政肇划开国

“五一”口号与群贤北上

1948年3月中旬，中央后委（叶剑英、杨尚昆负责）根据中央的指示，分批从山西临县三交地区向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转移，与中央工委（刘少奇、朱德、董必武负责）会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转战陕北胜利结束后，3月21日率党中央和军委机关东渡黄河，行千余公里，经晋绥边区于4月13日到达晋察冀中央局驻地——河北阜平县的城南庄。毛泽东在这里住了一个时期。周恩来、任弼时先率中央和军委机关于4月23日到达河北建屏县（今平山县）的西柏坡。

这时，人民解放军不仅转入战略进攻，消灭了大量敌军，而且收复的城市也不断地增加。河南的洛阳、开封，山西的运城、临汾和距离西柏坡仅百余里的石家庄相继解放，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土改运动也全面展开，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及华南武装斗争也蓬勃发展，形成了配合解放战争的第二战场。一些民主党派在香港、上海、昆明等地相继恢复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力量在迅速壮大，而蒋介石政权处于朝不保夕、摇摇欲坠的境地，新中国诞生的前景已经清晰地显示出来。

中央研究了全国形势后，于4月30日发布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五一劳动节号》，响亮地提出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当天，毛泽东致电香港李济深、沈钧儒，并指示潘汉年登门进谒。电文说，要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政治协商会议，提议会议的地点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在今年秋季，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请参加此项会议，以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联合，拟订民主政府的施政纲领。中央的号召切合时宜，反映民心，很快得到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和国外华侨的热烈响应，迅速发展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推动了全国民主力量的广泛团结。

1945年8月到10月，毛泽东、周恩来和蒋介石在重庆谈判，10月10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到31日，蒋介石根据《双十协定》召集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了基本符合全国人民和平民主愿望的五项协议，这就是俗称的旧政协。可是，五项协议的墨迹未干，就被蒋介石一手撕毁。1946年6月，开始对我中原军区大举进攻，全面内战从此爆发。11月，蒋介石又召开所谓的“国民大会”，公开背弃政协协议。而我党号召召开的是新政协会议，是不允许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派和反动分子参加的会议；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拥护新民主主义，团结一切人民民主力量，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所以，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爱国民主人士在党的“五一”口号的号召下，群情激奋，立即响应。5月4日，华侨首领陈嘉庚代表在新加坡的120个华侨团体致电毛泽东，表示响应“五一”号召。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从香港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五一”号召，并通电国内外。7日，台

湾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响应“五一”号召，接着，在港的各界民主人士柳亚子、茅盾、冯裕芳等 125 人，妇女界何香凝、刘立明等 232 人以及南洋、法国、加拿大、古巴华侨代表，纷纷致电毛泽东，拥护中共的主张。23 日，民主建国会在上海作出决议，指定驻港代表章乃器、孙起孟表明响应“五一”号召的态度。在美国的冯玉祥将军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积极支持民主运动，为和平民主奔走呼号，批评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在“五一”号召发出之后，他搭乘苏联轮船“胜利号”回国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但航行到黑海时因轮船失火不幸遇难。10 月下旬，他的夫人李德全带着冯先生的骨灰回到祖国东北。随后，她也投身于筹备新政协的工作。

“五一”号召发出后，新政协的整个筹备工作就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开始了。中央城工部负责同上海、香港地下党组织保持秘密电台联系。7 月底到 8 月初，周恩来致电上海、香港党组织和华北局，准备安全接送沪、港、平、津的民主人士和党员到解放区。9 月 26 日，中央为了适应统战工作需要，决定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改称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高文华，秘书长齐燕铭，我为副秘书长。首要任务是协助中央作好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具体工作，组织接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各界知名代表到解放区。李维汉部长给统战部同志开了个会，说明召开新政协会议的重大意义，动员大家以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延安精神，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光荣的政治任务。会后，大家就紧急动员起来，分别投入紧张的筹备新政协的工作。齐燕铭负责民主人士的政治联络和协商工作，章汉夫、于刚等也参加了这项工作。李维汉分别同民主人士交谈，并组织集体讨论。统战部随时把民主人士对新政协的意见向周恩来和中央反映，重要问题都及时向中央请示报告。周子健是总务处长，负责解决民主人士的吃住问题，伙食都按中央机关小灶标准供给。住房除了挤出较好的民房外，请当地工匠利用空地或旧房基盖起了几栋土木结构的平房，砌上土炕，再配上木制家具。这种居住条件虽然很简陋，但在李家庄算是最高级的了。从上海、北平来的民主人士看到他们的居住条件比李维汉部长还好，对共产党的优待感到过意不去。另外，在石家庄建立交际处，以原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为基础，增加一些干部，由金城、申伯纯负责。民主人士到来，先给予热情招待，然后用吉普车转送李家庄。我除分管行政工作外，主要是负责同上海、香港等地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无线电台联络，保证及时、准确传达中央的指示并向中央报送收到的电报。因为收发电报多在深夜，要及时处理，电台离驻地又远，译电员就用我炕头的手摇电话机同电台收转电报码子。所以，常常是深夜不眠。

正在我们紧张工作的时候，蒋介石于 10 月下旬飞抵北平，想乘我华北主力部队在察哈尔、绥远地区作战之机，命令傅作义指挥两个军从保定突袭石家庄，威胁我党中央的安全。党中央及时得到北平地下党的准确情报后，周恩来亲自部署人民解放军准备反击，并于 27 日凌晨 4 时半、6 时、7 时三次写信给毛泽东，汇报我军部署情况。周恩来指挥解放战争已经够忙了。9 月，他敦促国民党整编第 96 军军长吴化文在济南起义。10 月 17 日在获悉国民党第一兵团副司令兼第 60 军军长曾泽生在长春率部起义后，周恩来向毛泽东等介绍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的情况，说明在目前情况下，争取其起义，则对整个黄埔系军队的影响当会很大。毛泽东赞成这一分析，随即电告中共中央东北局并林彪、罗荣桓，指出对郑“可努力争取之”。18 日，他又写信给郑洞国，敦促其起义，投向人民。19 日，郑洞国

在长春放下武器，促使辽沈战役的迅速胜利结束。而今，得悉华北敌军企图偷袭石家庄，周恩来一面力中央军委起草命令紧急调动部队，准备集中主力将进犯的敌军各个击破，一面对中央机关布置了周密的紧急疏散措施，除少数老弱病号和儿童疏散到后方外，党中央和军委机关照常工作。敌军袭来，遭到我军迎头痛击，被歼 3000 多人，才知道我方早有准备，遂令后撤，蒋介石偷袭石家庄的阴谋就此破产。

1948 年 8 月 1 日，毛泽东复电给集中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对他们赞同召开新政协表示钦佩，并提出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人士共同商讨，并以卓见见示。从这个时候开始，筹备新政协会议就成为我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摆在紧迫的议事日程上了。

如何把滞留香港的民主人士安全地接到解放区来共同商议召开新政协？周恩来曾试探开辟自欧洲到苏联再转赴哈尔滨的路线，但未能在短期内打通。同年初秋，周恩来曾经电告在香港的潘汉年设法与港方交涉。潘汉年通过民主同盟的萨空了，去找香港当局指定穹中共中央及民主党派联系的香港大学校长施乐斯。施乐斯对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李济深、沈钧儒要从香港去伦敦转经苏联到中国东北解放区一事请示港督，港督表示对这件事作不了主，他要请示伦敦英国政府，且要较长的时间才能答复。施乐斯语意搪塞，态度敷衍。因此，周恩来决定在港民主人士不走这条路线，改走香港到大连或朝鲜罗津等航道，来完成迎接民主人士到解放区这项重要又机密的任务。12 月，施乐斯才转告伦敦的意见说，不发护照但可给一纸证明身份的文件，离开伦敦时还可以保护。可是伦敦回话时，我们已经安全地迎接了两批民主人士七到达解放区了。

早在 8 月 2 日，周恩来致电在大连工作的钱之光，要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尽快去香港，配合香港分局负责接送在港的民主人士。钱之光到港后，住在铜锣湾希云街 27 号，就和香港分同方万、潘汉年、章汉夫、连贯、夏衍等共同把民主人士北上的接送任务紧张又审慎地开展起来。

9 月 20 日，周恩来拟定了邀请从港、沪和长江以南各地前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 77 人的名单，其中有李济深、蔡廷锴、张澜、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何香凝、史良等著名人士。同时，他又起草发出中央致香港分局并钱之光和上海局刘晓、刘长胜的电报，征询对名单的意见，还指出，各方人士于今冬明春全部进入解放区方为适宜。北来人士，拟先集中哈尔滨招待商谈；华北民主人士如直接进入解放区，则集中华北。视战事发展，明春或来华北或即在哈市召开新政协。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民主人士的接送要绝对保密，保证安全，做到万无一失。钱之光和方方、潘汉年等作了仔细周密研究，为了不引人注目，决定分批秘密接送，由同民主人士保持联系的侨港分局、香港工委以及其他党内同志分别联络。为了保证旅途安全，商定每次都由负责同志陪同下船，并派出熟悉旅途情况的同志随船护送。在联和公司工作的杨琳、袁超俊、刘恕，在中华贸易公司工作的祝华、王华生、徐德明，都参加了护送工作。

从 1948 年 9 月到 1949 年 3 月，先后接送了 4 批在港的民主人士安全抵达解放区。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由祝华、徐德明随船护送，于 9 月 29 日安抵哈尔滨，中央派李富春专程迎接。

因为这一批都是知名度很高的重要人物，钱之光在接送工作准备完成后，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周恩来复电同意了行动计划，并指示“这是第一批，出发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报告”。10月3日，沈钧儒等到达哈尔滨的第四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欢迎他们安抵东北解放区，并告知准备于1949年适当时机举行新政协会议。

第二批北上民主人士搭乘的是一艘挂挪威旗的轮船，10月底才送走。他们中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翦伯赞、宦乡、曹孟君、韩练成、冯裕芳（冯12月27日在沈阳病逝）等人，由连贯陪同，王华生随船护送。这艘船在航行途中，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用自己装的收音机收到新华社播发的沈阳解放消息，大家听了都很高兴，在船上开了一个热烈的庆祝会，郭沫若、曹孟君表演了节目，有的唱歌跳舞，有的朗诵诗作，充满胜利的欢乐。他们的船驶至大连、安东（今丹东）间的大东沟海面抛锚启航，改乘小船上岸，东北局负责同志去安东迎接，他们经安东转赴哈尔滨。

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有李济深、朱蕴山、茅盾夫妇、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洪深、施复亮、梅龚彬、孙起孟等30多人，是人数最多的一批，由李嘉仁陪同，徐德明随船护送，于12月26日晚上乘“阿尔丹”号轮离港，1949年1月7日到达大连，中共中央派李富春、张闻天专程到大连迎接。

李济深等这批民主人士离港之前，周恩来曾经电示钱之光和在大连的冯铤、刘昂说：“已经走了两批人员，很可能引起外界的注意，这次行动要更加谨慎。”钱之光等根据周恩来的电示更加精心、谨慎行事，对这批北上的民主人士穿戴也煞费苦心，有的西服革履，扮成经理模样；有的则是长袍马褂或是普通便服，化装成到东北做生意的商人，口袋里还装有货单准备应付检查。在这批上船的民主人士中，李济深是位很有影响的人士，可他秘密地离港走了，连香港当局政治部也不知道。李济深走了几天，该政治部主任亲自找到民革的副秘书长吕集义，责问说：“李先生这样一个有影响的人物离开香港，你们为何事先不告诉我们，叫我们怎样交待？”话语不无责怨。呵是，李济深没几天就安抵大连了。

第四批民主人士是1949年3月14日从香港出发，在天津上岸。这次北上的有黄炎培、姚维钧、盛丕华和他的儿子盛康年，还有俞寰澄等人，由刘恕护送。他们于3月25日到达解放了的北平，董必武、李维汉、齐燕铭等前往火车站迎接。至此，香港分局，香港工委和钱之光等同志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周恩来的亲自部署，接送在港的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和著名的进步爱国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重要使命，便按期胜利地完成了。

周恩来在部署迎接在港的民主人士北上的同时，也部署迎接上海、北平、天津的民主人士到中央统战部驻地的李家庄。主要路线是：在上海的，秘密经苏北或山东转石家庄；在北平、天津的，经华北局城工部的秘密交通站沧州南边的泊头镇转往石家庄，由设在石家庄的交际处转送到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李家庄。1948年8月，当时的城工部就开始接待工作，到11月底，由平、津、沪、西安等地来到李家庄的民主人士有毛泽东的老师符定一和胡愈之、沈兹九、吴晗、周新民、刘清扬、严信民、韩兆鹗、何惧等。而后来又来了周建人、雷洁琼、楚图南、田汉、安娥、杨刚、张曼筠、周颖以及上海工人代表朱俊欣等。中央统战部热情接待后，同他们个别交换意见，举行时事座谈会，讨论国际国内形势，座谈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

问题（草案）》和统战部起草经周恩来批准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

10月8日，周恩来电告东北局组织已到或将到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李德全等举行座谈，征求意见，以达到沟通思想、统一思想认识的目的。11月21日、23日，东北局高岗、李富春组织了两次座谈会，邀请民主人士座谈两个《草案》。30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香港分局电，将两个《草案》转告尚在香港的民革李济深、何香凝，民盟周新民，农工民主党彭泽民，民建章乃器、孙起孟等人，征询他们的意见。经过多次电报往返，反复协商，于11月25日，我党代表高岗、李富春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对新政协会议的召集、参加者、时间、地点、讨论事项等问题达成了如下协议：新政协筹备会由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筹备会的任务为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各方代表人物、起草文件和召集新政协正式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由中共起草，俟筹备会开会时正式通过；筹备会会址预定为哈尔滨。关于新政协参加范围及任务，决定：一、新政协的参加范围，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士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许参加；二、新政协举行时间在1949年，具体时间及地点由筹备会决定；三、新政协应讨论和实现的问题是共同纲领的制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

11月2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致函中共上海局，将东北民主人士讨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的各项意见转告他们，并将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央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11月25日商谈的共同协议转发给他们供研究，并据此转告各有关方面。12月19日，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从香港到达沈阳后，随即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代表致公党全体同志向中共中央致敬，表示对召开新政协诸问题草案的理解，愿为实现新民主主义、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沸腾的李家庄

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李家庄，是距离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只 5 华里的一个小村，村里几十户人家。可是，一批批民主人士到来，这个村变得沸沸腾腾、热热闹闹。

1948 年 12 月 25 日，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举行时事座谈会，与会者有胡愈之、沈兹九、刘清扬、韩兆鹗、周建人、吴晗、杨刚、严信民、楚图南等，由胡愈之主持会议。李维汉、章汉夫等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就国际国内政治形势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过了 6 天，正是 1949 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揭露了美蒋勾结玩弄假和谈的阴谋，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一定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因为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耍弄两面手法，一面表示愿意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另一面又提出要保持旧宪法、法统、团体及军队等先决条件。内容上在新年献词中已给予严厉的揭露驳斥。1 月 4 日，毛泽东特为新华社撰写了一篇《评战犯求和》的重要评论，一下子就更戳穿了蒋介石想利用和平谈判来保存反革命实力的阴谋。14 日，又发表了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痛切地再批驳蒋介石的新年文告，并提出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改编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系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声明》一发表，立即成为民主人士的热门话题。在李家庄、哈尔滨的民主人士都热烈进行讨论，在香港以及上海、重庆各地的民主人士也秘密地进行谈论，一致驳斥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险恶阴谋，同时一致表示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和谈八项条件。在李家庄的符定一、周建人、胡愈之、沈兹九等 19 名民主人士，早在 1 月 7 日就联名致电在哈尔滨的李济深、沈钧儒、蔡廷锴、谭平山、章伯钧、郭沫若等人，提出对战犯求和必须“芟恶务尽”，将革命贯彻到底：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决不能容纳反动分子于人民阵线内部。16 日，在李家庄、哈尔滨的民主人士互相致电联络后，决定起草发表告国人文件，严正表示他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态度。

1 月 16 日下午，周恩来在百忙中从西柏坡乘吉普车来到李家庄。虽然天寒地冻，可是小小的李家庄一下子就热闹起来。村民听到汽车进庄的声音，都拥到进庄的路边看热闹。统战部工作人员和民主人士也纷纷走出门来欢迎。周恩来身穿一套和大家一样的灰棉布军衣，头戴大耳朵军帽。他一进庄就下车向群众招手，同民主人士一一握手问好。齐燕铭秘书长招呼周恩来和民主人士进入一间墙泥未干的会议室就坐。我和统战部干部围在四周，坐的坐，站的站，一下子就挤满了一屋子。李维汉当即宣布：“请周恩来同志作报告！”周恩来在热烈的掌声中谦逊地说：“本来就应该来看望各位先生并当面请教，因为战争紧急抽不出身来，好在统战部随时将各位先生对召开新政协的意见报告了毛主席和党中央。今天本想先听听各位的意见，李维汉却对我说许多先生要求我先讲，然后大家再座谈发表意见。那么，我现在就向大家报告一些情况……”

周恩来报告了解放战争的发展情况后说，战争的发展实在是突飞猛进。战争大局已定，今年就有可能打垮蒋介石，但是现在切不可手软。他接着对

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中的8条作了详尽的阐述，又说：“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鲁迅先生说得好，要痛打落水狗，对落下水的狗还要痛打。天津已于昨天解放，正在争取早日解放北平。如北平解放得早一些，政协筹备会的工作更要加速进行，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周恩来的报告受到大家的热列欢迎。

会后，统战部全体工作人员和民主人士会餐。菜不多，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主要的一道菜是长征老战士、老伙夫班长胡金山做的红烧肉。为此，总务科长乔风咏亲自动手宰了自己饲养的一头大肥猪，加上大家自己动手种的大白菜，还有饺子、大米饭和白干酒。大家都吃喝得很是开怀满意。没有酒杯，就用粗瓷大碗代替，频频举碗同祝解放战争的胜利。席间，民主人士中的符定一先生年龄最大，已是快70岁的老人了，而且是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老师，所以，大家都向他敬酒，祝他长寿百岁。

饭后，在会议室举行跳舞晚会。当时统战部有个机要科，是由中央机要处拨过来的。他们在延安时，即是中央机关舞会上的乐队，又是可以下他的舞伴，他们就成了这次舞会上的主力了，三把胡琴，一支笛子，便是乐队。室内没有电灯，就用几盏马灯挂在屋墙四角，乐队奏起来，晚会就开始了。大家正跳得高兴时，朱总司令和周恩来也来了，使舞会达到了高潮。最后，大家扭秧歌。锣鼓一响，周恩来和大家一起扭起秧歌来。民主人士没有扭过秧歌，也高兴地跟着大家一起学扭起来。村里的群众围在门口看热闹。当晚，上海来的民主人士何惧和统战部的于刚特别兴奋，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两个酒仙互不相让，每人喝了两大碗白干，喝得酩酊大醉。于刚怕回家受妻子程绯英批评，便倒在我的炕上迷迷糊糊地睡了一宵。

1月20日，中共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在李家庄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欢迎来自各地的民主人士和上海工人代表。当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等乘几辆吉普车来到李家庄时，群众都不约而同地热烈鼓掌表示欢迎。欢迎会开得很热烈、很亲切，使民主人士深深感到解放区的温暖，纷纷发言表示拥护毛主席1月14日的《声明》，拥护共产党打倒蒋介石，将革命进行到底。

1月22日，中共中央对有关部门发出《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要求我党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向民主人士报告战争、军事政策、政权、土改、外交、经济、文化、教育、妇运等方面的情况，

要不加回避地正面解答有关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主动向民主人士进行宣传教育，并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周恩来还指示统战部给民主人士组织报告会。于是，统战部邀请了一些负责同志在李家庄给民主人士做专题报告，如胡乔木报告文化政策，邓颖超报告解放区的妇女工作，安子文报告干部政策，李维汉报告解放战争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斗争等，都受到民主人士的欢迎，不但增加他们对党的有关政策的理解，而且提高了他们商讨召开新政协的热情。

1月下旬，因为傅作义将军与平津前线司令部代表已经秘密签订和平协议，北平和平解放在即，形势发展迅速。毛泽东和党中央分别致电在海外的爱国侨领陈嘉庚、司徒美堂。电文说：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需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敬请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

在这之前的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特地联名致电在上海的孙中山夫

人宋庆龄。电文说：“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19日，毛泽东致函宋庆龄，信中说“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6月21日，周恩来也写信致宋庆龄，欢迎她北上共商建国大计。

邓颖超奉命抵达上海，拜访了宋庆龄，于7月21日复电周恩来、李维汉，告知孙夫人表示因身体不佳不能参加任何团体的业务，也不愿意参加任何团体，只愿以个人旁听的资格列席新政协会议。邓颖超向中央提议由特别邀请单位推选宋氏为代表。8月28日，宋庆龄在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邓颖超、廖仲恺先生之女廖梦醒、上海市军管会交际处处长管易文的陪同下，从上海乘专车抵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和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等59人前往北平火车站欢迎。

侨领陈嘉庚早在6月4日已偕庄明理、王雨亭由香港抵达北平，准备出席新政协会议。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李维汉、李济深、蔡廷锴、陈其尤等在在北平的侨生200多人到车站欢迎。

因为胜利形势发展飞快，召开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必须加紧进行。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在李家庄的统战部全体工作人员日以继夜不知疲倦地工作着。那段日子里，来往电报特别多，重要的由我随收随送给住在西柏坡的周恩来。有一次，我送电报去，正遇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作战地图前面聚精会神地研究战局，我赶快拿起照相机拍下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珍贵镜头（现在放大成几米大的照片陈列在西柏坡革命纪念馆的进门处）。不久，平津战役便宣告结束，北平获得和平解放。胜利的消息传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西柏坡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伟大形象，又光闪闪地浮在我的脑子里。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北平的和平解放，为政协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很好条件，同时又促使新政协筹备工作的加紧进行。周恩来考虑到政协会议会址从哈尔滨改在北平召开，为了及早在北平准备接待民主人士的住处和政协筹备会会场，便指示统战部派齐燕铭、周子健、申伯纯等立即从李家庄前往北平，在华北局与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协助下接管中南海，成立中南海办事处，负责中南海的房屋管理和环境卫生，同时接管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德国饭店等几家大饭店，准备接待来自各地的民主人士和参加政协筹备工作的人员。他还要统战部尽快准备好车辆，护送住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进北平。周恩来又指示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要警卫处先派干部和少数部队进驻中南海，负责安全保卫工作。2月1日夜，周恩来在西柏坡约见了即将出发北平的齐燕铭、周子健，向他俩当面交待了具体任务和注意事项。随后，齐、周就率领部分工作人员离开李家庄，打前站前往古都北平。而后，调回中央工作不久的杨超等同志也从西柏坡进入北平，住在北京饭店20多天，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李维汉的直接领导下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同中央统战部的一个工作班子一起，组织新政协会议材料，了解各民主党派的情况，提供各民主党

派、无党派人士的材料，为新政协会议的召开作了事前准备。

这期间，统战部更是忙碌、紧张，除继续同上海、香港党组织联系，继续组织接送民主人士到北平外，还起草了《对新政协单位与人选的拟议》这份重要文件送中央审批，又继续采用座谈会、个别交谈的方式，同李家庄的民主人士交换或听取对政协筹备工作的意见。当时，部分民主人士曾就战争罪犯问题举行座谈会，讨论了战犯定义和战犯名单两个问题。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吴晗、雷洁琼等 15 人整装也同齐燕铭一起前往北平。这是先行赴平的第一批民主人士。

“进京赶考去”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的《关于时局的声明》发表后，在国内引起极大反响，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分别在哈尔滨、李家庄发表谈话，表示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1月24日，清华、燕京两所大学教授张奚若、曹靖华、费孝通等52人也联名发表宣言。宣言说：“八项主张”是实现真正和平的最低条件，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到底。

2月14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成员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飞抵刚刚解放半个月之久的北平。邵力子以私人资格也随团到达。第二天，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会见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22日，颜惠庆等飞石家庄，傅作义、邓宝珊也同机到达。中央派李维汉到石家庄迎接，并陪同他们乘汽车到西柏坡。毛泽东、周恩来在西柏坡接见从北平来的颜、章、江、邵四老，对和平谈判及南北通航通邮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周恩来又接见傅作义，邓宝珊，称赞傅将军为了人民利益和平解决了北平问题，欢迎他同中共合作，欢迎他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会谈结束后，我分别给他们照了相。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央统战部开始分批迁往北平。秘书长齐燕铭和周子健、申伯纯一行已于2月3日进入中南海，先接管南海范围的房屋（因中海部分暂由北平市人民政府和民政局作办公室，到4月间才全部接收），立即成立中南海办事处，由周子健任处长，负责整修房屋，打扫卫生。因为中南海是明清皇朝贵族的住宅和花园，许多建筑物都已破旧。北平解放前，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部就驻在里面。他们只管使用，不管修理，许多房屋都搞得破烂不堪，到处堆着垃圾。中南海里头杂草丛生，污泥堆积，成为蚊虫滋生地。后来动员了部队才把污泥清理出去。对准备给中央领导同志居住和活动的颐年堂，准备政协筹备会办公开会的勤政殿和开大会用的怀仁堂，更是清理修缮的重点，还要进行扫雷，防火等安全检查。

与此同时，申伯纯率领交际处人员接管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德国饭店、远东饭店等几家大饭店，又协同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审查饭店有关人员并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布置安全保卫工作，为即将集中北平的大批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人物提供生活和工作的必要条件。

2月10日，原住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全部到达北平。14日，林伯渠离开西柏坡前往沈阳，迎接在东北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到北平，以便集中起来共商大计，成立新政协筹备会。25日，李济深一行35人由林伯渠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陪同，乘专列火车抵达北平。由中央统战部负责接待，安排在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北平市人民政府、中共北平市委根据中央指示，共同于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的欢迎大会，热烈欢迎由东北、天津、李家庄来北平以及留在北平的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刚从西柏坡回北平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也应邀参加。林伯渠、董必武、彭真、薄一波、聂荣臻等负责人都参加欢迎大会，宾主共400多人，大会开得既隆重又热烈。这是北平有史以来罕有的一次政治盛会。会后，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傅作义、邓宝珊、郭宗汾、周北峰等也应邀赴宴。宴后，观看了华北大学文工团的文艺节目。

3月10日，李维汉部长率领中央统战部大部人员到达北平。李维汉住在

丰泽园内的颐年堂后院正厅，其他人员大都住在居仁堂。大家安顿就绪，就全部参加紧张的工作，白天拜访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同他们交换筹备政协会议和党派工作的意见，晚上就组织情况汇报会，把民主人士的近况和意见综合成书面材料，报告周恩来和中央；另外组织座谈会，单是征求接管上海的意见就开了7次座谈会。会后，把许多好意见整理出来报告中央并电告华东局参考，我和机要科迟至15日才到达北平。我与紫非先住在颐年堂大厅的西侧。没几天，因为大厅要接待客人，就搬到后院的东厢房。那时候，因军委三局电台设在西郊八大处，送报挺不方便，便在中南海专设了一部电台和上海、香港等地秘密电台保持联络。

人们都还记得：1945年7月1日到5日，褚辅成、黄炎培先生和冷遯、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6位参政员以个人名义访问延安。黄炎培到杨家岭拜访毛泽东。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褚辅成、黄炎培和冷遯等6人到他家作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对延安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淳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听过黄炎培的耿耿谏言，对如何跳出历代统治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问题作了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时过3年余，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于1949年3月23日就要动身从西柏坡向北平胜利进发了。临行时，毛泽东既幽默风趣又意味深长地对随行同志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周恩来在旁也说：我们应当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周恩来这些话，就是重新喻示全党同志要经得起胜利的考验，告诫全党不能陷入“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周期率”中。其意义何等重大和深远啊！

3月25日清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乘火车到达北平清华园车站。下车后，先在颐和园休息。周恩来留下卫士长成元功看管文件等物，他没有歇息就同有关保卫同志去西苑机场察看、检查阅兵的现场。当日下午，在北平的党政军机关负责同志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各界代表人士共1000多人聚集在西苑机场，热烈欢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当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自颐和园到达西苑机场时，北平市市长叶剑英首先迎向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各界代表，也满怀热情与希望迎接自己的领袖。毛泽东、朱德等首先和工人代表一一握手。毛泽东一行来到160多位民主人士的欢迎行列，高兴地、热烈地与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黄炎培、郭沫若等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对和平解放北平有功的傅作义将军也来欢迎，毛泽东与他握手后还一起合影留念。阅兵开始时，毛泽东登上第一辆浅绿色吉普车，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也依次登车，乐队高奏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50门六炮陆续放出发发礼炮。第四野战军参谋长、阅兵总指挥刘亚楼陪同毛泽东检阅经过无数艰辛战斗的英雄部队。缓缓行进的阅兵车到来，“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翻江倒海般的澎湃起来。阅兵结束后，毛泽东等同工人、农

民、青年代表和民主人十一起拍了一张象征团结、胜利的照片，然后，驱车前往早已准备好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驻地香山。毛泽东住的“双清别墅”，原是熊希龄的私人别墅，房间不多，但风景优美，院子里有两口泉水池，故叫“双清别墅”。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住在“来青轩”。

中共中央到达北平香山后，周恩来又成了大忙人。

解放战争正在继续向国民党统治区胜利发展，大军强渡长江天险的准备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后方生产的恢复、交通线的修复和后勤供应的保障以及国统区第二战场的领导等等，无一不靠周恩来的组织和指挥。那时候，大多数民主人士已经到达北平，周恩来要分别拜访、接见和谈话，商量召开新政协会议；南京国民政府于此时也决定派代表团到北平来谈判。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周恩来的工作重心就必须转到国共和谈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上来。这样，就使得周恩来每天奔波于香山和北平城内之间。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首脑机关暂时先住在香山，这是中央办公厅早就派人到北平同叶剑英商定布置的。因为中央、军委在北平城内的房子还要有一段时间的清理准备，加上安全保卫工作尚未布置妥善，只好暂住香山了。香山是个休息的好地方，但对办公并不方便。香山离北平城有20多公里远，道路狭窄不平，所使用的汽车又都是从国民党那里接收过来的破旧货，走一程就要费1个多小时。这对大忙人周恩来来说，本来一天24小时他已不够派用，这阵子有时每天还得花几小时在路上，更增加了他的沉重负担。

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飞抵北平后，周恩来除非见毛泽东或在中央开会，就没时间往香山跑了。为了方便周恩来的工作，李维汉、齐燕铭同周恩来商量，在中南海颐年堂后院东侧叫菊香书屋的一个四合院里给他布置了临时办公室。北屋正房共5间，他不愿全用，只要了东头的两间，西头两间给林伯渠住，留下中间的一间作会客室和餐厅。由于周恩来往在中南海，他工作、休息就方便多了。因他的电报、文件和信函很多，统战部派杨超给周恩来当秘书（不久，杨超随军入川，由于刚接替）。周恩来的警卫员住在东厢房，我和紫非住在西厢房，中间是过道，恰恰我们成为看门人。

国共和谈破裂前后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代总统职。李宗仁企图通过和平谈判达到“划江而治”、在江南保留他的统治势力的目的，于22日发表文告，表示对“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接着，又连续派人来试探。对于南京政府的假和平圈套，毛泽东、朱德在致民主人士的电函中，有过生动的揭露：“现在残敌尚存，诡谋时作。求喘息谓为求和平，待外援名曰待谈判。口诵八条，手庇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3月24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决定派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为代表与中共进行谈判。26日，中共中央通知南京国民党政府：中共中央决定同国民党政府的和谈于4月1日在北平举行；中共方面代表为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周恩来为首席代表；谈判以1月14日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及八项条件为基础。29日，国民党政府又加派刘斐为代表，卢郁文、屈武为顾问，并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4月1日，中央加派聂荣臻为代表，又批准周恩来的建议，决定以齐燕铭为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于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于4月1日乘专机到达北平。周恩来没有亲自到机场迎接，只由徐冰、齐燕铭、刘亚楼出面。张治中走下机舱同徐冰等人握手后，便问：“怎么不见周恩来先生？”他心中好不打怵。当晚6时，周恩来才偕中共代表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到六国饭店看望并宴请张治中一行。宴会后，周恩来等同张治中作个别长谈，这次谈话涉及各个方面，主要的是对张治中表示中共对和谈的诚意，并说由于国民党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所以兵联祸结，国共两党的斗争20多年，对此历史责任是无可推卸的。他还对战争罪犯问题和战争责任问题阐述了我党的原则立场。张治中要为蒋介石争些面子。说战犯名单和首恶元凶的具体字样很难接受。他还拿在南京同何应钦研究的《和谈腹案》9条，向周恩来要求改变国共双方隔江对峙的局面，“化干戈为玉帛”，其实含义是宣布停战，划江而治。周恩来重申我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表现出坚定的原则性。两人在谈话中，周恩来询问张治中为什么在抵平之前特意两次去奉化溪口请示蒋介石，对此他很不满意。正是因为这件事，周恩来没有到机场迎接张治中一行。随后，周恩来与张治中等共同商定从2日起到12日止，双方代表作个别交谈，充分交换意见，然后再正式进行谈判。谈判的地点是中南海勤政殿。

4月8日，周恩来陪张治中到香山双清别墅谒访毛泽东。毛泽东和张治中在重庆谈判时期已是朋友。那天，毛泽东请张治中吃饭，又谈话近3个小时。9日，毛泽东接见邵力子、章士钊。10日，接见黄绍竑、刘斐。11日，接见李蒸、卢郁文。毛泽东同张治中谈话时，提到战争责任问题。他对张说：“重庆谈判以及随之而来

的政协决议、停战协定、整军方案等等，都是你亲自参与缔造的，谁撕毁这些协议，谁首先发动战争，你比别人清楚，这不是我们要提的要求问题，而是客观历史自行鉴定的问题，完全否定它们，

全国人民是不会同意的。”毛泽东也说到和谈，希望国民党内不赞成独裁的开明进步分子和一切真正主张和平的人能和我们合作。

13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1月14日提出的八项条件草就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于当天早晨交给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通知当晚进行

正式谈判。当晚，在谈判过程中，周恩来对南京和谈代表团进行有理有节的交锋，在原则问题上坚持不让步，而在细节问题上，中共代表团接受了南京代表团提出的某些修改意见。在 15 日第二次正式谈判中，南京代表团表示应该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并决定在 16 日派代表黄绍竑、顾问屈武带文件回南京，劝告李宗仁（代总统）、何应钦（行政院长）接受。周恩来在会上宣布，谈判“以 4 月 20 日为限期”，就是说南京国民党政府是否愿意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必须在 4 月 20 日前表明态度。

16 日这天，黄绍竑和屈武要乘飞机离平回宁请示和平协定签字问题时，周恩来工作很忙，但他觉得应当到西苑机场同他们作行前面谈。在途中，他几次催促司机钟步云把汽车开快一点，说一定要在飞机起飞前赶到。当黄绍竑等人正在登机时，周恩来及时赶到并在舷梯旁与他们谈了话。在回中南海路上，他表扬了司机钟步云。

20 日晚，南京国民党政府是否愿意签字的消息尚未传出。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去六国饭店同国民党代表约谈。谈话结束后，张治中走出会客室送周恩来。他俩人边走边谈，当走到楼梯口时，周恩来问张治中：“文白先生，依你看，我们渡江要多长时间？”张治中沉思片刻，说：“宁、沪、杭地区国军有 40 多万军队，防线也有几个月的准备，工事坚固，又有海、空军配合，你们没有 5 至 7 天的时间怕渡不过去。”周恩来一听，微笑着和他握手道别，又回中南海继续办公。

当晚深夜，李宗仁、何应钦致电在北平的张治中及各位代表，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因为李宗仁接到《协定》后，向在奉化溪口的蒋介石请示，蒋指示李宗仁万万不能签字。南京政府和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常会、中央政治会议紧急商讨，决定不接受《协定》。于是，李宗仁、何应钦在 20 日夜表明了拒绝签字的态度，并反对解放军即行渡江；国民党中常会也同时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协定》。这样，就使国共和谈谈判彻底破裂了。4 月 21 日凌晨，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香山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立即渡江，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敌人，解放全中国。凌晨 3 点多钟，周恩来接到电话报告说，我们 3 个军已在安徽裕溪口至枞阳镇一线渡江成功了。早晨 7 时许，周恩来叫卫士长成元功挂电话给住在六国饭店的张治中。通话时，周恩来说：“文白先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的部队已于今晨在你的老家安徽芜湖、铜陵、贵池线渡江成功了。另外，浦口我军报告，电讯局要通了南京电讯局的电话。他们说：“他们（指国民党）都跑光了，我们等着你们来接收。”张治中对我党用兵之神速，既佩服又赞叹。

也是 21 日，李宗仁、何应钦电示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从北平返回南京。我党为了使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免遭蒋介石的迫害，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 23 日特地到六国饭店同张治中谈话，诚意挽留他们留在北平，切不可返回南京。早在 4 月 13 日，毛泽东给周恩来一封信，信中说：应争取南京代表团 6 人都同意签字。如果李宗仁、何应钦、白崇德不愿签字，只要他们自己愿意签字，亦可签字。签字后他们不能回去，叫他们全体留平。如他们因南京不同意签字而不敢签，并有些人要回去，则必须争取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 3 位代表及 4 个顾问留在北平。此点请十分注意。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六国饭店对张治中进行真诚恳切的挽留工作。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就与张治中先生过从甚密，结成朋友。毛泽东从延

安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安全来去，还有我党一批干部在新疆狱中获释，张治中都帮过忙。而今，张治中这位老朋友处于去留安危的抉择时刻，周恩来非常诚挚、恳切地对他说：“现在的形势，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姓张（张学良）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个姓张的朋友了。”周恩来的话，使张治中十分感动。最后，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全体成员毅然决定留在北平。周恩来随即秘密电示坚持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吴克坚以巧妙的方法将张治中夫人和女儿，利用南京派来北平接代表团回去的飞机，安全送到北平。当张治中随周恩来到机场突然看到夫人、女儿下飞机时，对周恩来的周密安排和至诚待友，感到无限敬佩和铭感。

为了开好新政协

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蒋介石盘踞了十多年的南京，红旗高悬在蒋家宫廷“总统府”的门楼上。这就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大陆统治的覆灭。南京解放后，人民解放军乘胜迅速向南方、西南、西北前进。一个月后，东方大都市上海宣告解放。

这么一来，召开政协会议的时机更加成熟了。周恩来在协助毛泽东指挥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同时，即抓紧组织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亲自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谈话磋商，酝酿举行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预备会议。同时，组织民主人士赴东北参观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十大城市。这个参观团一行59人，自4月22日启程至6月8日回到北平，历时47天。6月14日，赴东北参观归来的民主人士致函毛泽东陈述感想，盛赞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对世界和平事业将起着极伟大的作用。

周恩来和民主人士、各界代表人物经过反复协商后，于6月11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预备会议。预备会议商定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单位为23个，共134人，并确定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人选。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23个单位的134名代表出席。周恩来担任这次会议临时主席并致开幕词。这次筹备会讨论、修改并通过了筹备会组织条例和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名单。16日晚上，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委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

从此，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正式宣告成立了。

新政协筹备会成立，决定下设6个小组：第1组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单位及各单位之代表名额；第2组负责起草政协会议组织条例；第3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第4组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第5组起草大会宣言；第6组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周恩来被推选为第3组组长，负责起草共同纲领。起草共同纲领，是各组工作中最繁重的工作。他在勤政殿花了一星期时间，查阅了大量资料，亲自执笔写出全文，再经毛泽东审阅后提交小组讨论。周恩来起草的《共同纲领（草案）》提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可以说，这是中国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是全国人民意志的集中表现，也是新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施政准则。

周恩来在中南海的日日夜夜，都是在繁忙紧张的工作中渡过。由于新政协筹备工作中有许多重要问题，要及时到香山向毛泽东报告，也经常要到六国饭店、北京饭店同民主人士交谈磋商，往返奔走，费时又劳神；而毛泽东也要找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党外的主要代表面谈，交换建立新中国、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意见。他住在城外的香山，工作起来很不方便。于是，毛泽东在6月15日从香山搬进中南海居住和工作。周恩来考虑自己住的院子比较安静，就把他和林伯渠的房子让出来给毛泽东住，再给林老另找了房子，

而他搬到南面的一排房子办公和住宿。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和他的妻子蒋英及两个女儿住在西边的一间小库房里，警卫人员住在东厢房。香山调来了一位炊事员，临时搭了一个小灶房，为毛泽东做饭。几天后，毛泽东的大女儿姣姣（李敏，贺子珍所生）来看爸爸，叶子龙把她临时安排在我的屋子里住，要紫非照顾一下。毛泽东利用休息时间来看姣姣，见到紫非在那里，便对姣姣说：“你在阿姨这里睡，好呀！”紫非当时只有28岁，一听到毛主席说“阿姨”，还很不好意思哩。过不久，江青也从香山搬进中南海。周恩来又让房，把他的住房让给江青。周恩来考虑到政务院将来要设在中海的位置，为了工作方便，最后选择了中海西北角的西花厅。这样，他在这里工作和居住了27年，从筹备召开新政协，建立人民共和国起，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和振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毛泽东住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亲笔撰写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光辉名著《论人民民主专政》，先经过中央几位负责同志传阅后，于6月30日公开发表。毛泽东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创建28周年而作，总结了我国民主革命的经验，分析批评了在建立人民政权问题上的各种糊涂观念和错误思想，指出建立新中国后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阐明了新中国国家政权的性质及对内对外的方针。这篇名著的发表，为新政协会议的召开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成为《共同纲领》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这时，有一些民主人士对解放区情况和党的具体政策不甚了解，存在疑虑，主要反映在三个问题上：一、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二、新中国是实行新民主主义还是实行旧民主主义？三、革命胜利后，共产党还要不要他们？对三个重大政治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出面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直接商谈，充分交换意见，特别是周恩来更是经常地、广泛地同各方面人士接触，除个别交谈和小型座谈外，还多次举行报告会，介绍情况，分析形势，阐述党的方针政策，并针对他们的思想问题作令人信服的分析 and 解答。李维汉也做了许多工作。

在关于实行新民主主义还是旧民主主义问题上，周恩来在报告会中亲自向民主人士说明，我们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不是旧民主主义，不是在朝党同在野党互相斗争、互相交替，而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民主阶级的政治合作。这种合作是政治的分工合作，各民主党派各自联系不同方面的人，都要向共同的方向前进，而这个共同的方向就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周恩来还分别向他们报告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人民外交、土地改革以及其他重大政策问题。他还向民主人士报告同南京国民政府和平谈判的情况。

中央许多负责同志也根据民主人士的提议，分别出面向他们作过报告：叶剑英报告北平军管问题，邓颖超报告解放区妇女工作问题，李维汉报告统一战线问题，胡乔木报告文化政策问题，安子文报告干部问题，陶铸报告改编傅作义部队问题，戎子和报告物资接管问题，邓小平报告解放军渡江问题，陈毅报告上海接管问题等。通过报告和组织座谈，沟通了思想，促进了团结合作。

关于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周恩来坚定地表明我党及中国人民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态度。同时严肃指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能否与我党真诚地合作到底，就要看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

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的摇摆不定者。在北平的民主人士通过学习，提高了认识，看清了形势，个别人放弃了建立“反对派”的想法，表示愿意追随共产党革命到底。

关于民主党派害怕革命胜利后共产党不要他们的问题。5月26日，周恩来同民主建国会部分领导人座谈时说，现在的中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四个阶级的联盟，共同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因此需要各党派的合作。6月22日，他在新政协筹备会党组干事会上特地作了《新政协筹备会的工作与统战工作》的报告。报告说，新政协的召开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具体组成。中央政府成立后，政协便成为中共领导的各党派的政治协议机关，国家的一切大事都可以事前在此协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是长期的，我们要善于和党外人士相处。周恩来的这些讲话，不仅教育提高了党员干部对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而且解除了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民主人士认识到长期合作是党同党外人士关系的根本方针，相信共产党在革命胜利之后仍然是要他们的。

通过这一阶段工作，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我党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都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从而推动了新政协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

为了加强我党对新政协会议的领导，中共中央于7月10日成立了新政协筹备会党组干事会，干事共21人。其名单与分工是：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齐燕铭负责党派工作；陈云、薄一波负责财经工作；董必武、陈绍禹（王明）负责政法工作；聂荣臻、叶剑英、罗瑞卿负责军事工作；胡乔木、徐冰、周扬、钱俊瑞、廖承志负责文教工作；李立三、蔡畅、冯文彬负责工青妇工作；连贯、杨静仁负责农民和民族工作。干事会设常务委员5人，书记周恩来，委员林伯渠、李维汉、徐冰、李立三。

这段期间，新政协会议下设的6个小组也分别进行着紧张工作。从6月17日起，或先或后地连续召开小组会议：以李维汉为组长、章伯钧为副组长的第一小组，开始忙于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各单位的代表名单；以谭平山为组长、周新民为副组长的第二小组，在成立会上讨论草拟新政协组织条例草案提纲；以周恩来为组长、许德珩为副组长的第三小组，举行第一次会议时决定由中共起草并同纲领的初稿；以董必武为组长、黄炎培为副组长的第四小组，草拟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以郭沫若为组长、陈劭先为副组长的第五小组，召集全组成员讨论大会宣言的起草；以马叙伦为组长，叶剑英、茅盾为副组长的第六小组，商决广泛征求国歌、国旗、国徽方案。总之，各小组各司其职，紧张又有序地进行着各项准备工作。

这时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已从香山搬进中南海办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都住进中南海，只有任弼时住在景山东街。中央统战部便从中南海丰泽园、居仁堂后院移到中海西岸的迎春堂、锡福堂。李维汉部长很忙，准备作《关于政协的性质、地位和政权的组织问题》的发言。6月23日，他在第四小组起草提纲委员会上发言说，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由新政协行使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产生政府，人民政府委员会是最高政权机关，将来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务院是最高行政机关。没多久，李维汉摔伤了腿住院治疗，他的筹备会秘书长职务就由林伯渠代理了，而统战部的工作由徐冰负责。

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的中心会场设在中南海勤政殿。勤政殿是清代皇朝所建，是中南海的一座重要建筑，位于丰泽园东边，正中有一座约百米面积的椭圆形大厅，左右各有两进四合院。这里是清皇朝举行政务活动的重要场

所，所以取名“勤政殿”。袁世凯

曾将大厅的方顶改成西式的圆顶，并于1916年1月1日在此举行过“登基”大典，做了83天的皇帝梦。国民党统治时，何应钦、李宗仁、博作义等都曾在此举行过重要政治活动。现在归人民所有，成为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场所了。很可惜，这样一座有历史文物价值的建筑，在“文革”后期，当时负责修建某工程的汪东兴同志，竟下令把它拆毁，重建新的办公室和会议室。

自6月16日起到9月20日止，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先后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8次会议。周恩来是每次会议的主角。常委会对诸如政协代表名单和共同纲领草案、政协组织法草案、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等问题，都进行反复讨论和最后决定。6月16日第一次常委会就决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并通过《各单位代表参加小组的办法》。9月20日第8次党委会，决定于9月21日下午7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全体会议，并通过政协一届全会议程。这之前，周恩来曾经在第4次常委会讨论政协组织法草案时，提出将新政协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建议。他说，在人民民主国家中需要统一战线，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有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要合作，就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这组织就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要长期存在下去。周恩来的这个建议，在9月17日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会上正式通过，由全会决定将新的政协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早在9月7日，周恩来就到北京饭店向参加新政协的代表作《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阐明人民政协决不是发源于旧政协，它是100多年来民族民主运动牺牲奋斗的果实，是30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集中表现。他说，人民政协的形式组成了一个包含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它的任务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它将仍然以统一战线的组织出现，仍是一个协议机构。讲到政协代表名额和人选问题时，周恩来说，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政协代表范围和组织要比原来设想的扩大，以完满地代表全国各阶层人民。因为我们要实行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所以，参加政协的45个单位产生的根据，是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为重点，同时又照顾到了各方面。周恩来的屡次报告，不仅阐述了共同纲领和政协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这三个立国大法的要点，而且明确地说明了政协的性质、任务及其代表组成的依据。这就给尔后顺利地通过三个立国大法和政协代表名单提供了思想政治基础。协商新政协的代表名单是一件极为复杂繁重的工作。这个工作，是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碰到有争议时还得由他亲自出面去商谈。新政协要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新政协的阵容就必须扩大，而《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第一条规定：新政治协商会议，为全国拥护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及同意动员一切人民民主力量，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解放区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无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所组成。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派及反动分子不容许参加。这样就要求做到，既有广泛的代表性，足以体现全国各

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也要体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又不能机械地按人口比例分配名额，要充分照顾各方面；而且要慎重地掌握敌我界线，防止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和反动分子混入，以保持新政协政治阵容的严肃性。所以，这个工作既复杂又繁重。那时候，还规定对新政协委员提名要逐个审查，反复研究。这方面的工作量是很大的，时常为了某一个代表的适当与否而函电往返，多方协商，斟酌再三，费时达几周之久。有时，毛泽东、周恩来也参加讨论。代表名单初步产生之后，还先后花了3个月工夫才最后确定了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名额、名单。名单分5类：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和特邀代表。其中前4类共45个单位，正式代表510名，候补代表77名；第5类特邀代表75人。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总数计662人。中央统战部经过同中央组织部及有关单位反复研究，把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人选和各项统计印制了一本很厚的资料送到中央。毛泽东看了，很风趣地说那是一本“天书”。他的风趣话里也带着看到全国人民大合作、大团结的喜悦心情。

从代表名单可以看出新政协这一阵容的鲜明特点：

一是它的极其广泛性。新政协既包含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地区、解放军以及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和宗教界等方面的代表，充分反映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和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同时又包含了近百年来我国民族民主革命各个历史时期为人民事业作出贡献的知名人士和代表人物，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各个革命时期的代表性人物都吸收了，乃至前清末期和北洋政府时期较有声望以及后来同情革命、并为人们作过好事并有代表性的人物，都吸收参加新政协。为了广泛吸收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在政协委员单位中专列了“特别邀请人士”一个类别。在这一单位中，列在第一名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始终站在正义一边的坚强战士宋庆龄。同时，还有戊戌变法主要人物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前清翰林张元济、海军耆宿萨镇冰、同盟会老会员张难先，有北洋时期任过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司法总长江庸，有曾经是南京政府和谈首席代表的张治中和和谈代表邵力子、黄绍竑、刘斐、李蒸，有国民党的起义将领傅作义、程潜、龙云、董其武、邓宝珊、陈明仁等，有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陶孟和、陆志韦，有艺术界知名人士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等，有少数民族知名人士赛福鼎、阿里木江等，还有工农兵方面的劳动模范、英雄人物刘英源、阎存林、戎冠秀等。此外，对于当时尚未解放的地区，也邀请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参加，并决定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中给这些地区留有十分之一的名额，准备在这些地区解放后可以有代表参加。这些都表明，党中央的考虑十分周到，充分肯定了各方面人士在我国近百年来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又尽可能地扩大和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新政协这一阵容，从组织上充分反映了我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复杂曲折历程。可以说，它是一个全面生动的历史总结。不过，少数民族代表只有28位，少了些。为了这事，李维汉还专门同朱早观、奎璧、杨静仁、天宝等少数民族代表进行座谈讨论，但感到在物色人选以及交通等方面均有困难；还有个工作疏漏，即在少数民族“单位”中没有安排满族代表（在其它单位中虽然有满族同志，如齐燕铭、罗常培等，但群众不知道）。

名单公布后，北京有些满族人因此哭了。毛泽东知道此事后说：“一个民族没有代表，整个少数民族为之不欢。”后来，在召开政协二届全国委员会时作了补救。

二是反映出严肃的政治标准。新政协的各党派单位共有 14 个，其中除了中共及在香港公开响应“五一”号召的 10 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外，增加了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3 个单位。九三学社于 1946 年成立，积极参加了民主运动，并且响应我党“五一”号召，它在政治上和代表性上都是符合参加新政协的条件，因此筹备会也一致同意邀请它参加新政协；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是台湾爱国同胞组成的一个政治组织，其主要成员领导和参加过 1947 年“2.28”反对帝国主义和国 33

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并于当年 11 月组织台盟这个台湾人民的革命组织。筹备会也一致同意台盟作为党派单位参加新政协；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从社会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会、民主青年联盟、民主青年同盟等青年革命组织发展而来的，也是我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青年的政治组织。虽然成立较晚，但对革命的贡献很大，且有广泛的青年群众基础，所以筹备会也一致同意它作为党派单位参加新政协。至于在国民党内部从事过反蒋活动、对民主运动作过贡献的秘密政治组织“小民革”，于 9 月 17 日自愿宣告结束，其领导人大部分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区域代表中被推选为代表，参加了新政协。还有对孙中山主义革命同盟、民社党革新派、少年劳动党、光复会、中国农民党等，筹备会都作了慎重考虑，进行具体分析和分别处理。基本指导思想是首先注意政治的严肃性，严格分清敌我，对于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参加新政协标准者，不作为党派或团体单位；同时在此基础上又注意团结的广泛性，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这些组织中有民主运动史、在解放战争中有实际表现并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人士，在他们的政治组织或团体宣告结束以后，邀请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或在联合政府中作适当的工作安排。例如民社党革新派的汪世铭、沙彦楷，孙中山主义革命同盟的许闻天、邓吴明，都是以个人身份被邀请为特邀代表参加政协的。

三是既能保证共产党的领导又能实现党同党外民主人士的团结合作，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新政协将要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当时的形势下，从组织上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不应当以简单的多数去压倒少数，而是必须以平等待人的态度同民主人士真诚合作，采取民主协商的方法来达到政治上的一致。因此，共产党作为一个党派单位，同民革、民盟这两个成员比较多的党派单位采取了相等名额的做法，而在人民解放军、各地区以及工、农、青、妇等基本群众单位中，虽然也适当安排了党外人士，但共产党员和基本群众占多数，这已经足以体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和工农联盟的基础作用。另一方面，共产党员也不宜过多，应当有相当数量的党外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才能充分反映各方面的意见。因此，在 662 名代表中，共产党员只占约 44%，工农和各界无党派代表约占 26%，各民主党派成员约占 30%。这说明，民主党派名额的比重是很大的，他们也是满意的。这样，既保证党的领导又促进党同非党的团结合作，推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有利于共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人民中国。

从拟订到决定政协代表名单，可以说是一项复杂又繁重的系统工程。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统战部都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但是，这项系统工程是在周恩

来的领导下，经过自上而下、从下到上的反复协商三个多月后，终于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筹备会常委会第8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上获得通过。这项系统工程的胜利竣工，表明周恩来是一位杰出的系统工程领导者、组织者和指挥家。

新政协会议在北平召开

1949年9月20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8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决定于9月21日下午7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之前，有关筹备诸多会议事宜已经安排和准备就绪，周恩来对会场布置、文件印发、座位安排和警卫工作等各项准备工作都亲自作了检查。16日，常委会第6次会议决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修改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将国旗、国徽方案和宣言稿交由政协全体会议主席团决定。17日，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又基本通过35常委会所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等。

上述3个草案都是重要的历史性文献，是经过许多次反复修改、集众人的智慧和经验才产生的。周恩来在报告草拟《共同纲领》的经过及其特点时说，筹备会第3小组决定由中共负责起草草案初稿。初稿写出了后，除各单位自己讨论不计外，经过7次的反复讨论和修改（由先后到达北平的政协代表五六百人分组讨论两次，第3小组本身讨论了3次，筹备会常委会讨论了两次），广泛地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将草案提交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作了基本通过。

《共同纲领》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人民大宪章，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为之流血牺牲所取得的革命成果，体现了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低纲领。《共同纲领》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权制度，规定了国内各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规走了我国的外交政策、民族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和人民的民主权利等基本政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并通过宪法之前，《共同纲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不过，当时所制定的《共同纲领》暂时不提社会主义，这是不是说明不要社会主义？不是的。但为什么不写明呢？对此，周恩来曾向各位民主人士公开说明“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以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也证明了周恩来当时所说的话是完全正确的。

在制定《共同纲领》过程中，涉及少数民族政策时，有人主张采取苏联的做法，实行联邦制。到底是采取联邦制好呢还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曾经就此问题征求过意见。李维汉对这个问题作过专门研究，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比较适合我国的国情，而不宜套用苏联的“民族自决”，并向中央提出积极建议。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得到了起草小组的一致赞成。因此，《共同纲领》第一次就明确地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是使统一战线组织化、经常化、完备化的一部重要文献。它反映了人民政协是适应我国国情的一个创举，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特点，阐明了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发展形成的，它不单是一种会议形式，而且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最高组织形式。因此，《组织法》规定了政协的宗旨是：“经过各民主党派

及人民团体的团结，去团结全中国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共同努力”，“建立及巩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及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起草这部《组织法》时，有人认为到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就不再需要政协这样的组织了。周恩来向他们指出这种想法是不恰当的。他说：“统一战线是我党的一贯方针，统一战线出现今天这样广泛的规模，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并且应当长期地存在下去。即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政协也将是一个协商机构，是参谋部。”几十年实践证明，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之后，政协仍然需要长期地存在下去，而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日益发挥它的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是根据《共同纲领》草案中新民主主义政权制度的精神拟定的。它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形式为民主集中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并规定在全国人大召开之前，由政协全体会议执行其职权，选举成立中央人民委员会，并且组织政务院、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并通过宪法后，这一组织法才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

关于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曾经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和发出“启事”征稿或邀请专家设计，共征得国旗图案2992幅、国徽图案900幅、国歌歌词694首。经过反复协商，分别选择了国旗图案38幅、国徽图案5幅提供大会采择。周恩来对这个工作十分重视，连《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歌词谱启事（草案）》的清样也亲自审定，并作了重要的修改。7月4日晚上，周恩来在外面活动后回到寓所已是凌晨3点，看到办公桌上案卷第一页有一份征稿启事草案的清样，知道要等他签发。周恩来立即审阅了200余字的草案全文，亲自改动和增添14处，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国旗应注意“色彩以赤色为主”的“赤”字改成了“红”字。这一字之改，变赤为红，飘扬中国大地的那面五星红旗的底色便就此设计产生了。红旗上的黄色星，是钱三强在一次讨论国旗图案的会议上建议的。他说：“我国长江、黄河就是黄色的嘛，改黄色的好！”这一建议，博得与会者一致赞同。

关于国歌，一下子还制定不出来，征稿虽多，却难入选。所以，马叙伦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郭沫若赞成用它代国歌，黄炎培也支持并主张不改动由田汉所作的旧歌词。周恩来也说：“要嘛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这首代国歌，就是9月2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于丰泽园召集政协筹备会第6小组座谈时暂定的。散会前，毛泽东高兴地站了起来，同周恩来和全体与会者一齐合唱《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代国歌，第一次响亮地回荡在中南海内。

关于国徽，因为比较复杂，大家的意见又不一致，当时没有选中合适的图案，所以在开国大典上未能用上新中国的标记。现在的国徽图案，是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国徽的内容是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着中间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建国后，制定国徽的任务，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邀请了梁思成、林徽音、李宗津、张仃、张光宇、周令钊、张正宇等专家参加这项工作。梁思成、张仃等人根据政协常委会讨论意见，绘制了新的图案，再进行讨论。周恩来总结大家意见，决定进一步修改，并建议将麦稻穗设计成挺拔向上的形象。国徽图案通过后，塑造立体模型的任务便交给了清华大学营建系高庄

教授。高庄经过精心的艺术再创造，采用45度锐角线平面立体浅浮雕的技法制成了国徽模型。1950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就正式发布颁发实行国徽的命令。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倒有了一颗国印。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陈叔通。陈叔通给周恩来送去一枚镌刻得严肃庄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印鉴。原来，早在政协筹备期间，周恩来就委托陈叔通请治印名家制作一枚国印，陈叔通返回上海后，即向杭州西泠印社创始人王福庵说明了意图。王将制作国印的任务交给他的得意门徒、从一个苦力车夫成为治印名家的顿力夫去完成。周恩来握着这枚镌刻技艺十分精湛的国印，意味深长他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正是由于千万万个苦力拓凿而成的吗！”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出席开幕式的各党派、团体代表634人，应邀来宾300人。大会由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担任执行主席。当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时，54响礼炮和军乐齐鸣。毛泽东用洪钟般的声音致开幕词。他以沉稳、缓慢的语调庄严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是的，自鸦片战争以来，深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压迫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自此始，中国人民进入了伟大变革的新时代，中国开拓了崭新的新纪元。毛泽东的振奋人心的致词，其洪亮的声音、高昂的语调，至今还回旋于我的脑海中。1991年6月30日晚，在漳州市委统战部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的纪念“七一”晚会上，我还情不自禁地学湖南口音表演了毛泽东的这段开幕词。

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的社论。

9月22日，大会第二天，政协筹备会代理秘书长林伯渠作筹备工作经过报告后，由周恩来、董必武、谭平山分别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经过的报告。25日，继续开会。当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周恩来、郭沫若、茅盾、田汉、梁思成等参加。毛泽东在筹备会第6组会上谈到国旗时，拿起了五星红旗的式样，指点着说道：“这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9月26日，政协全体会议休会一天，而“国旗、国徽、国都、国歌、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却在北京饭店举行会议，对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进行最后审查。关于定都问题，在讨论时有人曾建议在重庆、成都、西安或武汉。但最后还是一致通过首都设在北京。对于国号，早有不同意见，有的说简称“中华民国”，有的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的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张奚若先生说不如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林伯渠在这一天特地柬请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前辈二三十人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座谈，大多数主张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辛亥革命后归隐38年、平生不写“民国”名称的前清进士周致祥，就主张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侨领司徒美堂说：“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末翰林陈叔通和民盟主席张澜、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等也持此议。最后，政协全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说明新中国每一个标志的诞生过程，也是

一个充分发扬民主、进行政治协商的过程：

27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在怀仁堂继续举行。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了4个决议草案付诸表决，被全体代表一致通过，掌声如雷，经久不息。大会还通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本年为1949年；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人民大团结。这样，新中国的标志除国徽外已经全部诞生了。

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共开了8天。9月30日，大会顺利地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全会选出了180人组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议选出了63人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朱德副主席在政协全会闭幕会上致闭幕词说：“我们既然能够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

会议期间，有中共代表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共83人先后在全会上讲话或发言。中共代表刘少奇发表讲话时，郑重表示“中国共产党一定要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及其发展和巩固而进行不懈的努力。”“凡是中国共产党参加并一道通过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将坚决地执行，并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宋庆龄在发言中赞颂政协会议的召开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会上，张澜说政协会议开幕是“世界人类史上值得永久纪念的一个光荣的日期”；黄炎培说政协会议“写出一篇意义最伟大、最光荣的记录”；程潜说这是“划时代的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的一次人民真正大团结”；沈雁冰说政协会议“展开了中国历史全新的一页”。国内外新闻媒体也纷纷报道政协会议消息。开幕当天，新华社发出电讯：“中国人民所渴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于今日下午七时半在北平开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得很成功，主要是党中央方针政策正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直接领导的结果。为了保证大会的胜利召开，中央决定，大会组成党组秘书处，我任处长，中组部的韩劲草任副处长，负责政协委员中党员和团员的报到、编组工作，召开党员大会，参加大会工作的党员也列席。党员大会请刘少奇做动员报告，报告阐明了人民政协第一次全体大会的意义和任务，要求每个党员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团结党外人士一起把大会开好，特别说明大会候选名单中党外人士的安排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党员要保证投党外人士的票。党员大会后，各党小组都学习和讨论了刘少奇报告，保证完成任务，使政协大会开得顺利。选举结果，不仅党外人士都当选，而且票数都相当多，党外人士都很满意。参加大会的秘书、总务、警卫等全体工作人员（包括饭店工作人员），都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任劳任怨地完成了任务，也得到了中央负责同志的表扬。

9月30日上午，政协会议全体会议通过建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纪念碑的碑文，并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当天下午6时，大会利用统计选票的时间，全体代表到天安门广场隆

重举行纪念碑奠基典礼。周恩来代表会议主席团致词说：“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1949年9月30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礼。”致词毕，全体代表脱帽静默致哀。默哀毕，毛泽东宣读他亲自撰写的纪念碑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碑文宣读完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各单位首席代表一一执锹为纪念碑的基石培土，表示对革命先烈的崇敬。

这座纪念碑于1952年8月正式动工兴建，1958年4月竣工落成，同年5月1日隆重揭幕。纪念碑雄伟壮观，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碑身呈方形，高近40米，是用山东崂山运来的巨块花岗石雕成；碑下为两层平台，四周环绕汉白玉栏杆。碑身正面（北面）镌刻毛泽东题书“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鎏金大字；背面是周恩来亲笔题书的碑文。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对150年来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前仆后继、英勇奋斗而牺牲的无数革命先烈的光辉纪念，也是对中国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好场所。中国人民络绎不绝到此瞻仰，缅怀革命先烈，学习他们为革命、为人民、为真理而英勇战斗的精神。

1976年“4·5”那天，我和紫非到天安门广场，用照相机记录下了广大群众抗拒“四人帮”无理压制、簇拥着花圈纪念周总理逝世的动人情景。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于每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日，都相约到纪念碑敬献花束（近年来改在3月5日总理诞生日），无限追思和深切怀念周总理。

在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进行期间或闭幕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朝鲜、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蒙古、波兰等国家党和政府以及英国、美国、西德、丹麦、荷兰、澳大利亚共产党都致电祝贺。苏联等国政府决定同我国建交。这正如毛泽东在政协全会开幕词中所说：“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在政协会议开幕的第三天（23日），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举行宴会，邀请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黄绍竑、刘斐、陈明仁、吴奇伟、黄滇翔、林遵、邓兆祥等26位起义将领一同赴宴，周恩来、陈毅、刘伯承、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作陪。席间，毛泽东几次举杯为起义人员响应人民和平运动立下的功绩干杯。毛泽东说，由于国民党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这年8月4日，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北伐老将程潜和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率部在长沙举行起义。16日，毛泽东、朱德电称程潜“义声昭著”。毛泽东对国民党老前辈程潜是很敬重的。当程潜于9月7日晚上10点到达北平参加政协会议时，毛泽东亲自到火车站迎接。他到火车站亲迎朋友除宋庆龄外，就是迎接程潜，仅此两次而已。

9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宴为程潜洗尘，周恩来等也参加。19日，毛泽东邀程同游天坛，20日又细心同他商量安排公职。10月1日，毛泽东邀请程潜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因为程潜出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离京前夕，毛泽东找程星龄谈话，说“ 颂公（程潜字颂云）在军政界搞得久，旧部多，需要安插而又可以安插的，尽可能地予以安插，可能还有人向他要点钱，或者他自己想送点钱给老朋友或者老部下，都要替他设想到，免得他为难。现在决定由政府按月给他特别费大米 5 万斤（注：币制改革后，折成人民币 5000 元），任其开支，不受限制”。可程潜对待别费从不动用一分一文。

我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是富有号召力的。程潜于 8 月 4 日在长沙宣布起义，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黄绍竑、贺耀组、龙云等 44 人于 13 日在香港发表声明，宣布“ 坚决地向人民靠拢”；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委员刘孟纯、屈武，该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等于 9 月 25 日、26 日发表通电，宣布脱离广州国民党政府，归入人民阵营；10 月 1 日，西藏宗教领袖之一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在青海省解放声中致电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这些都证明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胜利，也是反映周恩来领导国统区第二战场的伟绩。

有些爱国军政人员为了参加人民政协，竟然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曾任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的国民党中央执委杨杰，9 月 19 日在赴北平参加会议的途中于香港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政协会议开幕时，还通过一项临时动议：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名义，向杨杰家属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致唁。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拜克、阿巴索夫、达列里汗和中苏文化协会干事罗志（汉族）等 5 人，在转道苏联阿拉木图赴北平参加政协会议的航途中因飞机失事牺牲。为此不幸事件，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唁电，向不幸遇难的 5 位同志及其家属表示哀悼。

出任开国总理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和委员陈毅等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宣布就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会议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的施政方针。会议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自从这一天起，周恩来成为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的总理，连任26年之久，日理万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社论。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隆重盛典。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解放军主要将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民主人士、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出席参加，中央和北京市机关于部以及群众30万人整队参加庆典。首都群众穿着节日盛装，有组织地在盛典开始前汇集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上8个大宫灯醒目喜人，两排红旗迎风招展，广场上红旗似海。下午2时半起，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张澜、李济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陆续从端门前下车，从天安门东西两侧的坡道健步走上天安门城楼，互相握手致贺后先去大厅休息。早就等候在那里的摄影记者蜂拥过来抢拍下一个个珍贵的历史镜头。

为了保证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安全，保证参加庆祝盛典的首都30万群众的安全，周恩来早已和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罗瑞卿等同志采取了周全缜密的安全措施。对毛泽东从中南海到天安门的必经之道都预先亲自作过安全检查。当时，我们私下里啧啧称赞，还风趣地说周恩来是“大公安部长”。

2时50分，毛主席暨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休息厅走出，站到天安门城楼前沿各自的位置上。当群众看到毛主席时，广场上欢声雷动，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等则向群众挥手致意。3时，开国大典由林伯渠秘书长宣布开始，军乐队奏起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主席亲手按动升旗电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广场上冉冉升起，54门礼炮轰鸣28响。接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向全世界郑重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当毛主席在宣读公告时，我抢拍了一帧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照片，而今它成为一件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了。

《公告》宣读完毕，林伯渠宣布阅兵式开始。突然，飞机的隆隆声从东方的上空传来，人们立即仰望天空，新组建的空军排着人字形掠空而过，天安门上下齐向空军鼓掌欢迎。接着，朱德总司令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的陪同下，乘敞篷车检阅了16400名官兵组成的海陆空三军部队。之后，朱德重登天安门城楼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三军迅速肃清国民党残余军队，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令毕，奏起军乐，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和骑兵师从天安门城楼下列队通过，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这次

阅兵，是愈战愈强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一次检阅，也是人民解放军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的一次誓师。

阅兵式结束，欢腾的群众游行队伍接踵而来。他们通过天安门时振臂高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万岁！”入夜，举行焰火晚会，五彩缤纷焰火腾空而起，千万朵礼花开满夜空，北京成为不夜之城，首都群众沉浸在狂欢之中。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宾，坐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与民同乐。

当晚，我背着照相机和小摄影机想摄下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不料，经过金水桥时被负责警卫的战士挡住，不让过桥去。尽管我佩带着“工作人员”的证件，他还是不让过去。幸好碰到警卫负责人刘维同志，才带我上天安门，使我有机会摄下了一组狂欢之夜的照片。我有幸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盛典，亲眼看到代表新中国诞生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凌空升起，也亲眼看到几十万群众欢呼新中国诞生的热烈场面，使我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我在北京工作、生活了41年，几乎“五一”、“十一”都要上天安门。1990年定居漳州后，常常想念天安门。每次进京办事要离开时，总要瞻仰天安门城楼，凭吊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47纪念堂，仰望飘扬在天安门上空的五星红旗和宏伟的人民大会堂，思绪万千，对新中国的缔造者、已故的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寄予无限敬仰之情。

10月1日成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法定的国庆日，是当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决议规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10月9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选举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李维汉为秘书长。这次会议，患病缺席的马叙伦委员托许广平委员向会议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毛主席说：“我们应作一提案，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这个规定，必将千秋万载地沿袭下去。

开国大典那一天，周恩来被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为政务院总理之后，便集中主要精力筹建新中国第一届“内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但是，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所需要的为数众多的工作人员从哪里来呢？政务院副总理和所属各部主要人员怎样配备呢？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在组建政务院时首先碰到的两大问题。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反复考虑和研究，最后一致商定：首先将华北人民政府撤销，把这个班底拿过来作为政务院的基础，并参照华北人民政府的经验组织政务院；然后再陆续从其他几个大行政区抽调一部分人（特别是负责人）来充实和加强政务院。邓小平、李富春、高岗、贺龙、陈毅、邓子恢、习仲勋等，就是在这以后陆续从各大区调到北京工作的。

新中国首届“内阁”是一个民主联合政府，必须考虑安排民主人士。对民主人士的安排，是周恩来筹建政务院时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他认为，民主党派在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斗争中同我党亲密合作，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对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导人都应该有所安排。但是，怎样在配备上取得平衡，却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因为周恩来在国统区工作的时间比较长，对各党派民主人士的情况比较熟悉，并同他们有着密切的交往。因此，民主

人士的任职名单大多数是由他提出来报告党中央决定的。之前，他先听取中央统战部关于民主人士的安排意见，还亲自做了大量平衡和协调工作。那时候，我在统战部任副秘书长，深深感到周恩来费尽心思，深谋远虑，力尽综合平衡之功，使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头面人物、知名人士，差不多都安排进了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他首先提名对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的起义将领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在绥远时，曾在兴修河套水利工程方面做过许多工作，因此周恩来便提名傅担任水利部部长，并安排李葆华到水利部当副部长、党组书记，协助傅工作。周恩来很尊重傅作义，请他推荐人选参加水利部领导班子，傅向周恩来推荐了两位民主人士，一位是原国民党黄河治理委员会比较负责的技术专家张含英，一位是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北平市市长的刘瑶章。其次，劝说过去几十年一直不愿做文官的工商界主要代表人物黄炎培担任公职，由他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中国民建会主委黄炎培有出世思想，曾多次拒绝旧政府的高官厚禄。1949年3月，他来到解放后的北平也无意做官。10月11日晚，周恩来前往安儿胡同黄炎培家中拜访，诚恳地提出请他担任政府公职。黄炎培仍抱定初衷，说：“1946年我才68岁，已觉得年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72岁了，还能做官吗？”周恩来充满敬意他说：“这不同于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恳谈，黄炎培被说动了，但他表示要考虑考虑。12日早晨，黄炎培征询了江问渔、杨卫玉等好友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在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求贤的盛情邀请之下，应该接受在政务院的职位。这天晚上，周恩来再次登门听取黄炎培的答复。这时，黄老高高兴兴地向周恩来表示，他愿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再次，是提议无党派民主人士李书城担任农业部部长。为什么要委任一位大家不甚了解的人来当农业部长呢？周恩来解释说，他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首义后在武汉当过革命军总司令黄兴的参谋长，继之投入了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共“一大”就是在他家召开的，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他还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这样安排，体现了照顾民主人士的各个方面。周恩来派薄一波去找李书城谈话，便请出了李书城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部长。此外，周恩来也请了在旧社会拒绝高官厚禄的耿介之士、著名林业学家梁希出任林垦部部长。

10月19日下午，在经过党中央决定并同党外有关人士协商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正式任命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李维汉为政务院秘书长；任命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为总参谋长。同时，正式通过政务院下属委、部、会、院、署、行主要负责人的任命名单，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部长。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这项任命中的比重：在4个副总理中，有黄炎培、郭沫若两位民主人士；21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民主人士占11人；政务院下属34个机构的109个正副职位中，民主人士占49个，其中15个正职。他们是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林垦部部长梁希，粮食部部长章乃器，司法部部长史良，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出版总署署长胡愈

之。对以上安排，许多民主人士非常感动，称赞道，“周总理不愧为‘周’（指考虑问题周到、完备）总理啊！”

政务院的人事安排就绪后，周恩来于10月21日召集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宣告政务院成立，总理、副总理、政务委员以及下属34个机构的负责人正式就职。他在政务院成立大会上作了《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指出：“政务院是首脑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他还强调：政务院既已成立，各部门都应该有一个组织法，以便依法办事。一个月后，即11月21日，周总理于中南海勤政殿东会议室召集政务院机关工作人员开会并讲话。那时候，政务院工作人员只有95人，主要是秘书、警卫、行政人员。他对大家说：“人民的国家、人民的政府刚刚建立，我们要在革命秩序里创造新的社会。所以，我们要改革，要创造，不要因循守旧，不要只作‘循吏’。大家要善于发现和接触新事物，勤劳加智慧，富有创造性地把革命工作做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还谈到政务院与旧官僚机构的本质不同。他说：“中南海是过去的封建皇帝呆的地方，在这个黄圈圈里都是穿黄马褂的人，是个与民隔绝又统治百姓的禁城。现在解放了，我们在中南海工作，就要打破往日的‘黄圈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当真正的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为中央人民政府服务，及时把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传达下去，把初建的国家建设好。”周恩来这次讲话，给政务院工作人员以深刻的教育，迅速形成廉政、勤政、高效率的为人民群众好作风。自此始，政务院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兢兢业业，勤政廉明，艰苦朴素，积极认真，开展建国初期繁忙的政务活动，为新中国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为国民经济的胜利恢复，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合作，为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地从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而奋斗不懈。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巨人的雄姿屹立在东方。这是一百多年来无数革命先烈奋斗牺牲的结果。特别是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结果。

毛泽东在1939年就说过：“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完全证明了这个真理。

解放战争只以3年半的时间，就推翻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反动统治，就是由于党中央在这个时期内最灵活又最充分地运用了这三个法宝，使它发生了伟大的威力，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而在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中，毛泽东和周恩来亲密合作，充分发挥了他们领导革命的高超艺术，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岁月里

接收了一个烂摊子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成立的时候，接收了国民党留下的一个烂摊子。

当时，解放战争并未结束，除台湾而外，沿海岛屿还有舟山、马祖、金门、海南尚待解放；在大陆上，两广和西南的云、贵、川以及新疆、西藏部还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战争还要继续进行，军费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俘虏的大批国民党官兵如果不管他们，让他们到社会上自由活动，将成为不安定因素，非把他们包下来不可。到1950年最高峰时，这些俘虏达到550万人。军队包下来，国民党政府的文职人员也要包下来。南京、上海解放时，曾实行精兵简政，裁减人员，闹得这几个地方很不安定。而且这些人也不是毫无用处的，经过思想改造，还能为我所用。这样，全国的公职人员达到350万人。也就是文武加起来共计900万人要包下来。尽管当时实行的是毛泽东讲的“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政策，对国家来说，也是很沉重的负担。1949年12月22—23日，周恩来对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和航务会议的人员讲话时说，因为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基本胜利，这种负担叫做“胜利负担”。

在旧中国，工业和农业部极其落后，从1937年到1949年，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国民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新中国建立时，工农业生产远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拿农业来说，抗日战争以前全国粮食的最高产量是2800亿斤，而1949年大约只有2240亿斤。1950年计划增产100亿斤，距离战前最高水平还差得远。棉花生产的情况更坏，只有战前的一半左右。当时农村每人每年的收入约400斤粮食，需要向国家交纳80斤公粮，这个负担是很重的。

工业方面。战争中遭到的破坏更为严重。1949年我国现代工业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主要产品同历史上最高年产量比较，煤减少48%，铁减少86%，钢减少83%，棉纺织品减少25%以上。由于农业生产没有恢复，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品维持正常生产也感到困难，而且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出现了空前的恶性通货膨胀，市场极为混乱，以上海为例，物价上涨比战前高达200万倍，城乡人民购买力低下，商品卖不出去，使工业受到极大的影响，同时造成了大批工人失业。

交通运输亟待恢复。当时全国有铁路2万多公里，除了东北占40%左右因解放较早得到恢复以外，关内的只在逐步恢复之中。航运可供使用的船只很少，大都是吨位小的沿海、内河轮船，许多海轮被国民党胁迫到台湾或香港。

工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商品流通不畅，这就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谈到当时的税收时说，现在农村负担占国家财政收入的41.4%，城市负担占38.9%，而实际上许多税收如盐税、货物税、屠宰税等，很大一部分还是要转嫁到农民身上。而国家企业收入只占17.1%，以上三种税收不够国家的支出，还会有赤字，这就要发公债。在编制1950年国家预算时，支出的82%靠各种收入，7%靠公债，其他靠发行货币。

1949年水旱天灾又很严重，全国有1.2亿亩耕地、4000万人受灾，对这些灾民人民政府不能置之不顾，必须采取紧急救济和生产自救等措施，这也要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

当时官僚资本在接管城市的过程中，已经陆续收回国家所有，帝国主义在华企业，也受到许多限制，只有民族资本因为它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组成

部分，受到保护，他们还有一点经济实力。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看不起共产党，认为这些“土包子”只会打仗，不懂经济；能够统治农村，管不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有人说：“共产党军事 100 分，政治 80 分，经济是零分。”一些投机商公然和政府较量，国民党崩溃前夕，金元券形同废纸，市场上银元通行，有的地方甚至拒用人民币。上海解放的第一个星期，投入流通的人民币不到 20 亿元（旧币，等于后来的 20 万元），数量并不大，但大部分还是浮在市面上，买不到成批的货物。加之黑市猖獗，上海证券交易所已经命令停业，投机商却把它作为银元投机的指挥所，大街小巷银元贩了到处活动。他们抬高银元价格，进行黑市交易，扰乱金融市场，市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这种现象如不制止，市场秩序建立不起来。1949 年 6 月，上海市组织一次严厉的政治打击，首先发动以工人为骨干的各阶层人民，造成强大的舆论攻势，关闭银元投机中心上海证券交易所，拘捕严重违法的投机商，然后实施金银管理办法，从此人民币才得以流通，并占领市场。

一波才平，一波又生，银元投机风平息后，粮食和纱布价格急剧上涨，1949 年 10 月，天津、上海物价如脱疆之马，天津是粮食带头，上海是纱布领先，华中、华北都受到影响，可谓波及全国。政府当然不能让投机商人这样兴风作浪，立即采取措施，一方面筹集物资择机在市场抛出以平抑物价；另一方面收紧银根，征收税款。这样一放一收，才使市场趋于稳定。但从当年 7 月到年底，上海、天津、汉口、西安 4 大城市，物价已上涨 3 倍多。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与扰乱，也是造成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当时沿海港口的海运极为困难，南方许多岛屿还被国民党军队所盘踞，对外贸易主要是与苏联及东欧国家进行。许多我们需要的物资无法取得。国民党还经常派飞机轰炸沿海城市，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遭到的损失最为严重。1950 年 2 月 6 日，上海最大的杨树浦发电厂被炸，不仅使许多工厂停工，市民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周恩来与苏联政府协商派来空军，才使国民党的骚扰有所收敛。

形势确实是严峻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总是盼望着共产党失败，他们说：“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有些民主人士也担心共产党缺乏经验，治理不好国家。

当时，作为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要当好这个 5 亿多人口大国的总管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这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几十年艰难曲折的革命历程中，早已炼就了百折不挠，不畏艰险，不怕困难的意志。为了尽快把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整治好，他又开始为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废寝忘食，日夜操劳起来。

为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决不可以丢掉乡村，只顾城市”；“必须以极大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同时指出：对民族资本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对民族资产阶级要既团结、又斗争。

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周恩来，参加了这些会议并参与决策。早在青年时代就立志要让中华腾飞于世界的周恩来，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在中国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前夕，已在思索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1948年6月，他写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的提纲，其中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是反对旧民主主义或旧资本主义的经济方针的”。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与旧民主主义经济的区别是前者为无产阶级领导，后者是资产阶级领导；前者是为多数人，后者是为少数人；前者是以劳动大众为主，附加自由资产阶级，后者是以资产阶级为主，附加劳动大众；前者是基本上计划经济，后者是完全自由主义经济。对国营、合作、私营三种经济，他提出主要与次要、少数与多数、国家命运所系或非国家命运所系等问题。同时还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也是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或极端平均主义的方针。从这份提纲里已可看出周恩来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脉络，同后来七届二中全会所提出的，基本上是一致的。

1949年3月下旬，党中央到北平后，周恩来除了继续协助毛泽东指挥军事，领导国统区党的秘密工作以外，把更多的精力用在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组织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方面。受党中央的委托，他主持起草了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向大会作了关于《共同纲领（草案）》特点的报告，其中，谈到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时，他指出它的基本精神是照顾四面八方，就是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新民主主义5种经济的构成中，国营经济是领导的成分。在逐步地实现计划经济的要求下，使全社会都能各得其所，以收分工合作之效，这是一个艰巨而必须实现的任务。在这个报告中，他还说明《共同纲领》中之所以没有明确地把新民主主义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发展前途写出来的原因。我在上一章已经谈过了。1952年6月，他又进一步指出，当时不写入，是为了避免急躁地把前途当作今天要实行的政策，避免发生“左”倾错误。从周恩来的这些观点看，他对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当前任务、长远任务，以及需要避免的错误，思想上是十分明晰的。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如何恢复呢？当时各部委分别召开全国性的会议，一方面了解情况，一方面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方针和计划，也就是如何把《共同纲领》中的规定具体化。1949年12月下旬，周恩来在《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的报告中谈到国家财经计划问题时说，1950年国家财政负担是很重的，因为一方面要继续进行解放战争，同时又要负担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公教人员的生活，必须采取恢复生产、开源节流的办法，要求全体工作人员在建设新中国的时候，要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在谈到处理6种关系时，他指出我国确定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方针，但不能忽视农村，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无法发展，要认识这样一个辩证关系。在内外关系方面，我们以自力更

生为主，欢迎友邦在平等互助基础上的帮助。工商关系方面，他强调工业为主，国营和合作社商业要服务于工农业产品的流通，防止投机现象。关于公私关系，他指出国营经济是领导成分，但允许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遇到困难，政府会帮助它的。关于劳资关系，实行毛主席确定的“劳资两利”的方针，采取保护劳动的政策，也给资方适当的利润。最后谈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他强调要利于国家的统一，又要因地制宜，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这个报告体现了党的方针，也充分反映了周恩来对于恢复国民经济与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主导思想。

当时国家的财经工作，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直接领导。这个机构建立于1949年7月，主任是陈云。建国后陈云仍为主任，副主任为薄一波和马寅初，以后，又增加了李富春、邓小平、曾山、贾拓夫、叶季壮。除马寅初是著名经济学家外，陈云等同志都是领导经济工作的能手，中财委是做出了很大成绩的。作为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也要过问中财委的事情，在努力恢复生产、交通的同时，参与领导统一财政、稳定物价，主持制定根治淮河的方针、规划，采取救济失业工人的措施，逐步减轻农民负担等工作。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后，周恩来由于兼任外交部长和中央军委主管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军事、外交上繁忙紧迫的要务纷至沓来，曾有人劝他对经济方面的事情可否少管一点。但他认为，党中央委托他主管政府工作，凡是以政务院名义发布的决定、法令都需要由他亲自审走，不管财经方面待批急件有多少，问题多么繁杂，他都及时、缜密、周到地逐步解决。周恩来不知疲倦地工作，主管财经工作的同志出色地完成任务，使得我国既要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同时又能使经济迅速恢复，财政收支平衡，物价保持稳定，人民生活有了初步改善。

这里，我谈谈周恩来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在我党的领导人中，和民族资产阶级打交道最多的是周恩来。在重庆时期，他和实业界人士接触频繁，不少人同他成为彼此可以信赖的朋友。他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了解是很深的。建国以后，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了政府，和我们合作共事。但是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在党内包括一些高级干部中，思想认识并不都是正确一致的。1950年4月，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提到银行系统一位负责同志在统战工作会议上发言中说：“今天斗争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经济政策是‘允许、限制、排挤’（民族资本）”；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等。起先，周恩来以为是个别人的看法，会后他发现中南区一位参加中央财政会议的同志回去传达时，也是这样讲的。他才警惕起来，把那份发言打印出来，送给了毛泽东和刘少奇。毛泽东对这份发言作了很多批注，说：“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到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并指出“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他们困难时应给予扶助使之发展。”毛泽东还严厉批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老百姓点灯”的错误说法。

在“三反”、“五反”中，周恩来也严厉指出资产阶级的种种违法行为，但他看待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两点论。当时不少干部“左”的情绪比较严重，有人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1952年6月，中央统战部召开全国统战部

长会议，我是统战部秘书长，筹备这次会议，周恩来到会作了报告，并在第二部分“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中，详细阐明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和现状。他指出资产阶级的本质是唯利是图，就是剥削工人榨取剩余价值。尤其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必须把它的本质揭露出来。但是资产阶级还有积极进步的一面，我们还要尽量地利用，让它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使我们的经济能更快地发展。有一个同志在会上说，跟资产阶级做统战工作就是讲“外交”、应付、说空话。周恩来指出这种看法不对。他说，这次黄炎培先生打算在全国工商联代表会议的致词中传达毛泽东同志告诉他的一段话，就是“四马分肥”，即私营企业中把利润分成四份，其中国家一份，就是税收；工人一份，就是福利费；还有一份公积金，作为再生产之用；第四份就是私人应得到的纯利。实际上资本家所得的是一份多一些，因为公积金在将来发展生产中所取得又分成四份，他又得到一份。这难道是毛泽东同志闲得没事，把黄炎培找去聊天讲闲话吗？毛泽东同志没有这样的闲工夫。他找一个人去总是有目的的，毛泽东同志向黄炎培讲清道理后，黄炎培就给资产阶级写信，用他自己的口气向资产阶级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有什么不好呢？经过他们把党的政策传达到他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人民中去，这是很有效的。这能说是应付、说空话吗？

从新中国建立到 1952 年底的 3 年间，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政务院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工农业生产一般地达到或超过解放前的水平。3 年中，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 77.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144.9%，农业增长 48.5%，特别是粮食产量有很大的提高，超过解放前最高产量的 2800 亿斤，达到 3278 亿斤。建国时占工业总产值一半左右的私营企业，也有所发展，发挥了它应有作用。作为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为这个成就倾注了多少心血啊！

第一个五年计划

周恩来预计国民经济的恢复要用大约3年的时间。建国初期，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地投身于经济建设事业，3年之中，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根本扭转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留下来的混乱局面，不仅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许多生产项目取得超过预期的成就，国民经济的恢复提前实现了。

毛泽东高瞻远瞩。1951年2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构想，决定自1953年起，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要求立即着手制定五年计划各项工作，争取在22个月（即1951年的10个月和1952年全年）的时间内，完成试编工作。经周恩来提议，成立一个6人领导小组加强领导。小组成员是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这6位同志陈云是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李富春是中财委副主任，聂荣臻是代总参谋长，宋劭文是中央财经计划局局长。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鉴于战争短期内不可能结束，中央作出了边打仗边建设的战略决策。中央指出，从1953年到1957年的5年中，是我国长期建设的第一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提高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并保证我国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根据毛泽东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意见，明确了五年建设的方针为：（一）工业建设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重工业优先建设钢铁、煤炭、电力、石油、机械制造、军事工业、有色金属及基本化学工业。轻工业优先发展纺织、造纸和制药工业。（二）工业建设的速度，在可能的条件下，力求迅速发展。（三）工业的地区分布，应有利于国防和长期建设，并且结合实际情况，充分发挥东北及上海原有工业基地的作用，继续培养与利用已有工业基础与技术条件，为建设新厂矿、新工业基地创造条件。（四）铁路建设以沟通西南、西北和中南为主要任务，以适应在国防安全条件下，长期建设的需要。

当时中央财经委员会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的指导思想是：（一）经济计划要确实保证重点。（二）建设的规模和速度，要按实际需要和财力、人力、物力条件的可能进行安排，并且配套建设。（三）第一个五年计划应同第二个五年计划相衔接。

1952年6月，中财委汇总各大区和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指标，试编出按部门和行业划分的《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计划轮廓（草案）》及其《总说明》，有两大册，主要工业、交通、水利设施都包括了，计划和准备扩建、改建几个重工业区域，其中有以钢铁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鞍山、武汉、包头三个区域，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兰州区域，以动力设备、重型机械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哈尔滨、沈阳、齐齐哈尔、西安区域，以化学工业为中心的吉林区域，以煤炭和采矿设备制造为中心的抚顺、大同区域，以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洛阳、成都区域。这个工业建设的新框架，体现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为新中国即将展开的有计划大规模建设绘制了一幅宏伟的蓝图。

实行计划经济，在中国没有先例，在世界上也只有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有这方面的经验，于是只能向苏联学习；同时，要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把中国这个农业国转变成为工业国，关起门来搞工业化只能是纸上谈兵，

而当时帝国主义是敌视新中国的，对我们进行封锁，不可能从西方先进工业国中得到必要的设备、技术和资金，只有一条途径：争取苏联的援助。

1952年8月17日，周恩来率领阵容强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这是新中国建立后他第二次以公开身份对苏联的访问。周恩来任团长，副团长为陈云、李富春，团员有王鹤寿、吕东、陈郁、宋劭文、柴树藩、罗瑞卿、邱创成、刘亚楼等，包括政府许多工业部门和军事部门。当时我国还没有自己的民航飞机，苏联政府派来了三架军用飞机和一架民航飞机，供中国政府代表团使用。飞机途经伊尔库茨克时，住了一夜，第二天又换乘飞机继续起程，离开宾馆时，周恩来与宾馆服务员——握手告别，感谢他们对中国政府代表团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这些服务员没有料到中国总理竟是这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都深受感动。飞机经新西伯利亚抵达莫斯科。

周恩来一向对工作认真负责，重大事情更是事必躬亲，一丝不苟。抵达莫斯科后，他又将准备提供给苏联政府讨论的“一五”计划草案及《总说明》等详细地审阅一遍，逐字逐句，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凡有错误的地方，做了改正。审阅当中，发现林业采代、造林和木材蓄积计划数字对不上，周恩来当即在电话中严厉批评了负责综合工作的同志。可是第二天，周恩来到中国政府代表团团员住的宾馆，与大家共进午餐，服务员送来一瓶白兰地，周恩来亲自斟满两杯，站起来走到昨天受批评的同志面前，递给他一杯，并微笑地说：“昨天我批评了你，以后要细心一些嘛！不要把这么重要的数字搞错。来，现在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今后工作得更好！”一杯酒，几句暖人心田的话，一下子就把一天前发生的那件不愉快的事情造成的紧张沉闷气氛缓和下来了。大家深为总理的严谨作风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所感动。

为了便于同苏方各部门工作人员商谈和面对面研究计划的制订问题，周恩来把代表团团员和工作人员分成若干相应的组，让他们同苏方有关部门的同志直接接洽，开展工作。这样做，也可以使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超脱一些，有更多的时间考虑和解决一些急需处理的较大的问题。

到莫斯科后两三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设宴招待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代表斯大林起立敬酒。宴会结束后，斯大林陪同周恩来看了电影，边谈边吃糕点、水果，活动进行了3个小时。

各个工作组走上正轨后，周恩来率部分团员参观莫斯科一个汽车制造厂，随后又到斯大林格勒参观访问。此行的目的——一是慰问这里在苏联卫国战争中表现英勇顽强的居民，他们蒙受了重大牺牲，对扭转战争局势起了重要作用；二是为了调查这个城市在历史上罕见的最残酷战争——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遭受纳粹军队破坏的情况；三是了解这个城市战后所进行的恢复和重建工作的情况。他们参观了当年的几处战场：面粉厂、万人壑（通向伏尔加河的一条沟渠，只在这一处双方伤亡就上万人）、伏尔加河岸、市街心大厦。战后在这里任省委书记的莫斯科文描绘了苏联军队和人民在这些地方战斗的惊心动魄的情景。在参观中，周恩来受到了运河两岸人民群众自发性的热烈欢迎。战争结束已经6年，仍是到处断垣残壁，战壕沟渠等战争痕迹尚未消失，可见战祸的深重和恢复的艰难。

9月中旬，斯大林会见周恩来和陈云、李富春，莫洛托夫（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维辛斯基参加会见。周恩来谈的内容主要是：

一、中国经济概况；二、五年建设方针；三、五年建设的主要指标和主要项目；四、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五、请苏联援助事项。

斯大林对周恩来的介绍给予积极的反映，他谈了三点意见：一、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应当能够制造汽车、飞机、军舰；二、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一定很快，但是做计划应留有余地，要有后备；

三、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价格便宜，技术也是头等的。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苏联自己的重建工作任务很重，而且苏联还从来没有搞过这样大规模的对外援助，他们慨然许诺援助中国，这是难能可贵的。

9月下旬，周恩来和陈云先期回国，留李富春领导中国代表和苏联政府继续谈判。离开苏联以前，周恩来把他亲手办理与苏联往来的有关文件逐一清点，交给李富春的秘书吴俊扬。苏联政府对中国代表团的接待工作，改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萨布罗夫负责。苏联国家计委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组织一批人着重审查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要求援助的项目。中苏双方进行多次会谈和磋商，项目一个一个落实，凡是重大问题李富春都打电报请示中共中央，周恩来都仔细地审阅这些电报，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后，及时作出答复。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不幸逝世。8日，周恩来专程赴莫斯科，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参加斯大林的葬礼。他还听取李富春关于同苏方商谈“一五”计划的情况汇报和意见。他听得非常认真，亲自做记录，回国后又整理成文，分送有关领导同志征求意见。

3月下旬，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等人约见李富春、宋劭文和袁宝华。米高扬代表苏联政府对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提出了几点意见：一、关于工业发展速度，原定每年递增20%，但由于建设时期与恢复时期情况不同，速度定高了，摊子就铺得很大，力量分散，因此计划每年逐增14%或15%就可以了。二、中国工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缺乏自己的专家和地质资料，这两项工作必须做在其他工作之前。苏联的帮助可以减轻中国的负担，但毕竟很多工作要中国自己去做。设备不能全依赖进口，能生产的要自己生产，这样既可节省资金，又培养了技术力量。三、中国“一五”计划，需要大力发展手工业、小工业。手工业是增加财政收入和国民经济积累的来源之一。四、要注意考虑农业。过去3年，中国实行土改，农业收获很大，但今后这个重要条件没有了，就要另想办法保证农业的继续发展。要保证肥料，注意发展城乡交流。五、铁路建设意义重大。六、五年计划在财政、金融、商品流通方面，还要花力量研究，因为计划中缺少财政和物资平衡。这些意见很有参考价值，比如我们原来准备工业年平均增长20%，是根据前3年工业平均增长34.8%的速度设想的，虽然计划指标已低于这个数字，但经济恢复时期带恢复性质，不可能持久，这一点我们认识不足，苏方的意见提醒我们，使我们减少了盲目性。

4月初，李富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同米高扬等会谈的主要内容，并决定派宋劭文等回国汇报。4月中旬，宋劭文回国后，即向周恩来汇报。他是晚上10点钟到达总理办公室的，周恩来正忙着处理手中的急事，直到午夜12点才同宋劭文谈话，听取汇报。周恩来问，“谈判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宋劭文说：“这是因为苏方对计划的平衡工作要求很高，对我们的地质资料、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询问得很详细，而我们在这方面的准备工作不足，使项目选址、施工计划、技术人员的培训等计划的落实，花费了不少时间。”周恩来说：“确定100多个援助项目，并要守约按期交付使用，确实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宋劭文拿出7、8幅计划援助项目进度曲线图，从图上可以看到施工进度各种数据，周恩来很高兴。宋劭文汇报到苏联经济专家说：“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大于职工人数的增长速度，这样才能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要大于工资的增长速度，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积累；技术人员的增长速度，要大于工人的增加速度，才能保证技术水平的提高。”周恩来很赞赏这几个观点。宋劭文又汇报了苏联计委管综合的同志说：“平衡法是编制计划的基本方法，要从需要算起，充分考虑可能，经过平衡，使计划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这句话给周恩来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把这种观点运用在我国建设实践中，并在“一五”时期形成他对经济建设工作的一种指导思想，即：既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这说明周恩来在经济建设中既虚心学习苏联经验，又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来制定计划的。

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联商谈援助中国“一五”计划，历时8个多月，取得了圆满成功。根据协议，从1953年至1959年，苏联将援助我国建设与改建91个工业项目。加上1950年签约援助我国50个项目，共141个项目。1954年10月，苏联政府接受我方要求，又追加援助15个项目，三批加起来共156项。这些项目大部是重工业工厂、煤矿、电站。此外，苏联每年接受我国1000名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培训，又派5个专家组200名设计专家和50名地质专家，帮助我国建设。苏联政府和人民的援助，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了重要作用，这一点我们应当永志不忘。

“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1953年6月至8月，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传达了中央关于“一五”计划的指示精神，并讨论它的方针任务，对编制工作进行了初步总结。1954年4月，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以陈云为组长的8人小组，成员有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陈伯达。同月，毛泽东审阅了陈云提出的《五年计划纲要（初稿）》，并批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审阅。后来由陈云、李富春主持，8人小组接连举行了17次会议，对“一五”计划初稿逐章逐节进行讨论修改。10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3位领导人聚会广州，用1个月的时间审议修改后的“一五”计划初稿。周恩来经常召开国务院会议，对计划的细节一一进行研究。周恩来非常重视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有些工厂选择厂址，他亲自过问，并下去实地考察才最后定下来。

在执行“一五”计划中，周恩来积极稳妥，实事求是，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1956年2月8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他指出：绝不要过早提出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当时有的部门和省市的领导人，要求加快速度，出现急躁冒进情况，这些话是针对他们说的。周恩来还说：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1956年9月，党召开“八大”，周恩来在报告中对“一五”计划的执行情况作了分析，认为经济工作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按比例发展。他指出，要处理好四种比例：第一，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第二，应当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

比例地发展。第三，应当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第四，应当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他认为“一五”计划所定的各项指标基本上是正确的，也大都符合当时的情况，但也发生过偏差，某些部门和地方在建设上不顾条件，到处铺开，造成财政上的困难和人力、物力的浪费。有的在7年或者12年才能做完的事，急于在3年5年甚至1、2年内做完。他认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会发生的，这就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财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的后备力量，特别要增加国家的物资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并且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困难。在制定财政收入计划的时候，必须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考虑到积累和消费之间正确的比例关系，避免把收入定得过分紧张。在制定财政支出计划的时候，除了必须根据保证重点建设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要求，进行正确的分配以外，还必须考虑到建设规模和物资之间的平衡，考虑到意外的需要而留出一定数量的预备费，避免把支出定得过分紧张。周恩来在总结上述问题之后，强调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区广阔、情况复杂并且经济上正在剧烈变革的国家里，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发生重大错误，造成重大的损失。因此，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对我们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这里可见周恩来对于国家经济建设，抓得紧、摸得深、讲得透，尤其注意避免头脑发热的冒失行动，使国家遭受损失。他多次在国务院的会议上提出，要认真研究经济和财政的关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划出几条杠杠来，作为安排计划的依据。1957年底，“一五”计划全面提前超额完成，中国迅速建立起前所未有的新兴工业，如飞机、汽车、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冶金和矿山设备、精密仪表、新式机床、塑料、无线和有线电器材的制造等。我国已建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旧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开始发生了变化。

为新中国外交奠基

到莫斯科签约

新中国成立以前，周恩来就是中共外事工作的领导人。抗战期间在武汉和重庆工作时，周恩来同苏联、美国、英国的驻华大使都有过接触，同各国官方和民间访华人士也曾多次会见。抗战胜利召开旧政协前后，美国总统杜鲁门派特使马歇尔来华调解国共争端，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与马歇尔和后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接触更加频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周恩来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加上他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建国以后，他出任总理兼外交部长。

旧中国的外交，不论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无不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壓力。“弱国无外交”，这是当时一些具有爱国心的外交官和爱国人士的哀叹。新中国建立以后，外交方面的方针、政策、任务应该是怎样的呢？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说：“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外交工作有两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我们同兄弟之邦并不是没有差别。换言之，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对帝国主义国家战略上是反对的，但战术上有时在个别问题上是可以联合的。”这是当时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正在逐步形成。新中国的建立是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美国政府在中国内战中支持蒋介石，遭到失败，但它对新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将持什么态度，仍然抱有幻想。1949年4月南京解放时，司徒雷登还留在南京观察，曾通过民主人士罗隆基提出，美国准备给中国提供40亿美元贷款，企图与即将建立的人民政府拉关系。罗知道中共不会接受，没有提出。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我们要“一边倒”，司徒雷登才离开中国。对苏联，在1949年7月刘少奇秘密访苏时，就向斯大林介绍了中国的情况，说明中国外交活动根据这几项原则进行：一、同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国家的完全独立；二、在国际事务中，与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和民主；三、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四、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贸易。在新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如果各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承认中国新政府的政策，我们就准备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那时希望苏联能在这些国家之前承认新中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0月2日，苏联承认新中国。接着，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越南也都承认了新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随后，印度、瑞典、丹麦、缅甸、瑞士、芬兰、巴基斯坦等亚洲、欧洲国家也相继承认了新中国。新中国的外交，开始打下了基础。最主要的是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交往和合作。

新中国建立之前，毛泽东即准备访问苏联。刘少奇秘密访苏时，曾向斯大林提出，毛泽东准备在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后公开访问莫斯科，希望苏联方面考虑时间和方式。斯大林表示同意。开国大典后不久，周恩来即协助毛

泽东进行访苏的准备工作，指导有关部门编写有关的资料。这次出访的任务主要是：参加斯大林 70 寿辰庆祝活动；就两党两国之间最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谈和签订两国之间的有关条约、协定，并商议和解决有关两国利益的若干具体问题。

1949 年 12 月上旬，毛泽东偕同随行人员陈伯达、叶子龙、师哲等乘坐专列从北京出发，经满洲里前往莫斯科。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苏联专家总负责人柯瓦廖夫陪同前往。12 月 16 日中午，火车进入莫斯科车站，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到车站迎接毛泽东。因为天气太冷，只举行了简单的仪式。毛泽东发表了书面讲话，首先表示对苏联政府和人民“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然后指出：“我相信，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于新民主国家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努力，由于中苏两大国共同愿望和亲密合作，特别是由于斯大林大元帅正确的国际政策，这些任务必将会充分实现并获得良好的结果。”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前往斯大林的别墅下榻。

当天下午 6 时，斯大林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小会客厅会见毛泽东。他对毛泽东提出，你来一趟不容易，我们这次该做些什么？你有什么想法或愿望？不能空手回去。毛泽东回答说：恐怕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斯大林不理解这个“既好看，又好吃”的是什么东西。毛泽东也没有挑明，但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斯大林表示惊讶，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要叫他来，他来干什么？”

两位领导人的会见和谈话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除了 12 月 21 日参加斯大林 70 寿辰的庆祝活动以外，毛泽东访问苏联的情况没有在报纸上再作任何报道。英国一家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苏方有些着急了。

当时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出了个主意：以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这次访问苏联的目的。1950 年 1 月 1 日，毛泽东决定发表这个《答记者问》，于 1 月 2 日见报。在《答记者问》中，毛泽东说：“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并说：“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

《答记者问》发表后，震动很大。斯大林在了解我方的意图后。同意周恩来来莫斯科来。

1 月 2 日晚上，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会见毛泽东时，商谈了周恩来访苏的具体事宜。

当天深夜，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随后，毛泽东会见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访问了列宁格勒。1 月 10 日，周恩来率领一个庞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代表团成员包括李富春、叶季壮、吕东、张化东、伍修权、赖亚力、欧阳钦、柴树藩等。

毛泽东返回莫斯科后，与来苏途中经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的周恩来通了一次电话。毛泽东把自己的活动、愿望以及要签订的条约的大致内容都讲了，并征求周恩来的意见。这样，周恩来心中有了底，到莫斯科后即可投入工作。1月20日，周恩来一行到了莫斯科。他在车站发表演说：“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大国外交的会商。”随后见了毛泽东。周恩来起先住在别处，距毛泽东的住处较远，后来搬来与毛泽东住在一起，以便于商量问题。

1月22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举行会谈。双方参加的还有维辛斯基、李富春和王稼祥等。

毛泽东首先发言，阐述了在新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条约的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再起或与日本勾结的其他国家的重新侵略。

斯大林同意这一意见，并谈了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中国长春铁路问题、旅大问题、贸易及贸易协定问题、借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等。

毛泽东提议，中长路、旅顺和大连三个问题写在一个协定中。

斯大林说，中苏条约应是一个新条约，对雅尔塔协定问题可以不管它。旅顺口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限期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毛泽东同意前一个办法。

关于中长路，因为我方原无变更中苏共同经营之意，所以只提出缩短年限，改变资本比例，由现在的中苏各出一半，改为51：49，由中国同志担任局长等三项意见。苏方同意缩短年限，但不同意改变资本比例，并提出双方人员轮流担任正副局长。

关于贸易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准备的进出口货单，并不十分准确，因此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只能作出大概的规定。

斯大林突然提出中国应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周恩来随即反问：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居民？斯大林一时回答不出来。他的原意是，应禁美、日、英等国家的人进入东北。因为这个问题是干涉中国内政，会谈的时候，出现了不愉快的气氛。

在谈到聘请苏联专家时，斯大林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条件，如对苏联专家的待遇要求过高，还规定苏联专家在中国犯了错误，中方不能处理，而应交苏方审查和处理。这是沿袭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做法，有点治外法权的味道。苏方还提出要在我国的哈尔滨、沈阳、大连、上海、广州、乌鲁木齐、伊宁、喀什设立领事馆。中国也相应地在海参威、赤塔、伯力等地设立领事馆。苏方对这件事非常积极。以后，很快开始建馆工作。我方除在赤塔、海参威、阿拉木图设立和维持不长时间的领事馆外，没在其他地方建馆。苏方按老习惯，把外交人员当作情报人员看待，处处提防。这些都表现出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毛泽东对苏方的这些做法是有意见的。

在1月22日的会谈中，双方决定由周恩来与米高扬、维辛斯基进行具体会谈，后来我方加入了李富春、王稼祥，苏方加入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和罗申大使。第二天，他们即开始就条约和协定的内容进行会谈。有时毛泽东也参加。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商谈，周恩来强调：“友好同盟的具体内容自然就包括‘互助合作’在内了，而后者也应该是条约的具体内容。”苏方对周恩来的解释很感兴趣，也相当重视，因此把这次会谈的情况向斯大

林作了汇报。起先，苏方按周恩来提出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交给我方。周恩来看后说：“不对，我说得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当即把王稼祥、陈伯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

周恩来用了两天多时间，草拟了条约文本，由师哲译成俄文交苏方修改。苏方没有改动多少，表示满意。条约文本实际上是我方起草的。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有效期为 30 年。其中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亟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 1952 年末。”“不迟于 1952 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 1945 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以上两项在苏联未移交前均由中苏共管。

《关于贷款协定》规定：苏联以年利百分之一的优惠条件给中国 3 亿美元的贷款，中国于 1954 年 12 月 31 日至 1963 年 12 月 31 日 10 年内分批还清。

此外还发表了《公告》。

1950 年 2 月 14 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字仪式。中国代表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师哲等。苏方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等。在签字仪式上，毛泽东、斯大林站在最中间，中方由周恩来签字。

晚上 9 时许，中方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特勒保尔大旅社举行答谢宴会，即告别宴会，有 500 多位客人参加，包括许多国家的驻苏大使。斯大林破例在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地方参加宴会。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大使夫妇、李富春亲自站在门口迎接。毛泽东和斯大林握手后，便陪斯大林向餐厅的正席走去。苏联许多高级干部从没有在这这么近的地方见到斯大林，更不用说外宾了。客人全都惊呆了，接着就热烈鼓掌和欢呼。两位革命领袖和主要客人被安排在里间小客厅，与众多客人的外厅隔着一层玻璃大门。外厅的人不顾礼节纷纷拥进里间，连一些国家的驻苏使节也坐不住了。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阻挡不住，隔板、玻璃板有被挤碎的危险。周恩来见势不妙，索性请服务人员打开玻璃大门，将两厅合并成一厅，让大家都能看到这个伟大的历史性场面。

周恩来致祝酒词。费德林担任翻译，他拿着周恩来祝酒词的俄文译稿。周恩来临场未拿稿子，2000 余字的祝酒词竟说得与原稿一字不差，这种非凡的记忆力使人十分佩服。

斯大林也起立致词，说了一些中苏友好、兄弟情谊应保持下去的话。

2 月 16 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宴会，为毛泽东、周恩来饯行。2 月 17 日，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启程回国。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有着重大的意义。当时美国政府是敌视新中国的，我们不能孤立无援。周恩来回国后在一次干部会上说：“这次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大家都很高兴。由于斯大林和毛主席的

直接会晤，顺利地签订了条约和协定。”“条约中有反对和争取两个方面的任务。我们所反对的一方面，是条约里指出的与日本勾结的国家，这就是美国。由此烘托出另一方面，也是积极争取的一方面，这就是要争取世界持久的和平。这两个方面体现了我们今天的外交斗争和我们在和平阵营所从事的神圣伟大的任务。这个条约不仅体现了中苏两个国家 7 万万人民的团结，而且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新民主主义国家 8 万万人民的团结。……这个条约是有其历史意义的。”各项协定解决了中苏之间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苏联给中国提供贷款，帮助我们进行建设。这些都是周恩来协助毛泽东与斯大林进行会谈的成果。

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

经过3年恢复，我国的经济情况已大大好转。实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之后，各项事业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加强。在国际社会中，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不断增加，我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援朝抗美的斗争和援越抗法的斗争，充分显示出刚刚登上国际舞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正如周恩来在1953年10月8日以外交部长身份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所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英、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大国，对于解决和平与国际安全的重大问题，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1954年初，经过苏联的努力，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决定，1954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有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有关国家出席的国际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4月19日，中国政府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中共中央对这件事情十分重视。专门开会研究参加这次会议的原则、方针等问题。作为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更是认真对待。当他获悉邀请我国参加会议的消息时，就开始作周密细致的考虑。随后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确定代表团的人选；指导干部收集、熟悉、研究朝鲜和印度支那的情况及参加会议各国的态度、动向等必要的材料和问题等；指导、检查代表团的全部工作。

周恩来估计到，这次会议是一场尖锐的斗争，尽管他工作十分忙碌，仍经常约请有关人员商谈参加会议的问题；拟定开会期间加强外交活动的方针和计划，配合会议的进程进行国际宣传；同时还通过外交途径，与苏联、朝鲜、越南等国协商，力求取得一致的看法，以便采取一致的步骤。在商讨这些问题时，周恩来常常让外交秘书陈浩把有关人员找到西花厅去，谈到午夜以后。

为了和苏联方面协调双方对会议采取的方针、政策，对会议进展情况和可能取得的成果进行分析和估计。周恩来带领少数人员对莫斯科进行一次工作访问。4月1日，周恩来一行乘飞机离开北京，本来打算在伊尔库茨克稍事停留后直飞莫斯科。专机突然发生故障，不得不在乌兰巴托降落检查。周恩来等同志只好到机场候机室休息。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得到外国飞机停留的报告，打来电话询问：什么人的飞机，为什么飞来飞去，不打招呼？机场领导向他报告情况后，师哲去接电话，告诉泽登巴尔：是周恩来总理的飞机，本来没有计划在这里降落，因为发生故障不得不作意外的降落。泽登巴尔说：我们今天不能去机场迎接周恩来同志了，因为事先我们不知道，也没有准备，现在也来不及了。好吧，请向他问好！

师哲汇报这一情况后，周恩来沉思一下，说：我们应该找一个适当的机会，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一次正式访问。

4月2日，周恩来一行到达莫斯科，中苏双方即开始进行会谈协商，会谈是围着圆桌进行的，赫鲁晓夫把这次会谈称为“圆桌会议”。苏方参加的除赫鲁晓夫外，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苏斯洛夫等。中方是周恩来和驻苏大使张闻天。

会谈一开始，双方相互交换有关情况并提出一些新问题。然后赫鲁晓夫讲了对会议的设想和看法。他说：这是一次带着政治意义的会议，但对它不

要抱有过大的希望，也不要期望它能解决多少问题，它可能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然而，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的：中国、朝鲜、越南一起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我们利用这次国际会议的机会，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我们的方针政策，对有关事态作出声明、解释和澄清，就是一种政治收获。

莫洛托夫表示同意赫鲁晓夫的看法。同时指出，在国际斗争和外交场合中，很难预料出现什么问题，尤其不可设想一切都会按照我们预定方针或计划进行。因此，对任何一个问题、一件事，都不要认为它会依照我们的想法和愿望去发展，尽管我们对一些问题事先有自己的看法、设想、要求、愿望。因此，我们事先不应有一个大致的设想或意愿达到的目标。虽然，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毫不含糊的明确立场、态度和原则，但同时必须有极大的灵活性、预见性、机动性。这样我们才能做到恰到好处，达到预期的目的。总之，需要边走边看，随机应变，找到对策，灵活运用。

周恩来讲了，介绍了中国方面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意见。他指出：中国、朝鲜、越南能够一道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就是一种不同寻常的事，是我们的一个胜利。假如我们能够很好地利用参加这次会议的机会，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问题作出解释和澄清性的声明，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效。周恩来想通过努力，解决一些问题。他再三声明，中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尚属第一次，缺少国际斗争的知识和经验，中苏之间必须保持密切联系，交换意见，互通情报，校正口径，协同动作。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有其微妙之处，这就是会议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朝鲜和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虽与中国有利害关系，但却非直接属于我国自身的事情，所以特别需要小心谨慎，严肃对待。

周恩来指出，我们对苏联和西方国家关于这次国际会议磋商的前前后后和整个经过不太了解，希望苏联外交部作个介绍，并确定协作原则。由于当时中苏联系密切，苏方对我们这些要求都给予肯定的答复，周恩来对此十分满意。双方还约定，中国代表团提前两三天到达莫斯科，以便听取苏方向我代表团人员介绍国际会议的斗争经验，以及在斗争中须注意的各项事宜。经过会谈，双方达成一致的看法，由苏方草拟具体方案。

4月12日周恩来一行返抵北京。周恩来向党中央汇报了与苏方商谈的情况。

4月21日，周恩来率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代表团阵容强大。除首席代表和代表外，还有王炳南秘书长；雷任民、师哲、乔冠华、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黄华、龚澎、吴冷西、王悼如、雷英夫等顾问。还有很多工作人员，是仅次于苏联的大代表团。李克农主要负责代表团的秘书、机要、警卫、翻译、后勤等内部事务。王炳南出席会议主席召开的各代表团秘书长会议，研究决定会议议程、会务等具体事宜。宦乡、乔冠华、陈家康组成政治组，负责起草文件，特别是周恩来的发言稿。有时一个发言要起草很多份稿子，既要快，又要符合中央精神，还要针对会议变化的情况，这是难度较大的工作。师哲是俄文翻译，负责把周恩来的发言、提议等文件译成俄文，同苏联代表团交换，再将他们的文件译成中文，宦乡同浦寿昌、杨承芳组成英文翻译小组，杨负责笔译，浦负责口译，随周恩来参加会议。

吴冷西、吴文焘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负责人，负责新闻报道，同国内新闻机构联系。新闻发言人是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和黄华。每次会后，

他们都要召开各国记者招待会。紧张时休会间隙也要发布新闻。马列是周恩来的外事秘书，俄文很好，担任代表团的联络员，负责同莫洛托夫的秘书联系，安排、接洽中苏两国代表团之间的会晤。5月底，法越双方司令部代表团谈到停火等问题时，应越方要求，中苏越三方的军事顾问组成军事参谋会议。代表团团长中方是雷英夫，苏方是费登科中将，越方是谢光宝，马列是中方代表之一，负责同苏方的将领联系。

外贸部的雷任民率领一大批外贸工作人员随代表团出国，这是周恩来计划利用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机会，开展我国同西欧与世界各国进行贸易的探索。

一切重要工作的安排由周恩来亲自负责，他工作十分细致，召开记者招待会时，把问题讲到什么程度，也仔细地告诉主持人。

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停留了两天，周恩来和苏方除协调双方的方针、策略和校对口径外，还研究了需要整理和研究材料。这时胡志明和范文同都在莫斯科，周恩来和赫鲁晓夫、莫洛托夫、胡志明一起研究了印度支那问题。又邀请苏联外交部葛罗米柯等人开会座谈，回答我们代表团提出的各种问题，介绍国际会议中的斗争经验和应注意的事项。葛罗米柯讲得很具体。他说，我们的对手是狡猾的，会利用一切手段刺探我们的意图和动向，因为他们比我们更了解“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而且要用一切办法把我们置于他们的掌握之中。现代技术已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使各种窃听、窃照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因此，我们要行动检点，注意保密，尤其应随时注意，不论住旅馆、公寓、沙龙或别墅，都难以防止或发现他们事先早已设置的窃听器窃密装置。葛罗米柯介绍的这些情况，对我们很有好处。

4月24日上午，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下午抵达日内瓦机场。刚下飞机，各国记者都来抢拍镜头。周恩来发表了简短的书面声明。声明说：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两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能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相信，参加会议者的共同努力和对于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将会提供解决上述亚洲迫切问题的可能。”随后，代表团驱车到驻地日内瓦城郊莱蒙湖畔查尔索瓦镇的万花岭别墅。

莫洛托夫的飞机晚一些时候来到，周恩来又到机场接他。莫洛托夫一下飞机，就和周恩来握手、拥抱，并肩而行，亲切谈话。事后外国记者报道说，中苏两国外交代表在日内瓦机场上所表现的姿态，是当代外交史上的创举，是真正兄弟般友好的楷模。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在国际联盟大厦开幕。出席的国家有中、苏、美、英、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土耳其等19个国家。由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轮流担任主席。19个国家中有14个参加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与中国为敌，加上韩国为15个。只有苏联、朝鲜与我国有外交关系。以中、苏、朝为一方，以美国为首的其他国家为一方的形势就摆开了。双方的尖锐斗争不可避免。这种形势使我们的活动受到限制，遇到困难。但周恩来这位曾被马歇尔誉为“最出色的外交家”，充分发挥他的才能，以极其机敏的智慧、灵活的手法，顺利地打开局面，不仅使我们没有陷于孤立的地位，而是交了不少新朋

友，沟通了我国和许多国家的关系。

美国的首席代表、国务卿杜勒斯是个顽固的反共分子，曾命令不许美方人员和我方人员握手。在会议上，他要别的国家唯他的马首是瞻。加拿大是跟得较紧的一个。会议的休息室里，各国代表自由交谈。加拿大代表对我方人员说，他听了周总理的发言，很合情合理。谁知他在会上发言时，却重弹杜勒斯的滥调，并加以发挥，大肆攻击我们挑起朝鲜战争，是“侵略者”。散会后又主动和我方握手，请我们原谅，说他不能不听美国的话。周恩来获悉这个情况后，知道他们并非铁板一块，采取了利用矛盾，分化瓦解，争取多数的策略。

5月31日，杜勒斯离开日内瓦回国，副国务卿史密斯接替他。史密斯不像杜勒斯那样蛮横，但他不敢违反杜勒斯不准同周恩来握手的规定。有一次休息时，周恩来和莫洛托夫交谈。史密斯一手拿着咖啡杯子，一手空着，在旁边转来转去。后来凑上来和莫洛托夫握手，然后拉了拉周恩来的衣袖，表示向周恩来打了招呼，又不破坏杜勒斯的规定，周恩来始终没有主动和他握手。

6月15日的大会，出现了十分激烈的场面，这一天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担任会议主席。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相南日提出：“建议各有关国家的政府采取措施，遵照按比例的原则尽速从朝鲜境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等6点建议，周恩来发言表示同意。他说：“我们对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已经取得了不少一致和接近一致的意见，我们应该把已经一致和接近一致的意见肯定下来，然后对分歧之点继续讨论，以便对各项问题达成完全的协议。”“照目前会议的情形来看，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对和平统一朝鲜的问题达成协议，我们也应该努力对巩固朝鲜和平的问题达成协议。为了朝鲜人民的利益，为了巩固远东及世界和平，这是非常重要的。”周恩来还揭露了美国阻挠破坏日内瓦会议的阴谋，并呼吁：“我们没有理由不可能在南日外务相提出的6项建议的基础上达成适当协议。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建议本会议召开中、苏、英、美、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7国参加的限制性会议，讨论巩固朝鲜和平的有关措施。”最后，莫洛托夫发言，提议与会的19国代表发表关于不威胁朝鲜和平的共同宣言。

面对三个合情合理的建议，美国代表慌乱了。艾登宣布休会。美国等15国及韩国紧急开会磋商。复会后，史密斯发言否决苏联的提议。泰国代表宣读《十六国共同宣言》，企图强行结束会议对朝鲜问题的讨论。

周恩来再次发言，理直气壮地说：就连这样一个表示共同愿望的建议，都被美国代表团无理拒绝。会议已开了这么久，我们不能功亏一篑，建议日内瓦会议“与会国家达成协议，他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么，这种拒绝协商和和解的精神，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

比利时外长斯巴克为周恩来的严正立场和诚意所感动，起立响应说：这个意见有合理成分，可以研究，并说：“周恩来外长的建议是和16国宣言精神不矛盾的”，“希望以后将在‘更有利的环境下’恢复对朝鲜问题的讨论”。

周恩来抓住机会第三次发言：“如果16国宣言和中国代表团的最后建议有着共同的愿望，那么，16国宣言只是一方面的宣言，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

共同协议的形式来表示这一共同愿望呢？难道我们来参加这一会议却连这点和解精神都没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不能不表示很大的遗憾。”

斯巴克表示：“我本身赞成大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这个建议。”

史密斯又气又急，向斯巴克瞪了眼，连忙派人送条子给他。

会议主席艾登表态了。他说：“比利时代表认为中国这个建议表达了本会议工作的精神，如果大家同意，我可否认为，这个声明已为会议普遍接受？”一时没有人表示反对。

美国当然不能让中国的建议被大会所接受。史密斯表示：“在请示我们政府以前，我不准备表示意见，也不准备参加讨论刚才有人建议通过的决议。”

周恩来以沉着的语气第四次发言。他说：“我对比利时外交大臣所表现的和解精神感到很满意。会议主席要求会议注意到中国代表团所提出的并为比利时外交大臣所附议的建议，我认为也是值得提及的。然而，同时我必须指出，美国代表立刻表示反对并进行阻挠，这就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会场鸦雀无声。接着周恩来又说：“我要求，我刚才所作的这一发言也作为本会议记录的一部分。”这马上得到会议主席的同意。

这场针锋相对的斗争，说明周恩来运用他高超的智慧和娴熟的外交斗争才能。使中国赢得了同情，也使美国代表狼狈不堪。

会议讨论印度支那三国问题时，参加的国家有中、苏、美、英、法、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兰西联邦的越南（南越）、老挝王国和柬埔寨王国。

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原是法国的殖民地，太平洋战争之后被日本所攻占。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当年9月越南人民在胡志明领导下，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随后，老挝、柬埔寨抗法力量相继建立了寮国、高棉抗战政府。法国为了重新实行它的殖民统治，不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了印度支那战争，先后入侵这3个国家。这次会议谈判的主要问题是停火、划区、监督和 international 保证。关键是前两项：先实行停火，然后划区（南北划界）。谈判的主要对手是法国。

当时法国处境很困难。拉尼埃总理是主战的。参加日内瓦会议的皮杜尔外长也是主战派，对停战缺乏诚意。但他们在军事上节节失利。5月7日，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前一天，越南人民军在奠边府取得重大胜利，歼敌1.6万多人。5月8日开会时，法国代表团戴着黑纱，灰溜溜地进入会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拖延谈判，这引起了要求从越南脱身的法国人民的强烈不满。6月12日，拉尼埃政府倒台，主和派的孟戴斯-弗朗斯担任总理并自兼外长，亲自率代表团到日内瓦参加会议。

印度支那三国中，我们只和越南有往来，对老挝、柬埔寨的情况都不甚了解。老挝代表冯·萨纳尼空、柬埔寨代表泰普潘在第一次会议上，见到中国代表团就骂我们是帝国主义，认为我们支援越南，越南代替中国侵略他们。实际上，我们是支援越南抵抗法帝国主义，这也就支援了印度支那人民的抗法斗争。周恩来胸怀宽广，知道他们是受蒙蔽，派王炳南和师哲去做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看法才有所改变。接着，周恩来请他们吃饭，推心置腹地谈话，他们终于认识了斗争的矛头应该指向法帝国主义。

我们从老挝、柬埔寨方面了解了许多新情况，及时地调整了政策。在同苏、越代表协商后，周恩来于5月27日，提出了折衷方案：“关于双方军队

集结地区，也就是双方地区调整问题，中国代表团认为，印度支那三个国家——越南、高棉、寮国的情况不完全相同，因而在双方地区调整原则确定之后，还要根据三国的具体情况加以实施，因而解决的办法也会有所不同。”会议因此决定法越双方军事代表谈判越南问题，外长会议继续讨论老挝和柬埔寨问题。

孟戴斯—弗朗斯是6月17日来到日内瓦的。他向法国公民许诺7月20日如不能就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协议，他将辞职。所以他对谈判采取积极态度。这时美国仍然阻挠会议对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协议。周恩来运用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和策略，直接和英国代表团团长艾登、法国代表团团长孟戴斯—弗朗斯会谈，特别是他于6月23日亲自到伯尔尼会晤孟戴斯—弗朗斯，坦率地交换了对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意见。周恩来的真诚态度给孟戴斯—弗朗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对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原来就存在的美法矛盾日益增大，美国陷于孤立了。在这里顺便谈一件事：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时，孟戴斯—弗朗斯有腿伤，由他夫人开车，亲自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吊唁。可见他对周恩来的敬仰。

6月24日，日内瓦会议休会，周恩来利用休会机会，应邀访问了印度、缅甸，向两国领导人通报日内瓦会议情况。7月3日，周恩来在柳州与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会谈，达成“7月5日协议”：在越南，争取北纬16度以北的地方划线停火；在老挝，争取把靠近中国和越南的桑怒和丰沙里两省划为抗战力量的集结区；在柬埔寨，只能政治解决。随后，周恩来回北京向中央详细汇报。7月12日，又经莫斯科回到日内瓦。紧张的谈判之中，即使休会，他也未能好好休息。

经过周恩来同各方面的个别接触，多方协调、商议，越南划分集结区的谈判终于在7月20日达成协议。原来越南同志还有一些想法，周恩来呕心沥血，费尽口舌，开导说服他们不要在划线问题上过于纠缠，因为法方已向我们交了底，法国目前只要求给它留个面子，以便体面地从越南抽身，越南还是越南人的。20日晚，法国分别同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签订了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

签字那天晚上，周恩来到苏联代表团住处访晤莫洛托夫。很奇怪，莫洛托夫当晚9时外出，到深夜11时后还未回来。苏方人员说，印度支那三国的代表早已来到会场，却拒不签字，原因是孟戴斯—弗朗斯早已许诺要在7月20日以前达成停战协定，三国代表非要把签字仪式拖到午夜12时以后，给法国代表难堪。莫洛托夫在签字仪式完成后回到住地，已是21日凌晨3、4点钟了。周恩来等到莫洛托夫回来，倦意全消，知道已经签字了，他才放心。

7月23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离开日内瓦，回国途中访问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又在莫斯科停留3天。7月31日，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在乌兰巴托机场受到泽登巴尔主席的热烈欢迎。8月1日回到北京。

日内瓦会议开了3个月，朝鲜问题的谈判虽然没有结果，但我方能够在这个国际会议上阐明我们的原则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某些人对我们的偏见和误解，意义还是重大的。周恩来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他那端庄的风采和潇洒的举上，一直是记者们抢拍的镜头，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本想在日内瓦会议上孤立中国，结果没能得逞，它自己也只好开始同中国打交道。会议期间，中美举行了4次会谈，这些会谈成为此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印度支那问题的和平解决，是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胜利。

拨正万隆会议航向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风景秀丽的山城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是一个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是一个没有西方大国参加、没有被它们所左右的一次国际会议。

召开亚非会议的主张，首先由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提出，后来得到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四国总理的支持。1954年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时，曾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在会谈中，尼赫鲁谈到亚非会议问题，说会议将由科伦坡会议五国：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锡兰召集，旨在“促进友谊和合作”；“考虑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问题和关系”；讨论“特别感兴趣的问题”，诸如“影响国家主权”和“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研究亚洲和非洲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亚非国家能对“世界和平和合作”作出什么样的贡献。周恩来表示：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是为亚非和平世界和平努力的。

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点是：都愿意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多的发言权；都反对殖民主义，支持各民族自决和要求种族平等；都想要发展经济；都希望和平。这些共同点使他们能够坐在一起开会。但是他们之间也有明显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如何解释“殖民主义”。有的国家听信所谓“共产殖民主义”的说法并把它与西方殖民主义相提并论，一样加以谴责。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同中国建交的只有7个，接受美国援助的有22个。许多国家对中国很不了解，有些国家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对中国怀有恐惧甚至敌意。尼赫鲁、吴努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则是主张中立，他们主张同时与苏联集团和西方集团保持友好关系，来缓和紧张局势，避免军事结盟，尽量减少争议。埃及总统纳赛尔与中立派合作。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只有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这就决定会议上必然会出现尖锐、复杂的斗争。

这次会议中国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的代表团。4月7日，周恩来率代表团离开北京，将去印尼的万隆参加亚非会议。这时他刚刚动过阑尾炎手术，但他认为这次会议非常重要，一定要亲自参加。

台湾国民党方面不愿看到新中国在国际上影响日益增大，采取各种手段进行破坏，并针对这次会议，制定了谋害周恩来的计划，代号是“1号”。

周恩来到达昆明。原定11日和工作人员一起乘包租的印度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出发。忽然接到缅甸总理吴努的电报，邀请周恩来先去仰光，以便先同几个主要参加国缅甸、印度、埃及等国的政府首脑会晤，研究一下会议的有关问题。这样，周恩来、陈毅等人改经昆明去仰光，然后由仰光飞雅加达。一些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仍乘“克什米尔公主号”如期由香港起飞。不料飞机在香港启德机场加油时，被国民党特务在飞机轮仓附近安放了定时炸弹，结果在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的海面上爆炸，中国和越南政府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

争取和平的坚强信念，使周恩来不顾个人的安危，仍决定前往万隆。他知道邓颖超对他此行很担心，行前他给邓写信说：

“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

14日，周恩来等到达仰光。15日晚同尼赫鲁、吴努、纳赛尔、范文同等举行非正式会议，交换意见。周恩来提出在亚非会议上不提共产主义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致使会议无结果。这个建议得到一致赞同。

17日周恩来到达万隆，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抱着对于和平和友好的热烈愿望，前来参加即将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我相信，我们的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多种破坏和阻挠，并对于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作出有价值的贡献。”这也就是中国代表团参加亚非会议的目的。

18日，亚非会议开幕。周恩来成为会场内外最受瞩目的风云人物。有的外国记者报道说：“他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欢呼声和掌声。”当周恩来坐着飘扬着五星红旗的汽车驶向大会会场时，街头群众蹚着积水，冒雨向中国代表团车队发出雷鸣般的欢呼，人们不顾警察的阻拦，从四周围上来。动人的情景使美国记者也感叹说：“人们都为他发疯了！”

参加这次会议的29个代表团团长，有13个总理或相当级别的人物，另有3个副总理和4个外交部长，规格是相当高的，他们都将在没有西方大国领导人在场的情况下，显示自己的外交本领和政治家的才能。

会议由东道主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主持并致欢迎词。印尼总统苏加诺讲话。接着各国代表团团长按英文字母顺序发表演说。会议开始时，各国代表团团长在发言中只是一般地谴责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主张独立、自由，发展各国之间经济和文化合作，语调缓和，没涉及到争议的问题。尼赫鲁、吴努都没有发言。轮到中国，周恩来也没有讲话。

伊拉克的贾马利在发言中，说什么世界上有三股扰乱和平和谐的国际势力。第一股势力是“旧时代的殖民主义”，第二股是“犹太帝国主义”，“第三股就是共产主义”，“地球上没有哪个国家不被他们的活动和颠覆行为所触动”。“非共产党世界每个国家的领导人都要认真对待共产主义危险的严重性。”他断言，共产党已经创造了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在谈到殖民主义这个主题时，断言过去那种形式的殖民主义是一种时代错误，已在消失之中。我们必须加以小心，不要上当——打开大门把一种新的、更加阴险的帝国主义以解放为名放进来。虽然他回避对共产主义进行直接的攻击，却为参加军事同盟进行辩护。菲律宾外长罗慕洛发表长篇讲话，赞扬美国基本上是“好心肠”，宣布“帝国主义已经日薄西山”。话锋一转，谈到“另外一种屈服于别国的行为”。“这些国家……在我们看来是屈服于其他列强”。很明显，他指的就是共产党国家。他说，“在那里只有一个政党可以有统治权”，自由只是幻影，而“某些殖民制度最恶劣的特征”继续存在。

这些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攻击的发言，周恩来只是沉着、耐心地谛听着，没有立即起来予以驳斥。19日下午，是最后一次公开讲话的会议。到下午3点钟，各国代表和记者们都带着极大的期望来到会场。因为事情十分清楚，有一只黑手正在把会议拖向失败的方向。今后会议的进程要由周恩来讲调子来决定。如果周恩来猛烈回击伊拉克、巴基斯坦和菲律宾代表发言中对共产主义的直接攻击，整个会议就很容易变成一场不可收拾的大混战。这正是西方帝国主义所求之不得的。

周恩来继续倾听代表的发言。

泰国的旺·威塔雅康亲王直接对准中国进行攻击。他说，有三件事引起

泰国人担心：一是中国在泰国附近的云南省组织傣族人；二是泰国境内 300 万华侨拥有双重国籍；三是泰国东北部有 50 万越南人，越盟部队在 1953 年和 1954 年两次侵入老挝，逼近泰国边境。然后，为他们参加马尼拉条约辩护。土耳其副总理法丁·罗斯土·佐尔鲁为缔结军事条约抵御共产主义进行辩护。

会议的这股逆流看来不小。周恩来不能再沉默了。他施用巧妙绝伦的外交手法，明确地表达了中国对万隆会议的和解态度。他是下午 4 点钟走上讲台的。他把原来的发言稿作为书面稿印发给与会者，利用午间短暂的休会时间起草了一份补充发言稿。一上讲台，周恩来就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周恩来的和解态度使许多人感到惊奇和振奋，会议空气为之一变，会场上鸦雀无声，听周恩来继续讲下去。

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周恩来还说：“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会议应该把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在谈到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时，他说：“第二次大战后，亚非两洲兴起许多独立国家，一类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类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我们这两类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并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会上许多人提出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周恩来说：“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它不仅有七百万共产党员，并且还有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这些情况并不妨碍中国内部的团结，为什么在亚非国家的大家庭中不能将有宗教信仰的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团结在一起呢？”谈到所谓颠覆问题，他说：“有人说，中国在国外有一千多万华侨，可能利用他们的双重国籍来进行颠覆活动。但是，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又有人说，在中国境内有傣族自治区威胁了别人。中国境内有几十种少数民族共四千多万人，其中傣族和相同系统的壮族将近千万人。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自治权利”，“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中国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最后他说：“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周恩来这个和解态度的发言，使前两天的公开会议达到了高潮。这个发言获得与会代表普遍热烈的欢迎和赞扬，代表席上、来宾席上和记者席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当他讲毕回到自己座位时，许多代表过来同他握手祝贺。缅甸总理吴努说：周恩来的演说是“对打击中国的人的一个很好的答

复”。有些在会上发表过攻击中国言论的代表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出民主精神。”一个美国记者说：“这篇发言最惊人之处就在于它没有闪电惊雷。周恩来用经过仔细挑选的措辞向他们说明了共产党中国对这次会议通情达理心平气和的态度。”周恩来的发言阐明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回击了别有用心者的造谣污蔑，使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认识更清楚了。短短 18 分钟的发言，驱散了会场上空的阴霾，引导会议绕过暗礁，回到了正确的航道上，也使与会各国和整个世界进一步认识了新中国，认识了它的谦逊、诚恳、善意和对和平的真诚愿望。“求同存异”这个周恩来提出的方针，成为万隆会议的原则。周恩来的外交才能和斗争艺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周恩来走出会议大厅时，群众再次聚拢过来。他站在沸腾的群众中间，举起右手，微笑着。很久，汽车才从人丛中开出去。

21 日，锡兰代表科特拉瓦拉又在会上大谈所谓除西方殖民主义外，还有另一种殖民主义，共产党统治下的中欧、东欧卫星国，难道就不像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一样吗？又一次企图把会议引向歧途。会议义展开争论。尼赫鲁非常着急，主张推开这个议题。吴努起来呼吁大家保持和谐。周恩来支持尼赫鲁的观点，22 日周恩来在会上说：他曾与科特拉瓦拉私下谈过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在会议上讨论意识形态问题，这不是会议的目的。

会议仍然存在着严重分歧，一派支持尼赫鲁的中立主义和同共产主义和平共处观点；一派支持集体防御，主张同西方国家结盟反对共产主义。双方难解难分。

周恩来先是按兵不动，但在关键时刻他又说话了。4 月 23 日，他在发言中说：“我们应该以要求和平合作为共同基础，来解决现在正在讨论的问题。”“有些代表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用的名词。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联合国宪章的前言中有‘和平相处’的名词，这是我们应该能够同意的。”他批判了要以实力政策来代替和平共处的论调，阐述了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并提出了中国代表团拟定的《和平宣言（草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都包括了，都是普遍可以接受的。尼赫鲁随即发言说：中国总理的发言应受到最大的重视，他的讲话是权威的。一个美国记者评论说：“周恩来选择了这个时候来发表他在亚非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他善于等待时机的外交才能简直是登峰造极。他长期静观之后在这个辩论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的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

在会议快结束时，有人在会上提出台湾问题。周恩来不得不在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说，解放台湾是我国的内政，美国侵占台湾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同美国谈判。讨论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个声明影响很大，导致当年 8 月 1 日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24 日，《亚非会议最后公报》通过，并于当日闭幕。尽管分歧不可能解决，但气氛是和谐的。周恩来肯定会议所取得的成就，表示中国坚决支持亚非人民为摆脱殖民主义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会议期间，周恩来几乎是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只有两小时睡眠。据卫士长成元功统计：开了 7 天的会，周恩来总共才睡了 13 个小时。实在累得不行，就和衣躺一会儿，然后继续工作。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就以 4 月 24 日会议闭幕这一天来说，上午 8 时开代表团团长会，会上一直争论到下午 6 时，还是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才打破僵局，达成协议。6 时 35 分开全体会议，

到晚上 9 时半闭幕。然后，周恩来、陈毅出席老挝代表团的酒会和五个发起国的宴会，回到代表团住地已经晚上 11 点。11 点半，周恩来又会见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谈克什米尔公主号被炸事件的问题。25 日零时 30 分，他会见范文同，直到 5 时才上床休息两小时。起床后，他又会见日本的高碕达之助，10 时半会见印度代表梅农，11 时半出席华侨在广肇会馆举行的招待会，并讲话。他忘我工作的精神，使代表团全体人员深受感动。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万隆受到华侨的关怀和保护。印尼华侨支援委员会万隆分会成立了秘书组、食品采购组、住房组、家具组、洗衣组、翻译组和记者组等。华侨自愿报名征用的汽车有 160 多辆。车主们说：这是千载难逢的，让我们向祖国表示一点心意。周恩来和陈毅的住处是郭贵盛先生的别墅，鲜艳的五星红旗在空中飘扬，周围是绿树红花青草地，住地经常围着一个二三百米长的圆形人圈，从早到晚，雨天也不散，为的是要看周恩来。他们说：“仔细看看新中国的总理，这一生也值得了。”百多年来中国贫穷落后受欺压，华侨在国外也被人瞧不起，从来没有现在这样扬眉吐气。

把友谊之路铺向非洲

1955年亚非会议召开以来，亚非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过去被人们称为“黑暗大陆”的非洲，正在觉醒。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50几个国家和地区，已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取得独立。还没有独立的国家，也正在燃烧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怒火。同时，新中国建立10多年来，同非洲少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许多国家和人民对我们还不够了解，彼此的往来也不多。基于这些原因，周恩来总理建议并经中央决定对非洲国家进行访问，以达到互相支持、发展友谊的目的。这次共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共10个国家。这次出访是我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谊，揭开了中国对非洲外交工作的新篇章。

1963年12月13日，周恩来率领代表团人员，乘坐向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租来的两架飞机飞往埃及。所以选择荷航，是因为这家公司自创建以来，从未出过事。代表团成员中有：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原、外交部副部长黄镇、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等。由孔、黄、童组成3人小组，负责行政、机要、秘书、保卫等工作。陈毅副总理先期应邀访问肯尼亚，他将从肯尼亚直飞开罗与周恩来会合。

12月14日中午，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专机抵达开罗，受纳赛尔总统委托的阿联部长执行委员会主席萨布里和先行到达开罗的陈毅在机场欢迎周恩来。机场上欢迎的人群不断发出欢呼的声音。从机场到宾馆的路上，周恩来和陈毅站在两部敞篷车上，绵延数十里的群众挥着旗子，热烈欢迎中国人民的使者。场面使人十分感动。

纳赛尔总统为什么没有到机场欢迎，有人说是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苏联驻开罗大使向纳赛尔施加压力，如果他对中国人过于友好，苏联将停止提供贷款。其实纳赛尔对周恩来是很尊敬的，当天下午7时，纳赛尔就在总统府接待周恩来和代表团全体成员，并把一枚精制的“共和国勋章”亲自挂在周恩来的胸前。随后，纳赛尔举行盛大招待会，欢迎周恩来一行。

周恩来在招待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是我第一次正式访问友好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天，当我们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来到非洲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觉醒的大陆，一个战斗的大陆。在这片被帝国主义者叫做黑暗大陆的辽阔的土地上，自由的晨曦已经升起，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土崩瓦解。

中国和阿联都是世界上有最古老文明的国家。12月16日，纳赛尔在阿联第9届科学节大会上，称赞周恩来为“亚洲的杰出战士”，“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活生生象征”。

12月19日上午，周恩来、陈毅一行在总统会议委员会委员法特陪同下，到开罗郊外参观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它们是埃及古老文明的标志，周恩来对它们很感兴趣。当中国代表团正在赞叹不已时，突然有几个阿联运动员健步如飞地冲上金字塔，把周恩来、陈毅和我们这些人都吸引过去了。顷刻之间，他们已登上了塔尖，随即又以很快的速度下来，一眨眼工夫就到了塔底。这是主人安排的一次精彩表演，我们都为他们热烈鼓掌。周恩来很快走过去，握着运动员的手夸奖着：“你们身手不凡啊！7分钟就在146米高的金字塔

跑了个来回。”运动员们受到中国总理的夸奖，露出了得意和自豪的神色。

周恩来与纳赛尔、萨布里等阿联领导人多次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亚非会议十项原则，提出了《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对于发展我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关系起了积极作用，受到他们的欢迎。

12月20日，中国代表团离开开罗的前夕，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有的记者向周恩来提出：“你访问非洲有什么目的，以致你认为有必要离开办公桌达两个月之久。”周恩来回答说：“我们是第一次到非洲访问，而新中国建立已经14年了。我们来得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所以，我这次到阿联首先要向纳赛尔总统表示我来晚了歉意。这就是我访非的第一个重要任务。”“我们访问非洲国家的目的，是寻求友谊，寻求合作，多了解一些东西，多学习一些东西。”“我们自远东来到非洲，路很远，不容易，既然已经来了，就多访问一些国家，以表达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的友好愿望。”

此前不久，法国总统戴高乐派富尔为特使访问中国，商谈中法建交等事宜。法国记者对周恩来访问非洲非常重视。法国记者向他提问：“你对于法国有什么要谈的吗？”周恩来说：“我和陈毅元帅40年前都在法国勤工俭学，我们是在法国参加共产主义组织的。我愿借此机会，向法国人民致意。我和陈毅元帅都希望有机会到法国访问。我们对法国热情的人民印象很深。”

周恩来诚恳、谦逊的态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2月21日，中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开罗飞阿尔及尔，访问阿尔及利亚。本·贝拉总统和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布迈丁前来机场迎接。在欢迎仪式上，本·贝拉和周恩来热烈拥抱，他称周恩来为“阿尔及利亚最好的朋友”。这个称号是有深远含义的。在机场到国宾馆的途中，排满了欢迎的群众，有30万人。许多披着白布巾的妇女，用舌头颤动发出“噜，噜”的欢呼声，表示对中国贵宾的热烈欢迎。

阿尔及利亚原是法国的殖民地，中国一向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既在道义上支持，也给予军事上的援助。中国也是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国家。为了帮助他们医治战争创伤，发展民族经济，中国又给予经济上的援助。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阿尔及利亚人民是铭记在心的。周恩来的访问受到格外热烈的接待。

12月22日，阿尔及尔市政府和市民做了两件事，来表达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深厚友谊：一是把一条大街命名为“北京大街”；一是授予周恩来“阿尔及尔荣誉市民”的称号。这既是对周恩来本人的尊敬，也是对中国人民友好的行动，周恩来欣然前往市府大厅参加授予仪式。

在阿尔及利亚，周恩来多次和阿方领导人特别是本·贝拉，进行会谈。由于我们对阿尔及利亚独立后的情况，对他们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实行的方针政策都了解得很少，起初的会谈主要由本·贝拉介绍阿方的情况。阿方也迫切想了解中国的情况，以吸取中国的建设经验。12月24日第三次会谈时，本·贝拉要求周恩来“赐教”。周恩来谦虚地说：“才学习3天，第4天就讲话，发言权是很小的。对于阿尔及利亚，我们是刚进课堂的小学生。”他称赞“阿尔及利亚的革命胜利，是继续中国和古巴革命后，60年代的伟大事件”，也介绍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政治思想建设的情况和外交政策。

12月27日，周恩来、陈毅又率领我们访问摩洛哥。本·贝拉、布迈丁等领导人都到机场送行。

摩洛哥王国是阿尔及利亚的近邻，1956年3月获得独立。国王哈桑二世还很年轻，他对周恩来的接待是热烈而隆重的。本来摩洛哥的国宴是西方式的两菜一汤，对中国总理却破了例。中国代表团到达后，首都拉巴特的王宫里忙忙碌碌地准备了“烤全羊”等传统名菜，极其丰盛。我听杨琪良大使说，他来摩洛哥3年多，从未享受如此盛宴。出席宴会的外国记者看到国王如此对待中国总理，也都感到惊奇。

宴会依照摩洛哥的风俗，国王和周恩来围在一张短脚方桌旁边，盘腿坐在很矮的软皮垫上。一只烤好的整羊放在桌上一个大瓷盘中。国王用手挑了一块最好的羊肉放在周恩来的盘里，表示对中国贵宾的盛情。周恩来有流鼻血的毛病，很少吃容易上火的羊肉。但这次主人盛情难却，他只好入乡随俗了。每道菜上来，周恩来也是这样回敬主人。国王的弟弟则和陈毅副总理坐在一个小桌边，他也用手给陈毅副总理撕羊肉。宾主都很热情，气氛十分融洽。

宴会后，周恩来、陈毅被哈桑国王请进他的会客室，喝的是中国的龙井茶，放在大铜壶里煮开，加上白糖和鲜薄荷，味道清凉香甜。两个大铜壶分别由两位长胡子的长者看管，人们称他们足“茶博士”，也就是品茶专家。他们不时品尝，味道甘美后才敬客人。这种在摩洛哥加工后的茶被称为“中国绿茶”，味极浓，喝后使人兴奋，阿拉伯人极爱喝。国王说：这是80年前流传下来的吃法。面包、茶叶、糖是摩洛哥人民每天不可缺少的食品，没有茶叶，人民会造反，周恩来说：这个品种的茶叶中国只在一个不大的地方生产，产量有限，我们国内很少出售，主要供应外国。我们可研究研究能不能扩大生产，如果可能，你们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摩洛哥历史上是王国制，一直延续下来。这种制度在世界各国中已经越来越少，哈桑二世似乎有所考虑。他想了解周恩来这位东方大国总理对王国制有什么看法，突然提出：“当今世界像我们这样的国王、皇帝为数不多了，不知以后会怎么样？”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得好的。但富有外交经验的周恩来笑着说：“你们可以组织一个委员会，开会商量。”陈毅接着说：“亚洲有个西哈努克亲王，我们是好朋友，可邀请他们参加。”周恩来又说：“陛下可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嘛！”周恩来机智、幽默、恰到好处的回答，引得三个人哈哈大笑。这个回答寓有深意，表示中国尊重这个国家人民选择自己的制度。

周恩来、陈毅访问摩洛哥时，又针对有人诬蔑中国“好战”，在同摩洛哥方面会谈时指出：尽管美国敌视、包围中国，中国并不打算向美国发动武装冲突。我们主张和平谈判解决争端。对于中美大使级会谈，我们主张先达成原则协议，再解决具体问题，但美国不同意，我们只好等待。历史上有百年战争，现在可以有百年谈判。我们相信，最终总是要达成协议的。这种态度表明，即使对美国那样的国家，中国也是主张以谈判解决争端，使非洲国家对中国更加了解。

1963年12月31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在那里过了新年。新年过得很热闹，霍查、谢胡主持宴会招待中国代表团。宴会后举行联欢会，又唱歌，又跳舞。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领导跳集体舞，我们也跟着跳。周总理要我领头扭秧歌，他们也跟着扭，情绪十分热烈。

代表团原计划是离开阿尔巴尼亚后，即飞越撒哈拉沙漠访问加纳。阿尔巴尼亚距离加纳5000多公里，途中必须停留在突尼斯为飞机加油。当时突尼

斯并未与我国建交，但它很欢迎周恩来去访问，并表示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陈毅得到这一消息，连忙和我们几个人商量，大家都赞成顺道访问突尼斯。但事关重大，必须打电报向中央请示。中央很快就同意了。于是对突尼斯由“飞机加油”变成了正式访问。

1964年1月9日，中国代表团飞抵突尼斯，全体政府部长都到机场欢迎。可是，当天下午周恩来同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会谈时，双方出现了意见分歧。布尔吉巴直言不讳，认为中国政府激烈的言词得罪了一些潜在的朋友，并说：“你们想让我们与西方为敌，你们跟印度发生冲突，谴责铁托，又谴责赫鲁晓夫……别人不会对你们说真心话，可我要告诉你，你们这种调子在非洲是没有人愿意听的。”这说明布尔吉巴对中国是不了解的。周恩来对他进行了耐心的解释，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精神向他说明情况。周恩来指出，亚非国家的共同目标，是摆脱殖民主义强加给我们的落后状态，发展民族经济，促进友谊。我们的目标相同，采取的方法不一定相同，每个国家有自己的情况，各国领导人根据具体情况和人民的要求确定自己的方法。

布尔吉巴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周恩来并没有被激怒，反而对他说，“这才是真正的朋友。有话直说，毫无保留。你的话有助于我们了解情况。”周恩来的宽容态度终于打动了布尔吉巴，他说：“我同意周恩来总理求同存异的方针，我们还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突尼斯需要伟大的友谊，并一定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1月10日，中国和突尼斯发表联合公报，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周恩来访问非洲一个意外的重大收获。

当我们还在阿尔巴尼亚的时候，元旦刚过，突然传来消息：加纳共和国发生未遂政变，恩克鲁玛总统遇刺受伤。周恩来立即找陈毅、孔原、黄镇、童小鹏、乔冠华以及外交部的几个司长商议。周恩来先谈了他的意见。他说：“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了暂时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对人家不尊重、不支持。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去，才表现出我们的真诚，患难见真情嘛！按原计划访问加纳，不能取消。至于外交仪式，可以打破通常的礼宾惯例。”

陈毅支持周恩来的意见。有的同志感到加纳政局不稳，有可能出现危险，而且加纳方面要接待中国代表团，也会有困难，不赞成去加纳。我在周恩来身边工作20多年了，深知他遇到无数次的艰难险阻，从不被危险、困难所挡住，他想要做的事，别人是挡不住的。但我和李树槐负责保卫工作，不能不为总理的安全担心，我也提出了要慎重考虑的意见。最后，周恩来和陈毅说服了大家。这一次又使我们受到了安全服从政治的教育。周恩来不是忽视安全，而是依靠主人负责安全工作。孔、黄、童3人小组还专门讨论了安全问题。

为了了解情况并听取加纳方面的意见，周恩来派黄镇先行前往加纳，并对他说：“你到加纳与黄华多商量，有什么问题，马上电报联系。”黄华当时担任我国驻加纳大使。黄镇乘飞机抵达加纳。他们一起去见了恩克鲁玛总统。

恩克鲁玛住在首都阿克拉海滨的奥苏城堡，加纳仍处在紧张状态中。黄镇和黄华代表周恩来总理向他表示关切和慰问，并告知，周恩来将按原计划前来访问。考虑到恩克鲁玛总统的安全，我们建议打破礼宾常规，凡有总统参加的一切活动，都在总统居住的地方进行；总统不要到机场迎接，也不要到城堡外面举行会谈和宴会。恩克鲁玛听了，非常高兴和感激，表示完全同

意。他原以为中国总理是不会来访问的，因为上次他遇刺时，印度总理尼赫鲁正在尼日利亚访问，获悉恩克鲁玛遇刺后，就取消了原定访问加纳的计划。

黄镇和黄华发来电报详细报告情况，访问加纳按原计划进行了。1月11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飞越撒哈拉沙漠，抵达阿克拉。恩克鲁玛派三人委员会成员代表他前来机场迎接。机场和沿途都加强了警戒。机场和街道两边群众热烈欢呼，表示对中国客人的欢迎。当天下午，周恩来、陈毅等人在三人委员会成员陪同下，从下榻的总统府到奥苏城堡会见恩克鲁玛。我们见到城堡周围布满大炮和装甲车，门口站着全副武装的士兵，戒备森严。周恩来、陈毅和出来迎接的恩克鲁玛，都是从卫兵的夹道中走进城堡的。恩克鲁玛脸上还贴着胶布，向周恩来解释门外的情景，并表示歉意。周恩来笑着表示理解，交给他一封毛泽东主席的慰问信，并对刺杀恩克鲁玛的卑鄙行为表示极大的愤慨。为了感谢周恩来冒着危险前来访问，恩克鲁玛城堡里举行宴会，欢迎周恩来一行，并破例地介绍他埃及血统的夫人跟中国客人会面，可见恩克鲁玛把中国客人当成自家人。会谈和宴会都在城堡中举行，恩克鲁玛很感激周恩来对他的谅解，深为感激地说：“你们的访问是所有对加纳的访问中最好的一次访问。”

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非洲新独立的国家，除了表示道义上的支持以外，都要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经济援助，帮助它们发展民族经济。援助的原则是什么呢？应当及时予以公布。周恩来经过多日酝酿，1月14日晚上，写下了一份《援外原则八项》的提纲：

1. 平等互利；
2. 尊重主权，不附条件；
3. 无息或低息贷款；
4. 有利自力更生；
5. 有利国家收入，积累资金；
6. 国际价格，按价论值，保证质量；
7. 技术出口；
8. 专家待遇一律平等。

这些原则与西方国家那些不平等、附带条件、要求特权的援助不可同日而语。15日最后一次和恩克鲁玛会谈时，周恩来提出了《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并通过加纳记者向全世界宣布。这些原则受到了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欢迎，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访问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周恩来在城堡里发现一张乒乓球台，他提议与恩克鲁玛赛一场，由陈毅元帅当裁判。恩克鲁玛欣然接受。有人戏称，这是国际乒乓球比赛中最高级别的比赛。在恩克鲁玛处境艰难的时刻，周恩来使他轻松愉快一下，含义深刻，意味深长。

1月16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马里共和国访问。马里总统凯塔热情欢迎周恩来。当天晚上，凯塔举行了一个有1000多人参加的盛大招待会，与会的人载歌载舞，会场洋溢着友好的气氛。周恩来深受感动，即和凯塔总统一起参加舞蹈，这是出访非洲以来的第一次，我们都感到惊异。

凯塔称，马里选择了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他要周恩来谈谈对马里的看法，周恩来明确表示：尊重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任何人不得干涉。换句话说，友好的国家、友好的人民只有尊重你们的义务，没有干涉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你们的权利。

1月21日上午，周恩来一行飞离马里前往几内亚访问。

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机场，塞古·杜尔总统和许多政府官员前来欢迎。令我们感到意外的是，他们按国家元首的规格，鸣放礼炮21响，这是杜尔表示对周恩来的尊敬。从机场到宾馆15公里的街道两旁，欢迎的群众层层叠叠，载歌载舞，情景令人感动。

代表团住在叫“美景别墅”的宾馆，杜尔亲自陪周恩来到了卧室，看看各种设备，然后才放心地离去。当晚杜尔总统举行盛大的文艺晚会，欢迎周恩来。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感谢几内亚政府的热情接待，表示中国人民永远支持几内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

1月23日，在杜尔总统陪同下，周恩来乘汽车访问了金迪亚市，受到热烈的欢迎。在返回科纳克里时，杜尔别出心裁，要乘直升飞机。这一带大都是山地，气流不稳定，乘直升飞机是有危险的。许多同志反对，我和警卫的同志更是担心。周恩来说：“人家总统能坐，我为什么不能坐。”说完就上直升飞机了。我们乘汽车赶紧追赶，直到他们安全回到科纳克里，我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26日午夜，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苏丹访问。

苏丹在非洲东北角的红海之滨。从几内亚到苏丹要横穿非洲大陆，飞行十几小时。27日下午才抵达首都喀土穆。

当时苏丹政局动荡，苏丹方面想请周恩来、陈毅从机场到宾馆时乘敞篷汽车，既让喀土穆人民得以瞻仰中国总理的风采，也扩大他们的政治影响。孔原、黄镇和我商议，觉得安全没有保证。我们没有请示周恩来，即改变了苏丹方面的计划。周恩来知道此事后，严厉地批评了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对东道主不尊重，在他们遇到困难时没有给予支持，又失去了跟苏丹人民见面的机会。

周恩来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对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帝国主义的侵华史十分熟悉。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英国侵略军中有一个军官叫查尔斯·戈登，他焚掠过圆明园，又在苏浙一带镇压过太平军，罪行累累。后来他被英国政府派往苏丹，任这个殖民地的总督，在苏丹人民武装起义中被打死。抗战前上海公共租界英国当局曾命名一条“戈登路”，纪念这个殖民者。苏丹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阿布德和周恩来会谈时，提到这个被苏丹人民称为“喀土穆的戈登”的英国人。周恩来接着说：“他还有一个名字，叫‘中国的戈登’，他杀害了很多中国人，你们结束了他的性命，我们得感谢你们。这样他就不能再害人了。”这是在谈历史，却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国和苏丹都深受殖民者之害。会谈后，主人安排中国代表团参观历史博物馆，馆内陈列有被苏丹人民打死的戈登的文物。清朝皇帝感谢戈登镇压太平军有功赐他的一件黄缎子马褂也陈列在这里。

1月30日，中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喀土穆。周恩来、陈毅在阿布德陪同下，乘坐敞篷汽车从宾馆到机场，满足苏丹政府和人民的要求，经过之处，群众热烈欢送。

当天上午，中国代表团的专机在6架埃塞俄比亚战斗机的护卫下，到达阿斯马拉机场，受到首相沃尔德的欢迎。

由于埃塞俄比亚领导人受美国的影响较深，同中国还未建立外交关系。埃方既邀请周恩来访问，又怕影响他们同美国的关系，左右为难。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提出，不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接待周恩来，改在北部的阿斯马

拉市。这是违反外交惯例的，我们都很反感。周恩来给我们讲道理。他说：应当体谅埃塞俄比亚政府的困难，不要计较礼仪，要着眼于发展中埃人民的友谊。

塞拉西皇帝我们并不陌生。1935年，我们长征到达陕北时，就知道他曾率领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人民抵抗意大利法西斯的侵略而名震世界。但我们都没见过他。中国代表团到达的当天中午，他就接见了周恩来。

双方在会谈中出现了争论。塞拉西指责中国在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边界争端中支持索马里。周恩来耐心解释说：中国对索马里的经济援助与埃索边界争端是两回事，中国并未向索马里提供军事援助。中国愿意同非洲各国友好，决不介入他们的争端。亚非国家的问题应该由亚非国家自己来解决，不应让外国干涉、破坏。他还表示，中国将在经济上援助非洲国家。双方的会谈使埃塞俄比亚进一步了解了中国。

1月31日、双方最后一次会谈后，在《联合公报》中埃方只提出“不久将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不同意立即建交。周恩来说：我们可以等待5年、10年、15年，直到对方方便时，我们再建立外交关系。7年后，中埃正式建交，塞拉西皇帝访问了中国。中埃关系出现了突破，周恩来的访问起了积极作用。

2月1日，中国政府代表团来到这次出访非洲的最后一站索马里的首都摩加迪沙，受到舍马克总理的热烈欢迎。

索马里和中国在几百年前就有来往，明朝航海家郑和“下西洋”时，曾到过索马里，周恩来把这段历史告诉了索马里总统欧斯克和总理舍马克，强调两国的传统友谊。

许多非洲国家很关心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舍马克也认为，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要把恢复合法席位与驱逐蒋介石集团扯在一起，使中国迟迟进不了联合国。周恩来详细阐述了我们的原则立场。他说：虽然国际上承认中国成为一种趋势，但是联合国里的多数国家是否能支持中国恢复合法权利并驱逐蒋介石集团，还不能肯走。因为美国在联合国操纵了多数。美国会蛮不讲理，提出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硬说台湾地位未定。英国会赞成，一部分亚洲国家也会动摇，劝我们先进联合国，把台湾问题先放在一边。但这样做是没有法律根据的，是违反国际法的。台湾光放在一边我们是绝对不会接受的，不然，等于我们承认台湾被割出去，承认美国占领台湾。蒋介石不承认的事，我们承认，我们就会变成民族罪人，出卖领土，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只要共产党在领导，我们绝不会承认把台湾割出去。

这个声明多么铿锵有力。

在摩加迪沙，周恩来盛赞非洲在觉醒，反帝反殖的民族独立斗争终会取得最后胜利，整个非洲大陆是一片大好形势。这个论断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2月4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满载非洲人民的友谊回国。2月5日11时抵达昆明。

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两架专机圆满地完成任务，18个机组人员对周恩来这位大国总理如此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由衷地表示惊异和敬仰。他们说：我们这些人跑遍全世界，接待过许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没有见到像中国总理这样平等对待我们，同我们握手照像，对我们十分尊重。他们提出想到

北京看一看，周恩来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用我们的飞机送他们到北京参观游览。他们离开昆明时，飞机突然从空中下滑，我们在机场的同志以为出了事，都大为吃惊。原来这是一种礼节，表示他们由衷的感谢。

在昆明、成都休息了几天后，周恩来、陈毅继续访问了缅甸和巴基斯坦，并陪同宋庆龄副主席访问了锡兰（斯里兰卡）。2月6日到成都，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春节。在春节联欢会上，孔原、李树槐和我们都情不自禁地跳起了刚学会的非洲民间舞蹈，龚澎学阿尔及尔妇女吹口哨，都引起了热烈掌声。3月15日回到北京。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机场迎接，可见党中央毛主席对这次访问的重视。

在中法建交谈判中

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政后，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不再一切听命于美国，而采取了独立自主方针。60年代初，美苏策划所谓“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法国同中国一样，拒绝在这个条约上签字。同时，法国还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一体化机构，法国和美国的矛盾异常尖锐。

戴高乐调整法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步骤是与东方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63年，周恩来访问阿尔及利亚期间，就曾利用一些活动间隙专门了解并研究过对戴高乐的看法和中法建交的可能性。在听过情况汇报后，周恩来曾表示过以下主要论点：一、戴高乐是坚决抵抗德国法西斯的民族英雄，在法国人民中有很高的威信。二、戴高乐不服从美国的指挥，对美国闹独立性，我们可以利用美法矛盾做工作。三、戴高乐果断下令从阿尔及利亚撤出百万侵略军，让阿尔及利亚独立，这是很明智的决策，既减少了法国的财政负担，也有利于提高法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四、中法建交是可能的。

1963年8月，法国前总理富尔通过中国驻瑞典使馆提出不带任何官方使命，以纯私人性质访问中国。中国政府早已知道富尔访华的意图，同意富尔这一要求。周恩来指示：以中国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的名义邀请富尔访华。

富尔在1957年5月曾以法国前总理的身份来华访问过一次。当时中国完成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国家蒸蒸日上，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这个新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不容忽视。在同周恩来和其他中国官方人士的接触之后，他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有了一定的了解，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制造“两个中国”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法国没有理由奉行‘两个中国’的政策，除非断绝同台湾的关系，否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是一种无用的行动，而且实质上是一种不友好的姿态。”戴高乐以及法国政府中一些官员，对富尔的看法有同感。因此，当戴高乐决定建立法中正常外交关系时，富尔作为特使来华进行试探性活动，就成了最适合的人选。

1963年10月22日，富尔偕夫人乘专机到达北京。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在西花厅接见了富尔，张奚若和谢黎在座。

周恩来在同富尔握手时说：“很高兴再一次见到阁下。”

富尔高兴他说：“已经6年多了，总理一点也不见老。”又问：“总理到过巴黎？”

“是的，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

“现在是再去巴黎的时候了。”富尔这句话意味深长，道出了他此行的使命。

接着转入正题，富尔说：“法国元首戴高乐将军希望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会谈。他认为，像我们这样两个大国的领导人现在还不能进行会谈是不正常的。”“因此，戴高乐将军要我来中国，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他认为，我这次访华的使命不宜公开。这并不是想掩盖他对中国的感情，而是因为一旦公开出去，报界就会大做文章，那就不能安安静静地深入探讨问题了。不过，此次访华还是正式的、官方性质的。戴高乐将军有一封亲笔信给我，信中授权我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

富尔当场拿出信读了一遍，把信交给了周恩来，说：“你们可以留下来看一看，过两天再给我。”

周恩来礼貌地接过富尔递过来的信，看了一下，又还给了富尔。接着说：“从戴高乐将军的信中可以看出，法国很注意如何增进中法两国的关系。我们一向有这种愿望，阁下上次来华时，我已经谈过这个问题。”

接着，周恩来谈了他对近年来戴高乐将军所采取的行动表示赞赏。他说：“戴高乐将军当政，做了一些工作，特别是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方面采取了勇敢的步骤。有些大国可能不高兴。我们觉得，一个国家应该如此，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因为一个国家的事务只能由这个国家自己解决。”

听到周恩来一番真诚、坦率的话，富尔也以坦诚的态度提出会谈的主题——法中建交。他说：“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保持同蒋介石的关系。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不正常的，而且产生了很多问题。我不愿意像一个商人那样来谈论这个问题。”

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要提出来，因为目前的局面对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坏处。但是这种局面是不正常的，是奇怪的，因此，我们愿意同你们交换意见。”“希望总理考虑我刚才提到的问题。”

“会谈的方式也请总理决定。”

有着丰富外交经验的周恩来，听富尔的席话，明白了他所表达的意思：法国急于同中国建交，但它是一个大国，不能表现出有求于中国的样子。因此，他直截了当地对富尔说：“我了解你的意思。可以不只谈一次，可以谈几次，自由交换各种意见。”

“今天还想问一个问题。中法建立正式关系，法国同台湾的关系是一个困难。我想了解一下，除了这个困难，还有什么困难？”

周恩来想试探一下，法国同中国建交是否要看美国的脸色。

富尔很爽快地回答：“法国奉行独立政策，不需要征求苏、美的意见，自己可以作出决定。”但他同时又表示：在戴高乐将军采取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时，中国方面也不要强加使他不愉快甚至丢脸的条件。

周恩来坦率地说：“我们的态度很清楚。采取拖泥带水的办法，像英国、荷兰；双方都不大愉快。英、荷承认中国13年，但同中国一直是半建交的关系，没有互换大使。因为英、荷一方面承认新中国，一方面又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集团，这使双方都不大愉快。与其如此，不如等待。这是第一点。第二，如果法国认为采取勇敢的行动，断绝同蒋帮的关系，同中国建交的时机已到，我们欢迎这种决心，也愿意同法国建交，直截了当交换大使。这是友谊的表现，而不是交易。”

富尔听了周恩来提出的两点，立即表示：第一点不成问题，法国“不会采取拖泥带水的办法，要么交换大使，要么维持现状”。对第二点，即同台湾断绝关系，富尔态度模棱两可。他既表示法国不迁就“两个中国”的主张，却又说台湾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对法国来说，同台湾断绝一切关系有困难，因为岛上存在着一个事实上的政府，而戴高乐将军没有忘记战时同蒋介石站在一边，不愿意切断联系。

对于台湾问题，周恩来是决不作原则性妥协的，他严正指出：“蒋介石集团是被中国人民推翻和赶走的，这是中国人民的意志表现的结果。”为了以理服人，周恩来语气平和、态度诚恳地反问：“如果法国处在中国的地位，将如何考虑这个问题呢？现在法国是戴高乐将军领导的，如果外国势力在法国本土以外扶植一个反戴高乐将军的傀儡政权，说这是法国政府，法国对此采取什么态度呢？”在作了一番人情入理的分析后，他明确指出：“台湾问

题解决以前不能建立外交关系和交换大使，但可以建立非正式的关系，如先设立贸易代表机构，半官方的、民间的都可以。”富尔从周恩来坚定不移的态度中明白了：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是不容商量的。

他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法国在13年前就犯了一次错误。我个人很愿意承认这次错误，但作为一个大国，很难承认这种错误。我愿意同你们共同找出一个办法，使法国不致对过去的错误表示忏悔。”他指的是13年前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同台湾保持了关系。

10月25日，周恩来与富尔在西花厅举行了富有成效的第二次会谈。

会谈一开始，富尔就提出了对华建交的三个方案：

一、无条件承认方案，即法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国，中国政府表示同意。

二、有条件承认方案，即法国政府表示愿意承认中国，中国政府提出接受承认的条件。

三、延期承认方案，即法国政府对中先不作政治上的承认，但两国间形成特殊关系局面。

富尔对这三个方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还说：戴高乐希望能争取立即实现第一个方案。但是，如果法国主动承认中国，而中国提出先决条件，对他是不愉快的。

周恩来想把双方的共同点肯定下来，使会谈有个明确的基础，然后对分歧的有关问题再进行深入讨论。他对富尔说：我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双方都愿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这点是肯定的。”第二，“法国承认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有另外一个中国。”“戴高乐将军是否也是这样认为？”

富尔说：戴高乐也是这个想法，但是保留台湾这一点，“需要进一步得到情况”。

富尔这个回答耐人寻味，才思敏捷的周恩来立即问道，“台湾保留是什么意思？是指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但由于目前在蒋介石手中，这样一个复杂问题需要时间和手续来处理，还是指台湾的地位尚未定？”

富尔回答说：“戴高乐将军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明确的指示。”这可能是事实，也可能富尔有难言之隐。

“你的看法如何？”周恩来将了富尔一军。

富尔无法回避了。他说：作为戴高乐的代表，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得到指示”，因而“不能明确表示意见”。“但是我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戴高乐不管这个问题，他所管的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

周恩来坚持要对方有个明确的态度，于是又问：现在要明确这一点：戴高乐将军是否还认为台湾地位未定？

富尔说：不是戴高乐不明确台湾的地位，他要“我来了解你们的看法”。

周恩来说：“我们的看法，我和陈毅元帅都已经说了，我可以再明确一下，也就是第三点，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在这个问题上，法国无意承认‘两个中国’。”是不是这样？

是的，法国“只承认一个中国”，富尔回答倒很干脆。

周恩来接着说：“好，这一点肯定了。”“那么冲华民国，从客观上说不存在了。”“台湾是中国领土这一点应该肯定，因为蒋介石也是这么说。”

富尔又把前面说过的问题提出来并作解释。他说：“戴高乐将军想要了

解的是在承认中国的同时，是否能不完全割断同台湾的关系。这样做不是为了让美国制造‘台湾共和国’”，完全“是出于方便的考虑”。“既然你们的答复是要法国完全割断同台湾的联系，我可以把这一意见转告戴高乐。他没有要我拒绝，也没有要我接受。”

周恩来再次申明：你的立场我了解了。但我还是要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以便你回去报告戴高乐将军时把事情弄得更明确。“我所要谈的第三点关于台湾问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为台湾地位未定、这就不是一个小问题，这会引导到美国制造‘台湾共和国’这条道路上去。另一种情况是作为一个复杂问题，蒋介石在法国没有领事馆，为了摆脱这样一种关系，需要通过一些手续，从礼遇上说，不使台湾代表太难堪，也不使戴高乐为难，这是一个手续问题。”

富尔连连点头说：“对。”

对富尔的这个表示，周恩来也采取了灵活态度，接着说：“如果认为台湾地位未定，对两国建交是个很大的障碍；如果属于第二种情况，我们可以想些办法如何摆脱。”

富尔也坦率地谈了戴高乐的态度。他说：“戴高乐说过目前同中国的相处情况应该结束了。”派我来和你们接触时，“他说，你自己看，去谈以后再谈。我想，他不会像你们那样对台湾这样重视。我已知道的是现在要缩减在台湾的外交机构，也即试图摆脱这样一种关系。但是，必须先了解情况后再进行摆脱。这一点总理是否清楚？”

周恩来回答：“清楚了，希望你把我们的态度转告戴高乐将军。”

将近4个小时的会谈使双方的看法比较接近了。在共进晚餐时，周恩来又有针对性地对富尔谈了柬埔寨与新中国建交的情况：“西哈努克宣布承认我们，蒋介石集团的领事就走了。”

富尔说：“这是一个先例。”

10月31日下午，会谈继续进行，地点在钓鱼台宾馆15号楼，一开始就接触到主题。

周恩来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积极地、有步骤地建交的方案。这个方案分三个步骤。第一步，即富尔提出的，法国政府通过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建议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派大使。中国政府接到上述照会后，复照表示愿意建交和互派大使，并在照会中申明我们认为法国政府采取这一行动意味着法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认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和它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第二步，中法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来往照会，在照会公布以后，双方派出筹备建馆人员去对方建馆。

第三步，上述两个步骤做出后，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蒋介石驻法国代表看到照会后主动撤走，这样，法国也相应撤回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机构。二是蒋介石驻法国代表赖着不走。法国政府不把他作为外交官看待。只作为普通侨民看待；同时，法国应撤回它驻台湾的外交代表，不降级保留任何代表。如果出现上面两种情况，中法双方即可派出大使，完成全部建交步骤。第三种情况是，蒋介石驻法国代表赖在法国不走，法国政府仍将他作为外交代表看待，同时法国把它在台湾的代表降级后仍为外交代表存在。这样，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两个中国”的出现。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将

不得不中断同法国的建交步骤。

周恩来的这个方案，实际上是把是否附加条件的问题上加以变通，即不要求法国政府公开声明对“两个中国”的立场，而以我单方面照会申明、法国默认的方式代替。这样就照顾到对方的面子了”。这是一个让步。

富尔对周恩来关于附加条件问题的变通办法表示兴趣。他说：法方把对附加条件的承认变为附加解释的承认，“戴高乐需要完全了解中国对承认这件事是怎样解释的。你们的解释完全符合国际法，主权是不可分割的”，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能承认‘两个中国’”。“我可以向戴高乐报告，中国的解释不是条件，而是国际法的实施。”富尔也作出让步。但他对中方要求的法国与台湾完全断绝关系后才答应派出大使，这一点感到为难。他说：“如果蒋介石自己断交，问题很简单。如果蒋不动，就会造成双方的困难。我明确说戴高乐也不会自己采取驱蒋步骤，这是他的立场。”这“不是要承认‘两个中国’或帮助美国关于台湾地位的活动”，“这是形式问题，礼遇问题”。“如果蒋介石不采取行动，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事实上，法国驻台代办和台湾驻法代办虽然存在，但他们的地位“不可能是外交地位”。“台湾代办如果到法国外交部去，说他代表‘中华民国’，我们的回答是：‘不可能’”。

周恩来说，“如果台湾驻法代表走了，法国理所当然要相应召回它在台湾的代表。”

富尔毫不含糊他说：“当然。如果台湾断绝关系，我们也断绝关系，没有必要保留。”

周恩来又问：“我们的大使去了，如果法国外交部请客，对台湾代表请不请？”

富尔风趣地回答：“可能有好多人可怜他”，“外交部的人认识他，会有人请他吃饭”。“但不能作为中国代表请他”。

到这时，周恩来已感到中法建交的障碍基本上扫除了。

这时正在上海的毛泽东将接见富尔。

11月1日晚上，周恩来和富尔在上海和平饭店继续会谈。

在此之前，富尔传达了戴高乐将军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中法双方达成三点默契：

一、法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认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二、法国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的“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三、中法建交后，在台湾撤回它驻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地撤回它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

这样，中法建交已经水到渠成，这次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提出了一个直接建交的方案：

一、法国政府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建议中法两国立即建交，互换大使。

二、中国政府复照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国政府的来照，愿意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

三、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照会，并立即建馆，互派大使。

周恩来宣读这一方案后，问富尔：“你现在还有没有困难？”

富尔回答说：“我觉得这个方式好，没有反对意见。我是受委托来的，有权答复，但还要经过总统批准。我相信总统会同意的。因为我认为你们的方案是正确的，形式也是很好的。你们明确一下（指达成的三点默契）有好处，但又不是一个条件，而是你们的一个声明。事实上，你们把第一方案和第二方案融合在一起了。这不是无条件建交，也不是有条件建交，而是附加解释的承认。”

周恩来很高兴，接着说：“就这样吧，我们把不一致的意见排除了，从共同的愿望出发达成了协议。上次你说要看我们的，以后就看你的了。”

富尔也显得轻松，站了起来，说：“我将尽力而为。”会谈告一段落。

周恩来还继续和外交人员研究建交方案，以“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的书面文件交给富尔，这时已是11月2日的凌晨了。上午11时，周恩来和富尔在和平饭店就这个方案进行最后推敲。富尔提出第二点默契中的“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这一句删去。双方经过协商，最后商定把这一句改为“这就自动地包含着这个资格不再属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方案最后定下来，建交的具体问题由双方代表在瑞士洽谈。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发表联合公报，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并在3个月内任命大使。台湾当局终于撤走了它驻法国的“大使馆”。

中法建交是震动世界的大事，这意味着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遭到沉重的打击，也为许多西方国家作出了榜样，中法建交以后，意大利、加拿大、比利时、葡萄牙等西方国家相继表示愿意同我们讨论建交问题。

戴高乐和周恩来两位伟人，为中法友谊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戴高乐对中国是怀有敬意的，他说：“中国是真正的国家，比历史还要古老的国家，那里有真正的人，豪迈的人。”他对毛泽东、周恩来很崇敬，生前一直希望能访问中国。

毛泽东、周恩来对戴高乐奉行独立自主政策，敢于反对美国的控制和干涉，表示十分赞赏。

1964年4月，周恩来在接见日本友人松村谦三时，称赞戴高乐是“反映民族独立精神，摆脱外国控制的了不起的政治人物”。

戴高乐频频表示访问中国的愿望，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实现。戴高乐将军逝世后，毛泽东、周恩来分别给戴高乐夫人和法国总统蓬皮杜发出唁电，称戴高乐为“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周恩来亲自到法国驻华使馆吊唁。北京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以示哀悼。外国领导人逝世，中国政府以这样的规格对待，是很少有的。中国人民对于热心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朋友，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致力于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

开拓政协工作的广阔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为巩固和发展我们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呕心沥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他不仅是我党统一战线的坚定执行者，而且也是统战政策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他有许多有关统战思想的精辟论述，有极为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与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有密切的联系，尽管担任了政务院总理的重要职务，中央仍决定他兼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主席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实际工作）和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主席，并主管党的统战工作。周恩来终生关心党的统战工作，一直到他弥留之际。

周恩来在长期从事人民政协的组织领导工作中，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他正确地贯彻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各项统一战线政策，充分发挥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职能，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为人民政协树立了好传统，为做好政协工作开拓出一条广阔的道路。

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在 1949 年至 1954 年期间，共召开了 4 次会议，常务委员共开会 60 余次，进行了许多重大活动。在这期间，建立了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制定了全国委员会工作条例；通过了关于国庆纪念日的决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推动土改运动的全面开展。随后经过同各民主党派的协商，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抗美援朝《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发起并支持了全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斗争；通过了《关于抗美援朝工作的决议》，继续推动抗美援朝运动的深入发展；通过了《支持世界和平大会各项要求的决议》。此外，全国政协还协商讨论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协助人民政府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协助政府贯彻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推动工商业者积极参加“三反”、“五反”运动，组织各界人士学习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推动各界民主人士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并且组织、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和人大会议的筹备工作。通过这些活动，发挥了政协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开创了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制度的光辉历史。

1954 年 12 月 21 日至 25 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政协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后人民政协职能的变化，也标志着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继续发展和加强。在二届政协会议召开之前，中共中央讨论了今后人民政协的工作，明确了人民政协的性质和主要任务；人民政协的组织原则等。

这次会议推举毛泽东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宋庆龄、董必武、李济深、张澜、郭沫若、彭真、沈钧儒、黄炎培、何香凝、李维汉、李四光、陈叔通、章伯钧、陈嘉庚、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包尔汉为副主席，邢西萍（徐冰）为秘书长。

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的召开，实现了由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向统一战线组织的转变。为今后历届人民政协的工作奠定了基础，成为开展人民政协工作的一个里程碑。

为了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基本职能，政协全国委员会每年在人大开幕前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并列席人大会议。讨论政府工

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家预决算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在组织机构上，设立国际问题、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工商、华侨、宗教、社会福利等 8 个工作组，后又增设了医药卫生组、民族和妇女组；设立工作会议；学习座谈会干事会改称学习委员会。为了加强对地方政协上作的调查研究和经验推广，1956 年 7 月 17 日召开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工作会议决定设立地方工作委员会。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需要，仿照中国共产党高级党校办法举办社会主义学院，当时人们称这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高级党校。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设立学习委员会和它的办公机构。周恩来在政协会上讲到成立社会主义学院的目的时指出：它在于帮助各党各派和各方面人士提高认识，接受新的知识，改造世界观，得到共同进步。

社会主义学院开办初期，参加者有全国政协委员、省市政协副主席和政府部门的负责人 160 多人，他们绝大多数都在 50 岁以上，其中有知名人士黄炎培、章伯钧、李德全、王绍鏊、黄琪翔、翁文频、郑洞国、卫立煌等。黄炎培老先生已 79 岁，选学一门哲学。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大的年纪还来学习，他回答：“我要追求真理。”

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对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了推动作用。

为了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人民政协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和开展了视察工作的活动。周恩来很重视调查研究，提出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成员多到农村和城市调查研究和开展学术讨论，形成提案、意见和建议提交有关机关去考虑，以利于选择更好的方案来执行。这是参政议政的一种重要形式。

视察是政协委员参加协商和监督的主要步骤。经过实践，政协委员视察工作形成了一项制度，经常进行，起到了参政议政的作用。

1956 年 4 月，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正确处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的方针，“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极大地鼓舞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给人民政协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1959 年 4 月 17 日至 29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推举毛泽东为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彭真、李济深、郭沫若、沈钧儒、黄炎培、李维汉、李四光、陈叔通，陈嘉庚、包尔汉、陈毅、康生、帕巴拉·格列朗杰、阿沛·阿旺晋美为副主席，徐冰为秘书长。

会议闭幕那天，周恩来主席举行茶话会，招待 60 岁以上的全国政协委员，号召他们把亲身经历和见闻记录下来，传之后代。为了搞好这项工作，1959 年 5 月 12 日全国政协三届常务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增设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同时决定增设联络委员会。此后，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协也相继设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全国政协和地方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还先后出版了文史资料选辑，由各界知名人士就亲身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对重要人物的情况撰写资料。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为中国的近现代史研究提供了大批有价值的史料。从 1959 年起，一批在押的战犯陆续得到特赦，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参观和劳动之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一部分安排为

政协文史专员。他们除亲自撰写了不少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史资料外，还对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稿件进行订正、校阅，使文史资料在实事求是和真实可靠性方面进了一步。

周恩来时刻关心着文史资料工作的发展，每辑《文史资料选辑》出版后，他都仔细阅读。1965年4月，他在第四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常委会上，专门就文史资料工作讲话，明确指出：“文史资料的工作方向要对头，要存真，要实事求是”；“研究文史资料要有个方向，要用历史知识启发教育后代”，“不要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笔”。

到1966年5月全国共征集了约1亿字资料。由于撰稿人层次比较高，态度认真，所以质量一般都比较高。“文革”前全国政协出版了《文史资料选辑》55辑，计493篇，约860万字；《辛亥革命回忆录》6辑，约250万字，还有十几个地方政协出版了文史资料，受到历史学家和社会的重视。

1962年春天，周恩来在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作了《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了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新发展和新任务，为实现统一战线工作和人民政协工作的重点转移作了精辟的阐述，因而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统战工作者和政协委员及民主人士，使人民政协工作有了新的发展，迈开了人民政协工作进入新阶段的步伐。

从1962年至1965年，虽然共产党内“左”的思想重新抬头，犯了把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但在人民政协工作方面，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仍然得到一定程度的贯彻执行，人民政协仍然有了新的发展。

1965年，国民经济经过继续调整，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调整过来了，国民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鼎盛的时期。祖国的强大，统一战线的正确，吸引了许多原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台湾空军人员返回祖国大陆。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回归祖国大陆。这是经过周恩来近10年的争取工作，才使得李宗仁终于1965年7月17日回到祖国怀抱。此举对台湾当局震动很大，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正当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出现好势头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使人民政协工作受到严重挫折，几乎陷于瘫痪。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疯狂破坏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全面否定17年来的光辉成就，否定人民政协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统战部被打成“修正主义司令部”，全国统战、政协、民族、宗教工作部门被扣上了“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帽子。有不少统战、政协干部遭到残酷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大批政协委员、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爱国人士、原工商业者上层代表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宗教、华侨的头面人物、非党高级知识分子被抄家、被揪斗、被关押，几乎无一幸免，不少人被迫害致死。人民政协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各项工作都处于停滞不前状态。

面对党的统战政策遭到破坏的严重局面，中央统战部的大多数干部万分焦急，忧心如焚，每天都收集统战对象被斗被抄家的情况，写成报告报到部里，希望部领导转告当时党中央主管统战部负责人李富春同志。当时统战部负责人之一张经武见到富春时，曾经把这种混乱情况向富春同志作了口头

汇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金城又把收集到的情况及时报告富春同志和我。1966年8月底和9月初的几天，红卫兵闹得特别凶，事态不断扩大。金城焦急地打电话问我：“你是否将我的报告转报总理？”我告诉他说，我已及时报告总理了，并说，“总理对你们的工作已有指示——中央统战部对统战政策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不管。统战工作必须坚持下去。”

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疯狂肆虐的时期，周恩来为保护政协委员和党外民主人士及其家庭免遭劫难，做出了极大努力。

1966年8月29日夜，大约30名北京大学的红卫兵查抄了著名民主人士，原人大常委、政协常委章士钊的住宅。30日清晨，章士钊在红卫兵离去后，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请求毛主席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

当天，毛泽东收到了章的信，阅后立即在信上作了重要指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也就在当天，章士钊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送到了周恩来总理手中。周恩来阅后，严厉地批评了那些抄家的人，并当即部署了对章士钊采取的三条保护性措施：一、责令把抄走的东西立即全部送还给章士钊；二、派两名警卫部队的解放军同志到章士钊家，负责保卫工作；三、要秘密地将章士钊送到解放军301医院，保护起来。

由章士钊的家被抄，周恩来想到了其他政协委员和爱国民主人士，他当即开出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这些人是：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同时，周恩来又划出了一个应予保护的人员的范围：（1）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2）部长、副部长（3）政副（4）国副（5）各民主党派负责人（6）两高。周恩来还指示301医院接收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入院，对他们加以保护。

为了保护好宋庆龄，周恩来恳切地劝她从上海迁到北京居住。宋庆龄到北京后，为了确保她的安全，周恩来特别指示杨德中主管宋宅的各项工作，在部队执行警卫任务的同时，由公安部、市公安局、当地派出所三方面协同警卫。周恩来还亲自找红卫兵谈话，做说服教育工作。1966年9月1日，周恩来特地对首都红卫兵讲话，他说：“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国外，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1966年10月1日，周恩来专门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杨明轩、程潜、张治中、周建人，人大常委会委员贝时璋、卢汉、史良、庄希泉、许广平、华罗庚、严济慈、邵力子、王昆仑、茅以升、罗叔章、季方、胡子昂、胡厥文、胡愈之、章士钊、梅龚彬、蔡廷锴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

全国政协副主席沈雁冰、许德衍、李德全；国务院各部委的党外正副部长和主任刘文辉、蒋光鼐、朱学范、沙千里、张奚若等；还有著名爱国人士、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参加国庆观礼，对他们采取了一次在国庆观礼台上露面的保护性措施。在国庆盛典开始前，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东休息厅开座谈会，向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高级民主人士认真解释“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还针对个别人的情况，提出了保护的办。为使民主党派领导人免遭批斗，周恩来于1969年5月4日致函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负责人丁江，信中说：“派往各民主党派机关的军代表不知已否派去？如已派去，可与他们谈谈政策，机关革命造反派的任务是清理机关干部的队伍，而不要去斗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

在“文革”中，周恩来对政协委员和爱国民主人士的保护和关怀，还体现在他那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之中。1973年5月，针对中央统战部组织爱国民主人士外出参观安排中的一些问题，周恩来指出，爱国民主人士年纪大了，各方面应有所照顾，可让他们带秘书或家属，一个人住一间房，要组织服务人员拿行李、搀扶，饭菜要软，菜要适应老年人的口味，参观座谈不要安排得太紧。

1974年国庆前夕，周恩来病重在医院里，就参加国庆宴会人员名单，写信给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及中央政治局。信中讲到：“昨晚你交我国庆节招待会拟见报的名单，并告我已经主席——听过，主席当即提出要加肖华、李力群、侯宝林三人，又问及商震是否列入。经政治局昨晚讨论，你告我遵照主席精神，又加刘志坚一人。昨夜我匆匆看过名单，便想到齐燕铭。今晚又将两千多见报名单细细翻阅。在第十七类爱国人士方面，据统战部提出起义将领4夫人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及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因吕案解案被禁多年，去年已无罪释放）5人。我看，4夫人对国内外影响也不小。至于张学铭，则因林彪利用东北军一案大搞东北民主人士，现吕正操同志已平反，张学思已死（此案亦应弄清），故邀张学铭出席有此必要。”

屈武曾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参事室副主任，“文革”时，被“四人帮”关押在秦城监狱。在1974年参加国庆25周年的国宴名单上，周恩来加上了屈武、孙起孟、齐燕铭等10人，径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批示“可”。于是，便将屈武从监狱接到人大会议，阶下囚变为座上客。

在“文革”中，周恩来对一些下落不明的人士多方打听，加以营救。直到他病危躺在床上时，还在询问：“朱学范哪儿去了？”当周恩来得知朱学范在北京秦城监狱关押7年，又被强制送到武汉郊区农村劳动的情况后，他非常愤怒，指示身边的同志：“赶紧把朱学范请回来！”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朱学范才回到了北京。对于那些患病的老先生则积极组织力量治疗和抢救；去世后妥善安排后事，对家属关怀备至，把党的温暖送到了每一个家庭。

正是周恩来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智大勇，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保护了大批政协委员和民主人士，捍卫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使人民政协工作在十年浩劫中没有被完全摧毁。使许多党外朋友理解和谅解我们党所出现的失误，增强了对我们党的同情和信任，更加坚定了和我们党站在一起的决心。

周恩来为人民政协工作开拓出一条广阔的道路，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

十分丰富和宝贵的。从政协的筹建开始到历届全国委员会，周恩来都十分重视发挥政协组织的民主协商作用。有关国家大政方针，如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调整等等，都事先在政协中酝酿协商。当时作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经常指示所属部委，凡是拟订重要法令草案在报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公布实施之前，一般都先提到政协常委会和全国委员会各工作组进行协商征求意见。政协机关的秘书长会议、党派“双周座谈会”等，也都依照这个精神办事。

周恩来一贯保持虚心听取不同意见、发扬民主的优良作风。每次政协会议，周恩来都要广泛征求各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尽量采纳并付诸实施。在统战工作中，他大力提倡发扬民主，提倡民主协商，指出民主协商是做好统战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和方法。他不追求多数表决通过和形式上的一致，而强调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听取党外朋友的各种意见，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和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 and 了解，然后再拿到会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

周恩来在自己的工作中，始终不渝地恪守协商的原则。他虽然担负着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但仍然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同各方面代表人物经常接触，通报情况，听取意见，协商对话，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推动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顺利实施。

就在周恩来晚年病重的时候，仍然念念不忘协商的原则，1975年5月25日，还对中央统战部《关于组织爱国人士外出参观的请示报告》作了如下批示：“此类参观人员，如尚未与他们协商就突然宣布，似仍应分别约他们座谈一次，取得他们同意后再定，以示我们历来主张的民主协商精神。”

周恩来认为，参加人民政协的成员要有广泛的代表性，把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使它真正成为各阶级、各党派的政治联盟。

针对有人批评政协名单里面什么人都有时，1954年12月4日，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周恩来报告二届政协筹备情况时指出：“我觉得好处就在这里。政协不是一盆清水，如果是一盆清水就没有意思了。政协就是要团结各个方面的人，只要他们拥护宪法，立场站过来，我们就欢迎。”我们要吸收不同意见的人，这样政治协商会议才能前进，才能有利于国家建设。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参加人民政协的成员不断扩大。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80人，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559人，较上届增加两倍，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071人，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199人。这充分体现了人民政协的代表性和团结面的广泛，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的高度重视，也表明我国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发展。

粉碎“四人帮”后，统一战线更加扩大，从高举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到高举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两面旗帜，只要赞成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就是团结的对象。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邓小平1979年10月19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宴请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明确指出，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缩小，而是应该扩大。它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

盟。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共同奋斗，还要为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共同努力。今天人民政协取得了重大成就，是和周恩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分不开的。

与民主人士的真挚友谊

坚持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合作，是周恩来一贯的战略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周恩来对我党与民主党派的长期合作的方针，又进一步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1957年4月24日在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发表了讲话，他指出：“既然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都能和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共同合作，团结在一起，那么，怎么能够设想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不能同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继续合作下去呢？这是说不出道理的。”

民主党派究竟存在多长时间呢？周恩来在上述讲话中坚定地回答说：“我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共产党同民主党派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可同年同月同日死，说共产党可以多活几年，是错误的。

周恩来鼓励政协中的中共党员要发扬民主，广交朋友，多交党外朋友，交诤友，交畏友，多交换意见，多谈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决不要把自己局限起来。共产党要“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也要帮助党外朋友在思想作风方面进步。1961年，有一天周恩来曾要我当面转告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徐冰，对党外政协委员余心静、唐生明等，不要只同他们吃喝玩乐，同时要关心他们的政治学习，使其不断地取得思想上的进步。

建国后，为了推动各民主党派与我党的团结合作，共同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服务，周恩来不仅在理论上丰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统一战线的学说，在实践上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在他的思想、品格、修养、作风和待人等方面都具体、生动、形象地展现出他是全党的楷模。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内交友最广的一位领导人，他在国内外都有难于数计的朋友，并在朋友中享有极大的信任和极高的威信。他认为，广交朋友是密切联系群众、团结广大群众一道前进、争取革命胜利的需要。他将我党与民主党派关系所遵循的方针，具体体现在与民主人士的交往中。他一生为革命事业结交了无数国内外朋友，而且十分珍视友情，他不忘老朋友，又广交新朋友。他特别注意听取党外朋友的意见和批评，强调党外各界人士对共产党的监督作用，从不以权势压人。他与一些长期联系的革命朋友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在国内外广大朋友中受到极大的尊敬和爱戴，他们把他当作自己的良师挚友和引路人。这对中国共产党建国后继续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也起了很大作用。甚至当中国共产党发生“左”的错误，党外人士受到严重伤害的时候，许多党外朋友由于对周恩来的深切信任，而对党给予谅解，仍不变初衷，继续与共产党合作。这方面的事例举不胜举，我在这里只能讲几个有代表性的。

周恩来和张治中（文白）是老朋友。他们的友谊始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20年代。长期以来，他们确实做到相互谅解、相互支持、患难相济、亲密合作，道义相砥，生死亦可托。他们的友谊经过数十年时间的考验证明是非常真诚的。他们在交往中，彼此都是以诤友相待的。

建国初期，张治中向周恩来提出过关于外交方针方面的重要意见。他主张通过中国的缓冲，促进远东和世界和平，主张同各国，特别是工业发达的国家发展贸易往来，不能像过去那样闭关自守，一律排斥外来的东西，要吸收外国好的经验。在国号、国徽、国旗的选择上、在抗美援朝战争问题上、

在大力支援老根据地建设问题上、在制定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是否为国家元首等问题上，都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他把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向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提出，供决策时参考。他每次外出参观和视察，都要把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用书面向毛泽东或周恩来报告。

在解决新疆的民族关系问题以及和平解放新疆的工作中，张治中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54年国庆5周年时，毛泽东举行授勋典礼，亲自授子张治中一级解放勋章。张治中还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治中无限感慨地说：“是毛主席、周总理挽救了我的生命，唤醒了我的灵魂，怎能不叫我刻骨铭心地感谢共产党，永世不忘呢？”

周恩来知道张治中患有神经性腿痛症，因此，每次从国外回来都带一些如虎骨胶、燕窝等珍贵药品送给他。邓颖超大姐还亲函致候。

1960年，有一次，周恩来和张治中同机飞广州，张忽然想起：1925年，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在广州“太平餐室”举行结婚仪式的，便笑着对周说：你们结婚35年了，应该在“太平餐室”请我们吃餐饭，纪念纪念。周恩来听后会心地笑了，后来，他真的请张治中在老地方聚会了一次，请他吃了当年结婚时吃的烤乳鸽。

建国以后，周恩来日理万机，废寝忘食，张治中的社会活动也频繁紧张，两人除公务上的接触以外，从1954年起，张治中每年必邀请周恩来聚会一次，周从不失约。“文革”前的一次是在颐和园的介寿堂，张还邀请陈赓和郑洞国、杜聿明、宋希濂等20多位经过教育改造的黄埔学生作陪，师生共叙往事，展望未来，气氛十分融洽。

张治中很关心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对如何发挥我国在国际上的作用，有他自己的见解。1964年夏，我和罗青长奉周恩来命去北戴河见张治中。张治中曾说过：“看样子，我们还是要参加联合国，不然对我们不方便，也不能发挥我国的作用。”事后，张的机要秘书余湛邦向我和罗青长解释说：“张老不是主张现在就参加联合国，而是认为条件成熟时应该参加。”当然，当时驱逐台湾出联合国的条件还没具备，但张治中当年就有这种设想，可见他的政治敏感性是很强的。

“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闹得很凶。当时张治中还在北戴河。周恩来为了让张有个思想准备，特地通知中央统战部派一位负责同志到北戴河跟张打招呼，解释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文革”中，周恩来自己的处境也十分困难，为了保护张治中，除了在“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上开列了张治中的姓名外，并指示北京卫戍区派了一个连队和营部驻在张家附近。战士们身着便装，佩带红袖章与前来的红卫兵周旋。红卫兵先后到过张家5次，由于事前做了准备，采取了保护性的措施，所以他们没敢动手。后来周恩来在一次接见红卫兵的讲话中说：你们知道张治中三到延安的故事吗？重庆谈判时，张治中先生亲自迎送毛主席，保证了主席的安全。他是我们的朋友，你们不要再去了。由于这些红卫兵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唆使，三番五次还要揪张。周恩来感到这样下去不行，就指示周荣鑫找一位负责同志把张治中秘密送到301医院保护起来。

1967年在全国揪叛徒高潮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从新疆回来的那批人是叛徒。康生造谣说：新疆回来的那批人是叛徒集团，他们同张治中勾结隐瞒了叛变历史，回到延安潜伏下来，是一批定时炸弹。康生之流明明

知道这件事是周恩来出面委托张治中办的，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利用这件事整周恩来。周恩来再次在红卫兵的集会上讲话时指出：新疆那批同志出狱是党中央提出来，我向张治中要求，由张治中先生的部下送回延安的。这批同志没有问题，党中央是做了结论的，张治中是做了一件好事。他还提到：朱总司令曾亲笔写信感激张治中先生，并赠送了延安的羊皮筒子和毛线。至此，这件事才平息下去。

以后，周恩来还派人代表他到 301 医院看望张治中，自己也常抽出时间去和他谈心。张治中看到国家这个样子表示十分忧虑时，周恩来总是劝慰他“这种日子不会长久的”。在张治中病危时，周恩来经过努力使张得以在病逝前与家人团聚。

张治中逝世时正是“四人帮”最嚣张的时候，周恩来仍然为张设立了灵堂，亲临八宝山主持遗体告别仪式并致悼词，还特意叮嘱张夫人洪希厚说：“你们有什么困难、就找我的联络员告诉我。”之后不久，洪希厚也病了，周恩来知道后，多次派人前去探望，周恩来了解张治中一生廉洁奉公，没有留下什么遗产，更没有积蓄，就特地嘱咐办公室的同志送去一笔钱。周恩来还交代我和国务院吴庆彤，专门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了一个党内外副部长以上的遗孀生活补贴标准（党外高于党内），经他批准后实行。

张治中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和迫害，但他毫无怨言，对共产党忠诚如故。临终时念念不忘的是台湾的回归，没有半句谈及私事。他在晚年所写《我与共产党》一书中，他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最后总结：“由近望到远，我已接受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一革命路线的领导，我当然以无限的忠诚跟着共产党走，走向建成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到世界大同的大道。我虽年已七十，仍不敢妄自菲薄，自当更加努力，不愧作为一个红色老人，不愧做一个共产党的朋友，‘共产党的好朋友’！”

1976 年 1 月 8 日，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传到了北京东城东总布胡同的一所住宅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轮椅上，忍不住老泪纵横，放声大哭。他表示一定要参加吊唁，家属们劝他不要去了，要走路，又要长时间站立，他虚弱的身体怕支持不了。他年过半百的儿子，强压住自己的悲伤，婉言劝说爸爸：“我们很理解您的心情，可您已 90 多岁了，下肢瘫痪，行动很不方便，再说您近日又患病，小便十分频繁，去那样庄严肃穆的场合，恐怕不太适宜。”万没有想到，这一劝说激怒了老人，一甩手打在儿子身上，他激动地说：“我死了，也要去！”他流着眼泪哭诉着周总理对他的恩情，就像大海一样深。这位老人就是 94 岁高龄中国共产党的诤友、坚强不屈的民主战士，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原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

1951 年 9 月，接任北京大学校长不久的马寅初，在北大发起了一个以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为目的的学习运动。马寅初请周恩来来北大做报告，听讲对象后来扩大到京津地区高等学校教师。大会在怀仁堂召开。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他从自己的家庭、身世讲起，讲到后来如何走上革命的道路，革命胜利后又如何正确处理个人、家庭和革命的关系，指出知识分子要过好民族关、阶级关、家庭关。最后亲切地鼓励大家要从爱国的立场发展到人民的立场，发展到共产主义的立场，这才是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应有的归宿。马寅初仔细聆听，认真做笔记，周总理报告完后，他兴奋地对大家说：“周恩来的这次报告，对于推动我们的政治学习太重要了！特别令人钦佩的是，周总理自我批评的精神，坦率说出自己的社会关系，

在座的人没有一个不受感动的。用这样的办法来领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在我看来是最有效的，它不仅启发了知识分子学习政治的要求，而且还巩固了学习者的信心，提高了学习者的情绪，推动了学习改造的过程。”马寅初从心中佩服周恩来总理的演讲风度、口才和技巧，在之后的几十年中，他还常常对人提起这次演讲。

1955年，马寅初根据浙江、上海等地的调查材料，写了一份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稿，准备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提出。事先，他将发言稿交浙江人大代表小组征求意见。由于当时盛行苏联新人口观点，认为人多力量大，谈控制人口是不受欢迎的，除少数人表示赞同马寅初的观点外，多数人不表示意见，也有一些人表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他的观点同马尔萨斯一样，甚至有些人还打算对马寅初进行批判，后来由于周恩来的阻止才未能实现。马寅初看到这种情况，认识到现在谈论这个问题还不是时候，于是将发言稿收回。但是他并不灰心，继续进行着他的调查研究。他还找竺可桢、柳亚子、马叙伦、陈达、潘序伦等专家学者谈话，征询他们的意见。马寅初在同潘序伦谈及他的人口理论时说：“我的人口论，既不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也不是马克思的人口论，而是我马寅初的人口论。”他还风趣地自嘲说：“我这个马寅初的马，不是马尔萨斯的马，而是马克思的马。”

1957年春天，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会上听取了马寅初《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发言。

马寅初说：“人口多就是我们的致命伤。我们只要研究一下中国人口的增长情况，就会感到人口问题十分严重。”

“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经济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计划经济。”

马寅初的发言结束以后，整个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当即对他的发言表示赞同。

毛泽东笑着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马寅初今天讲得很好！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1957年4月27日，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发表人口问题的演讲，受到热烈欢迎，引起了广泛的讨论。6月，他将这次报告稿加工整理，先写成书面发言稿，作为一项提案，提交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然后又在7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就是马寅初著名的《新人口论》。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警告说：“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政府对人口若不设法控制，“难免农民将来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和不满”。

同年，报刊上发表了不点名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如1957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文章，康生、陈伯达等人曾主张把马寅初定为右派。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许涤新为此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周总理明确指出：“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由于周恩来出面制止，马寅初才得幸免。

10年浩劫开始后，一天，马寅初居住地区的派出所所长来到马家，高兴地对他说：“马老，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周总理指示，你的住宅不准任何人侵入，抄家，你的住宅受到我们的保护，以后家里如遇有事时，可及时告诉我们。”由于周恩来的关怀，在“文革”中，马寅初的家才免遭查抄和浩

劫，马寅初本人也未受大规模的批斗和皮肉之苦。

1972年4月，经多方诊断，马寅初患了直肠癌。周恩来在一份为马老手术治疗的报告上做了如下批示：“本人有动手术的要求，家属又坚持手术，医院应当从手术着想，组织会诊，议后望告。”

卫生部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当晚就转告北京医院再请金显宅和王德元大夫到京会诊。参加会诊的有国务院和卫生部的代表、北京医院有关领导和医生、天津人民医院的医生，马寅初家属也列席了会诊会。当有的同志转告了周总理的批示后，与会同志莫不为周总理对老朋友的关怀，感到惊讶和敬佩。

手术前，马寅初激动地说：“我不怕手术，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有总理的支持，我身体素质又好，我要和病魔作坚决的斗争！”

5月30日，马老作了第一次手术，情况良好。两周后，在作第二次手术前一天，总理办公室来了电话，口头通知了总理的三点指示：手术前要作好充分准备；术中要慎重细致；术后要严防一切不良后果。主持手术的几位医生听到周总理的指示更增添了作好第二次手术的信心。6月14日，手术成功的消息传到了西花厅，周恩来又关照要注意手术后的护理工作。

马寅初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病魔，身体渐渐康复起来，一次，他的一位老友来看望他，马寅初含着泪花说，“周总理是我的救命恩人。解放前曾在重庆救我一次。这次手术又救了我呀！”

1975年，病势日重的周恩来，在病榻上仍关怀惦念着马寅初的身体。特派他身边的两位保健大夫——北京医院吴蔚然副院长和卞志强大夫专程来到马家，代表总理看望马老。马老惊喜交集，感动得老泪纵横。两位大夫嘘寒问暖，从马老手术后的身体状况到饮食起居、家庭成员、困难请求，逐一详问，并仔细检查了马老的身体，作了完整详细的记录。两位大夫再次代表总理向马老致慰问之意后，才告辞离去。

半小时以后，吴蔚然大夫从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告诉马老家属说：“总理听得很仔细，我们尽所知道的都汇报了。万没想到总理问我们马老吃什么药？唉，刚才什么都问到了，偏偏在这一点上疏忽了，总理要我们立即打电话问清楚，我们只好又来麻烦你们啦。”

马老听了家属的述说后，眼睛湿润了。半晌他才深沉地说出四个字：“总理无私。”

往事一幕幕从脑海中掠过，马老百感交集，久久不能平静。他对夫人王仲贞说：“周总理对我恩重如山，情深似海，可惜他先我而走了。他为人民耗尽了心血，但他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千古不灭，万世长垂！我们全家要永远记住他，崇敬他！”

向周总理遗体告别时，老人执意要向周恩来总理遗体行礼，他的儿孙们只好费劲地扶起他，用手按低他的头，点了三次，然后坐着轮椅围遗体缓缓绕了一圈，马老不肯离去，一定要再绕一圈，绕完刚要出去，马老又说他要鞠躬，直至儿孙们扶着他向周总理遗体行了三鞠躬礼，才离开了告别厅。老人泪眼朦胧，极力想扭头再望一眼……

周恩来广交朋友，也善于交朋友。他广交的各界朋友不仅有进步的、中间的，而且有落后的，甚至有社会影响的旧政权中的当权派也主动和他们交往，向他们做工作，身体力行地做到了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周恩来与曾任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朱启钤的交往中，结下了真挚的友情，被世人传为佳

话。

朱启铃先生生于 1872 年。晚清时曾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津浦铁路局北段督办。北洋政府时代，曾任交通部总长、内务部总长、代理国务总理、1919 年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以后，在津沪一带经营实业，经办中兴煤矿公司（今山东枣庄煤矿）、中兴轮船公司等企业，并在北京组织中国营造学社，从事古建筑的研究，是个经历十分复杂的人物。在他的晚年能够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祖国和人民做了一些好事，与周恩来的关怀和信任是分不开的。

解放前夕，朱启铃居住上海。当时章士钊也住在上海。朱启铃和章士钊交往密切。1949 年章士钊第二次到北平参加国共和谈时，周恩来曾请章写信给朱启铃，劝说他留下来，不要去香港或台湾，章士钊两次写信，交由金山派人送到上海。朱启铃说只收到一封。后来听金山说，第一次派去送信的人中途牺牲了，未能送到。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朱启铃留了下来。

上海解放后，周恩来派章文晋（朱启铃的外孙）到上海将朱启铃接到北京，定居在东四八条住宅中，与章士钊同住前后院。

朱启铃来到北京后，对人民政府的各项措施颇有好感。他是中兴轮船公司的董事长，与公司的常务董事张叔诚、黎绍基、周叔廉、唐伯文商量后，决定把已经开到香港的十几条轮船召回大陆支援国内海运。后来，除被台湾当局扣留的几条轮船和仍留香港暂营客运的“中兴号”客轮外，其余 9 条货轮全部召回。同时，朱启铃又将他珍藏的岐阳王世家文物共 56 件捐献给政府。

周恩来对朱启铃十分关怀。朱来京后，周恩来请他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还先后安排他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因为他对古建筑研究有素，又让他兼任古代建筑修整所的顾问。

50 年代初期，人民政府决定扩建天安门广场，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征求朱启铃的意见。当时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长薛子正派人请朱启铃参加市政府在旧司法部街老司法部内召开的座谈会。

1957 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周总理来到东四八条章士钊先生住处，看望了章老并向他了解香港的一些情况。然后，在章老的陪同下，周恩来又去看望朱启铃，坐下寒暄一阵后，周恩来说他在北戴河看到一通碑文，上面有他叔父周嘉琛的名字，问朱启铃知不知道？朱说：“民国二年，我任内务部总长，举办县知事训练班时，他是我的门生，当时他正在临榆县知事任内（北戴河属于临榆县治）。”周恩来打趣地说：“那你比我大两辈，我和章文晋同辈了。”

把话题扯开后，周恩来详细地询问了朱启铃的起居和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又问：“送给你的《参考消息》收到了没有？”朱启铃说：“他们每天都拿给我看，字太小，没法看清楚。”周恩来说：“这些是专治我们老年人的，叫我们看不见。”他当即指示秘书，转告新华社，以后给老年人专门印了一种大字的《参考消息》。

朱启铃的长子朱泽农和周恩来握手时说：“我也是南开的学生。”周恩来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朱沛（他谱名朱沛，字泽农）。”周恩来马上说：“五班的。”当听说他们兄弟子侄等多就读于南开中学时，周恩来便同他们谈起了南开时代的一些往事。周恩来还同在场的朱老的女婿共叙南开时代的往事，大家欢声笑语，谈得十分畅快。

朱启铃请周总理抽烟时，周说不吸烟，只是在同马歇尔谈判时偶尔吸过

一些，因为太费脑筋。但他又爽快地告诉朱老先生：我爱喝酒，茅台酒能喝一瓶。朱启钤出于待客的礼节和对总理这样一位贵客的敬意，执意要家人上茶。总理随行的保卫人员为了执行当时的安全规定，便向朱启钤的家人摆手，示意不必送茶。出于对总理一片敬意，家人只得将茶杯和糖果放到了中间的桌子上。朱启钤眼花耳聋，没有看清以上的情形，仍在不断催促家人“上茶”、“上茶”。朱启钤家人理解保卫人员的职责也理解朱老的心情，正在左右为难，没想到这时总理却亲自走过去，端起茶杯，呷了一口，然后将茶杯放到了自己身旁的茶几上，并且还吃了送上来的糖果。

在周恩来讲活时，朱老因耳聋而经常打断周的话，他的家人直向他摆手，示意不要打断总理的话。周恩来看到后说：“不要阻止他，让老先生说么！”

朱启钤对文字改革有些不理解，他说：“是不是改革以后，我们这些老头子都成文盲啦？”周恩来听罢大笑，指着在座的章士钊说：“他参加了会嘛！情况他都了解，以后请他详细介绍介绍。”朱启钤担心死后被火化。他对总理说：“国家不是说人民信仰自由吗？我不愿意火葬。我死了，把我埋在北戴河，那里有我继室于夫人的茔地。我怕将来办不到，所以才和你说，请你帮我办吧！”家人忙去阻拦，但是周恩来又一次制止了他们。等朱启钤说完后，周恩来对着他的助听器话筒说：“我一定帮你办到，请相信我，放心吧！”朱启钤听到总理的回答，连连点头，脸上露出欣慰的神色。

周总理告别离去时，朱启钤全家送到门口，他和他们一家人及工友等一一握手，并幽默地说：“你们朱家可以组成一个仪仗队了。”

1961年朱启钤90岁生日时，周恩来派人送给他一个大花篮祝贺。几天后他又在政协二楼小礼堂为朱启钤举行一次小型祝寿宴会。参加宴会的除朱启钤和家属外，还有章士钊和张学铭（朱老的女婿），其他应邀作陪的都是70岁以上的在京全国政协委员。祝酒时，周恩来说：“今天在座的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我是个小弟弟（总理当时63岁）。我们今天不只是给朱桂老（朱启钤号桂辛）祝寿，而且也是给在座的各位老人祝寿。”在朱启钤家属集体向总理敬酒时，周恩来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什么时候请我们吃饭？听说你们朱家的菜很好吃。”朱启钤说：“好呀！那就请总理定个日子吧！”宴罢都尽欢而散。

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政协副主席张执一和我3人，因工作关系参加了宴会，散场时都以看到了“三朝总理”（朱启钤，北洋政府代总理；翁文灏，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周恩来，人民政府总理）欢聚一堂而高兴。以后传为统一战线的佳话。

1961年12月7日，周恩来约定到朱启钤家作客。朱老全家兴高采烈。特地从北京饭店订了两桌菜，家里又做了几样有贵州风味的家乡菜，另外还做了总理喜欢吃的“狮子头”。

饭后，周恩来、邓颖超和朱启钤全家合影留念。朱启钤十分高兴，他将手书的“松寿”缙丝小条幅，亲手装裱，通过中央统战部送给周恩来作为纪念。

朱启钤先生于1964年2月26日逝世。临终前，还时时惦念远行国外的周总理。朱启钤生前鉴于火葬日益普及，而北戴河茔地又划作禁区，因此又在京郊万安公墓买了寿穴。他去世后，全国政协征求他的家属意见，是否仍照他的遗愿葬在北戴河茔地。家属们考虑后说：“老人生前已另有准备”，没有坚持葬在北戴河。后来经周总理批准，朱启钤的遗体被安葬在八宝山革

命公墓。安葬后，在嘉兴寺举行了追悼会，总理送了一个用鲜茉莉花做成的花圈。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代表周总理主持了追悼会。李维汉在同朱启钤继夫人许曼颐谈话时，一再表示了总理对朱启钤丧葬事宜的关怀。

由于党和周恩来的关怀，朱启钤家的生活一直受到很好的照顾。十年动乱中，朱家受到冲击，朱启钤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墓碑被“造反派”砸碎。周恩来知道后，指示中央统战部很快给他们落实了政策，并重新修复了朱启钤的墓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朱海北到中央文史研究馆任馆员，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又把朱启钤生前居住的东四八条住宅，定为“朱启钤先生故居”，列入文物保护单位。

在和平改造的道路上

1950年春，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周恩来两次作报告，对有的同志在发言中反映出来的“左”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和教育。他指出：“今天我们中心的问题，不是什么推翻资产阶级，

而是如何同他们合作。”周恩来在报告中分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性，说明它的两面性是长期的，“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员，是我们的朋友”。

中国的猪鬃大王、四川的猪鬃出口商古耕虞，从抗战前后，就与周恩来交往。在对国共两党的关系上，他是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不偏不倚保持中立；二是“一推一拉”，即国民党把他向外推，共产党把他向里拉；三是拿定主意拥护共产党。古耕虞认识到，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民族资本，是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而发展的。

古耕虞说，“中国资本家不会喜欢‘共产’，但都喜欢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反帝爱国运动。资本家是要剥削劳动人民的，但在反帝爱国上，却与无产阶级有共同的语言，也有共同的要求，因为“两者在这方面的利益是一致的。”

古耕虞一向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本来是中间的，但由于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强迫民间交纳金银外汇，甚至以坐牢、杀头相威胁，于是一下子就把这个阶级“推”到共产党这边来了。

1949年10月4日，徐冰陪古耕虞到周恩来家，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在座的还有乔冠华。周恩来用商量的口气对古耕虞说：“我们准备把猪鬃公司交给你全权负责，你的意见怎样？”周恩来还说，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就知道你，同你多次谈过桐油、猪鬃问题。那时，我们共产党不是执政党，所以只能空口支持你，现在我们执政了，相信你能够把这件事情办好。古耕虞说：“我参加中国猪鬃公司工作之后，现在的四川畜产公司和公司的一批人怎么办？”周恩来说：“你说怎么办？”古耕虞说：“我想把四川畜产公司全部交给国家。”周恩来说：“这事要从长计议，我还没有考虑，以后由主管部门具体研究，但请你先把猪鬃公司的事情定下来，以便我通知中央贸易部长叶季壮。”

周恩来请古耕虞一起吃晚饭。饭后继续谈话，周恩来再次向古耕虞提出全权负责猪鬃公司的事，并且勉励他把事情办好。古耕虞最后向周恩来表示：“我一定努力办好。但我先要出去看一看，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然后再向你汇报。至于我个人，政府要怎样用我就怎样用好了。请你转告叶老（叶季壮）。”

古耕虞与人民政府签订了协议后，便把他的四川畜产公司改为国营公司的组成部分，受国营公司领导。1950年6月，古耕虞奉命到美国推销猪鬃，同时从美国进口我国所需要的物资，如重型卡车轮胎、五金机械、橡胶等。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由于军需，美国政府大量购进中国猪鬃。1950年，我国猪鬃出口创历史最高记录。

抗美援朝时，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冻结中国大陆在美资金。当时，四川畜产公司在美资金达500多万美元，加上国内其他公司委托的输美物资，达700多万美元。并指定为“特别冻结户”，非经美国总统批准，不得解冻。因为四川畜产公司有“特殊嫌疑”，他们估计香港的四川畜产公司是与中共合作的。

后来，古耕虞通过各种努力，终于使美国政府同意解冻那笔资金。古把

解冻后的款项全部汇回国内，并把在香港的子女也送回北京上学。有关部门向他了解在美资金解冻经过时，古耕虞写了一封信，报告了他在港、在美的工作情况，并叙述了他与周恩来交往的经过，尤其是周恩来对他的关怀和信任。他以深切的感激之情，在信上说：“周总理以国土待我，我以国土报之。”

1956年，古耕虞担任了中国畜产公司经理，以后又担任了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对外经济贸易部顾问。

“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古耕虞得到了公司党委、街道居民、派出所公安干警的保护。

古耕虞激动地说：“经外贸部党组审核批准，我作为新中国的国家干部的工龄，是从1950年4月（现在按规定改为从1947年）算起。我认为从那时开始，我就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干部，不再是资本家了。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光辉成果，也是与周总理对我的相遇又相知、引导和启发教育密切相关的，周总理等中共领导人是我的挚友、相知。”

黄炎培，是一个前清举人出身的著名教育家，他与周恩来在近30年的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知无不言的挚友和诤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10月11日晚，周恩来来到黄炎培寓所，长谈两小时动员黄炎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职务。黄炎培一向表示不做官，周恩来动员他做“官”。经过两个多钟头的恳谈，黄炎培被周恩来说服了，表示决定接受这个职务。

黄炎培毕生从事职业教育事业，为我国的民族工商业培养了上万的技术人才，所以，他和我国的民族工商业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毛泽东、周恩来对他殷切的期望，使他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带领民主建国会的全体成员，在民族工商业者中发挥模范、带头和桥梁作用，将是他晚年的一项光荣的历史使命。

1952年10月25日，在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常委会后，周恩来特邀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座谈。当时，不少资本家在“五反”运动中，受到批评教育，对我们党和政府有疑虑、有牢骚。有些人参加开会时不敢讲话，有些则想抓住某些地方人民政府工作上的一些缺点泄愤。他们对私营工商业者的前途有些丧失信心。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向他们作了恳切的谈话，他说：“将来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中国经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后，不会再留第二次血。和平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变得很自然，‘水到渠成’。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他预言：“将来要和平、愉快、健康地进入社会主义，使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我们要做很好的安排。”参加座谈会的代表听了周恩来的谈话后都感到满意和兴奋。普遍认为不但解决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问题，而且解除了将来进入社会主义的顾虑，并对国家和自己的前途增加了信心。胡子昂表示由衷地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并积极带头贯彻，努力加速自己的改造过程，决心不辜负周恩来等党的领导同志对他的教诲，不辜负党对他的关怀和信任。周恩来的讲话在工商界广为传播，使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很大的鼓舞，安定了他们的情绪，坚定了他们今后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信心，使我国今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得比较顺利。

1953年开始，全面开展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主义

改造工作。中央责成中央统战部分管这方面的工作。1953年11月，中央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下设第六办公室，1954年改为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兼任中财委副主任、国务院八办主任，统战部副部长许涤新为副主任，协助周恩来、陈云主持这方面工作。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会遇到各个方面的阻力和不同形式的反抗。个少工商业者对政府的政策有疑虑，普遍感到不安，有的甚至惊呼“上了贼船”。有的大财团资本家，为保存其资本主义阵地，宁愿拿出一个企业抵债而不愿实行合营，说“宁砍一指，勿伤九指”。少数人则以“三停”（停工、停伙、停薪）、抽逃资金、破坏生产等手段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党中央分析了这一阶段斗争新形势，决定自上而下地，有领导有计划地在全国开展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特别是在工商业界要广泛深入宣传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和平改造的方针政策，使它深入人心，做到家喻户晓。

1953年，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黄炎培自告奋勇，要求去上海向工商界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意义。临行前，还去请示了周恩来。周恩来认为，黄任老（黄炎培字任之）不顾年迈到上海去宣讲总路线的精神很好，并说黄任老在上海很有影响，请在宣传的时候，要注意结合实际，把总路线解释清楚。

黄炎培不仅能以模范的行动来带动大多数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还领导民建会的同志作广泛的调查研究，不断把他所了解的情况和意见向党中央报告。

1953年9月8日至11日，全国政协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邀请部分工商界代表人物参加。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报告和《社会主义改造与国家资本主义》的总结发言。他针对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改造思想上的疑虑和不安，系统地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步骤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前途等问题。

1954年12月，黄炎培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言说，民建会一定要负责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三种任务：一、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教育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结合企业的改造，进行个人改造；二、密切联系民族资产阶级，了解、研究、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推动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三、协助政府宣传、推行国家的政策法令，并代表他们的合法利益。

通过一系列对总路线的学习、宣传和教育工作，大大减少了资产阶级上层代表人物的疑虑，提高了认识，表示拥护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盛丕华对资本家现在有利润可得、将来有工作可做，表示满意。黄炎培形容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针是“同登彼岸，花团锦簇”，并说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只要接受改造，将是“风又平、浪又静，平平安安到达黄鹤楼”；“到社会主义都有一份工作，有饭吃”。博得了许多代表的赞赏。许多人感到“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有的则提出要“积极经营，争取利用，不犯五毒，接受限制，加强学习，欢迎改造”。

1954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作取得很大进展。规模较大的重要工业合营了，剩下大量分散落后的中小企业生产上发生了困难，在加工订货分配上，只管国营和公私合营，不顾私营企业，以至造成部分私营企业停工、停薪、停伙，甚至关门、失业。许多地方党委纷纷向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发电报，要求小厂

也应得到生产任务，也应使工人得到工资。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坐着不管，看看各地党委如何解决工人的要求。八办副主任许涤新向周恩来、陈云作了汇报。周恩来听了汇报之后，明确地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只有一个，没有两个。国营工厂的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私营工厂的工人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谁也不能说私营工厂的工人不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成员吧。”周恩来还说：“我们的加工订货必须统筹兼顾，既要一视同仁，又要有所不同。”周恩来还要陈云给干部做一次报告，说明加工订货必须贯彻统筹兼顾的原则。

当时主管八办工作的陈毅也向周恩来写信，批评国营主管部门缺乏统一安排、“左”的倾向，指出：“改造速度太猛，孤军独进，不与各方打招呼。”

1955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把全行业公私合营推向高潮。这时，黄炎培正因病住院动手术，但他念念不忘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大事。当他读到了党中央的上述决议时，兴奋地立刻在病榻上写信给毛泽东说：“我准备这副老机器活动力完全恢复以后，将发挥新的精神，重新投入战斗部队，为光荣地执行主席又一次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珍贵指示努力。”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黄炎培和民主党派负责人一起被邀请列席大会，并应邀在主席台就坐，受到了一次最生动的教育。随后，民主建国会举行了一届二中全会，黄炎培在会上号召工商界和民建以亲密的伙伴关系，帮助、团结、教育民族工商业者，认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毛泽东在1953年6月1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当时大家都赞成，但时间多长？意见并不一致。周恩来是赞成总路线的，但认为对资本主义的改造，不能搞得太快。如果搞得太快，对国家、对国民经济并不利。如果按照周恩来的意见，要实现这个历史任务，15年可能不够，还需要更长一点的时间，可惜的是，由于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当时在起主导作用，从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到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高潮，前后还不到4年！以致留下了一些后遗症。

1956年2月，国务院讨论《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时，周恩来在会上严肃地告诫各部门：“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要真正巩固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成果，必须实现工业化才行。”

1957年5月，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正在全国展开，要求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黄炎培从上海回到北京，以《帮助共产党种牛痘》为题，把存在的问题坦率地讲了出来，当时主持会议的李维汉看到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好办，就宣布休息，请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反右派运动是当年6月8日正式发动的，而在3天之前的6月5日，周恩来就专程去看望了黄炎培，向他通报了鸣放的情况和鸣放中的问题，使黄炎培心中有数。可见，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对黄炎培是爱护备至的。但是，黄炎培

仍然正直不阿地在反右派斗争一开始就表示不满，提出不同意见。他在6月15日就向党表示：“不要树敌过多，要把可能拉过来的人拉过来，不要把这样的人推到反党的那一派里去。”

黄炎培87岁高龄住院手术治疗时，周恩来对手术方案作了认真的研究，对主治大夫作了妥善的安排，这使黄炎培非常感动。

陈叔通对周恩来非常钦敬，认为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宰辅之才。他说，周总理对他非常尊重，一点没有总理的架子。1952年在成立全国工商联会筹委会时，拟请陈叔老出任主任委员，陈老感到突然，他向周恩来诚恳表示：“我是清朝的翰林，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名高级知识分子，怎么能把我变成工商界的头子呢？”周恩来向他解释说：“你不是资本家，我明白，但是，你同资本家，特别是江浙帮的企业家、银行家，关系密切。大可做好工作。而且你是一位爱国老人。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党相信你，才请你出来挑这一担子。”后来，陈叔老担任了主任委员。这位以俭朴闻名的陈叔老，长期穿布长衫。周恩来在开国大典过后，立即要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陈叔老做一套中山装。他接过周恩来送来的中山装都舍不得穿，直到逝世后退回国家，不仅反映他的俭朴精神，而且反映了他对周恩来的感激之情。有一次，周总理到他家，总理说：“叔老家清静，可以谈谈。”也有一次周恩来突然到他家，说在他家吃饭，谈话的时间可以多些，同时又说，司机和警卫的饭他已安排好，请叔老不要操心。周恩来对人总是推心置腹的。叔老称赞党的统战工作，是“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礼待人”，说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统战工作真是“做到家了”。

作为党的诤友的陈叔通，对党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坦诚直率的提出来，在1957年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上，陈叔通提出：“‘矫枉必须过正’是否永远都是金科玉律，值得怀疑，希望领导上总结一下，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的损失大？”在反右扩大化时，叔老又说：“不能因对党提了意见，就作为右派。”在讨论第一部宪法时，叔老说：“我们应以法治国，宪法以外还应有各种单行法规。”这些意见都是很好的，很值得我们深思。

现任国家副主席荣毅仁，是当年中国民族工商业界的“少壮派”（按：荣毅仁是荣德生最小的儿子，他掌管荣家的产业，上海人称他“少壮派”）。每当回忆他与周恩来的交往时，可以从他眼里和面部表情看出他对周总理深厚的敬爱。在那非常的年代，他和他的家属的命运，同周恩来的关怀是密不可分的。

荣毅仁和周恩来第一次见面是在1950年5月全国政协召开一届二次会议前夕，毛泽东邀请部分参加会议的党外人士吃晚饭时，周恩来热情地拉着荣毅仁的手说：“噢！荣先生，少壮派。”他们第一次见面，给荣毅仁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

1959年荣毅仁到北京工作以后，有一天，荣毅仁到北京饭店理发碰巧遇到周恩来也去理发，周恩来主动同他打招呼说：“你来啦，很好。”又说：“你可以半年在北京，半年在上海。”荣毅仁明白周总理的意思，怕他不习惯北京生活，他立即表示：“到北京就在北京工作，不必半年在这里，半年在上海。”周恩来关切地问：“你夫人来了没有？”荣回答：“准备过了国庆节把家搬来。”总理听了高兴地说：“好！”

后来，周恩来了解到荣毅仁夫人杨鉴清还没有工作时，便亲切地征求她

是否愿意参加工作的意见，她当即表示愿意。在周恩来亲自关怀下，中央统战部很快安排杨鉴清到全国工商联家属委员会工作，后来她又当了全国政协委员。

1963年春天，荣毅仁身体不好，回到上海休息。那时，周恩来到上海开会。会后，荣毅仁邀请周总理到他家吃饭，周恩来很痛快地答应说：“那好呀，明天去！”

第二天中午，周恩来、邓颖超和我，还有上海市委几位同志来到一座有花园的荣家。席间，总理和他们在谈家常，总理问起荣毅仁的子女时，荣说：“我的四个女儿都在楼上，她们刚才还躲在上面看你！”周恩来笑笑说：“叫她们都下来嘛。”孩子们高兴地跑下楼来，总理逐一问她们的名字、年龄和上学的情况。孩子们看到总理那么和蔼可亲，很快消除了拘束紧张的情绪，认真地回答了总理的问话，荣毅仁说，孩子们同周总理在一起的短暂时刻，成为她们终生难忘的记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在不便于同荣讲话的处境下，便让邓颖超来找荣说：“总理托人带过口信给你，希望你一定要经得起考验！”这时，荣毅仁才知道周总理曾托人带信给他的事。邓颖超关切地询问了荣毅仁夫妇的健康情况，并说总理很关心他们。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想了许多办法保护了荣毅仁夫妇。荣毅仁激动地说：“要是没有总理的关怀爱护，我早就完了！”

对于资本主义改造，周恩来主张把它的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改造结合在一起进行，既要改变企业的所有制，又要把这个阶级的成员从剥削者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同时，还将他们对企业的生产技术知识和经营管理经验利用起来为国家服务。

在定息问题上，周恩来明确地指出这就是赎买政策。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仅要算经济帐，而且要算政治帐。定息原定7年，从1956年算起，到1963年就要结束。后来，周恩来同陈云商量后，认为对定息期限有必要重新考虑。他叫许涤新去汇报情况时，再三询问资产阶级这一层人的生活和政治思想状况。经过反复深思，周恩来认为在1963年之后，还有必要把定息延长3年。他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并向中央和毛泽东作了建议，得到了中央和毛泽东的同意。到1962年，周恩来再次考虑工商界的实际情况，认为到1966年结束定息的条件还未成熟，还有必要再予延长，于是又向中央建议再延长3年。后来经毛泽东批准再延长2年。然而，这一计划却被“文化大革命”冲垮了。

“文革”开始后几个月，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召开各部部长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好几个月，是否再搞下去，中央要考虑。但是，无论如何，党和国家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政策还是要执行下去，同民族资产阶级的人们交朋友，还要继续下去的。1956年他们把企业交出来，但他们还是在祖国大地上生活着，还是我们的统战对象。党的统战政策要求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今天要你们来参加会议，就是要提醒你们决不可因为运动，而放弃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又团结又斗争的统战政策和任务。

十年浩劫，民族资产阶级大多数人和各界人士一样，虽经历了苦难，但仍做到了“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经过20多年的和平改造的道路之后，在各得其所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贡献力量。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庄严宣告：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了。历史的进程已经作出证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前途正如周恩来所预言的那样：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阶级消灭，个人愉快！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和平改造的伟大成功！

心系少数民族的发展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 55 个少数民族。如何处理民族问题，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曾多次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考察和处理各种民族问题，多次发表讲话，其中《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是 1957 年他根据我国民族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青岛民族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从理论上系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时期解决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和原则，成为指导我国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周恩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对我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所取得的实践经验，及时作了总结，为建立社会主义新型平等的民族关系，为我们拥有 56 个民族（包括汉族）的多民族国家能够统一、团结、稳定、发展和共同繁荣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为了逐步清除历史遗留的民族隔阂，加强各族人民之间的亲密团结，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周恩来的关怀和主持下，先后组织了中央、中南、西南、西北、东北 5 个民族访问团，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送党和政府对全国少数民族的亲切关怀，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每次访问团下去前，周恩来都亲自讲话作指示，勉励大家要大力宣传，坚决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把党和政府对各少数民族的关怀带给全国各族人民，为增进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多做工作。同时，周恩来又亲笔写了关于民族政策的指示，指出全国各民族要一律平等，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人民公敌，要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自由、发展民族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政策；要使我国成为各民族团结发展、互助合作的大家庭等等。访问结束后，周恩来在百忙中又耐心听取了各访问团的汇报，对一些重要情节亲自作了记录，还对今后的民族工作作了进一步的指示。此外，还派出大批民族工作队和医疗队，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了解和检查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帮助少数民族解决遇到的困难，传送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同时，又先后组织了几百个少数民族参观团、代表团到首都北京和全国各地城市、农村参观访问，加深少数民族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汉族人民的了解。这些代表团在京期间，差不多都受到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周恩来还多次亲自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视察工作。这些活动对沟通民族感情，逐步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增进各民族间的互相了解，增进各民族大团结，起了重要作用。

157

我国各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都是同周恩来的操劳分不开的。在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先后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的计有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等 5 个自治区，31 个自治州，82 个自治县（旗），在少数民族散居杂居地区建立了 333 个民族乡。这些民族自治区的建立，周恩来都给予了亲切的关怀和具体指导。

1947 年，在成立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时，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央电报中作了明确指示。电文中，除表示同意建立内蒙古统一的民族自治区政府外，对内蒙古自治区与各解放区的关系、党的工作、政权建设、军事斗争，以及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其他问题，都做了明确指示。历史已经证明，周恩来亲自起草的这一电报指示，为后来不断充实完善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奠定了基础。周恩来被誉为这一基本政策的奠基者之一是当之无愧的。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酝酿筹建过程中，周恩来从建立这

两个自治区方案的提出，到组织实施，都亲自出面做工作。他亲自主持全国政协常委会，讨论和协商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问题，既充分发扬了民主，让各种不同意见都充分说出来，又反复讨论和协商，耐心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干部，最后达到认识上的一致。由于周恩来亲自做工作，解决了一些棘手问题，这两个自治区才得以顺利地建立起来。

对于西藏的解放和发展，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以及少数民族爱国人士的关心、爱护，周恩来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1951年4月27日，班禅大师率领堪布会议厅（班禅属下的办事机构）的僧俗官员45人到达北京，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隆重欢迎。当晚，周恩来宴请班禅，为他接风洗尘。这是班禅第一次到北京，也是第一次参加重要的政务活动。他当时年仅13岁。

为了表达崇敬之心，班禅向周恩来献了一条质地极好的洁白哈达。然后，周恩来和班禅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谈话内容十分广泛，从中国革命的胜利，到西藏的前途；从即将开始的和平谈判，到班禅在京期间的活动、食宿安排；从藏汉两个兄弟民族的团结，到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都谈到了，连最细小的生活琐事，也没有忽略。周恩来的真诚、慈祥、热情、周到给班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谈话结束，周恩来陪班禅步入宴会厅。到了门口，周恩来请班禅大师先行；班禅则双手合十，微微弯腰低头，十分恭敬地请总理先行。两人互相谦让一会儿后，周恩来挽着班禅的右臂，并肩进入宴会厅。席间，总理不断地给班禅夹菜，介绍各种菜的味道和特点，偶尔还讲一点烹调技术。整个宴会洋溢着亲切欢快的气氛。

周恩来会见班禅之后，指示有关领导，在谈判时，要十分尊重并充分听取班禅和堪布会议厅主要成员的意见。

当时阿沛·阿旺晋美已率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到达北经过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共同努力，加上班禅和堪厅方面的积极配合，1951年5月23日终于达成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和谈期间，周恩来和李维汉对消除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和堪厅的官员之间的隔阂，促进双方互相理解、谅解和团结，做了大量工作。

早在和谈开始之前，中央已经在慎重考虑并认真准备护送十世班禅回藏问题。根据中央的指示，西北局和西北军区任命范明为西北军政委员会驻堪厅代表，牙含章为助理代表；任命梁选贤为堪厅副秘书长，共同负责护送班禅返藏事宜。

1951年初，中央电召西北局统战部部长汪锋和范明、牙含章到北京，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由李维汉具体负责，对班禅返藏的组织领导、交通运输、物资供应、安全保卫等方面，都认真进行了研究并作了周到的安排。

临行前，班禅致电毛泽东，表示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与达赖紧密团结，为西藏的解放和建设而奋斗的决心。12月13日，毛泽东复电班禅：“我完全同意你的这种志愿……。并祝你顺利地到达目的地。”

班禅一行离开西宁，经过4个多月的行程，于1952年4月28日平安抵达拉萨，受到拉萨市各族各界僧俗百姓和驻藏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当天下午，拜会了达赖喇嘛，并进行了长时间亲切的交谈。他们之间的这次会见，标志着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两位活佛时期形成的长达29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已告结束，重新恢复了他们昔日之间的友好关系，西藏民族内

部的团结从而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为了进一步加强西藏建设，1955年3月9日，国务院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专门讨论了西藏的工作。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并决定由达赖任主任委员，班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张国华为第二副主任委员。会议还通过了《国务院对于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之间关于历史悬案问题的谈判达成的协议的批复》。这一协议的通过，使噶厦和堪厅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

党中央、国务院对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非常重视，决定派遣以陈毅副总理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前往祝贺，指导工作。代表团的组成人选、指导方针、日程安排、安全保卫、卫生保健、车辆分配、物资供应、礼品馈赠、文艺演出以及有关文件的起草、翻译等等，事无巨细，周恩来都亲自过问，监督检查，严格要求，一再指示只能做好，不能做坏。

周恩来再三叮嘱陈毅和其他领导同志，到了西藏，一定要尊重达赖和班禅，尊重在藏工作的同志，尊重藏胞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不懂的要学，向人家请教，不要以为自己是中央去的，以钦差大臣自居，指手划脚，评头论足。

周恩来又对张经武和汪锋说：你们是代表团的副团长，要切实负起责任，协助陈毅做好工作，不要有什么顾虑，不要考虑什么地位、职务，一切以工作为重。论打仗，陈毅是内行，我们都不如他：做民族工作、西藏工作，你们是专家，是老师，我们都要当你们的学生。

陈毅风趣地说：“当小学生没有问题，我就是爱放炮，你们多管着点。放错了，及时纠正。”周恩来还派自己的秘书韦明跟陈毅去，协助工作。

中央代表团决定于1956年3月16日离京赴藏，代表团离京前一天，周恩来再次到代表团驻地检查工作。检查到送给达赖和班禅及筹委会的礼品时，周恩来表示满意。然后又要了礼单看，发现礼单上没有藏文，周恩来问：“藏文的礼单在哪里？”工作人员回答说，没有藏文的。周恩来的神态马上变得严峻起来，说：“送给西藏的礼品，怎么能没有藏文？实行区域自治，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是一个重要内容。”周恩来立即指示，所有礼单都要用藏、汉两种文字印，而且要把藏文排在前面。同志们都为周恩来工作的细致而感动。

这时，礼单已全部印好，代表团很快就要出发。怎么办？中央民委当即决定，连夜翻译，突击赶印，过去印好的全部作废。

周恩来离开代表团驻地时，同汪锋等人一一握手，并表示歉意，说：“对不起啦，本来是为你们送行的，却给你们添了麻烦。”

送走了周恩来，陈毅深感内疚地说：“像礼单这样的小事，都要总理操心，太不应该了。这都怪我，工作太粗，应该打我的屁股。”

代表团共有成员57人，包括17个民族成分。各自治区、国务院各有关部、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全国工、青、妇、科学、文教、工商等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都派出了代表，连同随团的文艺团体和工作人员，共有800来人。这样高规格、大规模的代表团前来祝贺，在西藏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在中国民族工作的历史上也属罕见。这充分显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人民的亲切关怀。代表团于4月17日到达拉萨。

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拉萨隆重开幕。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及中央有关部门分别打电报表示祝贺。陈毅、达赖和班禅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这次会议开得圆满成功，标志着西藏工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陈毅和代表团全体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但是陈毅因高原缺氧引发了心脏病。

早在 1955 年下半年，在中国内地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金沙江以东，包括川、滇、甘、青的广大藏族地区，就开始实行民主改革。但是，遇到了巨大阻力。改革尚未开始，就相继发生了叛乱，起初是局部的，后来规模越来越大，几乎波及广大藏族地区，同时影响到外界，叛乱分子受到美国政府和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支持，他们空投武器弹药，派遣武装特务。由于他们的参与，使事件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奉命进行了平叛斗争。

叛乱武装不断被剿灭、被平息。不少叛乱分子支持不住，纷纷西渡金沙江，逃到西藏自治区境内。

江东发生的事件，震动了西藏，尤其使上层集团感到震惊和恐慌。他们担心革命会革到他们头上，使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于是本能地起来反对改革，同情和支持江东藏区的叛乱活动。

1959 年 3 月 19 日深夜，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全面的反革命武装叛乱。19 日深夜，叛乱分子向驻拉萨的人民解放军全面进攻。人民解放军奉命讨伐，经过两天多的战斗，彻底粉碎了拉萨市区的叛乱。

3 月 28 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命令，指出：“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除责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外，特决定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在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被劫持期间，由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副主任委员代理主任委员职务。”

3 月 29 日，班禅致电毛主席、周总理，说他个人，并代表西藏广大僧俗人民，坚决拥护国务院命令。

班禅大师等西藏代表于 4 月 14 日到达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周恩来等亲自到车站迎接。当晚，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举行欢迎班禅大师的宴会。周恩来发表了讲话，指出：西藏反动分子自甘暴弃，选择了背叛西藏人民、背叛祖国的道路。他们这样自取灭亡，实际上反而替西藏的民主化造成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我们相信，从此，西藏人民将逐步摆脱贫苦落后的黑暗生活，走上繁荣进步的光明大道。在这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班禅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正当西藏的民主改革深入发展的时候，国民经济遇到了严重困难，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左”的错误，同样影响到西藏。1960 年到 1961 年，班禅作为副委员长，不但领导西藏工作，还到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的藏族地区视察。他把自己视察中发现的问题，向周恩来和李维汉口头汇报后，又写成书面材料，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

班禅大师认为，最好是通过周总理向中央反映。经过反复斟酌，最后拟定了这样一个题目：《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

汉译稿正在打印时，周恩来要到东北视察，就于 1962 年 5 月 18 日会见班禅，先听汇报。在座的有乌兰夫、习仲勋、李维汉等中央领导和张经武、张国华、阿沛、帕巴拉、王其梅等西藏党政领导。班禅概述了材料的主要内

容，因为同西藏的其他领导同志存在较大的分歧，所以当场发生了争论。

周恩来听取了汇报后说：“从反帝、爱国、建设社会主义三点上说，我们不仅是同胞，而且是同志。”“但不是你说你错的，统统要听。说错了的要给你指出来，不这样就不是同志式的态度，也不是真正对你的爱护。”周恩来还说：“你的汇报稿写好后，我看一下，我们回来再谈。”6月上旬，班禅大师把打印好的这份材料送交中央的同时，会见了周恩来和彭真、乌兰夫、李维汉、习仲勋等领导同志，面陈了自己的意见。后来，毛泽东也专门为此事接见了班禅。

这份材料比较系统、全面地批评了民族工作、尤其西藏工作中“左”的错误，提出了如何纠正错误，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的建议。

班禅的汇报材料上报中央后，中央非常重视，责成李维汉、习仲勋同志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研究讨论，提出改进西藏工作的意见，最后形成了4个文件，并很快得到中央的批准。

周恩来从外地视察回来后于1962年7月24日，接见了班禅、张经武等在京的西藏领导人。周恩来说：“相隔两个月，产生了4个文件，你们做了件大的工作。我们把阶级、民族、爱国和人民的立场统一起来了。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有叛必平。”“平叛、改革是真正挽救了宗教和民族的危亡。……在现在的条件下，如何着手搞好农业、牧业、商业，希望你们提出一个办法。要注意解决贫苦的那部分群众的生活。”

周恩来又说：“我们完全相信，班禅、阿沛、帕巴拉、计晋美同志都是反帝爱国、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你们也要相信工委的同志是要把西藏搞好，不是去消灭民族、消灭宗教的。”

班禅非常满意，也十分感谢周总理对自己的理解和支持，感谢周总理对西藏人民的关怀，他认为西藏工作从此会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1962年夏天，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谈了阶级斗争的问题，随后又把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他点名批评李维汉说：统战部不抓阶级斗争，搞投降主义。随后，班禅受到批判。

后来班禅才知道，在批评处理他的整个过程中，周恩来总理作了很大努力来保护他。为了使班禅免于遭受更大的冲击和迫害，为了尽量削弱批判的锋芒，周恩来有时不得不讲一些违心的话，对班禅进行“批评教育”。对于周总理的困难处境和一片苦心，班禅大师后来才有了充分理解，因此，他也更加爱戴和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1964年底，周恩来担心班禅大师在西藏会发生意外，在他亲自关照下，让班禅离开拉萨，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常住北京，生活上仍然给予很好的照顾。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中国大地，西藏民族学院等院校的红卫兵来到北京串连，同中央民族学院等首都高校的红卫兵联合揪斗班禅。

周恩来对班禅极力进行了保护。他一再劝阻红卫兵，说对乌兰夫、班禅这样的少数民族领袖人物要加以保护，他们有问题，可以写揭发材料，交给中央；也可以进行背靠背的批判，但不能揪斗。

内蒙古大学的“红卫兵”曾结队到北京，有一天到中南海西门来，要求

揪斗乌兰夫和他的夫人云丽文，我接见他们的头头，转述了周恩来的指示：乌兰夫对内蒙人民的解放事业是有功的，是民族领袖，不能揪斗。有揭发的材料，可送给中央。经说服他们回去了。

8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少数红卫兵违背周总理指示，翻墙而入，擅自闯进班禅住处，抢走班禅，用卡车拉到中央民族学院关押。

周恩来指示统战部部长徐冰和副部长刘述周：共产党员应该坚守岗位，在任何时候也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即使你们自己受到揪斗，也要把班禅保护好。

徐冰、刘述周同周恩来的联络员、卫戍区的解放军一起赶到中央民族学院劝阻红卫兵，徐冰当部长的时间不长，学生们没有认出来，他和解放军一起，将班禅转移走了。刘述周即被红卫兵揪住，说他是“李、徐修正主义司令部的黑干将”、“牛鬼蛇神的保护伞”。在校园里四处游斗，后来又转移到民族印刷厂批斗。为了保护班禅，刘述周吃了不少苦头。

十年动乱期间，周恩来日理万机，昼夜辛劳，由于“左”的错误思想占领导地位，林彪、“四人帮”的疯狂破坏，周恩来的处境也十分困难，加之他的健康日益恶化，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经常惦念和关怀着班禅。不但想方设法保护班禅的安全，而且设法使他恢复自由，重新工作。

“九·一三”事件之后，一大批老干部相继被解放，重新出来工作，周恩来就曾考虑给班禅安排工作，但因遇到各种阻力，未能实现。1974年3月，科威特国民议会议长哈立德·萨利赫·古奈姆和夫人来我国访问，已身患癌症的周总理，听说阿沛·阿旺晋美将陪同他会见科威特客人，特意通知阿沛提前到人大会议，商议班禅问题。周总理提出，应该让班禅出来工作，阿沛当即表示非常赞同，并表示愿意帮助班禅认错过关，尽早出来工作。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国内政治形势和周总理的健康情况，都在日益恶化，周总理的意图再次受阻，未能贯彻。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

班禅大师于1977年10月获释。

班禅出狱后，每逢周恩来的忌日，都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或者在家里祈祷祝福，表现了班禅大师对周恩来的无限敬仰和深切怀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陆续为班禅落实政策，安排工作。1979年7月2日，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班禅被增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0年又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88年4月4日，班禅大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新闻发言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顾这段历史时，满怀激情地说：“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总理的恩情。”

写到这里，使我又想起1975年8月底，周恩来病重时，仍关心西藏工作的感人事迹。当年9月9日，是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党中央、国务院派副总理华国锋率中央代表团到拉萨参加庆祝活动。8月29日晚上，已过12点了，周恩来在医院里接见了华国锋。当面嘱咐他说：你们到了西藏，要多加鼓励在那里工作的各族干部、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他们很辛苦，这几年的工作搞得不错嘛，是很有成绩的。告诉在那里工作的同志们，要特别注意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注意培养民族干部，使大批民族干部尽快成长起来，要搞统一，搞民族大团结，军政、军民和各民族之间，要互相支持，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只有增强团结，才能安定，才能发展经济，才能改善和提高

物质文化生活条件。要注意保护好森林和各种自然资源，要造福于我们子孙后代。华国锋告别周恩来回到家里，又接到周恩来从医院打来的电话，他说：“我看了一部科教片，叫《养蜂促农》，你把它带到西藏去，给那里的同志们看看，让他们多养蜂。不要说是我周恩来送的，就说是国务院送的。”我是代表团秘书长，我们听到这一消息时，都十分感动，深受教育。

周恩来和国务院很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在 50 年代初，国务院就批准在北京建立中央民族学院，在西安建立西北民族学院，在武汉建立中南民族学院，在成都建立西南民族学院，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各种干部，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发挥了重大作用。

关心宗教工作，关怀宗教界人士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就和著名的宗教界爱国人士有密切的联系。建国以后，周恩来一直把宗教问题视为扩大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宗教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曾多次与宗教界人士谈话，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阐明我党的宗教政策，对宗教事业和宗教界人士给予极大的关怀，寄予殷切的希望。周恩来与许多宗教人士交朋友并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从与他们的交往中，充分体现了党的宗教政策。

吴耀宗先生是我国宗教界一位知名人士，在信仰基督教的群众中有很大影响。周恩来与他有过多次交往，并积极团结他为人民的事业而共同工作。

早在1938年5月，吴耀宗因公到武汉第一次与周恩来会晤，这一次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周恩来向吴耀宗分析了抗战形势，论述了国共合作和中国革命问题，而且还向他谈中国共产党对宗教信仰的态度。周恩来着重指出：马列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并愿意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初次见面，周恩来给吴耀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给了他很大的启发。

1941年12月，吴耀宗从上海到四川讲学，在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再次见到周恩来。当时，抗日战争正在进入最紧张的时期，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周恩来在和吴耀宗谈话时，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他指出：抗战已经进行了4年多，只要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团结起来，就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接着又详细阐述了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这次谈话，使吴耀宗进一步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是民族解放的希望。

1943年5月25日，吴耀宗在重庆曾家岩第三次见到了周恩来，这次谈话的时间很长，会见持续了将近一整天。谈话中，周恩来除了详细地分析了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外，再次谈到了宗教问题。

吴耀宗认为，马列主义和基督教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共同点，尽管在根本问题上有分歧，但无关紧要，最后是可以一致的。周恩来听后，坦率地表示，他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并重申了党的宗教政策。他说：“不同的世界观并不妨碍我们为了争取和平、民主而共同努力。你多年来为抗日和民主事业做了不少工作。在目前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对每个人都是考验，希望我们能继续合作，在即将到来的新时期中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不同意见的交流，不仅没有妨碍党和宗教人士的关系，反而加深了互相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中午，周恩来留吴耀宗一起共进午餐。饭后，周恩来亲切地对他说：“我知道你身体不好，你是否愿意略事休息，再继续谈下去？”征得吴先生同意后，就在会客室里，临时搭起了一个铺让他小憩一会儿。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吴耀宗十分感动。

下午，继续长谈时，周恩来详细回顾了党的历史，诚恳地对吴耀宗说：“中国共产党对马列主义的认识也有个发展的过程。共产党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但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得到进步。但愿我们的朋友，不要看到一些问题，就对党丧失信心。”周恩来的热诚、恳切，使吴耀宗深受教育。

这次会见临别时，董必武应吴耀宗的要求，开了一张马列主义的书单给

他，一共 5、6 本，包括《共产党宣言》、《列宁传》。此后多年，他一直珍藏着这张书单和这些革命书籍。

解放后，周恩来对宗教事业和宗教人士更加关怀。建国初期，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制定了党对宗教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它包括：确定宗教信仰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思想意识问题，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切实保障公民信教的自由权利，坚决摒弃用行政命令或其他强制手段消灭宗教的错误想法和做法；清除宗教内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政治势力，支持天主教和基督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反帝爱国行动，支持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废除封建剥削制度等民主改革行动。

吴耀宗在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 10 年间，曾 14 次出国参加世界和平会议。每次出国前，周恩来都在中南海紫光阁亲切接见他，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复杂问题做出判断，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些重要指示成了吴耀宗国外活动的指导原则。

1950 年 5 月，中共中央召开基督教问题座谈会，周恩来亲自找吴耀宗等宗教界人士到中南海作了 3 次长时间的谈话。周恩来听取了反映各地执行宗教政策中的一些问题的汇报，还针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和我国实际情况发表了诚恳的意见。

5 月 2 日座谈会上，女青年会总干事邓裕志谈到女青年会已加入妇联，今秋在印度举行 1 个 6 周的训练会，她已被邀去讲两个题目，一为女青年会劳动部的经验，一为新中国的女青年会，能否前往，她希望周恩来作决定。周恩来表示可以。

男青年会总干事涂羽卿谈到健康教育，从事集体性的游戏时，周恩来指示应注意滑翔及游泳。

男青年会事工组主任刘良模说，我们很认真地帮助大家学习。

周恩来说，教学只可学新民主主义，不要学辩证法唯物论，只有新民主主义是讲得通的，再深了，可以自己研究，不要成为讲座。

周恩来除了在谈话中即席答复一些问题外，最后还作了总结。他指出，中国不是政教合一国家，宗教问题不如欧洲各国那样严重。基督教是靠了不平等条约而来的。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因此，中国人民是反对的。

谈到中国的宗教团体应该怎么办时，周恩来指出：把民族反帝的决心坚持推广下去，让宗教还它的本来面目。宗教思想是唯心主义的，唯心唯物，不同就是不同，不必隐瞒。我们只要求宗教团体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我们不搞反宗教运动。宗教团体本身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要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这样，基督教会就变成中国的基督教会了。

5 月 6 日第二次座谈会上，周恩来在谈话中指出：中国基督教会要成为中国自己的基督教会，必须肃清其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与力量，依照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的精神，提高民族自觉，恢复宗教团体的本来面目，使自己健全起来。宗教界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各宗教之间和各教派之间就应该加强团结，联合起来，研究怎样服务于中国人民。一个宗教团体，对新中国有无益处，要以爱国与民主两个条件来鉴别。

5 月 13 日的座谈会上，周恩来在谈话中指出：你们是有神论者，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无意在这里同诸位展开有神无神的争论。我们认为，唯物论

者同唯心论者，在政治上可以合作，可以共存，应该相互尊重。我们之间有合作之道。这是我们衷心的希望。我们同宗教界朋友的长期合作是有基础的，这一点我们毫不怀疑。我们希望宗教界朋友也有这个信心。这便是所谓“共信不立，互信不生”。当然，我们也不隐讳我们之间的不同点。但是，我们可以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实行合作，这是我们一致同意的。谁要企图人为地把宗教消灭，那是不可能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它还是有宗教的。我们主张，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信教的、不信教的可以共存。我们要团结和照顾各种社会力量，使大家各得其所，同心协力，建设新中国。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安定，稳步前进。

在座谈会上，周恩来对吴耀宗等所拟文件的基本方针是同意的。但对一些问题的提法有些不同意见，他都逐条提出同他们商量，使文件写得更准确。

在这次座谈会上，最后周恩来说，我们是不提倡宗教的，但与宗教合作是符合政策的。人民的认识，是要慢慢地改，我们能不能找出几个解决的典型例子，来示范一下，不是折中，而是正确，应当实事求是，如找出解决房屋占用的办法。一切为了真理，我们把一切都说了，诸位好好再研究一下，大家团结起来，争取主动，解决问题。

关于今后努力的途径，文件将作文字上的修正后，再行公布。

5月20日，周恩来召集中共中央、政务院有关单位负责人对于宗教问题作解释，并通过吴耀宗第五次修正的宣言，将一个字不改地照样发表。

周恩来指出，大家要一致，团结多数，争取中间分子，打击极少反动的，但也不能过早。要不疲倦地工作下去，只有懒惰的人感到束手无策或推卸责任。

由于周恩来的启发和教育，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中国基督教发起了一个“三自（自治、自养、自传）革新”运动，他们将《革新宣言》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宣布坚决割断同帝国主义的关系，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为掩护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宣言》得到了十几万人的签名。中国基督教事业从此得到了新生。事后，吴耀宗回忆说，“周恩来是中国人民尊严和自豪的象征。”“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无不感到一种伟大和平凡浑然溶成一体的魅力。”“在他身上，我看到了能够代表共产党人的一切最优秀的品质。”

周恩来不仅在国内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在国际场合也向世界人民阐述新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1955年4月，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有人误解了我国政府的宗教政策，歪曲说我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周恩来在大会发表讲话中列举许多事实说，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欢迎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实地考察，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作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肩负重任，然而在释迦牟尼像的发型如何设计这样细微的事情上，仍然模范地体现党的宗教政策和国际交往的友好精神。

1956年，杭州灵隐寺重新修建。负责设计释迦牟尼像的华东美术学院将佛家祖师的发型弄成波浪式。灵隐寺的方丈性空和尚根据他的渊博知识，认为佛祖的发型应当是螺旋式的。美院的理由是波浪式具有曲线美，性空和尚的理由则是螺旋式才符合真实和佛教的传统。双方各持己见，争执不下。周恩来知道此事后，毅然支持性空和尚，说：“应当尊重佛教界人士的意见。”事情才算一锤定音。

周恩来不仅在政治上关心宗教界人士，而且在生活问题上也十分关心他们。

赵朴初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1949年他从上海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时，周恩来请大家吃饭。他拿到请帖后，想到这是许多人参加的宴会，不可能照顾个人的饮食习惯，自己是个佛教徒，只好准备吃“肉边菜”了。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在出席宴会签到时，一位工作人员对他说：“赵朴初先生，给您准备了素菜。”周恩来对别人如此细致入微的关心和照顾，使赵朴初十分感动。

赵朴初在文学上有很高的造诣，他的诗词是很有名气的。有一次，周恩来在众人面前指着赵朴初对中国作协负责人说：“作家协会应当吸收他为会员。”过了些日子，在一次宴会上，周恩来一见到赵朴初就问：“你现在参加作协没有？”赵朴初回答：“还没有。”周恩来当即对在场的有关同志说：“你们拿表来，我作介绍人。”事后，夏衍曾羡慕地说：“赵朴初同志很光荣，是总理亲自介绍他参加作协的。”

说起诗词，赵朴初回忆说：“写个人的词，我写得最多的是周总理。总理生前身后我都为他写过不少诗词，第一首是在1967年，有一张大字报转载王力针对总理的讲话，我看后十分气愤，也很难过，当时就发作了心绞痛。病情稍缓，我就写了‘河满子’词。以后又写了一些诗词，使我安慰的是，这些为总理写的作品，都经过邓大姐送给总理看了，而且在不能公开发表的情况下得到广泛传抄。总理逝世，我先后写了几首悼念的诗词。周年时，我写的‘金缕曲’，曾被文艺界以书写和演唱的形式表达哀思。”

周恩来曾对廖承志说过，赵朴初是个难得的人才。但当别人问及这方面的情况时，赵朴初却缄口不谈，只是笼统地说：“我受过总理的批评，也受过总理的鼓励。无论他对我的批评或鼓励，我都是衷心感谢的。周总理每逢称赞一个人时，总是表现出由衷的高兴，仿佛是他自己的得意之作。由此可见周总理的崇高品德。”

赵朴初深有感触地说：“周总理值得怀念的事情太多了！父母之丧3年，留在人们心中的对于周总理的忆念是终身的。”

50年代末60年代初，赵朴初从日本参加一次国际活动回来，周恩来同他谈话时对他的一段话，至今还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周恩来说，同人交往，尽量不要面红耳赤，要做到以情理动人。这是针对当时一些“左”的倾向而言的。赵朴老说，这对他是一个重要的教导。

对于宗教方面的工作，朴老说，周总理是很关心支持的。日理万机的总理，为了宗教政策问题，曾约基督教吴耀宗先生等人谈过3个整夜。他们每次都是晚上走进周总理的办公室，出来时天已经亮了。很多外国宗教界人士来华访问，都受到总理亲自会见。佛牙两次出国，受到缅甸、锡兰两国人民倾城出迎。当时，在我国首都北京和云南傣族地区也都展开了盛大的活动。这些活动都是在周总理高瞻远瞩的伟大气魄支持下进行的。

帕巴拉·格列朗杰是两藏僧俗的领袖人物之一。他从1956年10月到1975年1月，曾20多次见到过周恩来，并多次直接得到周恩来对他苦口婆心的教育，使他万分感动，牢记终生。

1972年春天，帕巴拉到北京治病。有一次到人民大会堂听传达文件报告，坐在会场旁边。传达报告结束后，周恩来看见他，走过来亲切地拉着他的手问道：“你什么时候来的？身体怎么样？有没有事情？”周恩来在百忙中关心着他，使帕巴拉万分感激，急忙回答说：“我一切都好，请总理放心。”尽管他什么困难都没有向周恩来提，但周恩来还是细心地想到了他不懂汉

语,在以后几次传达文件时,周恩来要主管部门派翻译人员坐在他和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旁边,为他们翻译传达的内容。

从周恩来同志身上,宗教界人士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看到了党对宗教人士的尊重和关怀,因此,他们也更加尊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尊重和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华侨、侨眷的贴心人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对海外侨胞、归侨和侨眷一直非常关怀，他满腔热情地关心他们，处处从他们的长远利益和切身问题出发，一个一个地解决侨务政策中的问题。他始终亲自过问侨务工作，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

我国建国初期，据不完全统计，居住在东南亚各国的华侨约有 1000 多万人；他们中有 80% 的人都是在当地出生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都存在着双重国籍的问题，即既有所在国的国籍，又保留着中国国籍。新中国的成立，引起帝国主义和反华势力对我国的仇视，他们想利用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来挑拨华侨所在国与我国的关系，对我国产生疑虑，以便孤立我们，而使华侨受到歧视和迫害。对于华侨这种困难的处境，周恩来总理十分关怀，决心要解决这一邻国之间历史留下来的问题。

1954 年 9 月 23 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华侨的国籍问题是中国过去反动政府始终不加解决的问题，这就使华侨处于困难的境地，并且在过去常常引起中国同有关国家的不和，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我们准备解决这个问题。”

1955 年和 1956 年，周恩来在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等国访问的时候，都阐明我国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精神：我们不主张双重国籍；赞成华侨自愿参加当地国籍，成为居住国的公民，希望他们为居住国作出贡献，并为增进中国人民和居住国人民的友谊而努力。周恩来 1956 年在缅甸华侨欢迎会上说，有些侨胞居留的年代久了，长期生活在这里，取得当地的国籍，就成为缅甸公民了，好不好呢？好。他还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说这好象女儿出嫁或男儿给人招赘，彼此还是亲戚。他又说，这样对侨居国来说，是给他们添丁；对中国来说，是增加一门亲戚，有什么不好呢？他又语重心长地勉励华侨说，凡是自愿保留中国国籍的就应该遵守侨民的地位，做一个好侨民，做一个守法的侨民。他还在一些场合多次声明对自愿保留中国国籍的侨民，我国政府保护他们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对周恩来这些话，华侨和中国血统的外籍人普遍认为合情合理，符合他们的切身利益。这样做，说明中国对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的政策是光明磊落的，是符合实际情况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1955 年 4 月 22 日，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两国总理在万隆会议期间，签订了中、印（尼）两国政府关于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

1956 年，新加坡前首席部长戴维·马歇尔参加新加坡工商考察团来中国访问，10 月 9 日，周恩来单独接见了。马歇尔对周恩来说，新加坡准备独立，但新加坡的华人占新加坡人百分之七十多，关于中国政府对双重国籍问题的态度，人们还有些疑虑。他还指出，这次来中国访问，其中重要问题之一，是要了解中国政府对解决华侨双重国籍的政策。周恩来向他详细说明了中国政府对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原则。马歇尔听后表示赞赏。接见后发表了会谈公报，使新加坡政府和华人了解了中国政府对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政策，消除了他们的疑虑。

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努力下，我国已先后同许多国家谈判解决了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

50 年代，周恩来在国内外多次接见华侨代表，要求华侨尊重侨居国的法律和风俗习惯，不参加所在国的政治活动，搞好同侨居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

关系。他语重心长地叮嘱华侨：“在海外要注意团结，不仅团结侨胞，还要跟所在国家人民团结在一起，跟他们友好相处。要尊重他们。要得到人家尊重，首先要尊重人家。……要提倡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如果发生了一些困难和纠纷，我们应该首先批评自己，这样就会更加团结，就会得到所在国政府和人民的尊重。”

周恩来再三鼓励华侨学习侨居地语言，同当地人民往来，互相学习。加强友好关系。他说，祖国的国际地位越高，侨胞越应该谦虚，他还经常用毛主席的教导教育华侨不要骄傲，不要犯大国主义的错误，他劝导华侨工商业者要搞正当的业务，不要讨不该讨的便宜，不要赚不该赚的钱，以免对不住朋友，对不住亲戚。

1955年4月，周恩来出席亚非会议，在万隆市，华侨们倾城出动热烈欢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得到了华侨们的关怀和保护，华侨们采取了一切措施保护代表团的安全。在万隆华侨欢迎会上，周恩来勉励华侨要巩固和扩大爱国团结，他说，应该把蒋介石分子和受蒋介石欺骗蒙蔽的侨胞分开，对个别蒋介石派来的分子当然应该警惕，但对侨胞中少数受骗者不要一律视为“蒋匪帮”，不要怀疑他们，要向他们耐心说服，蒋介石是没有前途的，受骗的侨胞是会逐渐认清事实的。他希望华侨能多做工作，打破界限，巩固和扩大侨胞的团结，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

建国后不久，很快就在全国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为贯彻保护华侨、归侨、侨眷合法利益的既定政策，制定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处理的优待办法，周恩来做了很细致的调查研究，分别找陈嘉庚、司徒美堂等侨领和华侨集中的广东、福建两省的叶剑英、张鼎丞等负责同志交谈，倾听他们的意见。

1950年11月的一个晚上，周恩来要廖承志、李初梨和彭光涵去研究修改《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草案）》。周恩来听完他们的汇报后说，土地改革是一场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的大革命。大多数华侨是由于在旧中国不堪忍受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无法生活才背井离乡，出走异国的，或者被当作“猪仔”贩到国外的。大多数华侨眷属在土改中会得到好处，他们大多数人会拥护土改的。但估计还有百分之二至四的华侨地主，他们的土地要被没收分配，这些人是不会满意的。如果我们在华侨地主的房屋问题上给以照顾，就会波而不动，这对我们团结国外华侨有好处，而且他们的房子大都是用寄回的侨汇盖的，不是封建剥削得来的，要把这些情况向干部和农民讲清楚。1950年11月6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会议讨论通过并公布了这个政策。后因“左”的思潮干扰，有些地方没有得到认真贯彻，遗留的问题很多，直至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后才重新按周恩来总理审批的《土地改革中对华侨的土地财产处理办法》进行落实，并把没收错了的华侨房子退还原主。

周恩来还非常关心华侨赡家汇款问题，亲自主持制定了正确的侨汇政策。

由于历史原因，解放初期，在广东、福建两省约有六七百万侨眷的家庭生活来源主要依靠海外寄来的侨汇，解放后，允不允许他们靠侨汇生活，这是关系到数百万侨眷的切身问题。有一些受“左”倾思想影响的人，认为归侨和侨眷接受海外亲属的汇款是不劳而获，不允许他们接受侨汇，或者以各种名义侵占他们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周恩来知道这些情况后很生气，立即责成中侨委草拟一个保护侨汇的命令，坚决保护侨眷对侨汇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准任何人侵犯。由于当时货币还不稳定，为了不使华侨吃亏，周恩来

采纳了陈嘉庚先生的建议，指示中国银行对华侨赡家汇款可根据自愿原则采取原币存款，取用时按当时汇率取出人民币。这样就保证了侨汇不受货币贬值的影响。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美国政府下令禁止华侨汇款赡养中国大陆的眷属，其它国家也受美国的影响而限制侨汇金额。为了解决侨眷由于断汇带来的生活困难，周恩来一方面指示财政部拨出专款解救他们的困境；另一方面指示中侨委调动一切可行通道，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沟通侨汇。在国内外有关各界通力合作下，迅速粉碎了帝国主义的封锁，沟通了侨汇通道，解决了侨眷的困难。

全国实行统购统销后，居住在农村的侨眷由于靠生产队分配的粮、油、肉、布的标准比别人少，纷纷要求国外亲属寄粮、油、布、食品等。如何解决这个新问题呢？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根据侨眷的侨汇多少发给侨汇证，按证卖给一定数量的粮、油、肉、布等生活用品；另一种意见则反对发侨汇证；要求中央增拨统购统销物资统筹解决。两种意见报告总理后，周恩来认为管理侨汇是经济工作，必须用经济办法去解决。他立即批准采取发侨汇证的办法，并责成财政和有关部门制定办法和调拨物资。这样，不但解决了侨眷的实际困难，而且也调动了华侨寄侨汇的积极性，减少华侨向国内寄食品的麻烦，方便了华侨，又增加了国家的外汇收入。

在某些国家发生大规模排华逆流时，周恩来下决心派船把无法生活的华侨接运回国并妥善给予安置。他特别指示侨委和有关省政府，要把华侨农场办好。1960年2月，他和一些部长在广州从化学习《政治经济学》后，曾率我们几个人到海南岛兴隆华侨农场参观，鼓励归侨为发展橡胶、胡椒、咖啡、油棕等热带作物多做贡献。在五六十年代，华侨热爱祖国，送子女回国升学，为了使华侨子女能及时考入大学，周恩来指示中侨委大力兴办华侨补习学校。

周恩来很信任广大华侨，也很信任广大归侨。对归侨的所谓“海外关系”，总是具体分析，正确对待。他一再强调对归侨要“一视同仁”，不仅从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在政治上也给予亲切的关怀。周恩来与华侨和归侨民主人士交往中，结识了许多朋友，数十年来，他们亲密无间，互相尊重，互相信赖，成了真正的诤友。华侨领袖陈嘉庚和司徒美堂便是其中的代表。

被毛泽东称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把一生献给爱国兴学，献给救亡大业，献给振兴中华，成为华侨的一代领袖和楷模。

1940年初，陈嘉庚先生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发起号召南洋各筹赈会选派代表，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全国抗日军民。7月21日，陈嘉庚在重庆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虽然他们只见过一面，但周恩来的美名和业绩很早就在侨胞中传颂，周恩来的形象早就深深印在陈嘉庚的心中，他们互相敬重和关怀，都在为挽救危亡而奋斗，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1948年4月30日，党中央发表“五一”口号后，5月4日，华侨首领陈嘉庚代表新加坡120个华侨团体致电毛泽东表示响应。

1949年，毛泽东电请陈嘉庚先生回国共商国是。6月4日，陈嘉庚和庄明理、王雨亭等华侨民主人士到达北平。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等到火车站欢迎。7日晚，周恩来到北京饭店看望陈嘉庚并准备陪他去见毛泽东。一见面周恩来就说：“嘉庚先生，我们又见面了。当年在西安，国民党不让我

们见面，后来我们在重庆还是见到了，不过那时候有特务盯梢。一别10年，现在天下是我们的了。嘉庚先生10年来为抗日所作的贡献、所受的磨难我是知道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是不会忘记的。”陈嘉庚说：“不要让毛主席久等，我们还是早点去吧！”周恩来便陪同陈嘉庚前往香山，和毛泽东、刘少奇一起畅谈。毛泽东对陈嘉庚说：“全国基本解放了，我们要成立新政协，请您来参加，”陈嘉庚说：“我不懂政治，也不会讲话，我不敢接受。”周恩来说：“华侨的首席代表您不当，能请谁来当呢？您德高望重，这又是建国大事。您不懂普通话不要紧，有庄先生翻译嘛！”周恩来对他说，语言不通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翻译来解决，最要紧的是大家的心能够相通。例如我们同蒋介石谈话，语言是完全通的，可是彼此的心不相通，所以双方过去谈判了那么多年，总谈不拢来；我们同世界各国人民，语言很多也不相通，只要有共同目的，彼此心连心，那就什么事情也好讨论协商。大家亲切地交换意见直到深夜。周恩来这些话，使陈嘉庚十分感动，终于打消了自己的顾虑。

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陈嘉庚在会上代表华侨致辞。22日以后历时两个多月，陈嘉庚前往东北、内蒙等地参观，回到北京后，向周恩来兴奋地谈了他的观后感，他得出了“从东北看中国，国家建设的前途是一片光明”的结论。

9月7日，周恩来在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向政协代表作报告时谈到：“陈嘉庚先生这次到东北参观，同时也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他回来后说现在内蒙的汉、蒙二族合作得很好，犹如兄弟一样。这消息我们听了非常高兴，这足以证明我们的民族政策的成功。”

9月21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怀仁堂隆重开幕，陈嘉庚代表华侨在会上讲话，并当选为第一届常委。后又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门参加了开国大典。

陈嘉庚于1950年5月回国，周恩来热情挽留他定居北京，陈嘉庚却惦记着遭受美蒋飞机轰炸的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需要尽快修复，婉言谢绝了周恩来的好意，于9月5日到厦门集美定居。

陈嘉庚十分关心我国的建设，每次到全国各地参观视察回来后，都把发现的问题和应该如何纠正的建议写成书面报告周恩来总理。周恩来仔细阅读，并认真作出批复和处理，凡是有利于国家的事，陈嘉庚同周恩来总是推心置腹，无所不谈。

为了保证集美学校的办学经费，陈嘉庚把自己在上海、厦门和香港开设的集友银行所有股息和红利都全部捐献作为集美学校的校产。1950年8月，陈嘉庚对上海集友银行的邱方坤说：“我这次在北京开会，曾向周总理表示，我不懂政治，不会做政府的工作，不能有所贡献。总理说，今后我们国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外汇资金，他希望我号召华侨多寄侨汇，帮助祖国建设，这就是最好的贡献。我一定按照总理的指示去做，号召华侨多寄侨汇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能够尽力做到的。但要号召别人多寄侨汇，先要从自己做起。我正好打算修复集美学校的校舍和扩建厦门大学的规模，需要很多资金，这主要靠海外亲友筹集，争取侨汇既有利学校建设，又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一举两得。”说着，他拿出一张电报稿，叫邱方坤马上发给他香港的次子陈厥祥，叫他汇一大笔港币到厦门。

1954年，集友银行由于存款偏多，放款偏少，外汇业务下降，经营上略有亏损，陈嘉庚知道后很着急，于12月13日写信给周恩来请求帮助。不久

即接到周恩来复电：“厦门、上海集友银行事，仍继续经营，业务上由国家银行帮助，多分配一部分侨汇与放贷业务，保证集友银行有利可图，不使亏损，多余人员可安置在国家银行。”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厦门、上海集友银行业务蒸蒸日上，年年盈利，集美学校的经费从而有了保证。陈嘉庚对周恩来的关怀和帮助十分感激。

1958年，集美遭受台风袭击，学校百分之八十的校舍受损，陈嘉庚察看了校园，痛心不已，正在为修复校舍发愁时，突然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对集美学校遭灾表示慰问，并告诉陈嘉庚说国务院已决定拨专款80万元修复校舍，对周恩来总理那种雪中送炭般的关怀，又一次使陈嘉庚感动不已。

早在1950年赴京参加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时陈嘉庚就提出福建全省无铁路，交通落后状况急待解决。这一问题受到国家的重视。但因正在进行抗美援朝，一时还无法着手修建。后来陈嘉庚一再写信给毛主席、周总理，要求尽快修建福建铁路。中央曾派王震、彭德怀等先后到厦门实地考察，华东区领导陈毅也大力支持。周恩来为铁路选线等问题多次与陈嘉庚交换意见。1953年7月30日，周恩来还写信给陈嘉庚说，关于选线问题，中央铁道部提出三个方案中，拟采用第三方案（即采纳了陈嘉庚跨集美海峡到厦门的方案），征求陈嘉庚的意见。当陈嘉庚得知国家打算修建福建铁路，并采纳了他的意见时，高兴万分，急着马上要到北京去见周总理。

1954年春，陈嘉庚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又催问此事，毛主席、周总理当面告诉他，已经作出决定，即将动工兴建。在中央的重视和领导下，经过筑路大军的共同努力，福建省第一条铁路鹰厦铁路提前1年竣工，于1956年正式通车。这条铁路的建成，对福建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5年1月下旬，台湾国民党飞机轰炸福州市，烧毁店堂住宅4000多间，陈嘉庚闻讯后，立即发电报给周恩来，要求规划重建福州市，周恩来采纳了陈先生废木屋建新式街巷的建议，为建设现代化的新福州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对陈嘉庚不仅在政治上和事业上给予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在安全和生活上也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1952年，新华社福建分社给总社一份电报中说，美蒋特务最近计划谋害陈嘉庚，以嫁祸于我，破坏“五反”运动。毛主席在电报上批示：“周总理：请指示福建当局加强对陈嘉庚的保护工作，或劝陈来京，如何，请酌处。”周恩来立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作了布置，他再次请陈嘉庚来京定居，但是陈嘉庚为了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建设，再次婉言谢绝了周恩来的好意。于是，周恩来便指示福建省和厦门市政府要绝对保证嘉老的安全，并派驻军协助。

1952年，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两校都在建设，当时，集美海堤还未修建，陈嘉庚每天都要乘坐小木船来回两个工地督促检查，对于一个78岁高龄的老人来说，既不方便又不安全。周恩来知道后，指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拨一艘小交通艇和一辆小轿车给嘉老，嘉老考虑到当时国家还很困难，一直不要，直到1957年几经劝说，才只收下小轿车。

50年代，嘉老患眼疾住进上海华东医院，周恩来亲往医院探望。在周恩来的关照下，1959年，嘉老来京治病，周恩来为他选择了圆恩寺一座清静幽雅、宽敞明亮的四合院，很适合养病。

1961年3月，陈嘉庚因脑溢血病危，周恩来、彭真等先后到嘉老在北京

圆恩寺的寓所探视，指示在场的医护人员采取一切措施抢救和精心护理，并关切地询问陈嘉庚身边的同志：“嘉老病前有什么交代吗？”庄明理这时向总理汇报了陈嘉庚先生这次发病前跟他谈的几件事：一、死后希望运回集美安葬。二、人总要死，死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国家前途。国民党过去做尽坏事，现在逃到台湾去了，还在捣乱，我们应当尽早解放台湾，台湾必须回归祖国。三、集美学校一定要继续办下去。香港集友银行是集美学校校产，每年都有股息和红利。厦门。上海两所集友银行也是校产，它们赚钱不多，只要不亏本就可以，学校要继续办下去。周恩来听完汇报后，立即按照嘉老的心愿相应作了三条指示，庄明理把总理的指示告诉了他，他显露出一丝宽慰的笑容。

6月23日，陈嘉庚病情突然恶化，周恩来闻讯前来探望，只见他双目紧闭，不能说话。周恩来立即召来负责为陈嘉庚治疗的医务人员，指示他们全力抢救。

8月12日，陈嘉庚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8月15日，首都各界举行隆重公祭。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宋庆龄副主席、董必武副主席等送了花圈。周恩来总理亲自担任“陈嘉庚先生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他看到陈嘉庚先生的面部因癌症的侵蚀有些地方变形，就请来整容专家马燕龙为陈嘉庚先生精心整容。周总理与朱德委员长两人亲自为陈嘉庚先生执紼起灵。

陈嘉庚生前曾想盖一所房子供海外归来的子孙居住。但因“集美故乡规划未完成，不能先私后公”而一直没有兴建。周恩来对这位开创华侨兴学先河但却自奉甚俭的爱国老人怀着深深的敬意。为了实现嘉老的遗愿，他指示有关部门拨出专款，于1962年在陈嘉庚陵墓鳌园的斜对面修了一座“归来堂”，供海外赤子归来居住。

美洲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致公党元老司徒美堂先生，自1942年1月在重庆与周恩来晤面后，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经过多年的交往，结下了真挚的情谊。美老从周恩来的身上看到了对海外侨胞关怀在心的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他毅然与蒋介石决裂，拒绝参加伪“国大”，拥护中国共产党，表示“愿以八十有二之老年，为中国解放而努力”。

1949年9月，司徒美堂先生应邀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周恩来考虑美老年高足跛，行路不便，指示大会秘书处特制藤椅，由工作人员抬着他走。美老匆忙自美归来，衣物不足，周恩来又派人带他到前门大栅栏瑞蚨祥，特制水獭领狐皮大衣一件相赠。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使美老引为殊荣，十分感动。在人事安排过程中，周恩来注意照顾到华侨与致公党的代表人物。致公党的陈其尤、陈演生先生当选为第一届政协委员；司徒美堂先生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陈演生当选为政法委员会委员。

政协会议后，经周恩来极力挽留，美老结束了69年的侨居生活，定居北京，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度过了幸福的晚年。

周恩来领导制定和执行的各项侨务政策，解决了许多华侨、归侨和侨眷的实际困难，维护了他们的正当权益，团结了广大海内外华侨，使许多华侨心向祖国，调动了他们参加或支持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发展了人民民主的爱国统一战线。

建设强大的国防

关注解放军的“三化”

周恩来是我党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杰出活动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先驱，卓越的无产阶级战略家、军事家，同时也是我军实现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的主要设计者和组织者。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除长期担任政府总理、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务外，还曾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即使1952年不再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1954年9月以后不再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但作为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仍然分管国防事务，仍是毛泽东主席在军事上的主要助手。有关军队方面的许多事情仍需经过周恩来之手。周恩来对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仍一如战争年代一样的关心，倾注大量心血。建国初期，周恩来就指出：“中国百多年来的历史特别是近二十几年的历史表明：中国一直是帝国主义侵略盗匪的重要目标，因此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不可能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来保护自己。我们必须及时地加强我们的国防建设，并且随时警惕地注视着帝国主义敌人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从全国解放直至70年代中期，周恩来长期主管我国的国防建设事业，和老师们一起时刻关注人民解放军的“三化”建设，将单一步兵逐渐转变为一支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铸造了一支捍卫我国国防的钢铁长城。

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的总人数达540万人，但军队的构成，基本上还是单一的步兵，而且当时军费支出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38.8%，很不适应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为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国家机构所需经费要大量节减”的指示，并决定：“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人民解放军要有步骤地大量减少军队数量。”根据全会精神，周恩来具体抓了军队统一编制、裁减兵员、寓兵于民的工作，他当即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确定：缩小陆军步兵部队，加强海空军及其他特种兵建设，做到复员工作与军队建设并重。拟分两期将540万军队、裁减为300万人左右，第一期于1950年复员140万人，第二期于1951年视情况再复员整编100万到120万人，力争将全军的定额压缩为250万至300万人，这是我军第一次大规模的裁军。为了保证这一艰巨任务的顺利进行，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各级复员委员会（后改称转业建设委员会），中央复员委员会主任由周恩来亲自担任，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任副主任，委员17人，全面领导军队的复员转业和地方安置工作。

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下，中央复员委员会拟定了复员工作大纲，颁布了复员工作条例，对每个复员战士做到妥善安置，各得其所，并注意解决他们的困难。对一些年纪较大、体质较弱的老战士，离队后生活上确有困难，就采取有的转业，有的便留在部队做一些生产管理、看守仓库等工作。在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党对复员军人的关怀和负责精神。后来由于爆发朝鲜战争，1950年6月30日，由毛泽东、周恩来共同签署的中央军委、政务院《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对军队复员计划又作了重大调整，去弱留强，保留战斗骨干，为日后人民志愿军的组建和后备兵源的准备作出了有远见的决策。

在组织实施军队精简复员工作的同时，周恩来还主持和领导了统一全军的编制和海、空军以及其他特种兵的组建工作。当时参考了许多国家军队的

编制，并依据我军的现实情况，确定的方案是：以师为基本独立单位，保持军的指挥机构，撤销兵团和野战军的机构。将野战军指挥机关改为大军区，兵团机构一部分作为建立海军、空军的领导机关。整编后的军、师统归各大军区直接指挥。军、师、团、营、连步兵部队的建制都实行三三制，即个军三个师，一个师三个团，以此类推。对步兵师的总人数，当时规定，有解放台湾任务的部队，人员编多些，其他师一律编一万人左右。全国统一成立省军区、军分区、县（市）人民武装部，负责领导地方武装和民兵工作。

周恩来一直很关注作为武装力量体系之一的人民武装的巩固与发展。解放初期，他多次参加全国民兵工作会议，他指出：“民兵工作做好了，我们的根基就巩固了。”还强调：“民兵是进行人民战争的基本力量”，要为建设一支以复员军人作骨干与我国民兵制度相结合的强大的国防后备力量而奋斗。他要求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都要特别重视民兵工作的建设，因此，从军委到县区均建立了人民武装部，专职负责领导全国的民兵和兵役工作。五六十年代，周恩来还格外关怀全国人防工作的规划和人防工程的建设。他经常强调指出，“我们的战备是全民的战备，人防是全民战备的一部分。”可以说，我国边海防和人防建设的每一项重大成就，都凝聚着周恩来的大量心血。

与部队精简整编工作同步，周恩来领导了我军从单一步兵发展成为一支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的建设。建国初，我军除陆军力所能及地加强了一些火炮、坦克等特种兵部队以外，最早建立的是空军。它是1949年11月以14兵团机关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首任司令员是刘亚楼，政治委员是萧华。海军是1950年4月以12兵团部分机构为基础在北京组建的，首任司令员是萧劲光。之后，从1950年8月至1950年12月，炮兵、装甲兵、防空兵、工程兵等兵种的领导机关也相继建立起来。周恩来作为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对诸军、兵种及其领导机关的建立、确定体制、编制以及人员、物资的调配等等工作，都亲自过问，有的还参与组织实施，如对空军的建设，从指挥机构的组建、飞行人员的培训、购买飞机、修建机场、解决燃料等等，他都作出详尽的指示，并亲自筹划谈判定货、检查落实。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我国空军发展很快，到1950年空军总人数已达几万人，飞机数百架。1951年后，为适应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空军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我空军飞机型号还比较杂，性能也比较落后，飞行员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都比较低。但飞行员大都是从陆军指战员中挑选的，政治素质很好，作战非常勇敢，他们凭着高度的爱国主义觉悟和大无畏的勇敢精神，用落后的装备，同世界空军强国——美国空军交战，并一再创造出辉煌的战绩，涌现出空中优秀指挥员王海，空军战斗英雄张积慧、韩德彩，空中神炮手罗沧海等一批威震长空的英雄人物和立功集体。如1952年2月10日，张积慧将美国空军“特别勇敢善战”的“空中英雄”、王牌飞行员乔治·阿·戴维斯少校驾驶的飞机及其僚机击落，令我们的朋友和敌人都非常惊讶！

1953年以后，中央决定加快海军建设的步伐，周恩来又多次前往海军视察，对海军建设的长远规划和近期任务都作了重要指示，诸如购买舰艇、基地港口建设、人员培训、团结改造起义过来的人员等等，与海军领导同志，政务院有关负责同志作过多次研究安排。对新组建的炮兵、装甲兵、防空兵、工程兵、铁道兵建设规划，周恩来也都作过具体指导和审定。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我军便由几乎是单一的步兵，发展成为一支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

并在抗美援朝战争和保卫边海防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早日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从1949年起，全军就为开展正规化训练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并大办院校，加速对军队干部的培训。

1950年7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会议，研究了军队学校的建设问题。会议确定在战争年代原有学校的基础上，改建和新建一批适应现代化战争条件下的各类正规学校，各军兵种要新建一批各级专业学校；全军要创办一所综合性的陆军大学（后根据刘伯承的建议，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同年10月27日，刘伯承奉命进京，主持军事学院的筹建工作。当刘伯承一抵京后，周恩来就约见了。并先后三次同刘伯承和陆军大学筹委会的成员，就成立陆大的重要意义、办学方针、校名、校址、学校的编制、领导干部的配备、临时党委的组成和聘请苏联专家、启用旧军官任教等一系列办校的具体问题，进行详尽的研究。

大家都知道，大革命时期，周恩来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对办军校很有经验。为了适应我军干部文化低这个历史造成的状况，他特别强调要搞好文化和科学知识的基础教育。他指出：陆军大学的办校方针仍应遵循毛泽东主席确定的延安抗大总校的教育方针；要注意在人民解放军传统的基础上，总结我军的经验，学习苏联军队的先进经验；要重视实践，我军高级指挥员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要叫他们“献宝”，把好的经验谈出来；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教学活动，要多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不要用灌注式的方法。周恩来还提出，在5年内，把全军的师以上干部轮训一遍。

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1951年1月15日，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正式成立。随后，根据周恩来主持制定，经毛泽东批准的增建院校方案，又先后组建了军事工程学院、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海军学院、空军学院、炮兵学院、装甲兵学院；并将各战略区的军政大学、军政干校和各部队的随营学校，改建为5所高级步兵学校、24所初级步兵学校和一批专业技术学校。从而使全军院校形成了具有初、中、高级相衔接，诸军兵种院校齐全的、完整的培训军官体系。为了选拔优秀人才进军事院校学习，在周恩来主持下，政务院发出关于各种军事干部学校招收学生的决定。规定军委所属各种军事学校，可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招收一批学生和青年工人入学，1950年和1951年，分期选送84700名学生和6300名青年工人入军事院校学习。

周恩来还十分重视部队的训练，他坚决贯彻毛泽东关于“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胜仗”的指示，强调要从实战需要出发，严格训练部队。在他的关心下，全军从1953年6月起，开展了统一的正规训练。周恩来虽然工作极其繁忙，但仍抽出时间视察部队的训练，鼓励广大指战员像战争年代一样，吃大苦、耐大劳，攻克训练中的新课题，攀登新高峰。1958年夏，华北地区连降暴雨，洪水冲垮了郑州黄河铁路大桥。周恩来为了在实践中检验和锻炼部队，命令工程兵部队开赴现场，架设浮桥。他自己也冒着酷暑，蹚着齐腰深的水，带领部队的负责同志察看地形，指挥架桥。因为部队平时训练机械地搬用苏军的经验，严重脱离实际，第一次架桥未能成功。干部战士心情沉重。正在这时，周恩来又第二次赶到现场。深夜了还在河边召开现场会议，同大家一起分析架桥失败的原因，研究改进的方法。他意味深长地说：解放战争时期一夜之间，我们百万大军就渡过长江；第二野战军挺进大

别山，在黄河上也架过桥，而且是两座，坦克也过去了，为什么过去能架，军队装备现代化了，反而架不起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装备到训练都不适合中国的情况。学习的教材是外国的，装备也是从外国进口的，不是根据中国江河特点设计的。经验告诉我们：部队训练一定要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教条主义会害死人的。他鼓励大家不要泄气，要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从实践中锻炼提高，并具体提出克服困难的方法：首先将黄河水性摸熟，要求教于长年生活在水上的老艄公；要发动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多开几次诸葛亮会；只要以我为主，自力更生，在实践中练兵、实验，就一定会战胜黄河。周总理铿锵有力的声音，使指战员的思想豁然开朗，增强了战胜水患的勇气和信心。终于群策群力，用土办法，在波浪汹涌的黄河上架起了一座木结构浮桥。在大家欢庆胜利的时刻，周恩来第三次来到现场，兴奋地带领大家从桥上走过，并叮嘱大家要好好总结经验。

1963年，我国自制的第一艘万吨级的远洋货轮“跃进号”在驶往日本途中，于韩国济州岛以南海域沉没。当时不少人，包括脱险的船员都认为是敌人水雷炸沉的。周恩来听取了各方面的汇报后，初步判断：“我看是一起责任事故，但也不排除敌人破坏的可能。”为了弄清事实真相，锻炼部队，决定由海军组织一次深海潜水实地勘察。当时，日本与韩国同我均无外交关系，而韩国对我仍持敌对状态。我海军成立后，也从未进行过深海水下作业。周恩来亲临东海舰队某部，组织指挥这一艰巨的海上执勤任务。他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多次审查作业方案，反复检查各项准备工作，对每一个细小环节都不放过。从敌情、友情的分析和军事、外交以及航海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到出海力量的配备、指挥干部的选择、通信联络、水下作业、后勤保障，都作了周密安排。并亲临潜水员在增减压试验舱中演练的现场，直到有了十分把握后，才批准出海。作业期间，随时听取前方的报告，直至胜利完成调查任务。结果证明：周恩来的判断是正确的。“跃进号”货轮是触“苏岩礁”沉没的。这次出海调查，对海军是一次极有意义的锻炼和提高。同一年，他在接见空军作战有功人员时，强调“飞行员

要多飞、多练”。他说：“飞行像打乒乓球一样，像写字一样，像骑自行车一样，不经常练，技术就会生疏起来。”1966年6月，周恩来视察第二炮兵某发射场，要求二炮领导干部要很好地学习，尽快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带领部队在各种气候、各种环境条件下，从实、从严、从难训练部队，切实注意培养技术骨干。这些指示，在当时对端正部队训练方向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为了加速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周恩来非常重视军队各种条令、条例的制定。他曾形象地说：“解放军像一部大机器，这个齿轮和那个齿轮必须准确地运行，才能真正地协同动作。条令、条例就是保证正规化的根本条件之一。”在他的领导下，从1950年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开始着手军队各种条令、条例的制定工作。到1955年，我军相继颁布并实行了暂行步兵操典、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兵役法、军官服役条例、军衔条例等等。对这些条令、条例的编写，周恩来都格外关心，并亲自审定，督促尽快颁布实行。在贯彻实施中，他还抓住典型事例，加以引导，推动部队正规化建设。

那是50年代的一天，周恩来到西郊机场欢送外国元首离京，前往送行的还有罗瑞卿、刘亚楼等高级将领。当时恰巧有场足球赛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

是中国队对印尼队。而这些高级将领中有不少球迷，当外国元首刚刚走进机舱，早已心痒痒的“球迷”们，便有人迫不及待地往机场门口走。

周恩来发现了这一情况后，不喊不叫，只让秘书到门口，吩咐警卫不许放人走，并招呼“球迷”们都回去。

待飞机起飞在机场上空绕一圈后离去，周恩来与前来送行的外交使节告别后，才对这些将领们说：“你们学过步兵条例没有？步兵条例里哪一条规定，总理没有走，你们就可以走了？你们当将军能这样？在部队里，首长没有走，下边全走了，行吗？”他严厉地批评说：“你们颁布的条令，自己就不遵守，迎宾工作尚未结束。我还没有离开，你们一个个就懒散地走了，这样影响多不好，军队还要条令干嘛？”

通过这一事例，许多高级将领都深有体会，都说周总理是执行条令、条例的模范，因此，军队干部也都能身体力行，我军各项条令、条例很快得到贯彻和实施，部队很快走上正规化轨道。

在抓好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同时，周恩来时时关注着我军的革命化建设。1957年12月24日，周恩来针对当时部队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陆海空军军官大会上。作了《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的重要讲话。讲话指出：如果丧失了对敌人的警惕，就不能成为一个军人，尤其不能成为一个革命军人。军队如果没有党的领导，要使它成为一支既有高度军事素养，又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军队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保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因此，对国家建设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措施都应该关心，有的要争取直接参加，我们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应该保持与发扬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工作、打仗要强调按级服从，平时互相交往应该有同志式的友爱，像兄弟一样，不必过分拘泥于形式。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完全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子弟兵，我们是从人民中来的，我们过去的胜利都是在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不能忘本。军队要参加工厂和农村的生产劳动，帮助人民群众生产，进一步加强劳动观念和群众观念，使人民看到今天的解放军还是当年的子弟兵，还是抗美援朝时期“最可爱的人”，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个讲话，在30多年后的今天读起来，仍倍感亲切，深受教育。它对新时期加强我军的革命化建设起了重要指导作用，在今后仍具有带根本性的长远的指导意义。周恩来非常重视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军，要求全军指战员要联系自己思想和工作实际，很好学习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不断提高政治理论水平。他很重视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热情地赞扬我军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人物。号召全军学习雷锋“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以提高全军指战员的思想政治觉悟。

周恩来不仅经常教育我军官兵，要关心和参加国家建设，关心爱护和保卫人民群众利益，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不能脱离群众，而且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1951年3月，黄河河套一带冰凌泛滥，为50年来最大的一次，周恩来亲自召开会议，命令空军派飞机炸冰，使米仓、包头、萨拉齐等地区的群众和100多万亩农田免遭冰凌洪水危害。1956年1月，渤海遭到百年罕见的寒流，海湾结冰，冰层从岸边逐渐扩展到山东、辽东半岛之间，天津港外100多艘国内外商船被冰层围困，耸立在海上的石油井架随时有被撞塌的危险。周恩来马上约集有关部门汇报研究，将这项紧急的破冰抢险、打通渤海航道的任务交给海军去完成。海军立即出动，派出

北海舰队所属的拖轮和海上救生船以及其他特种船只参加抢救。经过海军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化险为夷，完成周恩来交待的任务。1966年3月8日夜，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损失。周恩来立即命令当地驻军连夜出动，赶赴灾区救死扶伤，抢险救灾。第二天拂晓，他不顾频繁的余震，亲自赶到重灾区，逐村察看灾情，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慰问伤员。情真意切，关怀备至，感动得灾区的父老乡亲们痛哭流涕。他一边察看灾情，一边下达命令，以最快速度从各地调运物资，抽调医务人员，让伤员及时得到救治，让没饭吃的群众立即吃上饭，没住处的群众住上帐篷。每到一地，与县、社干部一起研究如何生产自救，重建家园的问题。随后，指定部队组织了万人宣传队深入灾区，慰问灾民，帮助当地政府和群众战胜灾害，恢复生产。周恩来生前视察陕北时，看到群众至今仍赶着毛驴到很远的地方驮水吃，心情非常沉重，指示部队一定要找到地下水，切实帮助老区人民解决吃水的困难。解放军某部为实现周总理的遗愿，转战27个市县，经过8年的努力，初步查清了陕北1万多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地下水资源，为人民群众打井252眼，总涌水量每日达7.5万吨。陕北老区的人民深情地感谢党的关怀和子弟兵的帮助。他们说：当年毛主席、朱总司令带领中央和总部机关工作人员为我们开凿幸福渠，今天周总理又派解放军帮助我们打出幸福井！周总理如能看到我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他会含笑九泉的。周恩来就是这样，通过一些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事例，依靠军队，教育军队，在实现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进程中，不断地提高部队政治素质和加强部队革命化的建设，同时也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

和平解放西藏

正当我军向全国胜利进军，国民党反动派即将覆灭的时候，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西藏的阳谋活动。他们策动西藏上层以达扎摄政为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中的少数亲帝分裂分子，与英属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黎卡逊（英国人）暗中勾结，趁人民解放军尚未到来，而国民党政权又面临崩溃之时，积极策划“西藏独立”，妄图使西藏脱离祖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针对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和西藏民族特点，党中央决定：对西藏实行和平解放的方针。中央人民政府发出通知：要求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与此同时，同意康、藏、青海等地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在藏族人民中有崇高威望的宗教界人士格达活佛、夏日仓活佛等人前往拉萨，斡旋和平，并责成我第二野战军一部作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而西藏地方政府错误估计形势，坚持其分裂、反共立场，玩弄“真备战、假和谈”的花招。一方面增设和加强其应变机构，指使它派出的和谈代表滞留国外；同时，策动“驱汉事件”，组织什么“亲善使团”向帝国主义表演要求独立的傀儡剧；杀害满怀赤诚劝和的格达活佛，软禁了夏日仓活佛等人。另一方面，西藏地方政府加紧从英、美购买武器，扩充军队，将藏军 14 个代本（相当于团）扩充为 17 个代本，并将其主力 8 个代本 4500 人及民兵 3500 人部署于以昌都为中心的金沙江一线，妄图扼住我军进藏的咽喉，凭借金沙江天险，以武力阻挡人民解放军和平进军西藏。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是我们伟大祖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绝不允许任何外国侵略。针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行径，毛泽东主席在出访苏联途经满洲里时，作出了“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的决策。党中央决定：以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为主，在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配合下，于 1950 年 4 月开始组织向西藏进军。1950 年春，第二野战军第 18 军的先遣支队，开始了向西藏进军。中共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和初步掌握的康藏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项政策，包括人民解放军入藏之后，保护西藏全体僧侣人民的生命财产；保障西藏全体人民之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帮助西藏人民开展教育和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对于西藏现代政治制度及军事制度不予变更等主要内容。这十项政策既是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也是和平谈判的基本条件。进藏部队坚决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和西南局的十项政策行事，增进了汉藏民族间的团结，他们称赞人民解放军为“新汉人”。但西藏反动当局对以上情况视而不见，决心以武力阻挠解放军进藏。我军被迫于 1950 年 10 月 6 日发起昌都战役，经过 18 天的急行军，英勇作战，一举歼灭了藏军 3 个代本全部、4 个代本大部，争取一个代本起义，共歼敌 5738 人，于 10 月 19 日解放康藏重镇昌都。昌都战役的胜利，使西藏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妄图发动一场旨在分裂祖国的所谓国际性的宗教民族战争的阴谋成为泡影，西藏上层集团也急剧分化。西藏地方政府不得不派代表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举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党中央十分重视和关心这场谈判，毛泽东亲自接见西藏全体代表，周恩来设宴欢迎，与李维汉一道自始至终组织主持了这场谈判，终于圆满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根据协议，我军于 1951 年底前进驻拉萨、日喀则、江孜、亚东和阿里地区，将五星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上。

抗美援朝的后方总指挥

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战争骤然爆发。接着，美军公然入侵朝鲜，并派美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侵占我国领土台湾。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美军参加朝鲜作战；7月2日，在釜山登陆。7月7日，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组成以美军为主有16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军”，扩大侵略战争。朝鲜和中国毗邻，只隔着鸭绿江和图们江。美国对朝鲜的侵略，无疑威胁着中国的安全。

7月7日，中央军委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保卫国防的会议。周恩来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和成立东北边防军，以加强东北边防，准备万一时出国作战的指示。随后，提出了东北边防军所辖部队人数、指挥机构、指挥人选、部署调整、车运计划、后勤保证，以及到达鸭绿江附近集结时间的初步方案。经过与会人员酝酿讨论，大家一致拥护成立东北边防军和屯兵鸭绿江畔的战略决策，并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8月23日，周恩来从总参作战局了解到美军有可能在仁川等地登陆的企图，认为这是朝鲜战局最关键性的问题，很值得重视，立即报告毛泽东，引起了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重视。8月26日，周恩来召集了第二次保卫国防会议。根据朝鲜局势的发展，他着重指出：朝鲜战争已经成了世界、至少是东方局势的焦点。经过两个月作战，证明朝方原来设想一鼓而下，把美李（承晚）军赶下海去，很快解放朝鲜半岛是不可能了。根据多方面情况判断，美军很可能要在仁川登陆，如果实现，在洛东江前线的朝鲜人民军势必要向后撤，要准备在长期战争中进行复杂艰苦的斗争。现在看来，最后歼灭入侵美军的任务，势必要落在我们肩上。我们东北边防军必须在9月底以前做好一切作战准备。会后，我东北边防军指挥机关，根据会议精神，加紧了各项准备工作，做到一声令下，立即出动。

果然不出所料，9月15日凌晨6时，美军在麦克阿瑟亲自指挥下，集中陆海空军精锐7万余人，在仁川登陆。会同正面进攻的美李伪军疯狂北犯。为了阻止战争扩大化的危险，周恩来于9月30日再次严正指出：“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为了引起美方重视，10月3日凌晨，周恩来紧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印度政府转告美国：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但美国军队首脑却把我国的严正声明视为恫吓，置若罔闻，美李军于10月上旬先后越过三八线，加速向北推进。

1950年国庆节后，毛泽东多次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和军委扩大会议，反复征求各方面意见，反复权衡各方面的利害得失。当时大家都看到：我们建国不久，国内尚有上百万残匪有待肃清；台湾、西藏尚未解放；经济上更是百废待兴，亟需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而且从民心来说，也希望和平；从中美双方的力量对比看，美军处于优势，我处于劣势。这都是我们参战的不利条件，

而已在社会上、党内都有害怕出兵、反对出兵的意见。如林彪就不赞成出兵，如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计，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

周恩来在会上坚持毛泽东提出的出兵朝鲜的方针，严肃地批评了林彪。他说：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美国逼着我们非打不可。中朝两国是长期友好邻邦，本世纪初，日本侵占了朝鲜以后，许多朝鲜革命者来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长期并肩战斗。解放战争期间，有数万在华的朝鲜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时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革命政权曾给予我国东北解放区以多方面的帮助。的确如毛主席讲的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灿烂的五星红旗上，染有朝鲜革命烈士的鲜血。现在朝鲜面临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无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从军事上说，积极进攻是更好的防御……我们鸭绿江1000多里防线，需要多少部队防守？……既然早晚要打，我看还是早打为好；既然美国决定从朝鲜、台湾和越南三个主要方向进攻中国，那我看，我们还是选择朝鲜为好，理由是朝鲜北方多山地，对美军机械化行动不利，便于我军打运动战，而且朝鲜与苏联接壤，也便于我们获得苏联的援助。

10月4日，从西北匆忙赶来的彭德怀，在会上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可是，如让美军占领朝鲜半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毛泽东针对在出兵问题上持不同意见者，强调指出：我国和朝鲜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唇亡齿寒，不论就国际主义来说，还是就爱国主义来说，我们都不能见死不救。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有个光荣传统和美德，就是“见义勇为”，“舍己救人”，我们应该发扬它。进一步统一思想后，会上决定：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中朝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准备出兵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10月8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助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这天，应斯大林之邀，党中央派周恩来秘密去苏联，商谈出兵和援助问题，希望得到苏联方面的空中掩护及武器弹药方面的援助。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在彭德怀统率下，从安东（现丹东）、长甸河口、辑安等地跨过鸭绿江，奔赴抗美援朝战场，与朝鲜军民一道同侵略者作战。

为了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周恩来又像战争年代一样，挑起协助毛泽东组织指挥这次战争的重任。建国之初，中共中央还没有设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是领导核心，书记大权总揽。毛泽东主要抓中心问题，具体事务全交周恩来负责处理。从志愿军的编组、干部配备、武器装备调拨、兵员补充，到军工生产、交通运输、后勤保障、争取外援、新闻报道等等，他都要亲自过问，亲自组织安排。在那段时间里，每天经过他批阅的文电就有一二百份，而且所有前方来电都是首先由周恩来审阅定夺。遇有重大情况，他要亲自到总参谋部作战室听取汇报，分析形势，掌握战况，为毛泽东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并根据中央的决策，起草和部署前线部队的军事行动。而耗费他精力最多的，是组织指挥和维护战区的交通运输和后勤保障，在敌机疯狂轰炸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克服重重困难，及时把朝鲜战场所需要的大量物资和兵员源源不断地送上前线，保证了战争的急需。

与此同时，还要解决当时国内存在的崇美、恐美的思想；与民主人士谈

话，通报情况，统一思想，合力对敌。周恩来就是这样整天忙个不停，西花厅总理办公室许多高级官员进进出出，周恩来每天都接待很多人，毛泽东也说：“你那里是轴心。”后来，朝鲜战争进入一面打一面谈判阶段。党中央派富有谈判经验的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驻开城与北京热线联系。上午谈判，下午将谈判情况汇总，报到北京，北京当天研究第二天的发言及斗争策略，由当时政务院总理办公室起草发言稿，交周恩来连夜审阅修改呈毛泽东审定后转发开城。李克农接到后，组织负责谈判人员领会精神，指挥前台进行谈判。在什么问题上据理力争，在什么问题上可以妥协让步，都是按着周恩来的指示进行的。周恩来经常要和第一线通电话，了解最新情况，作出最新指示。那时的电话线路不好，又没扩音设备，不易听清，周恩来扯破嗓子喊，每次打完电话都累得一身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周恩来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长和指导谈判的决策人。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前方是彭德怀总指挥，后方具体事宜是周恩来总揽一切。谁也说不清花费了他多少心血和精力。周恩来因劳累过度，曾一度患病，仍不肯休息。毛泽东知道后，要他离京休息一段时间。他到大连仅休息了很短时间，又回北京投入紧张的工作了。

为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党中央确定志愿军出国作战，要自力更生，立足于国内供应的方针。周恩来坚决贯彻了这一方针。1951年1月，东北军区召开后勤会议，研究志愿军后勤保障问题。周恩来和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一道赶赴沈阳，听取汇报，解决问题。在会议上，周恩来特别强调战争的持久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为了保障作战物资源源供给，周恩来亲自过问铁路安全和公路、车站、码头等安全问题，要求在漫长的运输线上，普遍建立交通岗、防空哨，部署高炮部队和机动抢修力量，建立起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根据作战部队反映，我军被服不适于爬山、钻林子，周恩来当即指示：将大盖帽改换解放帽，将棉衣轧上紵线。当了解到前线战士因敌机轰炸和战斗频繁吃不上饭时，他立即责成政务院向一些省、市布置，发动群众炒面、炒米供应前线。中央和北京市的各机关都分担了任务。周恩来回到北京后，他还亲自到北京市的一些基层单位视察，同大家一起动手炒面。为了鼓舞士气，勉励后方人民参军、参战，举国上下开展了大规模慰问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活动。从而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爱国主义思想，掀起了支援前线和大生产的热潮。后方军民的热情支援，极大地激励了前方将士杀敌立功、报效祖国的决心和斗志。

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正义之师，在朝鲜军民的全力支持下，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接连发起5次战役，将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军及其帮凶的军队，从鸭绿江边打回三八线以南地域，歼敌20余万，缴获和击毁飞机、大炮、坦克等一大批重型武器，大长了中朝人民的志气，大煞了帝国主义的威风。1951年7月10日，美国侵略者被迫同意在开城举行停战谈判，周恩来亲自掌握谈判的进行。本着“能战方能言和”的思想，“争取和平，但也不怕战争，立足于打，以打促谈”的谈判方针，采取了“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谋略，粉碎了美国种种破坏谈判的阴谋。谈判开始后，美方代表无理提出将军事分界线划在我军阵地的后方，妄图不战而获取朝鲜120平方公里的土地。当遭到我严词驳斥后，竟又狂妄叫嚣“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的军事威胁。接着，对我发动了所谓有限目的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我军坚决还击，在夏、秋两季防御作战中，歼敌15.7万余人，将战

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迫敌不得不于10月25日恢复停战谈判。而敌人并不甘心失败，为取得谈判的有利地位，以大量航空兵对朝鲜北部铁路干线及交通枢纽实施长时期的“绞杀战”和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中朝军民于1952年9月18日，向敌发起全线性的战术反击作战。10月14日，举行了闻名中外的上甘岭战役。经过43天的激战，共歼敌2.5万余人，创造了我军依托坚固阵地——坑道工事进行坚守防御战役的光辉范例。

1953年6月中旬，停战谈判各项协议均已达成，正待签字之际，李承晚集团无理扣留我方战俘，并叫嚣要单独干下去，继续北进，公开反对实现停战。我志愿军为狠狠教训李承晚集团，密切配合停战谈判，打掉敌人伸向三八线的突出部，拉直金城以南战线。于7月10日发起了金城战役，歼敌7.8万余人，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迫使敌人向我方作出实施停战协定的保证。朝鲜的停战谈判历时两年之久，就这样经过谈谈停停，边打边谈的较量，最后以敌人的失败告终。美帝国主义被迫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正式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至此，朝鲜战争宣告结束。从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的37个月里。中朝军队共歼敌109.3万余人（其中美军39.7万余人）；击落击伤和缴获敌机12224架，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军坦克3064辆，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军各种炮7695门，击沉击伤敌军舰艇257艘。美军几易其帅；开支战费830亿美元。当时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承认：“美国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朝鲜停战后，中朝方面一再提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建议，但都遭到美国政府的无理拒绝。1958年2月5日，朝鲜政府再次发表声明，要求从南北朝鲜同时撤出一切外国军队。中国政府坚决支持，志愿军总部于1958年2月20日发表声明：决定于1958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说到做到，我人民志愿军从1958年3月15日至10月26日，分三批全部撤离朝鲜回国。

当杨勇上将和王平上将率领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周恩来怀着喜悦的心情到北京火车站迎接。当时我刚刚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陪着周恩来来到火车站去。看到他非常激动，大步走向杨勇，说：“你为抗美援朝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原来，正当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全部协议，准备签字时，李承晚竟公然破坏协议，叫嚣要单独向鸭绿江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进攻。于是我志愿军决定严惩一下李承晚。这时，毛泽东在沉思让谁去朝鲜唱“末台戏”呢？周恩来提出：“让杨勇去，让‘三杨，开台（三羊开泰）嘛！”由于种种原因，杨得志、杨成武先期赴朝“开台”，而杨勇未能如愿。这时经周恩来一提，毛泽东当即决定调任杨勇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1953年5月11日，杨勇赴朝任职。杨勇一上任，便冒着敌炮火，深入前沿了解地形、敌情，在志愿军总部的指导下，精心制定了“金城战役”计划。这一仗，是杨勇戎马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促使美李军在停战协议上正式签字。因此，周恩来说杨勇画了个完美的句号。

为庆贺抗美援朝的胜利，为表示欢迎和慰问志愿军将士们凯旋归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宴请志愿军指战员的代表。那天，周恩来特别高兴，一开始他就满怀激情地说，“今天我们都很高兴，要请大家喝庆功酒。要动真格的，喝我国的名酒——贵州茅台。”

是啊，抗美援朝终于胜利结束了，志愿军都凯旋而归，和过去打败过蒋介石，打败过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又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的老战友在一起，周

恩来怎么能不高兴呢？于是他频频举杯，欢庆中朝人民的伟大胜利。那天，谁也没数周恩来喝了多少杯酒，反正出席宴会的所有志愿军代表，都和他碰过杯。在这样的场合，我和卫士长成元功虽然担心总理喝醉，但谁都不敢也不应该去劝阻他，只有在旁边注视着他，也分享他的欢乐。当总理高兴地喝完最后一杯酒想回到座位上时，我看他的身子有点摇晃，我和卫士们赶上前去；知道他醉了，赶快扶他到休息室。代表们都满足了，高兴了，周恩来把欢乐送给了大家，自己却醉卧了一天。尽管酒后他自责影响了工作，但大家都觉得周恩来更可亲，更可敬，更可爱，他是真正有情、有义、有最丰富感情的人。在我的经历中，看过周恩来醉酒，这是一次。还有一次是1938年在武汉，那时国共关系比较融洽，国民党有一些高级官员、将领和周恩来很熟，部分留学苏俄的国民党人士如邵力子、张冲、康泽等以“留俄同学会”名义请王明、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喝酒。那次周恩来高兴也喝醉了，当晚就住在郭沫若家，没回长江局住处。就这事，邓大姐还批评他违反纪律。周恩来也作了检讨。周恩来喝酒不是在什么场合都乱喝的，决没有像有的人写的那样和他的下级随便斗酒。

指挥金门炮战，加强边、海、空防

1958年，我调任总理办公室主任不久，总理办公室又骤然繁忙紧张起来。原来，周恩来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决策，亲自组织领导了一场中外奇观的战争——金门炮战。

新中国成立后，美帝同主义一直在策划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1950年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同时，美国就以武力侵占台湾，使台湾问题复杂化。后来又同蒋介石集团签定了《共同防御条约》，企图把台湾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固定化。

当然，中国人民不会让美国的阴谋得逞。为了在国际上戳破美国分裂中国的阴谋，195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严正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军。当时，党中央的斗争方针是：一要斗争，二要讲策略。中央军委采取了“既慎重，又不示弱”的斗争态度，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因此，确保了既不扩大战争，又达到了预期的战略目的。1955年4月，在印尼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曾就台湾问题发表声明，提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迫使美国不得不同意用谈判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但是由于美方缺乏诚意，谈了3年，毫无结果。1957年底，谈判中断。这预示着美国准备进一步在该地区制造紧张局势，对中国的和平建设形成严重威胁。在这之后，毛泽东一直在寻找机会，使台湾问题引起世界关注，逼美回到谈判桌上来。

机会终于来了。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人民发动革命，推翻旧统治集团。而美国却悍然出兵黎巴嫩，苏联也作出强烈反映。中东局势骤然紧张，一时成为世界矛盾的新焦点。世界进步舆论都在声援中东人民的反侵略战争。与此同时，美国又于7月15日，宣布其远东地区陆海空军进入戒备状态，并积极支持蒋介石向大陆沿海地区骚扰，以加剧远东紧张局势。这时，毛泽东抓住了这个时机，提出台湾问题，把台湾问题同支持中东人民反美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两个地区的斗争，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为后盾。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压力下，美国不得不同意我国恢复谈判。为了促进事态的发展，在军事上，我们还考虑再次给蒋军以痛击，造成声势，引美入瓮，并选择了靠近大陆不足10公里的金门岛为目标。

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炮击金门，是有奥妙在其中的，它的用意是“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即针对美国划峡而治、分裂中国的阴谋，我们用炮火把台、澎、金、马与大陆联在一起，“帮助蒋介石守好金门”，以加深美蒋之间的矛盾，共同维护一个中国的局面，以备今后解决台湾问题。

炮击金门，是毛泽东决策、周恩来指挥的。毛泽东后来也谈到：“金、马局势那么严重，每个环节都是我和总理搞的。”从1958年7月中旬到8月中旬，毛泽东和周恩来为打金门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常常为了如何打击美国的侵略，惩罚台湾当局，频繁地与周恩来商讨。而周恩来则为具体指挥这一战役，运筹帷幄，调兵遣将，在短短的一个月里，他和总参谋部完成了空军6个歼击机团和一艘舰艇的紧急转场，调1个炮兵师和1个坦克团入闽集结，并迅速展开，待机而动，约见了许多高级将领，讨论战局的实施细节。

一切准备完毕。8月23日，即联合国大会紧急会议讨论通过阿拉伯各国要求美国从中东撤军提案的第二天，毛泽东下令：对金门实施大规模炮击。23日17时30分，我福建前线部队近500门大炮一起开火，不到一个小时打了两万多发炮弹，岛上蒋军遭此突然袭击，损失惨重。金门和澎湖防区的蒋军3名中将副司令赵家驷、吉星文、刘明奎在隆隆的炮声中被击毙，国民党“国防部长”俞大维头部和手臂也被炸伤。这次炮战还击沉、击伤敌大型运输舰各一艘，使台湾对金门的海运一度中断。在我军炮击和封锁金门10天之后，毛泽东又命令停止炮击3天，以观各方动态。

原来，这是毛泽东匠心独运的体现。因为美国从中东撤军的提案通过后，中东局势将缓和下来，这样国际关注的热点就会转向台湾地区，有助于中国人民的斗争。果然不出所料，炮击金门后，美国政府摸不清我军的意图，表现十分惶恐，立即从地中海、日本、菲律宾等地调遣舰队和飞机集结于台湾海峡。4天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居然说美国将不放弃他已经承担的、以武力阻止解放台湾的责任，并授权同务卿杜勒斯于9月4日发表声明，公开威胁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侵略范围扩大到金门、马祖列岛。但是，杜勒斯的声明除获得韩国李承晚集团响应外，几乎所有国家都不赞成美国的做法。美国内舆论反映冷淡，甚至像赫尔利那样敌视中国的人都认为美国政府在执行一种“自杀”政策。这就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慎重考虑中国的政策。据杜勒斯9月1日发表声明后的备忘录中透露：期望中共不会真的打起来，如要打，国民党可以自己同中共作战，美国负责保护海上运输，美国不放弃和平谈判的希望。这就表明美国不想与我直接交战。正如周恩来所料：打炮就是试验他，这回试验出来了，美国不想与我直接交战的底牌，由杜勒斯打出来了。

根据新的情况，党中央决定采取“以打促谈”的方针，逼美重新回到谈判桌旁。具体做法是，一面继续炮击金门，并向全世界正式宣告，中国领海的宽度为12海里，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舰船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领空；一面敦促恢复中美谈判。9月6日，周恩来发表《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他在强烈谴责美国侵略行径的同时，代表中国政府公开倡议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谋求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消除。这时，金门守军的海上补给线被我炮火封锁，美国军舰掩护蒋军补给船队进入我领海线，福建前线请示中央要不要开炮，毛泽东指示，坚决打击。但是叮嘱“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出乎前线指挥员意料的是，我一打炮，美国军舰丢下蒋军舰只向外海逃遁，充分表明美国在确保其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对我国在战略上取守势。美国在金门、马祖问题上实行的是“脱身”政策，这更增加了我“以打促谈”方针取胜的信心。

9月15日，在炮击金门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大使级的谈判，在华沙复会。周恩来亲自领导了这次谈判，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指示我方代表王炳南应该采取积极进攻的方针，即在美方不正面回答我方提案，而主张停火的情况下，立即提出要求美国从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停止向中国领海、领空的一切军事挑衅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以缓和消除目前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建议。9月19日，毛泽东十分兴奋地写信给周恩来，指出：我们这种新方针，新策略是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

至此，我炮击和封锁金门的目的已基本达到。从军事上说，当时解放金门、马祖列岛已不成问题。但是，如不能同时解放台湾，国共之间的距离将

拉大，接触会更加困难。同时，国民党当局失去在大陆沿海最后象征性的据点，更有利它制造“台独”或“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阴谋。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关于在目前形势下对金门的作战方针，仍以“打而不登，封而不死，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为妥”的建议。10月5日，中央向党内外发出了关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明确指出：把解放金马和解放台湾统一来解决的长远利益比较起来，则不如暂缓解放金马，仍由蒋军占据似乎较为有利。次日，毛泽东起草了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声明以7天为期，停止炮击，并建议举行和平谈判。从10月6日起，金门海域的炮声沉寂下来。随后，因美国要求实现永久停火，台湾当局又拒绝和谈，中央决定不能结束战争状态。10月31日，宣布实行战争史上罕见的戏剧性的安排：对金门只单日打炮，双日则不打炮。以后，又要求打炮时尽量不打死人。国民党方面虽然摆出一付顽固拒谈的姿态，事实上，也接受了这种象征性的战争安排，仅在单日偶尔发炮还击，自1959年初起，双方的炮击都打到海滩无人地带，蒋军拦截大陆商船和派飞机进入大陆领空骚扰的行动也基本停止。海峡两岸关系出现转机后，毛泽东立即抓住时机对台湾回归祖国问题提出许多重要的原则。后来根据这些思想，周恩来把它归纳、概括为“一纲四目”。这个问题在本书“为了台湾早日回归祖国”这一章中详细谈了。这是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祖国统一大业绘制的一幅蓝图。1961年12月，中央军委又规定停止实弹射击，只打宣传弹。随后，蒋军也照此办理。国共之间这种象征性的炮击一直持续到1979年1月1日正式结束。

在我军胜利地进行祖国领土、领海、领空斗争中，周恩来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他直接领导下，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制定了一系列边防、海防、空防斗争的具体政策、处置守则和实施办法。由于边、海、空防的斗争极其敏感，不仅是军事斗争，而且涉及到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情况瞬息万变，错综复杂，为争取主动、及时掌握情况，作出正确决断，周恩来经常是夜以继日地工作。他常对外事、公安、情报、总参等有关部门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的办公室是全天候的，一天24小时值班、全球发生的重大情况或边、海、空防发生的突然事件，不管他在做什么事情，或已经休息，都要及时向他报告。并且规定了边、海、空防发生的涉外事件，事无大小一律要请示报告，统一由中央处理。他亲自掌握斗争原则和策略的具体运用，重大问题报请毛泽东批准后执行，从而保证了每一次斗争做到既教训了敌人，又锻炼了部队，同时，还着眼于有利边境的长期稳定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比如1953年7月，当时朝鲜战场敌人调集部队，对我战役反击部队进行反攻，台湾国民党军和法、越军在我沿海、沿边也有作战活动。周恩来判断，这一行动似由美帝国主义统一布置，下一步有可能继续对我华东、中南沿海某些岛屿和西南边境进行窜扰活动。为提高警惕，加强战备，粉碎敌人可能的进犯，他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并发出加强海边防战备指示，要求有关军区拟制和完善具体作战方案。对岛屿防御，区分坚守和机动两类。对坚守的要求切实搞好各种作战保障，对不利于坚守、不便于增援的岛屿，不必派部队控制。要求守岛部队搞好通信联络，确保不间断指挥。对作战计划、部队训练要求都应注意防伞兵的保障。

在3年困难时期，蒋介石认为大陆会内乱，这是反攻大陆的好机会，于是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组织了几十股武装特务，在东南沿海伺机登陆骚

扰破坏。对此，周恩来责成公安部、总参谋部部署前沿驻军和公安部队予以及时打击、歼灭。对被俘的特务分子集中由公安部门加以教育改造。又如 1965 年 11 月，台湾当局的两艘军舰袭扰我福建崇武以东海域。当时正值深夜，周恩来得到报告后，亲自听取总参谋部的汇报，并且直接指挥了这场反袭扰斗争。当我海军舰艇向敌接近时，他指示：发扬我军近战、夜战、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集中兵力先打一条。我东海舰队遵照总理指示，击沉敌炮舰“永昌号”，另一艘敌大型猎潜舰“永太号”受重创逃走，取得了这次海战的胜利。1959 年，国庆 10 周年庆典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国民党二架 U—2 高空侦察机窜入大陆，直向北京飞来，我刚组建 10 个月的地空导弹营，遵照周恩来的命令，以 3 枚导弹全部命中目标，开创世界防空史上以导弹击落高空敌机的先例。在此基础上，我防空导弹部队不断总结经验，刻苦学习和掌握现代化科学技术和战术，从 1962 年至 1969 年共击落美制 U—2 型高空侦察机 10 余架。

组织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关于周恩来参与组织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这段历史，我是比较熟悉的，它是平定西藏叛乱后发生在我国西部边境的又一大事件，周总理为捍卫祖国领土完整，打击地区霸权主义，解决边界争端作出了重大贡献。

众所周知，中国与印度是近邻，在历史上有着长期交往和传统友谊。两国边界全长 2000 公里，分东、中、西三段。中印边界线从来没有正式划定过。但根据双方历史行政管辖所及，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线”。过去中印两国的地图均系按照“传统习惯线”标画边界，两国人民亦遵守这条“传统习惯线”，只是在英帝国主义统治了印度以后，英驻印度当局以印度为基地，把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中国的西藏和新疆地区，从而埋下了争执的种子。正如周恩来指出的：英国企图抹煞中印之间长期形成的传统习惯线。用割裂中国领土、扩大英属印度领土的办法，来达到它的帝国主义侵略目的。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对待与邻国的边界问题的方针，一贯主张既照顾到过去的历史背景，也要照顾到已形成的现实情况，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求得对双方都有利的公平、合理的解决。根据这一方针，中国同缅甸、尼泊尔、不丹等国顺利地解决了边界问题。鉴于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在宗教及商业上的密切关系，中国政府争取印度的友好合作是极其重要的。1960 年 4 月，周恩来同外交部长陈毅出访印度，与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也是本着以上方针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但是，由于尼赫鲁刚愎自用，错误估计形势，他以为充当反华急先锋和南亚霸主，就会得到美国和苏联等国的援助和赏识；以为中苏分裂加深，世界掀起反华高潮，中国孤立无援；以为当时中国经济困难，已严重到不可克服的程度；以为美国支持台湾同国民党当局企图窜犯我东南沿海，牵制了我主要兵力，西南地区防务空虚，我无力还击。加上 1959 年由英印策动和支持的西藏农奴主的叛乱遭到失败，对中国西藏实行扩张主义的梦幻破灭后，尼赫鲁公然抛弃中印友好的旗帜，对中国争取公平合理地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真诚努力，视为软弱可欺，进而得寸进尺，对中国步步进逼。尼赫鲁的扩张主义的逻辑是：“我已经侵占的地方是我的，我想要侵占的地方也是我的。”对尼赫鲁来说，中国如果不按照他的意图行事，他就要实行“前进政策”，直到采取战争手段解决边界问题。从 1961 年开始，印度采取加强边境兵力，增设边防哨所，不断越境武装挑衅。到 1962 年 10 月这段时间里，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了 43 个军事据点，侵占我国领土 4000 余平方公里；在东段越过所谓“麦克马洪线”，入侵西藏克节朗河谷地区；进攻我边防哨所和巡逻队；杀害我边民，打死、打伤我边防干部、战士 47 人；印空军飞机频繁侵犯我国领空。当时，印度宣称，在中印边境东段已将中国军队赶回两英里；在西段全线向前推进；欢呼并祝贺尼赫鲁取得了拿破仑式的大胆规划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胜利，创造了惊人的奇迹。在这种情况下，尼赫鲁得意忘形，一再拒绝中国政府提出的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办法，决心诉诸武力，以武力实现其领土野心。

为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充分暴露印度政府扩张侵略的面目，揭穿它捏造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对印军不断入侵挑衅和蚕食我国领土的行径，我始终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单方面执行在“实际控制线”本侧 30 公里地区不打

枪、不巡逻、不狩猎、不越出边卡活动警戒线的规定，采取一系列避免武装冲突的措施。同时，坚决执行党中央“对印军的入侵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和“必须作好两手准备，力争好，准备坏”的指示。我西藏边防军作了应付印军进攻的各项准备工作，严阵以待。

1962年10月2日，利令智昏的尼赫鲁在新德里发表战争演说，声称：印度政府决心以武力对付中国。12日，他公开下令：要把中印军队从印军入侵的中国领土上全部清除掉。14日，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叫嚣：要同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条枪。随即，印军在东线大举增兵。17、18日，入侵印军在东西两线同时向我边防部队展开猛烈炮击，挑起了大规模的边界武装冲突。我西藏和新疆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从10月20日至11月21日进行了两个阶段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作战的目的是为了使印度政府接受谈判，从政治上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是一次紧密服从政治、外交的军事行动。周恩来义不容辞，受毛泽东的委托，全面负责指挥此次边境自卫反击战。当时提出：“打是为了和，不打不能和；打不赢不能和，打过火也影响和”的斗争策略，作为反击作战的指导方针。

这次反击战是在号称世界屋脊的喀喇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主脉南侧地区进行的。该地区地势险峻，高寒缺氧，人烟稀少，道路崎岖，补给困难，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对作战行动有严重的影响，作战的艰苦性是罕见的。由于周恩来和总参一起精心安排、具体指导、保证供应，使前方作战部队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第一阶段自卫反击战从10月20日至28日，印军投入的兵力有4个旅21个步兵营，约2万余人。我军投入5个团的兵力1万余人，战斗结果，东段全歼印军第七旅及其他守备部队一部，俘虏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共歼印军1900余人，我收复克节朗河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全部领土；西段，清除了加勒万河谷和新疆阿克赛钦地区部分入侵的印军。第一阶段战役结束后，我国政府于10月24日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边境问题三项建议。其最主要点是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建议提出后，遭到印度政府拒绝。11月4日，周恩来再次致函尼赫鲁，指出：三项建议对双方来说是对等的，而不是片面的；是平等的，而不是屈辱的；是相互尊重的，而不是欺凌一方的；是友好协商的，而不是强加于人的。再次表明中国的和平诚意，博得了国际舆论的赞扬和支持。而印度政府蛮不讲理，悍然要求我军单方面后撤，恢复到1962年9月8日以前印军侵占的我国大片领土的边界状态。恶毒攻击中国的3项建议是“骗局”。在国内进一步掀起反华浪潮，加紧战争动员，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成立了战时内阁，公开撕掉“不结盟”的外衣，伸手向美、英等西方国家乞求军事援助；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到11月中旬，印军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增加了2个师9个旅及炮兵、装甲兵各一部，总兵力增到3万人，于11月14日到16日，又一次向我军发动猛烈进攻，决心扩大边境武装冲突，鉴于此，毛泽东指出：“尼赫鲁欺侮我们无能力，看来需要再教训他一下。”周恩来下达命令，再次反击入侵的印军。我边防部队于11月16日至20日，发起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我以4个师13个团的兵力展开全线反击。经过5天的激烈战斗，全歼印军3个旅，重创5个旅，共歼印军准将旅长豪尔·辛格以下官兵近7000人。我东线部队推进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传统习惯线”附近，逼近印度阿萨姆邦重镇斯提普尔。西线我军清

除了入侵阿克赛钦地区的全部印军据点，歼敌一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历时一个月，战斗中共歼印军 8900 余人，缴获飞机 5 架，坦克 20 辆，火炮 40 余门，各种枪 6300 余支（挺），汽车 400 余辆，以及大批粮秣、弹药等军用物资。在反击战中，我军伤亡 2400 余人，涌现出大批战斗英雄和功臣模范。此次作战我边防部队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同仇敌忾，英勇战斗，驱逐了入侵印军，维护了中国领土和主权，打击了印度扩张主义者的嚣张气焰，打出了国威、军威，在我军光辉的战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

考虑到当时国际形势和斗争的需要，为了高举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旗帜，中央认为：“打了不撤也有理，撤了更有理，撤了还要准备再打。”决定打破国际惯例，由我方实行单方面停火和撤军。

周恩来亲自部署了这次撤军工作。我中央人民政府于 1962 年 11 月 21 日发布了我国边防部队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的声明。声明宣告：从本声明发布之日起即 1962 年 11 月 22 日 0 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从 1962 年 12 月 1 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分批撤回到 1959 年 11 月 7 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我侧 20 公里以内。

我参战部队在停火到撤军期间，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指示，一面清剿溃散的印军，一面就地宣传发动群众。宣传我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宣传中印边境冲突的事实真相和我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主张；宣传我军的性质和宗旨，解除群众的顾虑。

部队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动群众一草一木，尊重当地群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不住民房，不进寺庙，不支差役，广泛开展为群众做好事活动，帮助群众重建家园、修桥补路、医治伤病，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当地的群众称赞我军是“亲人”、“救星”、“门巴的好兄弟”，主动地向我们报告敌情，协同搜捕逃散的印军，支援粮菜。许多头人和群众表示，你们走了，我们的心是不会变的，我们决不做不利于祖国的事。对毙伤俘的印军采取了宽大政策，对伤者予以医治；对死者按印度的礼仪予以火化或掩埋；对被俘人员给予人道主义的优待，发给棉衣、路费，分批释放；对被俘的 26 名校以上军官，组织他们到中国内地参观、游览，让他们亲眼目睹中国人民是多么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多么渴望中印友好，而后经昆明礼送出境。最出人意料的是，中央命令前线部队，把缴获印军的飞机、坦克、枪炮、弹药、车辆擦拭干净，登记造册，让印方打着绿旗前来接收，开创了中外古今战史的先例。为什么让印方打绿旗呢？这就是周恩来的高超想法了。因为打白旗意味着投降，打绿旗则意味着和平。而蕴藏着更深的含义是：战争是你挑起来的，是你入侵了我国领土，我们被迫自卫反击，现在举起绿旗，表明我们还应像以往一样友好相处，这是为对方设了一个台阶。这样做，充分体现了我军自卫反击战的正义性，以及同邻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诚意，对稳定中印边境局势具有深远的影响。

援越抗美，再举义师

五六十年代，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摆下了一个以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印度支那3路向心迂回的阵势，冲着中国而来。为了策应朝鲜战场，盘踞在中越边境一线的法国殖民军同越南的反动势力以及逃窜越南的国民党残匪相勾结，而后美国直接出兵，向越南、老挝大举进攻，严重威胁邻国和我国南部边疆的安全。

早在1950年7月，我国政府应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就派出由陈赓、韦国清等率领的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南人民抗击法国殖民主义者。1950年至1954年的越南抗法斗争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各种枪支11.6万多支（挺），火炮420门，以及大批配套的弹药和器材等。特别是于1954年1月到5月协助越南人民牵组织指挥了奠边府战役，一举歼灭法军和越伪军16200人，把法国侵略者赶出了越南。

1954年7月，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签订后，法国殖民主义正式从越南撤退，美帝国主义接踵而来，插足对越南南方和老挝进行直接的武装侵略。从1961年起，美国在南越不宣而战，发动了一场“特种战争”，大批屠杀越南人民。在这种情况下，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再次要求中国援助。

当时，我曾几次跟随周恩来总理，参加中越等国党的会议，商议东南亚的民族解放斗争，目睹了周总理关心和支持东南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殖民统治的感人情景。

1963年9月下旬，我随周总理到广东省从化县，出席中国、越南、老挝、印尼4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谈。当时参加会谈的有周恩来、胡志明、黎笋、十菊、凯山、阮志清、艾地。会议就东南亚的现状与将出现的局势进行全面的估计。周恩来以军事家的韬略和远见，指出美国很想在越南和老挝直接参战，但它在世界各地比兵太多，犹如10个手指头捉10个跳蚤，动都动不得。因此，只要美国发动战争，等待它的只能是失败。东南亚各国只要树立必胜的信心，一定可以打败美帝国主义。他说，东南亚是世界主要矛盾集中的地区之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插足很深，反动统治既薄弱又残暴。但这里的人民已经觉醒，而且富有斗争经验，共产党都有一定阵地，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有争取革命领导权并把革命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范例。东南亚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反买办资本主义，而要实现这一任务，首先要争取群众，扩大统一战线；其次要深入农村，准备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再是要加强党的力量和对各方面的领导。东南亚各国共产党要加强联系，互相支持。中国作为东南亚革命运动的大后方，我们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我们会以最大努力来支持东南亚各国的反帝斗争。

周恩来还就反对美国的“特种战争”，提出了具体的战略战术。

219指出要做好长期战争的打算。至于援助问题，中国将是可靠的、值得信赖的大后方，我们会同仇敌忾，把美帝国主义者赶出东南亚。

1964年7月，周恩来又率代表团到越南河内，出席有中国、越南、老挝三个国家党的领导人参加的三国党的会议。这次会议我也参加了。当时中国代表团有周恩来、陈毅、伍修权、杨成武等同志，越南方面有胡志明、黎笋、长征、武元甲、范文同、黄文欢、文进勇、阮志清，老挝方面有苏发努冯、凯山、诺哈、富米·冯维希等。会上，越南、老挝党的领导人就北越、南越、老挝各方面的情况作了介绍，特别谈到美国如何把南越作为进攻社会主义的

基地、防止社会主义发展的基地，作为“特种战争”的试验场等等情况。周恩来在听取了东南亚局势的介绍后，指出：东南亚是世界矛盾最集中，斗争最尖锐，革命条件最成熟的地区，美国企图把南越、老挝、泰国作为一条战线，以“特种战争”来对付社会主义国家，拿经济利诱和政治颠覆的手段企图破坏缅甸、柬埔寨的中立政策，但美国的这一阴谋不断受到挫折，而且面临彻底失败的危险。然而，美国对东南亚的侵略并不会罢手，当前美国军事形势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是强化“特种战争”；二是把“特种战争”扩大为局部战争，美国在南越和老挝直接出兵，轰炸或进攻北越。但不管美国采取哪一种办法，中国人民必将出面支持东南亚人民的斗争。

周恩来在会上深刻地分析了形势，同时又详尽而具体地指出斗争的任务，建议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准备长期的艰巨的斗争，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将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密切结合起来。政治上应坚持两次日内瓦协议，不断揭露美国破坏日内瓦协议，并利用美国与法国的矛盾，广泛建立统一战线；军事上要积极加强，搞好军队，巩固根据地，打歼灭战，一个一个地砍敌人的手指头，诱敌深入，然后聚而歼之，争取三五年或更长时间，在不断胜利中解决问题。我们的斗争方针是，尽一切可能把战争限制在目前范围之内，同时积极准备应付第二种可能的情况。对第二种可能的方针是，美国走一步，中国走一步；美国出兵，中国也出兵。

周恩来在三国党的会议上所作的讲话，给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和人民增强了抗美的信心，也为我党中央决策抗美援朝，保卫祖国南疆安全起了很大作用。

正如周恩来所料到的那样，1964年8月初，美国突然出兵袭击越南民主共和国，跨过战争边缘，扩大印支战争。1965年3月，美国把大批导弹部队、海军陆战队、战略轰炸机以及一些雇佣军调入越南南方，加紧侵略战争，并在1个月内4次突袭越南民主共和国，战火也有扩大到整个东南亚之势。

鉴于如上形势，1965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

周恩来是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斗争的组织者和决策者之一，他时刻关注东南亚局势的发展。当美国加速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步伐，以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要求我国给以支援时，周恩来即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建议向越南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同越南人民和越南人民军一起抗击美国空军的袭击，帮助越南进行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后，他即负责领导这一艰巨任务的实施。

自1965年3月美国派大批战斗部队开进越南南方，并扩大侵略战争到北方，至是年8月，在南越的美军激增至12.5万人，在此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数次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表明立场，他指出：中国是1954年日内瓦协议签字国，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邦，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随后，中国人民全力支援越南人民反抗侵略，直到根据越南人民的需要派出自己的人员，同越南人民并肩作战，赶走美国侵略者。

从1965年10月开始，中国分批派出支援部队。进入越南的中国援越筑路部队前后达8万人，在3年中修建公路1200多公里，修桥300多座，铁路工程100多公里。在修路中抗击美机轰炸的对空作战1122次，击落击伤美机近700架，超标准地完成了中越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无偿援助越南修建公路

的协定和协议书规定的公路数量和质量。

由于美国侵略者不断出动飞机轰炸，修建公路出现很大困难。为了保障前线的供给，周恩来还批准和组织修建了一条从我国的云南边界到越南南方的隐蔽的林中小路，可用自行车、人力车运送武器弹药上前线，美国飞机不易发现，这条小道被称为“胡志明小道”，在援越抗美的斗争中起到积极作用。

周恩来不但参加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军事决策，还多次接见越南党政军领导同志，共商抗美大计，甚至精心策划派人护送越南的军政干部安全返回前线。1966年，周恩来就曾派人秘密护送越南南方的一批领导成员从河内返回南越游击根据地。为了保证安全，周恩来仔细研究了返回路线，决定出奇制胜，从海上走。行前，还派一个调查小组，把路先趟了一遍，周恩来亲自听取小组汇报，一个个细节都问得清清楚楚，然后决定由中联部副部长许立陪同，用专机将这批越南南方领导成员从河内接到广州，再转乘我国远洋货轮直送到南越一个叫鸚鵡嘴的地方，最后安全送到南方司令部。确如胡志明主席多次满怀深情讲过的：“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

从1964年到1978年，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抗美援朝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周恩来仍努力克服重重困难，排除干扰，坚持抗美援朝。15年来，我国援越武器、物资折价达200多亿美元，在援越斗争中，伤亡达6000多人，尽了最大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支援部队是1970年完成任务后，奉命全部撤回国内的。

托举两弹一星的巨人

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中国人民托举“两弹一星”的总指挥。从50年代开始，这两位巨人就为发展我国军事工业和突破国防尖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特别是周恩来，他深刻认识到武器装备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是国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因此，他对我国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从无到有，从开采铀矿到核武器的研制成功，从导弹的研制到卫星上天的每一项重大决策及其实施，都要亲自过问。

从5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在进口和仿制苏式武器的同时，便着手尖端武器的研制和常规武器的改进工作。1954年秋，周恩来获悉地质部一支勘探队在广西发现了铀矿，非常重视，立即要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带着样品向他汇报，随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在听了汇报并看了样品后，感慨地说：“我们的矿石还有很多没被发现嘛！我们有丰富的矿物资源，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从此，周恩来就一直负责这一伟大事业的领导工作。

经过周恩来的安排，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研制核武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周恩来在此之前邀请原子能科学家钱三强和负责经济工作的薄一波、地质部的李四光、刘杰到总理办公室开会，讨论核反应堆和核武器的基础理论，他还通知他们参加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周恩来不断提醒科学家们汇报更多的细节，详尽地介绍核物理和铀地质学。毛泽东听得入迷，他说：“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特别兴奋。随后他们还和科学家们一起吃饭，周恩来特地交待拿茅台酒来。毛泽东向大家祝酒说：“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干杯！”号召科学家们“尽自己的努力发展中国的核事业”。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正式决走发展我国原子能工业，并着手制定研制核武器的规划。

1955年1月决策后，中央政治局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3人协助周恩来具体负责这项工作。这年10月，空气动力专家钱学森由美回国，周恩来对此十分关心，并委以重任，他亲自交代钱学森起草《建立中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钱学森是美国最早进行火箭技术研究的6个成员之一，他因受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迫害，面见美国海军部次长金布尔，要求返回祖国。金布尔曾声称：“我宁愿枪毙他，也不愿放他回中国，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值5个师。”而把钱学森拘禁起来。后来，经过周恩来、陈毅多方交涉，才得以离开美国，经华沙回到北京。1956年4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在我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委托当时军委分工主管军工生产和军队装备的聂荣臻牵头，黄克诚、赵尔陆作为副手，着手抓导弹研制工作。

1956年10月，当时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曾征求聂荣臻是否接替陈毅的科学规划委员会的领导，继续负责国防工业和武器计划，或出任北京市长？聂荣臻说：“我宁愿负责科学项目，也不愿意当市长。”后来聂成了上千位科学家和17位苏联顾问正在进行的12年规划的领导人，成了周恩来在科学技术政策制定方面的主要助手。

聂荣臻接受任务后，很快提出了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制工作的初步意

见。经周恩来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商定，在军委讨论通过。会上，周恩来明确指出：中国导弹研制的方针，应当采取集中力量，突破一点的办法进行。决定从国内外凡是吸收来做这项工作的专门人材，都应当设法吸收和招聘。委托宋任穷专门组织一个小组，从各工业部门、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军队系统选调优秀的科技人员，从事这项工作。并责成军队起模范带头作用，要人、要钱首先拿出来。在这之后，在周恩来关怀下，我国的导弹研究设计院、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电子元件和器件研究设计院、航空研究设计院以及其他武器装备的研究机构和试验基地相继建立。从而大大推动了我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1956年1月，周恩来为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明确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指出：“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应该掌握最先进的科学以便能保证我们拥有坚不可摧的国防。因此，有一批知识分子把他们的知识和青春献给了核武器计划的发展。1956年初，中国的战略导弹计划也开始形成，党中央把决定发展导弹和发展原子能，作为中国国防现代化的两个关键项目，把战略导弹、核燃料产品工厂的建设、原子弹的发展放在优先发展的重要地位。

要建立原子能工业和导弹航空工业，需要掌握许多先进技术，研制许多先进材料、仪器和设备。而这些，在世界上是保密的，完全靠我们自己研制，则需要较长的时间。为此，我国政府抓住中苏关系良好的时机，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努力争取苏联援助我国建立核工业。1957年夏，根据苏联在对华新技术援助方面出现松动的迹象，由聂荣臻出面，通过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向苏联政府提出在尖端武器研制方面给予技术援助的希望。同年10月15日，中苏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苏联在火箭、原子弹和航空等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的协定（简称10月15日协定）。在签约后两年内，尽管苏联政府只是向我们提供了几种过了时的导弹、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的实物样品，交付了相应的技术资料和设备，派来一些技术专家，但毕竟使我们这样一个科学技术落后、工业基础薄弱的国家，在尖端武器研制方面由无到有，打下了个底子，赢得了宝贵时间，为日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拿导弹来说，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近程地地导弹，正在自行设计中、远程地地导弹，并且进行了若干关键部件的研究试验工作。在原子弹研制方面，我们已查明的铀矿储量，可以满足第一套金属铀冶炼设备生产的需要。从选矿到核燃料生产厂的大部分设备基本具备，对几个短缺的关键设备也正在国内安排试制。在原子弹研究设计方面，对些关键技术问题，已经摸索了一段时间，有的已经突破，有的正在攻关。而苏联的援助没有维持多久，由于我党拒绝了赫鲁晓夫提出的侵犯我国主权、企图控制中国的要求；同时，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苏联在执行《10月15日协定》上也随之越来越后退了。1959年6月，赫鲁晓夫以种种借口拒绝交付原子弹教学模型。从1960年7月开始，苏联单方面撕毁所有中苏经济技术合同，而原子能工业首当其冲。苏联停运各种设备器材，拒绝交付技术资料，继则全部撤走技术专家，想把中国初生的原子能工业扼杀在襁褓里。

由于赫鲁晓夫破坏中苏关系，撕毁条约，使我们更加认识到自力更生的重要性，这就是必须把我国国防科学研究，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的研究工作的立足点，完全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之上，才能攻克各种难关，扎实稳步地向前发展。早在1958年6月，毛泽东就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

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周恩来提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当时，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是严峻的。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封锁和苏联的限制；国内“大跃进”的失误；加上接连发生的天灾，使我国国民经济陷入了3年困难时期。但是，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被任何困难压倒，从不对任何压力屈服。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说过一句话：幸好赫鲁晓夫没有给我们什么尖端技术援助，否则的话，对我们来说，要还这个债是很困难的。与此同时，周恩来召集彭德怀、聂荣臻和国防科委负责人参加紧急会议，研究苏联断绝火箭燃料供应后的对策。周总理坚定地说：“苏联想用卡燃料的方法，把我们的火箭事业扼杀在摇篮里，那是办不到的。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将导弹送上天。”

果然不久，即1960年9月10日，在苏联专家撤走的第17天，在中国的国土上，用国产燃料发射了第一枚近程弹道导弹。11月5日，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傲然竖立在发射台上，上午9时，发射成功。当天下午，在庆祝会上，聂荣臻激动地举杯祝酒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

接着，周恩来要求在执行紧急任务时，要“摸着石头过河”，要求有关负责干部应该以有条不紊的渐进方式拿出核武器发展的具体计划来。邓小平也对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说：“有关路线、原则和政策已经确定。现在，一切都依赖于你们的工作，放心大胆地前进吧！如果取得了成功，荣誉归于你们，如果发生了失误，责任由中央书记处来负。”

为了有力贯彻中央决议和指示精神，中央派邓小平、彭真、陈毅、张爱萍视察了兰州和其它核能工厂，并传达周恩来关于用自己的双手在8年时间内拿出自己的原子弹来的指示。1961年7月16日，党中央发出了加速发展原子弹计划的号召。当时，赫鲁晓夫既不希望也不相信中国能够掌握核武器，他曾嘲笑我们说：“有些人不愿意参加核保护伞，要自己搞，我看不仅得不到原子弹，到头来恐怕连裤子都穿不上。”外交部长陈毅听了这番话，主张不惜代价发展战略武器计划，“为此目的，就是卖掉裤子也值得。”他还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现在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

根据情况的变化，1962年周恩来又亲自主持制定了我国1963年至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的10年规划，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方针，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部署了尖端武器研制的规划。为加强对两弹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和更好地组织全国大协作，于1962年11月，经党中央批准，成立由周恩来任主任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成员包括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罗瑞卿、陆定一7位副总理和赵尔陆、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张爱萍7位工业部门主要负责人。同年12月，专委会讨论和批准了第二机械工业部提出的《1963年—1964年原子武器、工业建设生产计划大纲》（简称两年规划），主要内容是生产和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指示。他着重指出：我们发展尖端事业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要发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组织全国大力协同，从科研一开始就组织协作，要发扬风格，不要门户之见，要拧成一股绳，有关工业部门应当分别组织联合设计。他要求“二机部的工作要有高度的政治思想

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在实践中，要做到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要求大家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接着，他进一步阐明，实事求是既是思想方法，又是指导原则，要认识客观规律，不能怕失败。在科学实验中，有时必须经过失败，甚至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成功。工业中要循序渐进，想超越阶段跳过去也是不行的。要坚持不懈，做任何事情不能总是突击，只能在有一定可能性时才能突击。无论成功或失败都要戒骄戒躁，略有所成就，就骄傲起来，固然不好，急躁也容易犯错误。我们大可在现有的工业基础上“自力更生，立足于全国”，搞出一点名堂来。这次专委会的精神，后来成为我国国防尖端事业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指导思想。在研制两弹过程中，当时曾组织上百个部、委、局单位，26个省、自治区和上千个厂、矿、院、校、所，以及各军兵种的有关单位，分工协作，联合攻关，全国落实了大量科研课题和新材料、新设备的成套研制任务。在头两年里，周恩来在西花厅亲自主持了这个委员会的会议达9次之多。周恩来作为“总调度”，举凡中央专委决定的事，哪怕一个零部件的生产，当场拍板，由主管的部长保质、保量、限时完成，中间他还要不断督促检查。就这样，直到我国自制的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4年，准备原子弹爆炸成了科技城和整个试验基地压倒一切的任务。1964年上半年，各项准备工作就绪，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条件已经成熟。8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首次核试验党委会，张爱萍将军任党委书记，领导实施第一次核试验。周恩来指示张爱萍要不断与15人专门委员会联系，报告试验基地的情况，特别是要确保原子弹在组装、运送和爆炸时的安全。经过慎重研究，核试验党委会决定10月16日15时为核爆的零时。国防科委立即派人把这项决定送周恩来。周恩来报告毛泽东主席后同意按选择的零时实施核爆试验。从这天起，周总理办公室同罗布泊试验场开通了电话专线，一天24小时保持畅通。同时，刘杰也一直坐在电话机旁同前线张爱萍直接联系。

16日上午，聂荣臻来到周总理办公室。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也都来到那架连着罗布泊试验场的专线电话机旁静静地坐着。试验开始的时候，周恩来决定刘杰负责和在前方的现场总指挥张爱萍保持密切的联系。那场面是多么感人啊！当张爱萍在电话中用激动的声音向刘杰说：“请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爆炸成功了。”

周恩来听到了后，声音也有些激动，说：“你们能不能肯定是核爆炸？”

刘杰说：“张爱萍同志报告说我们的原子弹已经爆炸成功，蘑菇云已见到了。”

周恩来说：“好，我立即报告毛主席。”

毛泽东听了后也两次要周恩来核实是不是核爆炸。几分钟后，周恩来对刘杰说：“毛主席指示我们再一次证实它是否确定是核爆炸，以便使外国人相信！”刘杰又立即把毛主席的命令传达给张爱萍。经过各种测量，数据证实是核爆炸无疑。周恩来如释重负，随即拿起话筒再次向毛泽东报告。这时，坐在一旁的邓颖超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几个小时后，毛泽东、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出人员时，周恩来庄严宣布：“同志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已经爆炸成功！”刚开始，听众鸦雀无声，甚至不知所措，接着热烈欢呼起来，长时间地响起了暴风雨般的鼓掌声，与会人员无不激动万分，尽情地欢跳，热烈庆祝我国人民

依靠自己的力量制造的原子弹首次试验成功的伟大胜利。周恩来也激动地高声说：“你们愿意怎样庆祝就怎样庆祝，但是，可不要把地板跳塌了啊！”

这天晚上，中央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一消息。周恩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名义，也致电世界各国政府首脑，郑重声明：“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证中国人民免受美国核威胁。”“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声明，庄严地宣告了中国对于核武器问题的原则立场。不久，在全国人大三届首次会议上，周恩来又说了如下一段话：“我们能不能自力更生地攀登科学技术高峰，这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都是有人怀疑的。但是，随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现在应当是扫清一切自卑感的时候了！”

世界上的事情有些就那么凑巧：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那天，恰恰又是不相信中国人能自己制造原子弹的赫鲁晓夫在同一天垮台！那一天，我同孔原、邓典桃正在江西上饶市地区招待所和我们带去参加“四清”的工作队同志一起学习。大家听到上面两个爆炸性的新闻后，都高兴得跳起来。晚上，“四清”工作队和地委的一些同志在招待所开联欢会，庆祝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也欢呼破坏中苏关系的赫鲁晓夫垮台，全体同志都尽情歌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孔原情不自禁地赤膊上阵表演独特的“双肩摇摆舞”。我就领头扭起陕北大秧歌。

在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根据毛泽东“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指示，周恩来要求各国防工业部门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再接再厉，一鼓作气，立即抓紧加强型原子弹和氢弹、导弹的研制，特别是提出将两弹结合试验作为下一步的重点。同时，他要求总参谋部抓紧第二炮兵的组建。1966年5月进行的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前夕，周恩来对试验工作作了“要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指示。他不仅这样要求，而且身体力行，对每一次核试验、导弹试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他总要等现场指挥报告了专家、操作人员和主管部门领导三结合的研究结果后，仔细询问可能影响成败的各个关键环节，认真检查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才决定是否进行试验。他还要求各主管部门，把各种不利或意外因素都要考虑到，采取最可靠的保险措施。他不仅要求核试验本身万无一失，而且要求核试验的放射性烟尘，不仅对我国人民，也不应对邻国人民造成损害。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试验关系重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我们国家穷，做什么事情都要精打细算，都要考虑到略有失误都会加重人民负担。”“我们反对核讹诈和核威胁，不主张搞几百次核试验。因此，我们的核试验都要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都要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1966年12月，青海省代号“221”工厂（专门从事制造核武器的工厂）的负责人，给刘杰打来了电话，报告在氢弹零部件的加工过程中，发现某一部件有擦痕。刘杰接到电话后，立即赶到西花厅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当即指示，派刘杰乘专机立刻赶去青海调查此事。事关重大，但刘杰一想自己仅是个部级干部，就说：不必坐专机。周恩来回答：“坐专机，就是为了检查工作用的，你们就是要利用争取时间。”刘杰到青海后，经过同专家一起调查，那个部件的擦痕要用放大镜才能发现，是加工过程中留下的痕迹，不是人为用刀刻的，不影响质量。刘杰立刻把这个结论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才放了心。

1967年2月，为赶在法国之前，国防科委对氢弹提前试验进行了可行性

研究，决定把首次氢弹试验提前到 1967 年第二季度进行。不久，28 个参试单位的几千人进驻核试验基地，试验准备工作全面展开。

经过反复研究，确定 6 月 17 日为氢弹试验的零日。6 月 12 日，周恩来总理听取了关于氢弹试验准备情况的汇报，告诫参试人员要实事求是，尤其要搞好人民群众的安全转移工作，落实好意外情况下的安全措施。周恩来还指定聂荣臻亲赴现场领导这次试验。

6 月 17 日，天气晴朗，高空只有一片卷云。驾驶 726 号轰—6 飞机的徐克江机组，携带我国的第一颗氢弹起飞了。由于心情紧张，投弹时驾驶员动作失常，氢弹未能在晨 8 时准时投下。这时，驾驶舱里传来了周恩来的声音，鼓励徐克江机组“保持镇静，果断行动”。20 分钟后，飞机绕了一圈又回到投弹区上空。这次一切正常，降落伞准时张开。8 点 20 分，氢弹降落在预定高度，准时起爆。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科技工作者用实际行动实现了抢在法国之前的誓言。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爆炸，苏联用了 4 年，美国用了 7 年零 4 个月，英国用了 4 年零 7 个月，法国用了 8 年零 6 个月，而我国则用了两年零 8 个月。正是由于贯彻了周恩来的一系列指示，我国的原子弹、氢弹试验和外国相比，事故最少，成功率最高，耗资也是最少的。

为了打破核垄断，我国在研制原子弹的同时，就把下一步的目标瞄准导弹核武器。1964 年 6—7 月，我国连续发射 3 枚中程运载火箭成功。1966 年 6 月 30 日，当改进型运载火箭进行考核飞行试验时，周恩来来到火箭发射试验基地。他一下飞机，就详细询问基地的情况，接着，他不顾旅途疲劳，来到发射基地观看了火箭发射试验。这年 9 月，当我国“两弹结合”试验的工作准备就绪，周恩来又亲自过问试验工作的细节。10 月 19 日，“两弹结合”试验前夕，周恩来在与二机部、七机部负责人以及一部分科学家开会时，激动地说，“赫鲁晓夫不是说中国 10 年内搞不出原子弹吗？可我们只用了 4 年就搞出来了。这是争气弹、争光弹。核爆炸成功后，有人嘲笑我们有弹无枪，无非是说我们光有原子弹，没有运载工具。我们要用导弹把原子弹打出去，用行动来回答舆论的挑战！”10 月 24 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实施要求。27 日凌晨，“两弹结合”试验成功。毛泽东、周恩来都十分高兴，立即向试验场地传达他们的祝贺。周恩来对我国国防尖端和战略武器的研制与发展事业，真可谓是呕心沥血啊！

1970 年初到 1974 年，特别是后两年，周恩来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一方面，“四人帮”对他的迫害越来越疯狂；另一方面，癌症对他的折磨，也日益加重。周恩来以超人的毅力，顶着“四人帮”的压力，支撑着极为繁重的内政、外交重负，同时，也从未放松过对我国国防尖端和战略武器的研制。他对奋力为发展我国尖端事业的科学技术专家和行政领导干部，极尽其保护的责任。对主要厂、矿、企业较早地实行了军管，避免混乱造成的破坏。对林彪提出的重点工厂向大三线搬迁的主张，周恩来坚决顶住了。在这段极其艰难的时间里，他亲自主持召开了 20 多次专委会会议，对我国国防尖端各个领域的发展，做了一系列重大决策性的指示和部署。在我国中远程火箭的技术攻关取得新进展后，1965 年，钱学森等上书中央，希望早日把人造卫星列入国家任务。周恩来报告毛泽东，采纳了钱学森的建议，并把我国第一颗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

发射人造卫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卫星本体的研制，地面跟踪系统

设备的研制，以及发射试验场的建设等要齐头并进。为此，周恩来部署搞“全国大协作”，并极力排除“文革”的影响，要求全国上下通力合作，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委还发出“特别公函”，要物给物，要人给人，全力以赴，研制卫星。1970年春，“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总装完毕，4月1日运抵发射场。卫星地面测控系统第一期工程也如期交付使用。4月14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了刚从发射基地返京的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任新民、戚发轫等关于卫星、火箭在发射场测试情况的汇报。4月16日深夜，他给国防科委负责人打电话说：“中央同意你们的发射计划。卫星和运载火箭运到发射地后一定要认真地、仔细地、一丝不苟地进行测试检查。从今天起，测试情况每天向我报告。”

1970年4月24日，卫星发射场风和日丽，指挥部决定把发射时间定在晚上9点30分。下午3点50分，周总理电告国防科委，毛泽东主席已批准这次发射，希望大家鼓足干劲，过细地做好工作，要一次发射成功。9点35分，我国第一颗卫星徐徐升空入轨。10点整，国防科委向总理报告卫星入轨了！周恩来听到卫星入轨的报告后，高兴地说：“准备庆贺！”他立即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一喜讯，而毛泽东在书房里已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从卫星上发来的清晰洪亮的《东方红》乐曲！毛泽东、周恩来可以说是中国人民托举“两弹一星”的总指挥。

接着，我国自力更生建造核潜艇，二机部负责建造核潜艇动力堆。1970年7月，核动力陆上模式堆运行试验准备就绪，中央专委在对模式堆启动提升功率问题进行讨论时，周恩来着重审查了启动运行的安全问题。并在会上指出：这是核动力的起点，也是奠定核电站的基础。在各部门的大力协同下，我国终于建成第一艘核潜艇。在同年的一次专委会上，周恩来听取上海市研制核电站问题汇报时，重申“二机部不能只是个爆炸部，除了生产核弹外，还要搞核电站”。并明确了：我国发展核电，应遵循“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方针。从此，我国原子能工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建设核电站，和平利用核能。1974年4月12日，是周恩来生前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专委会议。审查批准了上海核电站工程，即今天已投入运转的秦山核电站的建设方案。也许他已预感到参加专委会的机会不多了，在这次会议上，他忍着病痛作了长篇讲话，对我国尖端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他指出：建设核电站要绝对安全可靠。有关部门要选派好的设计人员支援上海，通过这个工程锻炼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二机部、七机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要总结经验，要有专人抓这件事；在南方选址要注意防潮、防腐蚀、防风化；要想到21、22世纪，要为子孙后代着想，等等。与会人员眼含热泪记下了他最后的嘱托。

我国的国防科研和尖端工业，在帝国主义封锁和苏联霸权主义卡我们的情况下，没有被窒息瘫痪，在遭受“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严重破坏下，没有被中断。反而能够独立自主地继续发展，并为大规模发展尖端科学技术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经验，是党中央、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周恩来高超的组织能力和一丝不苟的作风的结果。正是由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我国在发展国防尖端科学和改进常规武器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从而保障了建国后几次卫国的局部战争的胜利，使我国在国际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今天，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军建设的指导思想正经

历着一个战略性的转变。我国的国防力量日臻巩固和发展，航空、航天工业、原子工业及核武器的生产，均进入了国际先进行列。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永远也不会忘记周恩来总理在这方面伟大的历史功绩！我们应当继承周恩来的遗志，进一步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创建新的业绩。

“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益友良师

1951年8月，周恩来曾在一次会议上说：人才缺乏，已是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不论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还是在巩固政权方面，我们都需要人才。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国家建设的重任使他比别的领导人更早、更充分地认识到：“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实际生活促使他十分重视培养人才，扩大知识分子队伍和充分动员与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不断总结经验，探索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周恩来是党内联系知识分子最广泛的一位领导人。从五四时期的天津“觉悟社”，至旅欧的中国少年共产党，以至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他都联系着一批爱国的、革命的知识分子。1924年他在欧洲出版的《赤光》杂志第2期《革命救国论》一文中，即称赞中国知识界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最值得注意的革命势力”之一；又指出其中尤以青年学生最能无忌惮地反对列强、反对军阀。就以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知识分子”这个词来说，在建党初期的党内文件或领导人讲话中，一般皆称“知识阶级”或“知识界”，周恩来在1925年6月的一篇文章中，正式指出“知识阶级”这个称呼不对，应说是“知识分子”或“知识界”。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讲到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他们两人先后使用了“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事前是否有过什么联系，我们还不清楚，但是，说他们不约而同地使用这个称呼，应该是可以的。

1928年党的六大以后，在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之时，曾经针对当时党内一股反知识分子的“左”倾思想，在党内文件《告全体同志书》中为知识分子讲过公道话：“因反机会主义而变成反知识分子，这是很错误的。”文告中在分析大革命失败后的情况时，指出：“知识分子虽然有很多动摇的，但是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奋斗的人亦不少。”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初期，周恩来以中共代表团领导的公开身份，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爱国反美统一战线而进行艰苦复杂的斗争，更是团结、领导和影响着大半个中国的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群。其中最令人感动的，如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他安排在重庆、桂林的文化界人士转移疏散到延安、香港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保护了欧阳山、茅盾、章泯、夏衍、艾青等一批人免遭顽固派迫害。同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又指示廖承志、潘汉年等人，将避居香港的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梁漱溟等800多人安全转移到重庆、东江、桂林、韶关等地。他把爱国知识分子看成国家的宝贝，尊重爱护，广泛联系，爱国知识分子则把他视为自己的知心朋友、益友良师，敬佩爱戴。

在新中国诞生之前，他已经开始千方百计地争取国民党政府管辖下的一批知识分子留在大陆工作，如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专家孙越崎、钱昌照等在他和党组织的工作、影响之下都留在大陆，连曾任过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也不跟蒋介石到台湾，1951年从法国回到北京，为新中国服务。建国以后，他更注意争取海外知识分子回国工作或讲学，先后把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请回来了，其中包括李四光、钱学森，邓稼先、老舍和冰心等著名科学家和作家，众多事实说明我党在这阶段的知识分子工作是做得很有成效的。

老教育家张柏苓是南开中学、南开大学的创办人，是周恩来的老师，抗日时期曾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以后还当过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长。在周恩来和我党的感召下，1949年拒绝蒋介石邀他飞往台湾之请，留在重庆迎接解放，后转到天津定居。

北京解放前夕，周恩来派田汉以毛泽东和他的名义秘密拜访知名画家、时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徐悲鸿，希望徐不要离开北平，尽可能在文化界多为共产党做些工作。徐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公开赞扬抗日解放区的木刻艺术，又拒绝为蒋介石画像，不愿加入国民党。周恩来对他早有了解，1946年徐悲鸿受命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时，不少朋友劝他不要去担任这个职务。正好周恩来在南京见到他，却鼓励他去北平就任。这次徐悲鸿从田汉那里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口信，受到巨大的鼓舞。当傅作义在起义前夕召开北平的学者名流征询意见时，他第一个表态，希望军事当局要顾全大局，顺从民意，使古都和平解放。原来，齐白石老人不了解党的政策，想举家到香港“避风”，经过他的劝阻后同他一起留下迎接古都解放。解放后，徐悲鸿被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当选全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创作了《奔马图》等名画，为新中国培养人才、发展美术文化事业做了有益的工作。

作家老舍，新中国成立时正在美国讲学，是郭沫若等人用周恩来名义请他回国。老舍一回到北京，便埋头创作，不久便创作出《龙须沟》剧作。1951年春，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特意在怀仁堂观看，《龙须沟》一时风靡全国。周恩来主张年轻一代看老舍名作《茶馆》，让他们知道在旧中国社会的种种腐败、黑暗现象。1955年当他第二次看《茶馆》时，散场后把老舍和演员请到一起，重提教育青年人的问题，说从近代史上选择什么事件为典型搬上舞台，还值得好好研究，希望老舍仔细推敲斟酌一下。后来，老舍写《春华秋实》，周恩来看完排演，亲自打电话提醒老舍有几处值得推敲，向老舍详尽解释有关政策，使老舍深受感动。

对于争取李四光回国工作，周恩来更是花了一番心血。李四光是湖北人，比周大9岁，1905年在日本留学时参加同盟会，后回国参加辛亥革命。1913年又留学英国伯明翰大学，攻地质采矿，五四运动后即在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长期从事古生物学、冰川学和地质力学的教学研究工作。抗战时期在重庆，曾两次同周恩来会面，周将中共的政治主张介绍给他，他对周有深刻印象，对人说过：“我从周恩来先生身上产生一个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1948年他以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身份，到伦敦出席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大会后，一直旅居国外。1949年9月李四光被推选为新政协的委员，10月又被任命为新中国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其时他尚在国外，闻讯后，即拒绝随蒋介石前往台湾的命令，冒着被国民党特务扣留或暗杀的危险，辗转几个月才回到北京。当时中央打算召开一次全国地质工作会议，周恩来认为新中国的地质工作要有个挂帅的，一定要等李四光回来再开地质会议。有人说李四光不会回来了，周恩来不信，非等待不可。1950年5月李四光回到北京，一住下就找人商谈全国地质工作会议的准备工作，周恩来特意到住处去看望他，一见面就说：“你终于回来了，欢迎、欢迎！祖国需要你呀！”李四光也直截了当地向总理汇报情况。周恩来听完说：“不论工业还是国防，都和地质分不开，地质要先行。开地质会议一定要等你回来，你回来晚了，一定是路上有困难耽搁了。”周恩来对他的了解和信任，使李四光很受感动，本来他想辞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职务，这时也难于

启齿了。周又向他了解有关中国地质构造特点、地质力学理论和国外科学发展情况等等，并称赞他创建了自己的地质力学。一个关于新中国地质工作发展的轮廓，就在这么一次老友重逢式的谈话中出现，李四光又一次从周恩来和共产党人身上看到新中国的希望，不久，他又接任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部长。

1957年春季，周恩来趁陪外宾到杭州参观的机会，去医院看望正在杭州疗养的李四光。他向李四光寻求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意见，又作为老朋友了解李四光对入党的想法。李四光早有入党的愿望，但他又感到自己年纪大、身体不好，怕入党不够条件，对要不要申请入党老是犹豫不决。周恩来友好诚挚地告诉李四光：现时很需要知识分子为党工作，入党后可以更直接受到党的教育和领导，能够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他要李四光好好考虑，找所在单位——中国科学院、地质部党组织领导谈谈，这无疑对李四光是一番重要的鼓励。过后，医院诊断李四光患恶性肿瘤，周恩来又3次到医院看他，每次都在病榻边同他谈入党问题。次年12月，70岁的地质学家李四光被批准入党，终于完成夙愿找到自己的政治归宿。李四光运用他的地质力学理论，指导我国地质界研究地壳运动和油气聚集规律，提出我国东部新华夏构造体系的三个沉降地带具有广阔的含油前景。根据这个研究结果，国家有关部门经过勘察、钻探，相继发现了大庆、大港、胜利等油田，随后组织开发，到1963年我国便结束了所谓“贫油国”的历史。1966年邢台地震之后，周恩来召开会议讨论地震能否预报，到会许多部门领导干部和科学专家都感到没有把握，李四光经过慎重思考后当场表态说，可以预见。地震是一种自然现象，它的发生有个过程，会有一定规律。预报是可能的，但要做大量的探索工作。周恩来赞同他的意见。指示有关部门组织探索，不久之后，我国的地震预报工作便不断取得成果，进入世界的先进行列。

钱学森的回国，周恩来则是慷慨大方的付出“代价”的。原来钱是研究尖端科学的喷气专家，他不计个人待遇、享受，决意回国报效祖国和人民。而当时尚坚持要包围、封锁、扼制新中国的美国当局，竟不惜剥下自由、民主和人权的美丽外衣，赤裸裸地露出“世界警察”的野蛮本质，强行扣留了钱学森等一批中国留美学人的护照，并且把他们监视起来。1955年6月，钱学森经过外国朋友，向我国政府请求帮助回国，周恩来即指示在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会谈的王炳南，通知美方说我们将提前释放11名美国战俘（飞行员），要求美国当局取消对钱学森等中国侨民的强迫羁留。尽管美国军方一些人还在叫嚣“宁可把这家伙（指钱学森）枪毙了，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他的威力抵得上五个师（军队）”。但在美国和世界舆论面前，美国当局不得已也只好让钱学森在同年底回国了。

对原在国内的知识分子，周恩来都十分爱护、信任、尊重，并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周恩来和郭沫若的深厚友谊，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起来了。革命胜利后，周恩来对郭沫若非常推崇，并委以重任。1949年春，世界和平大会邀请中国解放区派代表团参加，这是未来的红色中国首次在国际上亮相，周恩来亲自推荐郭沫若任团长，马寅初、刘宁一任副团长。他于3月27日在北京饭店接见全体代表40名，并发表讲话说：在中国只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根除它的战争政策，才能真正实现彻底的和平。这样将是中国人民对世界和平的一大贡献。据说代表团在大会上受到热烈欢迎，并同各国代表共同倡议，掀起世界范围的反对侵略战争的和平浪潮。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周恩来提名推荐郭沫若等为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果不负众望，长期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全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社会、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组织领导职务，都能尽职尽责，作出自己的贡献。

建国初期，在我国经济文化建设百废待兴，而又各方人才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周恩来对知识分子工作采取了两点对策：一是要“人尽其才”，充分动员和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同心协力建设国家；二是要“后有来者”。因为不论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还是巩固政权等方面，都需要人才。人才缺乏，已成为各项建设中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因此，大量培养知识分子，尤其是工业技术、科学研究和教育师资，已经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重要条件，必须马上着手进行。在1950年全国高教会议之后，周恩来又对教育工作倾注大量心血。

1950年政务院作出决定，在全国举办工农速成中学，让各地选送数以万计的工农革命干部（包括一部分老同志、老将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新型的分子。1951年又按国家需要，改革全国的教育体制，使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师范教育和各类技术学校、补习学校、工农速成中学等都得到适当的安排，以大量训练、培养各类人材。

对于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周恩来不仅时刻操心、孜孜不倦地告诫有关人员，而且身体力行，率先做出榜样。单从他在水利战线做知识分子工作的事迹，也不难看出这一点。1949年11月，在新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后的一个来月，他在接见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部分代表时，针对当时水电和灌溉远远落后于可能开发的水利资源的状况，热情洋溢地鼓励与会专家和代表们说，这是大大地荒废了自然界所赋予我们的资源。假如能够把全部水利资源都利用起来，那将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业！以自然界来说，要为人民服务，还有比这更直接的吗！他认为新中国的人民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首先必须治理危害人民的水患，解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吃饭问题，因此，大力治水，发挥水利专家的作用，重视举办水利教育，培养水利人才，正是人民政府不同于国民党政府的本质表现之一。在这个会上，他称赞我国近代史上的水利科学先驱李仪祉，以李仪祉1915年留德回国，为水利而任教、办学，组织兴修关中水利，虽经多年惨淡经营，终因政府官僚的漠视和压制而难以为继的事实，说明新中国为科学和科学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前景，勉励大家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又要大力培养青年专家，做到后继有人。第二年夏天，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上，他进一步鼓励科学家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他说，从新民主主义开步走，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成绩。他对科技工作者的关怀、信任和谆谆教导，给人留下良好印象。在以后治理淮河、黄河、新安江、密云水库等工地现场，他又经常向专家询问请教，支持专家工作，帮助解决问题，有时还把专家请到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听取汇报，共商治水大计，水利专家们都把他视为知己。如黄河三门峡水库在建设时对泥沙淤集量估计不足，以致建成后不久泥沙淤积过多需要开洞排沙，周恩来亲自和水利部、清华大学水利专家钱正英、张含英、张光斗等研究方案，最后解决了问题。50年代，周恩来在水利部副部长李锐陪同下视察了浙江新安江

水电站工地。当了解到这个电站是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设备的情况后，感到很满意，就挥笔题词：“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给水利建设的专家们以极大的鼓励。可以这样说，周恩来是我们党内最善于做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人，凡是同他接触过的知识分子无不为其精神、能力和风度所感动，许多人以后还留下真诚美好的记忆。

建国初期，周恩来在知识分子中影响最大要数他 1951 年 9 月 29 日在怀仁堂向京、津两地教授、研究人员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这次报告是应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和北大教师学习会的邀请，向高等教育界人士讲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报告的主题是讲知识分子为了适应新社会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改革的需要，必须清除旧社会的旧意识影响，树立为人民服务思想。党和政府在给解放前的知识分子安排适当工作的基础上，还要帮助知识分子通过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社会实践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民主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同时也谈到教育问题，说人民教师是新后代的培养者，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应当尊重他们，以提高他们为人民服务的热忱。他主张：我们对教育工作者要循循善诱，使人心悦诚服，要用这种精神来团结全国教育工作者。这次报告的特点，是他从自己的家庭、身世讲到受旧教育、以后参加革命的经历体会，认为知识分子要从爱国主义立场发展到人民立场、共产主义立场，必须过好民族关、阶级关、家庭关。他一气讲了 7 个小时，其中讲到批评与自我批评，比喻患病不能讳疾忌医，鼓励大家要以革命为归宿。这个报告循循善诱，感人至深。事后两个月左右，北京、天津两地的高等学校组织知识分子学习，联系思想，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我改造，自觉清除崇美、恐美思想，树立民族自信，以后又逐步发展到全国各地的教育界、文化界以至整个知识界，形成一个思想改造运动，前后经历一年多的时间。这次报告对 1952 年全国高等院校的调整和教学改革，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1956 年清华大学一批老知识分子入党时，还提起周恩来在怀仁堂这次报告对自己的重要影响。听过这次报告的老知识分子周培源对周恩来从自己的家庭出身和走上革命道路的实际经历，讲到在新社会必须自觉改造思想的道理印象极深，感到报告“内容感人肺腑”。

吹响向科学进军的号角

1955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次年1月召开一次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大型会议。会前，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经济文化建设中迫切需要人才，而知识分子工作中又存在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建议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解决。毛泽东把周恩来的建议提到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大家同意开会并指定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10位同志进行筹备，由周恩来负总责。周恩来是我们党内同知识分子保持最广泛联系，又最理解知识分子的领导人，由他负责筹备召开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推动了他十分认真地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和制定党的有关政策。

当时，一方面是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中国必须迎头赶上，而国内正在发展的各项建设事业又都迫切需要解决人才问题；另一方面虽然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已经有了重大变化，队伍也在扩大，但党内还存在着“左”的倾向，严重妨碍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中央领导人都感到情况已经基本清楚，只有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才能适应国内建设的需要，追赶世界科技发展进程。因此，必须切实加强和改进党对知识分子工作和整个科学、教育、文化工作的领导，动员全党重视知识分子问题，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

周恩来果然不负众望，自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成员和中央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确定由他负筹备总责之后，次日，他便在出席中央对私营企业改造会议的各省、市党委书记中吹风，布置调查研究，同日，又召集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开会，布置这项工作。

周恩来在中央10人筹备小组紧张进行调查研究的同时，亲自对我国科技现状同世界先进水平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对比研究，最后又主持起草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于1956年1月14日开幕，大会会场设在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等领导人都出席了，参加会议的有省、市党委和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党组负责人。还有部分党内知识分子代表，共1277人。

大会开幕式十分隆重，刘少奇主持，周恩来代表中央做报告，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诸位领导都在主席台上就座。报告主题是讲知识分子问题，实际上已经把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同充分发展科学，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联系起来，正式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号召科技文化界奋起直追，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个报告很有特色，第一，强调“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第二，“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我最早听到的关于多快好省的提法）。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其中特别指出“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他们“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成为“国家的宝贝”。“宝贝”这个提法，就我所记忆的，当年在抗日战争期间的重庆，作为中共南方局领导人的周恩来，就曾经向我

们这些南方局的工作人员说过，“爱国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贝，十几年后，到了新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他再次确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沿用中国民间最熟悉的形象语言称赞知识分子。第三，正确分析了知识分子的现状和阶级属性，这在当时也算是开创性的新闻。他说，旧时代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还有新培养出来的大量知识分子，中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把已经多年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看成工人阶级自己的队伍，这对周恩来和党内部分同志来说，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早在1949年夏季，在新中国建立前的全国文代会上，他也曾说过，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虽然报告所指都是实情，但在当时那样的场合提出，没有相当的政治、理论勇气是不行的。因为当时在党内负责同志中也还有人认为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报告还分析、批评了当时存在的歧视和排斥知识分子的“左”倾情绪，提出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安排、了解、信任和支持知识分子工作，解决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待遇以及在政治上关心和帮助知识分子进步等措施，系统提出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

找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一起，参加了这次大会。分组讨论时，我和统战部几位同志作为大会工作人员，去调查收集资料，然后向以周恩来为首的大会临时党组汇报。

毛泽东在会议结束前到会讲话，指出：现在搞文化革命、技术革命，要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知识分子是可以改变的，党要加强领导，促进他们的改变。又勉励大家说，我们国家人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好，应该建成一个科学、文化、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国家。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超过，把中国建设得更好。

这次会议的震动很大，不少知名知识分子反映，周总理的报告说出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心里话，指出了他们今后应当遵循的方向。很多专家表示今后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加强自觉改造，积极进行科学技术和理论研究，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最大的力量。老知识分子、哲学史专家冯友兰表示拥护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愿意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增添一份力量，并提出了给知识分子创造有利工作条件的几点建议。年轻数学专家谷超豪也表示，一定不辜负党所赋予的艰巨使命，要在导师（苏步青教授）指引下发挥集体的力量，开辟新课题，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做出成绩。

1956年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要求进一步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在全党和国家的各个部门的议事日程上，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个《指示》下达后，知识分子工作大有改善。早先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统战部对知识分子工作的看法有些不一致，中宣部有些同志认为建国以后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也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都应由统战部管。中央统战部不同意。统战部有个知识分子处，只管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中央指示之后，知识分子工作加强了，但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有人还不以为然，在实际工作中，不时还有所反映。

总的说来，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之后，各级党政机关按照中央指示，对知识分子工作的认识都有明显提高，低估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进步，低估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

级的一部分，不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积极性等“左”倾宗派主义倾向，逐步受到批评和有所纠正。

各级党组织在加强和改善知识分子工作中，多数能够逐步克服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等“六不”现象，使大多数知识分子感到“春天来了”，人人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发展我国的经济、科技、教育、文艺等事业而辛勤劳动，献策献力，并且对未来充满信心。

大会之前，轻工业部等5个单位作过一次调查，高级知识分子安排不当，用非所学的约占十分之一。周恩来认为这是严重的浪费，要求把专门人才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关于为知识分子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帮助知识分子解决居住、医疗、休息等具体问题，周恩来说，解决好行政管理人员照顾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差不多解决一半。他本人对这方面的工作，都是以身垂范，躬亲力行的。1956年他亲自给《知识就是力量》科普杂志题写刊名。1957年春节为天津南开中学青年题词：努力学习，积极劳动，热爱祖国，提高政治觉悟，树立艰苦朴素作风，准备做一个有文化、有技术的工人和农民，准备做一个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的知识分子。

除了在工作上、生活上关心知识分子以外，周恩来非常注意在政治上关心知识分子的进步。他亲自教育、培养程砚秋、李四光入党，是从政治上关心知识分子，认真执行中央有关决议的典范。

程砚秋是京剧表演艺术家。日本军队侵占北平古都时，他因拒绝为侵略者义演捐献飞机而遭搜捕迫害，甘愿在京郊务农为生，保持了高尚的爱国民族气节。北平刚解放，周恩来便登门拜访他，适他外出而留条致意。中央知识分子会议以后，周恩来亲自关心程砚秋入党的事。有一回宋庆龄送几只螃蟹给周恩来，周恩来利用请吃螃蟹的机会，约请程砚秋和程最敬佩的贺龙元帅一起长谈，教育提高程砚秋对党的认识，后来他和贺老总两人做为程砚秋的入党介绍人。他在程的入党志愿书上认真写了意见和希望，并且将这些内容亲笔抄送程砚秋。当时那封信写道：

砚秋同志：

我在你的入党志愿书上，写了这样一段意见：

程砚秋同志在旧社会经过个人的奋斗，在艺术上获得相当高的成就，在政治上坚持民族气节，这都是难能可贵的。解放后，他接受党的领导，努力为人民服务，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这就具备了入党的基本条件。他的入党申请，如得到党组织批准，今后对他的要求，就应该更加严格。我曾经对他说，在他被批准为预备党员期间，他应该努力学习，积极参加集体生活，力图与劳动群众相结合，好继续克服个人主义思想作风，并且热心传授和推广自己艺术上的成就，以便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发扬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精神。

现在把它抄送给你，作为我这个介绍人对你的认识和希望的表示。

周恩来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1957年12月初，程砚秋给周恩来回信表示：请放心吧，我永久忠诚遵守党的一切，有信心为人民去工作，不会使您失望的。

1958年初，程砚秋在入党3个月后不幸逝世，周恩来在程生前关怀其事业、进步，以后对其遗属也仍经常关心。1960年全国地方戏表演艺术家到北京开会，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借机请常香玉、红线女、袁雪芬等和程砚秋夫人果素英到西花厅吃饭，以聚餐的形式为程夫人散心，吃完午饭还陪客散步

漫谈，客人们看总理对文艺界朋友遗属这么体贴入微，都感到党的温暖可亲，心中异常宽慰。

对于知名的科学家、艺术家，周恩来很关心和大力支持。对从工人中成长起来的土专家，解放后培养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也关怀备至，热情支持。如东北的四平植物油厂工程师李川江，是一位在工作岗位上自学、钻研成才的知识化青年工人，1952年当他才20多岁的时候，总结研究了大豆出油技术，每担大豆可产油12斤多，比当时别人的产油率高出百分之十几。第二年他又把每担大豆的产油量提高到14斤，带动了东北地区油脂生产取得良好的效益。在1956年第一次全国群英会上，周恩来亲自把他介绍给毛泽东。李川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鼓励，积极性创造性更加发挥起来，一年多以后，又把出油率提高到百分之十七，光吉林全省推广他的经验——浸出机械化，每年即可增产油1400万斤。周恩来在第二次全国群英会上，亲手授给他“油脂工业的旗帜”锦旗一面，同行工人自豪地说：“油脂工人不种田，也要增产万石粮。”

在党中央和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关怀、示范和督促下，全国大多数地区和部门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待遇、工作条件、生活状况，在1956—1957这两年间，确实有了明显的改善，比如：知识分子入党的人数增加了，参加非业务性会议和行政事务方面的时间减少了。当时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要保证专业人员有六分之五时间用在业务上，对解决科技文化战线上一大严重问题——专业人员参加非业务性活动和行政事务太多，妨碍正常业务和生活，有所缓解。科研人员需要参阅必要图书、查找档案资料、技术资料 and 解决住宿、医疗以至配备助手的事，也都不同程度得到解决。周恩来在这段时间里，根据群众建议和国外科学文化发展经验，还提出：按照知识分子贡献大小相适应的调整工资，消除平均主义；修改不合理的升级制度，建立学位、学衔、荣誉称号，奖励发明创作和优秀著作等主张，并在部分地区和部门进行小范围的试行和探索。在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工作采取一系列改善、加强的举措之后，经济、科研、文化战线不断传来喜讯，比如水稻杂交育种、推广针刺麻醉、人工合成胰岛素晶体成功等等，其中许多项目都渗透着周恩来倾注的心血。

在向现代科学进军方面，各方的看法比较一致，发展也比较顺利。知识分子问题大会之后，全国出现向科学进军的新气象。中央明确指出：要尽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的科学和文化的落后状况，力求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在12年内（至1967年）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其中，并把大力培养知识分子的新生力量，提高知识分子业务水平，作为制定远景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一项，要求作出全面规划。1956年3月，中央政治局又批准成立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从事1956—1967年科技发展规划。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由陈毅、郭沫若、李四光、薄一波等组成，陈毅当主任（1956年11月陈毅因病休养，改由聂荣臻担任）。中央对这件事非常重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等领导人特地在怀仁堂听吴有训、竺可桢、严济慈等专家的科学专题报告。国务院召集了各种门类学科的科学家、高级技术人员757人，又聘请近百名苏联专家参加编制规划的实际工作，请16名苏联著名科学家来华讲学，历时8个多月，即把规划纲要草案编成。经过征求意见，修改定案，次年12月又派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率中国访苏科技代表团赴苏洽谈确定122个科技合作项目。郭沫若在11月初参加毛泽东率领的中国代表团，

参加苏联纪念十月革命 40 周年庆典后，留在莫斯科带领中国科技代表团活动。

周恩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编制这个 12 年规划提出明确的指寻思想：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短缺又是国家建设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补足起来，使 12 年后我国的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大国，一次，他在听规划委员会负责人汇报后，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尽量瞄准当代世界的新兴科学技术，采用世界的先进技术，不失时机地迎头赶上。根据我国国力有限的实际情况，我们在选择和确定科研项目上，要重点发展，避免分散力量。按照“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原则，规划委员会最后选定 57 项，600 多个课题，其中重点 122 个课题。这些项目主要包括：原子能和平利用、电子半导体、计算机、遥控技术、喷气技术、生产流程自动化、精密仪器、石油资源勘探、新的合金、冶金技术、燃料综合利用、新的大型动力机械，黄河与长江综合开发、农业化学化机械化电气化，几种主要疾病防治和自然科学中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等。对于理论问题，他还特别说明：如果我们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他对规划过程的及时指导，对正确制定规划和组织实施起了重要作用。

通过制定和执行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把知识分子工作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结合起来，并且在执行中不断改善知识分子工作，可以说这是周恩来高瞻远瞩的一个创举。他把群众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重大难题的研究解决，给科学家们提出任务，作为研究课题，比如：北京石化的烟柱、地下水资源、云南锡矿工人的肺癌、新疆维吾尔农民的甲状腺肿、东北伊春林区工人气管炎防治等，请广大科技工作者朝着一个又一个的目标去奋斗，切切实实解决一个又一个的实际问题，走向广阔天地。在科技专家做出成绩时，他便指示有关部门，推广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从而促使知识分子工作、生活条件的进一步改善。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张光斗，是美国哈佛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周恩来对他关怀信任。在 1956 年全国民进生产工作者会上，他热情地鼓励张教授不断前进。张光斗在建设密云水库，特别是处理当时的抗洪蓄水方面搞得很出色，在举行建国 10 周年的国宴时，他又把张光斗排到第一桌，向张敬酒，此举不仅是对某个有成就专家的表彰，更重要的是为众多的水利专家的工作开拓道路。比如采纳专家意见，在制定下达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中，水利计划先于其它计划下达，这对水利专家和整个水利工作都是很有益的。

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把周恩来称为新中国原子核科学技术事业的领导者，他说周恩来领导和部署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成功经验，将继续在新的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为了把知识分子工作搞得更好，1956 年 5 月，国务院成立了专家局，由副秘书长齐燕铭兼局长，主管国内专家工作的管理协调、检查、督促等。对于国外专家，早些时候已经有了国外专家局，为外国来华专家提供优待和服务。国内专家局成立以后，国务院各部门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有专门机构经常过问，问题的解决相对就会快些或好些。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把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同发展国家经济建设文化建

平问题，对文化艺术方面的工作涉及不多，但会议关于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政治状况分析和方针，政策，同样给文艺界人士带来春天的气息。

由于工作关系，周恩来在建国前就同文艺界的知识分子有着广泛的联系。为了努力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朋友，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建立新中国，他对文艺界的朋友总是十分尊重、爱护和以礼相待，不论年老、年轻，也不论哪个流派，只要这人愿意为社会进步和中国人民效力，他都给予鼓励和帮助。抗日战争时期，他同有名的言情小说家张恨水的交往是个生动的例子，张恨水是游离于政治党派之外的文人。周恩来并不因他当时有鸳鸯蝴蝶派之称而嫌弃疏远他，而是同样真诚地向他宣传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道理，终于使他有感于全民族抗日的现实，撰写了揭露国民党官场腐败的《八十一梦》，连载于1939年重庆的《新民报》上。周恩来对他的爱国心和正义感给予肯定和鼓励，当1944年6月张恨水50寿辰的时候，《新华日报》特意发表短评，指出张的章回小说“在主题上尽管迂回而曲折，而题材却是最接近于现实的”。“他的作品也无不以同情弱小，反抗强暴为主要的题目”。公正评述张恨水从游离政治走向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争取团结了一个作家，影响了一批读者。解放初张恨水病逝，周恩来还致电哀悼。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的工作十分繁忙，但仍尽可能地关心和联系一大批文艺界的知识分子，比如：关心辛亥革命过来的老诗人、“南社”社长柳亚子的治病，祝贺老画家齐白石90寿辰获得文化部授予“中国人民杰出的艺术家”称号，支持举办徐悲鸿遗作展览和建徐悲鸿故居纪念馆等。这些事情都得到文艺界知识分子的赞赏。

1953年9月，全国第二次文代会请他作报告，他号召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创作有正确思想内容的优秀文艺作品，给予《谁是最可爱的人》以高度评价，说它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将士，还请作者巍巍站起来，让代表们认识一下。

1956年春天，梅兰芳受命带京剧代表团访日。梅兰芳对赴日演出思想有疙瘩，情绪不高。周恩来得知这个情况后，亲自向梅兰芳讲赴日演出与发展中日民间友谊的道理，终于帮梅兰芳解开思想扣子，使演出成功，全团安全归来。

1957年春天，周恩来陪外宾到杭州，京剧艺术家盖叫天去看望过他，他即刻抽时间回访。在一个雨天，周恩来撑着伞步行到盖叫天家里，称赞盖叫天勤学苦练，关心盖叫天的健康和工作，盖叫天感动得热泪盈眶，双手颤动。周恩来在上海时接见了书法家沈尹默。沈尹默高度近视，进了宾馆的房间还看不清迎上来的人就是周恩来，误以为是宾馆的接待人员，顺手把脱下来的大衣交给周恩来，周恩来接过大衣自然大方地挂到衣架上。一开始交谈，沈尹默便发觉自己失礼，连忙表示抱歉，周恩来反而劝慰他不要放在心上。沈尹默专门抄写了毛泽东《沁园春》词送周恩来，后来发现写错了一个字，又重写了一幅，我把有错字的那一幅留了下来，成为纪念周恩来和沈尹默两位名人的纪念品了。老电影工作者陈荒煤说：周总理对文艺工作的关怀、支持和要求，更根本的一点，还是他那时时刻刻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的表现。

这个时候，全国各级和各部门的党政领导，在中央有关指示下，绝大多数都注意加强和改善知识分子工作，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确实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励，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亲密团结，全国社

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发展顺利，捷报频传，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胜利完成。文化、艺术战线的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鼓舞下，已逐步呈现出繁荣兴盛的景象，在小说、散文、诗词、电影等方面出了许多好作品。周恩来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他把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人民的劳动成果、发明创造，看作党和国家的荣誉。1956年出访缅甸时，特地让研制水稻插秧机得到初步成功的中国农科院农业机械化研究所的倪已雄随行，在缅甸搞操作表演，让友邻国家人民了解我国知识分子在解决农民兄弟世代“脸朝黄土背朝天”所做的努力，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和赞赏。

可惜的是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宽松祥和、和谐兴盛的气氛保持的时间不长，1957年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左”倾错误，使党为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进程踏步不前，甚至出现了较大的回流。

周恩来在这年年初出访欧亚11国回来，又忙于领导华北抗旱，他对于发动全党整风，是十分诚恳的。3月间，利用公余在杭州看望住院治病的李四光时，还诚心征求李的意见，希望李帮助党整风。后来，整风转入反右派，他对局势的估计还是清醒的。在1957年6月25日的国务院53次会议上，他批评了政府部门中一些知识分子的错误言论，但总认为这些人中反社会主义的还是极少数。不论是政治斗争或是思想斗争，绝大多数尽管见解不同，还是好意，这是主要的方向。

当时也有人对他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进行攻击，但他仍坚持报告的基本原则，即使在反右扩大化的冲击之下，他在8月8日的外交部干部会上，仍然坚持知识分子的两点论、两面性。不搞赶时髦的一边倒。当时有人要把马寅初划为“右派分子”，中央统战部领导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事，周恩来明确表示说：“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这才使得马寅初免遭厄运。

周恩来在反右运动中想减轻“左”的冲击，曾作过一些努力，比如规定全国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要划右派，须报国务院批准，对国外有影响的人（包括知名知识分子）要划右派须把材料报给他看，虽也保护了一些人，但“运动”还是超越了这些规定，如得过国际和平奖的党员作家丁玲，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照样成了“有派”，连最早建议参照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的孙冶方等都受了错误的批判。倒是他在1957年9月间亲自审定下达的中央关于自然科学部门反右派斗争的指示，提出自然科学方面的反右派斗争，应该按照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特别是对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保护过关的方针，这对一定范围内的知识分子是起过保护作用的。

年底，在中央决定处理右派分子时，周恩来是主张“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他曾亲自同大专院校、文艺、教育、民主党派等方面的知识分子交谈过，征询各界对右派分子处理的意见，主张对犯错误者只要有悔改表现，处理就要从宽，并且强调在科学、教育、出版方面还能做工作的，在艺术上还能登台表演的，只要态度好，还要注意使用他们。

1958年1月中央在南宁召开的工作会上，毛泽东严厉批判反冒进者是“促退派”，“距离右派只差50米”，是导致资产阶级进攻，跟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一起来的一股风。这时周恩来对右派分子的处理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即使说了也无济于事，只好尽其所能，采取一些不同的方式多保护一些人，如

对萧乾、乔冠华等的保护，更多的人他虽想保，最终也未能保住。

当时他对许多老朋友、老部下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事，内心虽有迟疑，但也无法干预改变，只能采取适当方式略表安慰而已。老作家冰心在新中国诞生之前已旅居日本几年。1952年是周恩来派人同她联系，使她同丈夫吴文藻教授自愿回来为新中国效力的。当年夏天，周恩来接见他们夫妇，长谈到午夜，还留客共进晚餐。哪料到1957年的反“右”浪潮把吴文藻也打成了右派，他们夫妇两人尤其是吴教授百思不得其解，总认为自己情愿放弃定居外国的优裕生活，为建设新生的古老中国尽心效劳，绝不是为了“反党反人民”。1958年4月间，周恩来同邓颖超特地把冰心接到西花厅，劝解冰心说，这时最能帮助吴教授的人，只能是他最亲近的人了，你要劝他思想别太窄。当冰心向其丈夫转达了总理夫妇对他的关怀时，吴文藻得到极大鼓励，尽管心里还感到委屈和苦闷，却坚信事情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后来1959年吴文藻被摘掉“右派”帽子，1979年终于得到平反。1958年初，当周恩来得知诗人艾青被打成“右派”后，感到非常惋惜，接连说：“怪我知道得太晚了，太晚了！”艾青是1940年在重庆由组织介绍到延安的，周恩来对他的工作和思想有所了解。1957年他写了一篇散文《养花人的梦》，意思说月季花虽然俏丽，受园丁的宠爱，但一花独开，再多再好也只是一种，于是盼望各种花于迎春前来相会。这篇散文仅是寓言而已，但当时却被扣上对抗百花齐放的罪名，戴上“右派”帽子，好在不久王震将军把艾青收为“农垦尖兵”，在那样的日子里，相比是好受一点。

脱帽加冕风波

党内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有过几次反复，周恩来总是按照党的八大和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精神，想方设法贯彻始终，尽量减少“左”倾错误对党的事业和知识分子的伤害。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在改变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时，有人断言，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1958年5月，在“大跃进”声中提出“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的八大二次会议，接受毛泽东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的思想，宣布我国社会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右派分子同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被称为一个剥削阶级；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另一个剥削阶级；工人、农民是为两个劳动阶级。照这个主张，知识分子实际上被视同资产阶级相似的剥削阶级。在当时所谓高举“三面红旗”的时刻，到处有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同“插红旗、拔白旗”的组织措施相结合，知识分子受到了压抑，不能不跟着这股风转，处境自然十分困难。

那时，周恩来在需要表态的时刻，总是检讨自己“保守多一点”，“我是唱低调的”。但当他得悉1958年12月22日毛泽东致信陆定一，建议“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的情况后，即召集中央意识形态部门的负责人到西花厅开会，以贯彻毛主席指示为题，从带头检讨工作中的问题入手，批评当时“左”的作法，要求与会同志保持清醒头脑，要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注意纠正正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偏向。

次年4月，他又约集在京开会的文艺界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谈话，分析“大跃进”中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倡“两条腿走路”，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和改善知识分子处境继续呼吁。可是当时全国正处在继续“跃进”的热潮之中，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忠言，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的挑战书，周恩来的意见“讲了以后得不到反映”，也被打入“冷宫”。

1961年6月，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请周恩来于6月19日到会讲话。他在事前调阅了大批文字资料，又同部分代表亲切交谈，听取了代表们的意见。开会当天，他让我随行，参加会议并做简要记录。

在这次会上，他讲了7点意见，主题是提倡民主作风，反对“一言堂”。他说：我们要造成民主作风，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作风；要改造干部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他批评了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把一句话的错误，一种想法的错误甚至把那种本来是允许的，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种说法想法，也都看成毒草、邪道，那就不对了。其中也讲到：精神生产有自己规律，不能限制时间和数量，强求一致。对于阶级斗争要具体分析，不要把对反革命的警惕性和人民内部的思想改造混同起来。人民内部的思想改造是长期任务，是自我改造，互相改造，要和风细雨，不要“五子登科”。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形象，通过形象思维才能把思想表达出来，没有了形象，文艺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为政治服务呢？标语口号不是文艺。讲的都很精辟，特别是提到：中心问题在于领导，在于教育，在于深入群众，总

起来一句话：要实行调查研究。更是切中时弊。他不断抓住时机，为广大知识分子排忧解难，仗义执言，多数与会的同志多次用喜悦的眼神和热烈的掌声向他表达内心的尊敬。

7月6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周恩来表态支持并发表“我们为科学家服务好了，科学家就为社会主义服务得好”的意见。会议通过这个《14条》，在批发该件时加上按语：“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以端正方向，正确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中央文件的下达和周恩来的不断呼吁，为改善1957年以来知识分子处境，鼓励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服务起到良好作用。广大文艺工作者以至大多数知识分子，所以尊敬、爱戴周恩来，把他视为知己，一方面固然因为他深刻了解文艺发展规律，更重要一方面是他作为一个领导者，能够切实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始终如一地身体力行。比如，他同电影界的老行家赵丹，对《达吉和她的父亲》的小说、电影孰优孰劣问题有过争论。赵丹认为小说写得比电影好，他不同意赵丹的意见，认为《达吉和她的父亲》小说和电影都是一样的好作品，而电影能够运用特有的手法，比小说表现得更好。但是在电影中，由于导演不敢放开手，处理达吉父女相会不敢让哭出来，有美中不足之感。赵丹执意坚持自己的观点，在一次郊游的路上，始终不赞同周恩来的意见，后来周恩来对赵丹说，你我的意见都是一家之言，还可以继续讨论嘛！

事后，赵丹对人说：“我怕部长、书记，不怕总理。”总理讲民主作风，同一些领导人习惯用行政权力决断学术是非，甚至把学术探讨上升为政治思想斗争问题，大不相同。

戏曲艺术大师梅兰芳1961年8月间在北京逝世的时候，周恩来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当时正值3年困难时期，有关部门建议一切从简。周接到请示电话后，即命我通知有关部门，要简朴、隆重开好追悼会，他和陆定一、郭沫若、周扬、茅盾等61人参加治丧委员会，亲自到人民剧院追悼梅兰芳，以此进一步团结鼓励文艺战线上的广大知识分子。有些文化界知名人士去世，如柳亚子，周恩来不仅参加执绋、主祭，而且指示革命博物馆，收集珍藏他的遗物、资料、诗文手稿6千多件，让老诗人获得崇高荣誉。

1961年秋，在台湾的画家张大千的前妻杨婉君把张的临摹画260幅献给政府，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奖给杨婉君4万元，并嘱其将其中2万元做为张大千日后到内地探亲旅游之用。

同年冬，电影演员舒绣文心脏病发作，周恩来工作到将近午夜还抽时间去看她，劝她一定要注意休息，他说：“你要明白，你的身体不单是你的，而且是党和人民的。人民需要你，你一定要战胜病魔。”次日，邓大姐又去看她，而且带了治病的药和自己种的黄瓜。类似的事例不止一起，豫剧名演员常香玉回忆，她于1959年发过癌病，病情紧急，也是周总理发话，让人限时送到北京医院，请肿瘤医院院长吴桓兴亲自诊治，邓大姐也去看过，当时她还不知道是总理亲自过问，事后听老同志讲了才知道的。女歌唱家张权，是留美回国的音乐文学硕士，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东北劳动，丈夫也去世了。1962年她应邀参加政协三届三次会议，张权在会上唱《绣荷包》，受到热烈赞赏。张权问总理：“犯了右派错误的人，改好了，还能成为左派？”周恩来明确答复：“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

1962年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为国家科委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

文化部、剧协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剧本创作座谈会共同组织的大会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取得人意外的轰动效应。周恩来同陈毅到广州，本来是想向这两个会议代表传达党中央七千人会议精神，继续端正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方向，以调动科技、文艺等部门知识分子积极性，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科学、文经教育事业服务的。他们听了会议领导人聂荣臻、郭沫若等的汇报后，约见出席两会的党员负责人座谈，包括当地党委领导陶铸等人都说近年内下达的《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十条》等条例，使知识分子的工作环境有了恢复，但大家最关切的是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有没有变化，也就是知识分子到底是属于工人阶级，还是属于资产阶级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周恩来再次按照 1956 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观点，明确重申：社会主义时期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他说，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中。列宁在对“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的说明中包括了知识分子，我们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要以这个为纲。12 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这就恢复了 1956 年中央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报告在分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后，指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因而能够站在民族立场上，反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卖国贼，逐步成为爱国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

中国知识分子有两重性：一方面是脑力劳动者，可以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又与旧社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党和国家有必要与可能对他们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知识分子也有必要与可能摆脱旧社会的影响，成为适应新社会需要的知识分子。所以说，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根本政策，也是知识分子本身的根本任务。

周恩来还有针对性地指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是必要的，但这决不会动摇我们党在整个历史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根本政策和战略方针，决不会改变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

他因国事繁忙，讲完话先回北京，委托同行的陈毅在 3 月 5 日再向两会代表讲话。陈毅快人快语，他说经过建国后 12 年的考验，尤其是那几年严重困难的考验，证明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爱国的，相信共产党，跟党和人民同甘共苦的。10 年、12 年，如果还不能鉴别一个人，那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力了。他幽默地宣布给广大知识分子“脱帽”（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冕”（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向到会代表脱帽行礼，引起全场的欢腾轰动。此举引起了全国的热烈反应。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和陈毅的讲话，长时期在知识分子中留下极深印象。广州会议的消息传来，大多数干部、群众都欢欣鼓舞，但也有不赞同的。在党中央内部也有个别高级干部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周、陈在广州的讲话，周恩来曾请示毛泽东表明态度，毛泽东不置可否，过半年之后党对知识分子政策便再次出现大反复。

3 月 28 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事先经过党中央讨论批准，其中在总结“大跃进”以来的政府工作的问题时，也谈到几年来统战工作的经验教训，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强调团结他们一道工作的重要性。再次指出：

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尊重。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属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我们应当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周在报告中还谈到我国阶级斗争总的趋势是波浪式的，但是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如果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或者短期内可以结束，是不对的，同样，如果认为阶级斗争不是向着缓和方向发展，而是不断尖锐化，也是不对的。报告不仅得到大会的批准，而且在全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应。60年代初期，我国文学、艺术、科技、教育都出过一批好作品，成果显著，与党的调整、改善知识分子政策有极大关系，这当中，周恩来总是党内坚持正确主张的领导人之一，他坚持和发展了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理论的正确思想观点，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极力克服阶级斗争扩大化在这个问题上所带来的偏差。

周恩来这次在广州所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报告，同他1951年9月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报告和1956年代表中央在北京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立论正确、精辟，观点互相贯通，是党在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三篇历史文献。

历史的发展总不会笔直上升，一帆风顺的。在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把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断言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所以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会上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黑暗风”。当时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曾建议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甄别平反的试点，也被指责为“猖狂之至”而给打下去了。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北戴河）的中心组会上，也讨论了知识分子“摘帽”问题；有人批评周恩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没有阶级观点，陈毅在广州会上讲话是“上当”等等。毛泽东在会上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人阳魂过来了，但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当时许多同志都感到很紧张，周恩来心情很不愉快，后来在11月26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终于对别人的批评指责作了辩解说明：对广州会议《论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不能说没有阶级观点。在列宁的著作和刘少奇关于宪法的报告都是这样提的。会上，总书记邓小平以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是中央批准的为理由，赞成对知识分子总的提法，“一切按总理在人大报告所说，把那一段话再印一下，统一语言。”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的内容，当时只传达到高级干部，没有详细向下传达，虽然“左”倾错误的气氛又逐渐趋向严重，但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毕竟还有点“内紧外松”。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暂时还糊着一层薄纸没有捅破，有点扑朔迷离，到了“文革”开始之后，终于公开排上“臭老九”了。周恩来不管别人舆论造得多凶，仍然坚持按党的正确政策，注意关心和保护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1963年1月28日，周恩来在上海参加各界人士春节座谈会上，他以宽松祥和的笔触，为会议题词：

百家争鸣 薄古厚今
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

各党各派 长期共存
同心同德 自力更生

次日，他应邀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讲话，题为《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他说：“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这次会议有一项内容，是要制订十年科技发展规划，周恩来就实现科技现代化的主要要求，提出四点原则建议，实事求是，循序渐进，互相促进，迎头赶上。同时对如何实现科技现代化的要求，又具体指出科委和政府有关部门，既要加强思想工作，组织科技力量，调整各方面的关系，还要适当改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对实验室、原材料、图书资料、配备助手、技术工人以及科学家的生活、居住问题，都要帮助解决，让科学家们少在专业以外的事情上花时间。

作家冰心在这一年把她 1959 年到 1963 年间参观访问、读书看报、和朋友交谈的点滴体会和深刻印象都记下来，编成《拾穗小札》出版。周恩来看了很高兴，在人民大会堂同她会见时说：“冰心同志，你又在写文章了，好嘛！从作品里看出来，你是爱国、爱人民的，要继续写下去，常常写。”冰心感到总理的话像春天的细雨，不论是参天乔木或一针新碧都得到了滋润。

1963 年 6 月，周恩来来到苏州看望在那里休养的陈云同志，得悉解放前有鸳鸯蝴蝶派之称的著名作家周瘦鹃，解放后潜心园艺，搞出许多好盆景，但写作却很少。周恩来特地到他家里看望，鼓励他边搞园艺边写作，希望他写出好作品，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坛作出努力。

7 月 22 日，周恩来应邀向北京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作报告，题目是《全面发展，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他殷切地告诉青年们：“党和国家对你们的要录，就是要你们为劳动人民服务，成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也在 1963 年，全国评选优秀剧作，青岛工人高思国创作的《柜台》被评上了，按规定该让作者到北京颁奖大会上领奖，可是当时有人讲高思国家庭出身有问题，让来不让来？问题反映到总理那里，总理说：“要尊重人家劳动，主要应看本人表现。”高思国才得以到京领奖。

周恩来对生产第一线的专家、知识分子更是推心置腹，热情关怀，很多科技专家都把他视为知心人。以水利工程而言，他多次在长江、黄河等工地现场，向林一山、王化云等专家询问治水规划，工程设计、施工进度，亲临现场支持专家工作，帮助解决问题，有时还把专家请到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听汇报，共商治水大计。为水利专家铺垫道路，目标就是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作为共和国总理，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他有时下工地竟亲自过问移民安置，对移民对象以工代赈等事，对工程技术人员的不同意见，他都能认真考虑，包括支持黄河放淤试验。

钱正英是 30 年代上海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她 40 年代参加革命，在解放区做水利工作，1952 年任水利部副部长。周恩来对她是信任、关怀又严格要求的。有一回，周恩来曾向国际友人介绍钱正英的情况说：“她原是大学生，学工程的。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到了解放区后参加水利工作，很快当了副部长。女同志当副部长。不容易。”1959 年水电部曾计划修建水利展览馆，展出水利工作成就，周恩来不赞成这种做法。当他知道钱正英同

意建这个馆后，对她说，“没想到你会做这件事！”她接受总理批评，立即停止筹建。1965年华北干旱时候，当时有人主张密云水库要分水保50万亩水稻，钱正英认为要从最坏处作准备，不要再分水灌田了。周同意水库水要留有余地，主要应发动城乡节约用水。结果这样做是对的。在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时，青年技术人员温善章，不同意规划的部分内容，主张“打洞排沙”，可是他的建议当时没被采纳。几年之后，三门峡水库积沙问题严重，最后还得打洞排沙，花时费力，耗费也大。周恩来想起当初提建议的青年技术员，一时没找到温善章，即指示有关人员要登报声明，说明他对了，而包括周本人的领导、专家都错了，“为他恢复名誉”。

1965年在全国青联四届二次会上，有位少数民族青联委员莫德格玛，对我国出国文艺演出中只演旧戏，不演反映我国革命和建设的节目提出批评。周恩来从会议简报上看到这条意见，很快派人把莫德格玛接到中南海，并把外交部、对外文委和演出公司等部门的负责人一起请去，由莫陈述意见，要各部门加以研究，立即改进。此事促进了现代节目的演出，产生了好影响。

这年夏天，周恩来出访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亚，当飞机经过帕米尔和喀喇昆仑山交界的、海拔4300公尺的红其拉甫导航站时，他向寻航站的同志发出一筒短电报说：你们在高山辛勤工作，不畏艰险，克服了重重困难，望你们继续努力。作为一国总理，在出访途中的飞机上，能想起边界高山上导航站人员的艰苦生活，并发电致意，恐怕也只有周恩来会这么做了。

周恩来对本国知识分子是如此尊重、关怀，对来华的外国专家也是非常尊重和关怀的。比如，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名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在新中国诞生之前，就曾为中国和世界人民写了大量文章，做了大量工作，1958年来北京定居。1965年斯特朗80寿辰时，周为其“40公岁”祝寿，祝她永远年轻，继续写出大量文章。斯特朗及到会宾客对此都深感愉快。

也是1965年4月，我国请日本女排教练大松博文来中国任教1个月。大松在上海训练中国女排，把他训练日本女排冠军贝塚队的办法部无保留地拿出来，训练非常艰苦，但卓有成效，其间也有人对大松在训练中体罚打骂运动员持批评态度。这年“五一”，周恩来请大松赴京参加五一庆祝活动，当面感谢他在任教中的负责态度，又说服他不要打骂运动员。大松很受感动地说：有这样的总理，中国女排一定会比日本强。

对居住在国外的华人知识分子，周恩来也时常关心，注意团结和发挥他们的爱国积极性。1957年，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当他们在瑞典首都领奖的时候，周恩来派出的代表，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张文裕专程赶到斯德哥尔摩向他们表示祝贺。张文裕是李政道、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候的老师，他受总理委托，去瑞典之前已去看过杨、李的亲属，带着两家亲人的情谊上路。

张文裕比李政道、杨振宁先到斯德哥尔摩，当李政道和杨振宁乘坐的飞机到达时，张文裕也去迎接。李、杨被前来欢迎的人和记者们团团围住了，张文裕挤都挤不进层层人圈。“杨振宁！李政道！”张文裕教授急中生智，干脆用中国话大声呼唤。杨振宁、李政道惊奇地听到有人喊他的中国姓名，马上循声寻人，终于见到了张文裕。不约而同地问道：

“张老师，你怎么来了？！”

“周总理派我来的。”张文裕代表新中国总理，祝贺他们在科学领域取得可喜的成就，使这两位科学家非常感动。

1972年10月，李政道同夫人秦慧一起回国，周恩来与郭沫若会见了他们，同他们谈论到优秀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报考大学，不必先劳动几年再考。周恩来还采纳了杨、李等科学家的建议，指示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要加强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特别关照要把高能物理列为主要项目之一。

杨振宁、李政道多次回国讲学，指导科学研究。为了帮助祖国培养物理科技人才，他们为选拔、推荐赴美国深造的留学生、研究生提供方便。

尽管周恩来和党内外许多同志不断为加强和改善知识分子工作而努力，可是在当时全国“左”倾错误气氛越来越浓的情况下，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的处境却是每况愈下，甚至灾难深重。周恩来想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心愿，只有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能变成现实。但是周恩来对我国教育、科技、文化和知识分子的理论和实践，却继续在发挥积极的影响，有“中国导弹之父”之称的钱学森说：周总理为中国大规模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成功的经验，而且是结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

电影界知名人士陈荒煤说：“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和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 and 繁荣，将永远闪耀着周恩来文艺思想的光芒！”

作家冰心称赞“总理是中国亘古以来给予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位人物”。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说：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自1962年广州会议开始的一场风波，有了公正的结论，周恩来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和工作，为开创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工作创造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为了台湾早日回归祖国

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台湾是我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实现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也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的神圣职责。周恩来肩负着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6年以前，我党的对台方针主要是用武力解放台湾。为此，1950年进行了军事部署，成立了前线指挥部，由粟裕任总指挥。为了培养台湾干部，把参加过“2·28”事件后退到大陆的干部和解放军中的台籍士兵集中在台湾干部训练团学习，对台工作关系集中在指挥部，制定了具体攻打台湾的计划。后来，由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情况发生了变化。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声称“台湾地位未定”，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游戈台湾海峡，空军第十三航空队进驻台湾，企图以武力阻止我解放台湾。6月28日，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严正声明：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我国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这个声明，表达了中国人民统一祖国的坚强决心。

进入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开始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1953年7月，朝鲜停战达成协议；1954年4月至7月，日内瓦会议签订越南停火协议，国际紧张对峙局面有所缓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地位的提高，美国对我国侵略和包围、封锁、遏制政策屡遭失败，海峡两岸的紧张形势也有所缓和。为适应变化着的形势，毛泽东提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

1955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会议，行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

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总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美国侵占台湾，造成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1956年，毛泽东关于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毛泽东主席还宣布：“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根据这个精神，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正式宣布了对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指出：凡是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什么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咎既往，可以回大陆省亲会友，参观学习，来去自由。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这个行动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予应得的奖励。他号召：“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此时，对解决台湾问题方针已从“武力解放台湾”正式转为“和平解放台湾”，但没有放弃战争方式的承诺。

为了开展对台工作，中央成立了“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由李克农和罗瑞卿负责，徐冰参加，罗青长、凌云和我进行具体工作。

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爱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和“来去自由”的口号，还提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7月16日，周恩来同香港记者曹聚仁谈话，讲到国共两党可以第三次合作时说：“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曹聚仁曾在赣南和蒋经国共事，周恩来希望曹聚仁将此消息转达台湾当局。

为了进一步摸清中共对台政策的底，国民党遂于1957年春派“立法委员”宋宜山（宋希濂的哥哥）到北京作“实地考察”。李维汉和罗青长会见了。中共提出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统一后，台湾作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的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预；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务的领导。但外国军事力量一定要撤离台湾海峡。

1958年，美国政府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直接插手台湾事务，竭力推行“两个中国”，企图制造“划峡而治”的事实。蒋介石坚持要“反攻大陆”，以金门、马祖为基地，出动军队，不断对我沿海地区进行骚扰活动。为了粉碎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8月23日，在毛泽东领导下，周恩来亲自组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的战略行动。这次行动的目的是，通过有限的军事行动，用炮火与台、澎、金、马保持“联系”，维持中国内战的态势，并利用美蒋的矛盾，打击美蒋的嚣张气焰。打击美国企图霸占台湾，让台湾蒋介石集团把台湾同大陆分开，划峡而治。这是一场政治仗。

在美蒋矛盾面前，中共中央实行“联蒋抵美”政策，与其台湾被美侵占，不如给蒋看管。炮击金门时，毛泽东曾请章士钊写信给蒋介石，并把“联蒋抵美”的方针事先告知了台湾。台湾当局也心领神会，拒绝了美国要求国民党从金、马撤退制造“一中一台”的阴谋。

8月的一天，毛泽东接见了香港来大陆了解情况的记者曹聚仁，并谈了话。关于炮击金门行动让曹转告台湾，曹在《南洋商报》上透露了此事。

10月6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30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25日，毛泽东再次以彭德怀的名义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文中指出：“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化敌为友，此其时矣。”“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

随后，在国共两党高层领导中都有私谊的章士钊先生从北京到香港，通过关系，向台湾高层转达中共中央的政策：一种是暂时不谈，双方先作有限度的接触，如互访、通邮通电，然后，通机通航；另一种是台湾可拥有自己的地方政府、军队、党组织，经费可由大陆负担，只要求台湾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是，台湾方面对此表示冷淡。1959年2月，毛泽东出于统一祖国275的真诚，在一次对省、市委书记的讲话中指出，对台湾“给

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当时，虽然还停留在“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上，但实际上，毛泽东为实现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进而和平统一祖国指明了方向。

1959年12月14日，周恩来接见首批特赦战犯溥仪、杜聿明等11人时，曾经寄语杜聿明向台湾传话：“海峡两岸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一家人。”又申明“反对托管台湾”、“反对搞两个中国”。“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1960年底，周恩来与美国记者费利克斯·格林的访谈中指出愿意与美国谈判的同时，再次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是我国的内政问题”。

1960年7月，章士钊到香港向台湾高层转达中共关于和谈的信息。章赴港前，于7月17日晚9时30分在北戴河寓所，与周恩来作了一次谈话，当时我也在场，周恩来说雷啸岑已回港，吴铸人可能来港（按：雷和吴都是为台湾当局了解情况的人），如谈时，可以将以下意思透露过去：蒋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名和利。利的问题，只要把台湾归还祖国，国家是可以补助的。名的问题，当然不只在台湾，而在全中国。荣誉职务很多，可以解决的，中共自有善处。既有台湾之实（权利），又有全国之名，不比只做台湾一个小头而且美国迟早要换掉更好吗？但蒋大概是要等到同美国的矛盾要爆发时才会选择的。美蒋的矛盾总是要爆发的。章士钊说：“是否可以把张岳军（即张群）作为一个对象来谈？”周恩来说：“张对这件事根本还未接触，目前还不适宜。”章提到对台写信问题，周恩来说：“他们如果要求的话可以写，但要经交通送来商量。”

60年代初，根据周恩来概括的毛泽东也多次指示并经主席审定的我们党的对台政策，归纳为有名的“一纲四目”。一纲即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为：一是台湾统一于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二是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当时台湾每年有8亿美元的赤字，毛泽东表示，8亿美元我们可以给）；三是台湾的社会改革都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四是双方互约不派遣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毛泽东讲，你不派白色特务，我不派红色特务。中共中央领导人还一再表示：台湾当局只要一天守住台湾，不使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大陆就不改变目前对台湾的关系。

1962年，有一次，周恩来邀张治中、傅作义、屈武在钓鱼台吃饭，席间谈到台湾问题时，周恩来希望他们写信给台湾当局，告诉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后来，屈武给于右任，张治中、傅作义给蒋经国、陈诚，傅作义给张群分别写了信，传达周恩来的意思。

1962年至1963年，周恩来多次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不能成为美国占领下的保护国，也不能搞两个中国”，周恩来几次谈话，都在国共第三次合作问题上，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和灵活的策略性。

前一阶段的对台工作，在上层秘密联络方面，都是经过周恩来直接向毛泽东报告的。通过国共两党高层都有深交的张治中、傅作义、李济深、邵力子、章士钊等爱国民主人士，分头寻找线索和渠道，把我们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信息传达给蒋氏父子和陈诚。蒋介石利用我们宣布与台湾谈判的公开号召，派一些人员来大陆摸我们的底。周恩来分析，这是蒋介石的一种政治手腕，刺探我们的高级情报，来摸我们对台政策的底牌。这一时期，蒋介石通

过各种名义和各种关系派了一些人到大陆，说要与中共高层接触。有一次派了4个人来，3个到北京，1个驻香港。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会见了其中一些人。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说这些人带来了各种消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不论是真是假，是虚是实，一时也判断不清，我们要心中有数，以假当真，假戏真做，最后弄假成真。这段时间，通过张治中、傅作义、章士钊等，替毛泽东和周恩来传话及送信。

章士钊是在台湾上层有较多影响的人。周恩来曾3次带罗青长到章家看望，研究台湾情况。1973年，章士钊患病住北京医院后，章曾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信中说：“与其让我僵卧北京，不如到香港动一动。”毛泽东将章的信批转给周恩来办。周恩来对此事先不知道，他找有关负责同志研究，了解到章还有一位夫人在香港，认为应让他去，但章是人大常委，因患病得坐专机飞港，就决定由外交部先跟港英当局谈好，然后由民航派专机带上医务人员陪章飞香港。经报毛泽东同意后，周恩来又到北京医院看望章士钊，把拟用专机送他去港的事告章时，章很感激政府对他的照顾。周恩来对章说，你到香港好好休息。我们的对台政策不变，你还可以在港做对台工作。章到港3个月在港病故。周恩来又安排用飞机将章的骨灰运回北京。毛泽东说，章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的关系很好，1920年在上海时，章资助过我。章在北洋政府时任教育总长。他是1949年南京派往北平谈判的国民党代表团成员之一，他在国民党幕僚阶层中有各种关系和朋友，有的可向蒋介石进言，来往较多。一直到现在传言还很多，章主要是起了特殊作用。比如，在炮击金门时，他给蒋介石写过一封信，毛泽东对其中几句话很欣赏：“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云（按：原稿是“遥望南天”，毛泽东认为把台湾看作“南天”不恰当，所以改为“南云”），诸希珍重。”章士钊对蒋介石讲：“溪口花草无恙，奉化庐墓依然。”毛泽东很称赞这些话，谈话中讲到我们同台湾谁也离不开谁，就像《长恨歌》中所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蒋介石把枝连到了美国，而美国却连根都会挖掉。

我党建议和平谈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可从长商议，但已达到了“促蒋拒美划峡而治”和“联蒋抵美”之目的。毛泽东指示解决台湾问题要靠实力派，主要是指蒋氏父子和陈诚，他们之间矛盾重重。蒋第三次连任总统，我们都捎了话，表示赞成，支持蒋介石，促进他们内部团结。周恩来通过张治中给蒋介石、陈诚写过信。周恩来在信中归纳了四句话：“局促东隅，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1965年3月，陈诚病逝。台湾报纸发表了陈的遗嘱。一般的遗嘱，都要讲国民党的反共八股，包括两方面：“反共”与“反攻大陆”。而陈诚作为国民党副总裁、副总统，遗嘱中一没讲反共，二没讲反攻大陆。我们通过有关渠道反馈回来的信息谈到，陈诚要周恩来、张治中相信他的人格，他不会违背民族大义。遗书发表后，周恩来在政协高级民主人士的会议上讲了这个问题，谈到从陈的遗嘱看，这是我们近4年对台通气、工作、传话、传信的结果，说明我们的工作有效果、有影响。

让以前的战犯为祖国统一效力

在解放战争时期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战争罪犯分别关押在北京、抚顺、济南、西安等地的战犯管理所。苏联军队俘虏的伪满洲国、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溥仪（即原宣统皇帝）、德王等战犯，移交我国后一直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们在战犯管理所一边治疗伤病，一边接受党的政策教育，交代所犯的罪行。

对这批人如何处理，党中央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对他们不判不杀，进行改造，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

1956年初，为加强对战犯的统一管理和改造工作，中央决定实行战犯集中。战犯中的200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被集中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们可以与家属自由通信，还可以接待来访亲友。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他们的改造采取了多种办法。首先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学习党的政策，开展讨论，进一步清理思想。同时，组织他们到东北各大工业城市及天津、武汉等地参观，看看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还坚持思想改造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安排他们参加劳动。此外，周恩来还委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及爱国民主人士张治中、程潜、邵力子、章士钊、傅作义、蒋光鼐、张难先、郑洞国、侯镜如等先后到功德林看望，做说服开导工作，他们带去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问候，并把周恩来的意思转告大家：今后谁愿意留在大陆为祖国建设服务，一律妥善安排。愿意去台湾或海外者，政府也给予方便，保证来去自由。有伤病的战犯在管理所得到的精心的治疗，黄维起初思想顽固和抵触不参加思想改造，后来他患了心脏病，政府有关部门想方设法为他治好了病，使他十分感动，随后抵触情绪消除了，积极参加思想改造。这一系列的工作和措施，推动了他们的思想转变。从1959年6月至10月，这批战犯先后3次给中共中央写“感恩信”，除表示服罪外，还表示愿在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廖耀湘说：“我虽是一个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犯人，但我是一个中国人，对这种复兴祖国的伟大神圣事业不能不虔诚的热烈拥护。”王耀武还建议组织工作小组，研究统一祖国的具体办法。

1959年国庆10周年前夕，经二届人大九次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决定首批特赦战犯33名，其中有前清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及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王耀武、陈长捷、曾扩情、周振强、杨伯涛、郑庭笈、宋希濂、邱行湘、卢浚泉等11人。周恩来安排他们11人集中住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派工作人员负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国庆10周年庆祝大会时，还让他们在天安门斜对面公安部的楼顶上观礼，使他们感到无尚的光荣。11个人中，除溥仪、陈长捷、卢浚泉外，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蒋介石曾任黄埔军校校长，他的亲信大都来自黄埔系，而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黄埔同学中也深有影响。周恩来认为，依靠他们来联络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是十分适合的。

对战犯释放后的安排，周恩来也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说：第一步先集中他们在北京参观，允许亲友看望他们。等这些人对新生活适应后，对祖国的形势有所了解后，再做第二步工作，即同他们一起讨论如何开展对台湾的工作。

这批特赦人员刚出狱不久，就受到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1959年12

月 14 日下午 3 时，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了这 11 名特赦人员。陪同周恩来一起会见的还有陈毅、习仲勋、张治中、邵力子、傅作义、章士钊、屈武、徐冰等人。我和罗青长也参加了。周恩来走到他们面前，依次一一握手表示祝贺。当他走到一位头发花白者面前，周恩来叫了声“曾扩情”时，这位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扩大哥”，曾经在周恩来的政治部当少校科员，跟随周恩来参加过第一次大革命，他想不到事隔 30 年，周恩来不忘他的名字和面容，他泪流满面，抬起头来，半晌才说出一句话：“周先生，我走错了路，对不起你！”其他特赦人员也和曾扩情一样落了泪。

周恩来微笑着招呼客人们入座。周恩来走到溥仪面前时，溥仪紧张而又激动地叫了一声：“周总理……”就再也讲不出话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说：“认识吧，这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他是从抚顺特赦的。”看到周恩来与溥仪握手，特赦人员纷纷站了起来。“坐下嘛！”周恩来朝大家摆了一下手，拽溥仪坐在自己身边，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同溥仪见面，叙谈的时间较长。

然后，周恩来询问杜聿明的年龄和健康情况。杜聿明回答说，已经 55 岁了，身体健康。周恩来说：“你还年轻嘛，还可以为国家做不少事情。”杜聿明听了总理的勉励，感到自己对人民有罪，非常内疚，他对周恩来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听老师的话。”周恩来忙说：“你过去是有罪行的，认识了，愿意改就好嘛！说起来，这不能怪你们，我也有一定的责任，你是黄埔的学生，我当老师的没有把你们教育好，你走上了另外一条路。”几句话，说得 281 杜聿明心情很激动，一再表示要继续认真改造，戴罪立功。

周恩来着重地说：政府对战犯实行特赦是“赦人不赦罪”。你们经过教育改造，有悔改表现，不是犯人，是公民了；但过去的罪行是不能赦的，要作为教训。

陈长捷是在解放天津时和我军激战数小时，然后被俘的，他的神情比杜聿明更紧张。他讲自己的罪恶重大，受到中共宽大释放，十分羞愧。周恩来说：“你原来是国民党的军官，服从上级命令，那是过去的事，现在可以立功赎罪嘛！”

周恩来在分别询问了各人家庭情况后说：你们出来一些时间了，有问题首先说了好，所以就叫你们来谈。我们党和政府是说话算数的，是有原则的。我们是根据民族利益、人民利益来释放你们的。

周恩来和他们谈了四个问题，即立场问题、观点问题（包括劳动观点、集体观点、群众观点）、工作和生活问题、前途问题。

谈到立场问题时，周恩来强调：“首先，要站稳民族立场，热爱新中国。”

周恩来接着说：“从鸦片战争到今天，经过将近 120 年的斗争，中国人民翻了身，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一事实连帝国主义也是承认的。”周恩来的目光注视着溥仪：溥仪先生，你可以证明这一点嘛，比你们过去搞得好吧！溥仪赞同地点了点头。“今天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站起来了，生于斯，长于斯，这样的国家不爱还爱什么？”大家深为周恩来强烈的民族感情、爱国热情所感动。

谈到民族立场时，周恩来说：“民族立场很重要，我们对蒋介石还留有余地，就是因为他在民族问题上对美帝国主义还闹点别扭，他也反对托管，反对搞两个中国。”针对美国企图霸占台湾，让台湾蒋介石集团把台湾同大陆分开而达到划峡而治的阴谋，周恩来说：“我们认为台、澎留给蒋介石比

留给美帝国主义好，将来这些地方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怀抱。”正如章士钊先生所说“现在真正支持蒋介石的是北京。”周恩来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总之，要坚持民族立场。祖国的领土是完整的，不容许帝国主义分割，损害我们的一根毫毛也不行。

谈到观点问题时，周恩来肯定了他们有做新人的愿望，但是还要继续树立劳动观点、集体观点和群众观点。周恩来告诫他们：“十年所得，不要抛于一旦。要认罪服罪，重新做人。”

谈到工作和生活问题时，周恩来嘱咐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对他们要作好妥善的安置。他还说：“与台湾有联系的，可以做点工作。但写信也不要太急，不要挖苦，要以民族利益为重。工作要从长计议。”

最后，谈前途问题。周恩来指出：“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做新人，有奔头。”他殷切的提出两点希望：“第一，要相信党和国家。党和国家对你们信任的，你们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国家为民族多做贡献。第二，倘有不如意的事，可以写信，可以与中央统战部联系，有话就要说，不要积少成多，结成疙瘩。”

最后，周恩来对所有特赦人员说：“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来去自由，你们愿意的话，可以留在北京，想回去台湾也可以，回去后，想再来也可以，要到别的国家去也可以。”

对他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周恩来都做了妥善的安排，还提出让他们到各地参观，看一下祖国10年来的新变化。会见结束时，当他们走到周恩来的面前，向自己的恩师辞行的时候，周恩来再次一一和他们握手，送到客厅大门，亲切地叮嘱他们：“你们一定要回去过年，骨肉团聚。”

通过这次接见，特赦人员心情十分激动，纷纷感到受到一场深刻的教育，思想震动很大，表示今后要带罪立功，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杨伯涛把周恩来的讲话记录珍藏至今，每逢遇到困难、挫折，常以此激励自己。他曾对人说：“这种对待俘虏的作法自古以来是没有的。我为什么拥护共产党？因为我是过来人，我看到过国民党的兴盛，也看到它的衰败。我为国民党做过19年事，又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了20多年，我感到只有共产党才有这种胸怀。而周恩来使我形象化地认识了共产党。”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杨伯涛一直坚持做对台工作。他经常对台湾方面进行广播讲话，劝导过去的同事和部下早日回到家乡来，他还根据亲身经历撰写了数万字的关于陈诚军事集团的兴起和衰落的材料，对争取台湾的工作很有帮助。

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特赦第四批战犯，其中包括1948年7月在襄樊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11月10日，周恩来会见康泽以及在京特赦战犯及家属。同每次会见的情况一样，周恩来在谈话中重点强调立场问题。

谈话中，周恩来还详细介绍了台湾方面的情况。周恩来再次表达了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团结一致，共同对美，早日回到祖国怀抱的真诚愿望。周恩来还说：“台湾现在面临美帝要把它变成独立国，我们和蒋介石都不同意，这是共同的观点。”“美国逼到最后，希望他们能和平归来。只要他们取消中华民国的招牌，台湾还是可以交给他们管，这个决心什么时候下，阶级性限制他，但形势也逼着他。”周恩来的话，使特赦人员感到振奋和鼓舞。

周恩来祝贺他们获得新生，鼓励他们自觉地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周恩

来最后说：“有句老话：‘好汉不谈当年勇’，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人要不断前进，才跟得上时代。”

1964年11月全国政协根据周恩来的提议，特邀杜聿明、溥仪、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6人为政协委员。党和政府的宽大和信赖使特赦人员受到巨大鼓舞。他们通过书信、广播、撰写回忆录等各种方式为祖国统一大业积极工作。侨居海外的人，始终牢记周恩来的嘱托，为实现祖国统一而奔走。1985年，侨居美国回来参加政协会议的宋希濂说：“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事淡忘了，唯有同周恩来会面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周恩来生前最关心台湾问题，希望我们发挥作用，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他的遗愿。”侨居美国的沈策，前些年他的儿子经商回到祖国，还特地看望了凌云和我，代表其父一再表示对政府的感谢之情和为实现祖国统一而效力。

溥仪特赦后，周恩来一直关心他的思想、工作、生活和进步。

1960年1月26日，周恩来在政协会议室接见了溥仪和他的叔父载涛、弟金友之、妹金欣如、金蕊秀、金温馨、溥韞娱、金志坚等。

周恩来对溥仪说：“你们的家族很大，今天请了你的几个妹妹来，没有请你们的妹夫们，因为时间来不及了。”

周恩来询问溥仪想从事哪方面工作。溥仪说：“我想搞轻工业或在公社中工作都可以。”溥仪想，搞这样的工作体力劳动会比较轻。周恩来劝他还是实际一点，说：“你自己想到哪里工作合适？”又以商量的口吻说：“我看，到哪个部的研究所，一边学习，一边工作，这样对你的身体比较好。可以让研究人员教你。他们都很年轻，多数不知道历史，你们可以互相帮助。你愿不愿这样做？”

“愿意。”他嘴里虽答应着，但想到自己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医务室帮过忙，又谈起自己打算从事医务工作，当个大夫。

周恩来听了后说：你读了不少医书，但是你不要给人家治病。大夫免不了出事故，别人治坏了人是常见的，你要治坏了人，影响可就大了。溥仪听后、不觉自己也笑了起来。

周恩来继续说：“你先检查身体，然后订个3年计划，学一点自然科学，学一点本事。”

饭后，周恩来请大家到会议室喝咖啡。座谈中，周恩来接着说：“现在民族平等了，各民族共同发展，满汉要团结得更好。”然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溥仪说：“你要努力学习，搞出点成绩来，这对你个人有好处，对人民有贡献，对满族也有好处。你学得还不够，要努力学习。”

周恩来又转身对大家说：你们家属要帮助他。一个家庭要争取前进，帮助落后，先进和落后总是有的，社会上有，在一个家庭里也会有的。你们家庭中也是这样。

谈到溥仪撰写的自传《我的前半生》这本书时，周恩来说：“你写的东西有价值，作为未定稿，用四号字印出来后你再改，改得比较完善一些。这是旧社会的一面镜子。旧社会结束了，你也转变成了新人。这本书改好了，就站得住了。后代的人也会说，最后一代皇帝给共产党改造好了。”

溥仪满怀信心地表示：“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和总理的期望。”

这次接见后，溥仪对他三妹金蕊秀说：“总理对我真是无微不至地关怀呀，我太感激了！”

周恩来对溥仪等人的关怀，就连生活琐事也想得周到细致。当溥仪等特

赦人员回京住在崇内旅馆时，周恩来亲自打电话催问是否发了棉大衣，还叫全国政协干部马正信打电话告：“周总理询问，是否给溥仪等人发了肥皂？如没有，要尽快发下，以便搞好个人卫生。”

周恩来还指示两件事：一、找个医院给溥仪全面检查一下身体；二、工作问题，原来的意思是到中科院下面的工厂劳动，现在考虑在北京西郊植物园劳动学点技术和知识，定个规划。

起初，民政局根据其特长，打算安排他到故宫劳动。周恩来得知后说：“不太合适吧，故宫每天那么多游客，如果都来看皇上，怎么办？”当他批准溥仪到植物园劳动后，行前，除亲自与之谈话外，还请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三转达了几点意见：

下放劳动1年，讲清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礼拜天可以休息，每两星期回城一次，可以自由活动。生活困难，另外补助，年纪太大，学习多点，劳动时间短点。

经过1年时间的劳动锻炼和实践考验，溥仪等人的工作做了重新安排。

1961年2月18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在全国政协

第一会议室郑重宣布，第一批特赦的7人，即溥仪、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郑庭笈、周振强、杨伯涛，将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

3月1日，溥仪来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正式走上文史工作岗位。

周恩来还十分关心溥仪的婚姻问题。1960年1月26日，周恩来在政协礼堂接见溥仪和他的亲属时，就曾提到溥仪的婚姻问题。周恩来在征求溥仪对工作安排的意見之后，微笑着对他说：“你还得结婚啊！”说完，周恩来转向一旁对载涛说：“这件事，你七叔得给你张罗张罗吧！”载涛笑着对周恩来说：“让他婚姻自由吧！”有一次，周恩来接见溥仪和部分文史资料专员时，也谈到这件事，周恩来幽默地对溥仪说，“你是皇上，不能没有皇娘娘哟！”说完，周恩来和在场的人都大声笑了。

1961年2月12日，也就是农历12月30日下午，周恩来请载涛、溥仪、溥杰及几个妹妹等亲属到中南海西花厅作客。周恩来说：“请你们来一起过个年。按北京习惯，这次过春节包饺子。”在热情招呼下，大家围坐了两桌。载涛、溥仪和溥杰以及几个妹妹被周恩来夫妇拽到一个桌上，其他人在徐冰、童小鹏、廖沫沙等陪伴下围坐在另一桌。边吃边谈，有说有笑，气氛十分亲切祥和。

周恩来谈得最多的是溥仪的婚事和溥杰夫妇团聚问题，周恩来对溥仪说：“你一个人没人照顾，要找一个对象，要有个家嘛，老这样孤家寡人行吗？”邓颖超也说：“是得有个家，总得有人照顾呀！”

溥仪说，他打算暂先不考虑，把精力放在学习和工作上。周恩来幽默地笑着说：“太政治化了，还是成家立业。”

溥仪道出了自己的苦衷：“有个矛盾，进步的不想要我，落后的我不要。”

“那你就找个中间的嘛！”周恩来又止不住笑了。

邓颖超在餐桌上对坐在身边的溥仪二妹、三妹说：“溥仪还没对象吧？你们做妹妹的，也应该关心大哥的婚事，帮助他介绍呀。”

二妹与三妹交换了一下眼色，小声说：“我大哥有病……”

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全国政协委托协和医院对溥仪的身体作了彻底

的检查。诊断结果为：“患者于30年前任皇帝时，就有阳痿，一直在求治，疗效欠佳……曾三次结婚，均未生育。”

在周恩来和其他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经过许多著名老中医及有关医院的精心诊治，溥仪的病有所好转。在1962年，他终于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

周恩来不仅对溥仪无微不至的关怀，对溥仪家族以及促进他们的团结，也倾注了心血。

溥杰特赦后，非常想接日籍妻子嵯峨浩回中国团聚。但是，溥仪认为嵯峨浩可能是日本特务，再加上有些历史原因，他特别反对弟媳的回国。在这个问题上，溥仪与溥杰哥俩之间结下了别人无法解开的疙瘩。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在家里接见了他们。周恩来听了溥杰对他的妻子分析后说：“你对你夫人分析很对。我看还是欢迎她来，来后再帮助她。”

溥仪对此一直想不通，他说：“我对溥杰和浩结婚是不满意的，因为那时有统治阶级的思想，怕日本帝国主义有意培植他，所以我对溥杰也动心眼，一直对浩不放心。”

“现在是不是放心了？”周恩来插话说。

“现在我对她仍然不放心。我怕溥杰和她通信泄露国家机密，怕浩是特务。”溥仪还是想不通。

“你的话也对也不对，先不要下结论。”周恩来说。然后又转身对在座的我说：“找一本《流浪的王妃》，给溥仪看看。”他又语重心长地对溥仪说：“日本人想操纵她，这是过去，现在不是这样吧。你能改造好，人家就不能改造好吗？”周恩来继续耐心细致地做溥仪的思想工作。同时还征求了溥仪亲属们的意见，在周恩来的循循善诱下，大家都表示赞同。周恩来对大家说：“嵯峨浩要来了，大家要帮助她进步。她是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来的，对于我们的社会，不会一下子就理解，大家要耐心地帮助她，不要操之过急，不要有什么顾虑，要多和她接触。”

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与溥杰分离16年的妻子嵯峨浩终于从日本来到中国团聚了。就在嵯峨浩来北京不久的1961年6月10日，周恩来在西花厅接见了溥仪、溥杰和嵯峨浩，还有浩的母亲嵯峨尚子、浩的四妹町田翰子，溥杰次女雫生以及溥仪妹妹等亲属们，并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周恩来在谈话中指出：“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在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了共和国以后，以前的皇帝还能存在，还给予平等地位？例如英国的查理一世、法国的路易十六、德国的威廉二世、埃及的王室等等，他们哪里去了呢？可以比较一下。（溥仪：世界有史以来没有过。）这是我们国家的政策，当然也要本人努力争取，大家合作。”周恩来还说，浩夫人是日本人，现在回来了，愿意做个中国人，愿意为促进中日两国友好、恢复邦交而努力，我很欢迎。解放10年来，有许多日本朋友见到毛主席、刘主席和我，表示谢罪。我们说这已经过去了，我们应该往前看，应该努力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恢复邦交，发展经济文化交流。我们并不总盯着过去的事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团结组织起来了。我们对日本人民毫无怨恨，日本人民也同样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日本朋友来中国的，左、中、右都有，我们对日本朋友是门户开放的。接见后，还宴请了他们。周恩来说，“听说你们要到各地去参观，所以提前请你们来了。”他又说：“慧生（溥杰长女）生前给我来过信，她很敢说话，我很喜欢这样有勇气的青年。”

对溥杰的次女零生，亲属们都愿把她留在北京，可是她愿回日本。周恩来对她说：“你母亲是日本人，和中国人结了婚；你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结婚也可以嘛，以后如你愿意，随时可以来中国，有这么一家亲戚也好嘛。”零生非常感谢总理。她对亲属们说：“总理的话真是语重心长。”她回日本时，特意买了一幅总理的绣像，留作纪念。

家庭的团聚给溥杰一家带来无限的欢乐，溥杰后来被安排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周恩来总理的恩情使他们永世难忘。1975年，溥杰夫妇第一次到日本探亲，出于内心的感激之情，在这次探亲回国时，溥杰夫人一定要带点礼物送给周总理表示心意。尽管溥杰再三劝说，告诉夫人周总理是历来不肯个人收礼品的，还是不能说服他夫人，最后商定，礼品减少到最少的程度：一扇日本小屏风，一束新鲜的玉兰花。夫妇俩都担心鲜花枯了，到北京一下飞机就立即赶到全国政协机关，委托人连同小屏风直接送到周总理处。几天后，总理办公室派人退回小屏风，并转达了正在重病中的周总理的嘱咐：“鲜花收下领心意，屏风送回留自用。谢谢！”

溥杰夫妇手捧着小屏风，热泪顺颊而下。

周恩来逝世的噩耗传来，溥杰夫妇抱头痛哭，不思饮食，精神恍惚。夫妇俩在家里设了小灵堂，以寄托对敬爱的周总理无限的哀思。

至“文革”前，党和政府共特赦战犯6批296人。随着对战犯改造工作的进展，以后又陆续给予特赦，至1975年3月19日，在押战犯全部释放。原来毛泽东批准释放军级以上24名在押国民党军官，周恩来和邓小平接着批准释放县团级以上全部在押的国民党官员和在押的全部从海岸线偷渡被俘武装特务，并宣布愿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照样欢迎。

党和政府采取的这一重大举措，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国外通讯社纷纷发表评论。德新社说，此举证明北京有极大的自信心，表明中国的团结和稳定。南通社说，对台湾作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政治行动，对国内具有重大意义，实际上在告诉台湾的人：只要及早回头，为解放台湾作出贡献，立功赎罪，可得到同样的待遇。南通社的评论还说，特赦的某些细节也非常有趣，特赦人员的工作、补助、医疗都和干部一样，还发新衣服和100元的零用钱，受到高级领导人的接见和宴请，又开欢送会，这一切无疑是在支持台湾回归祖国。

1975年4月，特赦人员王秉钺、陈士章、周养浩、王云沛、蔡省三、段克文、张海商、杨南屯、赵一雪、张铁石等10人要求回台湾。经国务院批准，由有关部门帮助他们于4月14日到达香港，准备回台与家人团聚。

消息一公布，就引起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恐慌。4月22日，“总统”严家淦先透露：不准10人回台，一怕引起和谈谣言，二怕再有二批、三批。又公开发表谈话，污蔑王秉钺等10人为“间谍”、“统战工具”，还逼迫他们发表“反共声明”，要以“难民”身份申请入境。阻止他们回台湾。

台湾“大陆工委”、“国家安全局”4月中旬开会研究特赦人员回台问题，结论是不准10人回台。理由是：1、中共选蒋丧期（蒋介石去世）送人，用意“险恶”；2、如10人回台，其余要求回台怎么办？3、台军政人员在大陆的亲属要求赴台探亲怎么办？4、最讨厌10人回台后外国记者采访；5、回台人员住几年后，要求返大陆怎么办？

王秉钺等 10 人到了香港后，台湾特务想从张铁石、王秉钺中先行拉拢分化，台湾特务把张拉到富都去策划，后张死在富都，台当局又不敢说死在富都。台湾特务的分化不仅没有捞到油水，反而将张害死。香港舆论纷纷表示不满台湾当局的行动，这使台湾当局完全陷于被动和孤立的境地。其余 9 人由于不满台湾国民党当局的行径，绝大多数人员不愿回台，有的到了美国等其他国家，有的留在香港，如蔡省三，他要求在江西的妻子、女儿来港团聚，我们就把她们送到香港。后在港开诊所。只有 1 人到了美国后再转到台湾去。特赦人员要求回台，使台湾当局内部感到震惊和不知所措，并发生意见分歧，负责处理此事的单位换了 3 个。

周恩来常说：我们团结的各方面代表都联系或影响着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群众，他们背后站着一批人。我们党的政策对头了，争取的就不仅仅是几十、几百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人。

对战犯的宽大政策，对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对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李代总统的回归

李宗仁归国，是周恩来将近 10 年努力工作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1955 年 4 月 23 日，周恩来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李宗仁，这个 1949 年 1 月蒋介石通电下野后的代总统，他上台后没有能够挽救国民党的命运，带着失败的耻辱离开大陆远赴美国。在美国，李宗仁曾经企图依靠美国寻求第三条道路，但没有多久他就意识到这一选择的错误。他看到新中国刚刚成立没几年就在各个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他深受感动，认识到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他曾指着报纸上的大陆新闻对人说：“共产党真了不起！”特别是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声明，使他萌生了“叶落归根”的念头。

周恩来的万隆讲话，使李宗仁倍感兴奋，他积极拥护中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于当年秋天发表了《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这份《建议》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个完整部分”，“在中国人之间，如假以时日，没有不能解决的事。经过一段和平共处的时间，就可召开一个全国会议，由自由中国人与中国共产党试行解决他们之间的一切问题。”“所谓联合国托管、中立化或两个中国的理论，作用在使台湾与中国分离。这正与一般的统一倾向，如德、韩及越南的情况背道而驰。”

对李宗仁的态度、立场上的变化，周恩来已经注意到。便开始了争取李宗仁归国的工作。1956 年 4 月下旬，周恩来授意李济深：想法以你的名义告诉程思远（李宗仁亲信，曾任“总统府”秘书长），让他到北京来一趟，就李宗仁的问题谈谈。

李济深按照周恩来的意思，当即给香港方面的朋友打长途电话，让转告程思远希望他到北京一谈。

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金尧如对程思远说：“我们接到北京长途电话：李济深先生希望你去北京一谈，来去自由，并且保密。”

程思远到北京后，才知道此事不是李济深策动的，而是周恩来决定的。

5 月 12 日中午，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宴请程思远，出席作陪的有李济深、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黄绍竑、刘斐、陈铭枢、屈武、余心情、刘仲容、刘仲华和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

在宴会上，周恩来发表了讲话，他提出：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合作，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希望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团结起来，争取第三次合作。周恩来特意请程思远向李宗仁和所有在海外的国民党军政负责人转告这样的信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们赞成中国的一句古话“和为贵”；欢迎李宗仁先生在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也欢迎国民党军政负责人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我们将给予各种方便和协助，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

1956 年 6 月 28 日，周恩来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作报告时明确表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希望一切身在海外其他地方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为促进和平解放台湾而努

力。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使自己免于流落异乡、受人轻视的命运。”“祖国的大门对于所有爱国分子都永远是敞开着。”这些话，深深他说到了李宗仁的心坎上，促进了他归国的决心。

1959年9月24日，程思远第二次来到北京，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在座的有张治中、邵力子，我作为总理办公室主任和副主任罗青长也在座。

周恩来对程思远说，你转来李德邻先生信，他自愿将他收藏的历史名画献给国家，这是他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政府考虑接受。

周恩来又说，德邻另有信给李济深先生，表示将回国定居，我以为他回国的时机还不成熟，将来我请你到欧洲去同他谈谈再说。因为当时李宗仁在美国被监视，周恩来给出主意，让他绕道欧洲，再回国。

后来，程思远把李宗仁存在美国纽约的字画运到香港来，然后又送到北京。不久程思远得到周恩来的寄语：这些字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赝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助他一笔赴欧的旅费，以壮行色。

李宗仁在北平当行辕主任时，有12箱古董，后来带出去了。他说这些古董是花了11万美元购买的，要运回祖国。周恩来要中央调查部派人将这批古董从香港接回，并召集故宫博物院的专家进行鉴定，仅值3000美元，大部分是假的。此事报告了周恩来，周说我们给他3万美元。当时我和罗青长感到已够大方了。但周恩来报告毛泽东后，毛泽东说这叫做“投石问路”，我们的统战工作要讲策略，我们就给他12万美元。李宗仁知道后说，共产党不简单，是识货的。1960年春，李宗仁派他的夫人郭德洁到香港，收受了这一笔外汇。

1960年，约翰·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李宗仁去信向他祝贺，并望他调整对华政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肯尼迪复了李宗仁敷衍了事的一函。李将复函寄程思远并嘱程送周恩来核阅。1961年6月上旬，程思远第三次来到北京，周恩来接见他时，重申派他到欧洲去同李宗仁谈谈，希望李先生对美国不要抱有幻想。

程思远与李宗仁约好，将于1963年12月在瑞士苏黎世会晤。11月中，程思远第四次来到北京，赴欧前夕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要程思远向李宗仁转达三件事：

一是“四可”，李先生可以回国定居，他决心回来，我们表示欢迎；可以回国后再去美国；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再回来；可以去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总之，我们欣赏德邻先生的向往祖国之心，但一切不强加于人，由他自己决定。

二是“四不可”，李先生不可介入中美关系；不可介入美台关系；不可介入国共关系；不可介入第三势力。

三是如果回国定居，要过“五关”，就是政治关、思想关、社会关、家族关、生活关。

周恩来要程思远把上述各项内容背熟，还嘱咐他说：“如果他决心已定，你可以通过瑞士大使馆和我们联络，商定具体安排。”12月19日，程飞抵苏黎世与李宗仁会晤，程转达了周恩来对李宗仁先生的期待。

1965年6月13日，李宗仁离美飞瑞士。周恩来得知此消息后要程思远来北京一行，商议接李宗仁回国事。6月18日，程思远295第五次来到北京，不巧周恩来离京出访。周恩来委托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央统战部部长徐

冰和我向程思远转告了有关安排：

- 一、政府发给李宗仁先生一笔回国旅费，由程思远带往瑞士面交；
- 二、同时发给程思远一笔旅费，请他把李先生接回来；
- 三、程思远到苏黎世时，将有负责同志同他联系，帮助他解决有关问题。

7月7日，周恩来出访归来，又亲自周密安排李宗仁归国一事。7月12日，周恩来得到消息：台湾国民党方面可能已经知道了李宗仁的行动。他立即通知苏黎世有关人员：李宗仁一行务必在13日下午2时离开苏黎世，前往卡拉奇。李宗仁按时飞离了苏黎世。果然，两小时后，台湾有人就带着白崇禧的亲笔信找到李的住所。李宗仁一行飞抵巴基斯坦卡拉奇机场后，中国驻巴大使立即按周恩来的指示把李宗仁等人接到大使馆内。7月16日，周恩来再次拟定“李宗仁行动计划”，嘱有关部门立即电告中国驻巴大使馆，并交待中国驻巴大使丁国钰亲自陪同李宗仁同乘巴航班机回国。

就在李宗仁回国前夕，在民主人士中，有一些人不理解国家为什么花这么大气力来争取李宗仁，因此，提出了不同意见。7月13日，周恩来约见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等原国民党和谈代表团成员及桂系有关人士进行了座谈，作了耐心的解释工作。

在上海虹桥机场等候李宗仁到来的时候，周恩来还利用这一时机再次对来迎接李宗仁的各方面人士做工作。他说：“李宗仁要求回来。他能回来，我们欢迎。人重晚节，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人的阶级出身并不能影响自己的觉悟，一个出身反动阶级的人，如果能觉悟的活，还是可以为新的阶级服务的。”他劝告大家，不要有“老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的想法，要看到李宗仁归国的积极作用和影响。

1965年7月18日11时，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等人乘坐的飞机徐徐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周恩来总理偕陈毅副总理及上海党政军负责人早已等候机场迎接。

李宗仁看到周恩来站在候机室门前迎接，连忙快步上前，抱住周恩来。周恩来说：“你回来了，我们欢迎你。”李宗仁激动不已，连声说：“总理你好，总理你好。”随后，李宗仁和陈毅副总理、叶剑英副主席等前来迎接的负责同志一一握手。罗青长告诉程思远说，总理直至今日凌晨接到李先生一行所乘的班机已经飞入国境的电话，才上床休息。

7月19日，周恩来在上海与李宗仁会谈。主要谈了对李宗仁归国的态度及安排，并就台湾问题表明了态度。周恩来重申了李宗仁及其夫人“来去自由”的原则。

7月20日上午，周恩来乘专机先期飞回北京，当李宗仁随后到达机场时，再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郭沫若、陈叔通的欢迎。

在机场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国民党起义将领都纷纷上前和李宗仁会面。当年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卢郁文、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华等人，也前来欢迎李先生。

周恩来总理介绍溥仪先生同李宗仁先生见了面。溥仪说：“欢迎你回到我们伟大祖国的怀抱里来。”这真是一个历史性的镜头，末代皇帝同末代总统握了手。

李宗仁在机场大厅宣读了声明，他说，“1949年我未能接受和谈协议，至今犹感歉疚。”“深冀我留台国民党军政同志，凜于民族大义，也与我采

取同一步伐，毅然回到祖国怀抱”，“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作出有用的贡献”。

李宗仁回国后，得到了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热烈欢迎，他所到之处，都得到了党和国家各方面诚挚而周到的接待。

李宗仁归国这一事件对台湾是一个很大的刺激，特别是使蒋介石感到担心，因李宗仁还是“代总统”，还具有合法性，而蒋介石则是下野的，在这一点上，他说，共产党高他一筹。当时，我们把李宗仁回来的三个条件（即“四可”、“四不可”及过“五关”）通过有关渠道通知了蒋介石。

李宗仁回国后不久，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动乱。随着运动的发展，红卫兵抄家、揪斗的事态进一步蔓延。1966年8月底，周恩来亲笔书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党外高级干部的名单。在名单的末尾，他着重添上了李宗仁的名字。不久李宗仁处境越来越不好，周恩来得知后，极为关心，在他的一再关照下，终于把李宗仁接到解放军301医院，以治病为名保护起来。有一天，李宗仁继夫人胡友松去理发，做了波浪式的发型，红卫兵发现后要斗她理这种发型，北京医院还贴了大字报，傅学文劝她洗掉。周恩来知道后，指示工作人员等她理完发后，用周恩来的车子将李宗仁夫妇送至301医院，李宗仁夫妇分别用化名叫王敬文、唐纬韩在301医院住了1个多月。

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因病在北京逝世。临终前，口授了一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信中说：“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道路是走对了的。”“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这封信被周恩来称作是一份“历史文件”。

1985年，程思远回忆此事时说：“我认为，共产党讲话算数，特别是这些话是由周恩来公开讲出来，那么我感觉回国时机是适宜的，心底是踏实的，因为我信任周总理。如果不是周总理讲这个话，我也许不会回来。”

1965年，屈武陪同李宗仁、程思远到国内各地参观时对程思远说：“1956年周总理的号召只是一个普通的号召，而你这件事却办成了，居然做到了，真了不起啊！”程思远不无激动地说：“如果没有周总理对我的关怀，结果还不一定是什么样子。”

台湾一定会回归祖国

1956年，党中央制定的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受到全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的拥护，台湾当局蒋介石、陈诚、蒋经国等，实际上也是赞成的。周恩来亲自领导的对台工作，在中央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市委共同努力下，到“文化大革命”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对台工作也无例外地受到干扰和破坏。首先是对台工作领导干部罗瑞卿、杨尚昆被“打倒”，徐冰，孔原靠边站，罗青长也被“造反派”挂在孔原的“黑线”挨批斗。1967年初周恩来为了工作方便，要对台工作办公室搬到国务院院内，“四人帮”诬陷为罗青长设在中南海的“特务据点”，被迫撤了出去。“四人帮”还企图通过各机关的“造反派”在夺权中夺取对台工作的机密文件。幸亏我当时已调中央办公厅当副主任，分管机要工作，在周恩来指示下，把部分核心机密和廖承志家里的对外机密文件转到中央办公厅来保存，并派李质忠去制止了调查部的“造反派”冲击档案室。徐冰保存的部分对台工作文件，在中央统战部“造反派”抢夺档案时，他的秘书陈欣机警地转到安全地方。台湾当局也很担心“文革”中我方是否会向他们传话、传信的机密暴露。由于周恩来亲自关照，没有发生泄密现象，他们才放心。

“四人帮”还鼓惑“红卫兵”“破四旧”，企图破坏南京中山陵，要把南京新街口的孙中山铜像搬倒。江苏省委报告周恩来办公室后，周恩来要我给江苏省委书记彭冲打电话：要直接对“红卫兵”做说服工作，孙中山是革命先行者，“五一”、“十一”天安门广场还挂他的像，不准搬倒。江苏省委为防止破坏，把孙中山铜像事先秘密移到安全地方保护下来，“文革”结束后安放在中山陵园大门口。但是中山陵内的青天白日旗图案还是被砸毁，“文革”结束后才恢复。这对台湾方面已造成了不良影响。

周恩来又得到浙江奉化溪口蒋介石母亲和他的毛夫人（即蒋经国生母，抗战时被日机炸死）的墓被破坏的消息，他要我打电话给省委书记江华，要对“红卫兵”做说服工作。说明中国人历来对“挖祖坟”的事是最不得人心的，我们不能这样做。大部分“红卫兵”同意了，但还有一小部分直接受江青指挥的“造反派”

又偷偷在破坏。周恩来知道后，要浙江省委派人修好，并将修好后的照片送北京，交给章士钊带到香港转给蒋介石。

1967年1月，我又被“四人帮”的爪牙戚本禹直接指挥的“中南海红色造反派”夺权靠边站后，周恩来就专门指定罗青长主管对台工作，直接向他汇报。并指示该部军代表要结合罗工作，罗还当选为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一直没有停止对台工作。

1972年2月28日，周恩来和美国总统尼克松代表中美双方在上海共同签署了《联合公报》，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并且确认最终从台湾撤出其全部军队和军事设施。这就使台湾开始由原来的国际斗争为主转为主要是中国人民的内部问题了。此时，毛泽东又发出指示“促蒋和谈”。对于美国支持“台独”的阴谋活动要给予打击，

同时注意搜集这方面的情报，通过有关渠道通知蒋介石。关于中美会谈成功，尼克松访华，这些消息我们都事先通知台湾，告诉了蒋介石，同时，

我们晓以大义，申明利害，为争取第三次国共合作而努力。

到了70年代的对台工作，除了对台湾上层工作以外，周恩来提出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过去对群众工作做的不很多，中美、中日关系打开以后，回来的人增多了，使我们做群众工作有了基础和条件，也成了我们对台工作的重要部分。周恩来生前多次接见从美国、日本，台湾回来的同胞，耐心地做工作。其中有很多在美国的青年学生，周恩来对他们说：台湾是一定会回归祖国的。我们的工作为后人开辟一条道路，不能急，“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周恩来接见了几批参加“保钓”运动的成员，和他们谈话时，提出要扩大运动面，要促进中国统一。不仅要去做进步人士和中间人士的工作，还要做有“台独”倾向的人的工作。日本统治了台湾岛50年，国民党统治了20多年，台胞对台湾的感情与主张分裂的“台独”有很大区别，我们要耐心细致地做人民群众的工作。周恩来亲自接见了七八批来大陆参观的台湾同胞，和他们亲切交谈，进行思想工作。1973年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台胞时，会谈了五六个小时，有青年问周总理：“什么时候解放台湾？”周总理说：“台湾是一定要统一的，我可能看不到，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对于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周恩来更加关怀备至。1956年，全国政协开会期间，在一次宴会上，周恩来见到了高山族代表田富达，就仔细地问他：在大陆有多少高山族同胞，他们是怎样到大陆来的，现在都在哪里，有什么困难？田富达一一作了回答后，周恩来马上指示：要关心他们，培养他们，要让他们有学习的机会。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第二年起就在武汉中南民族学院办了一个高山族班，有几十名高山族干部在这里学习。

1973年，周恩来针对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台湾同胞的情况，明确指示：对台籍干部要落实政策，消除疑虑，合理安排使用。有一次，周恩来从国务院的《群众来信简报》中看到了有3名台籍同胞所在单位没有对他们落实政策，立即指示中央组织部和两位台籍中央委员蔡啸、林丽韞和3个省的省委打电话，要他们派人调查。后来又指示要这3名台湾同胞来京列席台湾省协商选举四届人大代表的会议。

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关心、指示下设立的。1972年8月周恩来提出要邀请台湾同胞参加台湾厅的布置工作，后来他发现台湾厅太小，又指示把以另一个省命名的厅改成台湾厅，周恩来对海外归来的台胞说过，把那个比较大的厅改成台湾厅让台湾同胞用，这是有意义的。有些台湾同胞对厅内陈设布置提出了一些意见，周恩来就指示组织一个班子进行修改，直至他病重的时候，还不忘审定批准修改方案。

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在弥留之际召见了罗青长。当时，周恩来正在发高烧，体温38.7度，体质十分虚弱。他强忍着病体痛苦，跟罗青长谈起他在病中仍然关心着的台湾情况，关心着台湾的同胞和朋友。周恩来对罗青长说：“我请你来就是要想谈一下台湾的问题，对于过去帮助过我们的朋友后会有期，你们做对台工作的人千万要记住，对于帮助过我们的老朋友，一定要记住他，不要忘记他。”谈着谈着，他的声音低落下去了，眼睛逐渐合上了。罗青长急忙劝周恩来休息一会儿，可是他却顽强地挣扎起来，喝了几口水，又继续谈下去。前些时候，当他得知张学良患眼疾几乎失明时，十分焦急，向有关部门询问张学良的病情。他嘱咐罗青长一定要设法关注张学良。并说，蒋介石死后，蒋经国会怎样？要深入细致地研究台湾问题。谈话进行到可恶的病魔再次把他折磨得说不出话来，他才疲倦地闭上了双眼。然而，

只稍歇了片刻，周恩来又强打精神对罗青长说：“我休息 10 分钟，你等一等，我们再继续谈。”这以后，周恩来就昏睡过去了。周恩来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念念不忘台湾同胞，仍关心着祖国统一未竟的事业。

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不幸逝世，举国悲痛，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誓言要继承和实现他的未竟事业。他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供干部、群众包括国际友人悼念后，邓颖超大姐根据周恩来生前对台湾人民热爱的心情，当晚带领我们在总理身边工作多年的同志，亲自将周恩来的骨灰盒移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暂放，第二天才移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追悼会会场。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对台工作得到了恢复、发展和加强。中央成立对台工作小组，邓颖超任组长，罗青长和我参加具体工作。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对台工作进行了拨乱反正，落实了对台工作干部和家属在台人员的政策。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二次全盟代表大会于 1979 年 10 月 11 日至 22 日在北京举行，蔡啸被选举为主席。全国台湾同胞第一次代表会议于 1981 年 12 月 22 日至 29 日在北京召开，宣告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正式成立，林丽韞当选为会长。之后，中央又成立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央统战部长王兆国兼任主任。此后，对台工作全面开展起来。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制定的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实践证明完全是正确的，因而日益发挥它的政策威力。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不仅继续了毛泽东、周恩来时代的对台湾方针政策，而且根据国际、国内越来越有利于祖国统一的形势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加强。

1979 年 1 月 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告了中国政府和人民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呼吁两岸就结束军事对峙状态进行商谈。表示在实现国家统一时，一定“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

1981 年 9 月 3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表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建议由两岸执政的国共两党举行对等谈判。

1982 年 1 月 11 日，邓小平就叶剑英的上述谈话指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国家实现统一的大前提下，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1983 年 6 月 26 日，邓小平进一步发挥了关于实现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的构想，指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他还就两岸统一和设置台湾特别行政区问题，阐明了中国政府的政策。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和进一步发展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制定的对台方针政策。

1992 年 10 月 12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积极促进祖国统一。”“我们再次重申，中国共产党愿意同中国国民党尽早接触，以便创造条件，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逐步实现和平统一进行谈判。在商谈中，可以吸收两岸其它政党、团体和各界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

1995 年春节茶话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发表了题为《为促进统一大业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对台方针的八项主张。它是对邓小平关于实现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构想的进一步具体落实，对促进海峡两岸

关系发展的最新方针政策，对加快实现台湾和大陆的和平统一步伐必将发生重大的作用。

现在，国内外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十几年来，国力得到很大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已大大提高。海峡两岸人民经贸、文化、旅游观光等交流日益增多，尽快结束台湾同祖国大陆分离，实现海峡两岸骨肉同胞的团聚，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海峡两岸人民盼统一，已成为日益高涨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我们坚信，台湾是一定会回归祖国的。周恩来和平统一祖国的遗愿是一定会实现的。

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

新中国的勤政典范

周恩来是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的人民总理。他主持政务院（1949年10月至1954年8月）和国务院（1954年9月至1976年1月）工作近27年之久，身居高位，仍一直遵循和身体力行“为人民服务”，这一最高准则，最完整、最突出地体现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一辈子做人民的真正公仆。毛泽东、朱德曾经亲切地称周恩来是人民的“好管家”，邓小平也称赞周恩来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政务院成立之后，这部国家机器就全方位地开始运转起来。身为总理的周恩来非常繁忙，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当时他的施政重点放在恢复和建设经济方面。因为我们从国民党政府手中接收过来的只是一个烂摊子，百废待兴，必须在“废墟”上建设新中国。1949年7月23日，周恩来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作报告，就号召“恢复生产，建设中国”。12月22日至23日，他在全同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作报告，明确地指出经济建设“是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又提出关于“农业是基础，工业是领导”的论点，使我们第一次明确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基础与领导的关系。周恩来这一论点，反映了他从中国国情出发所提出来的恢复经济、建设经济的指导原则。

为了迅速恢复和建设国民经济，周恩来从1950年到1953年先后主持120多次政务会议，讨论和研究了工业、农业、交通，财经、民族、卫生、教育、文化艺术问题，还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出席相应的会议并作了专题报告。他的工作像10指弹钢琴一样的全面有序又有节奏地协调进行。1952年7月，成（成都）渝（重庆）铁路全线通车，他高兴地作了“修建铁路，巩固国防，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题词。1953年，他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49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上报告，也说完成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任务，“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们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以上这些充分说明，在建国初期，周恩来主政思想的最高原则，就是恢复和发展经济，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他的这一主政思想贯彻终生。

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周恩来以勤政作为最高的行动准则，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勤勤恳恳地做人民的公仆。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就曾经讲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进行党性修养的核心。共产党员就应当像牛一样，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而死。”1943年在重庆红岩村整风学习时，他还为自己制定了《我的修养要则》，其中第六条写道：“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建国后，他不止一次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像春蚕那样吐出最后一根丝。”二十多年中，作为大国总理的周恩来，正是以“为人民服务”作为最高准则，并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终生遵循不渝。有些老同志议论说，1948年是解放战争的武装斗争高潮，取得古今中外的光辉战绩；1949年，创建新中国，开创新纪元，各族人民空前大团结；1950年，国家形势的发展振奋人心，国内党心民心一致，国际地位提高。这阶段，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对于此说，我也颇具同感。这里凝聚着周恩来的多

少心血啊！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周恩来更是不遗余力地为中国的现代化而奋斗。早在1954年9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第一次全会作报告时，就第一次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在我国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光荣任务，指明了中国人民的光明前途。与会代表听过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受到亲切的鼓励和巨大的鼓舞。1955年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所通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求在5年内，全国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投资总额达427亿元。用这样巨量的投资进行国家建设，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为了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周恩来殚精竭虑、废寝忘餐地工作。他除了抓经济工作以外，还腾出手抓政治、军事，外交、教育和文化等全面工作。不管怎样忙，也要分身同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谈议国事，到各民族地区同各级干部、工人、农民谈话，调动他们争取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积极性。1957年终，尽管我国受到对私改造过急、过粗和农业急躁冒进的影响，第一个五年计划指标还是提前实现了，初步建立了工业体系，工农业生产较快地发展，国力增强，人民生活也得到改善。60年代初期，尽管我国遭遇自然灾害、苏联单方面取消合同以及大炼钢铁耗去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困难，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周恩来参与制定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渡过3年困难时期，仍然取得辉煌的胜利。周恩来担任总理职务期间，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哪里人民遇到困难，诸如发生旱涝、风雪、地震等重大灾害或事故，他经常亲临现场指挥，带领人民去战胜一个又一个的困难。1951年，北京复兴门外一家小化工厂失火，他知道后就立即驱车前去了解情况，指挥灭火。他到达一些时间后，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才赶到。周恩来立即在现场决定，为保障首都安全，在城内和城边的化工厂要搬到郊外。北京市政府执行了这一决定，以后再没有发生此类事件。1958年夏，黄河中下游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洪灾。黄河这条地上河，在历史上改道过20多次，发生过水灾几千次。这次洪灾降临，黄河花园口洪峰流量达每秒22300立方米，浊浪排空的洪流异常凶猛，把郑州的黄河大铁桥冲断了两孔。7月18日上午，正在上海开会的周恩来接到报告，立即宣布停会，找部队派来一架飞机立即飞抵郑州视察灾情，果断地作出了不分洪战胜洪水的决定。当晚10时，他又到邙山脚下的黄河岸边，察看洪水和抢修大铁桥的情况，并冒着雨淋在广场上给铁路职工讲话，鼓励大家同暴风雨、大洪水作斗争。总理办公室李岩等同志看见周恩来的衣服被雨淋湿，忙撑起雨伞来。他却不让撑，说：“你看大家不都是一样在雨里淋着的吗？！”这一天，他一直工作了18个小时。到8月1日，黄河大铁桥修复，南北运输大动脉畅通。周恩来于5日再次专程从北京去视察黄河大铁桥。他称赞了修桥工人发扬连续作战精神，迅速的高质量的修复了大铁桥的壮举。1966年3月8日晚上，邢台地区发生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大地震。当晚，周恩来闻报，立即吩咐秘书周家鼎通知空军司令部准备直升机出航去视察灾区，还让周家鼎通知总参谋部命令邢台驻军马上开赴现场，进行救死扶伤。第二天一早，周恩来赶到邢台，没有落脚休息，立即到震中重灾区视察。那时，余震未止，但他一个村一个村地查看灾情，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慰问伤员，并立即下达命令，以最快的速度从各地调运物资，抽调医护人员，让伤员及时得到救治，让没饭吃的群众尽快吃上热饭，没往处的群众往上新搭盖的帐篷。他每到一地，都与县社干部一起研究如何生产自救、重建家园的问题。在巨鹿县何家寨公

社灾区视察，周恩来迎着漫天风沙向干部、群众讲话，鼓励大家“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他讲了一句，群众跟着喊一句，场面激动不已！这一天，周恩来从早晨5点至晚上9点，连续视察灾区，一口饭没吃，一刻钟没停，连续工作了16个小时。

周恩来视察隆尧县白家寨大队，踩着震后的碎砖破瓦，穿过残墙断壁，走遍了整个村落。每见到一个人，他总是亲切地问：“家里损失怎样？锅碗瓢勺有没有？能不能吃上饭？”他在街上看见一个女孩站在倒塌屋的门口，就急步上前将她抱起来，深情地问她爸爸妈妈呢？当女孩回答爸妈都在时，他才放心地把她放下。周恩来到宁晋县东汪公社临时医院的简易病房慰问伤员，挨铺挨铺地查看，与伤员一一握手，还为骨盆严重折伤的贫农贺全胜仔细察看伤情。贺全胜激动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呀，亲人解放军把我救出来。您整天操劳国家大事，工作挺忙，还亲自来看大伙，不知怎么报答您的恩情！”周恩来亲切他说：“为人民服务应该！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也是为人民服务的。”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不论何时何地；总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天职。

周恩来是新中国的勤政典范。他尽毕生精力，勤勤恳恳，不知疲倦为实现富强、繁荣的新中国而奋斗着，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信任和爱戴。在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都连续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1975年1月13日，全国人大第四届第一次大会在北京举行，重病在身的周恩来还亲自到会作《政府工作报告》，代表党中央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他向全国人民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勤勤恳恳做人民公仆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和敬佩，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言行处处见高风

周恩来身居总理要职，地位显赫，在国内外都有很高的威望，但他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善于走群众路线，大扬民主之风、调查之风、科学态度之风，遇事同群众商量，倾听意见，服从真理。

50年代初期，周恩来每星期召开一次政务会议，讨论工作，征求意见。在国务院会议上，他总是热诚地启发每个人发表意见，共商国家大事。他认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我们管理着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就要注意听取各种意见。他还说：“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他提倡对他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和肯定。他认为，天下没有“一言堂”说出一句话来就百分之百地正确这种事情。

周恩来召集各部部长开会，十分尊重党外的部长的意见。傅作义是水利部部长，每次到来开会，他总是挚诚地听取意见。水利部由李葆华任党组书记，周恩来要李葆华邀请傅作义列席水利部党组会议，共商水利大计。这既体现党的领导，又体现党外部长有职有权，他最善于做统一战线工作，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协商合作。他主持政务会议时，都注意让党与非党的委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有些党外人士年纪大，讲话慢，说出不同意见，周恩来就一句一句地记下来。他作结论时，对政务委员发言之取舍，从来不以是否中共党员来划线、而是唯真理是从，所以，党外的政务委员和各部负责人都很高兴参加政务会议，聆听周恩来的讲话。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件事：政务委员罗隆基住院治疗，而每逢周恩来主持政务会议，他总要向医院请假赶来参加，而且发表自己的意见，从不中途退席，直到周恩来的结论讲话讲完才离开。罗隆基说，总理的结论“他中有我”，从“我”中出而又无数倍地高于“我”。周恩来把共产党的领导工作导入化境，使人们打从心底里悦服了。

1956年秋天，全国妇联召开工商业者及工商业家属代表会议期间，周恩来请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吃便饭，并征询她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她们谈得坦率诚恳，说女同志的衣服颜色单调，男女一个式样；花布、棉毛衫没解放前的质量好。全国妇联两位女同志听后，认为提意见的代表的态度和语气都不太友好。周恩来当场批评了她俩，说：“你们在解放区长期受党的教育，在艰苦的农村环境里受到了锻炼，进城后仍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这是应该的。”他又说：“刚才几位大姐提的意见，反映了妇女、儿童关心的问题，指出了我们政府工作中的缺点，有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这很好，应该欢迎嘛！”他教育全国妇联同志对妇女、儿童关心的问题不能漠然视之，不能凭自己的兴趣爱好处理问题，应该经常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向政府反映。这说明周恩来时时刻刻注意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对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工作缺点一点也不放过。

50年代，我党提出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时候，周恩来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知识分子，但他从来不以自己是留洋的大知识分子自居。相反，他常常说：“我是个中学生。”在各种会议上常常讲他“当总理是毛驴子当马骑啊！”他过谦他说：“当总理我是不够格的，只要有比我强的人，我马上下来让他当。”他还讲自己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后来，这几句话成为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口头语。

在1961年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局在讨论手工业产

值的计算口径和方法时产生不完全一致的意见。周恩来让与会同志发言讨论。杨波代表国家统计局讲了一些不同意财政部意见的意见。周恩来听了双方发言，表示基本同意财政部的意见，并对杨波的意见略有批评之意，但未作最后的结论。于是，杨波又起立发言，再申述不完全同意财政部的意见。会议结束后，杨波心情有点不安，认为总理讲话后不应该再起立发言，有不够尊重总理之歉疚。周恩来知道后对他鼓励说：“你敢于讲不同的意见，这好嘛！我们讨论问题就是要听不同意见，不然还讨论什么？有不同意的争论，就可以把要决定的问题考虑得更周到些。”杨波十分感动，深为总理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风所感动。

周恩来在工作中十分重视调查研究，经常亲临现场了解情况，和群众商量，听取意见，然后作出决策。他认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对于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实事求是地决定方针政策，正确处理问题，都是十分重要的。1958年3月16日，他利用参加成都会议的间隙时间，亲临成都市西郊金牛坝乡友谊农业社视察，详细询问该社的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和社员收入的情况，要陪同视察的负责同志把这些帐算给他听。这位负责同志汇报了一笔笔的“老实帐”。周恩来边仔细听边叫秘书详细记录。他说，把调查带回去研究，从中找出办好农业的规律性东西。这次视察，《四川日报》女记者沈志钧始终跟在周恩来身边，拍摄了友谊社的许多照片。

3月26日，周恩来收到沈志钧寄送的采访友谊社时拍摄的照片集，非常高兴，忘记了近一个月成都会议的繁忙劳累，当夜复信：

沈志钧同志：

谢谢你送我的照相册。

我很想知道友谊合作社的生产情况，特别是他们改建住屋的情况。如你能在业余的时候，每个月给我写一封信，告诉我关于友谊社的生产和建筑情况，那对我将是很大的帮助。

如果忙不过来，或者下乡去参加生产，也可停止。

如你不感觉为难，请将情况的报道函寄北京国务院总理办公室转我。专息，即致敬礼周恩来三月二十六日这封信说明，周恩来为了更多地了解农村情况，要沈志钧作“特约通讯员”。过后，沈志钧便遵照周恩来的托咐，每月都深入友谊社了解生产生活情况，并及时写出调研材料寄到北京。周恩来每次收到来信都认真阅读，并委托我（时为总理办公室主任）予以函复。

1959年，我去四川搞调查，周恩来还嘱托我一定要去看看沈志钧，并进一步了解友谊社的情况。我遵嘱，一下火车就给沈打电话，转达总理对她的关心和问候。她听到日理万机的周总理还关怀着自己，非常高兴地陪我去参观友谊社，又作了一次前进中的友谊社的调查。当时，该社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和改善社员居住条件，正在把分散在耕地中的居房拆了集中盖楼房。我照了许多照片，回京后向总理汇报了情况，给他看了照片，他很高兴。

1961年春调整农村政策时，周恩来派出工作组到河北邯郸地区调查，随后又亲自到武安县伯延公社蹲点，调查进行了5天，他从早到晚访问社员，与社员和干部座谈，与群众交朋友，深入了解群众中的实情。他善于寓调查研究于工作、活动和各种交往之中，获取真实信息比许多专门人员都来得快、来得多、来得准。周恩来调查后，回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了调查实况，特别提到“大办食堂”问题。他指出，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都要求解散食堂。周恩来把亲自调查实况和派员去各地调查所得的材料综合后，如实地向毛泽

东反映停办农村食堂的正确意见。后来，中央决定取消农村食堂。

记得3年困难时期，四川省委因为根据虚报数字征了“过头粮”，又多运粮食支援外地，以致川北发生饿死人现象，周恩来便立即下令停运。那时候，周恩来派我到南充市火花公社蹲点搞调查。南充地区是黄土丘陵地带，大办食堂，砍树烧柴，下雨又多，农民走远路去食堂打饭很麻烦，大食堂粮食很少，主要喝青菜汤，我看到小孩子个个肚子大，问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孩子们说：“吃菜喝大汤，肚子就大了。”群众要求解散大食堂，自己做饭省柴又方便。我回北京就报告周恩来，他很注意听这些真实情况。第二年，周恩来在回顾武安调查时又向我们强调“要搞好调查研究工作”。他说，刮了5年浮夸风，假话满天飞，群众开始不敢讲真话，你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要搞好调查研究，就要真正联系群众，你要摆官架子，群众有嘴就不讲心里话。周恩来深入实际、联系群众、搞好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1960年春，我从广东从化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结束回福建长汀老家，打算带上老母亲去北京住一段日子。在长江，看见农民在大食堂吃不饱，修路民工以青菜充饥，我回京向周恩来汇报龙岩地区有“每人每月分配30斤谷子”的虚报现象。他要我写信向福建省委反映。我如实写了信。那时候，东北、四川等地，也发生缺粮现象。周恩来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还是实事求是地积极想办法予以解决。1962年他到东北视察，发现缺粮，回到北京就与苏联谈判，从远东地区借了20亿斤粮食支援东北地区。

我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了一条一切为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建国以后，周恩来在政务活动和日常生活中，都率先坚持党的这条群众路线，广泛地联系群众，千方百计地为群众排忧解难。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经常批评那种“下了山忘了山”、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作风。他说，“这种官僚主义是领导者尤其是高级领导者必须警惕的。”他认为，犯官僚主义，一方面由于自己脱离群众忙于事务，另一方面是别人把领导者封锁起来。他告诫各级领导干部不要把自己置于群众之外，不要被“封锁”。周恩来就很反对“封锁”他自己。

1955年，周恩来在昆明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集会，公安保卫部门为了保卫总理的安全，连夜把已经搭好的主席台向后挪了30米。周恩来十分生气，严厉批评有关同志：“我们来参加五一节，就是为了和云南各族人民一起欢度节日，也是借此机会同群众见见面，表达党中央、毛主席对云南各族人民的关怀。可你们把主席台往后挪，这扩大了 we 和群众的距离。共产党要相信群众嘛。你们可不要让我们脱离群众啊！”

周恩来在20多年主政期间，足迹踏遍祖国的广阔大地，都是轻车简从，每到一地，就是深入机关、学校或是工厂、农村，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与群众接触。1958年，他在一钢铁厂视察，迎面遇到一个满身污垢，双手油腻的轧钢工人，便主动上前谈话、握手。那位工人犹豫，忙说：“总理，我手太脏！”周恩来紧紧握住工人的手说：“不，工人的手最干净。”1962、1963、1966年，周总理3次视察大庆，共视察了29个基层单位，同许多工人、干部和家属直接谈话，还到丰收村同正在地头劳动的家属话家常，访问生产和生活情况。1962年，他到铁岭县平顶堡公社地运新大队视察，一个7、8岁大小的男孩认出总理，瞪着大眼睛说：“我认识你，您是周总理！”总

理爽朗地哈哈大笑，连声说：“对！对！这回我也认识你啦！”社员们边笑边说：“咱们周总理和庄稼院的大人小孩都不见外呀！”

周恩来所到之处，都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在京的全体中央委员参加了十三陵水库的劳动。没几天，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信，报告他要同政府高级干部一起前往十三陵工地劳动1周。6月15日，周恩来当“劳动大队长”，率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长、主任、司局长500多人，乘车到水库工地。他同大家一起住在一所学校里，与水库建设者同吃、同住、同劳动。工地指挥说：“我们欢迎首长们！”周恩来纠正说：“这里没有首长，没有总理、部长、司局长的职务，在这里大家都是普通劳动者。”坐在总理身边的王震风趣地对工地负责同志说：“现在你是首长，我们都是你的部下。”

周恩来在水库工地参加劳动，主要是运石料。他又是推车，又是拉车，又是挑筐，又是搬石头。有一天搬石头，大家排成长队传递。周恩来边传边风趣他说：“来了一个‘大西瓜’，又来了一个‘大西瓜’。”顿时，指石头为“大西瓜”的劳动口号声，就在搬石队的队员口中相传开来。周恩来在工地劳动了5天才回京开会。之前，一天晚饭后，周恩来把各部委的同志集合起来，动员那些年纪大、身体弱的老同志在家休息。李德全部长站起来对周恩来说：“我不同意，你不让我们去，你怎么还去？”后来，大家都上了工地，以总理为榜样，没有一个人退下“战场”。

周恩来认为深入实际是一把认识客观真理的钥匙，是获得一切真知的源泉。他总是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参加劳动，深入实际，接触群众，了解情况，为国家建设开处方，为群众疾苦排忧解难。他心中所装的是人民，是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人民公社化那段日子，因为工作有过失误，给群众造成了困难，周恩来承担了责任。他自我批评说：“我是总理，是有责任的。”他呼吁各级政府不要加重人民的负担，要让群众有粮吃。1961年，他为全国人民的吃粮问题日夜操劳着。

有一次，他患病在服药，还在办公桌前打算盘，哪个省有多少粮食？哪个省可以调出多少？给哪个省调入多少？邓大姐心疼地对他说：“你掉到粮食堆里出不来了。”另一次是核实粮食定量，周恩来在这一天已经连续工作17小时了，一进卧室便戴起老花镜聚精会神地计算起来。保健护士郑淑云前去送药，心疼地忙向总理建议说：“像这样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不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周恩来严肃他说：“你说这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怎么能这么看呢？这可不是小事，关系到亿万人民吃饭的问题。”又说：“我不亲自算一算，怎么能知道底细？作为一国总理，那怎么行呢？”“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嘛，所以都应该为人民着想。”周恩来就是这样苦思焦虑和辛劳操持，带领全国人民渡过难关。郑淑云感动得忍不住流出了眼泪。

周恩来为了几亿人吃粮问题，他抓住一切机会进行调查研究，依靠群众，共同想办法来渡过难关。1962年6月的一天晚上，周总理住在大连宾馆。人们入睡时，他还和送水来的服务员小刘拉家常，问她多大年纪、家中几口人、粮食够不够吃？小刘一一回答。她说到家中的粮食基本够吃时，对总理讲：“听老人说，若是在旧社会，遇上这么大的灾害，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呢？目前虽有些困难，但有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困难也是暂时的。”周恩来对她说：“你说得很对。”接着说：“现在城乡人民生活都有困难，农村就更艰苦些，口粮标准低，目前正是大忙季节，社员每天起早贪黑，农活

很重，又吃不饱。‘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实在不易呀！”周恩来同小刘商量起克服眼前困难的事儿来：“那么，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国家现在有困难，拿不出更多的粮食调往农村，请城市的同志每人每月节约一斤粮食支援夏锄，您看行不行？”总理交代小刘就此问题与家里人和周围同志商量一下，然后反映真实情况，但不要说是总理给的任务。过了两天，小刘向总理汇报说，城里人一天一口节约三钱多米都能办得到。因为夏锄搞好了，可以迎来千车万担的丰收粮。

周恩来心实了，再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才找旅大市委负责同志商量说：“要把困难情况如实他讲给人民，相信和依靠群众，大家共同努力渡过难关。”还指示市委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酝酿一下关于节约粮食，支援夏锄的问题。他要求这一工作必须实事求是，不能搞一刀切，对重体力劳动的工人和家庭人口多的粮食困难户不能动员。旅大市委向各级党组织做了传达，并向东北局写了报告。东北局把报告转批东北三省，全区各个城市很快地掀起一个自力更生、挖掘潜力、解决农村夏锄口粮不足的群众性节粮热潮，解决了一件焦灼的大事。这件事，生动他说明周恩来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的胜利。

周恩来在贯彻群众路线的过程中，又善于从实际出发，统筹兼顾地解决问题。3年困难时期，因为粮食不足，不论到哪里都要交粮票才能吃饭。但是对乘坐飞机、轮船、火车的旅客，实行粮票供饭就发生困难，因为外国人、归国华侨没有粮票。此事反映到管粮食的副总理李先念那里，有人建议免票供应，但1年要3500万斤粮食，李先念不敢决定，报告了周总理，经国务院会议讨论，决定从国外1年进口3500万斤粮食免票供应旅客，终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周恩来主持政府工作期间，一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工作态度。他认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科学态度，是我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必须认真坚持。大跃进年代，各省、市都搞计划外的基建，还盖了许多楼、堂、馆、所，使农村的劳动力超计划地大量拥入城市，以致造成职工人数、工资总额和粮食供应“三突破”，影响国家计划的实行，发生财政赤字。面对这些困难，他总是实事求是地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给予解决。周恩来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后，报告中央并经中央决定，停止建设计划外的楼、堂、馆、所，并果断地决定压缩城市人口回农村参加生产。从1960年起，分批从城市压缩2000万人口回农村，还决定由杨尚昆负责，有关部门负责人员参加，成立领导小组抓这件大事，周恩来指定我也参加这个小组。那时候，我们工作挺忙，天天有个“上报表”要向他报告。经过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的共同努力，到1963年，从城市压缩2000万人口回农村去，既增加了农村的劳动力，又解决了城市的困难。在当时，这种做法是实事求是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在工作中坚持科学态度，对于周恩来也是有口皆碑的。解放后，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建工作。有一次，在扩建北海大桥时，遇到北海团城是保留还是拆除的问题。团城与它的北面琼岛同建于金代，元初在岛上建造“仪天殿”，明代修葺改名“承光殿”，改筑砖城为今之团城“它与北海诸建筑构成一个严整的古代建筑群，且自成一体，有着很高的建筑艺术价值，把它拆掉是很可惜的。如果不拆，南面马路狭窄，影响交通。因此，当时两种意见争执不下。1954年炎夏的一天，周恩来冒着火辣辣的烈日到团城察勘足足两

小时，然后跟陪同者和专家商量，又征询文物工作者的意见，最后他坚持科学态度和“取其主、舍其次”的科学决策方法，决定保留团城，让南面的中南海院墙后移，马路向南扩展。这样，既解决交通问题，又保存了有价值的古建筑。

记得 1958 年 6 月，周恩来刚刚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不顾疲劳，乘吉普车向密云县潮白河滩疾驶，为即将修建的密云水库选勘坝址。他和干部、技术人员一起踏过滚烫的沙滩察看河道、地形，并同大家一起研究坝址方案。经过反复论证，进行优化对比，在科学上站稳脚跟，他才同意了潮河主坝与九松山副坝的规划坝址。按这个规划，比原来的设计方案可多蓄 2 亿多立方米水，而工程量却减少 200 多万立方米，使北京人至今还舒享着密云水库的增蓄淡水。

1958 年，尽管周恩来因为正确地提出反对急躁冒进而受到毛泽东批评，甚至考虑变换他的国务院总理职务，但周恩来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不计较个人进退，依然忠心耿耿地、日夜操劳抓首都建设工作。为了纪念建国 10 周年，周恩来召集国务院会议反复研究，根据当时财力、物力的可能，报经党中央批准，确定了振奋人心的“十大建筑”项目，即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工人体育场、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军事博物馆、农业展览馆、钓鱼台国宾馆、华侨大厦、北京火车站。他说，北京是祖国的首都，应该有个“门面”，但外地其它城市不能模仿。对北京“十大建筑”，他殚精竭虑，费尽心机，参与设计，作出科学决策。

在确定建设面积 30 万平方米（超过故宫建筑面积）的人民大会堂时，周恩来指出人民大会堂应该包括能够容纳万人的人礼堂。可是设计的专家感到为难：大礼堂要容纳万人，体积必须 10 倍于普通的礼堂和剧场，空间这么大，如果处理手法不当，人坐在里面就会感到渺小和压抑。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专家们意见纷纷，有人主张做成歌剧院式的，有人主张压低礼堂的高度，这些方案各有弊病。周恩来了解情况后，在一次论证会上，给到会的同志反复宣传建设万人大礼堂的政治意义，强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的建筑必须“以人为本，物为人用”，使享用它的人民感到心情舒畅，自己是建筑物的主人。所以，他提出了“水天一色”的设计思想，还随手用粉笔画出一个不规则的扁圆形顶棚图，启发设计师们把礼堂的内部设计成“水天一色”的形状，顶棚与墙面圆角相交，成个窟窿形象，从顶棚到墙面，上下圆曲浑然一体，使人们感觉既不压抑又不空旷。他的设计思想使搞过几十年设计的老专家折服，敬佩他善于利用视错觉的科学方法应用在建筑设计上。专家们根据周恩来的科学设计思路制订缜密方案，经过 10 个月的紧张施工，人民大会堂胜利竣工，万人大礼堂屋顶用 150 吨重的钢梁牢固横跨，顶棚作 3 圈水波形暗灯槽，纵横密排着近 500 个灯孔，电灯如满天星斗，中心为红色的五角星，圈以镏金的向日葵花图案，寓意全国人民心向共产党。整个礼堂的构造、装饰和色彩有机结合，形成了朴素，明朗、大方的气氛。那幅“江山如此多娇”画，周恩来出点子要有个红太阳。人们称赞周恩来是人民大会堂的“总设计师和艺术指挥家”。

1963 年 5 月 1 日，我国第一艘远洋货轮“跃进号”在驶往日本途中沉没。为什么沉船？交通部部长王首道也搞不清楚。周恩来接到沉船报告，知道“跃进号”船长曾报告沉船前发生轰隆两声，怕有外国潜艇破坏。他听了汇报后，不排除敌人搞破坏的可能性，但他作过分析，当时日本、韩国和台湾尚未有

潜艇，“破坏”之因可疑。为了查明沉船原因，周恩来带着王首道和总参杨成武到上海召开调查“跃进号”失事的情况汇报会议，又同远洋轮船公司干部与专家研究，还派出海军潜水员到沉船处作为期 14 个昼夜的实地侦察，以求取实际证据。事前，对潜水员作了训练，下海作深水作业时，因潜水员要潜水几十米深必须加压，周恩来不放心，亲自和水底通话，问潜水员的身体适应不适应？最后，经过训练的潜水员胜利地完成任务，取得科学证据，否定了“跃进号”属破坏沉没的说法。于是，周恩来作出了该轮系触礁（海图标名“苏岩”礁）下沉的正确结论。他在工作中所坚持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作风，受到人们敬佩！

勤俭治国的总管家

周恩来是全国人民爱戴和敬仰的艰苦奋斗、勤俭治国的楷模。1949年10月1日，周恩来被任命兼外交部部长。11月8日下午，他在副外长李克农陪同下前往外交部部长办公室。办公室铺有地毯，安放1只红木雕花的大办公桌和4把太师椅、4个红木书橱，还有一套沙发。周恩来看过后说：“我不是说过嘛，一切因陋就简，为什么要搞得这样豪华？！”李克农解释道：“这些东西都是北洋政府外交部的，已经存放在这房子里30多年了。”周恩来扫视了一下办公室，郑重又严肃他说：“我今天告诉你们，在我当外交部长的時候，不得建造新的外交大楼，也不许增添更多的房子和办公用品。这些就很好嘛！一定要勤俭办外交。”说实的，外交部大楼是北洋政府时代建造的，房屋不够用，从工作需要出发来说，是应该盖新的，但为了勤俭办外交，节约经费，减少基建支出，周恩来、陈毅都一直坚持不盖大楼。

周恩来健步走进外交部东楼大厅，与全体干部见面。李克农说：“请周总理讲话！”周恩来却说：“我是外交部长，今天到外交部来，你们应称我‘周外长’，不要称我‘周总理’嘛！”接着，他说：“关于外交工作，特别是同帝国主义作斗争，我们不能说没有一点经验的。抗战以来10多年，我们当然是有些对外斗争经验的……”“中国100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他最后要求每一个同志要有严格的纪律，一切都要事先请示、商讨，批准后再做，做完后再报告。这是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后第一次发表的重要讲话。这次讲话，对开展人民外交工作提出了重要的指导原则，这给缺乏外交工作经验的同志是巨大的鼓舞！

周恩来讲完话，已是用餐时间，他便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陪同下来到楼下食堂，同工作人员一道排队，买了一盘豆腐汤、一碗米饭，随便找个位子，坐下就用起餐来。一个大国总理，一个大国外长，这样平易为人，毫不特殊，给外交部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筹备建国10周年的北京“十大建筑”过程中，有关部门提出修建政府办公大楼的计划，并制作了在府右街西侧、从西安门大街到两长安街之间修建政府大楼的设计图纸。周恩来看到盖大楼方案之后，不批，还批评了有关同志。

国务院会议厅是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常务会议的地方。但是这个会议厅是老式旧平房，面积狭小，开会时非常拥挤，且光线阴暗。早在50年代中期，有关方面就建议改建和扩大，周恩来不同意。为了解决开会时的拥挤问题，曾经打掉室内间隔，稍加修理，多添一些会议桌椅。周恩来看到后非常满意，说：“这不是很好嘛！”后来，又有人建议盖一座政府大楼，把国务院开会用的会议厅和办公室一起都解决。周恩来坚决不赞成。他对薄一波讲，连清朝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办公的地方也只有东花厅、西花厅，办事的大员只有四五个人，他们的衙门总共不过十几个人。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讲排场，只要我当一天总理，我就不盖政府大楼。

不久有关部门再次提起修建政府大楼的事，且呈出了设计图纸。周恩来依然不同意。一天晚上，他把国务院主管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副秘书长高登榜找去了解要盖大楼的情况。周恩来严肃他说：“只要我当总理，你们就要把

大兴土木的念头取消，国务院不能带这个头。”他还征求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意见。习仲勋说：“人民大会堂是人民代表开会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需要建筑。中南海这个地方，过去袁世凯、段祺瑞他们办过公，我们拾掇一下就可以办公了，不一定要盖办公大楼。如果要盖办公大楼，不是府右街一片民房都要拆掉？！”周恩来说：“你的意见很好，和我的想法一样，国务院不需要盖办公大楼。”他又一次宣布：“在我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绝对不盖政府办公大楼。”他郑重地把国务院办公大楼这项建筑计划撤消了。周恩来这样做，为的是要国务院成为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表率，集中更多资金投入到国民经济的建设中去。

往后，周恩来一有机会就以有人建议修建国务院办公大楼问题为例，在国务院会议上公开告诫大家要警惕和反对贪大、铺张和讲究排场的思想作风，进行勤俭建国再教育。水电部因为水利工作有些成绩，1959年在密云水库附近修造一座水利展览馆。周总理追问水利部负责人后，摇摇头表示反对，并说：“没有想到你们会做这样的事。”这位负责同志感到辜负了总理关于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一贯教导，内疚地把展览馆移交给其他单位改为研究所。60年代初期，国务院行政部门未经总理批准，便派工人动手将国务院的小礼堂拆去一角，打算扩建。周恩来路过此地，立即吩咐有关同志停止扩建。随后，只好把拆掉的地方按原样造起来。

也是1959年，还发生一起抢修西花厅受批评的事儿：那年，周恩来离京视察前，有关部门再次提出，西花厅年久失修，需要适当修缮，他同意做一般维修，以保护建筑物。因为周恩来进城后一直住在中南海西花厅的老式旧平房里，这栋旧平房多年失修，墙砖出现斑痕，墙皮出现碱印，柱上油漆部分脱落，有的柱子已经糟朽，地面大方砖每到夏天就泛潮，房屋潮湿，总理常闹腿病；房里窗子又裂着大缝，冬天还要用纸糊住，天花板也很陈旧。国务院总务部门多次提出要修缮总理的办公室和住房。可是，周恩来就是不同意修，说：“这个条件比起延安的窑洞好多了。我们经济还困难，怎么能为了我花这个钱，你们想都不该这么想！”

有关部门趁周恩来外出，对西花厅旧房进行保护原建筑物的修缮，把地面方砖改成地板，还添了一些新的办公和生活用具。主管的同志这样做，是出于爱护他的健康，方便工作。实际上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周恩来从外地回京，一进门发现房间里新添的地板、地毯、窗帘、沙发，便立即退了出去，找主管同志严肃询问：“我是怎么交待你的？为什么搞这样铺张？国家正在困难时期，谁叫你添置这些东西？”他指着房间里的新添家具说：“把那些东西统统搬出去。否则，我不进去！”说后，总理便住到他经常办公和接见外宾的钓鱼台去，直到将地毯、沙发、窗帘、梳妆台和灯具等，凡是能搬的都搬走，恢复了原来的旧东西，他才搬回家住。此后，他的房间再也没大修过。

事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我和行政秘书何谦同志说：“你们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对我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的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些，你们为什么不想到……”我和何谦当即作了检讨。

为了修缮西花厅一事，周恩来在国务院的会议上多次作自我批评说：“我

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那么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我心中不安。”总理这样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件修房的事，教育了大家要坚持勤俭节约，不能铺张排场。那时候，我在总理办公室做负责工作，从这件事中所受到的教育特别深刻。事过35个年头，仍然深记我的心中。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担负起大国总理的重任，成为中国人民的“总管家”。他忠心耿耿，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管起了新中国这个“大家庭”。他始终保持了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经常教育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发扬延安精神，不要“下了山忘了山、进了城忘了乡”，要继续艰苦奋斗，在个人身上节约，为国家增加积累，把国家建设好。1959年8月中旬，党的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他于这月24日在第17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作报告，谈到当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计划完成的情况时，提出了厉行增产节约的任务。26日，他又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1962年3月，他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到1962年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时，特别强调要抓紧完成增产节约、精兵简政、稳定市场、改善供应这几方面的任务。他的3次报告，都十分重视在抓好增产同时抓好节约，把厉行节约提到重要的位置上来，提到贯彻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方针的高度上来。建国初期，对于必须进口的军事装备和物资，他根据勤俭原则和节约精神都要亲自审查。对一些重要订货还按品名逐项批注，并一再指示总后勤机关“要严格审查，尽可能少订，能造者一定自己造。”有一次，总后要求从国外订购10000辆自行车。总理没同意，在报告上批示：“津沪均出产自行车，何以必须外购？”他以自力更生和购用国货的自尊自重精神教育干部，对于一些必须使用的经费和物资，在审查批准时，也提出“精打细算，尽量节省”的要求。1952年6月，他在批准总后关于筹购一些防疫药品时批示：一、控制药品器材的种类和数目，疫苗如保存过多，易失时效，如分配过多，则转成浪费；消毒药品如易保存并能作其他用处的，可照此数制购。否则，应减少数量；二、其他经费亦应尽量节省。1953年初，总后请求给沿海边防部队修建营房，追加一笔预算。总理批示同意，但要求应将单价再行核算一下，力求节省。把追加数目控制在总预算内。如不可能，则须提请中央决定。

周恩来在外事工作中，也坚持“勤俭办外交”的方针。他多次指出：“友好重在精神，不在物质，尤其不在排场。”1951年，随着外宾来访的增多，政务院有关部门草拟了《关于接待工作今后的改进办法》报告总理审核。总理遂即批示：同意。一切招待必须是国贵，必须节约朴素，切忌铺张华丽，有失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还对《办法》中的每一项批示了具体意见，如一律用国产水果“以少为好，不要多”，中餐西吃的国产菜“数量亦小不宜大”，用餐时“酒不要多”，“汽水亦需国产”，等等。他把艰苦奋斗作风和爱国主义思想都溶入了《办法》之中。

那时候，有的单位安排外宾到农村参观，从北京带去高级餐具，还从大城市订做饭菜去设宴招待。周恩来知道后，表示不同意这种作法，他认为要用当地的土特产，按当地的习俗，就地做农村风味的饭菜招待。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非常好。1973年9月15日，周恩来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到大同参观访问。周恩来设宴招待，他和法国客人一同吃了具有地方风味的煮玉

菱、高粱米粥，又吃了当地产的鸡蛋和土豆片，宾主都很高兴。总理宴请蓬皮杜，既重于友好招待，又不失革命精神和俭朴作风，收到很好的效果。

周恩来把收旧利废、变无用为有用的做法，视作贯彻“勤俭建国”方针的重要内容。1958年7月6日，他在广东新会县参观废物利用商店和废物利用展览会。新会县的废物重新利用，1年可创700多万元产值。在展览会上，周恩来对每一种物品的利用，如桔皮、橙皮、稻秆、果核、葵叶、野生淀粉和野生油果利用，都逐一详细询问。他对新会县开展废物利用的经验十分赞赏，称赞新会县人民“懂得辩证法”，还对该县领导说：“商业工作也要破除迷信。过去有人认为商业工作不过是做买卖、交换、分配，只为生产服务，不能生产价值，要改变这个观念。你们组织收购废物，变废物为有用，这证明打破常规，商业也能增加财富。”

他离开新会时，还亲笔为废物利用工作写下了光辉题词：“全国商业部门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应该向新会学习，抓紧废物利用这一环节，实行收购废品，变无用为有用，扩大加工，变一用为多用，勤俭节约；变破旧为崭新，把工农商学兵联成一片，密切协作，为全面地发展生产服务，以便更好地实现勤俭建国、改造社会的任务。”由于总理题词倡导和号召，全国掀起废物利用的清仓热潮，变无用之物为有用，为国家增加了千千万万财富。

周恩来为了国家的建设和人民的幸福，大倡勤俭朴素、厉行节约、艰苦奋斗的好风尚。他在个人生活上，表里如一地身体力行，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确实是一个艰苦朴素的模范。他虽然身居高位，住的是老式旧平房，吃的也简单；他的衣服，一穿就是好几年，有一套睡衣、睡裤和一双皮凉鞋，穿了20年；一只用了多年的手表也是国产的“上海牌”；使用的餐具和端饭用的木盘也用了20多年不换；穿破的袜子也舍不得丢，修补后再穿。他个人节约得叫人们敬佩又心疼。在困难时期，他每月粮食只15斤（邓大姐13斤），又不吃肉、鱼、蛋。1962年5、6月间，为了贯彻党中央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他和邓大姐在东北工作了1个月。一到住地，他就对管生活的同志来个“约法三章”：“有几样东西不能吃，鱼、肉、蛋，肉制品也不行。”他说：“毛主席在党中央带头，我在国务院带头。群众有困难，做领导工作的更不能特殊。”他在东北，每顿饭只有两盘素菜加一个汤。他在东北日夜操劳，伙食又很普通，同志们非常心疼，便想着法子让总理吃点肉食。一次，管理员偷偷地买了点香肠，切成碎末拌在咸菜里。总理发现后，马上叫邓大姐去厨房说服大家今后再不要买了，还把剩下的香肠分给了工作人员。周恩来对主管生活的同志说：“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带，憋着一口气战胜困难，你给我弄好的吃，我怎么能咽得下去呢？！”

在3年困难时期，周恩来在生活上严格地以身作则，同全国人民一起共渡难关。他和邓大姐有时留朋友或过去在身边工作的同志吃饭，饭菜都以素食居多。有同志对总理说，你俩都是老人了，日夜操劳，应该注意点营养。国家再困难，也不能没有首长吃得稍好的一些时候呀！邓大姐接过话茬说：“今天的生活水平比起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不知道好了多少倍，我们很满意了。”周恩来也说：“为了战胜经济困难，毛主席提出不吃猪肉，不吃鸡蛋，不吃好米，我们应该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

周恩来外出工作，与工人、农民一起啃窝窝头、吃红薯、喝小米粥、用

苞米做饭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他到河北省安国县五仁桥公社视察，到社员家，还和社员一起吃红薯。1959年，党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期间，周恩来抽空去看望江西省歌舞团和赣剧团演员，和他们围在一起吃南瓜。他边吃边讲：“南瓜好哇！我们红军在井冈山吃的就是红米饭，南瓜汤。”周恩来和蔼可亲的态度，亲切风趣的话语，把演员们都逗乐了。他就是这样善于把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教育贯串于细小的吃食间。

周恩来对待高级干部，同样是以节俭为原则。国务院开常务会议、全体会议或扩大会议，因为时间较长需要准备用餐，他只允许用工作餐，主食是大米饭、馒头或窝窝头、烙饼，副食是一大盆粉丝熬白菜汤加一些肉片，4小碟子咸菜。饭后，每个同志还必须交钱、交粮票。1954年，江西省委书记方志纯到北京参加国务院召集的一次会议。会议结束，周恩来请大家吃饭，餐桌上除馒头、煎饼和一大盆粉丝、白菜加肉片的大杂烩外，别无其他菜肴。周恩来笑着说：“吃吧，没有什么好的招待同志们！”他说着，拿起馒头便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过后，方志纯写文章赞誉说：周总理给我们树立了艰苦奋斗的楷模！

廉洁奉公正己率下

周恩来是一国总理，但他始终视自己是人民中的一员，坚持廉洁奉公，从不占公家一丝一毫便宜，有时公私分明到了令人不可理解。他常说：“正己率下。”正因为他的大公无私的伟大精神和模范行动，教育和感召了千千万万干部和群众，去为建设现代化祖国这个“大公”事业而奋斗。

我在总理办公室工作8年同，耳濡目染到周恩来廉洁奉公、公私分明、公而忘私的动人事迹太多了。例如：严守党中央规定，拒收任何馈赠礼物；坐公车办私事，自己掏钱交车费；看戏、上公园，他自己花钱买票；赠送外宾的礼物，只要是以他个人名义相赠，即自己付款，绝不占公家的便宜，等等。看来好像事非宏巨，但在细微处却可见周恩来的大公无私的伟大精神，正如人们常说的“一滴水可以反映一个太阳”那样。1956年的一个星期天，周恩来在北京中国照像馆照了像，准备出国时送外国元首，要照像馆再多印几张。照像馆职工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爱戴，特意精心印制了4张12寸照片赠送总理。几天后，周恩来要工作人员前去结账，硬要照像馆开两张单子，一张是因工作需要的那些照片由公家付钱，另一张是总理自己留下的几张照片连同照像馆赠送的那4张，由总理个人付钱。

另有一天，周恩来要接见外宾，乘车由中南海西花厅先去北京饭店理发刮脸。他再三提醒司机老杨要记账交费。他说：“从西花厅到北京饭店算私事，从这里（北京饭店）到人民大会堂才是公事，你不要又笼统搞错了。”周恩来总是这样公私分明地处事，把饭店理发、剧院看戏、公园散步、医院看病友以及私人访友，都算做私人用车，坚持自费，绝不占公家的分毫便宜，更不揩公家的半点油。

1964年初秋蜜桔收获季节，发生了一件感人事情。有一天，外交部礼宾司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要给柬埔寨王后送一些蜜桔。礼宾司建议以周恩来个人名义签字赠送，周恩来表示同意，并交代这次赠礼费用由他个人负担，不能向公家报销。礼宾司认为赠礼，不管是以国务院总理名义或以周恩来个人名义，都应由公家报销。周恩来公私分明，礼宾司只好服从照办。那个时候，总理的银行存折只有400元，怎么担负得起昂贵的远程航运费呢！后来，礼宾司同志想出办法，把蜜桔托便人带到柬埔寨。王后接到礼物，非常感动。

1959年到1961年3年困难时期，中共中央曾经发出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周恩来是执行《通知》的典范。1958年，中央举行成都会议时，各地负责同志看到四川省委在成都郊区金牛坝修几栋小楼、1栋大楼，为中央在这里开会时使用。于是，大家竞相效尤，争着在建设计划外拨款拨材料，依照四川办法在其省城盖起5栋小楼（供5位中央领导人住）、1栋大楼（供各省同志和秘书、工作人员住）和1个礼堂（供会议用）。有些地方还盖了大宾馆。周恩来知道后提到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由中央和国务院下令禁止各地盖计划外的楼堂馆所。1962年，周恩来来到东北调查抵大连时，市委书记郭述申要求他住到新盖在海滨风景区棒棰岛的宾馆去。周恩来不仅坚决不去，而且当面批评了大连市委未经批准擅自盖宾馆。他却住在过去日本人修建的旧旅馆内。到哈尔滨时，又拒绝住在黑龙江省委新盖的宾馆，跟工作人员一起住大招待所内。

1973年9月，周恩来陪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杭州。16日中午，他同随行人员到“楼外楼”饭店吃便餐，有他喜欢吃的绍兴霉干菜、豆芽菜等家常菜，

另有一盘西湖醋鱼。对这顿便餐，省里要报销，周恩来不同意，自己付了整整30元。饭店核过菜单，知道总理多付了，随后把饭菜清单开好，连同多余的钱一并寄给总理办公室。

周恩来从来不接受下面赠礼送物，给成都同志退银耳羹，给南京同志退活鱼，给江西同志退柑桔，批评淮安同志送礼品，曾在国务院机关传开。1961年春节前夕，周恩来故乡淮安县委托便人带了一点当地的土特产给周恩来和邓大姐。1月16日，总理办公室代总理写回信邮寄淮安。信中说：“你县送给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以及针织品都已收到了。你们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热爱和关怀，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信中还说明从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薪水中拿出100元，寄去作为偿讨藕粉暨工艺品等物的价款，其他的一些针织品，待以后有便人再带上送还。附信还寄去一份《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周恩来亲笔在这份文件上写了批示，要江苏省委、淮阴地委和淮安县委负责同志认真阅读，坚决按照《通知》的精神办。

周恩来拒收赠礼，我还亲历过一件事：那是1961年，龙飞虎在福州军区任后勤部长，他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多年，为了使周恩来和邓大姐的衣物不被虫蛀，就把部队工厂生产的樟木箱经火车运了两只到北京，一只送给周总理，一只给我，以便保存呢料衣服。老战友送来樟木箱，我接受下来。可是，周恩来看到樟木箱，批评龙飞虎不该送礼，要把它退回去。我建议说，既然运来了，退回去麻烦，是否可按市价付款。他不同意，我只好遵命把两只樟木箱托运回福州、并写信告诉龙飞虎以后再不要送东西。这件事，给我的教育十分深刻，一生不忘。

周恩来经常在各个部门讲话或作报告，有很多是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按照报社、杂志社规定给稿酬。但总理从来不收稿费。一次，报刊发表了他一篇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来寄来了一笔稿费。有一位同志收下，存入银行，过了几年，那位同志把钱交给周恩来。周恩来提出将钱全部退回。可是，已经过了好几年，机构已经变动了，无处可退，大家为难了。对这种情况，我们就出了个主意：“把这笔钱作为咱们办公室的文体活动经费。”过后，就用总理分文不取的这笔稿费买了一批文化用品和体育器材。

1961年，青海省委知道党中央机关的生活艰苦，就从青海湖打捞了2000多斤的蝗鱼运到中央办公厅。周恩来知道后，下令不准收，要退回去。但因路途遥远，退回去要腐烂，他才同意作价汇款去。为此事，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发了通报，要各省、市以此为诫，不准再送东西给中央机关。

周恩来一生为人民的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受到广大人民的衷心爱戴。江苏省淮安县委总想把周恩来出生的地方修成纪念馆，对后辈进行革命传统教育。1953年，周恩来听说此事，就让一位送他婶母回老家的同志口头转告淮安县委，对他家的老屋，有坏的地方修理一下便罢了，但不能建什么纪念馆。如果当地要办医院、托儿所，可以把那些老屋和院子让出来给公家用。

1898年，周恩来出生在淮安红光西巷（原名驸马巷）内的一座旧式普通小院，并在这里生活了12年。解放后，亲属们到北京看望周恩来，曾问及3间房子快倒了，要不要修理一下？他不恻意修。尔后，他和到京开会的淮安县委负责同志商量说，能不能把旧房子拆掉，拆掉了可以盖工厂。县委没有照办。1958年6月29日，周恩来给淮安县委写了亲笔信，请求万不要拿

这所房屋作纪念馆，引人参观。信中特别强调，“无论如何，要求你们答应。否则我将不断写信请求，直到你们答应为止。”淮安县委专门作了研究，并向江苏省作了报告，考虑到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爱戴，一直没有拆掉周家故居，还在1959年做了必要的修缮。周总理得知后，立即从自己的工资中支付了全部修理费用，而后又多次督促淮安县委将修好的房屋让没房子的群众住，不要空着。1973年11月至12月间，总理办公室还4次打电话给淮安县委，传达周恩来的指示：一、不要让人去参观；二、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三、房子坏了不准维修。从对待故居一事，可以看到周恩来的伟大胸怀中，装的是群众，而没有自己。同时，也反映了总理谦虚的高尚品德。

1960年，周恩来观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联合演出的苏联名剧《以革命的名义》。演出结束，他高兴地上台同演员们握手，祝贺演出成功，并一起合影留念。摄影时，出于对领导人的尊敬，大家请周恩来和扮演列宁、捷尔任斯基的演员到中间落座。周恩来笑着摆摆手说，列宁是他的导师，他只是列宁的一个小学生。说着，他就坐在扮演“别佳”的演员身旁照像。周恩来就是这样时时处处表现出自己的谦虚品德。

周恩来有着伟大的功勋，但他严格地告诫所有同志：“不能吹我！”60年代，龙飞虎写了一本回忆录《跟随周副主席十年》，周恩来知道后批评了龙飞虎。1958年6月26日，周恩来来怀柔水库视察，发现他亲笔题书的“怀柔水库”4个字，被放大后用汉白玉镶嵌在大坝的外坡上。为这事，他专门把县委负责同志找去作了严肃批评，并要他们把那个字碑挖掉。1959年，又以国务院的名义下达命令，把建造在天津南开中学内的“周恩来纪念室”撤了他说：“个人是渺小的，只有党和毛主席伟大。”

周恩来是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八一电影制片厂多次准备用纪录片、故事片形式反映和歌颂这一光辉史绩。周恩来不同意，拍摄计划一次又一次取消。因为周恩来反对突出宣传他。1961年9月18日，他在江西省委书记方志纯的陪同下参观“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参观时，他十分严肃地指出：“不要突出宣传我！”他说，八一起义“是党中央决定的，首先是中央决定的正确。是我和朱老总、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共同组织的”。他这种谦虚的品德和求实作风，使随行人员非常敬仰。

周恩来从来不讲他历史上做出的贡献，绝少答应外国记者报道他个人的历史。正如法国总统德斯但所称：周恩来是一个“从来不希望为他自己树立纪念碑的人”。1961年，周恩来和陈毅在上海同白杨等同志谈话时，有人建议总理写一本书。他说：“如果我写书，我就写我一生的错误……要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1965年元旦，文艺界同志请总理看话剧《八一风暴》，他微笑反问：“听说那个戏还涉及到我？你们为什么不写我的错误呢？没有和农民运动结合嘛！”他又说：“我那次领导失败了，你们又不批评我，我就不看。”

周恩来常说：“要有点自知之明，我只能做毛主席的助手，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具体工作。”他心悦诚服地甘当“第二提琴手”，时时处处对毛泽东都十分尊敬。1959年国庆10周年前夕，人民大会堂竣工。9月9日凌晨，他请毛泽东亲临视察，并请主席正式命名为“人民大会堂”。1958年，周恩来来河北平山岗南水库工地视察，知道水库蓄水后要淹没西柏坡村。他对河北省委负责同志说：“毛主席在西柏坡村住过，在这里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一定要把毛主席住过的地方迁移好，把毛主席住过的地方

保留好就行了 ,这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好阵地。至于我住的地方 ,不要保留。”

在周恩来的字典里只有“奉献”，没有“索取”，只有“人民”，没有“自己”。他为了中华的振兴、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坚贞不移，终生奋斗。周恩来把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的智慧和美德集于一身。他，不愧是一个伟大又平凡的人民好儿子。

不许亲属有丝毫特殊

周恩来对待自己的亲属从来不沾一点私字。他对亲属的要求再严格不过了，决不允许由于他的关系而有一丝一毫的特殊。50年代，有一次，周恩来的亲属从外地到北京探亲，按“家规”往招待所。因为周恩来在建国后给自己的亲属定出了“家规”：来北京一律往机关招待所，在食堂排队买饭菜，没工作的由他代讨伙食费；不许用公家汽车；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这位亲属按“家规”住下来，但他返回时，卫士长成元功向国务院机关互助会借钱买了车票，周恩来过问：“车票是怎么买的？”成元功说是向机关借钱的。他说：“公家的钱怎么可以随便借！职工有了困难怎么办？”等到成元功解释是向机关职工互助基金会借来时，周恩来才说：“这就好！”周恩来的六伯周嵩尧，1949年已经76高龄。全国解放了，他从淮安老家到北京找侄儿“大驾”（周恩来的幼名）。周恩来热情接待了阔别20多年的六伯，便按“家规”把老人家安顿在招待所。1952年8月，六伯80大寿。周恩来特地把他的六伯接到西花厅做寿。说是做寿，其实也就是邀在北京的弟弟周同宇和侄儿女周华章、周秉德、周秉宜等一起吃了一顿饭。周恩来和邓大姐出席了10个人的祝寿家宴。1953年9月1日，周嵩尧老先生病逝，2日在西城嘉兴寺内举行入殓仪式，周恩来出面给逝去的六伯含殓，并带着周家亲属向长辈三鞠躬告别，仪式很简朴。

1956年10月下旬，周恩来的婶母在淮安患重病，县人民医院写信向周总理汇报。他立即回信淮安县人民委员会，信中除表示感谢外，说他婶母的病是无法治疗的，不要到外地转治。其一切后事也请代为办理，但要本着节约和简朴的精神办理。他还汇寄人民币200元作为治疗和办理后事的费用，又嘱咐说：“如不够时，请你们先垫付，事后来信说明支付情况，我再补钱去。”隔年4月19日，周恩来致信县人委时，寄还婶母安葬费所尾欠的垫款25元。信中还说：“我伯母家现在还有陶华等人，今后她的生活费用均由我这儿接济，请当地政府对她勿再予照顾。”周恩来就是这样公私分明的处事，从细微处反映出他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

周恩来有个胞弟叫周同宇。早在20年代曾经投入大革命洪流。解放后，在中央工业部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后来，因为患病不能坚持正常上班，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恩来知道此事，在政务院的一次会上说：“周某人的弟弟在内务部做参事，不管是什么原因去的，总没有好影响。他在工业部时能工作，我不干涉，现在当参事等于拿干薪，那就要考虑了。”会后，他对内各部长曾山说：“同宇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就应该按有关规定办理因病退休手续。如果他因此在生活上发生困难，我个人给予补贴。”后来，周同宇提前办了病退手续，周恩来逐月给他补贴钱。

周恩来还有一个堂兄，在抗战时期帮助我党建立了秘密电台，解放后仍留在铁路系统工作，1953年，他因历史问题及经济问题被判刑劳改。有关部门想给予照顾，周恩来却不让，说他的堂兄有旧思想，犯上律条，就应该在劳动中好好锻炼、改造，重新做人。他真是依律行事、铁面无私，对自己的亲属也不例外。

1958年“大跃进”时，毛泽东提出“死人应该给活人让路”并带头签字提倡死后火葬，周恩来坚决执行。未提倡火葬之前，北京逝者都土葬。50年代初期，任弼时、张澜逝世都是在八宝山墓地土葬，后逝秆也是土葬，占地

很多。提倡火葬后，只有东郊一个小火葬场，很不方便。后来，周恩来批准北京市进口先进的大火化炉，便解决了问题。

1958年11月，周恩来派我去重庆，将抗战时期八路军办事处建在沙坪坝的“红岩公墓”平掉还耕，挖出周恩来父亲、邓大姐母亲和黄文杰、李少石等同志以及小孩13个棺木火化，把骨灰入罐深埋在地下。1984年，我再去重庆，经市委同意，又把这些骨灰罐移往红岩纪念馆，深埋在红岩公墓。

周恩来的早逝祖父母、母亲和婶母等11个亲属，都葬在淮安乍郊的上块普通坟地里，他考虑到坟地占用耕地，影响农业生产，多次提出平掉祖坟，坟地交公。但是这样做，不光群众通不过，县委一班人也想不开。难道淮安县增产增收，就差那么小小的一点坟地？县委说不能平，吃批评也心甘。1964年，周恩来特地派他的侄子周尔萃专程回淮安处理这件事。后来，当地干部和群众深为周恩来“坟地交公”的革命精神所感动，答应按周总理的指示办。旧历除夕，他们连日动工，把全部棺木深埋到1米以下，平掉坟头，使它不影响拖拉机耕作和土地深翻。另外，在周恩来的一再坚持下，也把远在绍兴祖籍的曾祖父周樵水的坟墓平掉，通通叫“死人给活人让路”了。

提倡火葬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都签了名。周恩来也和邓大姐商量约定，身后不留遗灰，把骨灰撒到祖国大地江河。周恩来、邓大姐先后逝世，经中央批准同意，根据他俩的遗愿，在火化后将骨灰撒落祖国江河大地。周恩来率先提倡并完成丧事的改革，这种彻底革命精神，深刻地教育了我和紫非。我们两口子也约定身后火化，把骨灰一半撒入嘉陵江，一半埋在红岩公墓。1993年7月，紫非不幸先我而去。1994年3月，我带上她的骨灰到重庆，遵照她生前约定，一半撒进嘉陵江，一半深埋到我俩共同战斗和生活过（相爱、结婚、生子也在这里）的红岩。在重庆，我当众宣市，身后也照此办理，以实现向周总理、邓大姐学习的夙愿。

1955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周恩来的侄子周华章到西花厅来吃成元功的结婚喜糖。邓大姐当知道华章有了女朋友侯云珍时，高兴地对他说：“那很好嘛，不过不要过早地结婚，还可以再等几年嘛，你看成元功就是28岁才结婚的。”周华章听他七妈的话，到1958年29岁时才登记结婚，实行了晚婚。华章结婚后，周恩来和邓大姐约定周华章夫妻去西花厅吃一顿饭，对新郎新娘热情祝福。饭后，邓大姐给侄媳妇侯云珍送了一块柬埔寨的红格细布，这就是一件极有意义的结婚礼品了。

1961年7月3日，周恩来的侄儿尔辉在北京结婚，婚礼是在伯伯的西花厅家里举行的。周恩来和邓大姐两位老人家准备的礼物很简单：一床周恩来用过的床单，一件周恩来穿过的短袖衬衫，一条周恩来穿过的毛料裤子，没有置办新的东西。周恩来笑着对两个年轻人说：“不要嫌不好。当年我们结婚比这还简朴，也没有请客，也没有买新衣服，条件比现在艰苦多了！艰苦朴素光荣嘛！”周尔辉就穿着伯伯穿过的衣服举行婚礼，感到很光荣。结婚后，新郎回钢铁学院工作，新娘回淮安工作，一对牛郎织女。当钢铁学院知道了周尔辉和总理是亲属关系后，为了照顾新婚夫妇在一起，决定把女方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不同意这样做，亲自动员侄儿侄媳一起在淮安工作，对他们夫妇说：“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大量压缩城市人口，国务院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周恩来又说服钢铁学院领导同志。最后，尔辉夫妻很快回到淮安，同乡亲们一起建设家乡。直到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周尔辉和他的妻子仍在

淮安中学当教师。

周恩来和邓大姐没有儿女，但对侄子、侄女等晚辈既关心爱护又严格要求，从小教育他们长大后到农村。基层去当农民、工人，做普通劳动者，鼓励他们要严格要求自己，告诫他们“不能利用亲属的职权搞特殊化”，周恩来另一个侄儿周荣庆，在我国开始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制度时，就让他由北京到河南当了农民。他说：“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鼓励荣庆学习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周荣庆很听总理的话，在农村积极劳动。后来当了拖拉机手，还在农村成了家。1964年夏天，周恩来对来京的亲属特意讲了一番殷切寄望的话：“对周家的年轻一代，我是希望你们跟着我背叛封建家庭，走一条革命的道路。”

周恩来侄女周秉建，1968年中学毕业后，报名奔赴内蒙古大草原。在离京前夜，周恩来对她说：“秉建，我坚决支持你上山下乡，到内蒙古大草原安家落户。我要求你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永远走下去，一定要迎着困难上，决不能当逃兵。”他又吩咐说，“你去的是牧区，是少数民族地区，要很好注意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邓大姐还给侄女讲了红军长征经过少数民族地区的故事。最后，周恩来要求秉建到牧区后锻炼吃牛羊肉，过好生活关。因为她在家里不吃牛羊肉，所以特地交代她到牧区要锻炼吃，尊重当地风俗。1970年12月，周秉建参加了解放军。周恩来不同意，立即派秘书到部队了解她入伍的经过。后来，秉建向部队组织要求重返牧区，并获得批准。周恩来高兴地对她说：“你回去以后，还要住蒙古包，住到生产队去。”又说：“我没有孩子，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这来路。”过些年，周秉建回京探亲，周恩来吃饭时慈祥和蔼地对她说：“要在当地找一个蒙古族青年，在内蒙古安家。”“王昭君就是匈奴的媳妇嘛！你可以向她学习，做个蒙古族的媳妇，也是加强民族团结的一种体现。”后来，周秉建完全实践了周恩来对她的嘱咐和教育。经过20多年，她已经做了蒙古族人的妻子和蒙古族孩子的母亲，正把全部身心投入到振兴内蒙古的建设事业中，为建设伟大祖国的边疆贡献自己的力量。

周恩来严格要求亲属的模范行动，影响和教育了一大批党外朋友，使他们以总理为榜样在自己的亲属中实行起来。在湖南长沙率部起义的陈明仁将军多次受过毛主席、周恩来的接见，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后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他有一个最小的孙子上山下乡，1970年找了爷爷，要他搞个当兵名额，通过关系参军入伍。当时陈明仁当大军区副司令员，想让孙子当兵并不困难。但他对孙子说：“要求参军是好事，但你的户口在临安，应该到当地去报名应征，我不能给你特殊照顾。周总理都这样对待家人，我们要学习。这个后门不能开。”后来，陈明仁的孙子继续在农村安心劳动，入了团，当上小队会计，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大学。

周恩来这样以身作则地、毫不徇私地教育和培养自己的亲属子女。他也要求党内领导干部正确对待自己的子女，不要叫他们变成“八旗子弟”、纨绔公子。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他呼吁领导干部（包括他在内的407名总理、副总理及国务院73个直属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应该做出一点表率，不要造出一批少爷”。中南海的武成殿的院子里，立了一块石碑，是乾隆皇帝告诫皇家子弟不要过腐朽生活的。周恩来有机会就对人说：封建皇帝都注意教育子弟，我们共产党干部更要加强对后代的教育。

一次，周恩来到上海开会，当了解到有些领导干部带着夫人、孩子来到

地方，所有住宿、伙食、交通费用皆由地方政府支付时，很是生气。回到北京，他在全国第三次交际接待工作会议上恳切地告诉各省来的同志：今后无论哪个领导到省里去，吃、住、行等所有开支，地方一概不要负责，都要给他本人出具帐单，包括交通费在内，由各人自付。这要形成一种制度。周恩来这种严肃态度，正是他从党、国家、人民利益出发考虑的一种大公无私的伟大思想的体现。

西花厅的日日夜夜

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常委、军委副主席、政协主席，又是一国总理，所以，他的国内外事务特别紧张繁忙。因此设立了总理办公室，配备了一些秘书，协助他分摊点事务工作，节省他一些时间。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一直在国民党地区领导地下党和统战工作，除了有一个警卫副官外，没有专门的秘书，警卫副官是保卫部门配给的。解放战争时期，他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并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都是依靠总参谋部、社会部、城工部和有关部门，也没有专门的秘书。

建国后，周恩来日理万机，没有专门办事机构就不行了，这样就开始建立总理办公室。当时政务院秘书长是李维汉，齐燕铭任副秘书长，分工领导政务院秘书厅、总理办公室等工作。至于总理办公室的干部配备、审查和调整，都是齐燕铭通过中央组织部进行的。周恩来只是根据工作需要提出要求，从来不提具体名单。

总理办公室 1956 年人员最多，有 20 多人。那时候负责周恩来、陈云，陈毅、习仲勋 4 位正、副总理和秘书长的事，由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兼办公室主任，下设综合组、财经组、外事组、秘书组、行政组。1957 年，办公室作过一次压缩，人员精简，近半数同志调出去支援各条战线。自此，办公室就只管周恩来的事了。办公室留下的包括正、副主任，还有 9 位秘书，“分兵”联系有关部门。另外，还有一个机要秘书和几名干事，负责收发电报文件，并且日夜轮流在值班室值班。为了及时处置紧急公务，国务院下属各部、委、局，根据总理指示，也相应地建立起 24 小时值班制度，并随时掌握部长、副部长的去向，以便“随叫随到”。

1958 年 3 月间，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分管总理办公室工作，感到总理办公室缺少一个熟悉统战工作的干部，他就向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徐冰和我分别征求意见。齐燕铭说，周总理除管党、政、军大事外，他还兼全国政协主席，分管统战工作，经常要和党外人士联系，需要一个熟悉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到总理办公室去。童小鹏抗战时期就随同周总理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又在中央统战部工作多年，调他去比较适当。李维汉提出调走童小鹏，但要调一个秘书长还统战部。徐冰认为我去总理办公室，可以使统战部同周恩来的联系更密切，更便于请示报告。我自己则表示，总理办公室的工作很重要，我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不能胜任，如果组织决定要我去，我一定服从并努力把 work 做好。齐燕铭又同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商量，安子文完全赞成，并答应可以物色一个秘书长给统战部，这时，齐燕铭才把商量的经过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说，既然组织部和统战部都同意，我也同意。经中央组织部办手续后，我于 1958 年 4 月 12 日到总理办公室上班。

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秘书、警卫等，进进出出的前后不下百把人，他们都是为工作的需要而来，又为工作的需要而去。都不是周总理自己提名要来的。周恩来选用身边工作人员，可概括为一句话：完全依靠组织，从不任人唯亲，只有大公无私。就这点来说，也反映出他高贵的品德，特别值得各级领导同志学习。

周恩来工作之繁忙、辛苦，那是在红墙之外的人所鲜知的。他的忙碌，连外国朋友也说他是时间最不够派用、睡眠时间最短的一位总理。由于他管的事多面广，所以办公室每天收到的各方送来的请示报告、文件资料、情况

简报、统计报表等，多得不可胜数。秘书们便充当第一道的“过滤器”，首先把材料过滤，该写摘要的写摘要，该拟提纲的拟提纲，等待周恩来夜里回办公室审阅和批示。周恩来的活动日程，白天忙于参加或主持各种会议，接待外宾，会见各种专业会议代表，约人谈工作，还不时要挤出时间去看望与我党长期合作共事的党外人士。白天忙过，晚间9、10点钟以后才能够批阅文件（当然对于急件或电话传来的汇报请示，随时批办）。他的工作有条不紊，属于只需过目的文件资料，由秘书们分门别类放入标名的文件夹内，陈列案头供随时翻阅；对需要审批的，秘书当面呈送。周恩来审批文件很仔细，连用错的标点符号也亲加改正；属于工作请示，要求批准的，他会作出明确的答复；对于从电话传递上来的国内外发生的重大情况，在专门印制的汇报表格上随记随送，随时批办。批示的内容，只要秘书和对方经办人员记录在案，核对无误，即可执行，无需再有什么文件往来。毛泽东对这种工作方法曾经称赞过，认为效率高，重要情况在短时间内即可使有关同志知道，并且减少了文牍主义毛病。

周恩来对每位秘书的工作都是直线联系的，有外交、政法、军事、经济、财政、文教、统战等等。他交代的繁多事项，秘书们从不疏忽、从不遗误，虽然工作很忙，但大家心情愉快，精神焕发。周恩来办公桌有一个抽屉，安有直通各个秘书办公室的电铃，像钢琴音键一样排列着，遇有交办的事情，就按铃招呼前去。每位秘书除手中积压的等待总理阅批的文件外，需要口头请示汇报的问题也是接连不断。晚间，周恩来在家，秘书即抓到他几分钟时间，争取办几件事。所以，周恩来回西花厅有时用餐、洗澡或在卫生间，也得处理公务。很多紧急事情是在他起床后上厕所的时间处理的。所以，秘书们开玩笑说，总理的卫生间是“第一办公室”。

周恩来的确太忙，睡眠时间实在太少，常常要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邓颖超大姐为了减少他的一些工作负担，曾经鼓励秘书们发挥集体智慧，把有把握的事代他答复，事后报告。可是，周恩来还是未能添点睡眠时间。后来，秘书们商量出一个轮流值夜班制度，每晚有一两人值班，不值班的人把任务交代下来。这样，每晚只有一两个秘书陪总理，不必大家都等着。

值班办公的效果虽然不错，但也出现另一个问题。一天，负责水利的李岩值班，周恩来戴着老花镜翻阅外交部送来的一些非洲国家的材料。他按铃招呼李岩进去，提了好几个问题。可李岩不了解外交的事，不敢随便回答。周恩来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们是铁路警察啊，各管一段，那怎么行啊！在我办公室值班，我就得找你，你就要能够回答，办公室就是你们7个人，不能回答我的问题怎么行？你们商量一下看怎么办吧。”

李岩回到办公室，给我留了一个条子，把周恩来的意见转告我。我见过条子，觉得过去为解决夜间秘书太多太乱，才实行值班制。可是，值班秘书顾了那头又顾不了这头，李岩碰到的事情就是一例。过后，我请秘书们开会，商量怎么办好。大家一合计，决定以后办公室秘书每周聚两次会，相互通气，把自己分管的这几天周恩来交代的大事通报一下，做到每个人心中有数，知道目前在抓什么问题，周恩来还没有办完什么事。开会时，也把搞机要同志请来听听情况交流。这样，周恩来问起来，值班的秘书就不会卡壳。我们做秘书的工作，就是要适应他的工作而不断变化。

总理办公室工作复杂，我这个主任也很难当。为了帮助我做好工作，1959年12月5日深夜，周恩来在一个信封的背面给我亲笔写下一个批示信：

童主任：

我批办各件，请你于每日在家时上午十二时前，晚间十一时左右来办公室看一次，以便熟悉全局，利于检查、联系和协调各口的工作。

此件请给各秘书同志一看，并对值班干事规定几条守则。

周恩来

十二·五

我按照周恩来的批示信办，熟悉了全局，工作就好做了。他的这个批示信，我一直保存至今。这份我唯一保存下来的珍贵资料，已经成为一件革命文物了。

周恩来的工作一丝不苟，非常细致，对计划项目，数字要详细审查，亲自笔算。开会讨论经济工作。秘书要用计算尺（当时还没有计算机）随时计算回答他提问的百分比。遇有审查国家计划、财政预决算时，还得从计委借来一架手摇计算机，搬到周恩来对面的办公桌上，帮助计算多种数据。他十分重视数字和百分比的准确性，不允许人家回答“估计”、“大约”、“差不多”的字眼，更不允许不懂装懂。他对秘书工作的要求是严格的，秘书们感到紧张、有压力，但大家心情舒畅、愉快，深深感到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是一种幸福，可以学到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和严谨作风。

在总理办公室工作，深感周恩来对毛泽东十分尊重。他对呈送毛主席的文件和附件都要亲自过细地检查，连字迹写不清的也要改正后才送去。公安部、调查部的文件写得清晰，受了表扬。有时，毛泽东有事找周恩来，总是随叫随到。有一次，已是深夜3点过了，主席办公室打电话找他。主席的秘书问：“总理是否休息了？”值班的李岩回答说：“总理已上床睡了。”毛泽东听说周恩来已睡，就让秘书通话说：“那就算了，不要叫了。”第二天，李岩向周恩来汇报这件事，周恩来一听就不高兴，说：“那怎么行呢？主席来找，即使我睡了，也要把我叫醒。”他随即到办公室找我来了，要我转告全体工作人员说，以后凡毛主席找他，即使睡下，也要把他唤醒。因为主席夜间找他，必有急事，误不得。从此，周恩来立下一个规矩，只要主席叫，不管睡没睡，都要马上报告。

周恩来对下面的工作人员、秘书们的工作要求十分严格。他经常说，对身边工作人员“亲者疏之”，在他那里工作别想当官，只有实实在在地做人民的公仆。但他对大家十分关怀和爱护，从不对那一个人作整体性的批评和评价，有个别同志犯了大一点的错误也不做全面的评价，他批评人一般是就事说事，说到为止，启发你自觉地检查。同志们受了批评，都不感到有压力，反而得到改进工作的动力。

我在西花厅8年，由于兢兢业业地工作，几乎未受过周恩来的批评，仅有一次例外。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大约是1962年的夏天，总理腹股沟患了湿疹，坐卧不宁，要躺在床上休息，但仍照样地批阅许多文件。卞志强大夫向我反映，希望他多休息，少看文件，争取早日痊愈。我同意大夫的意见，就一起劝他多休息，少看文件。他当时有点不高兴，随便说了一句“你们不关心政治”。我听了觉得很冤枉，我认为关心他的健康就是关心政治，反而受了批评。但我依然用心照顾他的休息，没有吭声。以后，我为此对他提了意见，他对我表示歉意，反而使我后悔，不应该提意见。周恩来的虚心态度，更深深地感动了我。

周恩来身居高位，但平易近人，关怀干部生活。有时候，也挤出时间到

秘书家串门子，关心地问问近况，看看家属，逗逗孩子。有时，他和邓大姐利用春节或中秋节抽空放电影或赏月，就欢迎秘书们带爱人和孩子一同到西花厅过节，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既亲切又热闹。1965年初，因为一位领导同志的秘书在外事工作上出了点差错，耽误了一件大事。这桩事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去。毛泽东不高兴的说了一句“秘书太多会误事”。周恩来认为“秘书最多的当然是我这里了”。1966年4、5月间（我当时正在江西上饶参加“四清”工作），他果断地决定撤消总理办公室，改为总理值班室。当时许多同志提出意见，说总理事多，秘书不能太少。他仍坚持己见，把大部分秘书调走了，只留下周家鼎和两个机要干事，又新调入钱嘉东管外事。总理办公室撤消时，周恩来说：“既然解散了，咱们就一块吃顿饭，照个相吧！”这次离别会餐，周恩来请秘书们吃饭，都是很简单的菜，特殊的就是一瓶茅台酒，饭桌上的气氛很好，西花厅洋溢着浓浓的同志情。周恩来对前来参加会餐的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说：“从我这里离开的同志，你一定要给予很好的安排。在没有安排之前，没走的，仍是我这里的人。”事后，周荣鑫同中央组织部商量，出去的人都作了适当安排。我同许明没有调走，留在国务院专任副秘书长职务。

总理办公室撤消，改为总理值班室，秘书少了，只有周家鼎管内政，钱嘉东管外交。但周恩来的工作还是那么多，两个秘书忙不过来，周恩来常常自己拨电话，联系工作，工作更忙了。

这里也要说一下，总理办公室也曾经出过两件事：一是50年代，某部起草一封电报送请总理批发，一个机要秘书收下后，竟然把它忘记了。过后一发现，不敢如实报告，还假冒周恩来签名送到机要局发，译电员看出来不像周总理亲笔字，一下就查出来了。这个同志也就调离总理办公室。还有一桩是伪造周恩来批示的诈骗案：1960年3月18日下午5时左右，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给中国人民银行值班室送去一信，信封的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信的主要内容说：“主席办公室来电指示，今晚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摄制纪录影片，需要现款十五至二十万元。”信上还假冒总理批示：“拨二十万，限当晚七时送交民族饭店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人民银行秘书见此“急件”，即找发行局和计划研究局、会计发行局研究送款。7时，人民银行派3人将20万现款送到民族饭店交给“赵全一”。21日，银行询问总理办公室这笔款怎样报帐，总理办公室答复不知此事，要求将“总理批示”送去查对。这才发现是一起伪造总理批示的诈骗案。公安部党组决定由杨奇清副部长亲自抓这个案件的侦破工作。不久，查明作案都是外贸部的科员王倬。这个诈骗犯终受法律制裁。

我在总理办公室工作8年，深切受到周恩来的教诲，终身不忘。1994年7月29日，我携带儿子、孙子到西花厅参观，要他们学习周恩来、邓大姐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做贡献。到了西花厅，我思绪萦绕，心中泛现出周恩来为党和国家日夜操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身影。1949年9月，周恩来和邓大姐迁入西花厅办公和住宿后，近27年如一日，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鞠躬尽瘁，为中国的繁荣和昌盛作出伟大的贡献。西花厅是周恩来、邓大姐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历史见证。它是我国人民纪念周恩来、邓大姐的一个好场所，学习他俩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的一个好课堂，也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历史文物。我们希望，将西花厅按原貌保护下来，作为周恩来、邓颖超故居向外开放，供人瞻仰、学习。这将是

纪念周恩来的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情。

“大跃进”的前前后后

反冒进及其受到不公正的批评

我国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后不久，在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问题上，党的领导人中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在实践中使我国的经济建设走了弯路，甚至遭到严重的挫折，这就是1956年出现的冒进，以周恩来为主几位领导经济工作的同志的反冒进和毛泽东进行的反反冒进。

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接连不断批评邓子恢“小脚女人”的右倾保守思想，全国出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随后，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也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毛泽东的注意力开始从社会主义改造转向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他一再批评领导机关的思想严重落后于实际，批判右倾保守，这对经济建设各个领域以至科学、文教、卫生等事业，都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当时周恩来以及其他领导人，对于来势迅猛的生产建设高潮也是欢欣鼓舞的，他表示拥护毛泽东关于各方面工作都是认识落后于实际的批评。他念了新编的一副对联，表示对毛泽东批评的体会。上联是：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下联是：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他还说：“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

1955年夏季，国务院在北戴河开会，讨论编制15年（1953—1967年）远景规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轮廓。各部汇报了自己的设想。按各部提出的数字综合，1967年全国粮食产量6000亿斤，棉花5600万担，钢1800万吨，煤炭2.8亿吨。工农业产值平均年增长速度：“一五”8.6%，“二五”9.9%，“三五”10.1%，15年平均增长9.5%。国家计委汇总报告中央。毛泽东对这个设想是不满意的。他认为指标偏低。这年11月中旬，毛泽东先后在杭州、天津召开一些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展望农业发展的远景，归纳了《农业十七条》，最主要的内容是1967年粮食产量要达到4、5、8，即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地区每亩年产400斤，黄河淮河之间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800斤。同一地区棉花分别达到60、80、100斤。从1956年起15年内，开荒1.4亿亩，到1967年全国耕地达到18亿亩左右。按照估计中的耕地面积和单位产量计算，1967年粮食产量应是10623.8亿斤，超出原设想指标80%；棉花产量应是12000万担，超出1倍多。

毛泽东的思路是，当时国际形势趋于缓和，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取得成果，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影响日益增强，估计可能出现10年到12年的和平时期。我们要利用这个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党准备在1956年召开“八大”，毛泽东提出这次大会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

与此同时，1955年12月，毛泽东采纳周恩来、薄一波、李富春的建议，提出了经济建设“要快、要好、要多、要省”的意见。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把多、快、好、省正式公布，这篇社论虽然鼓舞人心，却充满着形势逼人的气息。

1956年1月初，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对《农业十七条》作了补充修改，扩展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月25日，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以草案形式公布。它的主要内容除前面谈的棉粮指标和增加耕地面积指标外，还有7到12年内消灭普通水、旱灾和水上冲刷灾害；在可能的地方，基本消灭危害农作物最严重的病虫害，危害人民

最严重的疾病；5年、7年或12年内基本消灭老鼠、麻雀（后来才知道麻雀是益鸟，改为臭虫）、苍蝇、蚊子；5年或7年内基本消灭文盲。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发言提出，《纲要（草案）》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的奋斗目标。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形势。

于是各行各业都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已经不能按照原来的设想工作，都要加快速度和扩大内容，指标都定得很高。

1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部讲到：美国那点东西，1亿吨钢，几百个氢弹，不大算数，中国要超过他，第一步是接近他。2月中，各部委汇报工作时，他又说：我们工业的发展速度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所束缚。我们的建设可以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其实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工业的增长速度在13.2%到19.2%之间，已经不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增长速度是18%，已经很高。毛泽东这些话传达之后，必然起到鼓励冒进的作用；而按照已有经验和客观可能实事求是地测算发展速度的思想，就被称作“右倾保守思想”而加以批判。这种缺乏科学根据的冒进情绪，在1956年的国务院各部召开的专业会议上集中表现出来了，他们纷纷要求把12年远景设想和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的12年或8年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

毛泽东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和各部门制定的指标越来越高，使周恩来深为不安。他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感到这种冒进的倾向应当遏制。高指标完不成，国务院不能辞其咎，反冒进的主要责任自然就落到国家的总管、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肩上。

从1956年1月下旬起，周恩来感到要防止急躁冒进问题，对此，关键在于控制基本建设投资，因为基本建设过多，需要的物资大大增加，必然造成各方面紧张，控制基建的速度，才能遏制这种冒进倾向。他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呼吁说：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在1月30日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作《政治报告》中，他又提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2月6日，周恩来和计委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长李先念研究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压缩指标的问题。周恩来指出：现在各部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既然已经存在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现象，计委、财政部就要压一压。经过两个会议的努力，1956年度的基本建设投资从170亿元压到147亿元。

在这个月里，周恩来又多次谈到做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问题，认为这是一个重要原则。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他说：“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各部门订计划，不管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领导者的头脑发热的了，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4月10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搞计划要实事求是”，“搞生产要联系平衡”。他指定薄一波和计委副主任张玺负责平衡工作。由于不少地方劳动力增加和批判“右倾保守”，下面普遍要求多生产，多建设，而上面都不敢将物资紧张情况向群众交底，因此工作很被动。为了扭转这种被动状况，周恩来根据多次平衡测算的结果，提出1956年物资供应计划按钢材492万吨、水泥647万吨执行，并下达到各部门和地区。国务院发文后各部门和地区，要求建设高潮要同计划的全面平衡相结合，特别是同物资供应计划相结合。如果只看到施工力量的增长，而没有注意到设计、设备和材料的供应情况，采取全面铺开和齐头并进的作法，就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停工、窝工现象，并且会使我们的计划有部分落空的危险。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又说：反保守，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

5月，刘少奇要求中宣部就反对“两个倾向”问题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6月1日，中宣部长陆定一在部分省市宣传部长座谈会上宣布：反对右倾保守，现在已高唱入云，有必要再提一个反对急躁冒进。中央要我们写篇社论，把两个倾向反一反。

6月1日，周恩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关于压缩1956年计划指标和编制1957年计划问题，他认为当年基建投资147亿元，比上年增长68%，仍然是冒进的指标，数字这么大不可能完成。因为147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需要增加相应的钢材、水泥，而钢材只增长45%，水泥是负增长，即使有钱，缺乏原材料，如何去完成计划呢？薄一波、李先念提出“剃一次平头”，大家都减5%，总投资额降为140亿元。这个意见被周恩来所接受。当时全国人大即将召开，要在会上报告国家预算。在6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预算应该放在可靠的基础上，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在6月12日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他强调应加强计划性，先是搞生产计划，然后搞人力、物力计划的平衡，最后搞财政预算，有人不同意既反保守又反冒进。李先念在一次报告中说：“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只能招致损失。”周恩来对这个观点表示赞同，认为如果冒进继续下去，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

中宣部起草的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脱稿后，陆定一、刘少奇、胡乔木都作了修改。陆定一删去颂扬反保守主义的几句话；在“农村的扫盲工作也是突出的例子”这句话中，在“也是”后面加了“急躁冒进的”5个字。刘少奇作了4处文字修改，都是加重语气，揭示冒进的危害性。胡乔木在修改加工时，补充了几个急躁冒进的例子。其中之一是双轮双铧犁的计划定的太高，没有考虑到南方水田的条件，以致在南方许多地方造成积压。社论提出：急躁冒进所以造成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仅存在下面的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刘少奇改定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毛泽东接到此稿后，批了“不看了”3个字。社论于6月20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地位刊出。后来大家才知道，毛泽东批“不看了”3字，本意是他不赞成这篇社论。

双轮双铧犁和扫盲两个例子，在当时都是比较敏感的事情，因为都是毛泽东在《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的要求。为了推广双轮双铧犁这一

新式农具，曾生产 170 多万部，却只销出 80 多万部，还退回 15 万部，不退回的也有很大部分被搁置不用。规定 7 年扫除文盲，有的地方变成 5 年或 4 年，甚至 3 年和 2 年，在我们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即使《纲要(草案)》规定的 7 年扫盲也是冒进的。直到现在，我国也远没有实现扫盲。

由于党中央、国务院从年初开始，大力压缩基建指标，从防止冒进到明确提出反对冒进，盲目冒进的势头被遏制了。据统计，1956 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62%，是“一五”期间增长最高的一年。可是，出现赤字 18 亿多元。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四位主管财政经济的领导人都认为这一年冒进了。

1956 年 9 月，党召开“八大”。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初步总结了几年来我国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特别强调“应该根据需求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

1957 年初，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在国际上，波兰由于波茨南事件引起的动乱已经平息，匈牙利事件也在军队的镇压中恢复了平静。在国内，“一五”计划提前超额完成，生产建设出现了蓬勃的气象。毛泽东的注意力由国际方面转向国内方面，原来他对于反冒进是有意见的，这时他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认为反冒进给群众中高涨起来的生产热情泼了冷水，放慢了建设速度。9、10 月间，在北京召开八届三中全会，会上开始批评反冒进。毛泽东在会上说，1955 年来了一个高涨，1956 年，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主要是扫掉了 3 个东西，一是多快好省，一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是促进委员会。共产党的方针是促进而不是促退，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并提出要“复辟”被扫掉的这 3 个东西。

会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尖锐批评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把跃进看成“冒进”。12 月 12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修改和政治局讨论的社论，批评反冒进是“刮起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反冒进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1958 年 1 月初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会议上，尖锐批评“右倾保守”，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周恩来等政府领导人。

1958 年 1 月 11 日至 22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南宁会议，这次会议把批评反冒进推向高潮。由于 2 月份要召开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周恩来建议先讨论 1958 年的预算和年度计划，毛泽东同意，因此，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几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也来参加。

会议印发了一批文件，其中包括李先念在 1956 年 6 月 15 日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中关于反冒进的一段话，1956 年 6 月 20 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周恩来 1956 年 11 月 10 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 1957 年度计划的报告》的讲话节录。以上文件都是作为被批评的材料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的。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就批评说，反冒进首先没有把指头弄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就只讲一个长疮的指头，十个指头的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到 6 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后来又多次谈到反冒进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

主义就是这样。

当天晚上，毛泽东讲话对反冒进提得更高，说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日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这3个东西。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属于业务问题。对《人民日报》6月20日的社论，他的批评更是尖锐，说这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上重点是反冒进的。认为社论中引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的几句话来说明反冒进，“是用毛泽东来反对毛泽东”。他还对这篇社论批道：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尖锐地针对我的。

毛泽东在批评反冒进时，对柯庆施非常赞赏。柯在1957年上海市党代会上作过《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毛泽东说，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在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1月16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再次拿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我写不出来。”毛泽东接着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毛泽东的尖锐批评，使这次会议开得很紧张，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不知所措。周恩来为了顾全大局，在19日晚上作了检讨，说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促进方针相反的方针，并表示他对错误负主要责任。

南宁会议以后，对反冒进的批评并没有结束。2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批评反冒进。他说：如果说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而反冒进是马克思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在中国变了样子，把搞得少叫马克思主义，搞得多的不叫马克思主义。我不赞成反冒进叫马克思主义，赞成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并针对周恩来等同志说：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们相距不远，大概50米远。但他又说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我看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今后还是靠你们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会上，陈云、李先念、薄一波都进行了自我批评。率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归来的周恩来，参加了23日最后一天的会议自然也不会好受。

3月间，毛泽东在成都召开了成都会议，又接连谈到反冒进问题。3月9日，毛泽东说，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南宁会议提出了这个问题，有许多同志紧张，现在好了，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3月25日他又说：关于反冒进以后不要谈了。事实上批评反冒进还有余波。在这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作党中央工作报告时，又提到反冒进问题，报告说：反冒进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的生产建设，特别是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形成了“马鞍形”。毛泽东修改工作报告时，加了一段：“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经过几个月的批评，对反冒进负有责任的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又再次作

了自我批评，这时批评反冒进问题才告一段落。

进行了几个月的对反冒进的批评，事实证明它是起了消极作用的。首先，毛泽东把冒进称为马克思主义的，而反冒进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政治问题而不是业务问题，又称反冒进的同志是“促退派”、“观潮派”、“像蜗牛一样爬行”、“跟右派相距不远了”等等，上纲上线，对于冒进不能再提什么意见，这就助长了“左”的思想的发展，对于党内的民主生活也发生了很坏的影响。在党内生活和实际工作中，右倾保守和冒进都是可能发生的，只能反右不能反“左”，就造成了党内、各部门中许多人调子越唱越高，越“左”越好，订计划时指标层层加码，这就为1958年的大跃进开辟了道路，导致了后来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国家遭到严重的困难。其次，这次批评反冒进，被批评的都是党中央和国务院中职位很高的领导同志。由于毛泽东在党内有崇高的威信，大家敬仰他，尽管他的批评有许多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周恩来等高级干部也要按照他定的调子跟着走，几乎不容许进行说明和申述，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自我批评、写检讨，甚至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党内高级干部都不能申述自己的看法，这还谈什么党内民主，只能造成党内的“一言堂”。有些同志深有感触地说，南宁会议前后，党内气氛逐渐紧张，毛泽东有些高居政治局之上了，已很难像以往那样经常同政治局的同志在一起平等地商讨问题，党内生活开始不正常了。我认为这是符合事实的。

1958年4月，我从中央统战部调到国务院担任总理办公室主任时，看到中央党校教授兼总理办公室理论秘书范若愚正在为周恩来起草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检讨，其中谈到反冒进是十分错误的。他的思想确实“右倾保守”，“离右派差五十米远”等等。使我吓了一跳。我想，周恩来对毛泽东是紧跟的，重要的事都请示主席和中央，为什么犯这么大的错误。我很不理解。这个检讨稿送给邓小平征求意见，邓小平说，写这么多干什么，他把“离右派差五十米远”划去了。后来事实证明周恩来等同志反冒进是正确的，他一再自我批评，写检讨。我觉得这不是他的本意，是为了维护党的团结而在强大压力下作出的违心的行动。

从农业开始的“大跃进”

在批评反冒进中孕育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也推动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1958年4月，毛泽东又说，“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

“跃进”这个词原是周恩来的发明。1957年6月2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的报告中，批评右派所谓“全面冒进”的攻击，肯定1956年是“跃进的步骤”、“跃进的发展”。1958年5月26日毛泽东看到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说明最早使用“跃进”一词从此开始。毛泽东当即写了封信，表彰发明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实际上，周恩来使用“跃进”一词比《人民日报》社论早140多天。26日，彭真把周恩来的报告送给毛泽东，并在上面写道：“主席：‘跃进’一词，在这个报告中已用了。”周恩来在当夜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1956年建设是冒进的错误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

“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1957年10月25日，修改后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公开发表。毛泽东要求5年间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年达到2000斤。他认为，现在一人三亩地太多，将来只用几分地种粮就够吃了。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的社论，提出“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党中央通过报纸正式发出“大跃进”的号召。全国各地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首先兴修水利，1亿人投入农田水利建设，深翻土地，从1尺5寸达到几尺。最突出的表现是放“高产卫星”，最早放出的是河南遂平县放出的亩产小麦2105斤的“卫星”，接着江西贵溪县放出水稻亩产2340斤的“卫星”。于是“卫星”几乎天天放，而且越来越大，最大的小麦“卫星”是青海蹇什克农场亩产8585斤；最大的水稻“卫星”是广西环江红旗农业社的亩产130434斤。这简直如《天方夜谭》中的神话，使许多人瞠目结舌，迷惑不解。实际上这些离奇的丰产典型，大都是采用“并田”方法假造出来的，把许多块即将成熟的庄稼全并到一块田里，计算出它的产量。甚至那个数字压根儿就是假造的。许多同志都还记得，当时《人民日报》曾发表一张照片，一个小孩坐在卫星田的稻穗上。这些夸大的宣传，当时就有许多同志不相信，但是因为怕戴“右倾保守”帽子不敢公开说罢了。老实说，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当时各级干部的浮夸风、弄虚作假风达到惊人的地步。脱离实际，唯意志论的提法层出不穷，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有人甚至说，我国粮食产量再提高，“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也够用”。“高产卫星”起了鼓励与迷惑的作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决定1959年粮食产量指标为8000—10000亿斤，棉花产量指标是9000万—10000万担。而1958年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棉花只有3938万担。要它们分别增加1倍至1.5倍，根本达不到。

刚刚被批判“右倾保守”的周恩来，面对农业的“大跃进”局面，虽然表现沉默，但他仍以冷静的头脑观察这个问题。1958年7月，我随他坐飞机

到郑州视察黄河水灾时，参观了一个农业展览馆，馆内陈列了几个“亩产 3000 斤”、“亩产 4000 斤”小麦的“卫星”，他当即问陪同的负责同志，这是否确实？弄得那个负责同志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农业的“大跃进”促进了工业的“大跃进”。工业的“大跃进”是从钢铁开始的，最具典型的是“全党全民大办钢铁”。当时苏联提出，在 15 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我们也提出应当争取在同一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于是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赶上和超过英国，成为工业“大跃进”的重要口号。

和农业一样，钢铁产量离谱的指标出现了。1958 年 3 月 20 日，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两个报告，其中关于钢铁工业的发展提出，我国的钢铁工业“苦战三年超过八大指标（1070 万吨—1150 万吨），十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毛泽东对两个报告非常欣赏，称它是“一首抒情诗”。据此，4 月 15 日，毛泽东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明确宣布：“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他把这篇文章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同志时，还写了一封信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5 月份，八大二次会议开会，钢铁产量指标又被提高了。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再次提出了速度超过苏联的问题，他认为苏联是 20 年加半年把钢铁产量从 400 万吨（1913 年）搞到 1800 万吨。1957 年是 5100 万吨。我们搞到 5100 万吨，不需要这么多时间。我们的底子 90 万吨（1943 年），到 1962 年将搞到 3000 万吨，可能是 3500 万吨，也许是 4000 万吨。从 1949 年算起，可能只要 15 年就能搞到 5100 万吨。他还明确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毛泽东的雄伟气魄，使许多人包括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头脑都热起来。

6 月 17 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西楼开会，听取薄一波关于 1958 年计划执行情况和 1959 年设想的汇报。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除毛泽东外，其他常委都参加了。会上估计 1958 年钢产量将达到 900 万吨以上，1959 年指标应为 2000 万吨或者更高一些。就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的口号，毛泽东在薄一波的《汇报提要》中批示：“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一九五九年达到二千五百万吨钢，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毛泽东的讲话、批示都只在内部进行，公布出去的是 1958 年产钢 1070 万吨。

当时实际生产能力怎样呢？1 到 7 月份，累计只生产钢 380 万吨，和指标相比还差 700 万吨。8 月 16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开幕，毛泽东感到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决定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光靠“洋炉子”是完不成任务的，决定土法上马，发动群众大搞“小土群”，主要是发动农民就地大炼钢铁。于是，一场全民夺钢保钢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最多的时候，有 6000 万农村劳动力投入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这年年底，钢产量完成 1108 万吨，在 1957 年 535 万吨的基础上翻了一番。煤产量由 1.31 亿吨增加到 2.7 亿吨。

但是这个指标的完成是以极大的代价换取的，甚至是虚假的。首先是产品质量低，许多地方小高炉炼出来的铁是含硫量很高的“烧结铁”，不能炼

钢。用于浇铸，也因铸件发脆太硬而不能加工，成了一堆废物。经以后核实1958年钢产量为800万吨。而国家的矿产资源被破坏，森林被大量砍伐，连群众做饭的锅也被砸光。群众反映，“这是吃祖宗的饭，遗祸子孙”。其次，造成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一五”计划期间我国的积累率平均为24.2%，1958年却一下增加到33.9%，过高的积累，严重挤掉了消费，使人民的基本生活资料得不到保证。同时，重工业的产值迅速增长，也挤掉了农业和轻工业，使国民经济得不到均衡的发展。

10月以后，毛泽东也发现了“大跃进”中的问题。在11月召开的郑州会议，他开始降温了，承认包括他自己，犯了“冒失”的错误，认识了只讲多快不讲比例是不行的。但他仍然认为批评反冒进是正确的。

在反反冒进中被批评的周恩来，对于国家的这种现象是忧心忡忡的。但他不可能再来一下反冒进，只能不去添柴加火，使这股热焰烧得更旺，而是在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中尽量避免国家遭到损失。在八届六中全会上，1959年钢的指标降下来了，为1800万吨。周恩来、邓小平要计委交换一下情况。陈云认为完成这个任务恐怕有问题。周恩来心中是有数的。3月25日至4月5日，党中央先后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薄一波写信给毛泽东，谈了年度计划执行情况，并就轧钢机安排不落实作了检讨。26日，薄一波在会上作了第一季度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报告。毛泽东借题发挥，批评了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以及工交各部门的工作是大少爷办工业，现在要出“秦始皇”，老讲仁义道德结果一事无成。提出1000多个基建项目中要削减500项或600项。这时周恩来机智而又风趣地插话：要有决心，头上要沾点血。毛泽东说，根本不要决心，干掉就完了。周恩来说，这句话就是决心。在这次会上，邓小平提出1500万吨钢材也可能完不成，把计划放在1100万吨钢材的基础上，宁肯超过，大家心情舒畅。毛泽东、周恩来都赞同邓小平的意见。4月2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讨论钢、煤、粮、棉四大指标，周恩来讲了三条经验，一定要有保险系数，统统打满不好，要留有余地，藏一点。从北戴河会议以后，步步退却，就是因为不落实；逐步提高定额，超额完成；实事求是。这反映了周恩来对于经济建设要稳扎稳打的思想。

“大跃进”在工业生产方面“以钢为纲，带动一切”，赶上英国的主要标志是钢铁产量，钢铁生产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周恩来决心深入了解钢铁生产的情况，5月17日，周恩来写了《关于总理和八个副总理分别到9个产铁重点地区去视察的报告》，请邓小平批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彭真核阅。报告说：

根据我在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和主席处的报告，为了了解目前各地钢铁，主要是地方生铁的生产情况和问题，为6月中央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提供这方面的材料，我已征求陈毅等8个副总理的同意，我们于本月20日前后分别出发到九个产铁重点地区去视察，于6月15日左右回京。

分工视察的地区是：

周恩来——河北；

陈毅——山西，可能时再去内蒙；

谭震林——山东（主要是注意农业，并研究生铁生产）；

习仲勋——河南，可能时再去陕西；

贺龙——四川，可能时再去云南；

罗瑞卿——湖南，可能时再去湖北；

陆定一——江苏，可能时再去上海；

聂荣臻——安徽；

乌兰夫——包头。

视察的内容，主要是生铁的质量和数量问题，为此，拟到产铁产煤基地，对矿石、煤炭、洗煤、炼焦、耐火材料、炼铁、炼钢、设备、运输、劳动力分配和成本核算等一系列的具体问题做具体了解，以求实现中央财经小组的要求，先保质量，后争数量。

中央批准周恩来提出的报告，总理和副总理们分头出发了。他们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例如陆定一在山东枣庄调查时，了解到去年大炼钢铁中，“小土群”问题很多。大批农民上山炼铁，在地里挖个坑，睡在里面，棉被都是湿的，这怎么能持久呢？炼出来的铁含硫量很高，大都是不能用的废品。1958年是丰收年景，秋收时农村的壮劳力都去大炼钢铁了，庄稼成熟了却没人收，农民编了顺口溜说：高粱站了哨（成熟后无人收割），棉花吊了孝（棉絮从棉桃中垂下来），大豆放了炮（豆荚成熟后在地里爆开）。农民粮食缺乏，大都吃不饱。他们到了上海，柯庆施和分管工业的书记马天水都没来见他们，只派一个干部来说大话，说上海要达到年产1000万吨的生产能力。陆定一问，生产1000万吨钢，矿石、电力、运输的问题能解决吗？这个干部不能作具体的回答。陆定一和陪同他来视察的冶金部总工程师陆达一计算，这个指标根本完不成。他们回到北京后，到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表情极其严肃，一言不发。他已经看到完成任务不容易和大搞群众运动的种种弊端。

我是随同罗瑞卿去湖南视察的。罗瑞卿因为未管过工业生产，他特别从冶金部要来两个专家随行。从5月23日到6月24日1个月时间，跑了十几个县，既看了涟沅、湘钢等大中型钢铁厂，也看了遍地开花的“小土群”、“小洋群”炼铁厂，还看了煤矿、铁矿基地。最后在长沙做了总结并起草了一个书面报告报周恩来。总的印象是：像涟沅、湘钢等大中钢铁厂，因为有铁矿、煤矿、石灰矿等原料的来源，有比较先进的炼铁炉和炼钢炉设备，又有必要的技术人员，问题虽然不少，但经过一些整顿和加强领导，是有发展前途的。但靠运动轰起来的“小土群”、“小洋群”，除个别的生产了一些含硫高的生铁外，大多数都不能维持生产，不得不停产，但已浪费了许多煤炭和木材（“小土群”主要是用大木头去烧的）。至于人才和粮食的浪费，则是无法计算的。所以建议国务院要迅速研究并解决钢铁计划和生产问题。其他副总理也向周恩来马上书面报告，总的情况是差不多的。

周恩来根据自己的调查和各位副总理的报告，在国务院会议进行研究后，即向中央写了报告。主张迅速调整钢、铁和钢材的生产指标。

由于“大跃进”，钢铁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各方面给它让路，轻工业被挤掉，农业丰产没有丰收，粮食和副食品严重匮乏，工作被动，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陈云、邓小平等同志主张降低钢铁生产的指标，中央书记处决定，1959年产钢1300万吨，铁1900万吨，钢材900万吨。各部门才得以对严重失调的现象进行调整。周恩来思想上的压力也有所减轻了。

庐山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

郑州会议的纠“左”和钢铁生产指标的降低，开始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对待经济建设。1959年6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工业、农业和市场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和李富春都指出了“大跃进”的主要问题，就是对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重视不够。周恩来说：在跃进中间，综合平衡抓得不够，抓了这个方面，其他方面忽视了；企业内部的综合平衡，几个方面的综合平衡都抓得不够。毛泽东说：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横直是一样，就是高炉、平炉、小高炉、小转炉，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会转弯，为了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研究一些具体政策，进一步纠“左”，中央决定在7月初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俗称的庐山会议。

毛泽东这个时候心情是比较舒畅的。他6月24日由武汉乘专列火车到达长沙，恰巧罗瑞卿和我参观了韶山回到长沙。下午2时半，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告诉罗瑞卿，说毛主席已到长沙，邀罗和我一道到火车站迎接。我们立即去火车站，上了专列，见到毛泽东。专列随即开到城外的黑石铺机场专用线的车站停靠。毛泽东即乘汽车到湘江边准备下湘江游泳。这时省公安厅已准备了救生船只和游泳水手。毛泽东在游泳水手保护下顺江往下游。罗瑞卿和我虽然也会游泳，但没有在大江中游过，就各套了一个救生圈跟着顺流下游。大约经过40分钟，到了长沙的橘子洲头，毛泽东上了岸，大家也跟着上去。橘子洲是毛泽东风华正茂时和同学少年常来“中流击水”的地方，故地重游，所以他今天特别高兴。他一上岸，就被一群小学生认出来了。在小学生们“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中，游人也都围拢来向毛主席问好。毛泽东穿上睡衣，举手向群众致意。接着，在周小舟、罗瑞卿等陪同下，毛泽东到省委招待所住下。

25日上午，毛泽东和我们一行人从长沙乘汽车来到他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下午，约了一些老人座谈、照像，同他们吃家乡菜。晚上就写出那脍炙人口的诗篇《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谁也没有想到，26日清早，毛泽东就起了床，他告诉贴身警卫员要上山给父母亲扫墓。警卫员叫起罗瑞卿和我，我一骨碌下了床，立即背起徕卡照像机跑到毛泽东前面，爬上了山坡，拍下了毛泽东折松枝代花向父母墓前献上并行鞠躬礼的镜头。摄影记者侯波是女同志，比我落后一步赶了上来。

27日毛泽东在韶山，曾到毛家祠堂谒祖，参观了韶山学校，在水库游泳，又接见了许多乡亲。28日返长沙乘专列到武汉，改乘轮船到九江，于7月1日上庐山。当晚他又兴致勃勃地写了一首《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刘少奇和朱德是6月30日上山的。周恩来带秘书顾明、李岩等于7月1日由北京乘专机到武汉，然后经九江上山的。我陪罗瑞卿从长沙到武汉经黄石港上船到九江，于7月1日到庐山。

陈云本来上了庐山，因庐山海拔高（五老峰1400米，会场和住地1200米），他身体不适应，中央决定他下山休养，没有参加会议。

邓小平因会前打台球滑倒伤了腿骨，在北京治疗，没有上山。所以书记处由彭真负责，但许多事情他找周恩来商量。为了工作方便，周恩来和彭真、杨尚昆以及中央办公厅的同志都住在庐山交际处的一幢大楼里。周恩来除了要我和顾明、李岩分别参加大区的小组会，将小组会的重要意见向他汇报外，还要我帮助办公厅编会议简报。小组的简报由各组长签字后交会议科印发。

会前，已传出毛主席对形势估计的三句话，即“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大家听了认为这次会议要好好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克服缺点错误，对前途是有信心的。

庐山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要讨论读书、形势、今年的任务、明年的任务、综合平衡等18个问题。周恩来提出增加国际问题。共是19个问题。7月2日中央开了常委会，把会议要讨论的19个问题确定下来。7月3日，会议分6个组，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我列席中南组。组长陶铸传达了中央常委会确定的19个问题。从口气上看，主要是毛泽东的讲话。主要内容如下：

一、读书。由于许多领导同志不懂得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8月份用1个月的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中央、省市、地委一级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卷。这本书总结了苏联经验，但有缺点，如和平过渡，通过议会斗争夺取革命胜利之类。当时都认为革命必须通过武装斗争。山东、河北建议，给县、社干部编3本书：一本《好人好事》，在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不谎报、不浮夸的例子。如河北王国藩，山东菏泽一个队。一本《坏人坏事》，犯错误的，专门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各省找几个例子。一本从去年到现在中央各种指示文件。3本书10万字左右，10天读完，还要考试。公社领导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使大家冷一下，做冷锅上的蚂蚁，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

二、形势。是好是坏，有些坏，但还不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方针政策对不对？要坚持。总的来说，湖南省委有三句话，他们说得很巧妙：成绩很大，经验丰富（实际是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去年1年经验，主要是综合平衡，群众路线，统一领导，注意质量。最重要的是综合平衡。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产品都要有）。农业12项，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特。工业有轻

有重。过去“两小无猜”，把精力搞小高炉、小转炉，其他都丢了。去年大丰收，今年又大春荒。今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这是一个好现象。去年许多事是一条腿走路，不是两条腿。我们曾批评过斯大林一条腿走路，自己提出过要两条腿，反而一条腿了。“大跃进”中包含某些错误与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些问题，但包含积极因素。去年情况本来很好，但带来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一面，没想到困难一面。现在形势好转，盲目性少了。何时能彻底好转？争取明年五一节。去年脑子发热，但热情宝贵。有些问题还没完全弄清楚，为何粮紧，缺肉？似乎促进派腰杆不硬了。总之，怪话不少，要让人说。

三、任务（或分成两个问题，即今年任务，4年任务）。工、农、轻、重、商、交各方面，过去是两条腿，去年丢掉一条，是挤掉了农、轻，也挤掉了商。如果当时重视一下农、轻就好了。今年钢是否1300万吨？能超过就超，不能超就算了。钢明年只能增400万吨，达到1700万吨（或6、7、8三个数，1600万、1700万、1800万）。以后几年也是年增400万吨，2300万吨就超过英国。定要确保质量，不要追求太多数量了。今后应由中央确定方针，移交业务部门算帐。粮食去年增产有无3成？今后是否每年3成，即1000亿斤。64年搞到10000亿斤。恢复农业四十条。指标比原定的稍高一点，还是12年达到。两个口号不变。15年内主要产品赶超英国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人的脑子逐渐实际，要让下面去超过。

去年做了件蠢事，好几年的指标要在1年内达到。像粮食指标，恐怕要4年才能达到。过去安排是重、轻、农，现在是否改为农、轻、重。这样提，不会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是不会放松的。衣食住行安排好了，就不会造反，这是6亿7千万人安定不安定的问题。日子过得舒服，才利于建设，便于积累。农业问题，一是机械，二是化肥，三是饲料。农、轻、重，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它4年（准备犯4年错误）。不提口号，不作宣传。工业要支援农业，明年化肥，农用钢材，这次会议定一下。

有两种积极性：盲目性和实事求是。还是要讲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搞一平二调）。总的看，10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真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是多数）是权利归他是共产主义，否则是资本主义。山东有的地方发现抢粮之事，这很好，可引起注意。搞社会主义是会坚持到底的，不会一日或忘的。美国如打来，我们最坏退到延安，但还会回来的。

四、体制。有些半无政府主义。人、财、商、工四权下放了，现在要适当收回；对下要适当控制，要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强调集权，统一领导。统得不可不死，不可过死。

五、食堂。按人定量，分配到户，自愿参加，节约归己。在这几个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哄而散。能保持30%也是好的，形式可多种多样。太分散的户不办，吃饭基本要钱，一部分不要钱。四川是基本不要钱。湖北是半供给制。供给部分要小，三七、四六。供给制不要否定。食堂与供给制是两回事。按月发工资，大部分办不到。

六、学会过日子。湖北农民批评干部：一不懂生产，二不会过日子。要留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总要增产节约。今年不管增产多少，粮食按4800亿斤标准过日子。去年湖北的错误，是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了，放过卫星的县过得最差。

七、恢复三定：定产、定购、定销，3年不变。增产部分征四留六。自留地不增税。

八、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九、综合平衡，大教训之一。三种平衡：农业本身（农、林、牧、副、渔等）；工业内部；工业与农业。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新的基础上的综合平衡。无综合平衡，即无群众路线。

十、生产小队改为半核算单位。四川的问题在于原高级社小，现叫生产队。生产、生活的核算放在一起好，否则浪费很大，反正归管理区。一改，怕影响生产，弄个“半”字。

十一、农村党团作用。党不管党，都由生产队长包办代替了。无支委会，无组织领导作用。

十二、宣传问题。去年浮夸，怎样说法？1959年的四大指标定高了，现在陷于被动。上海会议时，即有人提出利用人代会议改。失了点时机，找个适当时机改过来，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粮食是否以后不公布绝对数。

十三、质量问题。争取一二年内解决。煤炭的含硫量超过了允许的标准（0.07%），出口退货，名誉不好。

十四、对去年的估计：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要等较长的时间才能看得出来。看出问题，才能鼓起劲来。跃进公路，修了这么多也没垮台。秦朝、隋朝很快就垮台了。

十五、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十六、全国协作关系。破坏了原来协作关系。协作区搞些调查研究。计委的派出机关（大区搞体系，公社工业化，工厂综合化）。

十七、团结问题。统一思想。河南120万基层干部，40万犯错误，3600人受处分，是个分裂。

十八、国际问题（列了个题目）。对资产阶级不易一次认清，界限要分清。同蒋介石打了10年，讲统一战线，一切都忘了。

这18个问题中，如第三个问题分为两个问题：今明年任务和4年任务，则为19个问题。这19个问题，虽然其中还有不少“左”的东西，但总算是抓住了“大跃进”产生的种种错误，如果真正头脑冷却下来总结经验教训，这场灾难不至于继续发展，而是能及时得到纠正。会议开始时，大家都轻松愉快，称这次会议为“神仙会”。周恩来也谈到大家初上庐山的心情时说：“那时候，是本着一年来党的总路线的执行情况，跃进了一年，大家都很忙，找到庐山来把经验总结总结。主席说了，也带一点休息的意思。这一年的大跃进成绩伟大，有些问题，逐步在解决，已经解决了不少，剩下的还在解决中，在认识上前途是光明的。是这样的心情，这样的意思上山的。”庐山会议是本着解决“大跃进”的问题、争取1959年继续“跃进”而召开的，起初大家的心情是舒畅的。

在庐山，周恩来最关心的是经济问题，除了参加常委会外，在7月23日以前，他多次找国务院各部门负责同志开会，讨论形势与任务。李富春、李先念都参加。有时刘少奇也参加。7月12日，周恩来作了长篇讲话，谈形势，摆问题，算细帐。他认为：1958年是一次新的革命，当然问题不少，突破了旧的平衡，要解决新的平衡。北戴河会议到现在将近一年，应如何认识将措施过程缩短。他说，这次在庐山比以前认识多了一些，如财政赤字，是

否即通货膨胀？物价只少数有变化。过去陈云同志总强调财政、物资、现金三个平衡，要略有节余。去年全冲乱了。主要是货币与财政不一致，银行的货币多发行了。他将工业、农业、商业分头算了细帐，单生铁，国家即补贴25亿元。商业透支了50亿，用于赊销和预付款。今年上半年银行支出，工业有30亿不正常，摊子铺大了，一机部等生产任务多变动，品种不齐，不能配套，质量下降，次铁退货等。冶金部今年24亿投资，上半年已用去19亿。他认为，继续跃进，过分紧张，综合平衡工作没做好，特别是三材（钢材、木材、水泥）太不平衡，不能这样过日子。国家一定要把帐算清楚，要收权，去年四权分给省市，要收到中央与省市两级。上下纳入计划。要归口管理，不能一个人四个口袋，流动资金不能当基建使用。最后，要号召增产节约，解决商品与货币比例的正常化。大家采取积极态度，不要隐瞒问题，也不要埋怨和推诿。

李富春、李先念也都发了言。主要也是谈经济问题和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17日和18日的小组会，组长传达了16日刘少奇和周恩来的讲话，可能是他们在常委会上的发言。大家认为刘少奇讲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鼓足干劲”，可以解决问题；只有把成绩讲够了，才能把缺点讲透，周恩来讲话中算了一笔帐，虽然大炼钢铁补贴了40亿，但是取得了经验，争取了时间，不仅大大提高了我国钢铁生产的设备能力，而且大大缩短了投入生产的时间。“小土群”为“小洋群”作了准备，小高炉为大高炉作了准备。“两小”充分利用了分散的煤铁资源。钢铁帐要算，但既要算经济帐，也要算政治帐；既要算现在的盈亏帐；也要算将来的盈亏帐。只能两条腿走路，不能一条腿走路。许多人认为，总理的说法有说服力。周恩来的讲话是持平之论，他考虑的主要是如何解决问题。

16日，毛泽东把彭德怀给他的信批给中央办公厅印发给到会同志，并加了一个大字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当时我正和杨尚昆等在一起，看到信后，我们都觉得彭德怀首先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又批评“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指出大炼钢铁“有失有得”，都是有道理的。“大跃进”造成的比例失调，确实给国家带来了严重困难。信中批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认为是对的。我还特别指出，徐水的县委书记提出“奋战三年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根本做不到。没有想到此后几天中，庐山气氛逐渐紧张，阴云密布，一场暴雨即将到来。

这时，周恩来还在召开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会议，讨论国家计委提出的今明两年的计划安排，落实各项主要指标。有一天晚上举行舞会时，李锐正在周恩来旁边，有意地问道：你看彭总的信怎么样？周恩来回答：那没有什么吧。意思指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当时对彭德怀的信已经议论纷纷，有直截了当表示赞同的，也有提出种种非难的。

7月19日，周恩来参加小组会发言时，没有提到彭德怀信的事情，只是说，他同意毛主席讲的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和少奇同志讲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现在争论的主要点是中间“问题不少”这句话，两头是一致的。他还说：检查缺点使我们前进，不会使我们后退。毛主席教育我们要天天扫地、洗脸，检讨了缺点，我们就会更加健康，就会干劲更足，更踏实。当时毛泽东指定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田家英、吴冷西和李锐7人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论定记录》，写了12个急待

解决的问题，作为会议的总结性文件。周恩来讲了同意其中讲的3条缺点，并补充了以下几条：1、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2、比例失调；3、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头一条起了主导作用，后两条与之有联系。周恩来还没有意识到彭德怀的信将会引起轩然大波。

7月23日，早饭后，毛泽东吃了3次安眠药还睡不着，他就要机要秘书告诉办公厅会议科立即通知大家开大会，他要讲话。大家当然以最快速度赶到“庐山大会堂”（30年代蒋介石在庐山办军官训练团时盖的两层楼，楼下是戏院，楼上是会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说，孙科一触即跳。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是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两种话都要听。我劝这些同志要听坏话。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垮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一塌糊涂，要垮台了。所有右派言论都出来了。有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我们这一回是会内外结合。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句名词。我对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谈了两个钟头。嵯峨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7、8、9三个月，平均每天3000人参观，10天3万人，三个月30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想早点搞共产主义。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

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刻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浪中不坚定。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要基本正确。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

教训，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是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他们重复 56 年下半年、57 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 30 公里了。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欢迎。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了，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不要怕穿小鞋。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就是怕讲得不妥妥整。这叫明哲保身。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部分人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

毛泽东的这个长篇讲话，措词的严厉，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主要是针对彭德怀以及那些“离右派差三十公里”的“动摇分子”。如果说前几天是阴云密布，这次讲话就是一声惊雷了。

毛泽东为了证明党内外出现了“右派猖狂进攻”的形势，7月26日，他又批示印发了《李云仲的一封信》，并写下了《对于一封信的评论》。评论说：“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 1957 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评论》号召那些“得失相当”论的中间派不要再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评论》最后说：“我们党三十多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还说，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

当天，各小组还传达了毛泽东的几句话，“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

这样毛泽东已经把彭德怀的问题定性为“右倾活动”、“猖狂进攻”。

毛泽东讲话后，会议形势突变，各小组纷纷揭发批判彭德怀、张闻天。一些“左派”更加劲头十足，彭德怀被罗织的“罪状”很多，有历史的，有现实的。揭发批判彭德怀等“罪状”的小组会简报，每天有好几期，都印发给全体到会者。

在这种情况下，7月26日上午，周恩来专门向北京来的各部委负责同志作了一个长篇讲话，苦口婆心地关照他们：要接受这个突然发生的连他也没有料到的严峻形势，怎样度过今后难关—既要反右倾，又要把工作做好。他在讲话中说：

谈政治方向与工作态度两个问题。弄清政治方向，划清界线。在政治向上，绝不能动摇和否定党的总路线；如果对总路线有怀疑，就是根本立场问题。但是，在工作上，应该采取积极态度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这两者间有联系，又有区别。会议形势的发展，事先我也无思想准备。也许有人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许多人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一个时期会议的发展，大家慢慢懂得了。不是两年的经验总结，而发现是方向问题，是一场政治斗

争。党内思想动态不能不反映党外思想动态。到了时机成熟时，主席才讲明这个问题。主席一开始就讲过“得失论”。

去年是一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革命。总路线为群众所掌握，九千万人上山，食堂遍及全国。怀疑者认为得不偿失。党内有天津干部、江西党校的议论和东北李仲云的信。会内也有人怀疑总路线。左、中、右，站在哪一方，彭总的信是右的代表。

主席论十大关系，1956年提出了多快好省，已经奠定了总路线的基础。不能单算经济帐，还要算政治帐。去年绝非得不偿失、得失各半，而是得多失少。

是投身于群众运动的热潮，还是对之泼冷水？每一个单位炼钢、炼铁得不偿失，都登报，行不行？算总帐，划得来。说“右”了，实际是说“左”的人右了。

现在要回答的问题是：总路线是否正确？

补贴几十亿划不划得来？这是先念提出来的。先念是不怀疑总路线的。落实指标，落实到可靠的程度，是否机会主义？大家“焦头烂额”，“精疲力竭”，算了4礼拜的帐，是否机会主义（会议期间，周恩来一直抓计委和工交部门算细帐，落实1959、1960年的主要指标）。

落实指标以后继续前进，决不是机会主义。这就是政治态度。泄气思想是动摇总路线，我们只是去掉一部分虚气。

动摇总路线有两种表现：基本肯定，得失各半，都是泄了气，没有看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另一种偏向是，尽说空话，看到许多问题不去解决，熟视无睹，放心得下。这同样是右倾。表面积极，总责备下面，光说空话，这实际是帮助了怀疑派。否认失调，否认紧张。这也是一类工作态度。

到底是否有赤字？是否通货膨胀？

会议初期要回答这些问题。会议中期，许多意见提出来了；怀疑、动摇出现了。中央领导同志中也出现了。引起了大家注意。

23日毛主席讲话之后，会议进入第三阶段。究竟站在什么方向。还是采取批评、团结方针。彭总在主席处讲过匈牙利事件。个别地方可能出现，但整个国家决不会出现，出了偏差，中央马上纠正了。

执行总路线过程中发生的偏差，不是路线问题。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主观客观相结合。今年850万吨钢材，最后算帐只700万吨。也不要彼此吓倒，不要沉溺在小洋群中，两条腿要走稳当，如意算盘不能打得太多，不要拍王鹤寿的桌子，各部是否有这类事？

有错误，也不能动摇总路线，问题只是偏差与不力。有的人一碰到问题，就怀疑一番；只看到个别现象，忘记了全局和真理。我心焦如焚，置身其中。

另一种态度，是站在局外指手划脚，做旁观者，中间派。尽管有的指责是对的，但根本问题是方向，包括立场与目的。两种目的，两种态度。定要弄清政治方向，才能划清界线。各人按自己的思想情况作回答，北京来的人占一半多，当此紧急关头，要表态。

第二个问题讲工作态度。要正确算帐，把帐算清楚。地平线上出现了右派进攻，还不到猖狂程度。公布了落实的指标，最高国务会议、人大常委会开后，必定议论纷纷，会发生各种怀疑，甚至反对总路线。郑州会议后，纠正了许多偏向，局部地区还有夏荒问题。

6月13日分配了850万吨钢材，加进口52万吨。但国内实际只有700万吨，将影响各方面的工作。对这些问题，应当采取既严肃又积极的态度，不要被吓倒了。

财政信贷、物资、劳动三平衡。即货币总发行数同商品总额相除，这是公式，不是教条。一切要同中国实际结合。面对客观事实，提出解决办法。商品跟货币流通的矛盾，承认商品、市场的紧张。去年不仅吃多了，也用多了。因而要大力提倡节约。

我不安了半年，并非对总路线动摇。但决不可盲目乐观。钢材订货，找不到厂长，心里着实难过的。总之，积极负责，不说空话，面对铁的事实。从武昌会议至今已8个月了。大家在小组会上要作适当自我批评。不要怪地方。

今年基建用材要减32%，共250万吨。生产用材减52万吨，减9.2%。

从不切实际到切实际。对远景，要增强信心，要保持“二五”跃进速度。实干、苦干、巧干。落实各项指标与措施。大家想办法，同心同德，不埋怨，不畏难。

周恩来是大管家，在庐山自始至终务实。他知道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着急的是今年指标如何落实，怎样完成任务。正如他自己说的，对此是“忧心如焚”。这篇讲话的言词之间，也显出了他内心的矛盾。在当时对彭德怀等批判升级的情况下，周恩来一方面要坚持和维护总路线这面旗帜，遵从毛泽东的指示和意图，对彭德怀有所指责；另一方面又要保证工作正常进行，完成各项计划指标。既要务虚，又要务实；既要正视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又不能为困难所吓倒。他已感到即将出现他不愿意看到的巨大风暴，又谆谆告诫大家站稳脚跟，努力把工作做好。真是煞费苦心呵！

23日毛泽东讲话之后，各小组都纷纷揭发、批判彭德怀。

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不作检讨更是不行的。聂荣臻、叶剑英两个老师也抱着关心老战友的热忱劝彭德怀作认真检讨，这样对党有利。

彭德怀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内心痛苦的煎熬，不得不于7月26日下午在小组会上作了违心的检讨，承认思想方法有片面性，信中对如何肯定“大跃进”的成绩，以及研究经验教训的方法，是有错误的。关于他写信的动机，“是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能够深刻地研究和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使我们的建设工作搞得更好一些。”“我感谢主席的严正批评，纠正了我的错误。”他坚持说：这封信，“当时考虑只是供主席参考用的”。

这样的检讨，当然是过不了关的。

因为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等几人到黄克诚住处闲聊，又碰到彭德怀，因为他们在小组会上发表过类似的意见，又都是湖南人，此事一传出，就变成有组织的“湖南集团”、“军事俱乐部”了，一下子都把他们挂上了“纲”和“线”。

7月29日，毛泽东召集了中央常委和6个大区组长会议，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实际上中央委员都已上庐山。接着，召开大会。毛泽东讲话，主要内容是：

商量召开中央全会的事。

庐山会议已经一个月了，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想做两件事：

一、叫改指标。武昌会议定了指标，上海会议改了，现在看来改得不彻底。武昌定的指标是达不到的，但在八大会上通过了，要改指标，应由八中

全会决定，向人大常委会建议通过。去年的事情，全世界都议论纷纷。

二、路线问题。究竟是采取哪一条路线，大家扯了很多，再开全会扯几天，方法是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词令，横竖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好工作。当面不扯，背后又有意见，那不好办事。

此外，还有业务问题，由国务院搞文件。

有些同志发表议论，说民主不够，谈得不充分，想把民主搞够一点。因此，8月上旬开中央全会。全会的方式，分大会、小组会两种。

7月30日，我听到周恩来向彭真、李富春、杨尚昆等书记处同志打招呼时，说清楚了毛泽东的想法。周恩来说，常委考虑对彭德怀进行批判时，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就事论事，只批他的《意见书》和对总路线、大跃进的错误；一是连他在历史上犯的错误一起清算。主席主张后一种办法。听了周恩来的话，这时我想，毛泽东拿定主意以后，林彪当然是坚决拥护的，但是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好再表示了，就是有所表示也是没有用的。

一场十分激烈的党内斗争，在毛泽东亲自挂帅下，开展起来。

7月31日和8月1日，由毛泽东主持，连续开了两天的中央常委会，约14小时。参加会议的人除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外，有彭德怀、彭真、贺龙、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4人旁听。会场是在毛泽东住的“美庐”（原蒋介石的行宫）。大部分时间都是毛泽东讲话，彭德怀有许多对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间插话。

毛泽东的讲话主要内容有：

关于“得失论”。九千万人上阵炼钢，有一点损失，我也一点不痛心，横直没有经验。从根本上论，是得多于失。没有失，哪来的得？总是失小得大。

彭德怀过去几次路线斗争都动摇。立三路线、王明两次路线错误。抗战时期闹独立性，听王明的。由于犯错误挨了整，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

说彭德怀和他（毛泽东）的关系，31年来是三七开，合作三成，不合作七成（彭德怀承认：他是是非各半的人，同主席的关系是对半开）。

彭德怀在过去多次重要时期都不写信，这次为什么上万言书？写信的目的是希望发表的（彭德怀说，他写信只给主席作参考，没准备发表），目的在于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有野心，有右倾活动。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信中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要是指中央领导机关，锋芒是攻击党中央，反对中央。

彭德怀的世界观是经验主义，非马克思主义，不懂马列主义理论。党性、组织观念和纪律性差，等等。

毛泽东批评张闻天时说，洛甫的马克思主义哪里去了？你们要瓦解党，这回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

刘少奇说，长征中，过金沙江后会理会议前，彭德怀批评军委领导，不守纪律。彭德怀表面讲的不是真心话，要检查记仇记恨的事。

朱德发言比较温和，只是就信的内容而谈，没有上纲上线，当然没有“击中要害”。毛泽东听了很不高兴，他抬起腿来，用手指抓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朱德只得停止了发言。会议快结束时，朱德对彭德怀说，要投降无产阶级，彻底改正错误，永远跟毛主席走。

周恩来在会中，问过彭德怀一件事，他们一起同斯大林说话后，出门时，

斯同他讲过什么话。周也批评彭德怀，他写信的方向是对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锋芒对着总路线。希望彭交心。要一改二帮。

林彪是7月29日才上山的，情况都没有搞清楚，但他看清了毛泽东的面色。他声色俱厉地批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看风使舵，老奸巨滑，攻击毛主席。他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彭德怀不要打这个主意。

这两次常委会，已把彭德怀定性为野心家、伪君子，组织“军事俱乐部”。反对总路线、党中央、毛主席，历史上是同毛泽东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等等。

在这场尖锐的斗争中，周恩来的心情是复杂的。8月1日晚上，他召集大家开了个短会，宣布将在8月2日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由毛主席讲话。他还说：彭德怀、张闻天的《意见书》出来后，“问题不少”已出现了右倾思想，怀疑和动摇总路线，会议动态逐渐明朗。

8月2日上午9时，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大会堂举行。主席台设在舞台下面，就坐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围着主席台摆有三排藤椅，大家散着坐。我是总理办公室主任，到会旁听，同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同志一起坐在边上。

八届中委共191人，到会147人，列席15人。

毛泽东主持并讲话。他说，这次会议讨论两个问题：修改指标和路线问题。

修改1959年生产指标问题。他说：武昌六中全会决定的今年指标，上海七中全会时有人主张改，多数人不同意。那次改也改不彻底。今年还有五个月，改了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高指标成为一种负担，改了就轻松了。自己立的菩萨自己拜，现在还得自己打破。

关于路线问题。他说，这是此次中央全会的主题，有些同志发生怀疑，究竟对不对？上山后，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说讲话不自由。后来才了解，他们要攻击、破坏总路线，要有批评总路线的自由。庐山会议已开了一个月，今天开全会。新来的同志莫名其妙。开几天小组会，再开大会，最后作出决议。

开会的方法，他说，历来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中央全会是分裂，还是团结？关系到中国之命运，社会主义之命运。我们应该团结。现在有一种分裂倾向。对犯错误的同志，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

毛泽东讲到过去同王明路线斗争的经过。他说，从遵义会议到七大，10年时间。中间经过四年整风，经过长时间等待，有的人才改正过来。他特别点洛甫（张闻天）的名说，经过10年很必要，有材料才能说服。洛甫这次旧病复发，打摆子，疟原虫在体内作怪，潜伏下来，有机会就出来。

最后他特别强调，现在是反右倾，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的领导机关，向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的问题。

为了彻底揭发张闻天的“旧病复发”，毛泽东在当天又写了封《给张闻天的信》，并立即印发给大会。信中正式提出了“军事俱乐部”这个名称。信的开头说：“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信的结尾又说：“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统统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毛泽东的这封信，把会议推向揭批“军事俱乐部”有组织、有准备向党猖狂进攻的高潮。

毛泽东又连续批了许多材料并亲自加上批语，向会议提供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攻的武器，而且把问题说的很严重，使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大会、小会、“机关枪”、“迫击炮”不停地向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轰击。

经过几天小组会的批斗争后，8月11日下午开大会，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主要清算彭德怀的所谓历史旧帐。说彭德怀30几年来阶级立场没有转过来，还是资产阶级立场，资产阶级宇宙观。

13日上午起开大会，张闻天作检查，下午彭德怀作检查，14日上午黄克诚作检查。这里，特别说一下13日大会情况。

彭德怀首先表示：一个月来的批判，“对我有极深刻的教育意义，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我诚恳地感谢同志们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他检讨了在土地革命时期历史上犯过的几次“路线错误”，也承认了过去对毛主席的主张不理解，不赞同，贯彻不力，等等。他还着重检讨了这次在庐山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彭德怀表示：“我坚决地、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错误立场、观点，坚决抛弃对毛泽东同志的一切成见，坚决回到党的立场上来。”

对于彭德怀的这次检讨，不少人点头称赞，我听了甚感钦佩，受到教育。可是仍有很多人表示不满。

周小舟是在小组会上被斗争的，没有在大会上检讨。

这次大会，斗争火力之猛烈，许多老同志都从来没有经历过。有些人推开藤椅站起来对彭德怀指着鼻子批，许多坐在后排的人，就站起来看。刘少奇当主席，还站起来当面批，并拍了桌子。很多人都吃惊地站起来看。我恰恰这次会上带了照相机，立即拍了一张斗争场面的照片。这张照片已经收入我的影集《历史的脚印》。李锐著的《庐山会议实录》也采用了。这是一个历史的瘢痕！

8月16日上午，八中全会最后一次大会。刘少奇主持，议程是：

一、彭德怀讲话。他简单地表态，承认错误，接受全会的决议。

二、通过决议：通过《八届八中全会公报》；通过《关于增产节约的决议》；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通过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三、毛泽东同志讲话。

8月17日，还开了一个政治局扩大会，中央委员都到了会。毛泽东主持会议。这次会议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长、军委委员的职务；撤销黄克诚的军委委员、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的职务。任命林彪为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贺龙，聂荣臻为军委第二、第三副主席；任命罗瑞卿为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撤销了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撤销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保留省委委员。

开了40多天的庐山会议，就在热烈的掌声中闭幕了。

但是，事实是无情的。庐山会议的“反右倾”，助长了“左”的发展，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轻工业急剧下降，许多日用品十分缺乏。遭到破坏最大的是农业，1959年粮食产量只有3400亿斤，比1958年的4000亿斤减少了600亿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亿斤，比1951年的2874亿斤还低。在3年困难时期，城市人民因缺乏粮食和副食品，普遍发生浮肿病，饿死不

少人。各地向国务院要粮食的电报像雪片飞来，堆满周恩来的办公桌，使他难于应付。他只好要粮食部和铁道部准备好几列装着粮食的火车，哪里急需火车就往哪里开。有一次，上海库存粮食只够供应3天，这个全国最大的城市一旦缺粮，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周恩来就用这个办法解决了上海的燃眉之急。“大跃进”和庐山会议的错误，给国家造成多么深重的灾难呀！

历史是公正的。经过22年后的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发生在庐山的这场斗争。《决议》中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这是多么深重的教训啊！

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

“大跃进”和“反右倾”使我国国民经济陷入极度困难之中，主要表现在农业和畜牧业产品大量减产，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危机；生产性基本建设规模膨胀，工业内部比例严重失调；国家财政收不抵支，出现赤字，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涨。1960年初，党中央并未就这一严重情况达成统一的认识，1月7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1960年的计划草案，钢的指标仍定为1840万吨，粮食指标是6000亿斤。4月，全国人大通过的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钢的指标未变，粮食指标减至5940亿斤，仍是一个跃进的态势。为了完成计划，投资要增加，各部门的工作被打乱，产量上下去，做经济工作的同志十分紧张。由于日用品供应困难，群众意见很大，主管国家计划和生产的李富春、薄一波给中央写了报告，提出为了扭转1960年第二季度主要产品产量下降，必须削基建、保生产，集中力量把钢、铁、煤、运输搞上去。中央同意这样做，并且指出，可供调运的煤炭、生铁资源减少，要求调入煤炭、生铁的省份，如果经过努力仍不能实现原定钢铁生产指标，那就应当实事求是，降低钢产量。这时李富春建议1961年的国民经济实行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8月底至9月5日，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人审议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压缩重工业生产指标，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加强农业和轻工业的生产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周恩来和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都赞成这些设想。周恩来认为，对方针的提法，与其讲整顿，不如提调整，因为调整二字，比整顿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并建议增加“充实”二字，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后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八字方针”作了较为详细具体的解释。他说，中共中央在1960年下半年，对国民经济工作提出了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个方针包含多方面的内容，主要的是，要适当地调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相互关系，生产和基本建设的相互关系，经济事业和文教事业、国防事业的相互关系，积累和消费的相互关系，以及财政、信贷和物资的相互关系。各经济部门和文教部门的内部，也要进行适当的调整。他还指出调整的具体工作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是一个中心环节。我国国民经济出现的不协调现象，农业生产下降的影响最大，没有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工业的发展规模，绝不能超过农业提供商品粮食、工业原料和其他农副产品的可能性，也绝不能挤掉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要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来安排经济计划。重工业必须为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各种农具、农业机构、化学肥料、木材、燃料等等，来不断地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使农业能够为工业和城市提供越来越多的粮食、原料和其他农副产品。轻工业必须尽可能为农村提供越来越多的日用品。此外，调整工作还包括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减少粮食征调数量，1961年进口500万吨粮食；开放农村集市贸易；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等。

“八字方针”提出以后，实施时并不一帆风顺。大家都受“大跃进”思想的束缚，计划指标仍是偏高。虽然毛泽东在党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不仅没有注意农业，而且是挤了农业，挤了农业的人力、物力，工业

战线过长，面过广。这3年都是指标高了后来退下来了。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从9月份开始大搞，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后又大搞，1960年又一年，这3年大炼钢铁，挤了农业。他还说：现在看来，社会主义建设也不要那么十分急，过急了办不成，越急越办不成，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要搞几年慢腾腾，要搞扎实一点，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今年、明年、后年要做巩固工作。但在经济工作的实际运行中1961年计划指标仍然不低，钢调低到1900万吨，煤却上升到4.36亿吨，粮食调高到4100亿斤，而这一年第一季度重要工业产品除个别的外，都比上年第四季度下降30—40%。全年的计划执行情况也是大多数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幅度下降。国民经济仍很困难。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即所谓“七千人大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参加，共7118人，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周恩来说这次会议有两个高潮，一是从开幕到1月9日上午，主要是围绕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书面报告》进行讨论和提出修改意见。出席的人提出话还没说完，还憋着一肚子气，于是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商量，决定延长会议时间，让大家“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畅所欲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于是出现第二个高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他还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的，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毛泽东不仅作了自我批评，而且带头承担了所犯错误的责任，体现了党的领袖的广阔胸怀，使与会同志深受教育并大为感动。

刘少奇在会上把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引用湖南农民的话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他认为不能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到处这样套”。这种敢于直言的精神是很可贵的。

周恩来较为详细具体地谈了国民经济存在的困难和解决困难的办法。他说1958年以来的错误已经停止，正在改正，或大部分已经改正。对于工作中的错误，他也主动地承担了责任，他一再说：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的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计划上的估产高、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等等，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都是有责任的。他还检查了自己所犯的两个错误：一是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了超过实际可能的关于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即规定农业每年增产超过10%是跃进，超过15%是大跃进，超过20%是特大跃进；工业每年增产超过20%是跃进，超过25%是大跃进，超过30%是特大跃进）。二是1958年6月2日主持起草一个关于将轻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76%的文件。他认为这是“权力下放过多过散”，“形成分散主义的根源之一”。他声明对于这些问题，要在3日举行的人大、政协会议上作适当的解释，这是我的帐，要交代。毛泽东插话说，交代一回也就好了。

2月3日，周恩来在福建组的会议上讲话，强调我们检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团结。这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

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他批评浮夸和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行事，又指出要大家说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强调要发扬民主，反对强迫命令。

会上，也有人唱出不同的调子。“大跃进”以来一直以“左”的面貌出现的柯庆施，对《书面报告》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要不要？多少年解决吃穿用？15年赶上英国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干劲？并且说《书面报告》“越看越没劲”。

林彪的发言也与众不同，他说最近几年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林彪的讲话后来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

在1月18日召开的《书面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彭真发言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这时邓小平插话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却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彭真接着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1%、10%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错误都担起来了？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帐，从毛主席到支部书记。第二天，大奸似忠的陈伯达发言说：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对此，彭真不得不进行解释：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彭真这种实事求是敢于直言的精神，确是难能可贵的。陈伯达何许人也，“文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貌似忠心”，正掩盖着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承认了自己的缺点错误。

“七千人大会”对于“大跃进”以来犯错误的原因，归纳起来有这么几个方面：一、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二、违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强迫命令，瞎指挥成风，听不得不同意见；三、分散主义严重泛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自行其是，各搞一套；四、丢掉了实事求是的传统和作风；五、只反右不反“左”，只反保守不反冒进。总的来说，“七千人大会”对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

“七千人大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正视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国民经济的困难情况，但是人们还没有从“左”的指导思想中摆脱出来，对困难估计不足。钢产量、基本建设投资虽然大加压缩，仍然较高，当年财政收支仍然出现30亿元的赤字。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于2月21日举行3天的扩大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对“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形势进行深入的分析，提出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周恩来提议，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大家同意这一建议，认为只有压缩某些工业生

产指标和基本建设投资，才能实现财政收支“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要求，使经济逐步恢复正常秩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陈云作了重要讲话，谈了当时严峻的经济形势在5个方面的表现和克服困难的6条措施，都是切中时弊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在讲话中，要求大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充分估计困难，扎扎实实地工作，把经济调整好。他们特别指出，如果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又不积极采取措施克服困难，那是真正的右倾。在以后中央的有关会议上，周恩来多次提出我们的经济生活要来一个大幅度的调整，使我们的经济生活来一个大改组。这个事情是领导的决心，也是全民的决心。他和陈云都强调压缩工业战线的必要性，主张1962年的计划还需大调整，“要有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

调整工作收到了实效，绝大多数重工业生产指标下降5%至20%，钢从750万吨降为600万吨，划拨75万吨生产农具和维修农业机械。工厂保住一批，关掉一批，缩小一批，合并一批，并且改变一批工厂的生产任务，把生产任务集中到消耗少、成本低、质量好、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从而降低了成本，减少亏损、增加利润。农业中产方面粮食产量虽比1957年减少850亿斤，但比1961年略有增加，安排较多的原材料增加日用品生产，商品比原计划增加19亿元，通货膨胀受到抑制，出卖高价糖、烟、酒等食品和手表、缝纫机等日用品回笼货币。全国的财政收入，1961年赤字10.9亿，1962年转为结余8.3亿。

在调整工作继续进行初见成效的时候，1962年7月25日党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一股“左”风又冒出来了，会议原定计划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等问题。8月5日，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会议转为着重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和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毛泽东把“七千人大会”后接着开的西楼会议和5月中央工作会议对形势和困难的实事求是的估计，当作“黑暗风”来批判，说这两年讲困难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这次会议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有的负责同志在发言中也批评说：农业恢复的时间越说越长，工业指标也越讲越少，我们一辈子没有希望了，还有什么搞头？有人说：现在是越低越好，越少越好，越慢越好，越黑暗越好，把大跃进说得越不像话越好，越松劲、越单干越好。两次会开过为到半年，在领导中出现这样大的分歧。原因是对于国民经济的调整有不同看法。毛泽东同意进行调整，但他的前提是必须肯定1958年以来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对“三面红旗”不能有丝毫损伤。西楼会议和5月中央工作会议使调整工作大大深入一步，在某些方面却触动了这个前提。他甚至认为讲困难讲黑暗就是压他。在这次会上，邓子恢主张“包产到户”受到批判，彭德怀则成为批“翻案风”的靶子，《刘志丹》被诬为“利用小说反党”。阶级斗争又一次被扩大化、绝对化，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大会就讲”。毛泽东还一再讲了怎样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这次会议使国内的政治方向发生逆转，使对扭转困难局面极为重要的纠“左”又变成了反右。由于继续贯彻执行“八字方针”，经济工作受的冲击不大，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终于能在1965年基本完成。

挽狂澜于既倒

周恩来的“救火队”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现在来回顾“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根据我的所见所闻来介绍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当时，我任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负责会议的准备工作。记得林彪当时正在外地养病，打电报来要求请假，我们将情况反映到主席那里，主席不同意，坚持让林彪来开十一中全会。萧华是中央委员，患有肝病正在青岛疗养，他也请假，起先并没有催他非来开会不可，会议开始后又催着他来开会，他没有思想准备，对于林彪当接班人的问题暂不表态，后来竟成为一大罪状。这次会议还发生一件怪事，在北大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在贵州最早造反的李再含都不是中央委员，康生、陈伯达却提出要让他们参加会议，还让他们在会上讲话。

会议原订议程有4项：一是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是讨论和通过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际、国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三是通过会议公报，四是对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中央人事变动的决定补行批准手续。

8月5日，毛泽东写了针对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印发给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了会议的议程，会上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揭发和批判；临时增加一项议程，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林彪名列第二，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全会没有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会后不久，林彪又被宣布为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实际上抹掉了八大选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副主席名义。

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个会议相继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这些错误决定，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

“文化大革命”对于周恩来来说是突然的，他没有思想准备，被动地卷入这场狂风暴雨中。

1966年春天，北方大旱。周恩来忙于8个省、市、自治区的抗旱工作，他亲自兼任河北和北京抗旱工作组的组长，深入各地推动抗旱。3月，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不顾余震危险，赶到灾区。正当他在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灾情时，突然又发生5级以上地震，房屋剧烈摇晃，泥土刷刷地往下掉。大家急切他说：“总理，离开这里吧！”但是周恩来拒绝了。他在灾区工作了4个多小时，第二天又一个窝棚一个窝棚地慰问受灾群众。从灾区回来后，他又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到外地参观访问。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

等贴出所谓“第一张”大字报，煽动揪斗老干部，冲击各级党委。周恩来批评了这张大字报。但是康生背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把大字报底稿送给在外地的毛泽东，大字报于是在电台播出了。之后，周恩来率领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回国后，又忙于接待尼泊尔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外事工作告一段落时，毛泽东批评了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派工作组到各单位领导“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在中央的会议上，仍对这件事承担了责任。他说对工作组的问题，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他同时保护性地说：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讨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周恩来和陶铸商量并经毛泽东同意后，删掉了原稿中的“黑帮”、“黑线”一类提法，加入不少限制性的政策规定，如：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把运动与生产对立起来；保护科技人员等等。直到1966年12月，周恩来还指示新华社：文字上不要用“黑帮”、“黑线”的提法。

为了进一步地全面地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于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林彪还在接见红卫兵大会上代表党中央坚决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赞扬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号召他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动，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毛泽东的接见与林彪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红卫兵起来造反的“士气”。他们自以为肩负着保卫“党不变质，国不变色”的历史重任，高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奔走呼号，四处冲杀，到处煽“文化大革命”之风，点“文化大革命”之火，一些红卫兵失去理智，疯狂破坏，全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文化大革命”之火燃烧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猛，其破坏程度如此严重，完全出乎周恩来的意料之外。他作为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对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作出的《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必须贯彻执行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究竟要干什么？怎么搞法？将来的发展是个什么结局？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样设想的？所有这些都搞不清楚。他在思想上没有作长期搞“文化大革命”的准备。这从下面两件事中可以看出。

一是面对当时红卫兵大串连之风席卷全国，各地红卫兵纷纷涌入北京，渴望得到毛主席接见一事。周恩来请示毛泽东：红卫兵到北京串连最好是有个计划，有组织的分批到北京，人员要控制在100万或150万。毛泽东一听说，不行，起码250万。毛泽东的口一开，红卫兵到京串连人数最后达到1100多万。

另一件事是，“文革”开始后，中央机关、中南海也有许多造反派起来造反，中央、国家机关的工作一乱，势必影响全国。周恩来对此十分着急。他向毛泽东请示，并得到批准，立即向中央、国家机关提出：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到1966年10月中旬告一段落。

可见，毛泽东是想以红卫兵为“文革”的主要力量，达到“天下大乱”，所以，他不能同意周恩来关于红卫兵串连应有组织、有计划、有数量控制的意见。周恩来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认识相差甚远，足以看出周恩来对毛泽

东发动红卫兵串连运动的深层想法是不理解的。至于“文革”时间长短，实际上毛泽东本人也未经过深思熟虑，为此，他就同意周恩来关于10月中旬告一段落的意见。

正因为周恩来是在这种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很不自觉的情况下卷入这场政治风暴中去的，所以在当时许多场合下，周恩来总是说：对“文革”这场运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他尽可能地从积极方面、从好的前途上去理解毛泽东的意图，多次反复地讲道：“要加深理解”、“跟上形势”、“在运动中紧跟主席思想，紧跟、紧学、紧改、紧赶”。

1966年10月1日，林彪在国庆17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斗争”。中旬，毛泽东也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于这一提法，周恩来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为此，他专门找了毛泽东，说明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由于毛泽东坚持，这一提法未做修改。于是，周恩来在后来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了“资反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随着局势的发展，全国混乱局面日见严重，周恩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认为，周恩来所能做到的就是：凭着强烈的责任感去“救火”，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尽可能地控制全国混乱的局面。

所谓的“救火”，主要是救干部、救档案。而这当中贯穿的主要工作则是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与红卫兵讲道理，劝阻并制止他们的一些过火行为。周恩来的“救火队”有我、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许明（国务院副秘书长），我曾经说过：“我们是光荣的救火队员。”

当时，周恩来要我们救的干部主要有中央部长级领导和地方省委书记。只要红卫兵把部长们抓去批斗，周恩来立即派我们出面与红卫兵讲道理，办交涉。他让我们掌握一条原则，不准红卫兵揪斗部长出去游街，不许打骂体罚部长们，他们有错误、有问题可以写揭发材料，将揭发材料送交周恩来；凡是已住在中南海要揪出去批斗的领导干部，都要报请周恩来审批，而且要写明时间，按时送回。

地方省委领导被揪斗，周恩来就让我们打电话劝阻。记得四川省红卫兵揪斗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从成都揪起，押送北京。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叫我沿途打电话加以劝阻，但劝阻无效。李井泉、廖志高一到北京后，我们立即将他们保护在中直招待所，对红卫兵说：要让他们在招待所里好好写检讨。名义上写检讨，实际上将他们保护起来。“文革”后，廖志高见到我时，还提起这件事，对周恩来和我这个“救火队员”充满着感激之情。

早在8月下旬，红卫兵在大中学校兴起，并逐渐联合起来。由于观点不同，大学分成第一司令部和第二司令部，还有以蒯大富为首成立的第三司令部。他们分头派人到各机关、学校以至企业、工厂去串连，组织红卫兵联合造反。为了便于联系和诱导，周恩来指示周荣鑫和北京市委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随时同他们保持联系，及时解决他们的合理要求。并给三个司令部各安排一个办公室、一辆吉普车。但对他们的错误行为，也随时加以批评、帮助。

10月18日，部分红卫兵在林彪、江青一伙人蛊惑下，在天安门前观礼台上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当天下午，清华大学也出现了“打倒修

正主义头子刘少奇”的大标语。周恩来知道后，立即要周荣鑫和我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向红卫兵做说服工作。我和周荣鑫乘坐一辆小汽车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文化宫前挤满了人，一片嘈杂，我们的车子无法开过，刚一停下即被拥挤的人流包围，车轮都被挤扁了。进了文化宫找到红卫兵头头们，我们便开始耐心地与他们讲道理。我说：“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周总理指示，不能随便贴他的大字报，你们把大字报贴在天安门，对国内国际影响都不好。”经过我和周荣鑫的反复劝阻，虽然还有人反对，但多数人赞成，他们终于把“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从观礼台上撕下来。

有一天，外贸部的“造反派”要把部长李强拉去游街批斗，遭到另一派反对，相持不下，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要我马上到外贸部向“造反派”做工作，说明李强还要代表国家对外搞贸易，不能游街，有问题可送揭发材料。我赶到外贸部，两派正争论不下，我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得到大多数人的赞成，使李强免遭游街批斗之苦。

1966年8月18日晚，一大批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准备冲入故宫，周恩来知道这个消息后，当晚作出“关闭故宫”的决定，并通知卫戍区作好保卫工作。19日上午，红卫兵再次来到故宫门前，叫喊着要冲故宫。故宫的工作人员因事前接到周恩来的指示，他们理直气壮地对红卫兵说：“我们按总理的指示，关闭故宫，现在，故宫一律不对外开放。要完整地保护故宫文物。请你们回去。”红卫兵听到是周恩来的指示，不敢强行冲进故宫，陆续退回。中国古代灿烂文明的象征——故宫，就这样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免遭一场劫难，完整地保护下来。

保护党和国家机密档案也是我们当时“救火队”的主要任务。在一片造反声中，红卫兵疯狂地冲向党政机关。机要、保密、档案等要害部门也不断受到红卫兵的冲击。中央调查部有许多绝密文件，孔原部长事先曾同我商量，秘密转移了一部分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局，但该部“造反派”以查“黑材料”为名要冲进档案室。周恩来高度警惕着上述部门被冲击的情况，他说：这是最高机密的档案，绝对不能抢。他立即通知我去制止，我正在对另一些红卫兵作工作，没办法脱身，周恩来马上派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机要局局长李质忠去劝阻。李去后被狂热的“造反派”扣住，他坚持在那儿与红卫兵反复说道理，总理办公室也打电话去制止。终于保住了该部的档案。

陈云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住在中南海外的北长街。为保护陈云的健康和安全，经周恩来安排到西郊安全地方休息。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竟唆使红卫兵，冲进陈云家里要“破四旧”，警卫团长张耀祠得悉后去劝阻无效。红卫兵把大门冲破后进到办公室要砸档案柜，由于警卫同志坚持，他们不敢动手。陈云很喜欢听苏州的评弹，家中收存一些评弹的唱片、录音等，红卫兵说评弹是“四旧”，是封资修的毒草，要全部查抄出去毁掉，而实际目的是要抢机密档案。我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火速赶到现场交涉。我对红卫兵们说：周总理有指示，陈云同志是中央常委，他的档案不是一般的档案，而是党和国家的机要档案，任何人不准动。至于评弹是苏州一带的文化艺术，不能作“四旧”破。你们破门进来，是错误的。希望你们立即撤出去。但是因为他们有后台，是受文革小组指挥的，几个小时过去了，硬是不撤。我只得打电话给文革小组的戚本禹，郑重地把周恩来的指示告诉他，让他通知红卫兵头头火速撤离。这样陈云的档案才得以安全地保护下来，此后迅速转移到别处。

为了制止红卫兵到处冲击、乱抢档案的做法，周恩来指示我和周荣鑫等人起草了中央文件，下发各地。文件指出：革命学生组织不要限制原工作组或学校当局和上级党政机关正常工作，使他们得不到必要的休息。机密、要害部门、新闻、广播部门和中央局首脑部门，一律不进行革命群众的内外串连。不应干涉机关内部革命或妨碍机关正常工作，不应率领群众进出机关办公室，进驻或封闭机关，搜查机关文件，或要求设联络站，特别是不许进入机关中的机要、通讯和技术保密部门。这个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文件下发后，对红卫兵的四处冲击，乱抢文件、档案起到一定遏制作用，局面暂时得到控制。

“文革”初期，周恩来为了稳定全国局势，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做“红卫兵小将”的工作。对于红卫兵的破坏，周恩来非常痛心，但对这些“毛主席请来的客人”还不能训斥、压制，只能谆谆劝说，耐心引导。从1966年8月下旬到12月中旬的3个月时间里，周恩来召开红卫兵座谈会40多次，有些会一次长达4、5个小时，有的会甚至通宵达旦。他唇焦舌燥，反复讲解党的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能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要随便抓人、抄家、砸毁文物，对建国17年来党和政府的工作要分清主流与支流，对干部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说党政机关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当说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干部也不等于是“黑帮”等等。周恩来对红卫兵的生活很关心，北京天气寒冷，从南方来的红卫兵有的穿草鞋，有的打赤脚，周恩来怕他们冻着了，让我们的招待部门去买棉衣，解放鞋，发给红卫兵。有一次，周恩来得知有一批红卫兵上井冈山，遇上下雪，粮食运不上去，他急得很，当即指示我们打电话到江西省委，派直升飞机运粮食到井冈山。

周总理不仅要花大量时间去做红卫兵的说服教育工作，还要做好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各项准备工作。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先后8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1100万人次红卫兵和广大师生。毛泽东的这一重大步骤使北京人员流量猛增，大量繁重复杂、琐碎细致的工作都落在周恩来头上。他要负责从各路进京的铁路交通安排，红卫兵在北京的食宿，组织接见检阅，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等等。周总理依靠党政军各级组织，充分发挥他那卓越超群的行政组织能力，保证了毛泽东8次检阅都没有出事故。

周恩来力挽狂澜于既倒的作为，使江青一伙感到十分恼火。9月底，江青让陈伯达送给周恩来一份所谓几个院校群众组织的汇报材料，攻击周恩来“和稀泥”。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授意下由王力、关锋执笔的《红旗》社论中，提到反对“折衷主义”。清华大学大字报也指责“周总理有折衷主义”。林彪、江青一伙还公然指责周恩来是“救火队长”。我认为：坏人唆使“红卫兵”乱放火，周恩来救火，这个“火”救得对，救得好，如果不救，后果不堪设想。我们是光荣的“救火队员”。

林彪、江青等人直接找周恩来的岔子找不着，就绕道整周恩来。其手段之一是先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许明被迫自杀事件就是例证。

许明是个有才华有能力的女同志，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分管文教工作。在延安社会部工作时就受过表扬。“文革”前，江青曾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审查电影时要许明去参加。在批判电影《武训传》以及讨论其他影片时，许明同江青有不同的看法，江青又怀疑许明在周恩来面

前讲她的坏话，所以一直怀恨在心。

“文革”开始后，中央政治局的许多权利逐步被中央文革小组取代。毛泽东要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和文革小组“碰头会”，讨论并决定“文革”和党、政、军的许多重大问题。那时刘、邓、陶相继被打倒，政治局委员参加碰头会的只有周恩来与叶帅、徐帅和李先念。有时林彪也来参加，他一来就贯彻他那套极“左”的方针。因会前、会中和会后都有许多具体事务要做，周恩来就要周荣鑫和我在会上协助汪东兴工作。

有一次开碰头会前，我碰到江青，她板着一副凶恶的面孔问我：“许明是彭真安插在总理身边的‘钉子’。你知不知道？”我如实回答：“我不知道。”我说，许明调到总理办公室的事情我是知道的。她原来在中央社会部工作，进城后在海关总署当办公室主任。她是由中央组织部按正常的调动程序调入总理办公室的。她分工管文教，与彭真没有直接往来。当然，彭真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有时开会，总理派许明去旁听。许明回来要向总理汇报。这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我看不出是彭真安的‘钉子’。”因为话不投机，江青很不高兴，气呼呼地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这个红小鬼啊。”说完，扭头就走，从此不再理睬我。当时，我觉得好笑，心想：正因为我是红小鬼，就应该说老实话，想让我拍你江青的马屁，做不到。江青一伙罗织许明的“罪证”，说许明是彭真安插在周恩来身边的“钉子”，实际上是想把彭真与周恩来联系起来，因为彭真当时是中央点名的反党集团首要分子，其用心十分险恶。红卫兵联络总站成立后，周恩来让许明到西安门国务院接待站去负责搞接待工作。陈伯达、戚本禹经常到接待站来，向红卫兵宣传他们那一套。当时在红卫兵中流传这样一首打油诗：“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戚本禹听了很高兴，但许多红卫兵听了不同意，说是“唯成分论”，两派的红卫兵因此在接待站展开辩论。戚本禹就将打油诗进行改动，并告诉许明是陈伯达改的。当红卫兵质问：为何改动打油诗时，许明告诉他们这是陈伯达改的。这下许明闯了大祸，陈伯达知道后十分不满，以陈伯达到接待站，许明不热情接待为由，向江青告了许明一状，江青又将此事告到毛泽东那儿，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此人（指许明）不适合做接待工作。许明知道主席指示后，心里害怕极了。加上当时她的丈夫孔原在调查部被揪斗，被监视、关押，一个儿子因参加“西纠”，被打成保皇派，也被抓走，家中的老母亲亦被红卫兵抓去，一个家被搞得支离破碎。许明精神压力本来就很大，江青状告她后，思想负担更重，终于被迫选择了自杀道路。她吃安眠药之前，还与我通了最后一次电话。我告诉她：“在主席、总理面前没有说不清的事情，延安抢救运动你也是参加了的，最后，不都是甄别了吗？”然而，她还是含恨地离开人间，临死前留下遗书：我是无罪的，孔原与两个儿子是无罪的。

这样一个有能力有才华的妇女干部，没有死在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之中，却在极“左”路线的迫害下悲惨地死去。

周荣鑫是国务院秘书长，他当然是积极参加“救火”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他和汪东兴一起把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的人民来访接待站加以扩大，加强领导，以适应人民上访特别是红卫兵来访的需要。汪东兴从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接待站工作。本来这是不干文革小组的事，但江青、陈伯达、王力、戚本禹等人，认为事先没同他们商量，很不高兴，因为他们想把接待工作控制在自己手里，就借口红卫兵对接待站有意见，所谓支持某

一派，压制某一派，不及时把群众意见反映到中央和文革小组等等。就由王力出面，组织中南海的“造反派”和北京、天津的一些红卫兵在中南海国务院小礼堂开会，名为提意见，实际上是斗争大会，主要矛头对着周荣鑫，对汪东兴也顺带批了一下，我也是被批判的对象。会开了3天，最后由王力代表文革小组宣布：汪东兴在主席身边工作很忙，他顾不了那么多，应原谅他。童小鹏有一定责任，要检查，可继续工作。周荣鑫问题严重，要好好检讨，要负责把接待工作搞好。王力把周荣鑫的问题说得很严重，更助长了某些“造反派”对周荣鑫的不满。散会后，王力就走了，忽然天津的一批红卫兵要把周荣鑫揪到天津去批判。我当即出来制止，我说周荣鑫是国务院秘书长，“红卫兵”不能在中南海内抓人，有什么意见可以报告周总理。同时，我对国务院的“造反派”说，你们有责任保护周荣鑫，不能让外面的人揪走。天津的红卫兵无理以对，只得撤退。但此后，周荣鑫就再也不能对外进行工作，只好靠边站了。

“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无法无天，文革小组的王力，就可以到国务院里头召开批斗国务院秘书长的会议并给他随便戴上政治帽子。

江青等人始终没有放过遵照周恩来指示勤恳工作的周荣鑫。1975年，周荣鑫在教育部当部长，曾任过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李琦当副部长。就在“四人帮”掀起“反击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风浪中，周荣鑫因坚持周恩来的有关指示被江青的爪牙迟群等揪去批斗，心脏病复发仍不停止，也不及时抢救，因而含冤死去。李琦得以幸存至今，也许是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吧！

我这个“救火队员”，虽然救了别人，可是最后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我是1966年6月初在“文化大革命”风浪初起时到中央办公厅任第一副主任兼秘书局局长的。事前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都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中央决定后，周恩来找我谈话才知道。大约6月4日，周恩来对我说：中央决定调你到中央办公厅当第一副主任。稍停一下又说：我认为你不一定能搞好，但是，中央既决定了，你就服从吧。这个决定真使我感到突然，但又不能不表态。我说：“我知道中央办公厅的工作很繁重，我是不能胜任的。你说，中央已经决定，我只有坚决服从，尽力把工作做好。”我感到他有难言之隐，但我不能问明，过两天我就去中办上班了。其实，我调中央办公厅是汪东兴的主意。

“文革”前，中央免了杨尚昆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由汪东兴任主任，他把机要局长李质忠调来当副主任，帮他清理、整顿办公厅。“文革”一开始，汪忙于在毛泽东和文革小组之间的工作，就先报经毛泽东批准把我调到中办，因为毛泽东已先批准，所以周恩来就只好不同意了。

我到办公厅后，就按分工尽量做好自己的工作。不久，“红卫兵”运动兴起，不论白天、晚上，都有许多批“红卫兵”到中南海西门来要求见中央领导同志，或者揪部长来向中央告状，秘书局副局长出面不行，只得我出面做工作。有两次甚至不听警卫劝阻，爬过铁门冲到大门里头，我只得协同警卫团副团长出面劝阻，最后报周恩来命令他们退出。常常忙得精疲力竭。

可是，刚成立几个月由江青的爪牙戚本禹（他当时还挂名秘书局副局长）所指挥的“中南海红色造反团”，就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开始批斗我。1967年1月24日，“造反团”居然得到汪东兴的批准，在庄严的怀仁堂召开大会批斗我和另一秘书局副局长曹全夫，会上散发经过汪东兴

批准去机要局印刷厂印刷的《告中央办公厅革命同志书》和《中南海红色造反团通令》。《通令》不仅揭发我的“罪状”，更猖狂地骂朱德为“黑司令”。当时朱德同志还是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他正住在怀仁堂南边的一幢小楼里。

现在引用《通令》中的两条，让大家作为奇文共赏吧！

“二、撤销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童小鹏的党内外一切职权，监督劳动，勒令其交代自己的罪行。

三、撤销追随童小鹏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曹全夫的一切职权，监督工作，责令其检查交代自己的罪过，揭发朱德等人的罪恶事实。”（按：曹全夫曾任朱德的秘书13年，与我同时调中办秘书局的。）

“造反有理”，《通令》一宣布，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委任我的职权，就一下子夺走了！

还有两个副局长曹幼民、赖奎，则要认真检讨，改正错误，继续工作。

当天晚上，中办主任汪东兴接见了“造反团”头头，承认他们的“全部行动”，并表扬他们对4个局级干部“区别对待”的政策。

这是在中共中央的办公厅里发生的事情。

从此，我就在“造反派”的监督下，每天打扫秘书局3层楼的6个卫生间，看《毛泽东选集》，背“老三篇”，不时还被揪去批斗，一呆就10个月。接着就以“在重庆工作时可能被国民党特务突击”为由，在审查、批斗“杨尚昆死党”的“训练班”隔离审查1年多。1969年1月，下放到江西进贤“中办五七学校”监督劳动改造（当猪倌）3年。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摔死后才恢复我的党的生活，调到校部生产组任副组长。可是改造3年后还不让我回北京，要我到江西南昌齿轮厂去当副厂长。我1972年12月要求回北京搬家和检查身体。当我准备去南昌时，中央组织部通知等一等，一等又是1年半。1973年8月，中央组织部通知我回中央统战部工作，参加以军代表为主的3人领导小组。不久，中央办公厅党委正式通知，我的历史已查清楚，没有问题。至此，算是“落实政策”了。

我这一个“救火队员”还能活到现在，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还有一件怪事情。1972年3月我准备去江西南昌时，向周恩来、邓颖超辞行，周恩来未表态，但突然问我一句：“你是怎样调到总理办公室的。”他说：“有人反映，童小鹏调到总理办公室是周恩来提名的。”

我心里很清楚，周恩来用人历来是靠组织安排，从未私自提出要调与自己关系好的同志到身边工作。一定是江青等人在背后指责周恩来任用私人，罗织他的罪名。于是，我便将如何调往总理办公室一事详细向总理述说一遍：

我是1958年4月调到总理办公室的。在此之前，我在中央统战部任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张唯一年纪大了，齐燕铭兼主任。齐认为要由一个熟悉周恩来情况的同志来任办公室主任，于是想到我，因我过去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情况熟悉。

我调到总理办公室，并非周恩来提名，更不是想用私人，而是通过正常的组织渠道调进去的。

当时周恩来虽然没有向我透露是谁在背后造他的谣，但我也猜出八九不离十是江青一伙。因为他历来不把闲言碎语放在心上，为何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专门向我了解组织调动的全过程呢？可见造此谣言的人不是一般的人，他才会这么重视。周恩来的“救火队”，在“文革”初期所起到的作用是显

而易见的。尽管“救火队长”和他的队员们一再受到林彪、江青等人的诬蔑、指责、迫害。然而，周恩来并不因此而停止“救火”。后来，救火队员都被夺权，靠边站，眼见“救火队”就要散了，他又想了一个办法，设“联络员办公室”。联络员办公室成立于1967年，人员随着工作量逐步增加，军队调师级干部，大约后来扩大到四五十人。哪里出乱子，两派打架，周恩来就派一名与造反派熟悉的人去当“联络员”，实际上也是去“救火”。如让刘西尧去当科学院的联络员，指定胡立教去当财政部的联络员，情况直接向周恩来反映，并收集信息。经过周恩来艰辛的努力，全国混乱的局面一度有所稳定。

“文革”之前，因有人向毛主席反映周恩来秘书太多。毛主席讲了一句“不要什么事都靠秘书”。他知道后就撤销了总理办公室，改称总理值班室，只剩下两个秘书、3个干事。“文化大革命”一来，周恩来更忙了，中央机关和地方的“造反派”常用保密机直接给总理值班室打电话。周恩来与外界联系的电话一天到晚不断，中南海总机人员建议：你们的电话太多，很难打进来，是否可以换一个号码。周恩来听后不同意，他生气地说：现在人民群众只有通过这架电话才能找到我，换了号码，他们怎么与我联系。因此，直至“文革”结束，这架机子的号码也没有换。总理的日程表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他逝世后，秘书整理27本台历交给党中央，那27本台历上密密麻麻的记录下周恩来的日程安排，几乎没有有什么时间是属于他自己的。中央领导看后都掉下眼泪。

江青等人还想着法儿累垮周恩来，最后搞的周恩来不得不把总理值班室也撤了，只留下1个秘书。

总理值班室是怎样被撤销的呢？

那是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当时，凡是省革委会成立之前，要先开会，由中央文革、中央军委联合召开，会议代表有当地党政领导、军队方面代表、造反派几派的代表，开完会后，由中央文革办事组起草一个会议记录，送到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那里传阅，尔后，再由中央形成文件。

有一次，四川、云南成立革委会的会议汇报记录先送毛、林看过后，送到总理值班室，周恩来签阅后顺手将这份文件放在两份文件中，用曲别针别住，放进他办公时常用的皮夹子里。中办来催讨文件时，秘书周家鼎怎么也找不到这份文件，一天多过去了，没有及时向他汇报。因为周家鼎认为文件的收发是秘书的职责，没有必要惊动周恩来，他更没想到这份材料会放在周恩来的皮夹子里。后来，文件找到了。周家鼎赶紧把文件送还中办。没想到这件事惹恼了江青，大骂总理值班室的秘书是干什么的，眼中根本没有中央文革，看不起江青，等等。江青将这份材料送到毛、林那里，林彪别有用心地在材料上写了一大段话，大意是要尊重中央文革的意见，不能拖延时间等。这份文件又一次转回总理值班室。周家鼎一看给总理捅了一个漏子，心情很紧张，也很沉重。当周恩来忙了一天，半夜回到办公室，周家鼎把文件拿给他看，并说：“总理，我们犯了大错误了。”周恩来看了文件后，没有吭气，到了天亮才对周家鼎讲了一句话：家鼎呵，你们顶不住，告诉我，我写几句话，由我来负责。周恩来的意思是：当时找不到文件，可以报告他，由他出面去向中央文革解释。

事情并没有了结。江青等人抓住这件事情，在钓鱼台17楼几次与周恩来

胡搅蛮缠，说总理值班室的秘书眼中没有中央文革，要解散等。此后不久，在一次国务院办公会上，周恩来宣布，值班室撤销，周家鼎等都下去锻炼，只留下钱嘉东。周家鼎走前向他辞行。周恩来对他做了3条指示：1、到最基层去；2、不担任任何领导工作；3、改个名字。当时，周家鼎不理解为什么要让他改名，就说：总理，为什么要改名字呢？“四清”时不是有人改名受批评了。周恩来不吭气。这时，邓大姐穿着一件睡衣走过来说：叫你改你就改嘛！你就叫“贾汀”吧。周家鼎后来才知道，周恩来考虑是家鼎已得罪了江青，怕江青又找家鼎的麻烦，还是躲着她点；再一个考虑就是避免别人说总理又把自己人派到什么地方去了。谈话后，周家鼎就改名贾汀，到二七机车厂去蹲了几年。周恩来真是煞费苦心来保护他们啊！

还有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遭过江青迫害。江青造谣说成元功不让她到周恩来开会的地方去，当面骂成元功是“狗”，并为整成而同周恩来胡闹。结果，成元功被调到“五七学校”，一去就是9年。

“吃掉”江青的“车马炮”

1967年七八月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操纵，国内局势出现了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最混乱的局面。

这一年7月，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武汉“七·二”事件。事件经过是这样的。1967年春夏，武汉地区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之间的斗争日趋激化，武斗时有发生，规模不断扩大升级。为了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周恩来等于7月14日亲临武汉，谢富治和王力也由重庆赶到武汉。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武汉军区和地区支左负责人的会议，听取汇报，作思想工作。18日下午，他作了总结讲话。主要指出：武汉军区支左有错误，建议军区负责人陈再道、钟汉华主动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工总头头朱鸿霞等人，“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当晚，毛泽东接见陈再道和钟汉华。毛泽东讲，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嘱咐首先要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做通了，再开会协商。工作要做好，慢慢来，不要着急。并要谢富治和王力，专门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但在18日晚周恩来飞返北京后，19日下午，谢富治和王力马上驱车去“工人总部”派的一个据点，在那里发表有明显倾向性的演说，接受并佩带该派袖标，宣称要同他们“团结战斗在一起”。他们还说对立面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人总部”派为此十分高兴，立即出动广播车到处播放王力的讲话录音。这样就激起了“百万雄师”的群众和支持该派的军区部分指战员的极大愤慨。

7月20日晨，“百万雄师”的一些群众和部分战士涌进谢富治、王力的驻地，要求接见，被拒绝。于是，一些愤怒的群众便冲进去，把王力揪到武汉军区大院，在群众集会上进行质问和批斗。数十万“百万雄师”派的群众涌上街头，数千辆大卡车载着工人、农民和驻汉部队指战员，浩浩荡荡进行示威游行。他们张贴标语，高喊口号：“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中央派人来，王力滚下台！”“周总理到武汉，王力靠边站！”“欢迎周总理到武汉！”

正直勇敢的武汉人民以为，这样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一定能够引起中央的重视，从而采取正确方针解决武汉问题。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这样的做法，恰恰是林彪、江青等人所希望的。

已返回北京的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责令武汉军区负责人保证王力的人身安全。不久，王力即被救出，转移到驻军第二十九师师部。鉴于武汉局势十分混乱，周恩来决定重返武汉，保护毛主席安全离开武汉。

7月20日下午3点54分，周恩来乘飞机从北京起飞。飞行途中，吴法宪造谣欺骗，说王家墩机场不能降落，陈再道派部队包围了机场，要劫持周恩来，同时打电话给林彪办公室说：“武汉有几十辆汽车冲进机场，要劫总理，武汉军区有鬼。”吴法宪把周恩来坐的飞机调到离武汉60公里的山坡机场降落。周恩来下飞机时，林彪和吴法宪指使别人以反“兵变”为名，紧急调动空降部队占领机场，机场一片刀光剑影。周恩来根本就不相信陈再道等人会搞什么“兵变”。他把秘书和中央警卫团的领导同志以及两个中队的警卫部队留在山坡机场，仅带两名卫士，即乘车赶往武汉。此时，毛泽东已离

开武汉前往上海。知道毛泽东已安全离开武汉，周恩来提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七·二”事件本来是一件由许多因素所促发而成的事件，其中，作为中央文革小组代表的王力本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林彪、江青却各怀不可告人的目的，借此大做文章，向武汉军区领导人和“百万雄师”施以高压手段；与此同时，没有什么名气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也一时间名声大噪，成了“正确处理”武汉问题的“光荣的中央代表”、“七·二”事件的英雄”。林彪、江青等为王力大肆吹嘘，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几十万人的欢迎大会，发文章，播放电视，拍摄新闻影片，大造声势，并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在全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

王力返回北京后，在林彪、江青等人吹捧下，俨然以“功臣”自居，更加积极为江青一伙效劳。不久，王力又将黑手伸向外交部，在外交部“夺权”等问题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8月7日，因武汉“七·二”事件受伤的王力拖着伤腿召见外交部“造反派”，听取他们关于外交部运动情况的汇报。

当汇报到外交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真正打倒，业务工作还是由原来的班子抓时，王力突然发出一连串提问：“你们1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不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总理不是讲过老、中、青三结合吗？为什么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结合？！”造反派答道：“有人批评外交部夺权过头，说业务大权是属于中央的。”王力显得异常激动地说：这话不对！革命和业务不能分开嘛！我看你们现在没有真正掌握实权，有点实权才有威风。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原封未动。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不一定是原来的“长”，谁站出来革命，谁合适就谁干。对那些不革命的，不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不管他什么级别、什么资历、什么“长”，要统统打倒！有人不赞成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都1年多了，外交部竟出现这类怪现象，令人深思。

王力并且信誓旦旦地对造反派说，“你们有什么过火？我看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文革小组自然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革命不能半途而废，坚决支持你们，将革命进行到底！”

以上就是后来被称为“王八七”讲话的主要内容。王力的一番话，对那些几个月来一直想夺外交部大权的“造反派”，无疑是一针“强心剂”。在“王八七”讲话煽动下，外交部“造反派”不顾周恩来的一次次批评、警告，于8月16日冲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并悍然宣布夺取外交部党委的大权。接着，“造反派”又强行封闭了所有副部长办公室，姬鹏飞、乔冠华等部领导白天均被关入地下室写检讨，直至晚间8时才放出地下室，向“造反派”汇报，由此，整个外交工作陷于一片混乱，一直由毛泽东、周恩来掌握的外交大权落入造反派手中。

有恃无恐的“造反派”在夺了外交部大权之后，又制造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围攻苏联驻华使馆等一系列严重的涉外事件。

8月22日晚，被极左的狂潮支配的外事口造反派以及北京一些高校红卫兵，突破卫戍区人员的防线，开始冲击英代办处围墙。随即，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率先突入西墙。22时40分，大批群众组织冲击代办处正门；10分钟

后，一些高校红卫兵又越过北墙。不多时，从三面进入英代办处院内的群众已达数百人。

造反派突入英代办处东、西两院后即开始点火，顷刻间，烈焰升腾，东院的门窗、地板、汽车房、油库及7辆汽车均被大火吞噬；西院楼内3个卧室、档案室及2辆汽车也都被烧毁。混乱中，英代办处的多名外交人员从大火中撤出，少数人逃离代办处到附近使馆和公寓避难。经赶来救火的卫戍区消防人员奋力扑救，大火于零时许熄灭。

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焚烧，是建国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一起涉外事件，给我国的国际声誉带来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害，成为新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个“冰点”。

周恩来对这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行径表示了极大气愤，他决定以此事件为契机，抓出“操纵群众运动”和“破坏我们对外关系”的坏人，中央文革中那几个江青的车、马、炮——王力、关锋、戚本禹，果断地对他们采取处置。

8月23日凌晨，大火刚被扑灭两个多钟头，周恩来立即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他们宣布：

一、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党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国防、财政等大权在中央，不能夺，你们在外交部“夺权”，是目无党中央、国务院。

二、“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以“外交部业务小组”的名义向驻外机构散布这个口号更是错上加错。

三、封副部长办公室，随意点名，发“勒令”，造成数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斩而不奏”，这是头脑发热，目无中央，如果再向你们指出这一点，我们就要犯罪了。

四、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说明现在已不能控制局势，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对外关系中的任何大步骤，如提抗议、发警告等，都是应由政府决定的行动，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代办处，就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

五、你们中有人“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尽管现在批评你们，对于这些天外交工作上的失误，还需要由中央负责，这个责任，我是不会推的，要报告主席，我们犯了错误，没有领导好。

就在这次召见中，有些造反派头头仍显得很不服气，他们甚至公开顶撞、打断周恩来的讲话，竟有人抬出“王八七”讲话，极力为自己的极端行为辩解、打掩护。

狂热中的造反派当然还不知道，一项经周恩来反复考虑制定的解决王力、关锋、戚本禹问题的重大决策已经酝酿成熟。周恩来将王力的“八·七”讲话和关锋伙同王力炮制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有关材料，报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在上面批了5个大字：“大、大、大毒草！”还说：王力的这些讲话，连我也不能随便讲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的事嘛！与此同时，毛主席还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2人实行隔离审查，对戚本禹则视其表现，再作处理。

8月30日，曾经不可一世的王力、关锋在钓鱼台（当时为中央文革驻地）同时被宣布隔离审查，随即又被送入秦城监狱。1968年1月，戚本禹也被宣布隔离审查。

仅仅三四个月，中央文革就折了3员大将，江青等人对周恩来虽然从骨

子里势不两立，恨得咬牙切齿，但无奈毛泽东已经发了话，王力、关锋他们又闯下了如此大祸。在周恩来一次次强有力的反击面前，江青一伙摇身一变，随声附和，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王力被审查后，江青、康生还给他加上“国民党特务”的罪名，同时诬告其妻王平权的家里是“一窝黑货”。

火烧英代办处事件发生后，在中央文革王力等人的鼓动下，又一批红卫兵把苏联驻华大使馆包围起来。当时情况十分紧急，什么人去劝都没有用，周恩来叫周家鼎去找红卫兵的总指挥，而他自己则亲自到东城圆恩寺一家电影院坐等。总指挥终于找到了，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总指挥竟然是个16岁的女孩子，扎着羊角辫，满脸稚气，透出一股聪明劲。她把随身带来的地图铺开，那是一张围攻及如何撤退使馆的路线图，与周恩来侃侃而谈，说既然可以火烧英代办处，为什么不能围攻苏联大使馆，苏联反华，是修正主义，我们就是要反对他们等等。连周恩来都觉得这个女孩子嘴巴有点厉害。他耐心地听完女孩子的意见后，便给她做思想工作，他先肯定女孩子所说要反修防修是对的，同时充分肯定苏联好的一面，指出用围攻苏联使馆这种办法不对，希望他们赶快撤退。因周恩来在红卫兵中威信很高，说话算数。女孩子马上答应下令撤退。并且是很快就有秩序地撤退了。这又一次说明，只要领导亲自耐心地做工作，大多数红卫兵也能听得进道理。

就这样，周恩来在国内局势几乎失去控制，党和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当机立断，下决心采取措施，重新控制局势，使之成为“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中局势转换的枢纽，其历史贡献永不可没。

“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一）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扫清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丧心病狂地迫害大批党政军机关的领导干部，以及高级知识分子、著名的民主人士。周恩来在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与林彪、“四人帮”展开巧妙的斗争。他以过人的智慧，高超的斗争艺术，使相当一批人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可以说，在那阴霾蔽日的年代里，周恩来是云层中透出来的亮光，是许多人寄托希望与寻求慰藉的参天大树，正如邓小平同志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中所说的那样：“‘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那么，周恩来又是怎样保护这“相当一批人”呢？在江青等中央文革一伙十分得逞，红得发紫的日子里，正面冲突，公开为这相当的一批人开“绿灯”，是行不通的，周恩来为此费尽心机，殚精竭虑，采取了许多办法，以智斗取胜。

“文革”刚开始，许多老同志与周恩来一样，觉得很理解，很不得力。随着运动发展到出现打、砸、抢，到处夺权，一片混乱时，一些部长级的老同志意见越来越大，他们有时也会到总理值班室发牢骚，讲一些对“文革”不满的话，这些话反映到周恩来那里，他很焦急，生怕这些老同志发牢骚会带来麻烦，他就很难保他们了。所以，他多次对老同志说：“你们说话时一定要小心，如果你们再这样讲，发牢骚，我也没法保护你们了。”他让周家鼎传他的3句话给老同志：心中无它，积极革命；实事求是地检查；特别是不要承认是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他还说：“文革”好像洗脸。洗过脸特别精神嘛，一定要正确对待等。

不久，周恩来亲自写了一封信给老师、副总理、部长们，让周家鼎送去给这些老同志看，并让他们签名后带回。信的大意是：你们一定要十分注意你们的言行，不要说过头话，不要做过头事，不要增加“文革”的困难，不要节外生枝，不要叫人抓住把柄等。总之是要他们一定谨慎言行、小心处事。周家鼎拿着信先后到过陈老总、李先念、李富春、贺老总、余秋里、谭震林等人那里，他们看了信后都很感动，认为这是周恩来对他们最大的关怀与爱护。当周家鼎拿回那封签有老师们名字的信退给周恩来时，周恩来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随即就把那封信销毁了。中南海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办公地点，也是许多中央领导人居住的地方。在那高大而坚实的红墙内，是一幢幢以平房为主的古代宫廷建筑和大片的绿化带。它的正门是南门，又称新华门，朝向长安街，还有西门、西北门、北门、东门，出东门穿过北长街，就是故宫博物院。“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后，这块令许多人向往的神圣之地也不平静了，随时有被冲击的危险。尽管如此，它仍然是老师、将军和部长们得以暂时避难的港湾。这是因为有周恩来总理在那里顶着。当时，国务院各部的部长们几乎都成了红卫兵、群众组织的“靶子”，随时可把他们揪出去批斗一番。这一大批部长级的干部，既要坚持工作，又要参加劳动，还要接受批判，许多人精神上体力上难以支撑。周恩来怕这些部长们承受不了，曾经心痛地说：“他们在外面根本休息

不了啊！应该把他们接进中南海休息。”但是，对外又不能公开讲，只好让秘书发通知，以开会的名义，轮番请这批部长们住进中南海，这样进来几天，休息一下，再出去挨斗，而且规定时间送回来，我们称之为“倒班出去”。余秋里是国家计委副主任，谷牧是国家经委副主任。他们都是直接为国务院联系各经济部门抓经济工作的，每天都要把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的具体材料送到周恩来那里。虽然他们工作很忙，可是还要受到“造反派”的揪斗，以致影响工作的进行。为了使经济工作照常进行，周恩来就以“小计委”（经毛泽东批准的，由余秋里、谷牧、林乎加组成）搬进国务院工作的名义，将余秋里、谷牧、林乎加3人调到中南海居住和办公。但“造反派”到中南海北门贴大字报、用高音喇叭喊，要揪他们出去批斗，“交代罪行”，为了不同“造反派”顶牛，周恩来派人同“造反派”谈判，约好时间分别让他们出去接受群众的批判，并作必要的检查交代。所以，他们既坚持了工作，又免受了过多的批斗。

廖承志是外交和侨委两个“造反派”夹攻的对象。他的秘书在“造反派”威胁、利诱下起来“反戈一击”，造了他许多谣言，弄得他没法在家里呆。他有严重的心脏病。周恩来要他住在中南海外办的办公室里不要出去。“造反派”要揪去批判，须经周恩来批准并按规定时间送回来，所以他就老老实实呆在外办看书报。有一天晚上，我从家里偷偷地跑到外办去看他。他感到惊讶，问我为什么敢来看他？我说：“为什么不敢，我们是老战友嘛！”自1937年9月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认识，日寇向南京进逼时，在11月我们和叶剑英、李克农等一起从南京撤退到武汉，又是难友。1946年1月在重庆，廖承志经中共代表团营救出狱后，我们就一起在代表团工作。建国后，他兼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经常在一起开会，现在都“靠边站”，怎能不互相关心？我们两人都以“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的乐观精神促膝畅谈，但又不能不防“造反派”知道后追问我们的“秘密活动”，于是就商量了一个共同的“口供”，只谈了他家里的秘密文件已安全转移到中办秘书局的档案处一事，我就回到家里。

中南海内国务院的宿舍楼，便是部长们的“避难所”。周恩来让一些被批斗得厉害的部长、副部长们到里面来“写检讨”，实际上是让他们来休息一下，同时冷静地写必要的检讨材料。我见过的有钱之光（纺织部）、钱正英（水电部）、王诤（四机部）、黄树则（卫生部）、萧望东（文化部）、陈正人（农机部）等。因为楼内还住有国务院内的“造反派”，所以我只能利用晚上去看他们，谈完后，都要约定一致的“口供”，来谈了什么，准备“造反派”追问时好交代。有一次，我看了王诤，谈到“文革”前我同他协同中央组织部，为一个建立党的电台有功的涂作潮摘掉“反党”帽子问题，还谈了其他问题，如所谓“杨尚昆搞窃听器”等问题。我们约定“口供”，只承认谈涂作潮问题。果然，不久后四机部的“造反派”知道了我同王诤见了面，就分别派人追问王诤和我，问我们进行了什么秘密活动？幸亏我们事先约好了“口供”，都只承认谈了涂作潮问题，就应付过去了。

1967年国庆节到了，还住在国务院宿舍里的一批部长、副部长们不能回家团聚。过去，部长都是白天上天安门城楼上，副部长在城楼下红观礼台观礼，晚上又去看焰火的，我是以工作人员名义上天安门城楼的。这一天，大家都没有资格去天安门了，晚上，只得自己带上椅子坐在中海边上“隔岸观焰火”了。因为有“海水”的倒映，比在天安门只看到空中一面，别有一番

风味。我就利用此机会照了一张“空海相映辉”的照片，已收入了我的影集《历史的脚印》，成为有意义的纪念品了。

写到这里，我不由地又想起周恩来。因为有他的一句话，保护了我的照相机和照片资料，“文革”一开始，“红卫兵”到处搞串连，为保持中南海内的安静工作环境，周恩来下令：中南海内的“造反派”不准同中南海外的红卫兵串连，不能把红卫兵引进中南海来。因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势力不大，也不敢闹得太厉害，没有来抄我的家。有一次有几个“造反派”到我家来，要把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杨尚昆、李维汉……等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照片剪掉或打×。我和紫非同他们据理力争。我们说，这些是历史资料，不能随便毁掉，而且不能根据大字报来做结论，不同意剪掉或打×。我说，不能毁掉，但可以全部封起来搬到秘书局楼上保存，将来请示中央领导决定处理办法。他们没有法子，只好同意，搬到秘书局加封保管。1973年我恢复工作后，全部收回来了，幸免了浩劫！如果外面的红卫兵串连到中南海来，那就要遭殃了。如果我还在中央统战部门的话，那就一定会像李维汉、徐冰、许涤新等一样，照片都被烧掉，连照相机也抢去了。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煽动群众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千方百计地关怀他们保护他们，花了大量的精力。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中央政治局开生活会，江青在底下布置大家要批斗刘少奇、邓小平，生活会一开始，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几次会上，只有周恩来、陶铸不发言。

9月，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红卫兵万人大会上，周恩来正在讲话时，会场的一角突然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他听到后，立刻转过身去，背向会场，表示反对。直到会场平静下来，才继续讲话。他说：“即便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也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

11月中旬，北京政法学院群众组织要开会批斗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目的是想从李雪峰身上追查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得知后，马上通知新华社：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中央已解决，不要在群众中搞，中央不支持他们开这样的会，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电台都不要派人去参加这样的会。周恩来还特意交代刘少奇、邓小平，要他们不出中南海。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无视周恩来的劝阻，继续掀起揪斗刘少奇、邓小平的狂潮。1967年1月，中南海各门外一片喧嚣，北京的“造反派”高喊着要揪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负责同志出中南海批斗，遭到周恩来的断然拒绝。我们看到平日笑容可掬的周恩来，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怒目冷对，严厉地制止了那些造反派的无理狂妄要求。终于逼使他们撤离中南海。

清华大学的“红卫兵”没有达到揪刘少奇的目的，1月6日，就采取造谣的伎俩把王光美骗出去，他们打电话给王光美说，她的女儿被车撞伤了，现在已送到医院，要她赶快去看。王光美信以为真，就急忙坐车出中南海到某医院，结果被“红卫兵”挟持到清华大学去开大会批斗。周恩来知道了，立即派人去交涉，把王光美救回来，并批评王光美为什么不报告就出去了。

江青、康生等人眼看一次冲不进中南海，就煽动群众组织再次去冲中南海。7月，他们趁毛主席不在北京之机，策划了100多个群众组织，共5000多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大有非冲进去不可之势。几百个高声喇叭对准中南海日夜狂吼，被狂热冲昏头脑的红卫兵、群众振臂高呼，非冲进中南海不可，局势相当严重。

周恩来临危不惧，独撑危局。他亲自打电话批评群众组织头头：“你们如要冲进中南海，就是错误的，错误的，错误的。”他一连说了3个“错误的”，可见气愤之极与坚决不让步的决心。面对那些高音喇叭和无数“造反派”的狂呼滥叫，周恩来坚定地说：“就是大炮轰，我也不离开中南海，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你们要想冲进中南海，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那时局势相当混乱，我们担心周恩来的安全，几次劝他离开，到安全的地方去，他严肃地说：只要我在这里，高音喇叭就只能喊，造反派不敢冲，我若一走，他们冲进来怎么办？中南海内住着的老同志怎么办？在中南海被围困的50多天里，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拼着一身，保护了刘少奇、邓小平和许多躲藏在中南海内的领导干部。

贺龙同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不朽的贡献。然而，却被林彪一伙视为夺取更大权力的障碍。文革开始不久，林彪以为时机已到，先发制人，指使康生等人罗织贺龙的罪名。

1966年初，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北京军区为卫戍区组建一个团，准备担负民兵训练任务，因一时找不到营房，而当时北京各大学都有部分师生在农村搞“四清”，空出一些房子，卫戍区便派人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联系借房，用来暂住军队。部队借房搞训练属正常军务所需，康生等人却将“借房”一事与搞“兵变”联系在一起，诬陷贺龙“私自调军队搞2月兵变”，还无中生有地制造了贺龙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要搞兵变等骇人听闻的消息。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去造贺龙的反。于是，贺龙家被抄，一家人日夜被包围在“坚决揪斗贺龙”的巨大声浪中。

在贺龙一家被迫害时，周恩来挺身而出，尽最大的努力保护贺龙。他多次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不能见群众，有什么事我顶着。”还亲自打电话给群众组织头头做说服工作，劝他们撤离贺龙的住处，反复阐明不许围攻贺龙的道理。为了让贺龙能正常休息，周恩来把贺龙和夫人薛明接到中南海西花厅来往，暂避风头。

贺龙年事已高，身体又有病，住进中南海西花厅后，总觉得住在周恩来家，会给添麻烦，心里十分过意不去，寂寞与愁思交织，心情仍然很沉重。周恩来就耐心地安慰他，经常讲些让他开心的话，再忙再累也要去看贺龙，有时就端着饭碗到贺龙住的房间，与他促膝谈心。在那段时间里，总理给贺龙多么大的安慰啊。然而，好景不长，中南海也有两派，戚本禹就是其中的造反派头头。他在背后捣鬼，风声很紧，周恩来不得不把贺龙转移到北京西山象鼻子沟（国务院的战备办公室）保护起来。但后来林彪等人侦知贺龙藏身之处，把他作了转移，周恩来再也找不到他了。直到林彪死后，周恩来才得知贺龙已去世，派人专程接回贺龙夫人薛明和她失散5年的孩子团聚。

中南海有知，中南海有情。那些曾经躲藏在中南海内的老同志，当然更不会忘记敬爱的周总理，他曾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为代价，保护他们渡过难关。

“文革”一开始，周恩来就十分注意北京卫戍区的警卫工作。他多次指示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要加强警卫工作，提高警惕，严防有人乘乱抓走和乱整、乱打老干部，他不仅做指示，交任务，还教如何保护老干部脱离险境的具体办法，想的十分周到。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已在全国展开，周恩来觉察到“中央文革”在打彭老总的主意，嘱咐我们要密切注意成都方面的动态，有情况随时汇报。他深知彭老总的性格，刚直不阿，宁折不弯，若是与“造反派”硬顶，

怕要吃亏。12月下旬，他获悉彭老总已被北京去的红卫兵抓走，即将送北京，十分着急，指示周家鼎告诉成都军区司令员、政委按中央3条指示对待彭总：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车站等候，指定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亲自去接，由卫戍区安排食宿，不准任何一派红卫兵插手。

12月27日下午4时许，火车抵达北京后，傅崇碧按周恩来指示亲自去接。但情况并不妙，北京各路造反派已闻讯云集车站，人山人海，排开阵势，准备抢人，各派互不相让。此时，周恩来正在与中央文革小组开碰头会，听到戚本禹眉飞色舞地向“文革”小组成员通报：彭德怀已抓到北京车站的消息，立即站起来说：此事由我来处理，随后离开会场，亲自去找红卫兵头头，批评他们，同意他们派人与卫戍区共同管理，并约法三章：对彭老总不许游斗，不准武斗，不准搞逼供信。这样，彭总暂时被“监护”起来，从1965年底到1967年7月由专案组管理之前，他没有受到后来那种非人的折磨与摧残。

震惊中外的武汉“七·二”事件后，毛泽东、周恩来通知陈再道、钟汉华等同志到北京谈问题，并把他们安排到京西宾馆，实际上将他们保护起来。可是，林彪、江青一伙蒙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开群众大会，组织示威游行，并冲击京西宾馆。

有一天，7000多人突破京西宾馆的警卫线，有几百人冲到楼上，情况非常紧急。周恩来立即指示傅崇碧与卫戍区另一位领导赶到现场，按事先商定的方案，采取紧急保护措施。让陈再道等同志躲进一个不常用的电梯，让电梯在9层与8层之间停下来，告诉电梯内的同志只有听到指定人给的信号才能出来。同时，让卫戍区的同志，反复做冲击宾馆的群众的工作，劝他们退出去。但是，由于戚本禹等人在背后捣乱，这些人一直不退。周恩来就把戚本禹找去，责令他“退兵”。并严肃地说：人要是被抓走了，你必须向主席交代。迫使他们最后退兵。在周恩来的亲自布置下，卫戍区保护了陈再道、钟汉华等同志的安全，打破了林彪、江青一伙要把陈再道、钟汉华等置于死地的阴谋。

彭真的职务被撤销后，周恩来通知卫戍区照样派警卫在他住地（台基厂）保护。有一次，江青指使一批“红卫兵”，不顾警卫部队阻止，爬墙进去把彭真抓走，不知去向。周恩来知道后，立即命令卫戍区四处寻找，同时要文革小组也经过“红卫兵”系统查找，都无下落。后来，有人说叶向真听说过彭真的拘留处，周恩来立即派人找叶向真调查，才找到地址，并派部队把彭真找回来保护起来。

有一次，由陈毅主持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周恩来担心有人会趁机到北京饭店劫走陈毅，提前指示卫戍区一定要保护好陈老总的安全。警卫人员按他的指示，提高警惕，车子开到北京饭店后，果然发现形迹可疑的人，警卫人员便将陈毅的车子停在正门，未等招待会结束，就先将车子开走，将那些要揪陈毅的人引向另一个方向，待会议结束后，用另外准备的车子从另一个门，把陈毅安全送回中南海。

为了做好几位老师的安全保卫工作，周恩来曾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带着卫戍区的领导亲自到几位老师家的住处，一一察看那里的警卫工作。

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周恩来通知卫戍区，徐向前同志必须去参加招待会，你们一定要保证他路上不出事。卫戍区为此采取措施，协同有关部门，在送徐帅回去的路上，用三辆警车跟着徐向前，并兜了个大圈子，把徐向前安全送回家中。

卫戍区的干部、战士在周恩来的言传身教下，都自觉地提高警惕，加强对老同志的保护工作。有一段时间，宋任穷住在京西宾馆，林彪、江青一伙指使辽宁的造反派带人去抓宋任穷。他们事先进行过侦察活动，于夜间突然闯入宋任穷的住处，他们不敢把宋从楼道送出来，便企图将宋绑起来从窗口吊送到地面。楼房那么高，宋任穷年纪又大，万一有个闪失，就会粉身碎骨。由于警卫部队警惕性很高，迅速赶到现场，制止了造反派的作法，将宋任穷解救下来。事后，卫戍区把事情经过向周恩来汇报，总理充分肯定卫戍区作法，并鼓励他们进一步搞好安全保护工作。

1967年夏天，住在中直招待所的李井泉等几位老同志，先后被人抓走游斗。卫戍区将这些情况报告周恩来，周恩来由此联想到王任重等20多位大区和省、市委负责同志也住在中直招待所，为了避免这20多位负责人被揪走，他要卫戍部队立即将这些同志送到卫戍区里一个安全的地方保护起来，并嘱咐部队要严格保密。

江青一伙一听到找不到这些同志，当着周恩来的面责问卫戍区司令：把人弄到哪里去了。接连吵了两天，周恩来不理睬江青，傅崇碧也不吭声，江青等人追问急了，傅崇碧就说：上面知道。几天后，傅崇碧见到毛泽东，向他报告了对这些同志的保护措施，主席赞同地说：总理做得好，你们卫戍区保护得好。事后，江青一伙又来拍着桌子问，傅崇碧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去问主席吧。江青一伙听了，不敢追问了。当傅崇碧把向主席汇报的情况报告周恩来后，他爽朗地大笑了。那20多位省、市委的负责同志被保护在卫戍区营房后，周恩来还专门指派一位同志，每隔1天去探望一次，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送文件给他们看，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为了保护被揪斗的老干部，周恩来经常与卫戍部队领导商量，事先怎样准备好部队，怎样准备好汽车，甚至连怎样准备好直升飞机都想到了，随时准备抢救被揪斗的老同志。

卫戍区司令按周恩来指示，在“文革”初期带领卫戍区官兵为保护老干部做了大量工作，贡献很大。然而他却成了林彪、江青眼中的钉子。1968年3月，林、江反革命集团制造了所谓“杨余傅事件”。他们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并且罗织罪名，说杨、余、傅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毛泽东听信了林彪、江青等人的捏造，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命令，撤销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军委常委等职务；撤销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等职务，并妄加叛徒罪名，逮捕法办；撤销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

傅崇碧遭迫害离开北京时，周恩来心情十分难过，眼见这位在“文革”最混乱阶段，帮助大家保护老干部的司令员横遭祸端，自己却无力保他，因为这些决定都是毛泽东批的。周恩来当时处境十分艰难，仍抽出时间，陪傅崇碧在人民大会堂吃饭，给他送行。分别时，周恩来紧握傅崇碧的手，鼓励他把身体搞好，经得起考验。并嘱咐有关部门要安排好傅的生活。在以后很长时间里，周恩来为傅崇碧平反事情做了许多工作，终于在1974年，使得这位“文革”中保护许多老干部的有功之臣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1974年五一劳动节，我和紫非带孩子到颐和园游园，恰恰在湖边碰到傅崇碧，我对他的“解放”表示祝贺。旁边一个老同志不认识傅，我向他介绍，这是“文革”中保护了许多老同志的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同志。傅崇碧即自豪地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曾被人打倒的‘杨、余、傅’的傅崇碧。”引得大家都哈哈大笑。

在法律受到严重践踏的“文革”中，一些利令智昏的人无视人格的尊严，无视法律的神圣，随意揪斗打骂、变相体罚老干部，周恩来为了制止这些作法，想了许多办法。陪斗，则是他在大批斗高潮中挺身保护干部的一种作法。

周恩来陪陈毅挨斗的次数最多了，陈毅性格爽朗，为人正派，敢于坚持真理，对“文革”中的许多做法看不惯，直言不讳发表过不同看法和意见。他看不起暴发起家的林彪，曾经说过：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过去他是我的部下。林彪为此对他怀恨在心，他们挑动学生和外交部的造反派不停地向陈毅进攻。

1967年1月24日，外事口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批斗陈毅大会，为了保护陈毅，周恩来亲自要求参加这场大会。这实际上是陪着陈老总挨斗。会上，造反派用大喊大叫的形式，批了陈毅3个多小时，然后要陈毅做检查。陈毅从容大度，按当时惯例先拿出“红宝书”，并说请大家翻开第271页，然后，高声颂道：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会场上的造反派懵了一刹那，随即哄然而起，因为《毛主席语录》上没有这句话，眼看造反派就要对陈毅加倍攻击。周恩来站起来，证实毛主席确实说过此话，骚动的人群才平静下来。

陈毅的风趣、幽默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人们对他油然而产生敬重的感情。林彪、江青则是恨上加恨，批斗在逐步升级。

1967年8月11日，“中央文革”再次策动外交部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批斗陈毅的大会。

周恩来再次亲赴批斗会场，并且坐在陈毅的身边，为这位身经百战的元帅分担着屈辱。批斗会前，他已再三声明，不许在会上喊打倒陈毅，不许挂打倒陈毅的大标语，不许对陈毅同志进行武斗。然而，造反派无视声明，于开会中间，突然从二楼悬下一幅“打倒陈毅”的大标语，几个彪形大汉还准备上台对陈毅动武，周恩来怒不可遏，当场严肃地批评造反派“说话不算数”。责令立即撤去这条大标语，并指示有关人员保护好陈毅安全离开会场，尔后他自己愤然退出会场。

林彪、江青一伙知道周恩来一直在保陈毅，于是便挑唆造反派围攻他，要周恩来同意他们揪斗陈毅。1967年8月26日，外事口的造反派围攻周恩来，扬言要拦截陈毅的汽车，要冲到人民大会堂去揪斗陈毅，致使周恩来18个小时不能吃饭、睡觉，猝发了心脏病。他气愤地表示：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由于周恩来的坚决反对，造反派才未能得逞。

对于周恩来的陪斗，挺身而出的保护，陈老总十分感动，刚正不阿，性格爽朗，不轻易掉泪的陈老总，在总理的一片真情下，流下激动的泪水。

陪斗，对周恩来来说是相当痛苦的，要耐着性子陪听那些泼向被批斗对象的流言秽语，要忍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对他的攻击，还要随时警惕批斗现场中的突发事件，有时还必须说几句违心的话，好让被斗者尽快过关。每次陪斗结束，都痛苦之极，疲惫不堪。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国家利益，他抛弃

了个人得失荣辱。在文革中，周恩来反复讲：“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陪斗，或许可以看作他入地狱、入苦海、入虎穴之举吧。

“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二）

“文革”之初，薄一波是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时，他一直同刘少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林彪、江青、康生决意要通过薄一波等人上追刘少奇。为此，他们制造了“61人叛徒集团案”，妄图以此作为最终定刘少奇案的证据。

所谓“61人叛徒集团案”党中央领导人一直都很清楚，在延安时早就做了结论。林彪、江青、康生等却置历史事实于不顾，把已有正确结论的事重新提出来。康生责令“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对这件事进行调查，并伙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和谢富治等人到处支持某些学校的红卫兵揪斗这批党员，把61人的事情透露到社会上。周恩来认为，这样做违背了党的基本原则，一再申明，所谓“61人叛徒”问题党中央是清楚的。

当周恩来得知红卫兵因这件事揪斗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和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的消息后，于1966年11月24日给毛泽东写信，并亲拟了《中央对西北局关于红卫兵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的请示批复》一并送往毛泽东那儿。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他说：“这一集体自首案牵涉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毛泽东批准了请示后，周恩来即于11月30日亲自写电报给西北局、吉林师范大学，重申刘澜涛、赵林等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指出：“希望你们按照中央上述电示执行，不要在群众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也不要散发传单，涂写标语。”

薄一波在这个重大冤案中横遭迫害，幸亏有了周恩来对他的暗中保护。薄一波患有美尼尔氏症，容易头晕，在这一年的8月底，一天早晨起来，摔倒在浴室里，只得卧床养病。他向周恩来请了几个星期的假，周恩来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薄休养6个月。”实际上是要让薄一波避开红卫兵对他的揪斗，摆脱林彪、康生设置的罗网。薄一波夫妇匆忙动身去广州，暂时躲开康生等人的魔爪。

康生等人知道薄一波去广州的消息后，又策动国家经委造反派赶赴广州揪回薄一波。赵紫阳当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他将造反派要抓回薄一波的事报告给中央办公厅，周恩来立即做出指示：“应由军区派队伍按接送彭德怀的3条，乘火车安全送回北京。”

1967年元旦，薄一波夫人胡明参加老朋友们举行的一次聚会。薄一波没有去参加，大约在中午时分，赵紫阳来到他的住处，告诉薄一波，有60多个红卫兵已到广州，现在正要来抓你，要薄一波赶快准备一下。

赵紫阳一走，薄一波马上把他带来的所有文件和材料塞进一个卷宗，转交给了住在同一个大院内的代主席董必武。很快，气势汹汹的造反派咆哮着向薄一波扑来，他们夫妇俩很快被押上回京的火车。在火车上，造反派对薄一波夫妇百般刁难，胡明不堪忍受如此屈辱与折磨，含恨自杀。

薄一波被押回北京时，家已被抄得乱七八糟。他被监禁在北京德胜门外的一座监狱，备受折磨。后来，在周恩来的多次关照下，薄一波被安排住进医院治疗，“四人帮”垮台之后，薄一波曾对友人说：“如果没有总理的关怀，我薄一波早已被林彪、江青折磨死了。”

在“文革”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周恩来深知对毛泽东支持的一

些错误决定，公开正面地硬顶是顶不过去的，他不得不采取一种特殊的解决方法，跟着违心表态赞同，说些违心的话，多做检讨，在毛泽东火气头上，顺着他，尔后采取其它方法补救或修正。因为他看到，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党和国家的损失，保存尽可能多的中坚力量。这在保护“二月抗争”中的老师们时，体现得尤为明显。

林彪、江青一伙掀起“打倒一切”的狂风恶浪席卷全国后，一切正直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群众无不为国家的前途担忧。特别是中央领导中身经百战的老革命家，再也忍耐不住，奋起抗争了。1967年2月，在由周恩来主持于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两次有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中央碰头会议上，几个副总理和老师们与中央文革那些极“左”的人唇枪舌剑，展开激烈的斗争。这就是被诬为“二月逆流”的“二月抗争”。

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在会上提出三个重大原则问题：（一）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二）老干部应该不应该统统打倒；（三）要不要稳定军队。会议围绕3个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

谭震林义正词严地对张春桥等人说：“你们的目的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越说越气，怒从心底起，气愤地喊道：“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跟你们斗到底！”他说完，站起来就要走。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叶剑英说，“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聂荣臻说：“不能为了打倒老干部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就是不安好心。”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在会上责问康生，《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提出：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发表前，为什么不送审，不叫我们看看。

会后，谭震林又写了一封信，表示对江青一伙罪行已“忍无可忍”，决心准备牺牲，斗争下去，拼下去。

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不同意见，完全是正常的，是合乎组织原则的事情。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却颠倒是非，强加罪名。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在2月16日夜里私自核对整理了中央碰头会的记录，并与江青密谋后，由江青安排他们向毛主席告了三老四帅的状，林彪还将谭震林的信转送毛泽东，更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毛泽东错误地听信他们的汇报，认为这是一件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的大会，决定对三老四帅进行严厉指责。

2月18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他一改平日谈笑风生态度，面带怒容，语气严厉地指责三老四帅：你们在怀仁堂会议上联合起来，搞突然袭击，向中央文革发难，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无非是搞宫廷政变，想让刘少奇重新上台。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为什么没过几天，你们就反对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为什么阳奉阴违，出尔反尔呢？讨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你们也是赞成的，我没看过你们谁投过反对票，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真的发动起来之后，你们又反对呢？

三老四帅据理力争，向毛泽东解释。然而，正在火气头上的毛泽东根本听不进去。他粗暴地打断三老四帅的话，继续气冲冲地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的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他用一种愤怒的目光扫向三老四帅：你

们想反对“文化大革命”，那办不到！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指林彪）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几位老师和几位副总理惊愕地望着满脸怒气的毛主席，他们与毛主席患难与共几十年，彼此肝胆相照，实在难以相信这是毛主席亲口说出来的话，在他们眼前，毛主席变了，变的那样陌生，那样令人难以说话，那样令人难以理解。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心情十分沉重，毛主席发这么大的火，一定是听了江青一伙的诬告。而心地坦然的三老四帅没有在毛泽东的盛怒面前胆怯、退让，却是针锋相对，反唇相讥，使事态越发严重了。周恩来心里十分明白，毛泽东已经直接“参战”了，明显支持林彪、江青，不认清这个变化了的形势，一个劲地往前冲，就等于与毛泽东短兵相接，这样做正中林彪、江青等人的下怀，不能走这着凶多吉少的险棋，保存实力，保护三老四帅过关的唯一良策，就是要先顺从毛泽东，检讨过关。于是他巧妙地出来打圆场，诚恳地对毛泽东说：在怀仁堂会议上，几位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这主要责任在我，会后，他们也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作了检查，他们也感到讲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查。

毛泽东采取了对周恩来宽容的态度，但对三老四帅毫不让步，他依旧生气地说：他们根本不认错嘛，恩来同志，我建议这件事要认真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说罢，毛泽东起身退场。

会后，周恩来立即与三老四帅商量，提出3条建议：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与他们奉陪到底；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阵地决不能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退却，逃兵；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不能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

三老四帅被周恩来的一片良苦用心深深感动，同意他的意见，主动要求找主席作检查。得到毛泽东的谅解后，周恩来又趁热打铁，拿出“五一”节联欢晚会让三老四帅出席的名单，毛泽东十分爽快地在名单上签了“同意”二字，周恩来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笑容。一批共和国元勋就这样保护下来了。

我们党有一个原则，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可以说，周恩来是党内高层领导中做检讨最多的人。“文革”之初，他觉得自己思想跟不上主席，老作检讨，这是由衷之言。后来，随着“文革”发展越来越离谱，林彪、江青一伙趁“文革”之机搞乱国家，篡党夺权野心越来越暴露时，他也越加意识到要讲究斗争艺术。为此，凡是领导干部受冲击、批斗，他总是要他们先做一个象样的检讨，以取得群众组织的谅解，并以此在毛泽东面前为他们开脱，这样一来，不仅可使受冲击的干部尽快过关，更重要的是可以继续工作，守住阵地，维护国家机器和国民经济运转，制止动乱局面的进一步发展。

由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具有绝对权威，林彪、江青一伙经常利用毛泽东的权威，把他的指示当作“尚方宝剑”去达到自己的罪恶目的。但是毛泽东的“大乱天下”与林彪、江青一伙的“大乱天下”有区别。毛泽东不完全同意林彪、江青越乱越好的极左做法，他主张“乱中求治”，“又乱又治”，为此，毛泽东是希望乱得不行时有人来治乱，这个人就是周恩来。为此，周恩来也努力争取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同样把毛泽东治乱的指示，

同样当作“尚方宝剑”来威慑林彪、江青一伙，使他们有所收敛。

《周恩来选集》下卷收录的历史文献《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就是周恩来充分利用毛泽东指示为“尚方宝剑”，为保护一批知名人士作出的不朽贡献。

事情是这样的。1966年8月29日夜，红卫兵闯入章士钊的住宅。他们手持红宝书，向章士钊全家读毛主席语录，随即，开始了抄家的“革命行动”，直至发现了毛泽东与章士钊合影及写给章士钊的信札后，才稍稍停止。

章士钊在这场惊吓之后，立即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了红卫兵来抄家的粗暴情景，恳求毛泽东在“可能的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章士钊同毛泽东的友情深厚，早在共产党成立前夕他们就相识相知。1920年6月，毛泽东为组织革命活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批数额较大的款项，在上海找章士钊帮助。章士钊当即热情相助，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共筹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章士钊对他从事革命活动作过的帮助。1963年，毛泽东曾经对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讲，“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他一笔帐没有还呢。”毛泽东指的“一笔帐”就是章士钊筹集的两万银元。从1963年起，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泽东必派秘书送2000元，一直到1972年送满累计两万元。毛泽东还说：“这个钱是给行老的补助，从1973年开始还‘利息’，这个钱一直送到行老不在为止。”

8月30日，毛泽东收到章士钊的信，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周恩来由此联想到大批党内外干部和统战朋友，他们一定也处于随时被冲击、抄家的危险之中，于是他“借题发挥”，亲笔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利用毛泽东“应当予以保护”的“尚方宝剑”，对一批高级干部和知名人士采取了多种形式的保护措施。

周恩来考虑到这些同志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性格倔强，不堪受辱，若在家中，万一红卫兵冲击时发生意外，会给党带来很坏的影响。因此，他委托可靠的同志去做说服工作，动员这些人暂时离家避一避；同时，通知三一医院准备接受这批人住院，对他们加以保护。在医院里，他派部队同志作警卫，安排医务人员照顾他们的生活。为了防止红卫兵追踪而来，他特别嘱咐秘密护送。总理值班室的同志到被保护人家中接人时，不告诉其家属到什么地方，只允许一名秘书跟随照顾，并要求被保护人改用假名字。对张治中、程潜、章士钊、李宗仁采取了这种保护办法，对郭沫若则采取相同措施送到外地，直至形势好转才将他们送回家中。

对思想不通或因其他原因不肯离家的人，周恩来改换方式加以保护，派解放军战士或公安人员身着便装，臂带红袖章，到被保护人家中劝阻前来抄家的红卫兵。同时，与当地派出所和所在机关的同志取得联系，请他们予以协助。对傅作义、邵力子、蔡廷锴、蒋光鼐、沙千里等都采取了这种保护措施。使他们较为安全地度过红卫兵运动的高潮。

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曾经是“文革”中一个时期十分时髦的口号，周恩来为了保护老同志免遭揪斗之苦，想出了让老干部也去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主意。

1967年各省、市区的党政负责人均被夺权揪斗，不少人被揪来北京，周恩来为了保护这批老干部，就把他们分散到毛泽东亲自抓的“点”去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毛泽东亲自抓的“点”就是“六厂二校”，即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进驻这些厂校的是中央警卫团和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因为这些工厂是毛泽东亲自抓的点，军宣队又是毛泽东派去的，可以“通天”，造反派不敢到那里找事，更不敢轻举妄动，随便进去抓人。周恩来把各省市区被揪来北京的党政军负责人送去那里“接受再教育”，真是再保险不过了。

每下去一批老干部，周恩来就把军宣队的负责人找来，嘱咐他们要好好照顾这些老同志，保证他们的安全和健康，并让军宣队拿出最好的房子（专家招待所），给他们单独开伙食；根据每个老干部的身体状况做些轻微的、力所能及的劳动，厂里订有报刊杂志供老干部每日阅读，晚上有军宣队值班警卫，保护他们的安全，节假日还可以探亲访友。尽管这些老干部在生活上的条件比在位时降低了许多，但在那个动荡的年月里，总算有了安身之处，不受揪斗和惊忧。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党内外干部、民主人士、科学家，乃至一般的知识分子、普通群众的事例举不胜举。他以高超、巧妙的斗争艺术，保护很多人过关，他在惊心动魄的风浪中，使很多人得到安全。尽管周恩来做了种种努力，但是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篡夺了党政军的极大权力，许多优秀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仍受到残酷的迫害，周恩来不可能一一做到，顾到的也不可能一一如愿，他在“文革”中保护了党和国家的元气，保护了相当一部分人，这一历史功绩永不可没。

砥柱中流撑大局

呕心沥血稳定经济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周恩来被指定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这意味着要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保证7亿人口的衣、食、住、行。周恩来以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智慧和特有的方式，挑起这副历史重担，在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竭力维持着国家经济的运转。

周恩来为了充分利用由余秋里、谷牧、林乎加负责的小计委主持经济工作，要他们住到中南海国务院院子里，保持着国务院和各经济部门和各省市的联系，以便维护生产的正常运转。周恩来正式通知计委和经委的造反派头子：余秋里等人是要负责抓经济工作的，不准随便揪斗，有揭发材料可以送来；如果需要到机关接受群众批判时，要经过他批准并按规定时间回来。这样，周恩来既有了抓经济工作的助手，又保护了余秋里等人不被揪斗。我自1967年1月被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造反团”夺权后，除每天在秘书局打扫3层楼的卫生间，就在家看《毛泽东选集》。当时我住在国务院的一个小院里，离“小计委”办公室很近，我同老伴紫非曾几次和余秋里、谷牧在一起聊天。当中南海北门外红墙上贴着“揪出叛徒特务谷牧”的大标语时，谷牧同余秋里正轻松愉快地在吃中饭，并且对饮茅台酒。紫非能喝两杯就陪他们喝，我因不能喝酒就只吃菜。边喝边谈，谷牧说造反派说他在北平读大学时受过特务电台训练，会拍电报，是叛徒，真是无稽之谈。我是搞机要的，听了当然一笑置之。幸亏有周恩来的保护，他们才能过着这样安静的生活。

有一次，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余秋里、谷牧说：“你们可得帮我把握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农民不种田了，没粮食吃了，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当时北京人流量大，各地来京的红卫兵、造反派人数与日俱增。周恩来多次指示：不管怎么乱，北京不能停电、停水，国内外电讯不能断，铁路要正常运转。为此，他责令北京市政府（以后是革命委员会）一定要保证北京的供电供水，并指定电力局副局长李鹏负责电力供应。他指定邮电部副部长申光坐镇邮电大楼，团结全体职工保证国内外电讯畅通；指定铁道部副部长郭维城负责维持铁路运输。并当面同各部门造反派和两派红卫兵头子讲话不准揪斗他们，有揭发材料可直接送总理办公室处理，因而保障了首都的供电、供水、电讯联系和全国铁路的正常运转。李先念副总理当时兼任财政部部长。财政部的造反派串连财经学院的造反派要夺财政部的权。有一派则反对。周恩来将两派头头召集起来开会，会上，周恩来十分严肃地说：“毛主席讲，外交、财政大权属中央，谁也不能夺。对李先念的错误可以写材料送来，但是不能打倒，要保。”当时有个副部长想靠到造反派那边，周恩来发现他也在会场，便厉声责问：“你进来干什么，没叫你来嘛！”因开会的代表事前都写有名字的。周恩来说罢，立即叫来警卫，毫不客气地把这位副部长隔离起来。这样，对造反派也是一个教训，不准他们胡来。

有一天，财贸部门的“造反派”要夺金库。周恩来得知后立即加以制止。他的态度十分强硬，说：“夺金库就是犯法的，当场就要逮捕，”“如果你们去夺金库，那你们算造反派，还是强盗？”他将手一挥，斩钉截铁地说：“夺金库就开枪。”从此，造反派再不敢提这个事了。

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破坏，1966年8月以后，一些党政领导机关开始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无政府主义思潮抬头，少数工厂停工停产。为了扭转这种状况，特别是为了防止它向农村蔓延，保证十六条规定的抓革命促生产方针的贯彻执行，同年9月间，中央书记处书记陶铸根据中央常委办公会议的精神和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为中央起草了农村县以下暂不搞“文化大革命”，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的指示，由周总理定稿的《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于中旬发出，文中规定：“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布置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等。同年10月，陶铸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等一道，又提出农村县以下单位不搞“四大”、不搞串连等5条规定，经中央批准发出后，各级党委松了一口气。它维护了生产建设战线和城乡基层单位的相对稳定，制约了“革命”初期对生产的破坏性影响。但是它却遭到江青等人的反对。江青秉承林彪的旨意，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和文革小组会议上大发雷霆，狂妄地要陶铸下令取消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陶铸义正词严地告诉江青：“这是中央决定的，我没有这个权力！”江青妄图破坏生产的阴谋被揭穿了，她气急败坏，大吵大闹，强逼周恩来表态。周恩来坚决支持陶铸的意见，驳斥江青：“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全国红卫兵大串连风潮迭起。各地交通运输负担过重，导致交通的阻塞，客运量的急剧增加，不仅造成运输线异常紧张，而且由于挤占了货物运输的能力，使一些物资积压待运。11月初，上海的造反派王洪文等煽动群众攻击上海市委，10日，制造了沪宁铁路全线中断行车30个小时的“安亭事件”，各地运输紧张，物资积压的信息不断反映到总理办公室。据有关方面反映，仅铁路运输到1966年底估计有1000万吨物资运不出来，其中主要是煤炭、木材、水泥、钢材、建筑材料和食盐等，大部分是江南地区和内地建设需要的。攀枝花钢铁基地选矿厂工地，因物资运不进去，有4500工人只好停工学习，真正是只抓“革命”了。城乡汽车运输也普遍紧张，水运港口物资积压，上海港、广州港各积压14万吨。

周恩来忧心如焚，他当时最为焦虑的是：这场“革命”越闹越大，将会严重地破坏我国的生产力，从而产生比“大跃进”更为严重的后果。为了维护起码的铁路运输秩序，保证起码的生产建设物资运输任务的完成，他找了余秋里、谷牧等搞经济的负责同志，要他们多花些力量，精心编制铁路运输计划明细表。他多次指示：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首先，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须的货运力量，然后，安排好客运计划，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地以应付学生串连之需。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生产受到影响！

9月12日，周恩来亲自给谷牧打电话，让他整理一份铁路货运情况材料。10月上旬，中央作出新部署，决定10月再放手让学生串连1个月，要求谷牧等人按进出北京学生各150—170万人的盘子安排运力。

谷牧向周恩来叫苦说：“上海等地都来电告急，说交通运输很紧张，进出北京各150万人很难安排。”周恩来帮助出了个主意，说：“你可以搞上、中、下三个方案，把每个方案的安排办法和困难都写出来，由我报送常委讨

论决定。”周恩来同时担心地说：“多拉一些学生是有困难，但我更担心的铁路中断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中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在周恩来的指示与具体帮助下，谷牧与铁道部的负责人勉强搞出了运输学生 170 万、150 万、120 万 3 个方案，报送周恩来，使得学生串连的运输安排有个计划表。

从 1967 年 1 月上海造反派向上海市委夺权开始，全国各地迅速刮起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风，即所谓的“一月风暴”。1 月 10 日，江青、陈伯达妄加罪名，公开点了铁道部长吕正操的名，煽动群众批斗他。1 月 13 日，造反派召开了万人大会，把吕正操揪到工人体育馆。周恩来听说后，立即赶到现场，很气愤地对主持批斗会的人说：“你们不应该随便揪我的部长，吕正操即使工作中有错误，也应该让他戴罪立功。”然后，周恩来亲自把吕正操交给在会场的铁道兵战士，让他们安全护送吕正操回家，并一再对造反派说：“要保证吕正操的安全和工作、生活条件，不准进家揪人。”

但是，在江青、康生的煽动唆使下，个别打砸抢分子和受蒙蔽的群众，还是不断到吕正操家去揪斗他。不久，造反派就宣布吕正操“撤职留用”。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吕正操每天仍到调度室参加行车调度，继续为铁道运输这一重要任务尽力。

那段时间，周恩来每天都要看《铁路运输报表》，经常利用夜晚找吕正操等人到人民大会堂，了解铁路运输情况，安排具体工作，甚至要亲自决定哪列车进北京站、哪列车开出去。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亲手安排下，这个时期的铁路运输没有发生过重大的事故。周恩来则无可奈何地对造反派说：“现在是我替吕正操当部长了。”

到了 1967 年上半年，由于一些铁路沿线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使京广线长江以南，津浦路徐州、蚌埠地区，广西柳州、桂林、南宁，东北的长春、四平地区等许多路段被迫停止通车或断续通车；有些地区发生抢劫货车和军事物资事件；有些地区发生拆掉路轨、破坏水塔事件等。水运、公路运输也不能正常进行。大连曾有 8 条船被动，厦门港务局因派性斗争，海关无人检查，致使英国商船到来后无法靠岸，而该船有 3 个病号，吃喝均成问题。周恩来为此十分生气，他在给厦门军管会的电话中严厉地指出：“这种违犯国法、影响祖国名誉的行为，是极端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各个铁路局客、货车受阻的消息接连传来，周恩来十分担忧，他一面抓紧实施先行军管铁道、交通两部的具体方案，一面让谷牧等人研究起草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秩序的命令及军管铁道部、交通部的决定。

5 月 31 日，郑州、徐州、金华都同时发生铁路阻塞事件，仅徐州一处就停开货车 69 列。周恩来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于当日中午赶到毛泽东住处报告紧急情况，向毛泽东说明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的交通命脉，一旦中断，国民经济不可收拾，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的事情不可再拖。他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

当天下午，周恩来亲自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余秋里、谷牧、萧华、杨成武等人开会，传达了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并一起商定如下具体对策，（1）尽快公布关于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运输的命令；（2）将全国 18 个铁路管理局分给附近驻军实行军管包干，将沿海沿江轮船交给海军实行军管包干；（3）参加军管的军队人员均与当地军分区、武装部分开，不再介入地方支左工作，以便统一铁路、轮船运输的管理，免受干扰；（4）责成

总参负责拟定调动部队的实施计划，次日拿出方案。会后，周恩来就铁路轮船交通问题，专门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封信，将主席的意见、开会拟定的几条通知中央文革小组。

1967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对铁道部、交通部实行军事管制，并且从6月1日起，先后5次发布命令、通令和布告，还派了国防军担负护路任务。周恩来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果断采取措施，对铁道、交通两部实行军管，对铁路全线和沿海沿江航运实行军管包干，扭转了交通运输部门混乱的严重局势，对于挽救国民经济的危局起到积极的作用。

1967年夏，鞍钢武斗十分严重，造成许多炼钢炉停火，生产急剧下降。周恩来十分着急，决定派李富春亲赴鞍山解决问题。中央文革小组先是反对，后来又提出由他们派人一同前去。周恩来知道，这样一来，非把鞍钢搞得更乱不可，于是，他就采取“拖”几天的办法，说时机还不到，等几天再说。江青等人立即向周恩来发难，就这件事指责周恩来不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周恩来表示：“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靠什么来搞革命？”后来，他与辽宁协商，派军队对鞍钢实行了军管，稳住了鞍钢的生产。

发生在1966年冬季的工交座谈会，是“文革”初期经济战线上，周恩来、陶铸、谷牧、余秋里等人继刘少奇、邓小平之后，继续抵制在工交战线和农村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进行的又一场激烈、正义的斗争。

最初一次限制“文革”发动范围的斗争发生在1966年六七月间，当时，北京等大中城市青年学生首先起来“造反”，混乱现象迅速从学校扩及社会，全国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开始发生混乱。有鉴于此，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特地写信给在南方巡视的毛泽东，他们报告情况说：“最近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完成得不算好，特别是钢、钢材、煤的产量开始下降，质量下降的情况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建任务原计划上半年完成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现在只能完成百分之三十五六。”

刘少奇、邓小平认为：目前，文化教育方面，“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中央和省市领导必须用很大力量领导这方面的运动。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等基层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因此，在京同志讨论后，认为在“文化大革命”的布置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和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刘少奇、邓小平在这封信的末尾说：“这是一个重要决定，请主席考虑决定。拟了一个通知稿，请审核。”毛泽东于7月2日在刘少奇、邓小平的信件上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

7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7月22日，中央又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补充通知》。两个文件的下达，限制了“文革”开展的范围，保持了生产建设战线及城乡基层单位的相对稳定，制约了“文革”初期对生产建设的破坏性影响。

第二次斗争发生在9月间。当时由于刘少奇、邓小平已经失去了权力并相继受到日益严重的斗争，历史把新上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陶铸推上了斗争的前沿阵地，陶铸在周恩来的支持下，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抵制“中央文革”对工农业生产建设的第二次冲击。

9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大会上讲话时着重指出：“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的生活，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要求：“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进行革命串连。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的‘四清’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同日，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再发社论，紧急呼吁：生产是不能停下来的。

林彪、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一伙人是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踢开党委闹革命”浪翻的元凶。1966年10月，林彪关于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的批件发出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工厂、农村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这股狂风恶浪的席卷，大批工交企业领导瘫痪了。

周恩来十分焦虑，一再讲经济建设要尽可能设法进行，强调工交企业要业余闹革命。毛泽东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周恩来立即把它作为同林彪、江青一伙煽动“停产闹革命”进行斗争的武器。他亲自主持和修改了《人民日报》11月10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说：“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搞文化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

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早想把工厂农村搞乱。过去两个回合的斗争都没有奏效，他们决计要把这第三次时机抓住，为此采取了种种阴谋手段。陈伯达、王力等人起草了旨在取消党中央多次发出的对于工交企业和农村开展“文革”的限制性规定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

为了防止把工交企业和农村全盘搞乱，周恩来决定把陈伯达、王力起草的《十二条》草案拿到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国计划和工交工作会议上讨论。

11月16日，工交座谈会开始，参加座谈会的有5部（冶金、化工、水电、铁道、机械）、7市（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哈尔滨、武汉、广州）及各大区有关负责同志。座谈讨论是围绕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十二条（草案）》展开的。原定5天的会期被大大突破了，实际上开了20天。

与会者对“文化大革命”危及工矿忧心忡忡，对陈伯达一伙的稿子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别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问题提出反对意见。事后周恩来在谈到这次会议的情况时说：会议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十二条（草案）》“基本上是全盘否定”，“也反映出不满情绪”。当林彪问周恩来：“会上有几个通的？”他回答说：“我所接触的那些部长、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很不理解。”并且为他们开脱说：“他们这种思想，也不是孤立的，反映了客观上的思想动态。”

会议期间，在陶铸的支持下，余秋里、谷牧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草拟了一份与《十二条（草案）》有不同意见的修改稿，明确写上“17年来，工交战线上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这个总精神。除此之外，还对稿子作了一些增删合并，增加了以下3条实质性的内容：（1）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不能停产闹革命，只能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搞；（2）工人参加“文革”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3）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修改后的稿子，由原来《十二条》变成《十

五条》，第 15 条就是一句话：“此件精神也适用于财贸系统。”这是按照当时主管财贸口工作的姚依林的意见加上的，他一再对谷牧说：“你的列车上一定要多挂一个车皮，把财贸捎上。”

11 月 22 日，周恩来、陶铸、谷牧等中央领导向毛主席汇报了工交座谈会的情况。毛泽东指示：（1）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革”；（2）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3）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 12 月份发出；（4）原稿上把当权派划宽了，同意将“忘本、自私、压制群众”等几类人去掉的意见。毛泽东认为，《十五条》不行，可以另写，讨论出来看看，然后再拿到底下去。之后，陈伯达以原《十二条》为基础修改了《工业十条》草案，上报中央。

林彪、江青一伙从中央文革记者的快报中，早已了解到工交座谈会的动态，并做好压制和破坏的准备。12 月 4 日至 6 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谷牧关于工交座谈会情况的汇报和讨论通过陈伯达起草的《工业十条（草案）》。

谷牧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于会前认真准备了《汇报提纲》和意见。谷牧的汇报归纳了工交座谈会的意见，对工交系统的状况作了概括。他指出在工交系统“文革”的具体做法上，应该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到工交企业的三个特点，即：一、工交系统基本上执行了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二、工交系统的干部和职工队伍基本是好队伍；三、工交生产的连续性决定了生产不能中断。这一点同学校、文教系统，同各级领导机关，同各部、各省委情况不一样，“文革”的做法应当有所不同。

谷牧的汇报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有理有据，切中要害，为减轻“文革”对生产建设的破坏而不遗余力的精神溢于言表，这不仅忠实地反映了工交座谈会参加者的呼声，也表达了关心党和国家命运的广大干部群众的意志。

但是无情的历史已把党和国家拖进了是非颠倒的年月，事实败于诡辩已不足为奇。谷牧汇报后，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即以《汇报提纲》为靶子展开围攻批判。

江青恶狠狠地攻击工交战线的领导人“毫无阶级感情，给工人戴上几百斤重的石头，完全是反革命，搞了修正主义那一套玩艺儿”。张春桥则攻击《汇报提纲》中提到工交第一、二个特点“是站不往脚的”，看不到企业存在的两条路线斗争，“反映了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绪”。康生毫无根据地说：“工厂存在的问题不一定比学校存在的问题少”，“现在的工厂也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式的工厂”。王力等人还在 12 月 6 日的会上对陶铸发动突然袭击，指责陶铸以生产压革命。

12 月 6 日，会议主持者林彪对于工交座谈会及其《汇报提纲》作了彻底否定的总结讲话。他说：“这次工交座谈会开了 20 天，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并说：“把那个《汇报提纲》里面三大特点的头两点彻底打破，如果不打破那个东西，就无所谓工交战线上的文化大革命。”耐人寻味的是，林彪主持的这 3 天半会，周总理虽然参加，但在会议进行中很少说话。直到林彪作了长篇批判讲话后，他才讲了一番话，主要是谈过程，说谷牧等人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进展。周恩来的这些话，实际上是为谷牧等人开脱责任。

周恩来内心十分清楚，林彪的讲话，显然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在

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图。在判明了形势发展的趋势后，周恩来便努力把这场斗争引向退却。他对陶铸、谷牧等人语重心长地说：现在的形势是“工交欲罢不能”。“浪潮来了，要站在浪潮的头里，因势利导，顺势搞下去，就能领导，背着浪头会被浪头冲掉。”既然已经“挡不住，不如疏导”。他还说：“这个惩罚是我们过去造成的。我们不来承受谁承受？我们不来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来入虎穴谁入虎穴？没有一点精神准备不行，做好思想准备，领导好了，也不至于那么严重。”

陶铸、谷牧等一批领导同志在这次会上，迫不得已地作了“检查”。会议就在充满政治高压和不得已而为之的气氛下，正式通过《工业十条（草案）》。工交座谈会的斗争有其重要的意义。会议的参加者们在“文革”全面发动的险恶形势下，敢于从实际出发，提出与“左”的错误相对立的主张，它代表了党和人民在“文革”初期所进行的一次正义斗争。

周恩来在判明毛泽东的态度之后，适时地将斗争引向退却，竭尽全力保护了一批经济战线上的高级领导，使他们免遭更大迫害。能留下来与他一道支撑岌岌可危的经济运转。采取这种以退为进的斗争方法，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是完全必要的。

1967年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这一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是在1966年1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交工作会议上讨论拟定、并经周恩来审查同意后上报中央的。可是，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中央一直没有批准下达，整个经济工作处于无政府状态，1967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9.6%。

进入1968年，经济形势更加严峻，“文化大革命”恶性发展，正确的规章制度遭到批判，经济工作处于无计划、无政府状态，工农业生产水平迅速下降，1968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67年下降4.1%，交通运输量和基本建设都大幅度跌落。

这些情况使周恩来忧心如焚。如果说1967年还有一个不起多大作用的全国计划，那么1968年连制定计划的条件也不具备了。这一年无法召开计划会议，没有订出一个计划，是“一五”计划以来唯一没有国民经济年度计划的一年。

到了年底，周恩来考虑，如果下一年还没有一个国民经济计划，偌大的国家，经济如何运转？无论如何要搞出一个196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这是他为扭转经济工作无计划、无政府状态的一次重大努力。

在周恩来的亲自敦促下，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于12月初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国家计委、建委军管会的同志负责召集，参加会议的有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军管会的同志和群众组织的代表。但在会议期间，很少讨论计划问题，主要是搞什么大批判，直到会议结束，也没有订出个1969年的计划出来。

12月25日晚，周恩来亲自来到会场，接见会议代表。原来打算通过他接见，能把计划的盘子定下来。但接见一开始，一些地区的代表就要求本地区生产的物资少调出去，而却要求调入物资，争争吵吵，互不相让，直到26日凌晨也没谈出个结果。眼见这样谈下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于是他就站起来说：“今天是12月26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日，请大家吃一碗寿面，今天上午大家都要赶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好不好？”代表们十分高兴，齐声说“好！”

当夜，周恩来心里焦急，难以入睡。凌晨2点多钟，他接通了余秋里家

的电话，让余秋里尽快赶到他那儿。余秋里赶到时，已是凌晨3点了，周恩来疲惫至极，面带忧虑地对余秋里说：“今年只有5天了，明年的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 and 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这个计划怎么行呢？”周恩来忧虑的情绪使余秋里深感不安，他觉得有责任为总理分忧，便主动地说：“我找几个人先搞一个明年第一季度的计划，以便使工作有所安排。”周恩来说：“好，你赶快回去搞吧。”余秋里顾不上休息，立即找人安排、商量，很快搞出一个第一个季度计划安排方案，提出几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指标。周恩来审查同意立即报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很快批准了这个计划。这样，1969年一开头，总算有了一个可供遵循的计划。此后，在周恩来的多方努力下，1969年2月16日至3月24日，全国计划座谈会讨论了《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纲要（草稿）》，并把它确定为1969年计划的主要文件，让各地同志带回去，边执行，边讨论，边补充。《计划纲要（草稿）》是由临时成立的班子、在很短的时间内草拟的，许多准备工作做的不够。草稿提出5项主要任务，一是高质量地在全国保证毛主席著作的出版，大力发展广播事业，要求年内出版毛泽东选集1至4卷2000万部，《毛主席语录》和《最高指示》3亿册；二是大力发展农业，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持，用于农业钢材由前两年的83万吨增加到160万吨；三是大力加强国防工业、基础工业和内地建设；四是安排好轻工市场，继续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五是狠抓交通。

对于这个计划，周恩来曾提出许多修改意见，建议削减印刷毛泽东著作及《毛主席语录》的数量，以节约出原材料来增加市场急需的产品，批评了在制作毛主席像章上的浪费现象，责令物资部门收回批发用于制像章的5000吨铝。周恩来十分尖锐地批评这种浪费现象，说：语录已发行7亿多册，毛主席像章越做越大，已做了22亿个，有些人就是搞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作风，我们要的是勤俭之风。

周恩来还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放松了计划生育工作，结婚多了，孩子生多了等问题提出批评，强调要抓紧控制人口工作，要将这项任务郑重地写上计划。他还强调在编制计划时，要实事求是地确定生产指标，要估计到完成计划可能遇到的困难，要承认计划也有不够确切的地方，等等。然而，这些正确意见，在当时是不可能得到全面贯彻的。但他那种忧国忧民、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伟大精神，却深深地铭刻在我们心中。

1969年国民经济刚刚开始有新回升，周恩来就指示余秋里、顾明等人要抓紧研制第四个五年计划，以期早作准备，使全国经济走上正常轨道。他说：提“四五”计划的奋斗目标一走要考虑全面，不仅要考虑工业，而且要考虑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在方针任务的提法上，要与“三五”计划所提任务相衔接，明确写上：“初步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考虑到当时的具体情况，制定详细的“四五”计划条件还不具备，周恩来提出可以先搞一个计划纲要，以利指导经济发展和防止盲目性。

从1970年春天开始，在周恩来指导下，“四五”计划开始起草，8月份前提出一个“四五”计划纲要草案，于同年9月提交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由于林彪、陈伯达的干扰破坏，会上未能讨论，因而后来只能以中央名义作为参考文件下发全国各地。

机智、果断处理“九·一三事件”

1971年，在中国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这就是“九·一三事件”。林彪于9月13日凌晨，偷乘三叉戟飞机仓皇出逃，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1970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4月11日，林彪正式提出一个书面建议：在宪法上规定设国家主席，并别有用心地请毛泽东担任此职。没料到，第二天毛泽东就写了一个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当场给林彪泼了一瓢冷水。毛泽东曾3次提出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

毛泽东虽然一再明确表态，但林彪一伙实在是野心难捺。7月，叶群私下对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于是，他们暗地里积极活动，准备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大干一场。

8月23日至9月6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宣布会议的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讨论战备问题。这个议程是事先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的，林彪并没有提任何不同意见。可是，在开幕会上，他却突然发表长篇讲话。他大讲天才问题，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他不敢公开地再提出设立国家主席职务的建议，但却拐弯抹角地说：宪法草案中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是宪法的灵魂”等等。这些别有所图的话一出，他的党羽们立即倾巢而出。陈伯达指使华北组抢先发出第二号简报，赞扬林彪讲话“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并且强烈要求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副主席。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也按事先的预谋分别在各组宣讲陈伯达选编、经林彪审定的“称天才”的语录。在党中央全会上制造了一场罕见的思想大混乱。

毛泽东有着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很快识破林彪一伙的阴谋。8月25日，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周恩来连续找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责令他们向党中央做检查。8月31日，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揭穿了“称天才”的骗局。当时对林彪还采取保护态度，没有点林彪的名。但揭发批判陈伯达这件事本身，也就是沉重打击了林彪集团，宣告他们利用和平方式抢班夺权的阴谋失败。

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较量，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失败告终。但林彪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在庐山上就对吴法宪讲：“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他们转向采取以暴力方式抢班夺权，积极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杀害毛泽东，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1971年2月，林彪带着叶群和儿子林立果来到苏州一所别墅，开始秘密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

林立果1967年到空军时还不是党员，却由吴法宪安插在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任秘书。第二年，吴法宪自己作介绍人把林立果发展入党。第三年，即1969年，25岁的林立果就被吴法宪封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吴法宪还宣布把空军的一切指挥大权都交给林立果。空军广大指战员当时敢怒不敢言，但背地却流传一首打油诗以示心中愤怒。打油诗说：“一年兵、两年党、三年副部长、四年太上皇。”

林立果凭借他的地位与权势，很快便在空军里纠集了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等一伙死党组成一支为林彪效劳的别动队。美其名为“调研小组”。后来他们观看了日本影片《山本五十六》、《啊，海军》，林立果欣喜若狂地说：“我们也是联合舰队，我们也要有江田岛精神。”所谓“联合舰队”就此得名。

经过一阵密谋后，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纲领便制订出来了。它的代号是《“571”工程纪要》。“571”即武装起义的谐音。《纪要》分析了形势，规定了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认为B—52（指毛泽东）“对我们不放心”，“军事行动上要先发制人”，“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纪要》强调“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把毛泽东杀害。确定的谋杀手段是：“属于自投罗网式”——“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先斩爪牙，既成事实，迫B—52就范；“逼宫形式”——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一种武器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纪要》阴谋“借苏联力量钳制国内力量”。

此后，林彪一伙为准备反革命政变而进行的各种阴谋活动步步加紧，黑手已伸向毛泽东。

然而，具有丰富斗争经验、杰出的政治家毛泽东已察觉到林彪一伙的野心。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就开始了一系列逐步削弱林彪权力的计划。他先是在“批陈整风”运动中，陆续批了一些文件，在批语中严厉批评了军委办事组和叶群等人，称为“抛石头”，接着，实行“掺沙子”，派人参加军委办事组，打破林彪集团“一统天下”的局面。1970年12月，毛泽东又提议，让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华北会议。主要是揭发批判陈伯达在华北地区的一些活动和罪行，会上宣布改组了北京军区，调李德生来代替原北京军区领导人。

林彪等人闻风加快反革命步子，毛泽东、周恩来加快防范野心家的准备。

1971年8月16日，周恩来和纪登奎、张春桥、黄永胜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去北戴河，向林彪传达了党中央根据毛泽东提议作出的决定：国庆前后召开党的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中央的这个决定对林彪一伙是一个很大的震动。他们猜测，九届三中全会可能要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到四届人大时，林彪可能连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也当不成了。

8月14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从北京开出，跨过黄河、长江，向祖国南方驶去，开始了对南方的巡视。

毛泽东在南方巡视的途中与一些省、市和大军区的负责人谈了话。在这些谈话中，毛泽东反复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对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的活动，作了更尖锐的批评，毛泽东说：林彪一伙“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论，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并明确指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毛泽东还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并表示：“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

对毛泽东的南巡讲话，林彪一伙十分注意，千方百计打探消息，9月5日，李作鹏陪外宾到武汉，从武汉空军政委刘丰那里得知了毛泽东讲话的内容。他听后立即感觉到：（1）上纲更高；（2）庐山的问题还没有完；（3）

点了林彪的名。因此，十分紧张，他火急赶回北京，立即把毛泽东讲话的内容告诉黄永胜，并报告给在北戴河的叶群。几乎同时，林立果也从广州的党羽那里，获悉毛泽东的讲话内容。

本来林彪一伙明白，已经到了该摊牌的时候了。林彪、叶群、林立果在北戴河连夜进行紧张的密谋后，悍然决定对在南巡途中的毛泽东下毒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9月7日，林立果对他的特务武装“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9月8日，林彪下令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手令。

林立果立即飞回北京，进行策划和具体部署。他们准备在上海附近的一个小火车站动手，炸毁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真是“图穷匕首现”了。

南巡途中的毛泽东已经从很微小的现象中发现了问题。8月31日，毛泽东到南昌，在谈话中了解到吴法宪、周宇驰等人的一些反常活动，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9月3日，毛泽东的专列到杭州。通常毛泽东总是要在杭州住一段时间的，林彪一伙也是这样估计的，可是毛泽东此次南巡只在杭州住了一周，9月10日，他突然下令开车，10日下午6时，专列抵达上海，毛泽东在列车上接见了王洪文、王维国等人，谈笑风生，轻松自如。当晚毛泽东没去住宾馆，就睡在车上。11日上午，毛泽东接见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下午1时，毛泽东突然下令开车。在南京车站只停留15分钟，专列便风驰电掣昼夜兼程，直驶北京。快到丰台时，毛泽东突然下令停在丰台车站，并把北京部队和北京市负责人找来，在车上谈了两个多小时，尔后，专列驶进北京站。毛泽东终于平安返回北京中南海。

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的消息，像一声炸雷，把林彪一伙从武装政变的美梦中震醒过来。他们昼夜苦心策划的阴谋化为泡影。这帮家伙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林立果嚎陶大哭：“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我拿什么去见首长呀！”

林彪、叶群眼看谋害毛主席的阴谋彻底破产，决定带着黄、吴、李、邱“四大金刚”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以图日后“东山再起”。

9月12日晚，首都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里，灯火通明，周恩来正在主持一个会议。晚上10点30分，秘书走近他身旁，悄声报告：中央警卫局来电话，有紧急情况直报总理。周恩来立即起身拿起电话机，听对方报告。他浓眉紧蹙，当即向对方说：“告诉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情况，随时报告。”

随后周恩来当即给吴法宪、李作鹏打电话查问：“空军有一架三叉戟飞机飞到山海关机场是怎么回事？随飞机的有哪些人？”接着又告诉吴法宪：“要飞机马上飞回来，不准带任何人回北京。”

在周恩来已掌握了山海关机场确有一架三叉戟机的情况后，林彪、叶群也得知了周恩来在查问三叉戟机的事，他们顿时慌了手脚，为了掩盖他们南逃广州的阴谋，叶群故意于当晚11时20分左右打电话给周恩来，说：“林副主席想动一动。”周恩来问：“是空中动，还是地上动？”“空中动。”叶群答。周恩来又问：“你那里是否有飞机？”叶群对总理撒谎说：“还没有调飞机来。”

事实上，周恩来早已掌握的情况是：林彪的256号专机当时正停在山海关机场，而且几天以前他们还调去了一架伊尔—14，如果林彪、叶群心中没有鬼，为什么要撒谎说没有飞机？周恩来不愧为有着丰富政治斗争经验、有高度警惕性的革命家，他从叶群的电话中已判断出林彪心怀鬼胎，可能要跑。

山海关机场当时归海军管理，周恩来立刻打电话给李作鹏：“停在山海

关机场的 256 号专机不要动，要动的话，必须有我、黄永胜、吴法宪和你 4 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但是李作鹏给海军山海关机场下达的命令却将周恩来的指示改为：4 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

12 日晚上，北戴河警卫部队的电话，一个接一个传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办公室电话铃声不断，周恩来进进出出不知多少次，福建厅的会基本上没有开成。

由于周恩来高度警惕与采取了紧急措施，使得林彪一伙意识到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已经不可能实现，他们决定孤注一掷，改南逃为北叛，立即飞往苏联伊尔库茨克，投敌叛国。

9 月 13 日零时左右，周恩来接到北戴河 8341 部队电话报告说，林彪一伙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已乘车从北戴河逃往山海关机场，并开枪打伤了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周恩来得知情况十分严重后，立即从人民大会堂起身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得到毛泽东批准后，下达全国禁空令。同时派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到西郊机场“协助”（实为监视）吴法宪指挥、封锁全国的机场，不让任何飞机起飞。

13 日凌晨零点 32 分，汪东兴得到山海关机场打来的电话，说林彪乘坐的飞机从山海关强行起飞了。他又接到吴法宪电话，说林彪的飞机已进入内蒙古，请示主席要不要派歼击机拦截？他立即报告周总理，并一同向毛主席请示报告。毛主席对周恩来和汪东兴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去吧。”周恩来回到人民大会堂后即下令开动雷达，追踪这架三叉戟专机。又指示空军司令部调度指挥室的调度人员，用无线电向 256 号飞机呼叫，但飞机上却不作任何回答。他恳切真诚地说：请向 256 号飞机发出呼叫，希望他们飞回来，无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已经下定决心叛党叛国的林彪一伙，无视周恩来的一片诚意，拒不回答。飞机来了一个狡猾的动作，改变方向，往西飞往内蒙古西部，但到了西部上空，突然往北直飞。飞机越出国境，进入蒙古，从雷达的荧屏上消失了。这时已是 13 日凌晨 1 时 50 分。

当时周恩来尚未掌握林彪一伙的全部阴谋活动，不知他们还会干出些什么罪恶勾当。为了主席安全，以防万一，劝毛泽东到人民大会堂暂住。毛泽东要周恩来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随后，毛泽东乘车从中南海出来，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住下。

3 点多，政治局委员被紧急召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首先告诉他们，毛主席已经在 12 日傍晚回到北京，接着，向政治局委员讲了夜里发生的一切情况，说林彪坐飞机跑了。要大家做好应付万一出现的各种情况的准备。会上作了紧急战备部署，布置了保卫北京，保卫中央的工作。为了毛主席的安全与健康，周恩来请毛泽东休息，不参加这次政治局会议。

东方开始微露晨曦，大会堂东大厅内的灯光依旧通明。周恩来还在不知疲倦地操劳着。他已经一天一夜没合眼了，值班的服务员和秘书多次劝他暂时休息一下，他却严肃地说：“现在怎么能休息呢？”

9 月 13 日这一天，从一早开始，直到下午 3、4 点钟，周恩来亲自给各大军区和全国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要负责人一一打电话，向大家打招呼，布置任务，并随时把情况报告给毛泽东。一直忙到 9 月 14 日上午，他已经连续多少个小时没有休息了，在大家的劝阻下，才躺了下来。下午 2 时，

电话铃声又响了，外交部的符浩报告，刚接到驻蒙古大使馆的电话，要立刻报给总理。秘书在周恩来卧室徘徊，实在不忍心叫醒，最后还是轻轻地走到床边，叫醒了他。

周恩来听说是驻蒙古使馆打来了电话，连忙起来，当他听到林彪所乘的256号三叉戟机13日凌晨2点30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8男1女全部死亡时，高兴地连声说：“摔死了，摔死了。”并立即向主席报告了这大快人心的消息。

在处理林彪叛逃事件过程中，可以说周恩来是整个指挥的中心，他有条不紊地处理着每一件事情，不仅沉着、冷静、果断，而且十分细心。在百忙当中，他没有忘记在电话上告诉代外长姬鹏飞转告我驻蒙使馆的同志，感谢他们为了使国内尽快知道我一架飞机在蒙方失事，当机立断，启用封闭已两三年之久的专用电话，以最快速度报告国内。

驻蒙使馆使用专线电话一事是这样的。9月14日上午8时30分，驻蒙特命全权大使许文益接到蒙古外交部副部长的约见，得知我国一架飞机在蒙失事消息后，他决定要尽快把消息报告中央。然而，负责机要工作的同志却神色不安地报告说：蒙古电报局称，由于线路情况不好，特急电报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要4个小时后才能发出。当时，我驻蒙使馆内未设电台。情况紧急，许文益急中生智，想到了使馆原设的专线电话。

50年代中苏关系好的时候，北京——莫斯科之间架设了一条高频专线电话。但需经苏军在蒙的高频通讯接转，在我驻蒙大使馆内也架一个电话机。自6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恶化，中蒙关系变冷，特别是苏军进驻蒙古，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后，接国内指示停止使用这条专线。

由于当时情况十分紧急，许文益决定承担风险，在来不及请示国内的情况下，启用此专线电话。在紧急而重要任务面前，使馆同志团结一致，立即行动，终于接通了专线电话，于当日（即14日）中午12时20分向外交部报回了飞机失事事件。

周恩来对驻蒙使馆负责人在情况紧急时，不拘泥于原来的规定，大胆启用专线电话的作法，表示满意。

周恩来是党中央领导层中的主要人物，有着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并严格遵守保密原则。这在处理“九·一三事件”中可以看林彪逃跑后，周恩来立即给各大军区打电话，回话最快的是许世友，他在电话中向周恩来保证：“报告总理，我已下令占领南京的全部机场，请总理放心。”

第二个表态的是心虚的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丁盛不知道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打电话到总理办公室，那天正好是纪东值班，纪东接完电话后，打电话给在人民大会堂跟着总理的警卫高振普说：“不知怎么搞的，丁盛在电话上说，我无限忠于毛主席闹革命。”高振普将纪东的电话报告周恩来，周恩来第一个反应就是，纪东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他当即让高振普通知纪东搬到人民大会堂住，以防消息外漏。

林彪叛逃的消息，周恩来严格保密，连邓大姐也不让她知道。在人民大会堂处理“九·一三事件”期间，邓大姐几次挂电话来问，为什么没有回去，他都不让告诉她林彪叛逃的事。邓大姐很担心他的身体，多次挂电话询问是否吃饭，是否睡觉，还让秘书注意提醒他上厕所，不要忙起来就憋尿，搞垮了身体。说到憋尿的事，是有过教训的。1961年，我国正遇到粮食困难时期，为了保证干部不害浮肿病，周恩来决定从东北调一批大豆给中央机关司局级

以上干部补充营养，因而减少了大豆的出口。当时一个东德的代表团团长同周总理谈判，硬要增加对他们多出口大豆，经总理反复解释他们仍坚持多要，双方争论很久，总理憋着尿耐心说服了他们，但因憋得太久，引起了尿中毒，邓大姐怕又出事，因而特别提到此事。

周恩来做事十分严谨，林彪叛逃后，他曾亲自打电话叫铁道部的刘向权到大会堂来。因为电话不是高振普打的，所以高振普不知道刘向权是总理约来的，便对刘说要去请示总理后才可进去。当时周恩来正在新疆厅里开会，高振普在门边报告：总理，刘向权来找您。周恩来出来后。马上批评高振普：“不会动点脑筋吗？就说有电话找我。”高振普这才明白，周恩来是不想让新疆厅里开会的人知道，来找他的是某某人，其目的也是为了稳妥地、万无一失地处理好“九·一三事件”。

在“九·一三事件”中，周恩来立了大功。如同陈云同志所说：“如果没有周总理，‘文化大革命’不知怎么样，如果没有周总理，我们的党和国家不知怎么样。”周恩来在事件中表现出的高度的党性原则，高超的斗争艺术，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忘我的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批判极左思潮，解放干部

1971年9月发生的林彪叛国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林彪自我爆炸之后，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自己的失误，调整了某些政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71年10月上旬，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同意撤销军委办事组，由叶剑英召开军委办公会议，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经过“九·一三事件”，毛泽东对周恩来更加信赖了。

周恩来痛切地感到林彪虽然自我爆炸了，但其赖以兴风作浪、祸国殃民的极左思潮并没有随之消失，仍旧充斥着各个领域，严重地阻碍着把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的困境中摆脱出来。极左思潮一天不除，国难就一天未已。基于这种认识，周总理决定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集中批判极左思潮，从这里入手，全面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推动各项工作的展开。

实际上周恩来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同极左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67年他就反对过极左思潮，1968年，他也提过极左思潮一定要批判。1970年6月，他指出：“防保守、批极左，仍是当前主要任务。”9月，他针对出版工作中存在的极左偏差，提出不能割断历史，不能“因人废文”，指出“任何思想的发展都不是无根的，新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1971年4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他针对存在的问题着重讲了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他批评了“破坏纪律，无政府主义泛滥，只有自由，没有集中，为所欲为”。他说：自由主义是右的，但形式上是以极左出现的。否定一切，这也是极左思潮。

周恩来在林彪叛国事件前与极左思潮所进行的斗争，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不可能充分地展开。那个时候，更多地体现在他独撑危局，力挽狂澜的努力之中。“九一·三事件”后，历史赋予周恩来新的契机，出于对人民和历史负责的政治责任感，周恩来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这面旗帜，以极大努力医治“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各个方面的生活所造成的创伤。这一努力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一、平反部分冤假错案，解放一大批领导干部。

为了扫除极左思潮这一障碍，从全局上推动解放干部工作的进行。1972年4月，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社起草一篇从正面阐述党在干部问题上的历来政策和优良传统的社论，并亲自审阅了这篇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干部还是老中青，老的都靠边站，都是年轻的，不行”。

这篇社论在当时的影响很大，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干部工作的进行。

在那段时间，周恩来常常利用各种活动，通过在《人民日报》发表参加人员名单的办法，为老干部恢复名誉，解放了一批又一批干部。

“文革”期间，谢觉哉被“四人帮”残酷迫害，于1971年6月15日去世。通常像他这样地位的人去世，报上总会刊登一则醒目的讣告。他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内务部长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然而，“四人帮”和他们的顾问康生却规定，不准发讣告、不准吊唁、不准送花圈和开追悼会。至于葬礼，他们说是“四旧”必须废除。但是，周恩来取消了他们这些规定，

为谢老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在《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表示对这位老一辈革命家的悼念。

1972年9月1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病逝。何香凝是国民党元老，她和丈夫廖仲恺追随孙中山革命，一直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与中国共产党长期亲密合作，在国内外有很大的影响。周恩来对何香凝的丧事很重视，他特别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委和人大政协办公厅，要多组织何香凝的生前好友去八宝山参加追悼会，以扩大政治影响，实际上也是利用这个机会多让一些老同志出来，以便在《人民日报》上亮相，宣布解放。

我是1967年1月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时被戚本禹直接指挥的中办的造反派（戚的老婆在内）夺权的。经过两年的监督劳动和隔离审查后，于1969年1月到江西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当“猪倌”两年又10个月，中办负责人宣布我“问题已经查清楚”，恢复党的生活。可是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不让我回北京工作，而以中央决定名义，把我调到南昌齿轮厂去当革委会副主任。既是中央决定，我当然绝对服从。学校即把我的组织关系和户口转到工厂。我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把我的妻子紫非（原在全国政协工作，下放湖北五七干校劳动）调在一起工作，以便互相照顾（当时我已57岁，她有冠心病）；二是两人一同回北京搬家、检查身体。得到批准后我和紫非于1971年12月回北京，临时住在东城魏家胡同。检查身体后即行清理行李准备搬家。1972年9月1日上午，中央统战部原副秘书长李金德（是周恩来指示统战系统军管组组长刘友法结合的老干部）到东城魏家胡同我宿舍来，说何香凝老太太已在北京医院病故，要我同他一起去北京医院，并准备参加追悼会。我即跟李到北京医院向何老太太遗体告别，并向廖承志、经普椿、廖梦醒等同志慰问。这是我被夺权后的第一次政治性活动。参加追悼后，我的名字和许多老同志一起登在《人民日报》上，中央统战部和其他一些同志看到后，都为我解放而高兴，当然我内心要感谢周恩来利用这个机会把我解放出来。

我本来准备在4月即去南昌的，后来中央组织部军代表郭玉峰通知我等一等。我不知什么原因，仍同紫非去向周总理和邓大姐辞行，他们对我去南昌未置可否，一直等到1973年8月，中央组织部才通知我不去南昌了，中央决定我回中央统战部工作，参加以军代表刘友法、李金德和我组成的3人小组，领导统战系统的业务和批林批孔运动。有些同志告诉我，把我留在北京回统战部工作，是周恩来的指示，我当然不好去问周恩来，但我相信这是真实的。叶帅也不同意我去南昌，这是后来证实了的。叶帅的女儿告诉我，她有一次到魏家胡同来看我，劝我不要去南昌，是叶帅的意思，但她当时没有说出来。我也要感谢叶帅的关心。

197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按惯例，国务院要在9月30日晚于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周恩来充分利用这次招待会的时机，使得一批长期关押的老干部释放出来恢复名誉。他认真细致地翻看两千多个见报的名单，及时地补进了一些享有一定声誉的老同志。如萧华、刘志坚、齐燕铭、薛子正等，都是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文革”一开始就隔离审查，至1974年国庆前夕仍未解放。还有一些久不见报的人如爱国人士张学铭（张学良胞弟，全国政协委员），相声大师侯宝林等，都是在总理的关照下写进出席国庆招待会名单，从此恢复了名誉。其中有些人是国庆招待会

前的一天，才得到通知，从监狱里出来的，一出来立即换衣服、理发、剃胡子，但都很消瘦，国庆招待会上互相见面，都很高兴，但同时不免心酸。

周恩来在解放干部中的最大贡献是用各种办法保护邓小平的安全和健康，在时机到来时，果断和及时向毛泽东建议，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建立第二代核心领导人，为中国能有改革开放的今天创造了先决条件，真可谓功德无量！邓小平是1969年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劳动，当时，周恩来就亲自给江西省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打电话（因负责人程世清外出），要他们立即转告程世清加以照顾。正如邓小平在那里劳动的工厂负责人罗明所说：“保护邓小平绝对安全的问题，是周总理指示的，我们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总理的指示。”

1972年1月，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他对陈毅夫人张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而且表示，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毛泽东还说，邓小平与刘少奇不一样，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听后内心十分高兴，他立即暗示陈毅的子女想办法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传给邓小平。

这年8月3日，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希望能出来工作。14日，毛泽东阅后批转周恩来，毛泽东说：“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毛泽东还列举了邓小平历史上的功绩。周恩来立即把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印若干份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15日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这一批示，同时以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立即解除对邓小平的监督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作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并指示将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回到邓小平身边帮助工作。

这年的12月18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提议，写信给纪登奎、汪东兴，让他们考虑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还约他们面谈这件事。之后，纪登奎、汪东兴根据谈话精神，写了一封建议信提出邓小平仍任副总理。周恩来看了之后，又取得毛泽东的同意，终于在1973年3月1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3月28日，周恩来、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次日，周恩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那里开会。之后他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邓小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遇有重要政策问题，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1973年4月13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西哈努克亲王时，请邓小平一同去作陪。当邓小平和周恩来并肩步入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时，首都各报和电视台记者围了过来，拍下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第二天见报时，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现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上。

此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赞誉之词和倚重之举次第而出。1973年12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一届二中全会追认；同时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同月，毛泽东接受邓小平的建议，采取8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重大措施。这样重大的决策，毛泽东居然采纳邓小平的建议，说明邓小平在毛泽东心中的位置举足轻重。到了1974年10月14日，事态更明显了，毛泽东正式向当时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王洪文提出，建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一建议见诸王洪文的亲笔记录，通过张玉凤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还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1975年1月5日，根据毛泽东建

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1月上旬召开的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得到追认，并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毛泽东对邓小平重新委以重任，与周恩来不失时机地向毛泽东进言有着密切的关系。

1972年12月，毛泽东问到谭震林的情况后，周恩来立即写信给有关负责人，说谭震林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由于林彪、江青等人在文革中的煽动，致使许多老干部在被批斗过程中身心受到摧残，健康状况甚差，1972年4月，周总理抓住陈正人、曾山两位部长发生心脏病因无处就医，救治不力而相继去世一事，指示卫生部一定要尽快恢复对老干部的体检和医疗制度，并亲自作布置。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卫生部组织北京10大医院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对近500名副部长以上的同志作了体检。其中有不少老同志是从外地五七干校赶回来体检的，并在这个名义下获得解放，安排了工作。此外，不少老同志还在周恩来的亲自干预下，获得了自由，住院检查身体，并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如李葆华的妻子田映萱在1972年冬天写信给周恩来，反映仍在囚禁之中的李葆华身体很不好。这封信经胡耀邦、王震辗转送至。周恩来亲自给当时安徽省革委会负责人打电话，责令其立即将李放出来住院检查身体，3天后又再次打电话催问落实情况。在周恩来的关心下，李葆华获释，不久调任贵州省委第二书记。

全国政协副主席、前文化部长沈雁冰（茅盾），是著名的进步作家，“文革”中也因“反革命”嫌疑被拘捕入狱，专案组又不及时审查，不得解放。1973年筹备四届人大期间，我曾向有关负责人打听究竟是什么问题，均不得要领。我就当面报告周恩来，引起他的注意，他要我向公安部军管组负责人施义之调查，要他们迅速审查结案。经公安部反复审查，是一起错案，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同沈雁冰同名，加以沈过去曾是党员，脱过党，就认为他有“反革命嫌疑”，经康生、陈伯达乱加罪名逮捕的。查清后，周恩来立即报中央批准予以释放，并给予参加政治活动机会，在《人民日报》见报后恢复了名誉。

贺龙是周恩来尽了最大力量保护而没有保住被林彪一伙陷害含冤而死的。周恩来一直耿耿于怀。为了给贺龙平反和恢复名誉，他在重病时亲自调出专案组材料审查。关于“篡夺军权”和“二月兵变”两项，事实早已证明根本没有此事，唯有“通敌”一事，在专案组材料中还保存了一件外调人员逼迫民主人士、国务院参事李仲公写的一个证明材料。李仲公承认，他知道1933年蒋介石派了熊贡卿到洪湖地区去策反贺龙，但他不知道结果如何。林彪一伙就把李仲公和他的材料作为贺龙“通敌”的人证物证。当时李仲公已因年老去世，周恩来指定我和公安部副部长施义之（原军代表）找李仲公的弟弟李侠公（民主人士，在贵州工作，全国政协委员）了解贺龙专案组逼迫李仲公写材料的经过。李侠公说，他的哥哥李仲公曾同他说，当时穿上军衣的专案组人员，曾要挟他写贺龙已同意“投向蒋介石”的证明，他没有写。我同施义之将调查结果报告周恩来后，他就写信向毛泽东报告，认为应该为贺龙彻底平反，公开恢复名誉，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于1974年9月29日向全党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为贺龙彻底平反。

停止追查“5·16反革命组织”一事，也是周恩来的果断决定。“文化大革命”中，北京有极少数单位中的极少数人以“5·16”为组织名称。印发、

张贴传单和大字报，诬蔑、攻击周恩来。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清查之机，镇压迫害对他们不满的干部和群众，使数以百万计的人蒙冤。一时曾搞得人心惶惶。周恩来发现后，即在政治局和文革小组会议上提出加以制止，使所谓“清查‘5·16’反革命组织”行动停止下来。

在解放干部问题上，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百般阻挠，这一工作步履维艰，远未达到预期目的。1973年春天，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大量便血，需要动手术。手术前，他专门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提出先易后难的方案，送政治局讨论。中央组织部提出一个300多人的名单后，周恩来抱病连续主持政治局开会讨论。江青、张春桥等人百般阻挠，设置种种障碍，从中作梗。为此，叶剑英愤然做了一首“过桥”的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诗中不仅表达了对江青等人阻挠解放干部的愤慨，更表达了对牵骡人周恩来的敬佩与感谢之情。

二、整顿企业扭转国民经济局面。

“文化大革命”中，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林彪事件之后，这一灾难性的后果充分地显示出来了。同时，由于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经济工作的许多问题是非颠倒，被搞得混乱不堪，抓生产被指责为“唯生产力论”，抓业务被指责为“冲击政治”，抓企业管理被说成是“管卡压”，抓盈利被攻击为“利润挂帅”，讲按劳分配被攻击为“物质刺激”，等等。很显然，不批判极左思潮，就难以扭转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局面。

周恩来从1971年底开始，在相继召开的一系列全国性的专业会议上始终坚持通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来消除林彪一伙对经济工作的破坏性后果。他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受林彪鼓吹的“突出政治”的影响而不敢抓生产、抓业务的倾向，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极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他论述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强调“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提出“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是要挂在业务上”，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

针对当时工矿企业管理混乱，无章可循，纪律松弛，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的状况，周恩来于71年12月提出：要认真整顿，加强企业管理，恢复和健全被极左思潮砸烂的各种规章制度。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国务院主持起草了《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规定各级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经济核算制度等7项制度和品种、质量、劳动生产率、利润等7项指标。这个会议纪要，周恩来主持定稿后，国务院建议提请中央批转下发，但是，由于张春桥作梗未能发出去。

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把工业产品质量放在议事日程上加以解决。1971年12月15日，周恩来对援外装配的“歼六”飞机质量不合格问题作了严肃的批评，他指出：“歼六40架，原说是为援外装配的。一经检查，便有7架不能交付，占全数17.5%。只此一端，就可以看出我们飞机生产质量下降到什么程度，还不够我们提起警惕么！”他和叶剑英亲自抓了军用飞机的质量问题。接着，1972年1月21日；周恩来对援外汽车质量问题作了指示：“请秋里像剑英同志一样，把长汽、二汽、京汽、南汽抓一抓。质量这样下降，如何援外。”在同年的四五月间，周恩来连续抓了罐头、衬衣、照相机部分产品的质量，狠抓了对外贸易交流会展品的质量问题，从抓产品质量入

手，推动了许多企业恢复和加强质量管理。

1973年，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工作时指出：“1969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给炸了。应把九大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一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此后，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这个文件拿到这年全国计划会议讨论时，除了“四人帮”把持的上海市外，其余28个省、市、自治区都表示赞成。

在企业整顿取得一定成效后，周恩来又立即转入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基本战线过长的问题。由于林彪等人对国际形势错误的估计，在计划安排中一再宣扬“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他们不顾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要求，盲目大上军工项目，不断扩大基本建设规模。1971年出现了“三个突破”，即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总额突破300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800亿斤。

“三个突破”是周恩来首先发现的。1972年初，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一系列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但是，到了1972年底，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切实解决，这年年底，职工人数达到5610万人，工资总数达到340亿元，粮食销售量达到927亿斤，出现了粮食周转困难的状况。1973年2月，周恩来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后，生气地说：“确实没有‘王法’了。”“不只三个突破，货币发行也突破了。”“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你们管财政、银行的也不叫，要随时提醒，这是个寒暑表嘛！”

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国务院采取了坚决的措施：首先，控制基建规模的扩大，减少基建投资，同时压缩基建占用民工人数，增加农业财政和支农工业投资，1973年比上年增长19%。第二，加强劳动工资的集中统一管理，重申劳动工资大权在中央。第三，积极解决粮食购销差额问题。1972年11月24日，国务院向中共中央写了粮食问题的报告，并转报了商业部的报告，内容是发展粮食生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控制职工人数和吃商品粮人数等。中央在12月10日批转了这两个报告，要各地执行。经过1972、1973两年的努力，“突破”问题得到解决。

周恩来还十分注意农村方面的纠“左”。1971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当时农村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普遍存在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状况，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管理办法；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批判；规定了有利于集体生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分配兑现的一些具体政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三、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

极左思潮的破坏，使得社会主义文艺园地一片凋零，从青年时代就十分爱好文艺的周恩来对此深感痛心。林彪事件之后，他多次指出：“极左思潮不肃清，艺术质量不能提高。”并提出了“革命激情要和革命抒情结合”的原则，针对当时只有几个“样板戏”的单调局面，周恩来大声疾呼：“现在要提倡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百花齐放。”周恩来的这些话，在今天看来，也

许平常常，但在当时却给正在彷徨思索无计可施的文艺工作者以极大的鼓舞，为他们指明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

教育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的破坏。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学生无心读书，学校秩序十分混乱，教学质量严重下降。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周恩来于1972年9月会见李政道博士时提出：“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对升学制度提出的富有胆识的主张，是恢复我国大学招生制度的先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不胫而走，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后来尽管由于形势变化未能实行，但在实际工作中对于排除极左思潮的干扰起了很好的作用。

对于科研工作，周恩来在长期领导国家建设的实践中，曾多次阐述这一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在“文化大革命”中，科研工作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加大了本来与世界先进水平正在缩小的距离。1972年7月，周恩来在会见杨振宁博士时，对于杨振宁提出的我国应加强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的建议，表示赞同。不久，他对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说：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这是我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就要扫除，有什么障碍就要拔掉。9月，他写信给张文裕、朱光亚，强调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和科学实践结合起来，这件事不能再迟了。随后，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召开“文革”以后第一次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了加强科学研究，努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号召。但张春桥却说“会议的大方向有问题”，是“右倾回潮”，并要追后台。周总理与张春桥进行了斗争，坚持不让在会议纪要中写入“黑线专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科技战线免遭教育战线那样的破坏。

周恩来在各个领域里批判极左思潮所做出的努力，引起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极大恐慌。从1972年9月下旬起，批“左”与反批“左”的斗争日趋尖锐。这场斗争的实质在于，是尽快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把党和国家从这场危机和困境中摆脱出来，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还是延续以至加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继续制造动乱，祸国殃民。虽然批判极左思潮这一过程后来被打断了。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周恩来所代表的历史前进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改变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

顶往来自苏联的压力

1956年初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所犯的错误，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对此，毛泽东和我党中央深感痛心和担心，并在内部对他提出善意的批评，希望他改正错误。赫鲁晓夫则是我行我素，中苏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一年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多事之秋。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后，在苏共党内、苏联国内以及各兄弟国家中，引起了思想混乱。10月，先后发生了波兰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苏联的坦克开进了华沙和布达佩斯。波匈事件的爆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和对兄弟党的颐指气使的老子党作风酿成的。赫鲁晓夫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为了摆脱危机，他想请中国共产党和世界著名的大外交家周恩来助他一臂之力。11月，赫鲁晓夫指示苏联驻华大使尤金邀请周恩来访问苏联。

这个时候，波兰、匈牙利等国出于他们的需要，也向周恩来提出邀请。匈牙利甚至这样说：只要周恩来接受邀请，哪怕只停留1天，也是对我们的莫大支持。

原来周恩来已计划访问阿富汗和尼泊尔等国，但从维护苏共党内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团结这个大局出发，周恩来决定推迟对阿富汗、尼泊尔等国的访问，先访问苏联、波兰和匈牙利。

出发之前，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话，指出：“只要苏共领导内部稳定，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但还是要好好地批评赫鲁晓夫一阵。”周恩来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

1957年1月7日，周恩来在贺龙、王稼祥等人陪同下，乘专机到达莫斯科。

由于赫鲁晓夫有所求，对周恩来这次来访显得格外亲热。在一次小型宴会上，赫鲁晓夫悄悄地对周恩来说：“我请刘晓大使转告你们党中央，你们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我们《真理报》已全文刊登，还将印发50万册单行本。”周恩来没有作出什么表示，他知道赫鲁晓夫的用意所在。

会谈开始后，周恩来坦率地批评赫鲁晓夫在处理斯大林问题上的错误，阐明了中共对斯大林的态度。他指出：斯大林是犯过错误，但他并不是总犯错误，评价斯大林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态度，不能抛开具体的历史背景去孤立地评价一个人。斯大林一生的功过，我们认为三七开，功绩是主要的。不能全盘否定斯大林。

这些话打中了赫鲁晓夫的痛处，他是不爱听的，但也得耐着性子听。在座的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等苏共领导，却很受感动。

周恩来把话题引到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态度上。他说：维护兄弟党的团结，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大国主义，特别是各国各党的内部事务，应由他们自己去处理，有意见可以商量，不能搞外部压力，干涉兄弟国家内政。赫鲁晓夫同志，在波兰问题上，你们处理得不够好。我们认为波兰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波兰完全有能力自己解决。我们不赞成派苏联军队进驻波兰。周恩来真诚和善意的批评，赫鲁晓夫听后按捺不住了。他不顾外交礼节，粗暴地破口大骂起东欧兄弟国家的领导人，甚至他们的夫人，说他们要了苏联

的金子，还要骂苏联，同西方勾勾搭搭，是“狗屎”、“坏蛋”、“像驴一样”。周恩来当即严肃地忠告说：“赫鲁晓夫同志，对兄弟党的领导人不能这样，有什么话当面讲，不能在背后随便怀疑别人，这不利于兄弟党的团结。”赫鲁晓夫暴跳如雷，完全不顾自己的身份，瞪起眼睛对着周恩来耍起无赖：“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无论如何，我出身工人阶级，而你是资产阶级出身。”

周恩来表情严肃而又巧妙地回敬了一句：“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你我共有共同的地方，我们都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

尽管双方争吵了起来，周恩来却不想把事情搞僵，因为他此行的目的不是争吵，而是诚心帮助赫鲁晓夫认识和改正错误，所以他还是通过各种场合对赫鲁晓夫进行耐心的规劝。

1月18日，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前往阿富汗进行友好访问。赫鲁晓夫、米高扬、布尔加宁送行。在前往机场的路上，周恩来劝赫鲁晓夫要拿起马克思主义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他说：“斯大林的部分错误，你们也有责任嘛！你说肃反扩大化了，你们每一级都有3人小组。赫鲁晓夫同志，你那时是乌克兰第一书记，你管这个事嘛！你怎么能只责备斯大林，而不作自我批评呢？为什么当时你们对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不提出意见呢？可见当时你们也是觉得斯大林对，你们自己也做得对。现在你们觉得错了，自己也应该作自我批评。不要只批评死人，这就不公道了嘛！”

米高扬坦率地说：“如果当时我们反对斯大林，除非把斯大林捉起来。”赫鲁晓夫捅了捅米高扬一下，瞪了眼对米高扬说：“你胡说，我们当时要是反对斯大林，是我们被捉起来，不是你捉了他。”

赫鲁晓夫又对周恩来说：“你们那里的党好办。”

周恩来说：“我们犯了错误可以自我批评，我就犯过路线错误，经过自我批评，还是一样可以得到大家的谅解，让我在工作中学习锻炼。你们为什么不可以呢？都是马列主义政党嘛！”

赫鲁晓夫说：“你们那个党可以自我批评，我要是这样搞就垮台了。我年龄大了，快70岁了。还有几年呀！还容许我作自我批评？”赫鲁晓夫有点无可奈何的样子，周恩来沉默不语。

尽管周恩来在莫斯科的几天中，苦口婆心，一片至诚，赫鲁晓夫却毫无悔改之意。更有甚者，后来他以为自己已经站稳脚跟，居然又向中国搞起大国主义，企图控制中国。

1958年4月，苏联提出在我国共同建设长波电台，归两国所有，由两国共同使用。同年7月，又提出苏联在远东没有不冻港，要和我国建立联合舰队，使用中国港口。这都是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毛泽东对此大为震怒，把赫鲁晓夫这些主意一一顶了回去，周恩来完全支持毛泽东的态度。

赫鲁晓夫并不死心。这年9月，他在度假地克里米亚的雅尔塔，突然召见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对刘晓说：“美国插手台湾海峡，使台湾海峡局势骤然紧张，苏联政府不能坐视不管，应当帮助中国应付这一紧张局势。美蒋的优势主要是在空军和海军方面，我们认为应该在空军方面加强这一地区的力量，以便对美蒋的海军起到威慑的作用。”

刘晓仔细倾听，没有作出反映。

赫鲁晓夫亮出了底牌：“如果中国政府认为需要而提出要求的话，苏联可派一批带有导弹的图—16轰炸机到中国，并配备苏联的飞行员，可惜用中国的领海、领空，给侵略者以致命打击。”赫鲁晓夫要刘晓把这一建议转告

中国政府。

刘晓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将赫鲁晓夫的谈话电告毛泽东和周恩来。

这又是一个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周恩来对赫鲁晓夫的行径深为震怒。但他不是采取简单地顶回去的做法，而是以攻为守。图—16 轰炸机战术性能比较先进，最大时速可达 920 公里，带 9 吨炸弹可连续飞行 7 小时 20 分钟，是苏联用以对付北大西洋公约成员国威慑的一种重要武器。中国一直想搞自己的图—16 轰炸机，并向苏联提出过技术援助的要求，但苏联迟迟不给有关资料。这次赫鲁晓夫提出这件事，正好可以顺水推舟，向苏联要资料。

周恩来指示外交部给赫鲁晓夫回电，大意是：我们非常感谢你的好意。我们觉得，目前整个斗争的形势不宜于这样做。因为我们目前没有使用轰炸机出海作战的意图。同时，美国也在尽力约束蒋介石的空军，不许他们轰炸大陆。这样，就使图—16 轰炸机没有作战的机会。相反，由于苏联空军在中国的突然出现，可能会使情况复杂起来。为了更有效地加强我国空军的作战力量，根据你的建议，我们准备提前进行图—16 轰炸机的试制生产，希望贵国能提供技术资料 and 样机，并派技术专家来华援助。

中国政府等待着苏联的答复。

10 月 30 日，赫鲁晓夫给周恩来发来一封复电：苏联政府原则同意你的要求，提前供给图—16 飞机技术资料和样机。1958 年 11 月开始提供技术资料；作为样机，可供你们最近出厂的、在部队中使用的两架图—16 飞机，可以派遣一定数量的专家去中国，可以供应目前中国还不能生产的某些部件、锻件、模压件和半成品。

11 月 10 日，周恩来派出一个 22 人组成的工作组前往莫斯科谈判图—16 飞机的技术引进问题。经过谈判，中苏两国政府签定了—个协议书，规定苏联负责提供图—16 轰炸机的全套技术资料 1342 项。为此，中国政府付给了苏联 8200 万卢布。没有想到，这是赫鲁晓夫布置的一个骗局，苏联提供的技术资料仅占协议规定的 37%，而且就是这套残缺不全的资料，也是他们早已淘汰了的。

8200 万卢布无异打水漂。赫鲁晓夫竟是这样玩弄“兄弟国家”。

1959 年，中苏关系迅速恶化，除了意识形态分歧以外，国家关系也紧张起来，赫鲁晓夫总是挥舞着他的指挥棒，要中国按他的旨意行事，毛泽东、周恩来多次把他顶回去。

这年 9 月底，赫鲁晓夫从美国戴维营同艾森豪威尔会晤后来到北京，名义上是参加中国建国 10 周年庆典，实际上是来吵架的。

5 天的会谈，都以尖锐的言辞争吵着。

赫鲁晓夫为美国做说客，要中国释放两名美国飞行员。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这是不能商量的。”

赫鲁晓夫指责中共炮击金门没有同他们打招呼。陈毅据实驳斥：“你问葛罗米柯，我是不是通知你们了。”葛罗米柯哑口无言。

当时印度总理尼赫鲁收留叛逃的达赖喇嘛并挑起中印边界冲突。赫鲁晓夫偏袒尼赫鲁，指责中国与印度发生冲突极不明智，把尼赫鲁推向西方。

周恩来义正辞严地驳斥道：“赫鲁晓夫同志，你完全是文不对题，达赖叛逃，怎能说是我们放跑了他呢？中印边界冲突，明明是印度对中国的进犯，怎么说我们不该为西藏那块‘不毛之地’和所谓中立国交火呢？”

赫鲁晓夫冲着周恩来说：“你是世界上著名的大外交家，怎么不懂得团

结尼赫鲁的意义呢？”周恩来针锋相对：“我们对尼赫鲁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而他却利用达赖反华，挑起边界事件。面对外来侵犯，我们忍无可忍，奋起自卫，这能说是不讲团结吗？”

赫鲁晓夫理屈辞穷，不敢申辩，转而对毛泽东说：“1957年你们派周恩来给我上了一堂课。”

周恩来当时申明：“我们不是给你们上课，只是给你们一个中肯的建议，而你们受不了，我们就不再说了。当时不是双方还发表了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吗？”接着他指出赫鲁晓夫背后咒骂兄弟党领导人的恶劣行为。赫鲁晓夫矢口抵赖说他没说过这样的话。周恩来的俄语翻译李越然插话说：“赫鲁晓夫同志，你当时同总理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谈话时，还有卡冈诺维奇同志在场，翻译就是我，你当时确实说了那些话。”有了人证，赫鲁晓夫不好狡辩，不自在地说：“我说过吗？我记不清了。”

此后，中苏关系走入了低谷。

1960年8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终止257个与中国的科学技术合作项目，撤走全部专家，妄图给中国科技和工业的发展造成困难。

对此，周恩来十分气愤，决心把中国的原子弹搞出来，把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搞上去。

1961年10月，苏共举行第22次代表大会，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应邀出席。在这次会上，赫鲁晓夫不但攻击阿尔巴尼亚，也低毁了中国。他说：“当我们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时，中共代表团却在发言中夸奖斯大林。我到北京的时候，还看到挂斯大林的像。这是反对我们党的。”

周恩来对赫鲁晓夫的这些言论一一驳斥。他说：“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又一次反斯大林，这种做法对苏联，对国际无产阶级，都无任何好处。对斯大林，我们不过分推崇，也不故意贬低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周恩来还在大会的发言中声明：“我们认为，兄弟党、兄弟国家间如果发生争执和分歧，应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以平等和协商的原则加以解决。进行公开的、片面的指责，是无助于团结的。”

由于赫鲁晓夫在会上公开指责中国共产党，并含沙射影地攻击毛泽东，周恩来没等会议结束就提前回国，以示抗议。

1964年10月16日，两件事情偶然巧合，一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人扬眉吐气了；二是赫鲁晓夫下台。有人说，中国选择这一天进行核爆炸，是向苏联显示实力，这纯属无根据的猜测。这颗原子弹爆炸后报道前，毛泽东还担心不实，请周恩来核实后再公布，怎么可能想炸就炸呢？由于这两件事巧合，周恩来后来曾说，中国爆炸原子弹是给赫鲁晓夫“放了送瘟神炮”。赫鲁晓夫为什么下台，苏并公开的说法是“由于年迈和健康的原因”，但人们不相信，纷纷在猜测，大体有3种看法：一是由于他内外政策失败，引起党内不满；二是由于他主观、片面、简单粗暴；三是两者兼而有之。对苏联的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将奉行什么样的政策，也猜测纷纷。大致有这3种估计：一是换汤不换药；二是汤换了药也会有所不同；三是可能比赫鲁晓夫更难打交道。要了解实际情况，最好的办法是直接同苏联新领导接触。毛泽东一向重视同苏联的团结。他得悉赫鲁晓夫下台后便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苏联政局动向和我们应采取的对策。尽管对情况还不甚了解，但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我党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毛泽东和党中央还是迅速果断地作出决策，要抓住赫鲁晓夫下台的时机，采取有力

步骤，争取扭转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周恩来向外交部苏联东欧司负责人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由毛、刘、周、朱联名给苏联新领导发贺电。接着，毛泽东提议并经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率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节 47 周年。周恩来说，今年不是大庆，苏联也没来邀请，我们本可以不派代表团去，但为了了解苏联新领导的真实意向，寻求团结对敌的途径，我们还是决定主动派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代表团由周恩来任团长，贺龙任副团长。

11 月 5 日，中国党政代表团乘专机飞抵莫斯科，受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欢迎，当晚下榻在列宁山苏联政府别墅。周恩来稍事休息，立即开展夜以继日的紧张活动。他拜会苏联新领导和各国代表团，了解他们的想法，阐明我们团结对敌的愿望。每天晚上 10 点钟左右，周恩来和代表团同志在我国驻苏大使馆交流情况，研究次日的活动，向中央报告请示，一直要忙到凌晨 3、4 点钟。7 时左右他又起床开始一天的紧张活动了。

在苏联的国庆招待会上，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发生了。周恩来在克里姆林宫宴会大厅内同苏联领导人交谈后，便向苏联元帅们聚集的地方走去，准备和他们交谈。这时，马利诺夫斯基迎面走来，见到周恩来后便胡说：“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我们。”周恩来立即正颜厉色地顶了他一句：“你胡说什么？”随即转身拂袖而去。然而马利诺夫斯基却像发了疯似的，在周恩来走后，还说什么“我们已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搞下去了。”这时周恩来和他的译员已经走远，没有听到，马利诺夫斯基走到贺龙面前继续挑衅，用粗鲁的语言辱骂斯大林和毛泽东，被贺龙顶了回去。代表团的同志听说后，都极为气愤，立即离开宴会大厅。

周恩来回到我驻苏使馆后，认真听取了几位翻译的汇报，分析马利诺夫斯基挑衅的全部情况，认为决非偶然事件，这是对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及其领袖不能容忍的侮辱，是公然要推翻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必须严肃对待。

第二天上午，苏联新领导到我代表团驻地回拜周恩来。周恩来把马利诺夫斯基挑衅这一严重政治事件向他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对方答复说，马利诺夫斯基是酒后胡言，不代表苏共中央，他已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谴责，现向中国同志表示道歉。周恩来义正辞严地指出：马利诺夫斯基并非酒后胡言，而是酒后吐真言；不是简单的偶然的个人行动，而是反映苏联领导人中仍有人继续赫鲁晓夫那一套，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当众对中国党政代表团侮辱中国人民和中国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是连赫鲁晓夫在位时也未曾采用过的恶劣手段。

勃列日涅夫说，我们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你们道歉；波德戈内尔说，我们同马利诺夫斯基划清界限。这时周恩来指出：美国、英国、法国的通讯社都在 8 日那天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这里的权威人士透露，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中共中央主席，难道这也是偶然的巧合？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中有这种思想，马利诺夫斯基敢于这样胡说八道？他们说，马利诺夫斯基是胡说并已道歉，这个问题已经结束。周恩来说，问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研究，要报告中央。

这一事件，给中苏会谈设置了严重的障碍。

从 11 月 5 日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到 9 日第一次正式会谈前，周恩来多次探询赫鲁晓夫解职的政治原因，苏共新领导都守口如瓶，不愿透露。会谈开始后，周恩来又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勃列日涅夫还是一味搪塞，而建议开始讨

论停止公开论战问题。挑起公开论战的正是赫鲁晓夫。苏联从 1963 年起，发表攻击我们的材料何止千篇，我党过去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他们一概避不作答，这个问题如何讨论呢？周恩来没有接过勃列日涅夫的议题，而是提出关于召开国际共运会议，以便从中了解苏联新领导和赫鲁晓夫究竟有多少差别，我们同苏联新领导有无商量的余地。

勃列日涅夫在十月革命节庆祝会上讲话中也说，要召开兄弟党会议。可是他说这个会议，正是赫鲁晓夫要在 12 月 15 日召开的、起草一个兄弟党会议文件的起草委员会。这个会议是一个预谋要反对中国党的会议。周恩来严正声明：这是一个分裂会议，我们党不参加，我们建议另辟途径，通过双边和多边协商，开个团结的会。他们坚决不干。米高扬比较坦率，他说在同中共的分歧问题上，他们和赫鲁晓夫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勃列日涅夫也表示了这种态度。周恩来明白，苏共新领导仍然坚持赫鲁晓夫的一套，要当老子，别人只能当儿子，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

在 11 月 11 日的会谈中，苏联新领导为自己破坏这次高级会谈辩解，企图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遭到周恩来的坚决驳斥。周恩来指出：第一，米高扬说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上完全一致，那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第二，你们坚持召开 7 月 30 日通知要开的会，就是坚持老子党的态度不变；第三，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把谈判气氛也破坏了。

这次周恩来访问苏联，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了解了苏联新领导的政治动向，捍卫了党和国家的尊严和独立自主的权利，也捍卫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意义十分重大。

11 月 13 日，我党政代表团乘专机回国，第二天到达北京机场，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各界群众数千人的热烈欢迎。周恩来随同毛泽东绕场一周，向欢迎群众致意。这时欢呼声、锣鼓声响彻云霄。这是机场上少有的热闹场面。

此后，中苏关系全面紧张，苏联增兵边境，进军蒙古，边界冲突日益频繁，甚至扬言要给中国以摧毁性打击，赤裸裸暴露出社会帝国主义的嘴脸。

1969 年 3 月，苏联军队越界侵入黑龙江上的珍宝岛，导致了举世皆知的流血冲突，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本来中苏边界存在着争议，边界谈判已经进行了多年，由于苏联坚持他们的扩张主义立场，谈判一直没有取得结果。1969 年 9 月，越南主席胡志明逝世，周恩来专程到河内吊唁，有意避开同苏联领导人见面，当天即飞回国内。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也到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他曾传话说希望途经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会面。因中转环节耽搁了一些时间，9 月 10 日当他回国飞到苏联塔吉克共和国的首府杜尚别时才得到回音：中国总理欢迎同他会晤。于是他转经伊尔库茨克于 9 月 11 日上午到达北京。

周恩来也希望通过同柯西金的会谈，能在缓和中苏边境局势方面有所突破。因此中国方面欢迎柯西金前来北京。当柯西金的专机在机场降落后，周恩来即偕同李先念、乔冠华等趋前迎候，握手寒暄后即把客人引进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开始了一次长达 3 小时 40 分钟坦率而又诚恳的会谈。后来人们把这次会谈称为“机场会见”。

会谈开始后，周恩来对柯西金说：不管争吵得怎样，来往总是要的，谈判总是要的。我们同美国还谈呢？何况我们两个邻国呢？他始终以向前看的态度，紧紧抓住中心，力争在不受任何武力威胁的条件下开始边界谈判。能

解决力争解决，即使一时解决不了，也应有效地保持边境局势的缓和。所以当柯西金讲中苏之间积累的问题很多，要一个一个讨论的话，可以讨论3个小时，周恩来说，要向前看，我认为边界问题是现在问题的中心。柯西金也认为边界问题是现有问题中最主要的。双方很快就达成这一共识。接着，周恩来把我国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立场作了简要说明，然后说，要解决边界问题，谈判总是要用些时间，在未解决前需要采取一些临时措施。为此，他提出了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3条建议。双方以此为基础展开求实的讨论。

尽管会议进行的时间很长，双方也有分歧，却能就一些重大问题取得一致看法：

关于“维持边界现状”，中苏一致认为就是双方原来在哪里，还在哪里，没有人的地方谁也不去。维持边界现状的时限，应一直到边界问题全面解决为止。

关于“争议地区”的概念，讨论的时间最长。1964年边界谈判时，双方曾交换过一份地图。苏方地图在许多地段上违反有关条约规定把边界标在中国领土的纵深，造成许多“争议地区”。这次经过双方反复探讨，最后柯西金说：“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

关于“避免武装冲突”，除周恩来所提双方武装力量从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外，柯西金还补充一条：在双方遇有争议时，由双方边防部门相互联系，协商解决。此外双方还同意：边境居民原来在哪里生产，还在哪里生产；为避免误会，只要互相通知一下，便可一次达成协议。当然，这并不影响这些地区的主权归属，归属问题须待边界谈判解决。

周恩来把上述讨论的结果，归纳为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论地区脱离接触、在双方遇有争论时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等4条，再次征求苏方意见。柯西金当即表示：“你讲的4条我完全赞同。”周恩来接着说：临时措施解决了，边境的紧张状态就会变成缓和状态了。柯西金同意这种看法，并说：“周恩来同志，缓和边界紧张局势是我们由衷的真诚的愿望，我们必须也一定能够做到。”最后，双方就边界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地点、双边贸易等交换了意见。双方相约，就上述协议向各自的中央报告后，交换信件予以确认。

这次“机场会见”，是周恩来同苏联最高一层领导人的最后一次接触。尽管边界问题的谈判此后还经历了很长时间，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但这次双方领导人会见之后，边境局势得到一定的缓和。

周恩来在加强发展中苏友谊、争取苏联援助以及抵制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的压力，坚持国家的独立自主等方面的贡献，是不能磨灭的。

中美解冻举世震惊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美两国一直是对立的。

1969年1月尼克松当上美国总统后，虽然他也是反共的，但与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奉行的僵硬策略有不同。他上任伊始，就给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写了一个备忘录：“我认为，我们应该对下述一种态度给予一切鼓励，即本政府正在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不久，法国总统戴高乐到华盛顿参加艾森豪威尔的葬礼，尼克松会见戴高乐时，请戴高乐把美国有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的新政策转告中国领导人。戴高乐答应了。当时中国与法国建交已经5年，戴高乐指示5月间将出任驻北京大使的马纳克完成这项使命。两个月后，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始了一次环球旅行，他们到达巴基斯坦时，尼克松请叶海亚总统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一个口信：“美国不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基辛格则请巴基斯坦空军元帅介绍有关中国的情况。8月间，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又请齐奥塞斯库总统向中国领导人转达同样的口信。

中国领导人也并非执意跟美国政府为敌到底。早在1959年3月的一天，毛泽东在武昌接见斯特朗和美国黑人杜波依斯夫妇时，就风趣而又意味深长地说：“如果你们3位不反对的话，我想到密西西比河里游泳，但我估计另外3位——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生、艾森豪威尔先生——可能要反对。”杜波依斯回答：“正相反。这3位很可能想见到你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尤其在河口附近游。”毛泽东笑着说：“真的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便近日内动身出发。就算位旅游者好了。我不谈任何政治问题，只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如果艾森豪威尔允许的话，我倒还想看看他打高尔夫球呢！或许我再到医院看看杜勒斯先生。”

1969年5月初，马纳克来到北京，在会见周恩来时转达了戴高乐要他转告尼克松的口信。周恩来心存怀疑，但是他对促进中美关系的解决还是很感兴趣的。他坦率地告诉马纳克，台湾问题是最大的障碍。马纳克是亚洲问题专家，当然知道这是关键所在。但他坦诚地说，台湾问题不只是一个“归谁所有”的法律问题，而且是一个容易动感情、难于处理的政治问题，不可能魔杖一挥就消失了。台湾问题的解决将是在道路的尽头，而不是开头。马纳克的现实主义观点，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

毛泽东对这些情况显然是重视的，尽管4月间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还在谴责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可恶的敌人”，不可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他准备对付他们大打、早打、打常规战争，也打核大战。5月间，他却要周恩来请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4位老师对国际形势进行研究，提出建议。具有战略眼光的4位老师却认为：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不大。陈毅还指出，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他说，这是他们“不合常规”的想法，将向周恩来口头汇报。

尼克松不仅是口头上表示要和中国改善关系，也拿出了实际行动。他下令放宽对美国6类公民（议员、记者、教员、学者、科学家和医生、红十字会代表）到中国旅行，还允许在国外工作的美国人可以购买100美元的中国货物，当美国方面正准备公开宣布的时候，发生了7月16日两个美国人进入

中国广东省领海的事件。基辛格决定，把宣布推迟几天，看看中国人会不会利用这次事件进行一次“反对美帝”的行动。几天过去了，中国人没有什么反应。因为周恩来过问了此事，广东省公安厅派得力干部前往调查，查了1个星期，把情况搞清楚了。这两人是暑假来香港旅游的大学生。船上没有窃听器、发报机等，不像是间谍。两人态度很好，承认是误入领海，写了字据。7月23日周恩来接到报告后，同意立即释放。第二天，这两个美国大学生即经过罗湖桥回到香港，这是中美之间一次奥妙的接触。

11月间，巴基斯坦传来消息，美国政府决定撤走从1950年朝鲜战争以来一直在台湾海峡巡逻的两艘驱逐舰，表示美国愿意缓和同中国关系的诚意。周恩来又采取了相应的步骤。当年2月，两个美国人鲍德曼和纳德，误入广东海面，一直被拘留，游艇上还有无线电通讯设备，审理很费时间。全面审查后，间谍嫌疑很小，误入的可能很大。根据这些情况和政治上的需要，周恩来决定释放这两个美国人，并通过巴基斯坦转告美国领导人，说明中国释放这两个美国人对两艘驱逐舰停止巡逻的相应行动。事后，基辛格称赞周恩来是杰出的外交家，把这一阶段的试探性行动安排得如此微妙。

1969年秋天，通过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中国方面表示愿意恢复华沙会谈。基辛格获得这个消息，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如果在社交场合见到中国大使，请跟他接触，告诉他美国准备与中国认真会谈。12月3日，在华沙文化宫举行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斯托塞尔与中国驻波兰代办雷阳不期而遇。斯托塞尔几次想接近雷阳，雷阳对斯托塞尔这种出格的做法不知所措，一再故意避开，后来竟匆匆向主人道别，迈步走出大门要上汽车。斯托塞尔急了，追出来对他说：“美国大使有重要信息要向贵大使转达。”雷阳也置之不理。他之所以不敢跟斯托塞尔接触，原因很简单，那时“文化大革命”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到处是“打倒美帝”的声浪，谁敢和美国大使接触？后来雷阳得到国内的指示，即于12月11日邀请斯托塞尔到中国大使馆正式会晤。双方同意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周恩来认为，双方坐下来交换意见总是好的。几年后，周恩来在北京对基辛格提起雷阳躲避斯托塞尔的事，幽默地说：“你如果要让我们的外交官得心脏病，就在社交场合找他们接触，建议举行认真的会谈就是了。”

1970年1月8日，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华沙会谈将在1月20日恢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克洛斯基宣称：会谈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开始进行。以前从未有过哪个美国发言人用正式名称来称呼新中国，而且说了3次，这是破题儿第一遭。他的用意在于使这个信号明白无误地传到北京。1月20日举行的135次会谈，美方提出美国政府准备派代表到北京或接受中国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直接讨论一些问题。雷阳奉命表示，愿意讨论美方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意见和建议，两国间的会谈可以继续在大使一级进行，也可以在更高一级或通过双方同意的其他渠道进行。2月20日，第136次会谈在美国驻波兰大使馆举行，雷阳奉命告诉美国大使：“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总统的特使到北京探讨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国愿予接待。”

北京发出了新的信号。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的日子里，周恩来把著名的美国记者、作家斯诺和夫人领到天安门城楼正中。周恩来对斯诺说，“在中美两国互相隔绝的情况下，你3次访问新中国，今天还上天安门参加我们国庆盛典。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

事。”斯诺兴奋地说：“我又有独家新闻了。”

周恩来把斯诺引到毛泽东跟前，说：“主席，您看，谁来了？”

毛泽东一看到斯诺，十分高兴：“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

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显眼位置上，出现了毛泽东与斯诺的大幅照片，这是周恩来的精心安排。可以说，这是含蓄而饶有深义地向美国发出信息。可是这件事却被尼克松和基辛格忽略了。事后，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幸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10月1日，中国国庆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游行，而且照了像，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这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自己事后谈起这件事时指出：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

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说：尼克松对华沙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但他“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尼克松愿意来，我们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也行，当做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尼克松也进一步努力开拓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与中国接触的渠道。10月下旬，许多国家元首到美国参加联合国成立25周年纪念活动，其中也有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10月25日，尼克松在椭圆形办公室同即将访问北京的叶海亚会晤，他告诉叶海亚，美国已经决定设法使对华关系正常化，要求叶海亚作为中间人提供帮助。

第二天，尼克松在白宫南草坪热情接待齐奥塞斯库，欢迎他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下午，两国总统会谈时讨论了中国问题，其中包括派高级特使访问北京和台湾问题。引人注意的是当天晚上宴会上，尼克松在祝酒辞中指出，罗马尼亚具有同“美国、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有良好关系的“独一无二”的地位。一位美国现任总统把中国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又是破天荒第一次。使用这种名称意味着美国政府的一项重大决策，表示了对中国政府的承认。

11月10日，叶海亚访问北京，立即会见周恩来，传递了尼克松的口信；13日，又与毛泽东会见。周恩来告诉叶海亚说，“我已就此事请示了毛主席”，并约定通过巴基斯坦在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传递信息。

叶海亚回到伊斯兰堡后，委托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亲自负责中美联系的渠道。舒尔坦曾担任驻北京大使5年，对周恩来有很深的感情。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密，毛泽东、周恩来给尼克松、基辛格的信息，是由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亲自交给舒尔坦，再由舒尔坦用外交邮袋交巴基斯坦驻华华盛顿大使希拉里，由希拉里亲自送给白宫的基辛格。美国给中国的信息也采取这个办法。

12月9日，一封没署名的也没有抬头，周恩来给尼克松的正式个人信件通过这个渠道传给了尼克松。周恩来信中强调，他不但代表他自己，而且也是代表毛主席说话的。还宣称：中国“一直愿意并且一直在设法通过和平方式进行谈判。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此享受到最热忱的欢迎”。“美

国通过各种渠道发出的许多其他信息都已收到，但是，一个国家首脑通过另一个国家首脑向一个国家提出建议还是第一次。美国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真实可靠的朋友，因此，我们十分重视这个信息”。可以说，这是中美关系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基辛格在尼克松批准后草拟了回信，也是交给希拉里，回信中表示美国准备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以讨论“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在互换信件的事进行几个月后，出现了一个被称为“乒乓外交”的插曲。

1971年4月间，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了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队参加了这次比赛。出发以前，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是代表国家的，也是代表人民的，在比赛中就要接触许多国家的代表队，其中包括美国队，我们也是要跟他们接触的。”

有一天，美国选手科恩练完球后，跳上了中国选手乘坐的大轿车。在车上，庄则栋和科恩亲切交谈，表示热烈欢迎，并赠送他一幅杭州织锦——黄山风景画。科恩也回赠一件带有和平标志的短衫。代表团领队异常不安，生怕惹出麻烦，遂即向国内请示。

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决定不邀请美国队访华，并联合打了报告，周恩来批“拟同意”3个字。毛泽东也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可是这份报告还是留在他的写字台上。周恩来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在3月15日宣布，取消对持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并说今后只要有正当的目的，均可到中国访问。白宫发言人在情况介绍会上提请大家注意这个决定时说：“我们希望对方会有互惠行动。”而且2月底尼克松在对外政策报告中说：“准备与北京对话。”种种迹象表明，中美关系已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关头。周恩来感到，不同意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是不妥的。周恩来又把他的想法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也改变了原来的主意，主张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尼克松获悉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后，喜出望外，予以立刻批准。消息传到名古屋，正如美国《时代》杂志说的：“这‘乒’的一声，全世界都听到了。”

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由斯蒂霍文率领，走过罗湖桥前来北京。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美国乒乓球队。他和美国客人一一握手后，坐在斯蒂霍文旁边的沙发上，热情地说：你们作为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打开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尽管中国和美国目前还没有外交关系，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与支持。美国代表团成员热烈鼓掌。

那位在名古屋同庄则栋打过交道的科恩霍地站了起来大声提问：“总理先生，我想知道你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斯蒂霍文对科恩随便提问题打扰周恩来，以手势示意，却阻挡不住。

周恩来打量了一下科恩，微笑着说：看样子你也是个嬉皮士啰！接着眼光转向大家说：世界的青年对现状不满，想寻求真理。在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在这种变化成型以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变化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可以容许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为寻求真理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途径。

科恩说：“嬉皮士是一种新的思想方式，只有极少数人熟悉它，了解它。”

周恩来回答：根据人类发展史，人类会找到普遍真理。我们同意青年人进行各种不同方法的尝试，但必须是寻求真理。要是经过自己做了以后，发

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你说是吗？

周恩来表示出十分理解当代青年的思想，并与之平等讨论问题，使科恩不禁对周恩来异常敬佩。

周恩来的这番话，第二天几乎被世界各大报和通讯社所报道。4月16日，科恩在美国的母亲托人通过香港，将一束深红色的玫瑰花送给周恩来，感谢他对她的儿子讲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

中国总理接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新闻传到华盛顿，尼克松找基辛格、罗杰斯作了研究，认为美国该作出反应了。通过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宣布，总统决定采取对华政策新措施：美国准备迅速发给从中国到美国来访问的个人或团体的签证；允许中国动用被美国冻结的美元；取消对供应前往中国或来自中国的船只和飞机的燃料的限制；准许挂外国旗帜的美国船只停靠在中国港口。

后来基辛格在评论这件事时说：“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跟中国人的所有举动一样，它有许多层意义。描绘得光彩夺目的表现是最不重要的部分。对这些美国青年的邀请的最明显的意义是：它象征着中国已承担了与美国改善关系的义务；而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保证——比通过任何外交渠道发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份量——现在肯定将被邀请的使节将来踏上的是友好国家的国土。”

“乒乓外交”是周恩来外交活动中的杰作，充分展示了他的智慧和才华。

4月27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渠道送来信息：“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者是美国国务卿，或者甚至是总统本人，以进行直接会晤和商谈。”这个信息仍是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里带到白宫来的。

这个信息使尼克松欣喜不已。尼克松觉得，基辛格是最合格的人选，但必须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准备工作。这是一个冒险的行动。

毛泽东同意建立一个对美工作小组，以便早作准备。工作小组由叶剑英负责。

果不出周恩来所料，尼克松派来的特使正是基辛格。周恩来获得这个信息后，在一封打字机打印的不署名的信中作出答复：

“在研究尼克松总统的3次口信后，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来访，并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直接对话。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先行来访，进行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华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他可以从伊斯兰堡直接飞往中国一个不向公众开放的飞机场。他可以乘巴基斯坦的波音飞机，或在必要时从中国派去接送他的一架中国专机。周恩来总理热烈地期待着在最近的将来在中国同基辛格博士会晤。”

基辛格十分喜悦地送给尼克松看，并对尼克松说：“我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两人高兴地谈论起来，谈到深夜，毫无倦意。

基辛格是7月1日出发的。在西贡、曼谷和新德里呆了一个星期之后，于7月8日抵达巴基斯坦。跟着他的记者有的已不感兴趣而离开了，只剩下3个。周恩来派了章文晋等人到巴基斯坦负责接待。叶海亚总统破格设宴欢迎。

基辛格到达巴基斯坦后，放出了空气，说是由于长途跋涉过分劳累，身体不适。巴基斯坦政府也宣布，基辛格将到纳蒂亚加利总统别墅去休息几天。

由叶海亚亲自安排，外交秘书（相当于外交部长）舒尔坦在前台指挥的被称为“遁身术”的活动在严格保密中进行了。一支乔装车队招摇过市，声言是去纳蒂亚加利，其实基辛格并未在车上，而是在总统宾馆下榻。

7月9日凌晨，一架巴航的波音707客机，从伊斯兰堡起飞。机上已先上去了章文晋等4个中国外交官，基辛格和他的3位助手随后上机。在这之前，周恩来为了确保这次航行的绝对安全，曾指示中国民航派人前往巴基斯坦执行领航任务。7月3日，徐柏龄和领航员、报务员等中国专机到达拉瓦尔品第。7月6日，巴航波音707飞机试航北京成功。

其实这次绝密飞行，也曾泄漏过天机。巴航这架专机在停机坪上时，曾在巴基斯坦外交部任职、现为伦敦《每日电讯报》记者的贝格，一眼看出基辛格一行从小汽车里出来，走向舷梯登上飞机。他大吃一惊，凑近机场的负责人问：“那不是基辛格吗？”

“是的，”机场负责人脱口而出。

“他去哪里？”贝格又问。

“中国。”对方回答。

贝格大为惊异，问：“他去那儿干什么？”

“我不知道。”机场负责人走了。

贝格无意中得到这一重大新闻，大喜过望。据传说，他向伦敦的报社发了一条急电：“据本报驻伊斯兰堡特约记者贝格报道：记者在拉瓦尔品第机场获悉，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博士一行人已于7月9日凌晨4时乘坐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707飞机飞往中国。”《每日电讯报》的值班编辑看了稿子，使他吃惊得不敢相信，大骂贝格“荒唐”，最后把稿子放到废稿签上。这条震惊世界的新闻，竟成了“废品”。

飞机飞越喀喇昆仑山，正午12时多到达北京南苑机场。前来迎接的有叶剑英和黄华等。

下午4时半，周恩来来到基辛格住的宾馆。周恩来和基辛格握手时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二十几年来第一次握手。”基辛格也说：“遗憾的是这还是一次不能马上公开的握手，要不全世界都要震惊。”

接着，基辛格将自己的随行人员介绍给周恩来。

“约翰·霍尔德里奇。”话音刚落，周恩来马上接着说：“我知道，你会讲北京话，还会讲广东话。广东话连我都讲不好，你在香港学的吧？”

当介绍到理查德·斯迈泽时，周恩来说：“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论文，希望你也写一篇中国的。”

温斯顿·洛德向周恩来自报姓名。周恩来握着他的手风趣地说：“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该是半个亲戚。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洛德的妻子包柏漪，写过小说《春月》。后来洛德当过美国驻中国大使。

会谈开始了。基辛格念了10分钟的开场白，接着周恩来讲：“我大致同意尼克松总统7月6日在堪萨斯城演讲的观点。总统讲到当今世界存在着‘五极’，也就是五种力量中心……”

周恩来对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声明，本届政府‘务必首先采取步骤，结束大陆中国与世界社会隔绝的状态’。他预见到世界上将出现‘五个超级经济大国’，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他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和平的结构。我赞同你们总统的观点，却不赞同给中国戴上‘超级大国’的帽子，

也不参与大国的这场比赛。”

基辛格因在路上，没有听到他们总统的讲话，周恩来这番耐心的说明，使他深感周恩来的真诚。他说：“总理同意我们总统的观点，我很高兴。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却也能寻到一致的地方。”

周恩来和基辛格在会谈中，谈到两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周恩来对美国的了解之深，使这位向来高傲的哈佛大学教授，也不能不感到这位总理学识渊博和才思敏捷。

这次会谈到晚上 11 时 20 分结束，没有解决任何具体问题。因为基辛格逗留北京的时间只有 48 小时，他心里不能不着急。

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我看，台湾问题事小，世界的局势事大。台湾问题拖一百年再谈也可以，先谈世界格局的大问题。”周恩来离开毛泽东的住地，已经下半夜两点多钟了。

第二天清早，周恩来派人把一份尼克松在堪萨斯城的讲话全文送给基辛格。基辛格十分感动。这一天上午，基辛格一行参观故宫。

下午 4 时，周恩来与基辛格继续会谈。地点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的办公室。在双方陈述对台湾问题、越南问题、亚洲问题、日本问题和世界形势问题等的观点，存在着严重分歧，会谈出现紧张气氛时，周恩来缓和了一下态度说：“我们不如先吃烤鸭，不然就要凉了。”

饭后，周恩来态度和蔼地建议，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时间为 1972 年春天。基辛格代表尼克松接受邀请。

11 日上午，两方的会谈再次进行。黄华提出联合公告草案。由于考虑得比较周到，基本上为基辛格所接受。同时也采纳了美方提出的发表公告的时间为 7 月 15 日。周恩来与基辛格讨论了今后联系的地点和方法。双方都赞同地点为巴黎，由尼克松总统信任的美国驻法国武官沃尔斯特将军跟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接头。周恩来还提议：有时，我们不妨继续利用巴基斯坦这个渠道，中国有句老话，不能“过河拆桥”。

基辛格和助手们乘飞机抵达伊斯兰堡，舒尔坦在机场迎接他们，又陪同乘车兜了一个圈子，经过纳蒂亚加利的穆里纳，又大肆张扬地回到伊斯兰堡，好象他们并未离开过伊斯兰堡。当晚，基辛格一行乘上自己的飞机飞往巴黎。在机上，向尼克松发了预定的代号，报告访华成功。

7 月 15 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了如下的公告：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尼克松是在电视荧光屏上宣布这一《公告》的。在场的评论员也为之目瞪口呆，大为吃惊。

何止是美国，这个《公告》震动了全世界的政界和舆论界，成了最热门的话题。

10 月 20 日，基辛格再度访问北京，此行是为尼克松访华进行具体安排。他提出访华日期为 1972 年 2 月 21 日或 3 月 16 日，周恩来选择了前一个日期。他们再次讨论世界形势和两国关心的问题，而后磋商一个声明，即后来的《上

海公报》。

基辛格这次是专程代表尼克松来华谈判尼克松的访问公报的，来华前基辛格的班子起草了一份公报的初稿，经过尼克松看过并批准。

24日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明确地说：“毛主席已经看到你们拟的公报草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样的方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基辛格显出了不快，也以坚定的口气说：“我们初稿的含义是说，和平是我们双方的目的。”周恩来说：“和平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你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

基辛格也不让步。他说：“我尊重总理的信仰，但把那些一贯正确的教条写在公报里是不合适的。”霍尔德里奇很不服气，说：“我方拟的公报初稿，难道就一无是处？”

周恩来严肃而心平气和地说：“你们也承认中美双方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如果我们用外交语言掩盖了这些分歧，用公报来伪装观点一致，今后怎么解决问题呢？”

斯迈泽说：“我们起草的公报，采用的是国际通用的惯例。”周恩来说：“我觉得这类公报往往是放空炮。”

基辛格自以为得理不让人，谈了他的观点说：“我们不回避双方的分歧，签公报又有什么用？列出双方不同的观点，岂不等于告诉全世界，中美双方在吵架吗？”周恩来坦率地说：“我们两国打过仗，敌对和隔绝了20多年，对于如何管理国家，如何跟外界打交道，我们有自己的观点。”

看来讨论难于继续。周恩来说：“现在该吃烤鸭了。我们将在下午提出一个公报的初稿。”

下午，周恩来交出我方草拟的公报草案。周恩来笑着说：“公报由双方各自阐述不同的立场观点。我方已经列了我们的观点，下面留下一些空白面，由你们阐述你们的观点，然后双方再进行讨论。”

基辛格和他的助手看了，大为惊异。美方认为中方交出的公报草稿别开生面，前所未有。基辛格对周恩来说：“总理先生，这样的方案，我看，在国际上和美国国内都是无法接受的。”周恩来严肃地说：“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祸根。既不解决问题，又会导致更深的矛盾。”

基辛格很机灵，口气松动了，说：“我们不能光是列举不同的观点，而是必须向着未来有所前进。”

周恩来接着话头说：“公开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博士，你说是吗？你们不妨再考虑一下。”

休息后，基辛格和助手们商量，像有所醒悟似的，说：“公开摆明分歧，难道不会使双方的盟国和朋友放心吗？这说明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护，还会使各方面的人确信公报是真诚的。”“也许用这种别出心裁的方式，能解决我们的难题。这就是中国方案奥妙的地方。”助手们也赞同基辛格的想法。

10月25日上午，基辛格提出了美方经过修改的公报草案。周恩来说：“博士，你熬了一个通宵，把我们的一个主要观点删掉了。”基辛格“哦”了一声。周恩来继续说：“坚持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这是我们对世界形势的基本观点。”基辛格激动地说：“如果总统签署同意这个观点的公报，那不等于我们的总统受到屈辱？”

周恩来也“哦”了一声。基辛格接着说：“我们需要删掉这些话。作为交换，我同意在美国观点部分也对等地删掉几句话，不使中国方面吃亏。”

周恩来用手一挥，说：“不，博士，我们不是在做交易，你完全不用讨价还价，你只需叫我同意，告诉我在中国观点部分所用的词句确有令你为难之处就可以了。”这使基辛格很感动，他觉得周恩来很真诚，他不搞讨价还价，双方终于商定了彼此都认为合适的内容。草案中列出双方的不同观点后，也列出双方的共同立场。周恩来说：“我们虽然有巨大分歧，也有一些共同的观点，特别是关心霸权，都表示不谋求霸权，都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的努力。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样，就使会谈的气氛缓和了下来。谈到台湾问题，双方僵持了。基辛格表示美国不会背弃老朋友，不会与台湾断交。周恩来严正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这3个立场是不变的。基辛格申辩说：“如果我们背弃老朋友，不但别的朋友不信任我们，你们中国人也不会尊重我们。”周恩来针锋相对地说：“台湾是中国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是你们历届政府都承认的。而现在，是哪国的军队占领着台湾？是你们美利坚合众国。中国人有句俗语，‘解铃还需系铃人’，如果说有什么复杂原因，那也是你们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你们不但对这一现实没有任何改变，而且还继续从各方面封锁、孤立我们。”基辛格又辩解说：“我今天坐在这里，不就是说明我们在改变吗？”但他意识到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让步。他和洛德商量一会儿后，对周恩来说：“我决定换一种方式表达美国的观点——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样？”

周恩来将这一句话重复了一遍，笑着称赞说：“博士到底是博士，这可是一项奥妙的发明。这句话的基本意思我方可以接受。”

公报中台湾问题的措词就这样解决了。

就在这一天，第26届联合国大会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表决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了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两国的提案，驱逐了蒋介石的代表，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

周恩来知道了这个消息后，脸上总是笑盈盈，“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从没有这样高兴过。为了不让基辛格难堪，周恩来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基辛格一行离开北京，在飞机上才获得这个消息，大为惊讶。苦笑着说：“我说过，光是美中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连我自己对此也认识不足。”洛德慨叹着：“周恩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否定了自己的方案，接受他们的方案，而且高高兴兴，心悦诚服。”

1972年1月3日，尼克松派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到北京来，安排他访问中国的行政事务和后勤工作。周恩来指示熊向晖与齐格勒洽谈，请美方帮助租用一个卫星。齐格勒估计租金可能需要100万美元。他建议中国政府不必花钱租用，只要在总统所到的地方北京、上海、杭州安置地面站，费用由美国承担。熊向晖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说：“不要一听100万美元就想缩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而是涉及我国主权的问题，不能有丝毫含糊。周恩来叫熊向晖告诉齐格勒：第一，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一颗通讯卫星，租用期是北京时间1972年2月21日上午1时至2月28日24时；第二，在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必须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将予以同意，中国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第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不作冤大头。齐格勒听后很惊讶：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我完全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前两点办法。租费一定很合理。可以设

想，这两项费用之间会划个“等号”。我很佩服你们的精明，更佩服你们处处维护国家的尊严。齐格勒很赞同基辛格的想法：周恩来是世界上罕见的令人衷心敬佩的伟大政治家和外交家。

1月4日，周恩来接见黑格一行，黑格带来的美方公报草稿中，有：“美国方面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Viability）”这样的字句。周恩来警觉起来。他要翻译专家查找各类辞典，弄清“Viability”一词的中文含义。他自己也查找有关资料，词义都是“生存能力”。在6日晚上的会谈中，周恩来望着黑格，目光中透出严肃：黑格先生，你们为什么要在谈话中使用‘Viability’这样的字眼呢？

黑格有点紧张，作了申辩。周恩来说：“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主权国家的生存能力，要你们美国政府来关心呢？美国人在世界上就是习惯于到处充当保护人。我要直率地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观念的反映……我们不能接受。”黑格自知理亏，抱歉地说：“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个词包含有这个意思，很抱歉，总理先生，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删掉。”

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乐团正在演奏美国歌曲《美丽的阿美利加》。这是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正在练习。那些年，外国歌曲在神州大地几乎都销声匿迹了。大会堂的工作人员经过这里，都驻足倾听。周恩来也来到这里，向乐团同志问候。

乐团领导汇报：“总理，‘首长’对奏这首歌有意见，认为是为美帝国主义唱赞歌。”江青不但干预奏这首歌，还说什么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向美国 and 全世界为尼克松进行电视宣传。

周恩来说：“我记得这是一首赞美美国风光的曲子嘛。不要太‘左’了。”说起电视播放的事，周恩来十分气愤地说：“岂有此理，过去美国政府一直敌视中国，现在美国总统要来中国访问，这是历史性的转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亿万人民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访华的情况，就会引起思考，增加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这是为尼克松宣传，还是为新中国宣传？”周恩来不理睬江青的无理纠缠。

2月21日上午11时，尼克松乘坐专机抵达北京机场。机场气氛并不热烈，只有一面美国星条旗和一面五星红旗并列在旗杆上，一支350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军仪仗队。周恩来、叶剑英和有关人员前来迎接。

尼克松下了舷梯，主动和周恩来握手。记者们迅速抢下这一历史性镜头。

周恩来对尼克松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他和尼克松同乘一辆红旗轿车进城，前往钓鱼台国宾馆。

当尼克松到达宾馆才几分钟，周恩来便问：总统和基辛格先生现在去会见毛主席是否方便？尼克松对这种礼遇感到高兴。因为毛泽东常在外宾离开的前一天才会接见他们。这么快就安排接见，出乎尼克松意外。

在周恩来陪同下，尼克松到南海会见毛泽东。一开始，毛泽东表示欢迎客人，并开玩笑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赞成这件事啊！”

毛泽东和尼克松的谈话幽默而富于哲理，话题涉及很多方面：台湾、日本、印度支那、反霸斗争、扩大两国交往……。尼克松说：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們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们就是为着这个而来的。毛泽东称赞尼克松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尼克松微笑着

摇摇头，朝着周恩来说：“他读的书太多了。”这次会谈持续了65分钟。

随后，周恩来和尼克松举行会谈。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招待尼克松一行。席间，周恩来指着熊猫牌香烟对尼克松夫人帕特说，“我想送给你这个。”

帕特大为吃惊：“你说……烟吗？”

周恩来笑着对帕特解释：“不，不是烟。我要送你们两只熊猫。”

帕特惊喜地对尼克松说：“理查德，周恩来总理说送给我们两只熊猫，真的熊猫。”

这个镜头通过卫星传到美国，美国人很感兴趣，到处都在议论熊猫。《华盛顿邮报》评论：“周恩来通过可爱的熊猫，一下子把美国人的心征服了。”后来，尼克松送两只麝香牛给中国。

第二天，周恩来同尼克松举行实质性的会谈。地点在人民大会堂。23日，会谈移到尼克松住的钓鱼台国宾馆。周恩来一下车，已看到尼克松、罗杰斯、基辛格都站在门口迎接。握手之后，尼克松笑容可掬地走到周恩来身边，为周恩来脱掉呢子大衣。这个镜头被电视记者拍下来。美国电视观众很赞赏尼克松这一热情举动。有家报纸评论说：“在美国人民对周恩来表示极大好感时，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衣，等于发表一篇极为动人的竞选演说。”

第四天，尼克松、罗杰斯在叶剑英陪同下，参观了长城和十三陵，25日尼克松等人又游览了故宫。

26日上午，周恩来陪同尼克松到杭州。尼克松一行乘船游览了西湖。周恩来在宾馆里同罗杰斯谈了40分钟。看来，周恩来是在弥补罗杰斯没有能会见毛泽东的遗憾。他考虑得多么周到啊！27日早晨，周恩来陪尼克松来到上海。

在上海，发表了震惊世界的《上海公报》。在当晚的宴会上，尼克松宣称：“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他们从上海回美国。

送走尼克松之后，周恩来也在当天乘飞机回到北京。新华社记者问：“总理，有个美国记者报道尼克松访华的结果，用乒乓球的比分来比喻中国对美国，21：2。可以报道吗？”

周恩来哈哈一笑，摆了摆手说：“人家可以那么写，我们可不能那么说。公报只是一个起点，我们要学会把眼光看到未来。”

事后，中美互相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

1979年1月，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可惜，周恩来总理没能见到。

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为了打开中日关系的大门，周恩来真是做到了呕心沥血。

50年代初，中日开始有极少的民间往来，官方没有接触过。1954年，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成立，村田省藏担任会长。当时日本经济界许多人，虽愿意同新中国建立贸易关系，却害怕美国，又担心得罪蒋介石。村田为了了解新中国，希望会见周恩来总理，1955年1月村田来到北京。

1月23日，周恩来会见了村田。村田提出了中苏友好条约、和平共处原则、美国和台湾等问题。周恩来针对这些问题阐述了中国的方针政策。他指出：中苏条约不会成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适用于中国同日本的关系；很难同意日本引进美国资本，美国没有尊重日本的独立；旧金山和约主要责任在美国方面，但吉田内阁也应负一定的责任。日本与台湾蒋介石集团签约，承认台湾“政府”，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国人民对此表示愤慨。同时他也指出：中国正在一心一意搞建设，这没有和平的环境是不行的，中国需要的就是和平。试想一下，一个没有海军也没有海运的中国能侵略到别国吗？中国深知，日本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但日本有少数帝国主义的残渣余孽，我们担心的是他们同美国的侵略主义者勾结在一起。周恩来还说：“日美关系如建立在平等互惠基础上，中国不持任何异议。中日关系也要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日本曾经把不平等的关系强加给中国，但这已成为过去，我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对此，中国无意进行报复。最后，周恩来说：“今天我们谈得很坦率，感到很愉快，我对村田先生的态度表示敬意。虽说通过推心置腹的会谈增进了相互了解，但一次谈话恐怕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今后，如村田先生认为有必要，我们可以随时再谈。”这次会见进行了长达4个半小时。村田回国后，四处奔走，呼吁日本政治、经济界同中国开展经济交流。

3个多月后，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同日本经济企划厅长官高碕达之助有过一次接触，原来日本外相重光葵对万隆会议持反对态度，不愿出席这次会议。美国正企盼着这次会议失败。日本政界中也有不少人认为不参加这次会议为好。鸠山首相因此有所顾忌，对高碕说：“虽然应由我出席，但还是你去吧。”高碕比较开明，率领日本政府代表团来到万隆。5月18日，万隆会议开幕，各国代表团团长在饭店大厅门口迎候东道国印尼总统苏加诺，高碕正站在周恩来身边，他向周恩来问候，这个情节被记者看到，作了渲染性报道。当时日本被美国占领，高碕不敢公开和周恩来会见。但通过廖承志，周恩来和高碕先后两次进行了秘密会见，周恩来和高碕的谈话内容非常广泛，谈到他在日本留学时期的情况；两国应该进行文化交流、贸易问题等。高碕谈到，“因为日本还被美国占领着，日本政府在恢复日中邦交问题上，未必能满足贵国政府的希望。”周恩来说，可以在维持日美关系的前提下，建立日中友好关系。谈话中有一个小插曲。高碕的翻译冈田晃把“日本被美国占领”误译为“被美国领导”，廖承志马上用日语指出：“刚才企划厅长官说的是‘被占领’啊。”翻译向高碕进行解释，周恩来听懂他们用日语交谈，马上说：“我明白了，我想，日本国民要求独立的心情将对政府产生影响，日本一定会从半占领的状态下摆脱出来。”多年以后这位翻译回顾这件事情时说：“周恩来有意避开了敏感的‘被美国占领’的谈话，含混地说：‘日本处在半占领状态’。从周总理这巧妙的含混用词中，可以看出他照顾

日本情绪的良苦用心，也表现出他那准确的判断力，他清楚地看到日本的将来。”周恩来和高碕的会谈是战后中日政府间的第一次接触，开辟了中日贸易乃至邦交正常化的道路。这次会谈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周恩来和村田、高碕的会晤，开辟了中日关系的新篇章。1955年春天，村田邀请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日本，签订了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秋季，又邀请中国展览团在东京和大阪举办了“中国商品展览会”。日本各界人士为了了解新中国的情况，争先恐后前往参观，32天中参观者达190万人。

1956年新春，周恩来写信给村田会长和山本副会长，向他们祝贺新年，对中国商品展览会取得巨大成功表示感谢。并说，日后在中国举行的日本商品展览会一定会取得巨大成功。后来日本在北京和上海都举行了商品展览会。由于通商产业相石桥湛山的支持，巴黎统筹委员会限制的商品也参加展出，又拨款资助。展品摆满了北京展览馆2万平方米的会场。中国方面鼎力相助，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都前往参观。在50天的展出期间，中国官方和民间来参观的有290万人。周恩来在会场逗留了两个来小时，同日本展览团的人员交谈，对这次展览给予很高的评价。中日双方的贸易获得迅速的发展。

中日的民间贸易在1958年以后，曾经徘徊不前。这是由于日本政府的错误态度造成的。为了打开局面，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和松村谦三相继访华，都同周恩来举行过会谈。在这前后，周恩来提出政治三原则：不敌视中国、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妨碍中日邦交正常化。进而提出贸易三原则：今后的中日贸易协定应由两国政府签订，即使没有政府间协定也要与日本的友好商社和企业做买卖，还要与处境困难的小商社和小企业做买卖。1962年，周恩来邀请松村谦三多次访华，进行商谈。随后中、日双方在对方首都成立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达之助办事处，双方的贸易又有所发展。有一次，我还代表周总理到机场迎接高碕来访。

1971年春天，中美的“乒乓外交”开展后，周恩来于这年8月派中日友协副会长王国权等到日本，参加松村谦三的葬礼，日本反应强烈，刮起了“王旋风”；中日关系出现了新的形势。尼克松访华之后，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有所松动。1972年7月，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对中日关系采取新姿态，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田中第一次会见新闻记者时就表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我要认真地处理这一历史性课题。”大平正芳就任外相后，也对记者发表谈话说：“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新内阁首相或外相需要前往访问中国。”对日本新内阁的友好表示，周恩来在一次外事活动中讲话说：“田中内阁宣布要在外交方面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这时上海舞剧团正在日本访问，剧团去日本时是途经香港飞抵日本的，由于藤山爱一郎的精心安排，剧团将乘日本包机直接回到上海。负责人孙平化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通过电话向国内汇报，并谈了自己的看法：“舞剧团回国的包机问题，早就安排好了，是否还要包机直飞国内，兴师动众，我个人看似乎无此必要。”周恩来看到孙平化的电话记录后，作出指示：“不对，很有必要，这是政治。”他还专门指示上海：为此做好准备，对孙率舞剧团回到上海给予盛大欢迎，对日方机组的招待不能低于美机组。于是上海舞剧团在虹桥机场受到热烈欢迎。这不单是欢迎舞剧团，当时田中首相已决定访华，这次直飞，实际上是周恩来为田中访华安排的试航。

9月25日，田中角荣首相偕大平正芳外相、二阶堂进官房长官等启程访

华。专机到达北京机场时，周恩来亲往迎接。随后两国政府首脑举行会谈。周恩来日理万机，经常在夜间工作直到黎明，而田中角荣有早睡早起的习惯。为此周恩来在这些天里一般工作不超过午夜 12 时，以便第二天上午参加会谈，这种尊重对方的态度，田中角荣知道后深为感动。

在第一次会谈中，田中提出坚持日美安全体制。他说：“要是日美关系有巨大损害的话，日中关系就不能正常化，坚持日美安全条约是大前提，日美安全条约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是绝对必要的。”田中接着说：“这是在中苏友好条约之后建立起来的，这一点也请理解。……今天，希望中国不要认为它是威胁，尼克松既然访问了北京，美国也应理解了。”

周恩来回答说：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如何，那是日美之间的事情，日美安全条约对日本非常重要，日本当然可以坚持。他对此表示理解。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欢迎宴会，在祝酒词中他说：“田中首相来我国访问，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我们两国的历史上，有着两千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友谊，值得我们珍视。但是，自从 1894 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他还说：“当前，世界形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田中首相就任以后，毅然提出新的对华政策，声明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表示能够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并且为此采取了实际步骤。中国政府本着一贯的立场，作出了积极的响应。……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

田中起立致答词。他称赞“两国千年来有丰富多采的交流”。但是当他讲到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中国人民遭受严重苦难时，却轻描淡写地说什么，“过去几十年，很遗憾地有了不幸的经过，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多麻烦。对此，我再次表明深刻的反省。”

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国人民遭到的苦难岂是“添麻烦”一语可以一笔带过的。单是南京大屠杀，中国就死去了 30 万人。周恩来列举日军侵华的大量罪行后，问田中：“你是怎么想的呢？”田中没有反驳，只是默默地听着。

周恩来严肃地说：添了麻烦，不过是在街上弄脏了女人的裙子时道歉的话，只是对小过失的道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用“添麻烦”来表达，在中国人民中间是通不过的，而且会引起强烈的反感。

田中承认周恩来讲的是事实，不容辩驳。他说：“添麻烦这句话所包含的内容并不那么简单。请原谅这句话是我满怀诚意地如实表达了对不起中国的心情。这是日本人未加粉饰地自然发出的呼声。添了麻烦的是我们，因此，我认为前来赔礼道歉是理所当然的。在自民党内尽管有人反对，但我还是这么干了，我访问了北京。”

听了田中一席话后，周恩来没有提出更多的要求。他说：“明白了，别再抓活把儿了。现在有更重要的问题要谈，还是赶快谈这些问题吧。”

在以后的会谈中，周恩来和田中进入实质问题的会谈。

与此同时，姬鹏飞与大平正芳举行两国外长会谈。在第一次外长会谈时，日方条约局局长高岛说明日本政府的见解。关于对中国的战争状态，高岛说：这已由“日华和平条约”宣告结束了，因此“联合声明”不应再使用“战争状态”结束的字样。如果中国一定要用，可由中国单方面宣布战争状态结束。

关于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请求权的问题，他认为也由“日华条约”解决了，因此“请求权”的问题日方难以接受。

所谓“日华和平条约”，即1952年日本与台湾国民党在美国策划下签订的“条约”，我国并不承认。高岛提这个见解，无疑为会谈布下阴霾。

26日下午的首脑会谈中，周恩来以严厉的口气谴责日方的态度，他说：听到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情况，高岛条约局长是不是来破坏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法律问题，是政治问题。高岛局长的主张是师爷的发言。高岛局长的意见不是田中首相、大平外相的真意吧！在谈到日方提及的蒋介石已放弃要求战争赔偿时，周恩来指出：这使我们感到惊讶和愤慨。蒋介石政权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他在和日本签订所谓“和约”时宣布不要赔偿是慷他人之慨，而我们是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出发，为的是不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才宣布放弃索取赔偿要求的。他还讲述了中国人民过去因赔偿负担而深受其苦的历史。周恩来和田中在会谈中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广泛交换意见，并就联合声明问题进行多次磋商。在联合声明中，日方对日本侵略战争问题终于用了“痛感负有责任”、“要深刻反省”等词，表示了日本的歉意。多年后，田中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不拘泥于一件事情，而是抓住大局，高瞻远瞩，推进谈判，仅此一点就不能不使我感动，周恩来这个人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应田中的要求，周恩来写了“言必信，行必果”6个字。

9月29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庄严而隆重的中日两同政府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周恩来、田中角荣、姬鹏飞、大平正芳在联合声明上签了字。

终生为中日友好做出重大贡献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日友协名誉会长、诗人郭沫若，高兴地作了《沁园春——祝中日恢复邦交》一词：

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昔鉴真盲目，浮桴东海；晁衡负笈，埋骨盛唐。情比肺肝，形同唇齿，文化交流有耿光。堪回首，两千年友谊，不等寻常。岂容战犯猖狂，八十载风雷激大洋。喜雾霁云开，渠成水到，秋高气爽，菊茂花香。公报飞传，邦交恢复，一片欢声起四方。从今后，望言行信果，和睦万邦。

忍辱负重鞠躬尽瘁

在批林批孔的潜流中

周恩来在林彪集团覆没后，主持中央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纠“左”，国内形势有所好转。但是，由于毛泽东在理论上坚持“文化大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观点。因此不可能从全局上改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周恩来只能带着癌症之躯，顽强地工作、斗争，在有限的范围内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影响。而且，在工作中还不断受到“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周恩来以一个革命家的雄才胆略，在病重期间。为国为民，忍辱负重，忘我操劳，鞠躬尽瘁。

1972年4月，卫生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组织北京十大医院对近500名副部级以上老干部作了身体检查。5月，周恩来查出患有癌症。当然我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才知道的。当时，我也从江西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赶到北京体检，回北京后我一方面休养，一方面参加一些学习活动，一直到1973年8月正式到中央统战部工作。在这期间，我们看到中央的工作在周恩来主持下，很有起色。批林整风始终贯串着纠“左”的精神。但是，这一切引起了江青、张春桥的恐慌，他们利用所掌握的舆论工具极力反抗。加上年底，毛泽东提出“批林”要批极右，致使周恩来纠“左”的努力受挫。最终导致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兴起。江青、张春桥借此兴风作浪，妄图乘机打倒周恩来。

江青、张春桥之所以能够假借“批林批孔”的旗号，把矛头对准周恩来，在当时还有一个错误批评周恩来的背景。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召见王洪文和张春桥。当时正准备召开十大，王洪文负责党章的修改工作，张春桥负责报告的起草工作。毛泽东这次召见主要是对外交部的一期简报不满引起的，但他不找主管外交部工作的周恩来而找王、张二人，其中含义不言而喻。

这期简报提到美苏合作，欺骗世人，妄图主宰世界。毛泽东不同意这种分析。他说：大家说好，都说此文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毛泽东在王、张两人面前开始批评简报中的观点，而且对着在座的外交部干部王海容、唐闻生讥讽外交部。王海容、唐闻生70年代成了毛泽东最亲近的人。她们成为毛泽东与政治局的桥梁，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作为晚辈的两位小姐在毛泽东面前表现得无拘无束，年老体衰的毛泽东也喜欢透过她们了解国内外情况。因此，王海容、唐闻生虽然当时职务不高，但成了通天人物。毛泽东接着说，我常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然后，毛泽东要王、张管管外交部的事，并说：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毛泽东越谈越激烈，说：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个屁也是香的！奉为圣旨啊！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毛泽东又强调要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尊孔，而且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一样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接着毛泽东旁

征博引，即兴议论，话题广泛，有些与对外交部的批评已没有直接关系。最后，他言归正传，他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毛泽东在这里实际上指责了主管外交部的周恩来，批评是相当重的。周恩来知道后，心情肯定不好，其中内心的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但他从不向任何人发泄一点怨懣或牢骚，总是把一切埋在心里。

1973年11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这事起因于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会谈时，犯了右的错误。

1973年11月的政治局批周会议上，江青幸灾乐祸地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姚文元像应声虫一样也跟着这样说。江青还当面指责周恩来“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企图达到离间毛周关系和中伤周恩来的恶毒目的。

癌症在身的周恩来对这种无中生有的攻击，强忍内心的愤怒，不动声色、平静地听着江青的发言，慢慢地喝下一口苦涩的茶水。

12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雅后，分别同周恩来、王洪文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等谈话。一方面肯定11月批评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认为“这次会开得好，很好。”另一方面批评江青的提法，“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对问题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我们知道毛泽东对周恩来历来是信任和倚重的，但对周恩来的某些不满也确实由来已久。正是这种不满，客观上为“四人帮”向周恩来发动进攻提供了勇气。

早在“九·一三事件”后，清查林彪罪行时，看到他的住处墙上贴着一些孔子、孟子的言论。江青一伙犹如发现了新大陆，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联想到林彪是尊孔反法的，再者，毛泽东对批林整风纠“左”后期出现的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否定不满。因此，党的十大以后，从提出评法批儒到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采取种种措施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江青一伙便借“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直接对准周恩来，掀起了3次攻击周恩来的浪潮；并凭借他们在党的十大上所窃取的权力，加紧篡夺最高领导权的步伐。

面对这股汹涌的潜流，周恩来不顾病情加重，忍辱负重，忘我地工作着，并极力抵制“四人帮”的阴谋，顽强地斗争着，尽力把运动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

从1973年7—9月，毛泽东提出评法批儒批孔后，江青、张春桥控制的写作班子便大肆鼓噪，在报刊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发表影射文章，并召开各种批孔座谈会。1973年《红旗》杂志第十一期发表的罗思鼎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1973年《学习与批判》杂志第四期发表康力的《汉代的一场儒法大论战——读盐铁论札记》，都是影射史学的典型。这在中国理论研究上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批林批孔运动掀起后，此类文章更多、更露骨。

我到统战部重新工作时，正是批林批孔的前奏阶段。因为参加了军代表刘友法为首，李金德和我组成的领导小组，便要照本宣科地学习中央两报《人

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的文章，并领导统战系统的学习。对于报上的评法批儒的文章，可以说很不理解，而对借批“宰相”、批“折中主义”、批“复辟”，影射攻击周恩来的文章，却是看得出来的。但还不能在军代表面前有所表现，因为他是只唯上、唯书、不唯实的。有时，只能在老同志面前交心谈论，暗中为周恩来担心。

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向毛泽东写信，要求把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转发全国。信的全文是：

主席：

我们看了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觉得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这种简明扼要的材料。我们建议是否可以把这份材料转发全国各省、市、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委各总部、国务院各部，供批林、批孔时参考。现把材料呈上，妥否请主席批示。

王洪文、江青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毛泽东看后，在信上批：“同意转发。”中共中央1月18日把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中共中央1974年第一号文件发出。实际上毛泽东批准了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从毛泽东的本意来讲，是想借“批林批孔”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防止“右倾翻案”，不允许纠“左”。他知道，“文化大革命”很多人有看法、有抵触。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深刻的变革，这与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有类似之处，进行这场运动可以得到一次“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

把批林与批孔扯在一起，既牵强附会，也有悖情理。至于毛泽东要借此来肯定“文化大革命”，当时是看不出来的。尽管我和许多人都想不通。但不敢明说，还要照学。

江青一伙自以为拿了“尚方宝剑”，便有恃无恐地大干起来。

先是在1月24日，背着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召开驻军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接着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1月25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我也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次大会表面上是由周恩来主持，但都是“四人帮”一伙在会上大嚷大叫。以后我们才知道，周恩来是临时接到“江办”的电话通知赶来开会的，事先并不知道会议内容，我们看到他面无表情地坐在主席台上，眉头紧皱地翻看着材料，对“四人帮”一伙的鼓噪，泰然处之。

江青神气十足地开头炮，叫嚷要联系实际，要批“孔老二式”的人物。会上，江青的走卒迟群、谢静宜按照他们事先商定的内容，发表了恶毒的煽动性的长篇讲话。江青、姚文元不时插话。大谈他们如何查到林彪的孔孟言论，毛泽东是怎样让他们整理材料，指示“批林批孔”要联系实际，要反复辟、批判修正主义、反右倾回潮。他们在会上颐指气使，像迟群、谢静宜这样的小人物也竟敢置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会上，郭沫若还几次被点名批判、罚站起来，实在令人气愤。迟群原是中央警卫团的一个连级干部，谢静宜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局的译电员。“文化大革命”使这类投机分子装模作样地登上历史舞台，不过，他们终究成为历史的垃圾。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迟群在会上大谈联系实际时，提到意大利人拍的纪录片《中国》，他大骂这是间谍加汉奸搞出来的，并说要联系起来批判。迟群的用意是很明显的，因为《中国》这部纪录片是意大利共产党员安东尼奥尼

经周恩来批准到中国拍的，而且拍摄的《中国》也没有什么原则问题。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会后，一边江青一伙兴高采烈，通宵达旦地整理讲稿，审查大会录音带，准备下发。另一边，周恩来忧心如焚，眼看着国家又要陷入一场混乱的运动中。他不顾一切，当机立断，让秘书连夜突击，把大会的发言整理出来。第二天，周恩来把整理稿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在他认为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划了横线，并亲自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一起由机要通信员马上送到毛泽东那里。

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毛泽东过后对江青私自召开“一·二五”大会，以及对他们的言论作了批评，并扣发了他们精心炮制的准备下发的材料。毛泽东说：“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江青一伙只好收敛了一下。但是，毛泽东并不是要取消“批林批孔”运动。1974年一号文件也已下发全党，批林批孔运动也就在全国开展起来。

接着，江青一伙就到处“放火烧荒”，私自用她个人的名义到处写信送材料，鼓动“批孔”，而且想方设法插手军队事务。例如，当时江青曾亲自出面对不按他们布置进行大批判的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又打又拉。她一面利用各种《内参》收集杨勇抵制“批林批孔”的材料，一面以个人的名义给杨勇寄“绝密”的亲启信。信封是用铅笔写的，是江青的亲笔字，落款写着“江青同志处”。深知江青其人的杨勇非常反感，看过之后当即吩咐秘书：“马上封好，按正常组织手续给她退回去！以后再有这类信件，不要送我，一律退回去！”江青的种种做法，不外是要加快夺权步伐。当然，最大的障碍仍然是周恩来。这也是他们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的主要原因。

1974年初，周恩来的癌症病情日益加重。他从那时起，只能一边治疗，一边工作。而且还要应付“四人帮”的干扰和攻击。如果周恩来不顾全大局，他完全可以离开岗位，安心养病。但是，周恩来从来都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只要自己生命不止，就要奋斗不息；宁愿自己多受苦，也要多做工作，让国家尽快摆脱困境。特别是为了遏制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再度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动乱不堪的局面，周恩来强撑着病弱之躯，靠输血打针坚持工作，不分昼夜地操劳。1974年1月1日到6月1日5个月中，一个76岁高龄的老人，除了到医院检查治疗外，总共抱病工作了139天。在这139天中，他一天工作不足14个小时的只有9天。工作14个小时到18个小时的有74天，工作18小时到24小时的共44天。其中不少是连续工作，没有间断。总理逝世后，当我和总理办公室的同志们每年1月8日到毛主席纪念堂在周恩来纪念室的展柜前，看到他的工作日历，看到这些统计，我们的眼中噙满了泪水。这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啊！但是，江青一伙恨不得周恩来马上离开工作岗位，让他们把政权抓到手，为所欲为。

江青一伙继续利用“批林批孔”，大搞阴谋活动，并炮制了大量的黑文，利用“影射史学”，掀起攻击周恩来的第二次浪潮。

1974年4月1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按照江青一伙的意图写出的《孔丘其人》。文章使用了比附手法，甚至把鲁国当时根本没有的“宰相”职务硬塞在孔丘头上，用来影射周恩来。这是一篇不批林、假批孔、真批周的代表作。此后，以史喻今，影射比附的文章纷纷出笼。20日，《朝霞》第四期刊载史经的“故事新编”《李鸿章出洋》；5月1日，

《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梁效的《读（盐铁论）——西汉中期儒法两家的大论战》；17日，《北京日报》发表柏青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这后一篇在描绘孔子见国君的一段文字中，凭空加上“端起胳膊”4个字。文章执笔人以后承认：“这是借批孔之名，对总理搞政治陷害和人身攻击。”20日，《学习与批判》第五期发表康力的，《林彪为什么要吹捧董仲舒》，明确宣称：矛头指向“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许多文章大批孔丘“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政治路线，影射让“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干部重新工作是“举逸民”，暗喻周恩来等人“复辟倒退”、“开历史倒车”。

江青一伙利用“批林批孔”运动为其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在全国造成了各方面的严重混乱，而且社会出现不安定局面，国民经济重新下降。面对着这一切，周恩来和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一起抵制和揭露他们的阴谋。毛泽东也不希望再度出现动乱局面。因此，1974年4月10日和5月18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连续两次就“批林批孔”运动的几个问题作出规定。

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通知》主要内容是：1、“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的群众组织，也不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联。2、已经回部队的“三支两军”人员，不要再回“支左”单位参加“批林批孔”。3、中央希望各级党委认真加强领导，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干部，使“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

5月18日的《通知》写明毛泽东已经圈阅。规定重申：1、当前，要注意掌握政策，注意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利于团结95%的干部，团结95%的群众，争取“批林批孔”的更大胜利，争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胜利。2、在运动中，广大群众揭发批判了许多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这是完全必要的。继续把这方面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完全必要。但是，领导上必须注意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3、确定陆、海、空军的军（不含省军区、警备区、科研单位、军事院校，含野战军）以下领导机关和部队，在“批林批孔”的运动中，一律坚持正面教育。4、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5、我们的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是好的。……各级党委应当结合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历次指示，认真地总结自己的经验，分析形势，加强领导。争取“批林批孔”运动和各项工作的新胜利。

中央的这些规走，尽管保留了“批林批孔”的提法，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基层其它各项工作的开展，防止了“文革”初期那种混乱局面的再度出现。当然，江青一伙仍然我行我素，把中央的决定撇在一边，继续为他们夺权制造舆论，欲使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名誉扫地。即使周恩来住进医院也不放过，很快掀起了“批周”的第三次浪潮。

1974年4、5月间，周恩来连续4次发生缺氧症状，病情日益严重，心脏功能每况愈下。在此情况下，经中央决定，他才不得不同意住院手术治疗。6月1日，周恩来在交待了工作，口授“6月1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后，依依不舍地离开生活、工作25年的西花厅。当天，就住进了解放军三五医院，接受手术治疗。

周恩来离开西花厅后，并没有停止工作，只不过把办公室移到病房罢了。尽管还要继续忍受江青一伙的影射、攻击。但他毫不退让，极力抵制，坐阵三五医院。

周恩来住进医院的当天，就作了第一次手术，手术非常顺利，大家很高兴，医生们对治疗抱有充分信心。大家觉得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好好休息休息，周恩来就可以恢复过来。可是江青一伙继续恶毒地攻击周恩来，对他的身心痛苦幸灾乐祸。

6月12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梁效、唐晓文等写作班子成员并举行座谈会。江青大肆鼓吹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荒谬观点。江青在会上说：“我的观点准备挨批，为什么要‘批林批孔’，林彪就是尊孔，就是儒。有一个批判继承问题。复辟与反复辟、前进和倒退的斗争，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一直到社会主义社会，都贯穿这个。现在还有人要复辟，不能说没有。要复辟必然要抬出儒家。我们要革命，对历史上法家就要批判继承。”江青还说：“凡是儒家都是卖国主义，凡是法家都是爱国主义。”18日，《人民日报》在社论《在斗争中培养理论队伍》一文中说：“2000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15日，江青等人与梁效、唐晓文等写作班子成员谈话中还说：“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在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不然，不会搞这样大的运动。”几天后，梁效的一个头头在迟群等人召集的一个会上说：“注意，大儒不是指刘少奇、也不是林彪、陈伯达。”弦外之音可想而知。17日、28日，江青在天津工厂、农村、部队，借宣讲“儒法斗争史”、继续散布“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谬论，煽动“揪现代的大儒”。江青在天津的一次讲话中露骨他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她还指使亲信读一份吹捧江青是“激进派”、诬蔑周恩来是“温和派”的外国电讯，并且暗示周恩来就是他们所说的“现在的大儒”。22日江青第一次窜到天津小靳庄时，专横地要一个叫周克芹的女社员改名为“周克周”。她说：“你就叫周克周吧！用咱们这个‘周’，去克他那个‘周’。”竟然明目张胆地在群众中公开宣传要“反周总理”。

江青的这些做法，在全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致使“批林整风”运动以来经过周恩来和全党同志的努力刚刚趋于稳定的政治局势，又重新动荡起来，逐渐有所恢复和发展的国民经济，又遭到破坏。1974年上半年工业生产骤然下降，与1973年同期相比，煤炭下降6.2%，铁路运输下降2.5%，钢下降9.4%，化肥下降3.7%，财政出现赤字，全国形势再度恶化。

当然，对于毛泽东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周恩来也没有放弃领导权。他极力把运动限制在意识形态范围内。从某种意义上讲，达到了一定的效果。

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主持通过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重申“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求“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又批评了所谓“反潮流”的歪风，指出：“那种不作阶级分析，笼统地讲什么‘只要造领导的反就是反潮流’的说法，是错误的。有的人不批林、不批孔、不上班、不劳动，……继续搞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连，拉

山头、打内战，还把这种行为说成是‘反潮流’的革命行动，这是对反潮流的严重歪曲。”“还有人散布什么‘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谬论，公然煽动停工停产。对于这些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对于幕后操纵者，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

7月17日下午，毛泽东离京前，在中南海约政治局成员谈话，交待工作。周恩来也从医院赶来参加。江青一伙在会上继续唱他们的高调，指桑骂槐地

大谈批“现代的儒”。不点名地指责周恩来阻碍“文化大革命”。看到江青一伙如此猖狂地攻击周恩来，政治局的其他委员大都很气愤。其中有的还义正词严地要江青把话挑明。江青尽管那样猖狂，但还是不敢公开说周恩来是大儒。他们倒想让别人自己承认。

有一件事颇能说明问题。有一天，周恩来和江青等人接见外宾后，被一群中外记者围住。一个西方记者抢先提问：“尊敬的周总理，尊敬的江青女士，请允许我坦率地提一个问题：中国现在搞‘批林批孔’运动，据说还有‘批周公’，这实质究竟是什么？”周恩来默不作声，冷眼看了一下江青。江青说：“批林么，就是批林彪，批孔么，就是批孔老二，批周公么，就是……嗯！我们没有正式提批周公嘛。”西方记者紧接着问：“那么，是否存在非正式的‘批周公’的提法呢？这个周公又是指谁呢？”江青不耐烦他说：“什么正式、非正式，这与你有什么相干？周公嘛，我想就是古代的‘周公’。”周恩来为了不把问题弄得太僵，就解围说，“就这样吧，回答已很明确了，再见吧！”江青转身走了，那个西方记者还在后边大声追问：“我们请江青女士回答问题实质！实质！”江青忿然地回过头，一甩手说：“什么实质不实质，实质是没有的。”

走进客厅，传说周恩来装作开玩笑地对江青说：“没有实质，那‘批林批孔’不就成了批‘零’批‘空’了吗？”江青无言以对，只好苦笑了之。

7月17日的会上，毛泽东看到江青一伙这样胡搅蛮缠，在研究国家大事的会议上也如此放刁撒野，因此，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你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帽子。”“你也难改呢！”毛泽东对在座的政治局委员说：“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大家都听着而不作声，只有江青回答毛泽东的问话并辩解。

后来，周恩来说有些事他也有责任，谈了“一·二五”大会没有制止，有的也是“纵”起来的。周恩来就是这样，不管是谁，尽量不把事情做绝。但江青并不领这个情。毛泽东仍接着批评江青说：“此人一触即跳”，“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并且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搞“四人帮”问题。而且在中央政治局内部对“四人帮”也进行了批评，使他们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当然，他们还在等待时机，准备东山再起。但不管怎样，政治局成员对此心中有数。毛泽东对“四人帮”批评的意义重大而深远。至此，“批林批孔”运动名存实亡，再也成不了大气候了。

1974年8月间，周恩来的病情又出现反复，为此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手术。为了不引起更多的猜测，造成思想混乱和情绪波动，中央决定在报纸上通报周恩来住院的消息。这一消息一公布后，人们的心头无不笼罩着一层阴影。周恩来住院后，我曾几次打电话给邓大姐，要求到医院看他老人家。可是邓大姐无可奈何地回答我：中央规定，不能去看。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只能把眼泪往肚子里吞！所幸的是我们能从报上获悉他的一些情况。当然我还能从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中了解他的情况。知道他在医院里是怎样带病继续为党的事业、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利益操劳着。

周恩来从1974年6月1日起，动手术14次，其中大手术6次，小手术8次，平均每40天动一次手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忘我地工作着。

在医院里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 161 次；同中央部门及其他有关方面负责同志谈话 55 次；接见外宾 63 次；在接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员谈话 17 次；在医院中召开会议 20 次，离医院外出开会 20 次；外出看望或找人谈话 7 次。他就是以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落入阴谋家的手里，当仁不让地继续担负起处理党和国家全面工作的重担，并最终胜利地完成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筹备并主持四届人大

四届全国人大的召开，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毛泽东要结束混乱局面，恢复国家生活正常秩序。但是，“四人帮”企图利用此机会“组阁”，以夺取国家的权力。在毛泽东支持下，以周恩来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及时发现并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确立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再度提出了“实现四化”的奋斗目标，开始了“全面整顿”的新阶段。

早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一伙笔伐批不倒周恩来，也曾经鸡蛋里挑骨头，制造一些事件，妄图借机打倒周恩来。比如，“无标题音乐问题”，江青一伙针对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圈阅同意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邀请友好国家的两名音乐家来华演出的报告，歪曲原意，说这份报告宣扬“无标题音乐、无社会内容”，并且发起一场全国性的大批判。还有所谓“黑画展事件”。那是1974年2月15日至4月5日，“四人帮”在中国美术馆和人民大会堂举办所谓“黑画”展，矛头指向周恩来。因为在此之前，周恩来曾指示：出口工艺美术品，只要不是反动的、丑恶的、黄色的东西，都可以组织出口和生产。又说风景画不能叫“四旧”。而“四人帮”组织展出的18名作者的215幅所谓“黑画”就是有关部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组织创作的作品。江青还故意拉周恩来去看画展。当然，对于“四人帮”的这种小动作，周恩来是不屑一顾的，以沉默抗击江青一伙的诬蔑。

但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周恩来从不含糊。对江青一伙制造的所谓“蜗牛事件”、“风庆轮事件”则坚决予以回击。

1973年，为了发展全国的彩电工业，四机部向中央打报告，要求从国外引进彩电显像管生产线。周恩来同意了这个建议，并征求了江青的意见，她也在书面报告上画了圈，表示同意。这年年底，四机部派人去美国考察，选中了美国康宁公司。在和康宁公司谈判结束时，康宁公司赠给我方代表团成员每人一件玻璃制的蜗牛作为纪念。

1974年初，“批林批孔”一开始，四机部第十设计院有人写信给江青，诬告赴美引进彩电显像管生产线考察团接受蜗牛工艺品一事有辱国格。江青收到这封检举信后，如获至宝，欣喜若狂。2月7日，江青冒着寒风，大驾光临四机部，不理睬四机部的领导，直接找到写信人，并给他一封信。信里把这件事上纲上线说，美方不怀好意，“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认为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是“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是崇洋媚外……”；大骂国务院搞“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并且拿走了一个蜗牛，还要求在场的四机部领导向美国驻华联络处提出强烈抗议。在那里，她还发了一大通的议论。江青的这个举动，无非还是冲着周恩来。

事情很快反映到周恩来那里，他完全清楚江青的用意。没事都要找事闹腾的江青以为抓到了对付周恩来的有效炮弹。周恩来不急于表态，他机智地指示外事部门先查清事实和该国的风俗习惯。结果说明，康宁公司并无恶意。蜗牛在美国象征幸福、吉祥，因此常以蜗牛为题材制成工艺品和礼品。

周恩来听了汇报，了解事情的原委后，心中有数了。在随后的一次由他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完有关生产方面的问题后，周恩来严肃地要求大家讨论一下“蜗牛事件”。有关人员汇报了事实后，经过讨论，政治局决定：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不印发，不下传，已印发的收回。

江青这次无理取闹又未得逞。过后，她悄悄地把拿走的蜗牛礼品退回去，

并要回自己的信。但她并不是就此罢休，一有机会就又要闹腾一番，不吵不闹就不是江青。当然，现在的吵闹已非一般，也就是要达到“倒阁”的目的，进而由她“组阁”。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根据周恩来提出设第一副总理的建议，决定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这一指示是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接到并记录下来的。他马上告诉江青、张春桥；过了几天才告诉周恩来、邓小平。江青一伙多么想改变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但苦于回天无力。凑巧国产“风庆号”万吨轮远航归来。“四人帮”借机又挑起事端，猛烈攻击周恩来和国务院其他领导。

“风庆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载重量为13500吨。当时，交通部远洋局曾担心国产主机和雷达等“五大件”设备性能不适应远航，为安全起见，规定“风庆轮”跑近洋。1974年初，“批林批孔”时，江南造船厂提出“我们要革命，‘风庆轮’要远航”。后来周恩来也同意了这条船出海远航。但作了5点指示：一是要派工作组到船上，随船工作；二是配件要备足；三是干部、船员要配双套班子；四是要派一条技术条件好的船跟随“风庆轮”保“驾”；五是开船前要对船只进行全面检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确定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组织处副处长李国堂和宣传干事顾广文随船工作，李任政委，顾为政治干事。

“风庆轮”的质量确实不怎么样。在远航过程中，主机不断发生故障。李国堂都如实记录下来。再者，“风庆轮”在毛里求斯停靠时，驻毛里求斯大使馆把样板戏《杜鹃山》影片送到船上。上映前，李国堂说了这个样板戏我看过，江青搞的样板戏都是些女英雄。其他人也对船的质量和样板戏有些议论。这在现在看来是很正常的事，在不正常的年代就是不得了了。“上海帮”的耳目，也把这些记了下来，并整理了材料。抵达上海港后，李国堂便遭了殃，挨了斗。诬蔑李、顾是“假洋鬼子”、“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10月12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各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宣称“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说什么：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刘少奇等都奉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推行一条卖国主义路线；声称“不是国产船和国产船的主机有问题不能远航，而是有些人崇洋媚外，思想路线有问题”；又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江青在10月13日《国内动态》有关“风庆轮”报道的清样上写了批语，并给政治局写信质问：“交通部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还说，“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表个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表示同意江青的意见，认为这个问题是个路线问题，要国务院、交通部和其它经济部门抓住这个事件进行所谓“路线教育”。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他们在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预谋地突然向政治局提出所谓“风庆轮事件”的崇洋媚外问题，并轮番逼着主持会议的邓小平马上表态。江青一伙的如意算盘是，如果邓小平赞同他们的观点，正好可以对准周恩来进行攻击。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如果邓小平反对，那么就可以借机整邓小平，阻止他出任第一副总理。但是邓小平就是不表态，强压怒火，反唇相讥道，“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吗，你们怎么这种态度！”后来干脆说，“我要调查，”当场进行抵制，会议不欢而散。

会后当夜，江青一伙紧急策划，兵分两路。一路由王洪文直飞长沙找毛泽东告状，而且商定要注意策略，拣重要的谈。另一路由江青出面找王海容、唐闻生，专门谈“风庆轮事件”，让她们向毛泽东汇报。

第二天，王洪文乘专机飞抵长沙。下午4时在毛泽东下榻的宾馆作汇报。说是4个人开了一夜的会，商定由他来汇报。接着故弄玄虚他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王洪文以此开头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接着他按照事先策划的内容，既紧张又抱着豁出去的态度一五一十和盘托出，争取达到预期的效果，让毛泽东确信北京有人在搞阴谋。他说：“最近一些天，周总理加紧了活动。这种活动，和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要抢班夺权是同样的性质！”毛泽东让他详细说说。王洪文来劲了，他接着说：“总理虽然患有重病，但他昼夜都找人谈话！经常去周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他们究竟在干什么，很令人不安，恐怕跟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望着沉默不语的毛泽东，一点也不知毛泽东在想什么。可笑的是王洪文不知道毛泽东太了解周恩来了。

王洪文告完周恩来的状后，按预定程序吹捧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说：“春桥同志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不仅有文化水平和政治修养，而且有组织能力；更可贵的是他忠于主席、忠于主席的革命路线。”讲到江青时，说她，“通过8年的文化大革命，证明是个有非凡才能的人，在协助主席处理文化大革命的重大问题上，立下不朽功勋。她政治水平高，又有领导艺术。”他还建议在四届人大给他们作适当的安排。也顺便捧了姚文元，说他是搞宣传工作的人才。他刻苦读书、工作认真、考虑问题周到深刻……。

王洪文使劲吹，毛泽东却越听越反感。毛泽东已经清楚王洪文是代表江青来的，一是告状，二是要权。毛泽东在王洪文一派胡言后，当即告诫他，“你们对周总理有意见，当面谈谈嘛，你回去之后，多找总理、剑英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王洪文这次长沙之行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而且暴露了“四人帮”的阴谋，还受到了警告。

王洪文去长沙时，江青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嘱她们报告毛泽东有关政治局讨论“风庆轮事件”与邓小平争吵的事，以及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常借工作搞串联的不正常现象，而且周恩来是后台。当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起又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继续介绍情况。张春桥首先讲了国内财政收支和对外贸易出现逆差的问题，说这是国务院“崇洋媚外”造成的。张春桥还侧重讲了“小平在‘风庆轮’问题上跳出来不是偶然的，文化大革命前他就主张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并把邓小平的抵制比作“二月逆流”。

政治局对“风庆轮”的争吵，周恩来知道后，在10月19日就约纪登奎、华国锋、李先念、邓小平等详细了解事情经过。周恩来很清楚，这是“四人帮”掀起一股“倒阁”的逆流，绝对不允许。当天，周恩来也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到医院，要通过她们把自己的意见转达给毛泽东，取得毛泽东的支持。她们到医院后，就把早些时候与江青一伙的谈话内容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完后说，“我已经知道政治局会议的情况。‘风庆轮事件’并不是像江青他们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在处理这件事上，小平同志非常克制。他们已经多次搞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忍耐了很久。”

周恩来清楚地知道，这次斗争的焦点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这件事

如何解决就要看毛泽东的态度了。

10月20日，王海容、唐闻生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这几天发生的情况，把双方的意见也都谈了，并表示对江青等人的不满。毛泽东听后，批评了江青的做法并明确指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还再次提议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并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毛泽东一言九鼎，使江青等人发起的攻势还没形成就溃败下去。

同时，周恩来经过深思熟虑，认为“风庆轮事件”必须搞清楚，虽然毛泽东批评了他们，但要让大家明白是非，并把此事平息下来。因此，周恩来从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不顾病情，强打精神，分别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谈了“风庆轮事件”的问题。也找江青和王洪文谈了这个问题。对于政治局的其他成员，周恩来分三批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关于“风庆轮事件”的指示，让大家清楚谁是谁非。经过周恩来的一系列工作，总算把江青一伙一手制造的这一事端平息下来，击退了江青一伙的“倒阁”图谋。

1974年是党和国家领导权重新配置的关键时刻。为了开好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周恩来不顾自己每况愈下的身体，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处理党和国家全面工作的重任，特别是在平息了“风庆轮事件”后，开始研究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的最后情况。

事实上，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从1973年冬就开始了。周恩来负总责，王洪文为具体召集人。当时我已回中央统战部工作。统战部历来都要参与人大会议的筹备工作，因为人大会议牵涉到统战工作，特别是党外人士的安排。这时徐冰部长和副部长们都被打倒还没有“解放”，由军代表主持部务。军代表对统战工作，特别是民主人士的情况不了解，所以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除了军代表刘友法参加，周恩来还指定李金德和我参加。李金德是长征干部，曾在西安、武汉、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做机要工作，担任过国务院机要处长、统战部副秘书长。他比我先结合进统战部领导小组。李金德对统战工作比较熟悉，所以在筹备会上统战部提出的意见，大都由李金德发言。有一次周恩来还特地点了我的名：“董小鹏，你老坐在后面，怎么不讲话。”我说：“刚才李金德讲了，我没有什么讲了。”我想他有点点我的名，主要是他知道我“文革”前一直在统战部工作，启发我应该敢于发表意见。

“文革”爆发后，统战部（包括中央统战部、人大常委机关、全国政协机关、国家民委、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以及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中央机关）各单位大都停止了活动。除受保护的民主人士外，大多数人都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劳动去了。筹备四届人大时，大部分人都还没有回来，只有少数机关工作人员参与了筹备工作。筹备工作之初，由王洪文召开会议，中组部军代表郭玉峰，统战系统军代表刘友法，他们对民主人士的情况根本不了解。所以，连最简单的党外代表的名单都提不出。因为民主人士大部分挨批的挨批，打倒的打倒，靠边的靠边。像荣毅仁当时在工商联扫地，华罗庚是“反动权威”。提来提去就只有十几位科学家和民主党派领导人。只好把过去的名单拿来参考，有“问题”的拿掉，最后所剩无几。后来，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侯宝林和荣毅仁。

我们就根据这一信息，从文化艺术界、工商界找出一些人来，如沈雁冰、夏衍、胡子昂、胡厥文、李烛尘等。但是还不行，毕竟人数太少。此后经过

反反复复的提名——筹备组研究——周恩来把关——毛泽东批准。这样由十几个人增加到 120 多人。最后，全部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的代表也不过 237 人，仅占代表总数的 8.8%，比三届人大少了近 150 名，而工农兵代表占 72%。当然，在当时“左”倾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也已十分不容易了。

到 1974 年 11 月，所有筹备工作即将完成。《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交给邓小平负责。考虑到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毛泽东特地指示邓小平，“总理只讲半个钟头左右”，主要是保证周恩来能够站着读完报告。我们知道过去周恩来一口气讲 3 个钟头不休息也没有问题，但现在无论如何不行了。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把起草小组各口写出来的草稿进行综合、浓缩成不到五千字的报告。这是政府工作报告最短的一次。

我想起了在此之前，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一件事。那是 1973 年 9 月的一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稿。参加会议的有各部委负责人和起草小组工作人员近 100 人。周恩来亲自主持一段一段地讨论、修改。讨论中有一个用词，周恩来认为不准确，要修改，并谈了他的修改意见，问大家，“这样改行不行？”还没等大家发言，一位年轻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周恩来修改后的用词也不妥当，应当如何修改。但开始周恩来不同意他的意见，于是，大家就这一用词开展了争论，各抒己见。这个年轻人就是总理办公室秘书纪东。经过争论，周恩来说：“好，我看小纪讲得有道理，可以按他的意见修改，你们大家的意见怎么样？”大家表示赞成。最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讨论问题应当提倡平等的争论，不要认为领导者的意见就百分之百的正确，其实有些问题，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年轻的同志，往往有很好的见解。他们接触实际多、框框少，所以有些意见比我高明，我们就按他的意见修改。”周恩来从来都是如此，他善于倾听和接受与自己不同的正确意见。

1974 年 11 月 6 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的情况，并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同时，也报告自己的身体情况，表示年底或明年初开人大，身体吃得消。最后表示：“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12 月间，周恩来在医院里继续紧张地展开四届人大的最后准备工作。他仍然事必躬亲，通宵达旦地工作，全然不像一个重病在身的人。他在审阅四届人大各界代表的名额分配名单后，致信中央政治局，提议要增加老干部的名额。在审阅政府工作报告后，也提出修改意见。在最关键的人事安排上，周恩来更是反复考虑，煞费苦心。针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竭力要将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委等部委的情况，周恩来多次约邓小平、李先念等人研究，交换意见，觉得教育部关系重大，不能让步，确定以周荣鑫为部长。随后，他在医院分批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通过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候选人名单的 3 个方案。

筹备工作一切就绪，但还得毛泽东的批准。周恩来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谈话时，一致认为，要由周恩来当面向毛泽东汇报，把问题谈清楚，才能取得毛泽东的支持。当时毛泽东在长沙。为保障周恩来的飞行安全和健康，叶剑英亲自对随行的秘书、警卫、医务人员和机组成员，分别交待任务。12 月 23 日，周恩来决定飞赴长沙。临行前，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大便有隐血，需要进行检查治疗。叶剑英知道后，经过慎重考虑，痛苦地决定不改变

计划，沉重地叮嘱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反复要求大家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恩来安全回来。

12月23日下午，周恩来离开医院，来到南苑机场。一下汽车，大家就发现，他面容消瘦，身体虚弱，两鬓已经斑白；他步履蹒跚，双手颤抖，在服务员的帮助下登上飞机。显然周恩来带着重病之躯，以超人的毅力，为国为民工作着。他完全知道自己的情况，在回答随行空军师长杨扶真的问候时说：“必须和疾病作斗争。我已经一年多没坐飞机了，8个多月都住在医院。”周恩来抱病飞抵长沙，稍事休息，晚7点半左右，与随后到达的王洪文一起去见毛泽东。接见时，王海容、唐闻生在座。一见面互相问好后，毛泽东便指着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边说边摇手。然后谈了自己的身体情况，表示不再见外宾了。话题很快转到邓小平身上，毛泽东说：“他政治思想强”，并指着王洪文说：“他没有邓小平强。”一边说一边在纸上写一个“强”字。王洪文听了十分尴尬，也很紧张。

周恩来接着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谈到叶剑英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打断周恩来的话，提出：“邓小平当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并在纸上写了“人才难”三个字，周恩来说：“人才难得。”毛泽东把笔放下。后来毛泽东还提议十届二中全会增补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报告副总理名单时，念道“邓、张、李……”毛泽东又打断周恩来的话，说了一个“陈”字，即“陈锡联”。……

第一天基本上是周恩来与毛泽东谈话，王洪文陪坐。周恩来和毛泽东谈得很融洽，非常顺利。毛泽东要周恩来、王洪文在长沙逗留几天谈谈。还对周恩来说，不要老闷在医院里，可以出来走走，告诉邓小平在京主持工作。这样，毛泽东于12月23日、24日、25日、27日先后四次与周恩来、王洪文谈话。同时，周恩来还与毛泽东单独谈了几次话，主要谈了张春桥的历史问题，毛泽东表示先放在一边，以后再说。4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几个问题：

1、“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说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能爬起来就好。并举党内斗争历史为例。

2、对邓小平的评价和担任新的职务问题以及副总理人选。也就是第一天谈话的主要内容。

3、对江青的批评。毛泽东说他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组阁）。还重提了他几次对江青说过的话。

4、“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3个主题，就搞乱了。毛泽东说：搞乱了，也不告诉他。周恩来说，在一、二月份，江青下达那些任务，开了那样的大会，他也有责任，政治局也没有认真讨论。毛泽东还提到，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5、谈国际形势。毛泽东认为越讲缓和越要备战。现在可以不提当前世界主要倾向是革命，但要强调备战，各国人民对此事要有所准备。

周恩来把几次谈的内容归纳整理成一个提纲，准备回京后立即向政治局常委传达。至此，他才感到一身轻松。27日周恩来飞回北京。这次长沙之行

的结果，在几天以后就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政局，而且也为未来中国的走向确立了正确的目标。

周恩来回京后，向政治局常委们传达了长沙之行的内容。并不顾病情的发展，迅速而有序地把各项工作铺开。他于1975年1月1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和各部委的设置以及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人选的报告。4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回京后各项工作的落实情况。同时，提出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销的文化、教育两部恢复起来，提议周荣鑫任教育部长，否定“四人帮”提名的迟群。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月8日，中共中央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理论学习以及今后工作方针的重要指示。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同意毛泽东不作人民代表，不出席会议的决定。同时也同意纪登奎、汪东兴不作为人大代表。在10日晚的闭幕会上，周恩来用迟缓、沉稳的语调向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发表讲话：这次中央全会结束前，我请示主席，有什么话要我向大家转达。毛主席讲了八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现在，我要向大家讲的就是毛主席这句话，“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希望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工作，都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安定团结，把今年的各方面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到会的许多老同志，此时此刻心情很不平静。他们眼见周恩来的病容，聆听他的嘱托，无不暗下决心，一定要干好工作，同时也深深地为他的健康担忧。

一周之后，新华社才播出这次全会的消息，而且没有报道出席会议的委员、会议主持人及讲话人等。这是“四人帮”故意不让人民了解哪些被打倒的干部出来参加中央会议的卑鄙做法。但是最后一行“会议选举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却是多么的鼓舞人心。

1月13日晚8时，北京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内灯火通明，在四届人大开幕式上，周恩来总理的声音还是那样清晰有力：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实现“四个现代化”一直是党和人民的愿望。10年前，周恩来在这个地方提出来。但是“文化大革命”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这项工作延缓了。今天，他又在这里重申了这个目标，不啻是拨开云层见蓝天，坚定了人们的信心，鼓舞了人们的斗志。我们的好总理这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的洪亮

声音已永远保存下来。我感谢中央档案馆送给我一盒周恩来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的复制录音带。我将传之子孙，一直到祖国完全实现“四个现代化”之时。

会议期间，周恩来到天津代表团参加小组会讨论时，代表们纷纷向周恩来致以问候。面对一张张诚挚的面孔，周恩来坦然而又郑重地向大家表示：我已得了癌症，工作时间不会太长了，这也是自然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现在我正在医院里同疾病作斗争，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要继续和大家一起奋斗，共同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代表们强忍着内心的痛楚，又为周恩来的精神所鼓舞。眼前的好总理啊，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他是那样的消瘦，老年斑、皱纹布满脸上和手上；动作和声音显得那样疲惫。一看到这，谁不被总理忘我的操劳、为国为民的精神所激励呢？！

这次会议，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人大常委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大会终于确立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江青一伙的“组阁”阴谋彻底破产。这为以后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组织基础。

支持邓小平复出和“全面整顿”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后，花了很大力气为大量的党内外干部恢复名誉和安排工作。其中，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乃是最具有意义的一件大事。当然，这也是历史的必然。里外一把手的邓小平成了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并逐步接替病重的周恩来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四届人大以后，周恩来病情加重，国家重担落在邓小平的身上。邓小平当机立断，运用毛泽东赋予的权力，凭着对灾难深重的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担负的责任感，义无反顾地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整顿。

病榻上的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以后并没有撒手不管，特别是面对“四人帮”的干扰，他毫不保留，以自己最后的生命之光，化作无形的巨大动力，全力支持邓小平的工作，在1975年留下最后的辉煌。

毛泽东之所以会提起邓小平，一方面“林彪事件”促使他思考，“亲密战友”不亲密，企图加害于他，而被打倒的与自己出生入死的老干部难道都是坏人？恢复被破坏的各项工作多么需要这些战友，而邓小平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管理国家的行家里手。另一方面，先行从江西东乡红星垦殖场回京恢复工作的王震利用机会，向毛泽东汇报了邓小平在江西劳动的情况，并力荐早日起用邓小平。周恩来清楚这一切，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总是把握时机，恢复了一大批老干部的工作。毛泽东现在提到邓小平，这又是一个机会。

不管从哪方面来讲，周恩来都希望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与周恩来有着几十年友谊的邓小平，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均是国家栋梁之材。邓小平比周恩来年轻，身体又好；而且有胆有识，可担当起国务院的重任。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封信，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给毛泽东。这是林彪自我爆炸事件传达到基层，开展揭批林彪罪行之际。邓小平在信中谈了对这一事件的感受，并实事求是地说，“我同林彪不很熟悉，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以揭发”，但回忆了一些林彪平时的做法及其自己的看法。邓小平在表达了自己随时准备参加批判林彪的罪行后，又谦虚地向毛泽东检查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同时，表达了自己要为祖国和人民的事业重新工作的强烈愿望。他心中有种强烈的使命感。这是历史赋予他的重任，他一定要为之奋斗。邓小平在信中对毛泽东说，他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已经5年多了，他觉得身体还好，还可以作一些技术性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一些工作，他没有别的要求，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后，于8月14日作如此批示：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头子。整他们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最先看到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周恩来内心充满了兴奋之情，他将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一起交给中央办公厅，印刷若干份，分别送中央政治局委员阅读。15日便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

这一批示，并进行讨论。

同时，周恩来马上以中央的名义正式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他还指示：“可以让邓小平同志搞一些参观，访问和调查研究活动。”并立即把邓小平原来的公务员、秘书派到江西，协助邓小平工作，帮助照顾他的生活。年底，邓小平参观了井冈山和红都瑞金。30年前邓小平曾在这里挨过整，今天他又从这里迈向未来。

12月18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让他们考虑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还约他们面谈这件事。之后，纪、汪根据周恩来谈话精神提出邓小平任副总理的建议信。周恩来看了后，又取得毛泽东的同意，终于在1973年3月1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10天以后，邓小平一家便登上了南昌到北京的快车，经过两天一夜的行程，顺利地到达北京，受到党和国家有关领导的欢迎。28日，周恩来、李先念等会见了邓小平。周恩来看到邓小平虽然59岁了，却满面红光，精神抖擞，他的内心充满了喜悦。第二天，周恩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那里开会。之后，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邓小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遇有重要政策问题，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4月9日，周恩来专门约邓小平、卓琳谈话。安排邓小平12日在宴请西哈努克亲王时公开亮相，正式重新走上工作岗位。5月20日，他在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表示欢迎邓小平出席这次会议，并说对于中央恢复邓小平的职务，“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8月在党的十大会议上，邓小平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邓小平回到北京后，先住在钓鱼台西边的花园新村的一幢小楼里。我同紫非专门去看望了他和卓琳。他身体很好，谈笑风生。他说他去江西南昌新建时，上午监督劳动，下午即在家搞家务、种菜。他特别高兴的是，学会了做馒头，发得很松。我也向他报告了在进贤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当“猪倌”，学会了给母猪接生的情况。

邓小平复出后，开始协助周恩来工作，果然不负众望，很快便把工作局面打开。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工作，任总参谋长。还当政治局委员，并说明是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他一个人请回来的。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提议军委会成立以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5人小组，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和紧急作战事项。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向毛泽东提出这一建议，毛泽东同意。3月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派谁去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邓小平出席。在4月的这次联大特别会议上，邓小平又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赢得了声誉。此后，邓小平在中国和世界的的影响与日俱增。至此，邓小平接替周恩来的格局初露端倪。四届人大之后，邓小平便全面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1975年1月下旬，四届人大刚结束，周恩来就连日在医院里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问题以及目前的工作安排。他嘱咐国务院核心小组副组长吴庆彤转告邓小平，请他把分工列出，并说：“他不好讲，由我讲。”2月1日下午，周恩来赶到人民大会堂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除了总理和几个副总理外，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了会议。会议一开始，周恩来便开门见山他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

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但我还是想争取每星期和大家见一次面……。”这次会议审定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方案。周恩来最后用郑重的语气宣布：邓小平同志，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同日，周恩来又接着主持召开有国务院各部部长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人材难得”，“政治思想强”的评语，并说，“现在国务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为首，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主持。”还在讲话中指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决定，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以后的工作。希望新的国务院能出现新的气象，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周恩来的讲话博得了热烈的掌声。第二天，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汇报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情况，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这一切都为邓小平开展工作开了个好头。

1975年4月底，毛泽东从湖南回到北京。周恩来与毛泽东商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在人大会后，就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以及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在会议上作了许多重要讲话，着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很快有了明显的好转。

在邓小平雷厉风行地实行全面整顿的同时，周恩来在医院与邓小平会见、谈话的次数也更加频繁，平均每周都要有一两次。病房内，两位老战友促膝谈心，共商国是，常常谈到深夜。此外，周恩来还时常找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国务院有关负责人谈话，了解各项工作情况，并要求他们支持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工作。

比如，4月16日，周恩来约请由中央派往浙江帮助整顿工作的纪登奎谈话，对当地派性严重干扰浙江省经济发展的情况表示关切。他向纪登奎提出，应按小平同志的要求，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整顿措施，解决好浙江问题。

还有，周恩来在医院里直接听取走马上任的教育部长周荣鑫的汇报，在详细了解了教育部门的现状，以及迟群等人对教育工作的干扰破坏后，明确表示支持周荣鑫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对教育系统进行整顿。

5月至8月，周荣鑫在周恩来、邓小平支持下，积极着手整顿被“四人帮”搞乱的重灾区——教育部门。他多次召开部内外干部、教师座谈会、汇报会，听取意见、了解情况，针对林彪、江青一伙对教育的破坏，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他反复强调全面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的教育理论，重提两年前周恩来纠“左”时关于教育工作所提出的许多重要意见，还对当时教育界存在的老师挨骂、学生不读书的现象提出了严肃批评，进而尖锐地批评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讲话一时广为流传，受到广大教师和学生家长的欢迎。

周荣鑫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整顿，触及了长期由“四人帮”控制的部门。因此，他们一直伺机反扑。其实，周荣鑫也知道自己所冒的风险。因为他所批评的就是“四人帮”长期以来所散布的种种谬论，矛头指向所谓“理论家”张春桥等人1971年8月一手炮制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教师中的大多数和17年中培养的学生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周荣鑫曾经在一次会上讲：“我有些话是会刺痛那几个搞形而上学的人，他们肯定会不满的。无非是再次被打倒，即使再次被打倒，我也不怕。……要横下一条心，做小平

同志讲的那种不怕被打倒的人。”

周荣鑫曾经任国务院秘书长，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李琦也在总理办公室工作过。我对他们都很熟悉，周荣鑫很有工作能力和魄力。他一到教育部，就使教育部门的形势开始好转。可是“四人帮”很快找到机会进行反扑。

“四人帮”利用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刘冰等检举迟群、谢静宜的信的批示，掀起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北京市委书记亲自坐阵指挥，分管教育工作的副总理张春桥责令周荣鑫作检查。清华大学先后召开了有1300多人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和全校大会，批判周荣鑫、刘冰和教育部，把矛头对准邓小平。我在周荣鑫、李琦被无理批斗期间，曾看过他们，打过电话，我说，有错就承认，没错就不要承认，并希望他们注意身体，聊表对战友们的一片心意。后来，周荣鑫心脏病发作，他们还不放过，在被追查、批斗50多次后，于1976年4月12日上午昏厥在追查会上，因抢救不及时，当晚逝世。李琦也差一点被整死。这场运动最后发展成“倒邓运动”。

8月份，“四人帮”还利用毛泽东评《水浒》的讲话，批宋江、批“投降派”，把矛头对准周恩来和邓小平，说什么宋江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和宋江一类的人物，在我们国家里还掌握着大权呢！他想架空毛主席，同宋江手法一样。

面对“四人帮”的猖狂，周恩来从侧面接应邓小平。9月7日这天，周恩来不顾病情严重恶化和医生的再三劝阻，仍然坚持会见了由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在会谈时，维尔德茨关切地问候周恩来的身体。周恩来坦然他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接着，周恩来意味深长他说：“请维尔德茨同志代我转达对齐奥塞斯库同志的问候！经过半个世纪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中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副总理已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在旁边的陪同人员小声地向维尔德茨解释说：“副总理是指邓小平。”最后周恩来充满信心他说：“具有50多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不论是风里，还是雨里，我相信这些同志都承受得了的。”

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成绩显著，国民经济各项指标，短时间内由停滞下降转入迅速回升。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从下半年起，国民经济情况继续好转，工农业生产稳步上升。1975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4504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国家财政收入815.6亿元。这一切全国人民有目共睹，拍手叫好，周恩来也感到十分的欣慰。

但是，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里，“四人帮”利用刘冰的信和毛远新向毛泽东劲吹耳边风的作用，当然更主要的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加快攻击邓小平的步伐。

躺在病榻上的周恩来注视着这一切。虽然他已经不可能起来与邓小平一起跟“四人帮”斗争，可是他要表明态度，支持邓小平。1975年10月底，处于病危状态的周恩来，不得不施行第五次大手术。进手术室前，躺在手推车上的周恩来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询问道：“小平同志来了吗？”每次他动大手术，邓小平总是在场。这时他快步靠近手推车，俯身问候周恩来。周恩来目视着邓小平，又看看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等，吃力地抽出手来，紧紧握住邓小平已伸过来的双手，语重千钧他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

得多！”

周恩来的话，在场的人都听到了。这是周恩来对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强有力支持和高度评价。

回击“四人帮”的“反经验主义”

十大以后，尽管“四人帮”都当上了政治局委员，而且张春桥还是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但是他们的内心里一直十分空虚。原来军委常委里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现在又加上一个邓小平。张春桥在那里要捣乱也难。尽管如此，张春桥还是想有所作为，能把军队的思想搞乱，不让邓小平对军队的整顿奏效就是他们的胜利。

1975年3月1日，这个没有打过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向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讲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时称：全国解放以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因此“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要警惕”。讲话中，张春桥还露骨地指责1972年周恩来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所取得的成果，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他还说：“四届人大提出了一个很宏伟的目标，在本世纪内，也就是本世纪末，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很强大，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但是如果我们把理论问题搞不清楚，就会重复斯大林的错误”。“他们是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

同日，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文章中，也歪曲地引用毛泽东1959年写的一段话，强调：“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2月1日，《人民日报》在《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的社论中，按姚文元文章的口径，再次引用毛泽东的话，并说：“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

“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更是在各种场合和张、姚一唱一和，互相呼应，大讲反“经验主义”。4月4日，她在接见工人代表的讲话时称：“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5日，她对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的讲话中又提出：“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江青还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妄图挑起一场新的运动。

1975年3、4月，各大报和刊物发表了许多反经验主义的文章。江青一伙提出“反经验主义”是攻击具有丰富经验的老干部。当然首当其冲的是指向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如4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文中说：“他们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于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而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除了大造“反经验主义”的声势外，江青、王洪文还在私下里找一些人谈话，无端指责中央某些领导人“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干业务”，以此来攻击领导整顿工作的邓小平和支持者周恩来。同时，他们还借历史上王明路线的错误，影射、诬蔑周恩来。

面对“四人帮”借反“经验主义”大肆攻击广大老干部的阴谋，邓小平首先挺身而出，同江青等人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4月18日，邓小平陪同刚从外地回京的毛泽东会见金日成。利用这个机会，他向毛泽东反映了江青、张春桥反“经验主义”的情况，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立即表示同意。毛泽东当然知道，江青一伙所说的“经验主义”指的是什么人。他不会忘记，1943年延安整风时，就有些人把周恩来当成“经验主义”的代表，说“经验主义是教条主义的俘虏”。在这前后，邓小平还多次到医院向周恩来通报情况。

4月23日，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经姚文元审阅修改后，报送毛泽东。这份报告提出把反经验主义作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项内容。毛泽东阅后，提笔在这份报告上写了一段批语：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为盼。

毛泽东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4月27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邓小平、叶剑英等带头发言，用事实揭露和批评“四人帮”自1973年以来，屡次寻机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的卑劣行径。提出这次的“反经验主义”是一次有计划的反周恩来的行动。“四人帮”在会上处于被批判的地位。

“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战幕刚刚拉开，便不得不收场。

1975年5月3日晚，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都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这是毛泽东到外地休养10个月回京后第一次召集的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抱病从三五医院赶来。

毛泽东在讲话中首先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对批“经验主义”的文章“放过了”。并就此严厉批评“四人帮”：“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毛泽东把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归纳到修正主义里去。

在谈到党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再次提及1931年在中央苏区发生的“邓、毛、谢、古事件”。并对邓小平说：“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毛泽东接着重申“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还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下去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呀？”“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错误，还是自我批评。”

毛泽东知道江青也是一个到处鼓吹“反经验主义的人”。毛泽东批评她既没有斗争经历，也不会写文章，谈不上教条主义，只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会上，江青不时插话，但并未检讨。这时毛泽东严肃地再一次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人们正在回味着毛泽东的一系列严肃谈话时，毛泽东用一种缓和的语气道：“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谈话的最后，毛泽东下了指示：“由小平同志主持政治局会议，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等几位同志进行批评。”

散会时，毛泽东和到会的政治局委员一一握手告别。在与王洪文握手时，王洪文说：“按主席的指示办。”毛泽东听罢用手掌作了一个翻来复去的动

作，正色道：“你不要再这个样子了！”

早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后，周恩来在医院里通过与邓小平及其他一些政治局成员谈话并反复考虑，决定把“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及个人的意见向毛泽东汇报。因此，在毛泽东回京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后的第二天，周恩来在医院里同正式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商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需要在政治局内进一步批评“四人帮”。随即，他伏案写下书面意见，表示“同意小平意见”，支持由邓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

为了确保开好批评“四人帮”的会，周恩来认为应先在政治局内部通通气。5月21日，他不顾身体极度虚弱，亲笔给政治局成员以及参加政治局活动的几个人写信，提议进一步讨论吃透毛主席5月3日的讲话，尤其应搞清楚有人带头批“经验主义”的问题。

周恩来在信中说，5月3日政治局同志当面听了毛主席指示后，他提议政治局常委5人先谈一谈。5月4日、7日谈了两个晚上。王洪文对传达毛主席指示的事表示说《红旗》第五期发了文章，毛主席4月23日的讲话就不再下达了（这篇文章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周恩来等考虑中央再发个文件，正面阐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问题，以利于学习和实践。当时张春桥说，如搞文件需一段时间。周恩来信中这段意思很明显，发个文件，可以更进一步消除张春桥“批经验主义”的影响。而张春桥认为需要时间，不外是想拖。因为起草文件是张春桥负责的事，他想不了了之。周恩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是要让政治局委员们拿出意见来。

周恩来信的第二部分内容，先是说明一下《红旗》第五期文章提到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时，提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是在姚文元文章中，而不是在张春桥的文章中，3月份《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反经验主义的两篇社论也是根据姚文元文章引用的。在作此说明后，周恩来指出：邓小平向毛主席反映的是指张春桥在总政3月1日召开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在信的此处加了一句注：当时还提出江青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在这个会上，张春桥说批林整风时，他就认为从1959年以后批经验主义不够，所以与周恩来商量将毛主席批印的《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小辞典》选辑重印一批发行。对张春桥的这些情况，当时认为已弄清楚，就不忙于向毛主席报告了。现在政治局正式开会讨论毛主席的批示和指示，并已请王洪文在政治局会议上将这些情况作了说明。

周恩来在信的最后提出：“如大家同意，亦请将此报告转呈主席一阅。”这段信的内容就是要把张春桥“反经验主义”的一些言行提出来，在政治局内部讲明，同时报告毛泽东。

这封信在政治局委员和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中传阅，最后又传到周恩来手上。“四人帮”中最早批“经验主义”的张春桥心怀鬼胎，虽然他不反对报毛泽东，但批注：“总理的信，有些不确切”；姚文元没有表示态度；王洪文也没拿意见，让周恩来定；倒是江青表示同意，不过前面也加了一句，“许多情况不了解”的假话。

5月27日，周恩来面对张春桥在“批经验主义”问题上的狡辩，毫不退让，特写信给张春桥，严肃地把这个问题摊开。周恩来的信如下：

春桥同志：

我在5月25日收到洪文同志退回我的报告，要我决定是否呈主席。在你

的注语中，说我信中有些话不确切。我因头上皮下神经疱疹未好，脚上皮下毛细血管病痛未止，故晚了两天才将当时认为较为确切的语言写出，请你审阅。

当时你说，由于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主席建议印两本书，都在半年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些组织，同志们读得多些和较好些，而哲学小辞典三版选辑却很少有人读，几乎没有什么反映，所以主席在批印的指示时就说：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而后，刘、林反党集团实施阴谋诡计，经验主义者就常常上当，所以你在批林整风时就提出将主席批印《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再印一批发出。这次主席指示要把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搞清楚，才会防止变修正主义，如果不把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因此你联系到十多年的思想，经验主义者由于不多读书，难于总结经验，易于上反党集团的当，甚至陷进去，故你在3月1日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片面地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这在三、四月间向政治局向总政来电反映的讨论情况。也可看出。

我这段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写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

如你的低温已退，我很想在今天下午或晚上到你处一谈。

盼复周恩来 1975年5月27日5点半当天，张春桥与周恩来通了电话，并在信上批复道：“总理，已在电话商定，不再改了。现退上，祝你健康。”

这封信当天又回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当即在此信上批了5个字：呈主席批阅。

在铁的事实和周恩来的有力批驳下，张春桥不得不有所收敛。

5月27日和6月3日，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毛泽东5月3日讲话。大家气很大，发言激烈，对“四人帮”进行质问和严厉批评。会上邓小平、叶剑英作了长篇发言。邓小平提了“三件事”和“一个问题”。“三件事”即“四人帮”所搞的“批周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反经验主义”；“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会冒出这三件事？”“这些问题不讲明白，没有好处”。叶剑英谈了3个问题：一是反经验主义的片面性。讽刺张春桥等“有的人书读得多，不要当私有财产”。二是要团结。三是要请示报告，严守纪律。不要事先不请示，事后来纠正。

迫于形势，王洪文不得已作了一些“检查”。张春桥一言不发，在记录本上写着：“沉默、沉默、又沉默。”江青当时则拒绝检讨，甚至还试图否认“四人帮”存在的事实。

这次政治局批评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事，具体情况，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这些是粉碎“四人帮”后才知道的。但是，批评江青的消息却不胜而走，迅速在京城传开，老同志都窃窃私议，觉得出了一口气，希望把斗争进行到底。而且有一种传说，当时邓小平严厉批评江青时，张春桥还给江青帮腔：“江青同志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有功劳的。”邓小平听了气得拍桌子，义正词严地反驳说：“她有什么功劳，不就是挑起全面内战，制造天下大乱，陷害无数无辜么！”这个传说广为流传。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表达了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

6月28日，江青在没有睡好觉，苦思再三后，迫于毛泽东的明确态度，

无奈写了一个书面检查：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我在5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得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当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1975年6月28日张春桥看了江青的书面检查后，也写了一个自我表白：“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做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就是这样的“检讨”，当时他也没有交给政治局。那是在1976年逮捕他时，从其住所搜出来的。

在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的时候，虽然周恩来没有在第一线“参战”，但他十分关心这场较量。且在“战前”就与政治局常委们通气，并与邓小平、叶剑英等作好了准备。会议的进展情况，他们也不断地向病中的周恩来进行详细的汇报。

会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毛泽东听后给予充分的肯定。“我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反总理、反你（邓小平）、反叶帅、反陈锡联。……”，“风向快要转了，在政治局”，毛泽东说这话，充分表露出对邓小平主持政治局批“四人帮”所持的喜悦、支持的态度。最后，他满怀期望地对邓小平提出：“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坚定地表示：“我有决心就是了。”

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江青一伙，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唯一的一次。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空名也就此结束，“四人帮”的反经验主义被回击得丢盔弃甲，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最后的光辉永恒的丰碑

语重心长的嘱托

面对一步一步靠近死神，周恩来当时想的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党和人民的利益。他殚精竭虑地以自己的影响力，为中国的未来谋划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四届人大开过之后，周恩来的病情急剧恶化，经肠胃镜检查，接近肝区的大肠内有一肿瘤。1975年3月底，周恩来作了第三次大手术。

手术后，躺在手术床上，包扎着伤口的周恩来刚醒过来时，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问题。当医护人员看到总理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微微抽动要说什么时，他们俯下身去，听到的是要找李冰。李冰是中国医学科学院日坛医院副院长，李克农的二女儿，解放战争时就是一个伤兵医院的负责人。当然周恩来非常熟悉。刚出手术室的李冰被召唤回来，侧耳俯身，她倾听周恩来艰难的吐字声音。原来周恩来要她组织人员去调查云南锡矿工人矽肺病发病的情况。“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去。”周恩来断断续续他讲完这句话，鼻梁处已经沁出汗珠。李冰用力抿紧嘴唇，点点头，喉咙臃塞着哑声地说：“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要好好休息。”她强忍着不让泪水在周恩来面前流出来，不敢久留，匆匆退出手术室。一到走廊，李冰再也抑制不住，放任眼眶里的泪水流淌下来。我们的总理就是这样，心中永远装着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其实，早在1971年2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代表时，就要求李冰他们材雄心、立壮志，攻克肿瘤难关，还说：“我看，你们还是到下边去调查好。”特地提到河南林县和西北地区的食道癌多的问题。后来，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科研人员，走出了高楼深院，下到农村、工矿，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他们来到林县，爬山涉水，走村串户，调查食道癌的发病情况。他们和有关部门协作，足迹踏遍了太行山周围181个县，对近50万人口的地区进行食道癌流行病学和发病原因的研究。当这些成果在国际肿瘤会议上报告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周恩来听了调查汇报，看到防治肿瘤事业走上我国自己的道路时，是那样的高兴。科研人员绘制的我国食道癌高发区发病分布图，就一直留在他的办公室，他多么想肿瘤发病区一个一个地从图上抹掉。……李冰从医院回去后，马上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医务人员带着周恩来在手术中对矿工的心意，跨过万水千山来到云南锡矿。当矿工们知道这是周恩来在病中派来的医生为他们治病时，一个个热泪横流。可是我们的总理也患着癌症，既要跟病魔作斗争，又要与“人魔”作斗争。当然，他想得更多的是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健康。

周恩来的内心是那样坦然和无畏，他要抓紧时间多干些工作。病重期间，他曾经与他的侄女周秉德谈到生死问题时说、“这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应该相信规律。”早在十几年前，周恩来就同邓颖超共同商定，相约死后把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这回，在得知自己的病已经不能挽救时，他又一再叮嘱说，不要保留骨灰。他坚信唯物主义的观点，物质不灭，生息不已。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十分清楚自己责任重大，自己的一进一退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特别是在目前党和国家遭受危难之际，更是如此。党和人民迫切地需要他坚守自己的岗位，但是周恩来清楚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加倍地工作，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他的这一心情不时地流露出来。5

月7日，周恩来来到北京医院看望谭震林等同志时，专门接见了曾在自己身边工作过的医务人员周尚珏、郑淑云等。他在谈到自己的病情时说：“我估计还有半年。”并曾经向身边的医务人员说过：“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如实地告诉我，因为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

当然，周恩来在病中总是积极配合治疗。癌症的晚期是十分痛苦的，周恩来以极大的毅力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每当难以忍受的病痛袭来的时候，他就紧紧地握住医务人员的手，一声不吭、巨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下来。为了党和国家的大局，他决意要顽强地活下去，哪怕是多坚持一天也好。每吃一口饭，他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要多吃几口，来！给我数数。”当费力的咽下一口后，他念叫着“一！”又咽下一口：“二！”……，1975年12月中旬，周恩来已经不能进食了，完全靠输液来维持生命。癌细胞已经扩散，剧烈的疼痛常常使他晕了过去。有时痛得浑身战栗，眉头紧拧，但他始终不肯哼一声。为了减少他的痛苦，医生不得不动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

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多次约见党、国家、军队领导干部，表达了对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的关心，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必胜信念。并且十分关注“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他确信，有着50多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必定会克服一切困难，走向光辉的未来。

周恩来1975年11月后，再也没有离开病床。叶剑英经常到医院，既谈工作，也谈点别的，陪周恩来减轻病痛。即使周恩来已难以说话，叶剑英仍然来到周恩来的病榻旁，轻轻地握着周恩来的手陪着他。这对周恩来是莫大的安慰。并且，白天黑夜与吴阶平医生保持联系，一再指示：“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

叶剑英在我党历史上有过大功。毛泽东说他：“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周恩来与叶剑英在黄埔军校建立起来的友谊，在红军长征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并肩战斗的革命感情，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牢不可破，革命战友相濡以沫，两位战友生死离别前，再一次共同为党和国家的未来谋划着。

叶剑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秘密加入共产党。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和张发奎等人秘密策划，决定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名义，通知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命令贺龙、叶挺的部队到九江和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集合，准备以3个军的兵力歼灭贺龙、叶挺所部。当时任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换上便装，找到叶挺，将汪精卫、张发奎的阴谋报告给党组织，促发了南昌起义。

周恩来曾在一次会议上风趣地说：“剑英同志加入共产党的头一个见面礼，是向党密报了汪精卫、张发奎的一个阴谋，挽救了我党的重要武装，促发了‘八·一’起义。这个功劳值得大书特书啊！”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四川懋功会师以后，叶剑英又立了一大功。当时，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向党闹独立，竭力反对毛泽东和党中央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促进全国抗日形势发展的主张。9月9日张国焘给右路军总部徐向前、陈昌浩发来密电，命令右路军南下，如毛、周、张不同意，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密电到达时，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大会。参谋长叶剑英最先看到译电员送来的密电，他大吃一惊，连忙离

开会场，把电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随后偕同张闻天、博古、彭德怀赶到巴西红三军团驻地，同患肝囊肿正在养病的周恩来以及王稼祥等进行研究，决定军委率中央红军连夜开拔，迅速离开巴西危险区，按中央毛儿盖会议决定的方针，继续北上，使红军避免了一次损失。

叶剑英在关键的时刻总是挺身而出，历史又一次到了紧要关头，显然周恩来与老战友是有所交待的。但是，周恩来与叶剑英谈些什么，现在已不得而知。可是有一点是无疑的，就是商谈如何对付“四人帮”。这是后来叶剑英提到的。当时叶剑英是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许多人一样寄希望于他再立新功。周恩来曾对叶剑英切切嘱咐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四人帮”手里。

事实也正是这样。在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紧要关头，叶剑英尽管已被宣布“生病”休养，但他又一次站出来，为党为人民再立一次大功。

1975年12月20日这一天，周恩来的体温38.7°，但他仍然在病榻上，吊着输液瓶子约对台小组办公室负责人罗青长谈对台工作问题。按规定，只有政治局委员才可以去探望周恩来。这次周恩来要见罗青长还受到“四人帮”的阻挠，说是还要研究决定。后来邓小平说：“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这样罗青长才来到周恩来的身边。周恩来询问了台湾的近况和在台老朋友的情况。他说：“不要忘记台湾老朋友。”谈话中两度被病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不得不中断谈话。他很抱歉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十分钟再谈。”随后便昏迷过去。

我们知道，周恩来一直亲自领导对台工作小组处理对台事务。而罗青长当时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台湾来的朋友大都由他出面接待。罗青长谈过，周恩来病重时在一个有关台湾问题的批件上，歪歪斜斜地批着“托！托！托！”3个字。

据我的理解，周恩来对解决台湾的问题，认为是一件需要艰苦奋斗的事情。尽管解决台湾问题是我国的内政，但外交上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他说过尽量使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当然没有说过只用和平的方式而不使用武力。要解决台湾问题，除了外交上的配合，主要是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和台湾当局。周恩来曾经说过：对台工作要有耐心、要多做工作，才能“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周恩来对于所有到大陆来的台湾人，只要有空，不管人数多少，总要挤出时间接见，与大家交流意见，为解放台湾做细致的工作。在他弥留之际，还关心着在台的老朋友。

我想他关心的朋友当中，第一个就是张学良将军。周恩来很钦佩他为民族作出的贡献。经常怀念“千古功臣”张将军。在纪念西安事变10周年、20周年、25周年时，周恩来都曾召集原东北军、西北军等各方面代表人物一起座谈，表达对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怀念，并通过各种渠道与在台的张学良联系，关心张学良的生活和安全。蒋介石一直要张学良承认西安事变是与中共商量的结果。但张学良始终坚持历史事实。身处逆境的张学良能够如此，可以说是够朋友，是个真正的中国人。

另外，像陈立夫、张群等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作出过贡献的朋友，周恩来也要求我们不要忘记。还有像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为保护毛泽东安全而做出努力的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周恩来曾对罗青长和我说过，“也

不要忘记他。”当然还包括主张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一中一台”的许多朋友，他都十分关心他们。

1975年6月，周恩来不顾医生劝阻，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他亲自为这位含冤离开人世的战友致悼词。他百感交集，一连向贺龙的遗像鞠了7次躬。他为没有保护好与自己患难与共的战友而歉疚。可是在生前能够为贺龙平反也算是一点慰藉。周恩来对自己已经置之度外了。“我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周恩来对贺龙夫人薛明这样说。但他在最后的时刻也要维持一个共和国总理的责任，他已不属于他自己。

8月13日，毛泽东在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谈话时，提到了他在1973年1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过《水浒》这本书，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毛泽东有感而发了一些议论，如：

《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芦荻是有关部门挑选来为毛泽东陪读的。他在向毛泽东请教关于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时，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议论。记了下来，并整理成文，转给分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

姚文元感到有文章可做，就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将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和他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的同志，增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转载评论文章。姚文元的信当天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批示同意。于是，中共中央发出文件，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

姚文元拿着毛泽东手赐的“尚方宝剑”，欣喜若狂，马上组织文章。8月31日，当我们打开当天的《人民日报》时，看到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和第二版的整版上刊登了《红旗》杂志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和署名“竺方明”的长篇文章《评〈水浒〉》。短评引用了毛泽东关于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指示。两篇文章明显的暗示：评论《水浒》有其现实政治斗争的背景和意义。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主题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

于是，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很快成了反“投降派”的重型炮弹。在受到中央政治局批评而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后的江青借评《水浒》之机又猖狂起来。她在各种场合利用各种机会，大讲批“投降派”。

江青、姚文元一伙所指“投降派”是哪些人？所谓架空晁盖者又是谁？明白人都知道，他们极力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

江青在山西昔阳由华国锋主持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要求大会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华国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批评江青“放屁，文不对题”。又说：“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这个批评是很严厉的。联系到过去的多次批评，毛泽东对江青已十分厌恶。7月份，毛泽东看到我国驻美联络处送来的《红都女皇》一书。这是肉麻吹捧江青的书。毛泽东一看此书内容荒诞无稽，招摇撞骗，自我吹嘘，不少地方还打击毛泽东抬高江青自己，丢尽了脸，还暴露了不少党内机密。顿时，毛泽东勃然大怒，提笔批示，“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

镰。”当时批示转到病中的周恩来手上，周恩来沉思良久，提笔批道：“暂缓执行。”这并非周恩来不讨厌江青，主要是考虑到毛泽东的权威，一个党的领袖的妻子在那种情况下臭不可闻，将是什么结果，周恩来不能不考虑。再说，周恩来也清楚毛泽东还是很欣赏江青在“文革”中的表现。如果毛泽东有意彻底开除江青出政治圈子，再解决也不迟。

对周恩来的这一批示，党内有不少人，包括一些高级干部都很有些意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更应当看到周恩来的良苦用心和高瞻远瞩，半年后的“刘冰事件”就是个最好的佐证。

不管怎样，如此宽容的周恩来却也为江青一伙所不容。尽管周恩来已离开了第一线，死神也已盯上了他，可江青仍穷追不舍、污泥浊水一古脑地泼向周恩来。

当江青在大寨污蔑周恩来的时候，周恩来再次病危。

这时江青一伙又借几十年前发生的“伍豪事件”向周恩来泼污水，这是一起恶毒的大阴谋。9月20日，北京三 五医院作好了一切准备，周恩来将在这里进行第四次大手术。或许周恩来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一份材料。那是几年前他所作的关于“伍豪事件”的讲话录音。周恩来还要邓颖超将这个讲话录音整理成书面材料。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可见周恩来对此事的重视。20日手术前，周恩来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躺在手术架上强撑着病体，浏览了一下稿子，用颤抖的右手，提笔在首页纸的空白处郑重地签下“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写毕交还工作人员保存。病危中的周恩来漏写了一个“前”字。在周恩来被推着往手术室走时，他突然使尽全身力气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周恩来的声音，在场的人都听到了，大家都明白，这是周恩来对邪恶势力的控诉，他签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间的重要文件。

“伍豪”是周恩来早年所用的一个化名。“伍豪启事”一事发生于1932年，是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伪造的一起诬蔑周恩来所谓“脱党”的事件。对此，当时在上海的秘密党中央曾设法在报上辟谣。1943年延安整风，中央座谈会又作出了澄清。然而“文化大革命”中“伍豪启事”却成了江青等人企图用来整倒周恩来的“把柄”。1972年6月23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曾就“伍豪启事”作专题报告，并录了音，到会的有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按毛泽东的意思，还要求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都保存一盒录音带，就是要让大家明白这段历史。但是，后来不知为何并没有下发各地收藏。这次报告周恩来用事实驳斥了敌人的谣言和诽谤。但就在这次会后，王洪文却暗地里交待他在上海的心腹，将有关“伍豪启事”的敌伪报纸找出，另处存放，以备将来再用。由此可见当时周恩来的远见卓识。

在此之前，周恩来在医院里同有关人员的谈话中曾愤然地提到：他们那些人（指“四人帮”）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当然应该批，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此时，周恩来又要进行大手术，结果如何不得而知，在生前，“四人帮”都敢如此污辱他；死后“四人帮”不知要怎样往他身上泼污水啊！周恩来不能不看重它，防止被“四人帮”故意以“伍豪启事”这一虚构的投降事件来

诬陷，进而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因此，他毅然地再一次作出维护自己政治生命的举动，把历史真相可靠地保存下来，让人民、让历史为他作证。

这时，我想起了明代于谦《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对周恩来也是多么生动的写照，但是还不够，他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清白，他“一生为革命，无私作贡献，骨灰撒大地，伟绩留人间”。他留给我们多么丰富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并可以把它化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物质力量。

举国同悲、追悼人民的好总理

1976年1月7日晚，周恩来弥留之际，突然醒过来，睁开双眼，对着吴阶平大夫说：“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们管理全局，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的。”在场的医护人员都无法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和痛苦。我们的周总理啊，永远是舍己为人，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就是他留给祖国和人民的最后一句话。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在与病魔的搏斗中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丝精力，怀着许许多多造福人民的美好设想，怀着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深深的关切，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离开了人世。

周恩来的逝世，举国同悲、千山肃穆、万水呜咽。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自己的总理，以各种形式追悼总理，回忆起那悼念活动的日日夜夜，那动人心弦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令我永不忘怀。

当晚10时，我按中组部通知赶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当时问开什么会谁都不讲，我心里就有些嘀咕，想到一定是关于周恩来病情的。到大会堂河北厅时，一位同志告知我“总理已于上午逝世”。果然不出所料，因为我们对他的病情早就有所了解，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老人家这么快就离开了我们！赶来开会的人都心情沉重地找地方坐下来，不像以前那样互致问候、打招呼、有说有笑。我坐在那里，脑子一片空白，但是周恩来的音容笑貌却不时浮现。可是，在周恩来病重时，我却未能再见上他一面，聆听教诲，而现在我却永远失去了机会。当时，我多次要求见他，但是一直得不到允许。中央规定，只有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才能去看望。我跟随周恩来大半辈子，却不能在他的最后日子里见上一面，成了我一生中的一大遗憾！

会议由中组部部长郭玉峰主持，他沉痛地告诉大家，周恩来总理已于上午9时57分逝世，并请全体起立默哀。然后他传达了下午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为周恩来治丧的决定，共有10个方面的内容。我查了当时的日记，主要是：
1、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名义发出讣告。
2、成立治丧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理日常事务。
3、10日、11日两天，在北京医院向遗体告别，拟请党和国家负责人、党政军民备方面负责人及群众代表一万人参加，并请江苏、浙江两省派代表来参加。告别后送八宝山火化，由王洪文、汪东兴及办公室工作人员、家属、生前友好护送。
4、12日、13日、14日3天时间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吊唁活动，组织四万人参加，另请各国外交使节、来华外宾、在京的兄弟党外宾吊唁。
5、15日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北门内大厅举行追悼会，由王洪文主持，邓小平致悼词，除各方面负责人外，另组织党政军民代表5000人参加。
6、布置党政军民各负责人及部门、各省、市送花圈。
7、15日全国下半旗志哀，停止娱乐活动一天，讣告之日起到15日，新华门、天安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交部下半旗志哀。
8、不请外国派代表来参加吊唁，但可接待驻京使馆、领事馆来吊唁。
9、邓颖超传达周恩来生前的意见，希望将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土地上。政治局认为可尊重周恩来的意见。
10、新华社负责组织安排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电影、摄影等事。
以上决定，毛泽东已批准同意。在这次会议的分工中，我被指定参加办公室秘书组的工作。

会议到下半夜2时才结束。在大会堂里我强忍着，没有哭出眼泪来。蹒跚回家后，不敢惊动紫非，悄悄上床，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

我的思绪又回到那遥远的时代。1942年7月我在重庆时，第一次奉命在周恩来面前说了假话。当时周恩来的父亲中风逝世，而周恩来正在住院，那时他刚作了小肠疝气手术，伤口未愈，因此董老和邓大姐商量暂时把这件事瞒着，等他稍好时再告诉他。我和吴克坚到医院看望时，我们闭口不谈他父亲去世的事。周恩来似乎有预感，追问起来，我却骗了他，说老太爷退了烧。回想起来，这样做是完全错的。谁没有父母？谁能不尽人子之道？但是，现在我再也不能够向周恩来认错了。

一夜没有睡好，第二天早上我早早就打开收音机，听新闻广播。6时3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了令人惊恐的哀乐声，播音员用低沉的音调一字一句地念着讣告。我叫醒紫非一起听着，两个人悲痛的泪水抑制不住，只有任其流淌。起床后，我和紫非一起给邓大姐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悲痛心情，并祝大姐保重身体。

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各地，每隔半小时，电台伴着哀乐，播发着讣告，人民沉浸在深深的怀念之中。统战部的同志，一见面就噙着眼泪为敬爱的周总理逝世而叹息！1月9日上午，在部里研究向遗体告别的爱国人士名单，我们提了190多名，但后来报上只发表了88人。下午便到东交民巷14号宾馆治丧委员会办公室办公。大家都以极其沉重的心情紧张地工作着。治丧委员会办公室已收到全国各地群众的许许多多来函来电，要求中央保留周恩来的遗体，要求进京参加吊唁等等。当然，内心里我们多么希望能够如此，但我们要按中央的指示办，要做好解释工作。晚上11时30分，治丧办公室的同志都到北京医院太平间瞻仰周恩来的遗容，但还未布置好。在旁边的一个房间里，我看到北京饭店的朱师傅正给周恩来刮最后一次胡子。朱师傅边刮边哭，刮在脸上，痛在心里。朱师傅元旦前，就多次要求为周恩来理个发、修修面，让周恩来光光彩彩过个新年。但是周恩来怕朱师傅看到自己的样子而难过，没有同意。想到这，朱师傅喃喃地说着，哭得更厉害……

后来，我才清楚地了解到周恩来逝世时，邓大姐当即向中央报告周恩来生前提出有关身后事的几点意见：一、火葬；二、把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大地上；三、葬仪从简，追悼会的规模不能高于在他之前去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四、外地的同志、朋友、亲戚，不能放下工作来北京参加追悼会，如有人一定要来，那么旅费应由私人负担；五、邓颖超同志只能以普通战友的身份参加追悼会；六、邓颖超今后的生活不能超出她本身应得到的普通中央委员的水平，不要特殊化。

中央得到这个报告后，进行了认真讨论。结果在尊重周恩来本人意愿的前提下，决定进行遗体告别和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最后，中央把拟好的有关周恩来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毛泽东审阅、批准。

我们正是按治丧委员会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具体布置治丧活动。汪东兴为具体负责人。

1月10日，向周恩来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举行。作为工作人员，我们第一批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眼望安卧在鲜花丛中的周恩来的遗容，千头万绪，涌上心头，滚滚热泪流不尽我们心中的无限悲痛，千言万语说不完我们心中的无限哀思。

党和国家领导人，爱国民主人士和各界群众共一万多人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向周恩来总理遗体告别。其情景，至今想来阵阵揪心。世界上从没有

这样深挚的哀痛。有多少人哭肿了眼，甚至哭得晕倒，群众的泪水洒湿了走过的地毯。

邓大姐带着坚定刚毅、从容镇静的神情，为周恩来守灵。她穿着已经褪了色的黑服和一双家制的布棉鞋，站在周恩来身旁。看得出，她忍着内心的极大悲痛。中央负责同志分别由治丧委员会的同志陪同，在遗体两旁轮流守灵。

奸诈狡猾的张春桥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故作姿态，与邓颖超拥抱，又长时间地拉着手说话，企图制造他是总理接班人的假象。看到的人，都觉得恶心！

遗体告别活动的第一天，一直持续到 11 日的零点，每一个进入北京医院告别室的人，一眼便望见遗体前面放着的邓颖超的花圈，飘带上款大字写着“悼念恩来战友”，下款写着“小超哀献”。看到这一个花圈的人没有不哭泣的。门外还有许许多多的群众要求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当时天气寒冷，雪花飘落，给大地披上了一层洁白的面纱，更增添了人们的哀悼思绪。等候瞻仰遗容的人们，彻夜排着长队，伫立街头，就是为了再见周恩来一面。人民是多么地热爱自己的总理啊！告别活动两天里，治丧委员会规定的组织一万人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人数，无论如何也打不住，不断有过去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也有不少从外省市专程赶来的各界代表，恳切要求向周恩来告别。好在我们早就估计到这一点，并和周家鼎、吴庆彤商量好，周家鼎当时是北京市委秘书长，吴庆彤是国务院副秘书长。我们并没有经过治丧办公室，用北京市的车，由李庚奇和孙岳分别组织他们集体去参加告别活动，再见周恩来一面，满足大家的怀念、哀悼之情。

11 日下午 4 时 40 分，冬日的夜幕开始低垂。在几辆前导车的指引下，周恩来总理的灵车从北京医院开出。灵车四周挂着黑黄两色的挽幛，上面缀着白花，庄重肃穆。后面跟着邓颖超、王洪文、汪东兴和治丧委员会工作人员及一些老同志坐的车辆。我坐罗青长的车，一起护送灵柩到八宝山火化。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几十里长街上伫立着 100 万的群众，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抱在怀里的小孩，很多人臂戴黑纱、胸佩白花，闻讯赶来为敬爱的周总理送行。他们在摄氏零下 10 多度严寒的冬日里，肃立在街道两旁，默默地等待着总理的灵车通过。随着灵车的缓缓而至，男女老少都不约而同地脱帽致哀。灵车过处，哭泣声响成一片。大家顾不得擦去腮边的泪水，虽然看不见总理的遗容，但多看几眼他的灵车，对无限的哀思也是一种最大的寄托和安慰。

当时，新华社记者报道首都人民扶老携幼、泪洒长安街，为周恩来总理灵车送行有一段文字。但却被“四人帮”全部砍去，只字不留。这一段血泪文字，记录下当年这一悲壮的情景：

11 日下午，周恩来遗体要送往八宝山去火化时，灰暗的天空压着沉沉的云层，整个北京城是那样肃穆宁静。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人们伫立在几十里大街两旁，冒着严寒等候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傍晚，悲壮的哀乐送来了周恩来的灵车。人民抑制不住悲痛，在寒风中哭泣着，从心底呼喊：“周总理啊，我们离不开您啊！”周恩来灵车在泪雨纷纷的行列中缓缓行驶。灵车啊，你停一停，让我们再看一眼周总理亲切慈祥的面容！司机啊，你刹住车，让我们再向周总理诉一诉衷肠！夜深了，风紧了，周恩来灵车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但仁立在数十里长街两旁的人群，依然在默默地等待着，等

待着灵车的归来。这是古今中外没有见过的送灵场景啊！

在八宝山，邓大姐再也抑制不住离别亲人的痛苦。望着风雨几十年、共同奋斗的战友就要诀别了，内心的情感迸发出来，她俯在周恩来遗体的水晶棺盖上痛哭。我们几次劝邓大姐离开现场，而她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周恩来的遗体前，久久不肯离去，在场的人无不为此情景痛哭流涕，只是到最后邓大姐才被领到休息室。

周恩来身着他最后几年一直穿着的灰色法兰绒中山装，看上去还是那样安详、镇定。最后大家又一次向周恩来告别，由我们几个人护送周恩来的遗体到火化炉边。当火葬场工人将周恩来遗体缓缓推入火化炉时，我不禁号陶大哭。这是我14岁死去母亲后的第一次大哭。

夜晚10时半，火化结束时由两位工人仔细地把骨灰收集起来。装入骨灰罐。然后，由西花厅支部书记、总理的卫士长张树迎捧着骨灰盒坐上总理的红旗车，在我们的陪同下，把骨灰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车队返城时，我们从车窗外看到沿途仍然有几万人肃穆沉痛地迎接周恩来的骨灰。

当周恩来的骨灰到达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时，邓大姐在仪仗队的哀乐声中，亲自迎接，将周恩来的骨灰接过来，抱在怀里，缓慢地、痛苦地一步步登上大殿的台阶，将骨灰安放在早已布置好的吊唁大厅里。邓大姐和工作人员一起向总理骨灰盒三鞠躬后，仍依依不舍，在同志们的劝扶下才缓缓离开。吊唁厅又一次充满痛哭声。

吊唁大厅中央悬挂着周恩来的遗像，安放着周恩来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骨灰盒两侧的花瓶中插满鲜花。邓颖超送的花圈安放在骨灰盒下。毛泽东、党中央及党和国家领导人送的花圈，摆在大厅的周围，大厅里铺设绿色的厚地毯。

我回到家里，已是12日凌晨2时。几天来几乎都没怎么睡觉，这时，我不禁又想起1940年和1942年在重庆给邓大姐的母亲和总理的父亲送葬的情形。1958年我到总理办公室不久，他让我到重庆去，把在重庆逝世的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和他父亲、大姐母亲共12人的尸体取出火化深埋，把墓平掉，周恩来率先响应中央号召实行火葬。18年后，我却护送他的遗体上八宝山火化，不禁又凄然泪下。

1月12日早晨7时，吊唁活动开始了。第一天的吊唁活动有许多外宾。他们穿着朴素，面色沉郁，在花圈的引导下，走向灵堂，向为世界和平事业作出贡献的周恩来表示哀悼。有的外宾甚至走到文化宫大门了还在放声痛哭。群众吊唁队伍从早晨5时多就在天安门广场排好了队，许多人的抽泣声和哭声压过了隆冬的朔风。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自动聚集起来，要求参加吊唁仪式。过去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还不断从外地来，虽未赶上告别，但都参加了文化宫的吊唁。如龙飞虎一家就是从西安专程来北京的。

吊唁活动一直持续到14日下午。列队进入吊唁大厅的每一个人都深深地向周恩来的遗像鞠躬致哀，然后静静地离去。但是，哭泣声与丧礼的肃穆气氛夹杂在一起，很多吊唁者不能控制自己的眼泪。由于过度悲伤，以致有的人晕了过去，有的人需要由旁边的人搀扶着。更多的人用眼泪润湿透了的手帕掩面。3天下来，吊唁周恩来的人数远非治丧委员会规定的4万人，已达8万多人。主要是我们把吊唁的时间增加了一倍，当然这件事没有什么人批示同意，也没有人反对，只是大家心里明白，这是我们能为总理做的一件事，也是人民的要求。即使这样，吊唁的人群依然不断。

14日下午5时30分，群众吊唁活动结束。约7时，邓颖超慢步走进灵堂，手捧周恩来的骨灰盒向大家深情他说：“我现在手里捧着恩来同志的骨灰，向在场所有同志表示感谢。”语音未落，全场悲声四起。接着，邓大姐捧着骨灰盒，在张树迎、高振普的搀扶下，走下了台阶，登上周恩来生前乘坐的红旗车，在我们陪同下，将骨灰盒送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暂放，准备第二天移到追悼大会上。这一安排，也是邓大姐对周恩来关心台湾工作的一点安慰。

周恩来卓越的历史贡献和伟大的人格，使他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世界上也享有崇高声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无限悲痛。从12日至14日，首都群众8万多人，在北京的外国朋友2000多人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参加了吊唁仪式。40多个国家、政党送了花圈，130多个国家、政党发来了唁电和唁函。到追悼活动结束时，共收到唁函、唁电13000多封，花圈数千个，花圈款10000余元。

“四人帮”害怕中央机关和北京市自动举行悼念活动，他们要治丧委员会办公室通知各机关，不准自设灵堂，不准戴黑纱。这个通知，倒引起许多人的反感，许多机关采取不同方式举行了悼念活动。我也不管他什么通知，和统战部办公室同志在礼堂布置了灵堂，统战部送了个花圈，我一家送两个花圈，一家人戴上了黑纱。不少同志也戴了。礼堂屋顶下了半旗。

除了中央组织的追悼活动外，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地群众均自发地举行各种仪式追悼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连日来，川流不息的群众，抬着精心制作的花圈，络绎不绝地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追悼日结束时，至少有200万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向周总理致以最后的敬礼。来到这里的人，有的宣誓，有的高唱国际歌，有的朗诵诗词，有的表决心。一圈又一圈的致哀人群形成了一股股巨大的哀潮。人民英雄纪念碑在成千上万个花圈的簇拥下，形成一个巨大的花坛。纪念碑四周的青树，全都挂满了白花，远远望去，就像大自然中的万株白菊，这象征着亿万人民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高度的颂扬和深情的怀念。1月13日当代文豪郭沫若作的《怀念周总理》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情：“革命前驱辅弼才，巨星隐翳五洲哀。奔腾泪浪滔滔涌，吊唁人涛滚滚来。盛德在民长不没，丰功垂世久弥恢。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

从首都到全国的每一个工厂、农村、营房、机关、学校和院落，在天津、广州、上海、南昌、武汉、重庆、延安、南京，在周恩来工作、战斗过的每一个地方，在我们共和国的每一个角落，人们都在同心哀悼。

1月15日下午要举行追悼会了。参加追悼会的5000多人名单是治丧委员会定的，当然没有紫非的名字，她一再要求参加，我也没有办法。当天上午，从陕西潼关赶来一个在重庆曾家岩周恩来公馆当收发的蓝际成，坚决要求参加追悼会。我一再解释实在没办法安排。为满足他和紫非对周恩来的感情，我只得同人民大会堂负责警卫的同志商量，在追悼会前由我带紫非和蓝际成两人到会场向周恩来遗像行三鞠躬礼。

1月15日下午3时，5000多人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由王洪文主持，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

为了谁致悼词，听说在政治局会议上还有一场争论。“四人帮”害怕邓小平亮相，与广大干部群众见面。于是举出种种理由，极力排除邓小平。江青主张由王洪文或张春桥来致悼词。张春桥自知不够格，并以为王洪文太嫩，

就找到叶剑英，说：“现在全国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致悼词不合适，还是请叶帅来吧！”叶剑英完全明白他的用意，斩钉截铁地说：“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他是堂堂正正的党中央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替总理主持工作，理应由他来致悼词。再说，我的心情太难过，也读不下来。”张春桥碰了一鼻子灰，只好作罢。

邓小平在追悼会上致的悼词，通过他那严肃的表情，沉痛的声调，感染了会场内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当邓小平念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时，全场都呜咽起来，1分钟后，邓小平才接着念下去。许多老一辈革命家肃穆伫立在那里，和广大听众一样，止不住泪如雨下。邓颖超在追悼会上眼泪不断地流淌，但她坚强地咬着牙，忍着悲痛没有哭出声来。晚7时，邓大姐带领我们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内的北小厅，向总理的遗像和骨灰默哀后，打开了骨灰盒。她用颤抖的双手，捧起骨灰，眼含热泪，缓缓地说道：“恩来同志，你的愿望实现了，你安息吧！”在场的同志听到这些话都哭了，都知道这是大姐在同总理作最后诀别。

早在12日上午，邓大姐就约西花厅党支部委员张树迎、高振普和赵炜3人谈话，讨论把周恩来的骨灰往哪里撒。她告诉他们，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恩来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请求。她得到这个消息后才放心，因为恩来同志生前最担心的是怕她办不成这件事，现在办成了。还说她和恩来同志年轻时都做过支部工作，一直重视党支部的作用。所以这件事就依靠党支部，不要惊动更多人，也不麻烦上级组织了。并让他们到北京附近有水的地方去看一看，能不能撒骨灰。这次会议就确定了张树迎、高振普负责完成撒骨灰的任务。

我从参加治丧委员会工作后，一直与大家一起，参与了治丧的全部过程。追悼会后，我一直在等待治丧委员会点名参加撒骨灰仪式。可是没有让我去，只去了4个人，其实增加一个也是完全可以的。我在总理身边工作几十年，他去世前不能看望，现在也不能最后送他一程。当然我只得服从组织。但无论如何，这又是我的一大遗憾。

尽管我没有参加，后来还是了解到撒骨灰的详情：15日傍晚19点50分，几辆不起眼的车子避开记者，载着总理的骨灰，直接驶抵通县机场。执行播撒骨灰任务的空军运输团的一大队二中队已在15日白天作好了充分准备，执行任务的飞行机组成员包括：正驾驶、副中队长胥从焕，副驾驶、飞行员唐学文，领航白海坤，通讯员、空中机械师、机务副中队长陈宝森。使用的飞机是苏联制造的安—2型飞机，编号7225。这是执行农业飞行任务的专用飞机，装备有整套喷撒农药的机械设备。机组成员在接受空军和国务院领导下达的任务后，就转移到机场内滑行道旁的一座独立小楼中。当天黄昏，胥从焕及机组成员登上飞机，作了一次试飞。飞机和喷撒设备的运转情况都很正常。试飞之后，空军两位领导干部都陪着机组成员守候在飞机旁。

晚8时许，治丧委员会的郭玉峰（中组部部长）、罗青长（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原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和总理生前的卫士张树迎、高振普走出吉普车。他们抱着4包大约30厘米长、15厘米宽的白布口袋，在空军领导干部的护送下上了飞机。邓大姐也随车到达机场，目送飞机起飞。那天夜里，天空格外清澈，明月高悬，繁星闪烁。她望着飞机，飞出很远很远，直到看不见机影了，才上车回家。

20点15分，飞机起飞后，胥从焕根据随机领导的要求，在飞机经密云水库上空，高度500米时，第一次拉了播撒把手，将一部分骨灰撒在湖泊中。

在飞经天津市塘沽上空时，第二次拉了播撒把手，又将一部分骨灰撒在周恩来青年时代学习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在黄河边的北镇，第三次将骨灰播撒在代表伟大的中华民族历史摇篮的黄河边的沃土上。至此，撒骨灰的任务全部完成，15日零时45分，飞机安全返航，整整飞行了4个半小时。

邓颖超回到家中，空军司令员张廷发随时向她汇报了飞行情况。邓大姐的心随着飞机，越过高山峻岭、平原大地，……直到是夜子时，这些同志完成了任务，安全着陆，邓大姐才放下心来。

周恩来的逝世，全国人民陷于深深的悲痛之中，而“四人帮”却以为去掉了他们篡党夺权的一大障碍，甚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蹂躏人民的感情，践踏人民的意愿。

1月9日，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四人帮”的爪牙于会 通知文化部各单位在悼念期间不准戴黑纱、不准设灵堂，不准送花圈，并且要求文艺团体照常进行文艺演出活动。当日晚，他们竟以招待外宾为借口，强令中央乐团演出，外宾观众纷纷退票，以示抗议。他们又从音乐学院强拉师生到剧场填空。说：“一定要演出，这是一场战斗，就是剩下一个观众也要演出。”演员万分悲痛，停止演出。工人、干部无比气愤，纷纷打电话抗议，于会 等则说这是“阶级敌人的恐吓”，通知公安部门追查。

从1月9日起，姚文元作了一系列指示，控制舆论，砍杀悼念周恩来的报道。作为中央机关刊物的《红旗》杂志竟然不登讣告和悼词。

相反，1月14日，根据姚文元的指令，《人民日报》刊登《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文章第一句话就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这是强奸民意，蹂躏民心、党心。文章发出后群情激怒。许多读者气得把这张报纸撕得粉碎，纷纷打电话质问：“当前全国人民注视着、关心的大事是周总理逝世，是悼念周总理，怎能说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的大辩论。为什么不宣传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为什么不宣传周总理的丰功伟绩？登这篇文章究竟安的是什么心？”

1月15日的《人民日报》在刊登的一组周恩来的照片中，有一张原来是1964年周恩来在莫斯科回击了苏联领导人的挑拨后从苏联回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到机场迎接的照片。这是一张很有历史意义的照片，过去发表过多次的。这次发表时相片上只剩下周恩来一个人，捧着一束鲜花，而其他3个人都被裁掉。当时，我就很不满意，裁去刘少奇，那时还情有可原，但是为什么把毛泽东、朱德也裁去？我愤愤不平地问中央新闻摄影组组长杜修贤。他告诉我，这是姚文元审查决定的，姚说只能出现一张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一起的照片，已有了一张，所以要剪去其他人。这真是咄咄怪事！

追悼大会开过以后，姚文元下令：“治丧报道要立即结束！”新华社原定16日要发布的全国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的综合报道，就被姚文元一刀砍掉。姚文元的指示显然不仅仅是他的个人意见，既有“四人帮”的，也有“帮四人”的。“四人帮”就是滥用他们的职权来发泄他们对周恩来的仇恨。

然而，连日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追悼、缅怀周恩来的人群仍络绎不绝。1月18日我同紫非也到天安门广场，同群众一道列队绕着纪念碑走了一圈，后来我还照了几张照片，把当时首都群众悼念总理的情景印记下来。1月18日，江青一伙违背全国人民心愿，如期举办全国舞蹈调演。1月28日，扣住纪录影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2月6日，内部刊物《参考资料》刊登一篇反动文章，在谈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大

屠杀时，无中生有地诬陷周恩来在幕后操纵，2月13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高路”（即梁效）写的《孔丘之忧》，大批“忧”字，把悼念周恩来的人民污蔑为“哭丧妇”，文章恶毒地写道：“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相反，对于悼念文章却不登。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折磨和痛苦，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了。“气不打一处来”，对“四人帮”压制哀悼周恩来的憎恶、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以至否定，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以至反对终于汇成巨大的愤懑。

祖国大地在悲痛和愤怒中燃烧。

2月下旬和3月初，在福州、杭州、贵州、重庆、太原、西安、广东等地贴出《“阿斗”的呼声》、《我爱我的祖国》、《对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几点看法》等传单、大字报、大标语、诗歌和上书毛泽东的信，以及各种各样的指责、批判“四人帮”的文章。许多市县还出现街头演讲，人民群众向“四人帮”公开宣战，人民已不再沉默了。

3月19日，北京市朝阳区牛坊小学红小兵，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了追悼活动结束后的第一个悼念周恩来的花圈。从此，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人流又一次首尾相接、川流不息，献给周恩来的花圈越来越多，形成了周恩来追悼会后第二次巨大的哀潮，并赋予了新的意义。

广大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怀念和热爱，对“四人帮”的愤慨和憎恨，激起一股爱与恨撞击的强烈怒火，就像天空中的陨石，与稠密的大气发生剧烈的磨擦，立刻变成巨大的火球，燃烧爆炸。这种爆炸的导火线，就是“四人帮”的喉舌，上海《文汇报》制造的“反周恩来事件”。

3月5日，新华社播发了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雷锋的报道，全文引用了周恩来生前为学习雷锋写下的4句题词。全国报刊大都原文转载。而《文汇报》不仅把这一消息挤到第四版，而且把周恩来的题词全部砍掉。群众对此已极为不满。可是，事过20天，3月25日，《文汇报》又火上浇油，在第一版上竟然刊登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恶毒咒骂：“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明眼人一看便懂，“党内那个走资派”就是含沙射影污蔑周恩来。

《文汇报》的这两支毒箭，射在亿万悲痛的人民群众的心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热爱周恩来总理的神圣感情受到了严重的挑衅。几天内，各地向《文汇报》发出抗议的信件、电报达400多件，抗议电话2000多次。人们纷纷指出：“反周总理的人不得人心。”责问：“《文汇报》必须向全国人民交代事件的真相！”对此，王洪义说：“删除题词是屁大的事。”张春桥说：“不要批评报纸，报纸以后还要删。”

于是一个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巨大火球开始引爆了，一场伟大的群众抗议运动兴起了！

这场运动从南京开始，汇总到北京。南京是周恩来出生入死战斗过的地方，南京人民对周恩来怀有深厚的感情。《文汇报》“反周恩来事件”发生后，3月25日晨，南京大学数学系的400多名师生抬着周恩来的巨幅遗像和用洁白的玉兰花制成的花圈，特意绕道新街口繁华的街道，去梅园新村悼念周恩来。沿途许多工人、学生、干部和群众纷纷自动加入，汇集成为南京市民反对“四人帮”的第一次大规模示威洪流，当时把梅园的围墙都挤垮了。

3月29日，南京大学300多名学生分成20个小组，走上街头刷写大字

标语。当晚他们拥向火车站，在铁路职工的帮助下，把“谁反对周恩来就打倒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等大字标语，写在火车车厢上，带往成都、上海、北京等各大城市。31日，在南京中山路的一幢大楼上贴出了“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的大标语，受到观众的热烈鼓掌欢迎。

也就在同一时间，“四人帮”胆战心惊，开始利用当时窃据的合法权力和地位，进行反扑。3月30日，王洪文对他们安插在《人民日报》的心腹鲁瑛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并说：“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下令一律取缔。

然而，人民的力量是无坚不摧的。“南京事件”继续扩大。可以说当时的广大人民群众是被深深根植于亿万人民心中的深刻危机感所召唤，为了民族的安危，为了中国的光明前途，为了亿万人民的幸福，奋勇地走上全国各城市的街头，汇集于首都天安门广场。

连日来，北京集合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群众日益增多，天安门广场成了悼念周总理的祭坛。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放满了花圈花篮。数不清的悼词、传单、诗词出现在纪念碑上和花圈丛中。人们自发地朗诵诗词、发表演说、宣誓默哀，采取各种形式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痛斥“四人帮”。进入4月，斗争达到空前紧张激烈的程度。正如一首民谣所唱：“一月人民悲痛；二月人民睁开哭肿的双眼；三月人民在怒吼；四月人民投入决死的战斗。”

4月1日，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秩序井然，到处是悼念周恩来的人群。有一个巨型花圈非常引人注目，黑底上写着白字：“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总理。”有一首诗贴在纪念碑前：“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首脍炙人口的诗迅速传抄到全国各地。它出自山西一位工人共青团员王立山之手，北京公安部门特把它列为“001号反革命案件”，进行重点追查。

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当前局势。但叶剑英、邓小平没有出席。叶剑英早就被以“生病”为由，解除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而邓小平实际上已处于被批判的地位，从周恩来追悼会后，就没有露面。会议认为当前全国各地流传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故闹事，还要利用清明节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的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的活动。这个动向值得注意。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央可以正式发一文件，说明所谓“遗嘱”之类是敌人造的谣言，是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不要上当。会后当天，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批准的电话通知，错误地指出：“最近几天，南京出现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求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复盖”，并且指出：“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要追查这次事件的“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

4月2日，北京出现了第一支大的游行队伍。清晨，中国科学院一九厂的职工，用4辆卡车开道，抬着4个大花圈（两个献给周总理，一个献给陈毅、一个献给杨开慧）和4块巨型诗牌，牌上写道：“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他们穿过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走进天安门广场，把诗牌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十分显眼的最高处。几乎同时，北京重型机床厂工人制作的第二个铁花圈送到天安门广

场。巨大的诗牌，钢铁的花圈，十分引人注目。这一消息在整个北京迅速传播。

也就在这一天，北京各单位普遍传达了中央关于南京问题的电话通知。说什么：“清明节是鬼节”，“送花圈是四旧”，“天安门有反革命分子捣乱”，要求人们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这道禁令不仅没有吓住群众，反而起了更大规模地动员群众的作用。

4月3日，天色阴沉，细雨迷蒙。无数支人流伴着淅沥的小雨，迎着蒙眬的曙光，从四面八方涌进天安门广场。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怀着深深的崇敬之情，把亲手制作的花圈敬献给纪念碑前。这一天，到天安门的群众达百万人以上。数不数的悼词、传单，犹如冲决堤坝的洪水汹涌而出，遍洒广场。我和紫非也在晚饭后，散步到天安门广场，亲眼目睹了这一场面，并用照相机记录下来。“电话通知”怎么能把群众的心情压下去呢？人民一旦觉醒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

4月4日，清明节又是星期天，天安门广场的活动达到高潮。这一天到广场的人数达两百万人次。广场上空两个气球悬挂着“怀念总理”、“革命到底”的白色飘带，十分引人注目。整个广场到处是精制的花圈，张贴的诗词，成了一片花山诗海。由纪念碑往南的两排柏树墙上，挂满了人们留下的白花。连旗杆灯柱和华表上，也吊满了条幅、花篮和花圈。“哀思念总理，誓言动天地，鬼蜮欲出笼，九天有霹雳！”一时间，卷起了哀曲和愤歌的浪潮。

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群众活动问题。作出了收缴花圈、禁止群众悼念活动的错误决定。毛泽东把会议讨论“天安门事件”的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毛泽东圈阅，并说“天下已定”。

在党内民主生活极端不正常的年代，邓小平、叶剑英又被排斥在政治局会议之外。而毛泽东听信了江青一伙的歪曲、欺骗。再加上当时党中央领导受“左”的错误思想支配，屈服于“四人帮”的压力，从而导致了历史的颠倒、历史的倒退。这是多么严重的历史教训啊！

4月5日凌晨1时，北京出动5000民兵和3000公安人员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花圈惨遭洗劫。200辆大汽车将花圈、条幅、诗词等运往八宝山销毁，只留下小部分放在中山公园当作“罪证”。王洪文还到“联合指挥部”小灰楼向亲信们面授机宜。广场路口和纪念碑周围被封锁，有些自愿看护花圈的人被当场抓走。

清晨，广大群众冲破封锁，陆续涌向天安门广场。可是花山诗海不见了，护卫花圈的人被抓走。大家愤怒异常。有数万人围在大会堂东门口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

这时，广播车奉命出动，在马路上来回行驶，广播什么：“清明节已过，悼念活动已结束，请革命同志赶快离开天安门广场，要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等等。这种论调群众太熟悉了，于是拦住了广播车进行质问：“谁组织过我们悼念周总理？”“悼念活动何时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阶级敌人是谁？谁破坏捣乱？”一辆广播车在理屈词穷之后，接受群众的要求，喊了“周恩来万岁！”才被放行。另一辆对群众的质问置若罔闻，一再重复“要警惕阶级敌人破坏”的滥言，结果被愤怒的群众推翻在地砸扁了。中午，群众包围了“联合指挥部”的小灰楼，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群众、保障人民有悼念周总理的权利等3项要求，均遭拒绝。被激怒的群众同前来

的民兵、警察等发生冲突。指挥部的几辆汽车在混乱中被焚毁，指挥部的小灰楼被烧。此时，张春桥、王洪文和他们的爪牙们一直在人民大会堂注视着广场事态的发展，研究指挥“反击”的部署。

晚上6时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奉命出面发表广播讲话，天安门广场所有高音喇叭一齐开放，反复广播。9时30分，联合指挥部下达了镇压的命令。突然，天安门广场照明灯全部开亮，隐蔽待命的1万名民兵、3000名警察和5个营的卫戍部队一齐出动，从四面八方包围广场，对群众进行殴打逮捕，200多名群众被打伤，纪念碑旁留下了斑斑血迹。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天安门事件”，后来被称为“四·五”运动。这是中国人民对“四人帮”举行的一次缺席审判。尽管这些罪犯当时还大权在握，逍遥法外，但正义的力量已经在政治上宣判了他们的死刑。

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群众运动，在“四人帮”的造谣污蔑下，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竟错误地把它当成“反革命事件”而加以镇压。而且还错误地把邓小平当成“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决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只“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四人帮”以为这是他们的胜利。可是当他们举杯庆“胜利”时，已经为自己挖好了坟墓。正如陈毅元帅常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与人民为敌的“四人帮”，仅仅过了6个月便被粉碎，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四人帮”问题，毛泽东生前就提出要解决，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引起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深深忧虑。老一辈革命家们都在思考着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多次反复研究、商量，慎重考虑，并征得当时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在10月6日以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名义，由华国锋、叶剑英亲自指挥，汪东兴负责执行，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实行隔离审查，解决了毛泽东、周恩来生前想解决而来不及解决的问题。中央政治局执行了党和人民的意志，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以后，又平反了“天安门事件”，肯定了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正义行动。还推翻了“四人帮”对邓小平的诬蔑和打击，恢复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邓小平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团的核心，领导全国人民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进行了公开审判，充分揭露和证实了他们累累罪行，并给予定罪量刑。亿万人民同声欢呼。历史是公正的审判官，人民是永久的执刑者。“四人帮”等这群历史风云中的小丑，被钉在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而全国人民正以高昂的斗志，满怀信心地沿着民主、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而努力奋斗。这一切一定能够告慰周恩来的在天之灵。

世界将永远记住他

周恩来的逝世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各国首脑纷纷发表谈话，哀悼周恩来；许多人撰写文章，悼念周恩来。联合国总部得知后降半旗致哀。安理会 12 日举行会议时，主席萨利姆回顾了周恩来总理的历史形象，并请代表默哀 1 分钟。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声明中说：“周恩来是一位十分卓越和深受尊敬的领导人，几十年来他以极大的忠诚服务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他对促进各国间了解和世界和平的献身精神受到了举世的公认，在当前危急的时期，世界不再能得益于他的智慧和政治家才干，这是一大损失。凡有幸会见过周恩来先生的人，无不对他产生钦佩和尊敬。”各国政府、政党、团体和无数个人纷纷给中国发来电、唁函，并且联系派代表到北京参加周恩来的吊唁活动。全世界几乎所有通讯社都发表社论，悼念周恩来。周恩来作为杰出的国务活动家、伟大的政治家和举世闻名的外交家，他的影响已超越国界。而且，他以其丰功伟绩、超凡的工作能力和崇高的品格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爱戴和世界人民的尊敬。

在日本，9 日黎明，知道周恩来逝世消息的三木武夫首相马上向报界透露，并通过驻华大使小川联系访问北京参加周恩来的葬礼。同时许多政界要人、经济界首脑和民间人士也向报界、电台或电视台发表谈话，表示哀悼，并表示争取参加周恩来的葬礼。日本要组织一个多达 600 人的朝野吊唁团来华参加吊唁活动。三木武夫说：“周总理不仅是中国的伟大领导人，而且是世界的有代表性的政治家之一，失去这样一位人物不仅是中国人民而且也是世界人民的巨大损失。没有一个外国政治家，像周恩来总理那样在日本各阶层人民中间有那么多的朋友，得到那么多的尊敬。”前首相田中角荣说：“周总理是和本世纪的中国历史同时走过来的人，是积累了实践经验的人，是世界性的政治家。我认为，周恩来总理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也将被长期传颂。”

日本电视台在 9 日早晨的新闻节目中，几乎都是报道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接着，从早到晚不断地播发，并报道周恩来一生的光辉事迹，其中特别着重中日友好的历史。见过周恩来的各界人士，发表对他的哀悼心情。

日本各通讯社都以最快的速度通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以及国内外的反响。甚至还出号外给予报道。这一天，日本 6 家全国最大的报纸均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和周恩来的半身遗像。各报均以大量的篇幅登载有关消息、评论、悼念文章、座谈记录和周恩来各个时期的照片。如《读卖新闻》、《每日新闻》、《朝日新闻》用了 6 版的篇幅，《产经新闻》用了 5 版的篇幅，《日本经济新闻》和《东京新闻》用了 4 版的篇幅。

自 1 月 9 日起，东京的中国驻日大使馆前的吊唁者终日络绎不绝。当天从政界首脑到平民百姓各界人士带着十分悲痛的心情纷纷到中国驻日使馆吊唁，并敬献花圈，表示深切的悼念。三木首相曾两次到使馆吊唁。大使馆还收到很多日本朋友发来的唁电以及接到许多表示哀悼的电话。后来大使馆吊唁大厅的花圈放置不下，以致使馆门口及其街上也摆满了花圈。可是吊唁人群和花圈有增无减，影响了交通。最后，只好把花圈移到附近公园里。而且，有许许多多日本人民在邮局排队拍发国际电报到北京，对周恩来的逝世表示哀悼。可见周恩来在日本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同时，日本各大报纸，还纷纷就周恩来逝世发表社论和文章悼念周恩来。

《每日新闻》9日晚登载的一篇文章说：“无论是爱中国的人或者恨中国的人都认为，他的逝世是当代最伟大的一位政治家逝世了。……像周恩来那样有许多传奇性的故事的人物是很少的。”尤其是通过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访问非洲等等，周总理的人品在国际上已有定评了。外国人得到的种种印象，恐怕用1955年会晤了周恩来的前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一句话就充分表达了，他说：“在周恩来总理面前，我不能不感到自己是野蛮人。”《读卖新闻》9日登的评论说：“周总理能一生保持他的革命生涯，是由于他有着无私而诚实的人格。他不追求最高的地位和权力，始终致力于‘党和国家的团结与统一’，晚年则致力于培养‘革命接班人’。”

《公明新闻》1月13日在读者来信栏刊登了千叶县山本忠雄的来信：“我认为，恢复在联合国的权利、中美关系正常化、恢复日中邦交，中国从过去在国际上遭到‘遏制’的状态下一跃而登上大显身手的国际政治舞台，作为其主角，周总理的贡献的确是巨大的。……中国给人的深刻印象是重信义的国家，是通情达理的国家。这多半是把通过周总理所获得的印象重合在一起了。正是周恩来这样的人物对宣扬现代中国所起的作用是伟大的。”

各报刊杂志的纪念文章在日本史上，对一个外国人的赞美和数量之多堪称之最。周恩来生前会见过数千名日本朋友，从首相、大臣、议长、议员，各种友好协会的负责人、工作人员，到作家、科学家、艺术家、运动员、记者、工人、农民都曾是他的座上宾，与他亲切交谈。这些日本朋友在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推动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友好交流合作的过程中，亲眼目睹了周恩来政治家的风度和可亲可敬的音容笑貌，亲耳聆听了他那富于哲理和体察入微的谈吐言论。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不同方面，从个人、团体、民间及官方等不同角度，回忆了与周总理接触、交往的情景，揭示了周恩来为发展中日友好事业和世界和平作出的贡献，再现了他的领袖风采和政治魅力，表达了对周恩来的敬佩、信赖和亲近的感情。

亚洲其他国家对一个逝去的外国政治家的追悼活动，从没有像对周恩来逝世的悼念那样悲痛、隆重。

朝鲜一获悉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后，党和政府马上联合作出决定：“1、为对周恩来同志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党政代表团。2、把进行周恩来同志葬礼的前一天和当天定为全国志哀日。在志哀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机关、工厂、企业、学校，街道和农村都挂丧旗。进行周恩来同志葬礼之日全国停止一切歌舞。”后来，在中国谢绝外国吊唁团赴北京参加周恩来吊唁活动的情况下，金日成主席派专机向设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周恩来总理灵堂送了一个大花圈。

周恩来的逝世在巴基斯坦引起了深深的悲痛。当消息9日传到巴基斯坦后，布托总理立即命令全国下半旗3天，即9日、10日和15日。当晚布托就到中国大使馆吊唁。巴基斯坦人民充满悲痛，到处是默哀的忧郁，所有公共建筑物上的国旗都下半旗。拉瓦尔品的电讯说：“周恩来几乎成了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命运的一部分，他的逝世对大部分巴基斯坦人来说，就像失去了一位长辈。”巴基斯坦政府、政界、社会和工业以及全国其他各界的官员和知名人士都发了唁电表示悲痛。大多数乌尔都文报纸和英文报纸都显著报道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并为这一不幸的事件发表了社论。巴基斯坦政府还决定全国志哀1周。在这期间，政界领导人和各界代表对周恩来的逝世发表哀悼

的讲话，并盛赞周恩来对中国和世界的贡献以及他的品格。布托总理称：“如果世界上有完人的话，周恩来是个完人。”

连日来，泰、马、菲、新、印尼、缅甸6国的报纸、电台都把有关周恩来逝世及治丧活动的消息，作为重大政治事件处理，无论从报道的规模，还是版面、时间、安排，都是空前的。

缅甸总统奈温自撰文章悼念周恩来总理，他写道：“虽然周恩来总理是一个大国的领导人，但是，他同较小国家的领导人交往时，总是平等待人，在他同较小国家的关系中，在包括复杂问题在内的各种问题上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与和解精神。”

在美国，也引起了震动，人们把周恩来的逝世当成世界上的一件大事。在人们的记忆中，这恐怕是30多年前罗斯福总统逝世以来，美国报刊、电台报道范围最广、时日最长的一次。美国东部时间，1月8日晚间，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传到美国，反应最快的广播和电视网，不少便以“公报”的形式宣布了新华社的电讯。当晚的电视和无线电台首先报道了由白宫发表的福特总统的吊唁声明：“周恩来总理将作为一位杰出的领导人，长久铭记在人们的心中，他不仅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而且在世界舞台上都留下了他的印记。我们美国人特别不会忘记他在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新关系方面所起的作用。我们确信这种关系将会在他帮助建立的谅解和合作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美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哀悼。”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声明说：“周恩来总理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是一位伟大的领袖。”“我尊敬他、钦佩他。”前任总统尼克松发表致哀谈话时说：“我对周总理逝世深感悲痛。”他说：“20世纪只有少数人比得上周总理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在过去的25年里，我有幸会见过的100多位政府首脑中，没有一个人在敏锐的才智、哲理的通达和阅历带来的智慧方面超过他，这些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

《纽约时报》9日社论说：“周恩来是20世纪中有远见的一位政治家。”“从1920年以来中国历史的更大的方面来看，周恩来是仅次于毛主席的一位巨人。”“组织家、宣传家、行政家、谈判者、军事领袖、调解人，在使中国变成一个世界政治强国的循环过程中，差不多没有一种重大任务他没有担当过的。”10日的《华盛顿邮报》评论说：“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家、政策决定者和行政家，历史重要性仅次于毛泽东的周恩来，看到了中国脱离外国支配，以无比的魅力和成功处理重大贫困，确立在亚洲的卓著地位，和负起国际舞台上广泛与核心任务。他随着历史而移动，他也移动了历史。”《华盛顿明星报》记者布莱德舍尔在9日一篇很长的文章中这样说：“毛泽东是共产主义中国的思想与建筑师，50年来的关键人物周恩来，是现代中国的一位建设者。”文章又说：“在过去的25年来，他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精力和才智，主持中国的政务，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成一个具有世界重要性的国家，一个长期贫困的国家达到目前的繁荣。以经济成就为基础的中国军事力量，中国在世界议事厅上的重量，这一切周恩来的创造，是和毛泽东主席的创造相仿的。”

在欧洲，人们对周恩来也是景仰备至的。周恩来的逝世引起了极大反响。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各国的报刊、电台、电视无不显著报道，并有专文、专题介绍周恩来的生平和功绩。9日英国《泰晤士报》，《每日电讯》和《卫报》都刊登了讣告，占有报纸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版面。法国的《费加罗

报》、《巴黎日报》、《世界报》等也是如此。西班牙 5 家全国性的报纸都以显著地位刊登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和介绍他的情况。

英国一家报说：“在对外政策方面，他可能比他的许多同事更能应付自如地同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尽管这个政策是由毛制定的。在 40 年代末期，周曾经长期同美国进行了谈判。并在 1954 年的日内瓦会议上进入外交舞台。”“路透社”说：“周是中国学问造诣很深的有才学的官员，但是，却能和西方人相处得很融洽；他衣冠整齐，风度端凝，把差别很大的开通的西方世界和神秘的东方世界沟通了起来。他博得了斯大林和美国的乔治·马歇尔将军这样大不相同的人物的尊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也十分尊敬他。”西德基社盟主席施特劳斯说：周恩来“是一位有高度教养和能洞察别人内心活动的会谈伙伴，对欧洲人来说，他简直是典型地体现了这里的人们对一位古老中国文化的代表的概念。”

法国前驻华大使马纳克在 10 日写的怀念周恩来的文章中说：“他是一个完人，他的事业充满了生活的各种困难和无数令人惊叹不已的危险与不安，但是这一冒险不是被遭受到的，而是被寻求、被选择，就像为人类的更高命运而前进，而生活一样。榜样超出了中国的边界。全世界，特别是贫穷而自豪的人们，都只能为这个朴实而情长谊深的高大影子哭泣。”

除此之外，人们还交口称赞他的高尚品质和风采。西德《世界报》说：“凡同周恩来会见过的人都认为他是有魅力的、卓识的、超群的和令人神往的。”“路透社”说：“他是一位温文尔雅，通达人情，永远是对人面带笑容，彬彬有礼的人，一个有着钢和冰的性格的人。”“法新社”说：“在个人方面，这个人的性格非常高尚。他的态度和谈吐，他的与众不同、高尚、有时讥笑的态度使他具有的魅力，以及对他的国家和使命的坚定忠诚，使人不能不尊重和敬佩他。”英国《观察家报》说：“周恩来是位学识渊博的政治家；也是个和善而懂得数国语文的官员；他不爱喝酒、有幽默感和是个跳舞能手；他又爱好艺术和歌剧。他对世界局势，又了如指掌。他是中国最忙碌的人，每天大清早起来，一直工作到凌晨。”《星期日泰晤士报》说：“他虽在 70 高龄，还如常每天工作 18 小时而毫无倦色。”《巴黎时报》国际部主任 10 日在该报发表文章介绍周恩来的生平称：“让我们从他的生平中的最微小的、能说明一切或几乎一切的事情谈起，这就是谦逊，中国千年历史的最令人鼓舞的时刻之一正是应归功于他的一生，而且本世纪的世界也要把它最高尚的形象之一归功于他的一生。中国没有周恩来的雕像，没有发表他的语录或著作，也没有他的传记，但在无数家庭的内心中是完全有其塑像的。”

另外，第三世界国家都认为周恩来的逝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也是第三世界的巨大损失。

埃及总统萨达特得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后，马上决定派高级政府代表团，由副总理加奈姆、副议长马泰菲和国民警卫队司令马赫将军组成，到北京去表达他个人对周恩来逝世的哀悼。埃及《今日消息》周刊发表文章赞扬周恩来在“我们东方的历史上起了杰出的作用”。

墨西哥当地时间 8 日晚，得到周恩来逝世消息的埃切维里亚总统便发表声明表示沉痛哀悼。全国主要报纸除了刊登消息，还分别就周恩来的逝世发表了社论和专题文章。《国民报》的社论说：周恩来总理的逝世“除了不安之外，这一消息造成的普遍情绪是深切的悲痛，尤其是第三世界人民，……周恩来总理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尊敬”。

阿尔及利亚布特弗利卡外长 9 日在欢迎越南武元甲将军的大会上，提议默哀 1 分钟，以悼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这次大会除阿尔及利亚政府、军队、党中央高级干部外，还有越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波利萨里奥阵线和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解放运动的代表。

阿尔巴尼亚各工厂和农业社进行集会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当地时间 9 日凌晨许多工厂企业上班前为周恩来总理默哀 1 分钟。集会时，宣读讣告，介绍生平，然后，通过给中国驻阿使馆的唁电，沉痛悼念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逝世。

尼泊尔加德满都对周恩来的逝世感到震惊。古里首相说：“中国总理是尼泊尔的伟大朋友和同情者。”前首相比斯塔的话概括了大家的感想，“尼泊尔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市评议会还举行了一次集会，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并通过表示深切悲痛的决议。会上全体起立默哀两分钟，祝祷故人在天之灵永远安宁。

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当地时间 9 日对周恩来总理的逝世发表声明，她说，听到周先生的逝世的消息时，感到悲痛和深为震惊。在我个人对他的逝世感到若有所失的同时，确实可以说，斯里兰卡失去了一位一贯的、真诚的朋友。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享有最高声望的世界人物。特别是对发展中世界来说，周先生一向是鼓励它们努力摆脱外国控制的巨大鼓舞源泉。班达拉奈克夫人还宣布 1 月 15 日为全国哀悼日，以表示对中国总理的尊敬，并下令从这天起到举行葬礼那天止，各公共建筑物下半旗。斯里兰卡政府当天也宣布，全国为中国总理周恩来志哀 4 天，为周恩来举行葬礼的日子为公休日，并举行哀悼。而且班达拉奈克夫人还希望去北京参加周恩来总理的葬礼。

还有，阿富汗为周恩来总理逝世下半旗 2 天。坦桑尼亚下半旗 3 天。赞比亚、肯尼亚许多官员和人民获悉消息后，打电话和到中国使馆、新华社内罗比分社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哀悼。扎伊尔、加纳各界人士通过各种渠道表示他们的哀悼和他们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同情。

总之，几乎全世界人民，绝大多数的国家及其领导人或政治领袖，所有较为负责的国际舆论，对周恩来的逝世都同声悲悼，众口一词地赞扬他的一生。一切同周恩来有接触的人士，都对他留有良好的印象。任何对国际政治、对人类历史、对现实世界稍有认识的人，都对周恩来怀有敬意。其中一些政治领袖称赞他，并不一定是他们个人对周恩来有特殊好感，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周恩来总理以他那为国为民的崇高品格、以及大公无私的献身精神，赢得了世界人民（包括他们本国人民）的崇敬和爱戴。因此，他们不能不反映人民的意愿，至少是不违背人民的意愿。

周恩来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也永远活在国际友人的心中。

周恩来在我心中

周恩来虽然离开我们 20 年了，但他那伟大的形象，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永志不忘。

周恩来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子，顶天立地的英雄。

他从小就热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他 12 岁读小学时，就树立了读书“为中华崛起”的雄心壮志，19 岁东渡日本寻求救国救民道理时，给同学留下了“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豪言壮语。从此、他终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祖国的统一和兴旺发达而英勇奋斗！

他具有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他勤劳、勇敢、艰苦朴素、谦虚谨慎。他敬老、尊贤、携幼、扶贫……

他把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在中国革命事业中加以发扬、提高，使它为革命事业服务。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自青年时代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后，就矢志不移，并以革命的实践为之奋斗终生。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他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他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坚决支持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斗争，支持人类的进步事业。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

无论是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的地下工作环境，或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的艰难困苦年代，还是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包围甚至随时可能被逮捕的日子里，或解放战争中同毛泽东、任弼时被胡宗南大军包围在陕北时，他都毫不气馁、斗志昂扬、信心十足地指挥战斗，坚信中国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他一生遇险十几次，都由于他的大智大勇而化险为夷。

在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挫折的时候，他坚信这是暂时的现象；他坚持人类的进步事业一定能够胜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始终要继续发展并最后取得胜利。

他临终前，仍以彻底的唯物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终生战友、伴侣邓颖超一起合唱“英特纳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周恩来生命中的最强音。

周恩来是久经考验的党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

他几十年来一直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参加党的一切重大决策，又一直是站在斗争的最前线，领导革命队伍，出生入死，不屈不挠，为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英勇顽强地战斗，直到胜利。

1919 年五四运动，他站在游行示威学生的前列，不畏军阀的监禁，在牢里坚持斗争。1925 年到 1927 年第一次大革命中，他率领黄埔军校学生进行了两次东征，一直在前线指挥战斗，并取得胜利。他同蒋介石的反共阴谋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他和赵世炎等同志在上海领导工人起义，进行武装响应北伐军胜利进占上海。

大革命失败后，1927 年 8 月 1 日，他和朱德、刘伯承、贺龙、叶挺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以革命武装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武装的第一枪，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

1931 年 4 月，上海党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由于周恩来事先派到国民党中统特务部门隐蔽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及时报告了消息，周恩来

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果断地安全地转移了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使国民党特务一网打尽从事地下工作的党中央领导人的阴谋落空。他长期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的组织工作，为党的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1931年冬到中央苏区后，即和毛泽东、朱德一起指挥红一方面军对敌作战。1932年4月，周恩来接受毛泽东东征福建漳州的意见，并由毛泽东率领红军东路军占领漳州，取得了伟大胜利。10月，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即和朱德一起在前线直接指挥战斗。1932年2、3月间，他和朱德抵制了临时中央要红军攻击敌人坚守的城市南丰的错误指示，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法，消灭了蒋介石的主力部队3个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由于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及军事顾问李德军事路线的错误，使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实行长征。周恩来和朱德、王稼祥指挥红军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于1935年1月渡过贵州乌江，到达遵义地区。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和张闻天、王稼祥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并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会上，解除了博古、李德的指挥权。会后，周恩来和毛泽东、王稼祥受中央委托，负责指挥中央红军，在川西草地粉碎了张国焘的破坏阴谋，克服了重重困难，到达陕北苏区，同红十五军团会合，取得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接着，他和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了直罗镇战役，消灭东北军两个师，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红军的第三次“围剿”。经过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和右倾逃跑错误的反复斗争，使红二、四方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同一方面军会台，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

周恩来是统一战线工作的模范。

还在1925年到，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就明确地提出革命的领导权、革命动力和朋友问题，正确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作出了贡献。他同国民党左派廖仲恺、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等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在黄埔军校依靠进步学生和教职员，团结了广大中间力量，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进行又团结又斗争。当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对蒋介石进行反共行为实行妥协投降时，他和毛泽东等对陈独秀进行严肃的批评。当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以后，他在南昌争取了国民革命军中进步将领贺龙等率部和叶挺、朱德一起举行南昌起义。即在土地革命时期，周恩来也通过一些渠道，同反蒋的地方势力如西北的冯玉祥、西南的刘湘、两广的李济深、陈济棠等进行了统战工作。在城市中，实行保护工商业政策。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和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州建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号召抗日反蒋，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主张同他们联合，但由于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反对，失去了同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结成统一战线的大好机会。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以后，周恩来一直站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最前线。他任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迅速地开展了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首先1936年2月，派李克农代表红军到洛川同张学良将军和王以哲军长谈判，打开了红军与东北军联系的大门。4月，周恩来又秘密到肤施（延安）同张学良将军会晤，取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并交换了共同逼蒋抗日的意见。接着，又加强了对西北军杨虎城将军的工作，

都取得很大的成绩。同时，他直接指导张子华、潘汉年等同南京国民党的谈判工作，开展对西南、两广的地方势力的统战工作。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赶往西安，根据中央指示，同张学良、杨虎城商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在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条件后放蒋回南京，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结成三位一体，挫败了亲日派何应钦等发动内战的阴谋，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到全国，为促成国共正式谈判，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打下了基础。

从1937年2月到9月，周恩来以中共全权代表或首席代表身份，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同国民党代表，主要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他坚持党的基本原则，又采取机动灵活的策略，克服种种困难，使谈判取得成功。9月，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第十八集团军），开赴山西抗日。随后，周恩来亲临山西同阎锡山、傅作义等进行协商，使八路军顺利到达山西前线，并取得平型关的首战胜利，使敌后抗日战争和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起来。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先后在南京、武汉、长沙、桂林，主要在重庆，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坚决执行党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贯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使抗日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和发展。他一直代表党中央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谈判，争取蒋介石坚持抗战。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打退了蒋介石的三次反共高潮，维护了国共合作关系，使抗日战争取得了彻底胜利。

在这个时期，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势力等中间力量做了大量的工作，使他们响应我党的政治主张，同我党合作，一起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同时，巩固了蒋管区的地方党组织，发展了进步势力，使广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成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基本力量。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周恩来付出了全部精力，取得了巨大成就。他和王若飞协助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争取了《双十协定》的签订。他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联合民主党派，争取了有利于人民的“五项协议”。

1946年5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南京，团结了民主党派和广大中间力量，在维护政协协议和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斗争中，进一步团结了中间力量，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争取了国际舆论的同情，使国民党反动派处于孤立地位。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关闭国共谈判大门，中共代表团被迫撤退后，周恩来在全力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同时，又继续领导国民党地区的党组织，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争取了国民党的大量军政人员特别是百万以上的国民党军队起义，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战争，加速了蒋家王朝的灭亡。

周恩来的一生，广交了许多党外朋友。1949年，他亲自指挥组织了大量的著名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进入北平，和中共及各界群众团体、各少数民族、华侨代表一起筹备和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这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成就，也是周恩来正确进行党的统战工作的伟大贡献。

建国以后，周恩来一直担任政府总理，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时期的人

民民主统一战线，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开展港、澳、台和海外的统一战线工作，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周恩来仍想尽一切办法保护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爱国人士免受冲击，利用时机恢复他们的政治活动和名誉。使党的统一战线得以继续和发展。

周恩来是党、军队和国家的创始人之一、卓越的领导人。他参与党中央领导几十年，从不计较自己的名誉地位。当党中央发生路线斗争时，他立场明确，态度鲜明，为了维护党中央的团结和威望，他忍辱负重、任劳任怨地做艰苦的工作。他一直尊重毛泽东，在毛泽东受到“左”倾教条分子批判时也一样。他对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形成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都作了重大贡献，他竭尽精力和智慧协助毛泽东工作，对毛泽东的安全和健康，极为关心，经常亲自布置和检查。

他主持政府工作，坚决贯彻党中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重大问题都先向中央或毛泽东请示报告，保证了党中央对政府工作的绝对领导。要提交国务院会议决定及全国人大审议、批准的重要案件，都先经过中央审批再送，经批准和通过后，即坚决执行。

他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工作中充分发扬民主，特别重视党外人士和专家的意见，重视不同的甚至反对的意见。重大建设项目，要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反复论证，才作出决定，并具体落实到部门，执行中加以严格检查，发现问题即研究解决。

他全面领导政府的工作，各方面都有重大建树，在外交工作方面尤其显著，无论在中国人民中，在国际友人以至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中，都公认他为“杰出的外交家”。

周恩来在树立和发扬我党的优良作风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一贯理论联系实际，无论在革命斗争中或经济建设中，都注意从实际出发，不说空话，说到做到。他又善于在实际工作中总结经验教训，上升到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实际。曾有人把周恩来作为“经验主义”的代表，甚至认为当了王明教条主义的俘虏，致使王明上台，这是违反历史事实的；

他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极为关心人民的利益，哪里的群众遭受灾害，他就设法解救，甚至亲自到现场去解决问题。

他是大家公认的自我批评的模范。从不文过饰非，犯了错误，发现后立即纠正，并以此为诫，公开检讨。所属干部犯了错误，除用与人为善的态度批评纠正外，还承担领导者的责任。

他身居高位，始终以“人民公仆”的身份出现在干部和群众之中。他一生都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坚决反对铺张浪费，特别是贪污腐化作风。他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服从组织，遵守纪律，廉洁奉公，大公无私，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是我的好老师。无论在思想、政治、文化、工作各方面，我都是在他的言传身教和耐心教导下成长、提高起来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国民党特务包围、监视下做了10多年的机要工作，保证了长江局、南方局、南京局和党中央及地方党机要通讯的畅通，保证了党的核心机密。这是周恩来亲自领导的结果。

总之，周恩来的一生，为中华民族、为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了伟大的

贡献，永远值得怀念。他给党和人民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和学习。

我后悔在过去学习得很不够，现在年过 80，还要继续学习，最主要的是要学习他那“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为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伟大精神！

敬爱的恩来同志万古不朽！

后记

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起，到周恩来逝世为止，我在他的身边或在他领导下工作了近40年。很早以前，我就想把自己在40年间亲历、亲见、亲闻写出来，以便让后人更加了解这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但周恩来在世时，从不赞成宣传他，龙飞虎同志曾写过一本《跟随周副主席十年》，受到他的批评，因此我的愿望只能埋藏在心中。

1977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周年，我曾写一篇介绍周恩来抗战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情况的文章，送到一家大报。该报编辑部说，奉“宣传口”负责人指示，不要以个人名义写纪念周总理的文章。稿件被退回了。这不但没有打消我写文章纪念周总理的念头，相反地更激发了我写一本有关周恩来的书的决心，把我所了解的情况反映出来，使更多的人学习周恩来，研究周恩来，也为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传统贡献一点力量。当时我在中央统战部担任副部长，繁忙的工作使我抽不出时间来做这件事。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加强党史工作，为此，先后成立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并在全国备省、市、自治区建立党史征集、研究机构，负责征集、研究和出版党史资料及有关著作。1982年，中央决定由我兼任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因为我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参加过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的长江局、南方局和南京局工作，于是分工要我负责征集和编辑出版上述3个中央局的党史资料。这些资料是整个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亟需出版，以供党史界研究。周恩来是长江局副书记、南方局、南京局的书记，所以这3个中央局同周恩来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些资料为我写作周恩来的书提供了可靠的根据。为了完成这个任务，1982年，我向中央请求从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专门从事党史工作，得到中央的批准。在中征委领导下，成立了南方局党史征集小组，孔原任组长，我和许涤新、郑伯克、徐迈进任副组长，在四川、重庆和南方有关省、市党史部门的支持下，编辑出版了《南方局党史资料》6册200余万字，后来又在中央和地方有关党史部门的支持合作下，出版了《抗战初期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中央南京局》。在这些工作还正进行中，我向陈云和杨尚昆同志报告要撰写回忆周恩来的书，书名为《风雨四十年》。他们都表示支持。陈云同志欣然命笔，为该书题写书名，杨尚昆同志也惠允作序。我也向邓颖超大姐谈了我的打算，她很赞成。后来我每次见到她，她总要问我：“你的‘四十年’怎样了？”由于上述党史资料出版工作没有最后完成，我还不能着手撰写，只在1985年12月，和杨村、田俊江、紫非4人到福州座谈了一个时期，并由杨村整理出一个撰写提纲。

为了摆脱在北京的各种活动，专心致志地投入撰写工作，我向中央写了报告，打算回原籍福建，定居于漳州。经中央和福建省委批准，1990年底，我与老伴、战友紫非来到漳州。在福建省委、漳州市委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我的生活很快安定下来了，紫非不顾年老多病，全部负起家务和接待工作，使我开始了撰写工作。

有关周恩来的资料浩如烟海，单是我了解的情况，内容也是够丰富的。要在纷繁的头绪中理出一根红线，并非易事。由于我在1981年患过心肌梗

塞，而且年事已高，不能过于劳累。如果全书都由我亲自执笔，既力不从心，也会迁延时日。我邀请原光明日报出版社社长陈清泉同志给予协助。他欣然同意，在我提供资料和口述材料的基础上，起草了第一部将近一半的章节。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胡康民、赵权壁和红岩纪念馆王明湘、王弘、刘英等同志，起草了开创大后方工作、皖南事变、隐蔽精干蓄积力量、重开国共谈判大门4章的初稿，由陈清泉作了修改补充。第一部的初稿完成后，我认真作了修订，再由陈清泉作文字修饰。

原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方提出了不少意见，我的秘书戴学平、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叶平霞，也做了不少辅助工作。

1993年9月下旬，中央文献出版社社长李庚奇同志，副总编辑谭德山同志，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廖心文同志，应邀来漳州进行审稿，他们对稿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作为该书责任编辑的谭德山、廖心文，在核对资料、调整结构以及文字加工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

《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于1994年11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这不是周恩来的传记，也不是单纯个人的回忆，而是以我的亲历、亲见、亲闻为主，参酌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和档案资料、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提供的情况和许多同志研究的成果而写成的。它不可能全面反映周恩来前半生的丰功伟绩，只是着重介绍建国以前我在他身边和直接领导下工作时所经历的事情，他所遭遇到的风风雨雨。这里大量的的是他的业绩，也直书了出现的失误。

使我感到遗憾的是，一直关心我写这本书的邓大姐，未能看到《风雨四十年》第一部的出版，已于1992年去世。老伴紫非也于1993年7月14日去世，不能和我分享夙愿实现的喜悦。我只能在她遗像之前放置一册，让她在九泉之下得到告慰。

1993年10月初，我正准备着手撰写《风雨四十年》第二部，内容是建国以后的事情。不料因劳累过度我再次发生心肌梗塞。医生告诫我必须静养配合治疗，不能继续紧张地进行写作。中共漳州市委书记曹德淦同志、市长韩玉琳同志、秘书长杨琼等同志对我非常关心，十分支持我完成第二部的创作。于是由组织出面，邀请原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方等几位同志组成编写组，协助我整理资料，列出编写章节，根据我的口述和有关资料撰写初稿。并指定原漳州市委副秘书长李栓义同志负责有关写作的后勤工作。陈清泉同志仍负责起草了重要章节和统稿工作。

1994年12月，第二部的初稿已基本完成。其中：召开新政协、创立新中国和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两章，由肖林执笔；统一战线和为台湾回归奋斗部分，由熊展威执笔；知识分子工作部分，由陈方执笔；经济和外交两部分，由陈清泉执笔。有关国防建设的章节，由曾担任总理军事秘书的周家鼎执笔后由曾一石稍作增删，原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同志作了重要补充。“文化大革命”部分，1965年至1973年这一段，由巩玉阁执笔，1974年“批林批孔”至周恩来逝世这段，由阮黄南执笔。“9.13”事件发生时，我已靠边站，在五七干校劳动，周恩来如何处理这一事件，我不了解，但事后听到传达，听过参加当时工作的纪登奎等同志的叙述，特别是当时担任警卫工作的高振普同志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最后一章“周恩来在我的心中”，则是我自己执笔的。

第二部的初稿基本完成后，于1994年12月中旬在漳州举行了审稿会。

我的老战友、原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同志和周家鼎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副总编辑谭德山同志、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熊华源同志，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毛祥瑞、副主任林强同志，都参加了这次审稿会，并对本书内容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罗青长、周家鼎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他们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使本书增色不少。

原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同志、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顾明同志、周总理外事秘书马列同志，以及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研究周恩来的专家力平同志，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李青同志、王仁同志，看过部分稿件，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此外，在第二部编写期间，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张湘、朱汝宁、苏滨英、叶平霞、陈振煌等同志，也做了许多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周恩来总理的工作是全面的政府工作，而《风雨四十年》第二部没有包括诸如内政、文教卫生等方面的工作，只是写我所了解和接触较多的方面的事情，所以是很不全面的。其中也不乏疏漏或错误，希望读者指正。

《风雨四十年》一书是中共福建省委特别是漳州市委和上述许多同志的鼎力支持的结果。在第二部出版之际，我特向所有支持本书的编写、出版的单位和个人，致以衷心的感谢。

童小鹏
1995年3月

